Cornelius Ryan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著

王义国◎译

二战史诗三部曲

遥远的桥

1944 市场花园行动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降部队作战

盟军计划最完美却败得最惨烈的死亡之旅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Greatest Battle of World War II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遥远的桥：1944市场花园行动

作者:[美]科尼利厄斯·瑞恩

译者：王义国

ISBN:978750865265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前言

市场花园行动，1944年9月17—24日

★ ★ ★

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上午10点钟，有史以来为一次军事行动而集结起来的最大的运兵机群，从英格兰南部各地的机场起飞升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263周里，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动了市场花园行动，这是“二战”中最大胆而又最具想象力的作战行动之一。令人吃惊的是，这场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发起的联合攻势，其倡导者却是盟军所有将领当中最谨慎的一位———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市场”，即这次作战行动的空降方面，规模宏伟———有将近5000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以及2500多架滑翔机，参与了这次行动。在那个星期天，下午1点30分，盟军的整整一个空降集团军，配备车辆和装备，在一次史无前例的白天发起的袭击中，开始在德军营地的背后空降。这次大胆的、历史性的空降的目标，就是纳粹占领下的荷兰。

在地面，沿着荷兰与比利时边界，部署着“花园”方面的兵力，那是集结起来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坦克纵队。下午2：35，炮击之后，在战斗机群的引导下，坦克部队开始猛冲，沿着伞兵们已经夺取并保持畅通的一条战略路线，冲向荷兰的腹地。

蒙哥马利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让部队和坦克全速穿过荷兰，像利用跳板一样越过莱茵河，进入德国本土。蒙哥马利推论，市场花园行动就是推翻第三帝国并在1944年结束战争所需要的那个闪电般的一击。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istory of the greatestbattle of world war II

第一部 撤退

Part One The Retreat

1



在德里尔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甚至在破晓之前，烦躁不安的人们就已经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百叶窗后面的灯光也亮了起来。起初人们只是意识到有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正在外面发生。逐渐地，模糊的印象变得隐约可见了。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一种低沉的声音。

那声音几乎难以听见，但又持续不断，一阵一阵地传到了村子里。许多人由于无法把这难以捉摸的声音辨认出来，于是在听的时候，便本能地以为那是附近的下莱茵河的流动有了某种变化。荷兰的一半国土低于海平面，在荷兰，水是恒久不变的敌人，而在自11世纪以前一直进行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当中，堤岸则是主要的武器。德里尔村位于下莱茵河的一个大弯曲处，在阿纳姆的东南方，阿纳姆是海尔德兰注省的首府；德里尔村始终在提醒人们，有这么一场斗争。村子北边几百码处，有一座巨大的堤岸，堤岸的上方是一条马路，堤岸在一些地方有20多英尺高，这座堤岸挡住了400码宽的不安静的河流，保护着村子以及整个地区。但今天早晨，这条河流却并不是使人惊恐的理由。下莱茵河以它通常的流速———每小时2英里，平静地流入北海。在这座保护性堤岸的石壁上回荡的声音，来自另外一个无情得多的敌人。

当天色变亮，太阳开始驱散薄雾的时候，喧闹声也变大了。从德里尔正东方的马路上，村民们能够清晰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那声音似乎随

着每一分钟的过去都变得更大。现在他们的不安变成了惊恐，因为这个声音的身份已经毋庸置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五个年头，在被纳粹占领的51个月之后，每一个人都听得出来，那是德军车队在隆隆行驶。

更加令人惊恐的，是车队的规模。有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以前只有一次听见过这样的车流———那是在1940年5月，德国人入侵荷兰的时候。当时，在离德里尔10到15英里的第三帝国边界上，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蜂拥而过，驶上各条公路干线，然后迅速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在那些相同的马路上，车队似乎再次绵延不断地移动着。

奇怪的声音来自最近的一条公路干线———那是一条双车道的公路，它把位于下莱茵河北岸的阿纳姆与8世纪建成的奈梅亨市连接了起来，奈梅亨坐落在宽阔的瓦尔河上，在南边11英里处。与汽车发动机低沉的颤动声形成对照的是，人们能够清楚地辨认出一些独特的声音，它们奇特地与军事车队格格不入———那是马拉的四轮运货车车轮的刺耳刮擦声，数不清的自行车的啪啪作响声，以及缓慢、凌乱的拖着脚步的行走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车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前往何方？在战争中的这个时刻，荷兰的未来大有可能依赖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上。大多数人认为，车队运送着大量的增援部队———他们不是涌进荷兰增援驻军，就是匆匆赶往南方，以阻止盟军的前进。盟军已经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解放了法国北部，现在他们正在比利时作战，据说已经逼近首都布鲁塞尔，而布鲁塞尔离这里不到100英里。始终有谣传说，强大的盟军装甲部队正在朝荷兰边界大举猛攻。不过车队正在朝哪个方向行驶，德里尔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出。距离的遥远和声音的扩散，使得正确判断成为不可能。而且由于宵禁，村民们也不能走出家门去打听。

他们被心中无数疑问折磨着，只能等待。他们不可能知道，就在破晓之前，小小的德里尔村的德军驻军的3名年轻士兵，全都已经骑着偷来的自行车离开了村子，消失在雾霭之中。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军事当局来推行宵禁的规章制度了。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仍然待在家里。但他们当中那些更加好奇的人，已不耐烦等待，于是决定冒险打电话。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家在霍宁斯旷野街12号，隔壁就是她家的果酱工厂，她在家里给阿纳姆的朋友们打了电话。她几乎无法相信他们亲眼看见的情形，车队并不是前往南方或赶赴西部前线。就在这个薄雾蒙蒙的清晨，在1944年9月4日，德国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似乎是在逃离荷兰，是在使用能够移动的一切交通工具逃跑。

科拉认为，每个人原先预计要发生的那场战斗，现在将会离他们而去。她

错了。德里尔本来是个无足轻重的村庄，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战斗触碰，然而，对德里尔村来说，战争刚刚开始。

2



南方50英里处，在靠近比利时边界的城镇和村庄里，荷兰人兴高采烈。他们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遭到重创的希特勒军队的残部，正在川流不息地从窗外经过。崩溃似乎是个传染病，除了部队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和荷兰纳粹也在撤离。而且对这些逃跑的部队来说，所有的马路似乎全都通向德国边界。

由于撤退开始得非常缓慢———开始的时候只有稀稀落落的参谋车和普通车辆越过比利时边界———因而没有几个荷兰人能够精确说出撤退是何时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撤退开始于9月2日，有些人认为是3日。但到4日的时候，德国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的调动，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特征，那是一种发疯似的集体大逃亡，它在9月5日达到了顶峰。后来，在荷兰历史中，那一天被称为“发疯的星期二”（Dolle Dinsdag）。

惊恐和无序似乎就是德国人逃跑的特色。每一种交通工具都派上了用场。从比利时边界向北，直到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北，马路上挤满了卡车、公共汽车、参谋车、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马拉的农家大车，还有用木炭和木料提供动力的平民的汽车。在整个杂乱无序的车队里，到处都有成群的疲惫不堪、满身尘土的士兵骑着匆匆征用来的自行车。

甚至还有更加古怪的运输形式。在比利时边界北边几英里处的瓦尔肯斯瓦德镇，人们看见满身重负的德国士兵在吃力地踏着儿童的滑板车前行。在60英里以外的阿纳姆，成群的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视着两匹步履艰难的农用马，拖着一辆巨大的灰黑色灵车缓缓经过。灵车放置棺材的地方，挤坐着二十来个衣冠不整、精疲力竭的德国人。

在这些可怜的车队当中，是步履蹒跚的多个部队的德国士兵。有穿着黑色的作战服却没有了坦克的装甲兵；有德国空军，那些不是在法国就是在比利时遭受了重创的德国空军，所剩余的人员大概就是这些了；有来自二十多个师的德国国防军士兵；还有武装党卫军，他们的骷髅画徽章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身份证明。圣奥登罗得的年轻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着这些显然无人带领、神情茫然的部队毫无目的地前进，心中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令在旁边观看的荷兰人感到既辛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士兵连方向都搞不清

楚，还要询问到德国边界怎么走。

工业城市艾因霍温，是特大企业菲利浦电器公司的所在地，那里的市民听见来自比利时的低沉炮声，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现在，人们注视着吃了败仗的德军残兵败将挤满马路，暗自预料盟军部队不出几个小时就会到达，德国人也这么认为。弗朗斯·科尔蒂是市政府财政局的一位24岁的雇员，在他看来，这些部队无意奋力抵抗。从附近的机场传来爆炸的轰响声，那是工兵在炸毁机场跑道、军火临时存放处、汽油储存罐和飞机库。透过从城市上空飘浮过去的一层烟幕，科尔蒂看到，一个个小分队的士兵正在忙碌，把架在菲利浦电器公司大楼屋顶上的沉重的高射炮卸下来。

在整个地区，从艾因霍温向北，一直到奈梅亨市，德国工兵都在努力工作。小学教师科内利斯·德维瑟尔看到，在流经费赫尔市南边的南威廉斯瓦特运河上，一艘满载货物的驳船被炸飞了，飞机发动机的部件飞了起来，就像一阵致命的弹片雨。不远处，在乌登村，45岁的汽车车身制造商约翰内斯·德格鲁特正和家人一起注视着这场撤退，这时德国人放火烧掉了离他家不到300码远的一座以前的荷兰兵营。几分钟以后，存放在兵营里的重型炸弹爆炸了，炸死了德格鲁特的四个孩子，他们的年龄从5岁到18岁不等。

在像艾因霍温这样的地方，学校大楼成了火海，由于不允许消防队前去救火，因而一片片街区被烧毁了。不过与在马路上逃跑的队列形成对比的是，有证据表明，工兵们是在按照某个确定的计划行事。

在逃亡者当中，最惊恐、混乱的莫过于平民了，那是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纳粹帮凶。荷兰人丝毫也不同情他们。在圣奥登罗得的农民约翰内斯·赫尔森看来，他们显然是“吓呆了”，而且他快意地想到，他们有理由吓呆，因为由于盟军“在他们的脚跟后猛追，这些卖国贼知道，斧头节（Bijltjesdag）到了”。

荷兰纳粹和德国平民惊恐万状的逃跑，是由荷兰的那位帝国特派员（Reichskommissar）所引发的，此人便是臭名昭著的52岁的阿图尔·赛易斯－英夸特博士，同时也是被那位野心勃勃而又残暴的荷兰纳粹党领袖安东·穆瑟特引发的。赛易斯－英夸特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人的命运，于是在9月1日命令德国平民疏散到荷兰的东部，到距离帝国边界更近一些的地方。50岁的穆瑟特亦步亦趋，向他的荷兰纳粹党党员们发出了警报。赛易斯－英夸特和穆瑟特本人，就在首先离开的人们之中：他们从海牙向东撤离，来到阿珀尔多伦，阿珀尔多伦在阿纳姆以北15英里处。穆瑟特匆忙地把家人送到更靠近帝国的地方，把他们安置在边界

地带的特文特，特文特在上艾瑟尔省。起初，大多数德国和荷兰的平民在搬家时还是从容不迫的，然后一连串的事件引发了混乱。9月3日，英军攻占了布鲁塞尔，第二天安特卫普陷落。现在，英国人的坦克和部队离荷兰边界只有几英里远了。

在这些令人震惊的胜利之后不久，荷兰年迈的女王威廉明娜，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告诉她的人民，解放在即。她宣布，她的女婿伯恩哈德亲王殿下已经被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也将领导所有的地下抵抗组织。这些派别包括三个明显不同的组织，在政治上既有左派，也有极右派，现在他们将聚集在一起，正式的名称是内政部队（BinnenlandseStrijdkrachten）。33岁的伯恩哈德亲王，是王位继承人朱莉安娜公主的丈夫，他在女王宣布之后，也发表了自己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地下抵抗组织准备好臂章，臂章上“用清晰的字母展示出‘橘子’一词”，但“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得佩戴它们。他告诫他们：“在当前的热情中切勿采取草率而又独立的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将会使你们自己以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处于困境。”

接下来，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一个特别的广播演说，证实自由在即。“荷兰等待了这么久的解放时刻，现在已非常接近了。”他许诺说。这些广播发表后没过几个小时，那个最为乐观的声明发表了，是荷兰流亡政府的首相皮特·S·格布兰迪发表的。他告诉他的听众：“现在盟军在其不可抗拒的推进中，已经越过了荷兰边界……我要求你们所有的人，竭诚欢迎盟军来到我们的祖国。”

荷兰人欣喜若狂，荷兰的纳粹们则在逃命。安东·穆瑟特一直吹嘘他的党有5万多名纳粹。在荷兰人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似乎全都同时起程了。在荷兰各地的几十个城镇和村庄里，纳粹任命的镇长和官员们突然拔腿开跑———不过往往是要求先拿到工资以后再逃跑。艾因霍温市市长以及他的一些官员，坚持要拿到工资。市政府办事员杰拉杜斯·勒基尤斯认为，他们的姿态荒唐可笑，不过对于发给他们工资后解雇他们，他甚至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看到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车”匆匆出城，他心中纳闷：“他们能走多远？他们能到哪里去？”银行也发生了挤兑。尼古拉斯·范·德韦尔德是一位24岁的银行职员，9月4日，星期一，他去瓦赫宁恩镇上班的时候，看见排成了队的荷兰纳粹在银行外面等候。银行一开门，他们便匆匆撤销账户，同时把贵重物品存放箱里面的东西也全部取出来。

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是极度惊恐的平民。开往德国的火车挤得满满当当。有一列火车抵达阿纳姆，年轻的弗朗斯·维辛在走下火车的时候，被争先恐后要上车的人海吞没了。人们是如此行色匆匆，在火车离开之后，维辛看见堆积如山的行李被丢弃在站台上。在奈梅亨西边的泽坦村，学生保

罗·范·维利看见，荷兰纳粹们挤在火车站里，整天等待开往德国的火车，可是火车根本没来。女人和孩子在哭叫，在范·维利看来，“候车室就像一个废旧杂物店，里面全是游民”。每一个城镇都有类似的事件。荷兰通敌者们用凡是能够移动的东西逃跑。市政建筑师威廉·蒂曼斯从他位于阿纳姆大桥附近办公室的窗户看到，荷兰纳粹们“疯狂地爬上”一艘驳船，沿着莱茵河向帝国驶去。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车辆行人越来越多，甚至在天黑以后这种情况也在继续。德国人急切地要抵达安全地带，以至于在9月3日和4日的夜晚，士兵们完全置盟军的空袭于不顾，在某些十字路口竖起了探照灯，许多超载的车辆缓慢通过，车辆前灯的强光令人目眩。德国军官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安东·莱特维尔医生是阿纳姆的一位全科医生，他看见士兵们扔掉步枪———有些士兵甚至试图把他们的武器卖给荷兰人。朱珀·穆塞拉斯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看见一个中尉试图叫一辆军车停下来，但司机却对这个命令视而不见，径直开了过去，气得那位军官拔出手枪，失去理智地朝着鹅卵石地面开火。

到处都有士兵试图开小差。在埃尔德村，18岁的办事员阿德里阿努斯·马里纳斯注意到，有一个士兵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朝一个农场跑去，消失了。后来马里纳斯得知，那个士兵原本是一名苏联战俘，后被招兵，当了德国国防军。离奈梅亨两英里的地方，在位于瓦尔河北岸的伦特村，弗朗斯·休伊金医生在例行巡诊的时候，看见有士兵在讨要老百姓的衣服，而村民们拒绝了。在奈梅亨，逃兵们却不这么卑躬屈膝，许多类似情况中，他们是用枪逼着对方交出衣服来。威廉姆斯·彼得斯牧师是一位40岁的加尔默罗会修士，他看见士兵们匆匆脱下制服，换上套装，然后步行前往德国边界。“德国人对战争完全厌倦了，”阿纳姆的林业督察长加里特·梅姆林克回忆道，“他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躲避宪兵队。”

由于军官们失去了控制，军纪也就荡然无存。成群结队的无法无天的士兵们偷窃马匹、马车、汽车和自行车。有的士兵用枪威逼着农民，要他们用自己的马车把他们拉到德国去。荷兰人看见，在整个车队里，在卡车、农用马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逃兵们推着的婴儿车———上面，高高地堆放着从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偷来的赃物。赃物从雕像和家具，到女式内衣裤，无奇不有。在奈梅亨，士兵们试图出售缝纫机、成卷的布匹、油画、打字机———有一名士兵甚至还用一个大笼子装了一只鹦鹉出售。

在撤退的德国人当中，不可或缺的是酒。离德国边界不到5英里的地方，在格鲁斯贝克镇，赫尔曼·霍伊克神父注意到，有一些马拉的大车装载着大量的葡萄酒和烈性酒，车辆已是不堪重负。在阿纳姆，赖因霍尔德·戴伊克牧师发现，喧闹的德国国防军坐在一辆卡车上，喝着一个巨大酒桶里的葡

萄酒，那酒桶显然是他们老远从法国带来的。16岁的阿加莎·舒尔特是阿纳姆市医院总药剂师的女儿，她确信，她所看见的士兵大多是醉醺醺的。那些士兵将成把的法国和比利时硬币扔给小孩子们，而且试图把一瓶瓶葡萄酒、香槟酒和法国干邑白兰地卖给成年人。她的母亲亨德丽娜·舒尔特生动地回忆说，她看见有一辆德国卡车装载着另外一种赃物，那是一张大双人床———而且床上还有一个女人。注

除了从南方赶来的成群结队的掉队者之外，从荷兰的西部和沿海也来了大量的德国人和平民。行人车辆像洪水泛滥一样，穿过阿纳姆，朝东前往德国。在阿纳姆经济发达的郊区奥斯特贝克，38岁的化学工程师扬·沃斯奎尔正躲藏在他岳父家里。在得知自己被列在荷兰人质的名单里，将被德国人逮捕之后，他便从20英里之外的海尔德马尔森镇的家里，带着妻子伯莎和9岁的儿子逃了出来。他来到奥斯特贝克的时候，正赶上看见这场撤离。扬的岳父告诉他，不要“再担心德国人了，现在你不必‘躲藏’了”。沃斯奎尔朝下面看着奥斯特贝克的大街，只见“全然的混乱”。有几十辆装满德国人的卡车首尾相接，“全都是危险超载”。他看见士兵们“骑着自行车，拼命踩着踏板，车把手上挂着手提箱和旅行袋”。沃斯奎尔确信，不出几天的时间战争就将结束。

在阿纳姆，坐落着一座气势宏大的圣优西比乌斯教堂注，该教堂建于15世纪，有一个高305英尺的著名塔楼。扬·迈恩哈特就是这座大教堂（GroteKerk）的司事。他看见德国佬（Moffen，这是荷兰人给德国人起的绰号，相当于英语中的“Jerry”）鱼贯而行穿过市区，“四人并排，朝德国的方向走去”。有些德国佬显得年老体衰。在附近的埃德村，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恳求青年鲁道夫·范·德奥，请他通知他在德国的家人，就说他们见过面。“我有心脏病，”他又说，“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卢西亚努斯·弗罗曼是阿纳姆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他注意到，德国人筋疲力尽，“没有剩下一点战斗精神或者自豪感”。他看见军官们试图在一片混乱的士兵当中恢复秩序，但收效甚微或者根本没有效果。有些荷兰人叫喊道：“滚回去！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个小时以后就要到这里了。”对此他们甚至都没有反应。

皮特·德格拉夫医生是一位44岁的外科医生，他注视着德国人从阿纳姆向东边移动，心中确信，他看见了“德国军队的末日，看见了德国军队显而易见的崩溃”。而中学数学教师苏塞·范·茨韦登则有一个特殊的理由要记住这个日子。她的丈夫约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雕塑家，因为藏匿荷兰犹太人，自1942年就被关在达豪集中营里注。现在他可能很快就要被释放了，因为显然战争几乎结束了。苏塞决心要目睹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德国人的离开和盟军解放者的到达。她的儿子罗伯特年纪太小，难以理解

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她决定要带9岁的女儿索尼娅进城。当苏塞给索尼娅穿衣服的时候，她说道：“这是你一定要看看的事情。我要你尽力一辈子都记住它。”

荷兰人到处都欢欣鼓舞。荷兰国旗露面了。富于创业精神的商人们把带有橘子图案的小徽章和储备量很大的缎带卖给充满渴望的人群。在伦库姆村，人们在当地的布店里抢购，经理约翰内斯·斯努克忙着剪橘色缎带，他能剪得多快，就能卖得多快。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村民们当场就把缎带结成蝴蝶结，骄傲地用别针别在衣服上。约翰内斯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他认为“这有点过分”。为了避免村民过激惹祸，他不卖缎带了。他的妹妹玛丽亚受到这种兴奋的感染，在她的日记里快乐地写道：“街道上的那种情绪，好像在过女王节（Konin - ginnedag）一般。”欢呼的人群站在人行道上，叫喊：“女王万岁！”人们唱着荷兰国歌《威廉颂》（Wilhelmus）和歌曲《橘子至高无上！》（OrangeBoven！）。修女安东尼娅·斯特兰茨基和克里斯廷·范·戴伊克供职于阿纳姆市圣伊丽莎白医院，她俩骑着自行车来到市内的主要广场费尔珀广场，一路长袍飘扬。在广场里，一个个咖啡馆外面的露天平台上人头攒动，她们也加入了进去，和大家一起啜饮着咖啡，吃着马铃薯饼，而与此同时，德国和荷兰的纳粹们正络绎不绝地从旁边经过。

在奈梅亨的圣卡尼修斯医院注，修女M·多塞特·西蒙斯看见，护士们在女修道院的走廊里欢快地跳着舞。人们把藏了好久的收音机拿了出来，一边注视着窗外洪水泛滥般的撤退人流，一边好多个月以来第一次公开收听广播，那是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橘子无线电台的荷兰语特别节目。圣奥登罗得的果农约翰内斯·胡尔克斯听了广播激动万分，结果竟没有发现在他家后面的一群德国人，把他家的几辆自行车偷走了。

许多地方学校关门，工作停止。在瓦尔肯斯瓦德，雪茄厂的工人们立刻离开机器，蜂拥来到街道上。在政府所在地海牙，电车停驶。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气氛既紧张，又如梦幻一般。办公室都关了门，股票交易停止。通衢大道上的军队突然没有了踪影，而德国和荷兰的纳粹则围住了中央车站。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郊外，成群的人们举着旗帜，拿着鲜花，站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马路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先看到英军坦克从南方驶来的人。

随着每一个小时的过去，谣传也在疯长。在阿姆斯特丹，许多人认为英国部队已经解放了海牙，而海牙离海岸不远，在阿姆斯特丹西南大约30英里的地方。而在海牙，人们则认为，离他们15英里的那个伟大的鹿特丹港注已经被解放了。乘坐火车旅行的人，每次火车停下，就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其中一位旅客亨利·佩伊南堡是一位25岁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他正

从海牙前往他在奈梅亨的家，这是一段不到80英里的路程。旅行开始的时候，他便听说英国人已经进入了古老的边境城市马斯特里赫特。在乌得勒支，他被告知，英国人已经到了鲁尔河蒙德。然后，在阿纳姆，人们又向他保证说，英国人已经攻占了芬洛，芬洛离德国边界只有几英里远。“当我终于到家的时候，”他回忆说，“我本来以为会看见盟军在街上，但我所看到的全都是正在撤退的德国人。”佩伊南堡感到既糊涂又不安。

还有别的人和他一样关注形势———在海牙秘密举行会议的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尤其如此。他们紧张地注视着事态发展，在他们看来，荷兰似乎就站在自由的门槛上。盟军的坦克能够轻而易举迅速穿越国土，从比利时边界直达须得海(注)。地下抵抗组织确信，那个穿过荷兰、跨越莱茵河并进入德国的“通道”，已经敞开了大门。

抵抗组织的领导人知道，德国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能够阻止盟军坚定的大规模强攻的作战兵力。对于那一个软弱而又人员配备不足的师，他们不屑一顾，那个师由老年人组成，守卫着沿海的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坐在水泥地堡里，一枪都没有放过）。对于别的不入流的部队，他们也几乎不屑一顾，那些部队的作战能力大大令人怀疑，其中有荷兰的党卫军、匆匆组成的卫戍部队、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的人———那些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的人所组成的部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胃营”和“耳朵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患有胃溃疡，就是耳背。

在荷兰人看来，盟军的行动意图似乎是明显的，进攻在即。但盟军的胜利，却依赖于英军从南方发起的大规模强攻的速度，而有关这一点，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确定盟军的挺进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格布兰迪首相的声明说，盟军的部队已经越过了边界，但这话是否确凿，调查起来却又绝没那么简单。荷兰是个小国，面积只有爱尔兰的大约三分之二，但人口密集，有900多万人，德国人要控制颠覆活动，也就有了困难。在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都有地下抵抗力量的基层组织。虽说如此，传递情报也是危险的。主要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使用复杂的电路、秘密的线路和密码消息，在全国各地通电话。这样一来，在这个重要时刻，地下组织的官员们没出几分钟便知道，格布兰迪的声明为时过早了———英军部队并没有越过边界。

橘子无线电台的其他广播则是进一步乱上添乱。在12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里，英国广播公司的荷兰语节目两次（一次是在9月4日晚上11：45，一次是在9月5日的上午）宣布，离比利时边界7英里远的荷兰城市布雷达

———这座要塞城市———已经被解放了。消息迅速传开。秘密印刷的报纸立即准备了解放专号，报道“布雷达的陷落”。不过阿纳姆地区抵抗力量的领导人，38岁的皮特·克鲁伊夫，却对橘子无线电台的新闻快报深表怀疑。克鲁伊夫的小组是国内技能最精湛、纪律最严明的小组之一。他立即让他的通信专家约翰内斯·施泰因福特核对这个报道，施泰因福特是一家电话公司的年轻的仪器制造工人。施泰因福特迅速用一条秘密电路接通，与在布雷达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结果他成了最先得知那个痛苦真相的人之一：那座城市仍然在德国人的掌握之中。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盟军部队，不论那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由于谣传泛滥，因而许多抵抗小组匆匆聚集起来，讨论该怎么办。尽管伯恩哈德亲王和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已经提醒人们，不要发动大起义，但一些地下组织成员已经没有耐心了。他们相信，到了该直接面对敌人，从而帮助挺进的盟军的时候了。显然，德国人害怕大造反。地下组织注意到，在撤退的队列中，卫兵现在是坐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步枪和冲锋枪随时准备射击。抵抗力量的许多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急于战斗。

在奥斯特贝克西北几英里处的埃德村，25岁的梅诺·托尼·德努易，试图说服他的小组领导人比尔·维尔德布尔发动袭击。托尼争论说，一旦盟军入侵，这个小组就应该接管埃德村，这是老早以前的计划了。埃德村的营房，原先是用来训练德国海军陆战队的，现在实际上已是空无一人。德努易想占领那些建筑。年纪比他大的维尔德布尔，原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军士长，他不同意这么做。“这个形势我信不过，”他告诉德努易，“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必须等待。”

并非地下组织的所有活动都被控制住了。在鹿特丹，地下组织的成员占领了自来水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荷兰比利时边界的阿克瑟尔村，村公所连同其古老的护城墙被攻占了下来，几百名德国士兵向平民战士投降。在许多城镇里，许多纳粹官员在试图开溜的时候被抓住。阿纳姆以西的沃尔夫黑策村，主要以其精神病院而闻名，在这个村子里，当地的警察局长在自己的车里被抓住了。他被临时关在最近的现成住所，也就是疯人院，准备在英国人“到达的时候”被交出去。

这些都是例外。总的看来，地下组织保持着平静。然而在各处，他们都利用这个混乱的局面，为盟军的到达做着准备。在阿纳姆，42岁的夏尔·拉布谢尔是一个古老的法国家族的后裔，他积极参加一个情报组织的活动，忙得无暇理会谣传。他与几个助手一起，坐在阿纳姆大桥附近一个办公室的窗子边，一个又一个小时地注视着，他们看见德国部队在朝东和东北方向开拔，沿着泽文纳尔公路和聚特芬公路前往德国。拉布谢尔的任务，就是估计部队的人数，如果可能的话把部队辨认出来。他记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情报，由信使送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经由一个秘密网络送到伦敦。

在奥斯特贝克郊外，年轻的扬·埃以克尔霍夫毫不张扬地穿过人群，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整个地区，把伪造的食品配给证交给那些躲避德国人的荷兰人。57岁的约翰努斯·彭西尔，是阿纳姆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人，人称“老头儿”，他的部下认为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传奇人物。他断定，到了该转移他武器库的时候了。在到处都是德国部队的情况下，他和几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助手，公开驾驶着一辆面包店的厢式运货车，沉着地来到市医院，武器就藏在市医院里。他们迅速把武器包在棕色的纸里，把隐藏的武器全都运送到彭西尔的家里。从他家地下室的窗子能把主广场看得一清二楚，很是方便。彭西尔和他的副手图恩·范·达伦都认为，到时候这就是一个可以向德国人开火的完美阵地。他们的这个军事分支名为“使用暴力的小伙子”（Landelyke Knokploegen），他们决心不辜负这个称号。

在各个地方，这支庞大的地下军队的男女成员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而在南部的城镇和乡村里，有人认为，荷兰的部分地区已经被解放了，他们于是跑出家门，准备欢迎解放者。在位于奈梅亨东南的奥斯村，蒂伯修斯·努德米尔神父看到兴高采烈的人群，心中想，空气中有着一种疯狂。他看见，人们怀着庆祝的心情互相拍着肩膀。他把在马路上行走的垂头丧气的德国人与欢欣鼓舞的荷兰旁观者进行了对照，特别提到，“一方面是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却是发疯的、无限的欢乐”。这位不喜形于色的荷兰牧师回忆说：“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正常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人们愈加焦虑不安。在奥斯特贝克主要大街的那家药店里，卡雷尔·德维特就开始担忧了。他告诉他的妻子兼主药剂师约翰娜，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盟军的飞机还没有攻击德国人的车辆和行人。弗朗斯·舒尔特是一位退役的荷兰少校，他认为这种普遍的热情为时尚早。德国人似乎是惨败了，对此舒尔特的弟弟和弟媳欣喜若狂，但舒尔特却并不以为然。“情况会恶化，”他告诫说，“德国人远没有被打败。相信我吧，如果盟军想要渡过莱茵河的话，我们会看到一场恶战的。”

3



希特勒所采取的关键措施已经启动。9月4日，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格尔利茨森林深处的元首司令部里，69岁的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准备前往西方前线。他本没有料到会得到新的任命。

冯·伦德施泰特原本被迫退休，这次又被突然召回，于四天之前奉命赶到拉斯滕堡。两个月以前，也就是7月2日，他还是西线总司令（用德国的军事术语来说，是OberbefehlshaberWest），冯·伦德施泰特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当时他正在试图处理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危机———盟军诺曼

底登陆的后果，而就在这时希特勒撤了他的职。

有关怎样才能最好地应对那个威胁，元首与德国最杰出的军人从未取得一致。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前，在呼吁派增援部队的时候，冯·伦德施泰特直言不讳地告知希特勒的司令部，也就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derWehrmacht），西方盟军在兵力、装备和飞机上占有优势，因而“想在哪里登陆，就能在哪里登陆”。希特勒则宣告，并非如此！大西洋墙，也就是那个建成了一部分的沿海防御工事，绵延几乎有3000英里，从（在挪威、芬兰边界的）希尔克尼斯[注]，直达（法国、西班牙边界上的）比利牛斯山脉。希特勒吹嘘说，这个大西洋墙将使得“这个前线对任何敌人来说都固若金汤”。冯·伦德施泰特太清楚了，这些防御工事与其说是事实，毋宁说是宣传。他用一个词总结了大西洋墙：“花招。”

传奇人物陆军元帅埃文·隆美尔，以其战争初年在北非沙漠里所取得的胜利而闻名于世，他被希特勒派去，在冯·伦德施泰特的手下指挥B集团军群，他也同样对元首的自信深表震惊。在隆美尔看来，这些沿海防御工事是“希特勒想象出来的仙境（Wolkenkuckuck□sheim）”。有贵族气派、拘泥传统的冯·伦德施泰特，与年轻而又雄心勃勃的隆美尔，大概第一次发现他们意见一致。然而，在另外一点上，他们有了冲突。1942年在阿拉曼，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被英国的蒙哥马利打败，对此隆美尔一直耿耿于怀，而且他深知盟军的入侵将会是什么样子，因而他认为必须在海滩上阻止入侵者。冯·伦德施泰特冷冰冰地表示不同意这位晚辈的意见———他挖苦这位晚辈为“乳臭未干的元帅”（MarschallBubi）；他力主在盟军部队登陆之后再消灭他。希特勒支持隆美尔的意见。在D日[注]，尽管隆美尔的即兴发挥才华横溢，但盟军部队还是在几个小时之内便攻破了这堵“固若金汤的墙”。

在随后的可怕日子里，盟军在诺曼底战场几乎拥有完全的优势，这令冯·伦德施泰特不知所措，他同时也受制于希特勒的“不得撤退”的命令———“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他站着的地方战斗到死”———所以他整个硬撑着的防线处处破裂。他不顾一切地填补裂隙，但尽管他的部下奋力作战，进行反击，其结局却从未有人认真地怀疑过。冯·伦德施泰特既不能“把入侵者赶到海里”，也不能“歼灭他们”（引语是希特勒的话）。

7月1日晚，当诺曼底战役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希特勒的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给冯·伦德施泰特打了电话，伤心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冯·伦德施泰特天生直言不讳，他厉声说：“结束这场战争，你们这些傻瓜。你们还能做什么？”在听到这话之后，希特勒的评论是温和的：“那个老头已经失去勇气了，再也控制不住局势了。他得离开。”24小时以

后，在一张客气的手写的条子上，希特勒告知冯·伦德施泰特，“考虑到你的健康，以及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大的压力”，他被解除了指挥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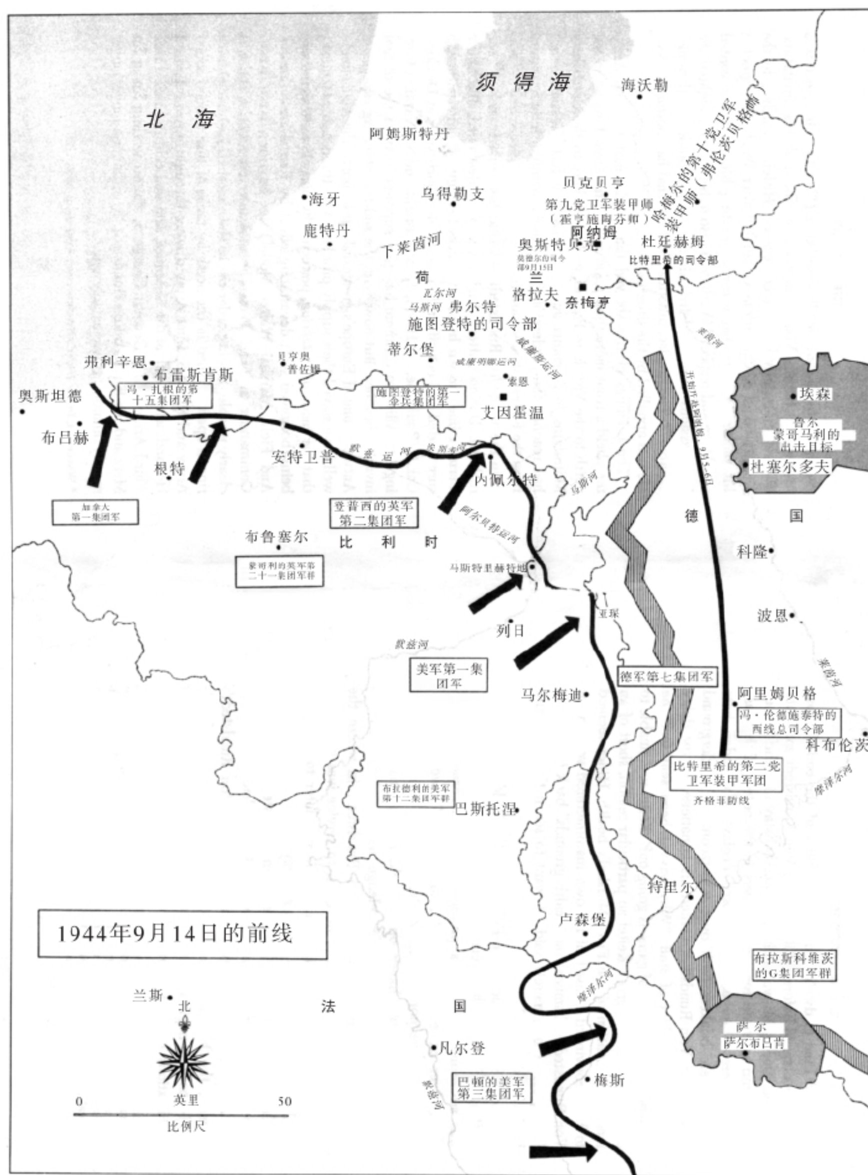
冯·伦德施泰特是德国国防军中的元老，是最可靠的陆军元帅，他对此不能相信。在5年的战争中，他以军事天才为第三帝国立下了不朽功勋。1939年，希特勒冷酷地进攻了波兰，从而引发了那场最终席卷整个世界的冲突，当时冯·伦德施泰特就清楚地展现了德国进行征服的模式———闪电战（Blitzkrieg）———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装甲部队便到了华沙的郊外。一年以后，希特勒转向西方，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击溃了西欧的大部分国家，当时冯·伦德施泰特率领着整整一个装甲集团军。而在1941年，当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候，他又是在最前线。现在，冯·伦德施泰特的事业和声望都处于险境，他义愤填膺地告诉他的参谋长京特·布卢门特里特少将，他被“一位业余战略家免职了，从而名誉扫地”。他怒气冲冲地说，那个“波希米亚下士，为了找到一只替罪羊，用我的年纪和身体有病作为借口免除了我的职务”[注]。冯·伦德施泰特已经计划，倘若放手让他干的话，他要缓慢地撤退到德国边界，他曾扼要地向布卢门特里特讲述了他的计划，也就是在撤退期间，他将会“对所放弃的每一英尺土地，让对方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正如他向他的参谋们多次讲到的，由于“来自上级”的不断“指导”，他作为西线总司令的唯一权威，也就是“更换门前的警卫”。[注]

冯·伦德施泰特再次被召回，于8月底来到拉斯滕堡的“狼穴”（Wolfsschanze），这个名字是希特勒起的，从那个时刻开始，在元首的邀请下，冯·伦德施泰特参加了每天的情况通报会。按照作战部副部长瓦尔特·沃利蒙特上将的说法，希特勒热情地欢迎他的这位资深陆军元帅，以“少有的羞怯和尊敬”对待他。沃利蒙特也注意到，在冗长的会议过程中，冯·伦德施泰特只是坐着，“动也不动，只说单音节的字”。[注]这位思考周密、注重实效的陆军元帅无话可说。局势令他深感震惊。

情况通报清楚地表明，在东方，苏联现在拥有了一条1400多英里长的前线，从北方的芬兰一直延伸到波兰的维斯瓦河，又从维斯瓦河延伸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喀尔巴阡山脉。事实上，苏联的装甲部队已经到达了东普鲁士的边界，离元首的司令部还不到100英里。

冯·伦德施泰特看到，在西边，他的最大恐惧已经变成了现实。一个又一个师现在被消灭了，整个德军防线绝望地后撤。殿后作战的部队虽然被包围了，切断了联系，但仍然固守在极其重要的港口里，比如敦刻尔克、加来、布洛涅、勒阿弗尔、布勒斯特、洛里昂和圣纳泽尔，这迫使盟军继续从远方的入侵海滩进行补给。然而现在，随着欧洲最大的深水海港之一———安特卫普突然而又令人目瞪口呆地被攻占，盟军可能已经很好地解

决了他们的补给问题。冯·伦德施泰特还注意到，那个经由他本人和其他人而臻于完美的闪电战战术，正在被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借用，且带来了毁灭性的效果。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那位54岁的德军新任西线总司令（他于8月17日接任）显然没有能力从混乱中带来秩序。他的前线已经被撕开了，大规模强攻穿过比利时前往荷兰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和美军第一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他的北部前线中劈出了一条通路。而在阿登高地的南边，乔治·S·巴顿将军所率领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的装甲部队，正在朝梅斯和萨尔河地区进发。在冯·伦德施泰特看来，局势不再仅仅是不祥，那是灾难性的。



他有充足的时间老是想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转眼四天过去了，希特勒才让冯·伦德施泰特私下觐见他。在等待的时候，这位陆军元帅待在一个以前的乡村客栈里，该客栈专供高级军官使用，位于巨大的司令部中心——司令部由一群带有地下设施的木屋和水泥地堡组成，周围围着铁丝网。冯·伦德施泰特对这个耽搁感到不耐烦，于是便朝参谋长凯特尔发泄。“为什

么把我召回？”他质问道，“现在玩的是什么游戏？”凯特尔无法告诉他，除了无伤大雅地提到陆军元帅的健康状况之外，希特勒并没有告诉凯特尔特别的原因。在7月的时候，希特勒基于“健康的理由”解除了冯·伦德施泰特的职务，这个理由本来是他编出来的，但现在他似乎确信冯·伦德施泰特的健康有问题。因而对凯特尔，希特勒只是说：“我想看看老人家的身体是否好转了。”

凯特尔两次提醒元首，陆军元帅正在等待。最后，在9月4日的下午，希特勒亲自召见了冯·伦德施泰特，而且难得的是，元首立即切入了正题，“我想再次把西方前线委托给你。”

冯·伦德施泰特笔挺地站立着，双手握着他的金色元帅节杖，只是点了点头。尽管他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尽管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反感，但在他的身上，那种尽职尽责的普鲁士军人传统根深蒂固，因而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拒绝这个任命。他后来回忆道：“不管怎么说，要抗议也是无济于事的。”注

希特勒几乎仓促地概述了冯·伦德施泰特的任务。希特勒再次即兴发挥。在D日以前，他就坚持认为大西洋墙固若金汤。现在，令冯·伦德施泰特忧虑的是，元首强调了西墙是固若金汤的———所谓西墙，也就是那些长期遭到忽略、没有配备兵力却仍然令人敬畏的前线防御工事，它以齐格菲防线的名称而为盟军所知。希特勒命令，冯·伦德施泰特不仅要把盟军阻挡在尽可能西边的地方，而且还要反攻，因为在元首看来，盟军的威胁当中，最危险的不过是“装甲先头部队”。然而，希特勒又显然被安特卫普的失守搞得心烦意乱。要不惜一切代价，使盟军不能占有极其重要的港口。希特勒说，这样一来，由于别的港口仍然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因而他预料，盟军的大举猛攻将会因为拉得太长的补给线而停顿。他确信，西部前线能够因此稳定下来，而且，随着冬季的到来，就能再次获得主动。希特勒向冯·伦德施泰特保证，他“对于西部的形势，并不是过分担心”。

这是冯·伦德施泰特曾经听过多次的一种长篇独白的一个变体。对希特勒来说，西墙现在已经成了一种顽念（ideefixe），冯·伦德施泰特再次受命，“寸土不让”，“不论什么情况都要顶住”。

希特勒命令冯·伦德施泰特取代陆军元帅莫德尔，这样一来，他就在两个月之内三次更换西线总司令———先是由冯·伦德施泰特换成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然后又换成莫德尔，现在又再次换成冯·伦德施泰特。莫德尔担任西线总司令仅仅18天，希特勒说，他现在将是冯·伦德施泰特的手下，只指挥B集团军群。冯·伦德施泰特素来对莫德尔没有什么兴趣，他感到，莫德尔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晋升的，他被希特勒过快地提拔为元

帅。冯·伦德施泰特认为，莫德尔更适合担任一个“好的准尉副官”。不过陆军元帅感觉，莫德尔的职务其实现在无关紧要。形势几乎没有希望，失败不可避免。在9月4日的下午，动身前往位于科布伦茨的司令部的时候，冯·伦德施泰特看不出能有什么办法阻止盟军入侵德国，进而渡过莱茵河，并在几个星期之内结束这场战争。

54岁的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是德国空降部队的创始人，在这同一天，在柏林市的万塞，在遭到贬谪长达三年之后，他又从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出现了。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大有作为的。施图登特认为，在1940年对荷兰的攻占中，他的伞兵部队立下了头功，当时有大约4000名伞兵在鹿特丹、多德雷赫特和穆尔代克的大桥上空降，从而让入侵的德国大军在这些极其重要的桥梁上畅通无阻。施图登特的损失却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只减员180人。但在1941年对克里特岛进行的空降袭击中，形势却大为不同，损失非常惨重———那支拥有22000人的部队，减员超过了三分之一，结果希特勒禁止以后再进行空降行动。“伞兵部队的时代已经过去！”元首说道。对施图登特来说，未来也就变得黯淡无光了。从那以后，这位雄心勃勃的军官就一直被束缚在办公桌的工作上，担任一个空降培训机构的指挥官，与此同时，他的精锐伞兵则被用作严格意义上的步兵。在这个关键的9月4日，在下午3点整，施图登特又突然出现在主流里，令人震惊。希特勒的作战部局长阿尔费雷德·约德尔大将给他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命令他立即组织一个集团军，元首将其定名为“第一伞兵集团军”。当大吃一惊的施图登特听电话的时候，心想：“对一支并不存在的部队来说，那是一个相当华而不实的头衔。”

施图登特的伞兵分散在德国各地，而且除了几支训练有素、装备完整的部队之外，大多是只配备以培训武器的刚招募来的新兵。他的兵力有大约1万人，几乎没有运输车辆、装甲车或者火炮。施图登特甚至没有一位参谋长。

然而，约德尔解释说，西线迫切需要施图登特的士兵，要由他们在安特卫普和列日到马斯特里赫特地区之间，“坚守一条沿着阿尔贝特运河的防线”，从而“堵住一个巨大的口子”。给施图登特的命令是，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率领他的部队赶到荷兰和比利时。武器和装备将在“目的地的铁道卸载点”发放。除了伞兵之外，还为他的新“集团军”拨出了两个师。施图登特很快就得知，其中的一个师，也就是第七一九师，是“由驻扎在荷兰沿海的老年人组成，他们到目前为止连一枪都没有放过”。他的第二个师，也就是第一七六师，则更加糟糕。它的成员是“伤残者和康复期病人，为了方便起见，他们按照所患的不同疾病而分别编在不同的营里”。为那些患有胃病的人，甚至还开设了特殊的“病号饭”厨房。除了这些部队

之外，他还将拥有分散在荷兰和比利时形形色色的别的兵力———德国空军部队、水兵和防空炮兵，另外还有25辆坦克。施图登特是伞兵战和训练超强的空降突击部队方面的专家，在他看来，这个临时凑合的集团军，是一种“荒唐的大规模心血来潮”。但不管怎么说，他又重返战争了。

在整个下午，通过电话和电传，施图登特把他的部下召集起来，派遣出去。他估计，要让他的全部兵力抵达前线，起码需要4天的时间。但他最强悍最优秀的部队，将在24个小时之内，在施图登特所称的“闪电调动”中，用火车专列匆匆运到荷兰，作为莫德尔B集团军群的一个部分，进入在阿尔贝特运河的阵地。

约德尔的电话，以及他本人从那以后搜集到的情报，令施图登特焦虑不安。显而易见，他最训练有素的部队———第六伞兵团，加上另外的一个营，总共大约有3000人———大概就是整个德国所拥有的唯一做好战斗准备的后备部队。他发现兆头不太吉利。

西线总司令瓦尔特·莫德尔元帅发疯似的试图堵住安特卫普东边那个张得很大的缺口，并试图阻止从比利时进入荷兰的秩序紊乱的撤退。到目前为止，有关冯·伦德施泰特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的消息还没有传过来。他的军队彼此纠缠在一起，一片混乱，几乎失控。他已经与他所统率部队的另外一半失去了联系，那另外的一半就是在南方的G集团军群。G集团军群的司令官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上将，是否已经成功地从法国撤退了？莫德尔拿不准。对这位疲惫不堪的陆军元帅来说，G集团军群的困境倒在其次，更大的危机显然是在北方。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装甲纵队，利落而又凶猛地把B集团军群分割成两半。在构成B集团军群的两个集团军当中，第十五集团军遭到了抑制，它背靠北海，大致被围困在从加来到安特卫普西北的一个地点之间。第七集团军几乎被消灭了，被赶回到马斯特里赫特和亚琛的方向。在这两个集团军之间，有一个75英里的缺口，英军已经强行通过这个缺口，直扑安特卫普。而在这同一个路线上仓促行进的，是莫德尔本人士气低落的撤退军队。

莫德尔绝望地想努力阻止他们的逃跑，于是向部队发出了一个感情用事的请求。

……随着敌人的推进和我们的前线的撤退，几十万士兵正在退却——陆军、空军和装甲部队——这些部队必须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改编，在新的据点或者防线坚守。

在这些川流不息的士兵当中，有一些溃散部队的余部，他们暂时没有确定的目标，甚至无法接收到清楚的命令。每当秩序井然的纵队离开马路进行重组的时候，川流不息的组织混乱的部队便继续赶路。他们的运货车在移

动，而窃窃私语、谣传、轻率的举动、无穷无尽的无秩序和邪恶的私利，也随之在移动。这种气氛正被带到后方地区，传染那些仍然完好无损的部队，因而在这个极端紧张的时刻，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予以制止。

我要唤起你们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我们输了一仗，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更多的东西，尽管我知道你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一些问题。不管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永远也不要失去你们对德国未来的信念。与此同时，你们也必须意识到形势的严峻。这个时刻将把男子汉和懦弱的人区分开来，也应该把他们区分开来。现在每一个军人都有同样的责任。当他的指挥官倒下的时候，他必须准备接替他的职位，继续下去……

下面是一连串冗长的指示，莫德尔在指示中“明确地”要求，撤退的部队应该“立即向最近的指挥点报到”，向其他人灌输“信心、自立、自控和乐观主义”，并且批驳“愚蠢的窃窃私语、谣传和不负责任的报道”。他说，敌人“并不是同时在各个地方”，而且确实，“要是把传播流言蜚语的人所报道的坦克都计算在内的话，那就会有10万辆了”。他乞求他的部下，不要“在迫不得已之前”，放弃重要的阵地或者毁掉装备、武器或者设施。这个令人吃惊的文件的结尾强调，一切都取决于“赢得时间，元首需要用这个时间，使新的武器和新的部队投入战斗”。

实际上，由于没有更多的通信工具，不得不主要依赖于无线电，因而莫德尔只能希望，他的“当日命令”能够让他的部队全都听到。在混乱之中，他甚至都不能确定，他组织混乱而又遭到重创的部队的最新位置在哪里；他也不能确切地知道，盟军的坦克和部队挺进到多远的地方。盟军大规模强攻的“主攻方向”（Schwerpunkt）是什么地方———北部的英军和美军是不是正朝齐格菲防线进发，并从那里渡过莱茵河，进入鲁尔河地区？而巴顿强大的美军第三集团军，是不是正在朝萨尔河地区、齐格菲防线大举猛攻，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兰克福？

莫德尔的困境是两个月以前出现的一种形势的后果。当时冯·伦德施泰特被解职，希特勒迅速任命冯·克卢格接替这位老陆军元帅。冯·克卢格原本在苏联统率那里的德军军队，后因伤休了几个月的病假，恰恰在希特勒决定免去冯·伦德施泰特的时刻，他对元首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希特勒开门见山，也可能是因为冯·克卢格碰巧是眼前唯一的一位资深军官，便任命这位大吃一惊的冯·克卢格为西线总司令。

冯·克卢格是位经验丰富的前线指挥官，于7月4日接任，一共干了44天。就像冯·伦德施泰特所预言的那样，盟军成功突破了。“整个西部前线被撕开了！”冯·克卢格告知希特勒。盟军排山倒海般从法国涌过，这让冯·克卢格不知所措，他就像前任冯·伦德施泰特一样，发现他的双手被希特勒的坚

持“不得撤退”的命令束缚住了。在法国的德国军队被包围了，几乎被消灭。正是在这一期间，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震撼了第三帝国————对希特勒的一次未遂行刺。

在元首司令部一次没完没了的会议过程中，一颗放在公文包里的定时炸弹爆炸了，炸死和炸伤了屋里的许多人。炸弹是由克劳斯·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放在靠近希特勒的桌子下面的。元首躲过了，只受了点轻伤。尽管介入这个密谋的只是几个精英军官，但希特勒却进行了野蛮的报复。凡是与密谋者有关系的人，或者与密谋者的家人有关系的人，都被逮捕了；许多人，不管是否无辜，都被立即处决注，大约有5000人失去了生命。冯·克卢格间接与此案有牵连，而且希特勒还怀疑他试图与敌人谈判投降。冯·克卢格被莫德尔取代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向元首报到。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以前，绝望的克卢格给元首写了一封信。然后，在前往德国的途中，他服毒自杀。

在给元首的信中，他写道：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我在我的权力之内，尽了一切力量，以应对这个形势。不论是隆美尔还是我，大概还有在西线的所有其他指挥官，凡是与在物质上占优势的英美联军有过作战经历的，都预见到当前的发展。我们的话没有人听。我们对形势的理解，并不是由悲观主义所决定的，而是产生于对事实的清醒了解。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色的陆军元帅莫德尔，是否能控制这个形势，我衷心希望他能。然而，倘若并非如此，而且你的新武器……又没有取得成功，那么，我的元首，就决定结束这场战争吧。到了该结束这个可怕事情的时候了……我一直钦佩你的伟大……钦佩你钢铁般的意志……现在也请你结束这个无望的挣扎，以表现出你是足够伟大的……

即使希特勒所吹嘘的那个将持续千年的第三帝国逐渐削弱，摇摇欲坠，他也无意承认盟军胜利了。在每一个前线，他都试图免于失败。然而元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似乎比前一个步骤都更不顾一切。

莫德尔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无济于事。莫德尔与冯·伦德施泰特不同，或者简而言之，与冯·克卢格也不同，他并没有得到隆美尔作战天才的支持。7月17日，盟军飞机的低空扫射使隆美尔受了重伤，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接替他。注起初莫德尔似乎并没有感到必要，他确信他能够扭转局势，于是承担了隆美尔原先的职务，结果他不仅是西线总司令，还身兼B集团军群司令。尽管莫德尔是内行，但这个形势对任何一位指挥官来说，都过于严峻了。

这时，B集团军群正在一条防线上为幸存下去而作战，那条防线大致是在从比利时海岸到法国和卢森堡的边界之间。从那里，朝南方一直到瑞士，莫德尔军队的其余部分———也就是布拉斯科维茨上将所率领的G集团军群，已经被消灭了。8月15日，法国和美国军队在马赛地区发动了盟军的第二次进攻，在此之后，布拉斯科维茨的集团军群便匆匆离开了法国南部。在持续的压力之下，他们正仓皇撤退到德国边界。

沿着莫德尔土崩瓦解的北部前线，盟军的装甲部队撕开了一个75英里宽的口子，因而那条从比利时进入荷兰，再从那里穿过德国脆弱的西北部边界的路线，也就畅通无阻了。那些大举猛攻进入荷兰的盟军部队，能够从齐格菲防线包抄过去，因为这个巨大的防御工事带从瑞士开始，沿着德国边界伸展过去，终点是荷兰与德国边界的克累弗。盟军如果从希特勒“西墙”的北端绕过去并且渡过莱茵河的话，就能挥师进入鲁尔河地区，那是帝国的工业心脏。这个调动足以带来德国的完全崩溃。

72小时之内，莫德尔两次绝望地吁请希特勒派出增援部队。在这个不设防的口子上，他的军队形势是混乱的。秩序需要恢复，口子需要堵住。莫德尔的最新报告是在9月4日凌晨发给希特勒的，报告提醒说，危机正在来临，他必须得到起码“25个作为生力军的师，以及5到6个装甲师组成的装甲后备部队”，否则整个前线就可能崩溃，从而打开“进入德国西北部的门户”。

莫德尔最关切的，就是英军进入了安特卫普。他并不知道，这个巨大的港口，这个欧洲第二大港，究竟是被完好无损攻占的，还是被德国卫戍部队毁掉了。安特卫普本身，由于深处内地，所以并非症结所在。要想使用安特卫普港的话，盟军需要控制它通向大海的通路，那条通路是一个水湾，其入海口为54英里长、3英里宽，它从北海进入荷兰，经过瓦尔赫伦岛，环绕着南贝弗兰半岛。只要德军的火炮能控制住斯海尔德河河口，盟军就无法进入安特卫普港。

对莫德尔来说最不幸的是，除了在瓦尔赫伦岛上的防空高射炮组和海岸重炮之外，他在北岸几乎没有军队。但在斯海尔德河的另外一边，几乎被孤立在加来海峡里面的，是古斯塔夫·冯·扎根上将的第十五集团军———这是一支有8万多兵力的军队。尽管他们被包围了———在他们的身后，北边和西边都是大海，而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又从南边和东边步步紧逼———但他们仍然控制着河口南岸的大部分地方。

莫德尔认为，英军的坦克部队一定会利用这个形势，沿着北岸前进，把北岸清扫干净。用不了多少时间，整个南贝弗兰半岛就可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在离安特卫普不到18英里的比利时边界北边的狭窄半岛底部封锁起

来，而将其与荷兰大陆隔开。接下来，为了打开港口，英国人就会进攻陷于困境的第十五集团军，清理南岸。因而必须把冯·扎根的军队解救出来。

9月4日下午晚些时候，在位于列日东南温泉村的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里，莫德尔发布了一连串的命令。他通过无线电，命令冯·扎根坚守斯海尔德河南岸，并增援敦刻尔克、布洛涅和加来这些小港，希特勒早些时候曾经颁布命令，要以“像要塞般的狂热决心”，来坚守这些小港。倒霉的冯·扎根要带着他的剩余部队，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冲进排山倒海般的英军装甲部队当中。这是孤注一掷，然而莫德尔却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扎根的进攻获得成功，就可能把安特卫普的英军孤立起来，并把正朝北方大举猛攻的蒙哥马利的装甲先头部队挡住。即使进攻失败了，冯·扎根的努力也可能争取到时间，延缓盟军的大举猛攻，足以让后备部队赶到，并沿着阿尔贝特运河坚守一个新的前线。

究竟有什么部队正赶来增援，莫德尔并不知道。天黑的时候，对于要求再增派若干个师的兵力以便稳定前线的请求，他终于收到了希特勒的答复。那是个简短的消息，即他的西线总司令一职，由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接任。冯·克卢格担任西线总司令44天，莫德尔则18天还不到。莫德尔通常是喜怒无常而又雄心勃勃的，但这一次却反应平静。他深刻地意识到他作为行政官员的短处，这一点批评他的人并没有看出来。[注]现在他可以集中在他最拿手的工作上了：担任一名前线指挥官，只是负责B集团军群。但是，在他担任西线总司令的最后一天，在他忙乱发布的一连串发狂的命令当中，有一个将证明是影响重大的。这个命令涉及他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调动。[注]

这个军团的司令，是50岁的党卫军中将威廉·比特里希，他已经有超过72个小时的时间与莫德尔失去联系了。自从诺曼底战役以来，他的军队就一直在作战，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比特里希的坦克损失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士兵缺少弹药和燃料。除此之外，由于通信手段的故障，比特里希通过无线电只收到过为数不多的几个命令，并且在他接收到的时候已经过时。由于不能确定敌人的动向，也由于非常需要得到指示，因而比特里希动身步行，去找莫德尔。他最终在列日附近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里找到了这位陆军元帅。“自1941年在苏联前线见面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莫德尔戴着单片眼镜，还是穿着他的短皮外套，正站着看地图，同时厉声下达一个又一个的命令。没有多少时间进行交谈。我被告知，正式的命令将随后下达，在等待正式命令期间，要把我的军团司令部向北迁移到荷兰去。”比特里希得到的指示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监督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的改组和恢复”。莫德尔告诉他，这两支遭到重创的部队要“缓慢地脱离战斗，立即前往北方”。[注]

这位几乎不出名的比特里希几乎无法预见到，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的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莫德尔为比特里希选择的地点，是一个安静的区域，此时在前线后面大约75英里远的地方。由于历史上的偶然，这个地区把阿纳姆市包括了进去。

4



德国人从荷兰的仓促撤退放慢了速度，尽管到目前为止，兴高采烈的荷兰人当中还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自比利时边界向北直到阿纳姆，马路仍然堵塞，但移动中却有着一种不同。夏尔·拉布谢尔的工作单位，是在阿纳姆大桥上方的省政府大楼里，他从那里看见过桥的车辆、部队以及纳粹同情者的洪流并没有减弱。但在拉布谢尔的位置往北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古书书商格尔哈杜斯·吉斯伯斯，却看见了一种变化。吉斯伯斯家旁边威廉兵营的院子以及就近的几条街道，挤满了马拉的车辆和衣冠不整的士兵。吉斯伯斯注意到，那里有大批德国空军、高射炮兵、荷兰党卫军，以及第七一九海防师上了年纪的士兵。在阿纳姆的抵抗力量领导人皮特·克鲁伊夫看来，这显然绝非暂时的停顿。这些部队并不是开拔返回德国，他们正在缓慢地重组；第七一九海防师的一些由马车运送的部队，正开始转移到南方。克鲁伊夫的阿纳姆地区情报组长，33岁的亨利·克纳普，悄悄地骑着自行车穿过这个地区，他也发现了这个微妙的变化。他感到困惑。他想知道，那些发自伦敦的乐观广播是不是假的。如果是假的话，那就是残忍的欺骗。在每一个地方，他都看见荷兰人兴高采烈。每一个人都知道，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安特卫普，毫无疑问荷兰将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获得解放。克纳普看得出，德国人正在重组。他知道，虽然他们没有多少力量，但如果英国人不迅速赶到的话，那个力量就会成长起来。

在南边11英里以外的奈梅亨，德国宪兵队正在封锁通向德国边界的公路。葡萄酒进口商伊莱亚斯·布罗克坎普看见，一些部队正在朝北进发，开赴阿纳姆，但大多数却是熙熙攘攘往回走，他们使交通中断，此后又列队行进，展开成为扇形。就像在阿纳姆一样，这位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似乎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同。布罗克坎普看到，荷兰平民正在对他们所认为的德国人张皇失措的困境哈哈大笑，冷嘲热讽。

事实上，这种困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奈梅亨正在变成一个部队集结待命地区，再次在德国军队的牢固控制之中。

更南边的地方，离比利时边界还不到10英里，在艾因霍温，撤退几乎停止了。在开往北方的掉队车队里面，现在更多的是平民纳粹，而不是部队。弗朗斯·科尔蒂原先看见德国人从菲利浦电器工厂的屋顶上卸下高射炮，现

在却注意到有一种新的发展。他看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铁道侧线上，有一列火车正拉着运货的敞车进入阵地，敞车上装载的是重型高射炮。科尔蒂感到了恐惧。

令观察力敏锐的荷兰人更加气馁的是，他们发现增援部队正从德国赶来。在蒂尔堡、艾因霍温、海尔蒙德和韦尔特，人们看见，作为生力军的分遣队乘坐火车到达了。他们迅速下车，列队集合，前往荷兰、比利时边界。他们并不是寻常的德国国防军。他们久经战阵，装备精良，纪律严明，一看他们与众不同的头盔和迷彩服，便可知道他们是能征善战的德国伞兵。

5



到9月5日快傍晚的时候，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的第一批伞兵编队已经开始沿着比利时阿尔贝特运河北边的各个地点挖掘战壕。他们的匆忙几乎到了发疯的程度。施图登特是在中午到达的，他一到达就发现，严格说来，莫德尔的“德国新防线”，就是那条宽80英尺的水陆屏障本身。防御阵地并没有准备出来，没有据点、战壕或者防御工事，而且，施图登特注意到，对守军来说更糟糕的是，“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南岸控制着北岸”。甚至那些横跨在运河上的桥梁，也仍然站立着。只是到了现在，工兵们才开始装炸桥的炸药。在一片混乱中，显然没有人下过命令把这些渡口炸掉。

尽管如此，施图登特的时间表却是计划完善的。他的空降兵部队的“闪电调动”是一个巨大成功。“鉴于这些伞兵是从德国各地匆匆赶来的，有的来自梅克伦堡的居斯特罗，有的来自洛林地区的比特施，”他后来回忆说，“而且从德国其他地方运来的武器和装备，正在铁道卸载点等待他们，这个行动的速度就惊人了。”施图登特不能不敬佩，“总参谋部和德国的整个组织精确得令人吃惊”。卡尔·西弗斯中将的第七一九海防师，也是一路快速行进。施图登特高兴地看到，他们赶往安特卫普以北阵地的纵队，“正在马路上嗒嗒地赶往前线，他们的车辆和火炮是由健壮的役畜拉着的”。他匆匆组成的第一伞兵集团军，每个小时都有人员到达。而且，凭着非同寻常的好运气，居然从一个最想不到的地方来了援兵。

从比利时进入荷兰的仓促撤退已经被减缓了，然后又实际上被一个人的不屈不挠和足智多谋阻止了：这个人就是库尔特·奇尔中将。由于他的第八十五步兵师几乎被完全消灭，因此奇尔奉命，把剩余兵力全都救出来，撤回到德国。但这位意志坚强的将军，看见马路上几乎是惊慌失措的撤退，在莫德尔“当日命令”的促使下，决定无视给他的命令。奇尔断定，避免灾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沿着阿尔贝特运河组织起一条防线。他把第八十五师的

剩余兵力与另外两个师的余部合并起来，并迅速把这些人分布在运河北岸的战略要点上。接下来，他把注意力转向各座桥梁，在桥梁的北出口处设立了“接待站”。在24个小时之内，奇尔成功地从德国武装力量的几乎每一个兵种，网罗了成千上万名军人。那是一种“百衲被似的乌合之众”，其中包括德国空军的机修工、军政府的工作人员、海军的海防部队，以及来自10来个不同师的士兵，但当施图登特到达的时候，这些充其量只配备以步枪的掉队者，已经部署在运河上了。

在阻止这场险些溃败的局面当中，奇尔表现出了精湛的技巧，施图登特将其称之为“奇迹”。他以惊人的速度，建立了一条勉强说得过去的防线，从而为施图登特部队的到达争取到了一些时间。他们的到达还将用上几天的时间。即使加上奇尔的兵力，施图登特所拼凑起来的第一伞兵集团军的总数，也只有18000到20000人，再加上一些火炮、高射炮和25辆坦克———其规模还抵不上美军的一个师。这支军队兵力严重不足，施图登特甚至不能在从安特卫普到马斯特里赫特的75英里缺口上全都配备上兵员，更不用说堵上这个缺口了，而朝这支兵力不足的军队全速赶来的，是英军第二集团军令人生畏的装甲部队以及美军第一集团军的一部分。施图登特在火炮和兵员数量上都屈居下风，而且在他和灾难之间，几乎就只有阿尔贝特运河而已。

敌人将在运河的哪个地点发起进攻呢？施图登特的防线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容易受到攻击的，不过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为关键。他尤其关切安特卫普北边的那个防区，力量薄弱的第七一九海防师刚刚在那里进入阵地。是不是还有时间，能利用这个80英尺宽的水路屏障，把它变成一条主要的防线，使它延缓盟军的进程，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让额外的增援部队到达？这是施图登特最大的希望。

他本来预料随时都会遭到进攻，然而却一直没有得到有关盟军装甲兵的报告。尤其令施图登特感到惊讶的是，在安特卫普的北边几乎没有与敌军接触。到目前为止，他还只是预料，英军的坦克部队在攻占了安特卫普以后，会挥师北上，截断贝弗兰半岛，并直捣荷兰。在施图登特看来，英军已经放慢了速度。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18天的时间里，德国西线最高司令部的庞大机构不得不四次迁移。在经历了轰炸、炮击，几乎被盟军的坦克追上之后，西线总司令终于在帝国边界的后面停了下来。9月5日，下午两点钟刚过，新任西线总司令在科布伦茨附近的小镇阿里姆贝格，找到了他的司令部。

在长途跋涉之后，陆军元帅格尔冯·伦德施泰特又疲倦，又急躁。一般说来，凡是更换德军司令，都有一些军事礼节，军号齐鸣，这次他全免了。

他立即召开了一连串的参谋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他接管的速度之快，着实让那些不认识这位陆军元帅的军官们吃了一惊。对老熟人来说，就好像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一般。对每一个人来说，单是冯·伦德施泰特的出现，就带来了如释重负和恢复了信心的感觉。

冯·伦德施泰特的任务是令人生畏的，他的问题是巨大的。他必须尽可能快地为那个400英里长的西部前线制订出一个战略蓝图来，那个前线从北海开始，一直延伸到瑞士边界———陆军元帅莫德尔曾经坦率地发现，这个计划超出了他的能力。可供冯·伦德施泰特使用的是遭到重创的军队，在北边是B集团军群，在南边是G集团军群，按照希特勒的指示，他要用这些军队在各处坚守，甚至还要反攻。与此同时，为了使帝国免遭入侵，他还要使希特勒“固若金汤”的齐格菲防线成为现实———那些早已被废弃、并没有建成的水泥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就疏于管理，人员不齐，火炮也被拆掉了。虽然还有别的问题，但在这个下午，冯·伦德施泰特首先处理的，是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它们比他所预料的还要糟糕许多。

局面是严峻的。在7月份被希特勒解职以前，冯·伦德施泰特统率的是62个师。现在他的作战部部长博多·齐默曼中将，则提交出了一份不利的资产负债表。注他告诉陆军元帅，在这两个集团军群当中，有“48个师是有名无实，15个装甲师和4个旅几乎没有坦克”。齐默曼说，这48个师在兵员、装备和火炮上非常不足，因而他们的“战斗力充其量只相当于27个师”，这个力量还不到“盟军力量的一半”。冯·伦德施泰特得知，他的参谋们认为，艾森豪威尔起码有60个师，而且完全摩托化了，整装满员（这个估计是错误的，当时艾森豪威尔在欧洲大陆上有49个师）。

至于德军的装甲部队，他们实际上并不存在。在整个前线，据估计盟军有2000多辆坦克，而德军只剩下100辆装甲车。德国空军已经实际上被消灭了，在战场的上空，盟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冯·伦德施泰特自己做出的严酷总结是，他的部队大部分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盟军与他相较，在兵力上是2比1以上，在火炮上是2.5比1，在坦克上是20比1，在飞机上是25比1。注除此之外，汽油、运输工具和弹药也严重短缺。冯·伦德施泰特的新参谋长———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上将后来回忆说：“形势是令人绝望的。这个前线已是千疮百孔，根本称不上前线，如果敌人能够充分利用机会的话，那么在前线任何一个地方的一次大败，都会导致灾难。”

布卢门特里特中将完全同意韦斯特法尔的看法，而且还有更为独到的见解。注在他看来，如果盟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挺进，在任何地方造成突破的话”，那么崩溃就会接踵而至。冯·伦德施泰特所拥有的唯一强大部队，正面对着乔治·S·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该集团军正在朝梅斯大举猛攻，前往萨尔河工业区。这些兵力有可能延缓巴顿，但并不足以阻止

他。在布卢门特里特看来，盟军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是会打击德军最薄弱的地方———试图在北方强力挺进，渡过莱茵河，继而进入鲁尔河地区。他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优先考虑进行这个大举猛攻，因为正如他后来所说："谁拥有德国北方，谁就拥有了德国。"

冯·伦德施泰特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夺取鲁尔河地区，无疑是盟军的主要出击目标。北方的英军和美军正在朝那个方向大举猛攻，前往亚琛的边界，几乎无法阻止他们穿透那条没有部署兵员、过时的齐格菲防线，渡过德国的最后一道自然障碍，也就是那条极其重要的莱茵河，然后直捣帝国的工业心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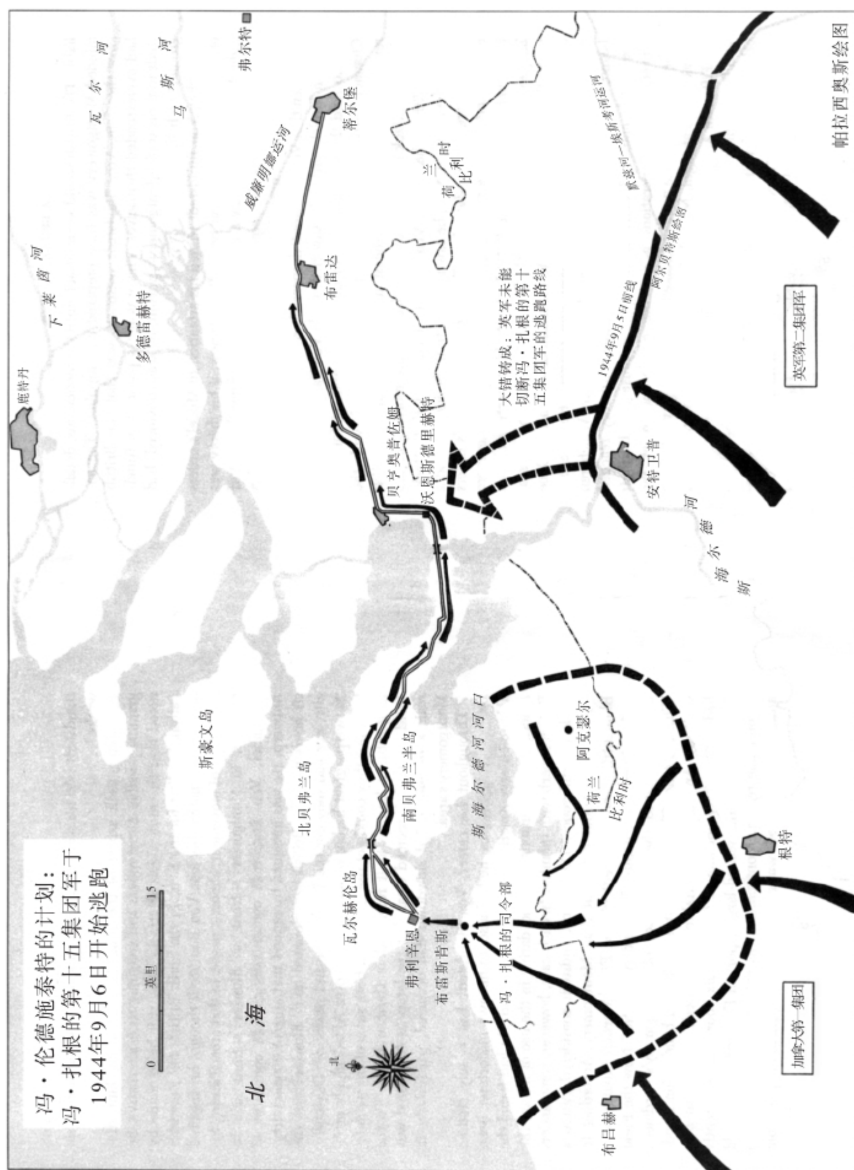
冯·伦德施泰特善于分析的头脑，又把握了另外一个事实。艾森豪威尔技能熟练、训练有素的空降部队，曾在诺曼底进攻中得到了非常成功的使用，现在则从德军的态势图上消失了。他们并非正在被用作步兵，显然这些部队是被撤回了，准备进行另外一次空降行动。但是将在哪里又是何时空降呢？空降部队的空投，与对鲁尔河地区的大举猛攻同时发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冯·伦德施泰特看来，这样的进攻可能出现在两个关键性的地区之一：一是在西墙防御工事的后面，一是在莱茵河的东边以便夺取桥头阵地。事实上，几天前，陆军元帅莫德尔在给希特勒的一封电报中就表达出了相同的惧怕，他强调，这种可能性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同样，冯·伦德施泰特也不能不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盟军的整个前线同时向鲁尔河地区和萨尔河地区挺进，同时又把空降部队投进去。对所有这些近在眼前的威胁当中的任何一个，陆军元帅都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盟军的机会太多了，又太多种多样了。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力在混乱中带来秩序，并且如果能够的话，猜透盟军的意图从而赢得时间。

艾森豪威尔对有关德军困境的情报掌握，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低估。但是，他也在思索，盟军司令部是不是真的意识到，德军的形势是那么令人绝望？正如他对布卢门特里特所说，真相是，他是用"衰弱的老人"来作战，而"面对盟军的猛攻"，西墙的那些碉堡将是"绝对无用的"。他说道："出于声望的原因而保卫这些耗子洞是发疯。"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得把这条幽灵似的齐格菲防线变成真实的防线，其防御工事必须做好准备，并配备兵员。冯·伦德施泰特简短地告诉他的参谋们，说："我们必须设法坚守起码6个星期的时间。"

他研究着当前形势的每一个方面，绘制出盟军可能调动的示意图，并且衡量每一个取舍，他注意到，最强有力的进攻仍然来自巴顿，巴顿正朝萨尔河地区进发。在北方，英军和美军的压力明显少了一些。冯·伦德施泰特认为，他发现，在那个地区没有军队的调动，而几乎是一种停顿。布卢门特里特后来记得，冯·伦德施泰特又把注意力转到蒙哥马利的前线，集中在安特卫普的形势上。下述报告引起了他的好奇，即到现在已经超过36个小时

了，英国人没有从该市向北边发动大举猛攻，也没有切断南贝弗兰半岛。显然，安特卫普的巨大港口设施将解决盟军的补给问题，但如果通往港口的那个54英里长的河口仍然在德军手中的话，他们就无法使用该港口。在这位陆军元帅看来，显然他所注意到的那个中断是真实的：盟军确实减慢了速度，在蒙哥马利的地区尤其是如此。

在整个战争生涯中，冯·伦德施泰特深入地研究过英国的军事战术，令他本人庆幸的是，他也能够亲自观察到美军的作战方法。他发现，在对装甲兵的使用上，美国人要更富有想象力，也更大胆，而英国人则在对步兵的使用上技术高超。然而，不论是在对装甲兵还是对步兵的使用上，又因指挥官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冯·伦德施泰特眼里，巴顿是一个远比蒙哥马利危险的对手。按照布卢门特里特的说法，冯·伦德施泰特认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过于谨慎，为习惯所累，有条不紊”。现在这位陆军元帅衡量着蒙哥马利行动缓慢的意义。冯·伦德施泰特看到，由于英吉利海峡的其他港口仍然在德国人手中，因而安特卫普对艾森豪威尔的进军至关重要———那么为什么蒙哥马利有36个小时没有移动，而且显然没有夺取这个欧洲第二大港呢？只可能有一个原因，蒙哥马利并不打算继续进攻。冯·伦德施泰特确信，他不会偏离习惯———在小心翼翼、满脑子细节的蒙哥马利得到充分准备和补给之前，英国人绝不会进攻。冯·伦德施泰特推断：英国人自己的战线过长了。冯·伦德施泰特告诉他的参谋们，这并不是一个暂停。他确信，蒙哥马利的追击已经慢慢停顿了下来。



冯·伦德施泰特迅速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先前24个小时里莫德尔下达的命令上。因为现在，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他就看到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让盟军得不到安特卫普港，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可以把冯·扎根将军陷于困境的第十五集团军救出来，这支军队有8万多兵力———正是冯·伦德施泰特非常需要的。

从莫德尔的命令中，他看出，虽然冯·扎根得到的命令是坚守斯海尔德河南岸，并增援海峡的各个港口，但冯·扎根也奉命用他的剩余兵力向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进入长驱直入的英军的侧翼———这次进攻定于6日的上午发动。冯·伦德施泰特毫不犹豫地取消了这次进攻。在当前的情况下，他看不出此举有什么可取之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更为大胆、更富有想象力的计划。莫德尔命令的第一部分可以保留，因为现在坚守各个海峡港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但冯·伦德施泰特给冯·扎根的命令，却不是向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而是经由海路撤出他的剩余部队，渡过斯海尔德河，到达瓦尔赫伦岛。一旦来到斯海尔德河河口北岸，冯·扎根的部队就能够沿着以瓦尔赫伦岛为起点的一条马路，向东行军，越过南贝弗兰半岛，最后到达安特卫普北边的荷兰本土。考虑到盟军的空中力量，所以在布雷斯肯斯港和弗利辛恩港之间，轮渡通过3英里宽的斯海尔德河河口的行动，就不得不在夜间进行。如果运气好的话，第十五集团军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就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内安全撤出。冯·伦德施泰特知道，这个计划是有危险的，但他也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因为倘若成功，就会有一个几乎完整的德国集团军供他调遣，尽管那可能是一个遭到了重创的集团军。不仅如此，他还可能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地———控制住安特卫普这个极其重要的港口。但这个行动的成功，将完全依赖于冯·伦德施泰特的预感，即蒙哥马利的大举猛攻确实停顿下来了。

冯·伦德施泰特确信这一点。此外，他还指望着蒙哥马利放慢速度能有更大的意义。他认为，由于交通和补给路线过分延长，盟军的高速追击已经达到了极限。布卢门特里特后来回忆，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冯·伦德施泰特看着我们，提出了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即希特勒可能终于正确了”。

对形势的估计尽管只是部分正确，但不论是希特勒还是冯·伦德施泰特都没有意识到，原来他们的估计居然这么准确。冯·伦德施泰特需要时间，以便稳定他的前线，而这宝贵的时间，正在由盟军自己提供出来。真相是，德军失败得太快了，使得盟军都来不及赢得胜利。注

6



就在冯·伦德施泰特孤注一掷，要把陷入困境的第十五集团军救出来的同时，150英里以外的安特卫普，英军第十一装甲师师长乔治·菲利普·罗伯茨少将正兴高采烈地告知他的上级，他有了一个惊人的进展。他的部队不但攻占了该市，而且也攻占了那个巨大的港口。

罗伯茨的坦克部队与近卫团装甲师[注]一起，在仅仅5天的时间里，就非同寻常地行进了250多英里。迈尔斯·C·邓普西中将的伟大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得到了第三十军军长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的命令，要“发疯似的不断前进”。罗伯茨的这个师让近卫军去攻占布鲁塞尔，自己则绕过这座城市，在比利时地下组织的勇敢协助下，于9月4日凌晨进入了安特卫普。现在，大约36个小时以后，在肃清了这个深水港口惊恐万状的敌人之后，罗伯茨报告说，他的部下已经完好无损地攻占了安特卫普占地1000英亩的巨大港口地区。仓库、起重机、桥梁、35英里长的码头、驳岸、船闸、干船坞、机车车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那些极其重要的电力控制的水闸门都处于充分工作状态———都被夺取了。

德国人要炸毁这个港口的计划失败了。在主要桥梁以及其他关键设施的下面虽然已经安放了炸药，但由于被英军和抵抗组织（其中有比利时的工程师，他们精确地知道炸药安放在何处）的惊人速度搞得不知所措，一片混乱的德国卫戍部队根本没有机会摧毁这些巨大的港口设施。

37岁的罗伯茨漂亮地执行了给他的命令。不幸的是，在“二战”这个最大的失算当中，没有一个人指导他利用这个形势———也就是说，挥师北上，夺取在北部郊区阿尔贝特运河上的桥梁，然后全速前往仅仅18英里之外的南贝弗兰半岛的基础部分。如果坚守住这个地峡2英里长的颈状部位，罗伯茨就能围困地峡里的德军，从而为肃清极其重要的北岸做好准备。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注]。“二战”的一个主要的战利品，安特卫普港，被夺取了，但那些仍然被德军把守的入口，却并没有被夺取。这个巨大的设施，本来能够在前线各地缩短盟军的补给线并向补给线提供物资，现在却没有用处。在使人飘飘然的气氛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个疏忽不仅仅是个暂时情况。确实，似乎没有必要那样匆忙。在德国人溃退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肃清残敌。第十一装甲师完成了它的任务，于是就坚守阵地，等待新的命令。

邓普西的装甲部队在北方壮观的大举猛攻，堪与巴顿在阿登高地南部的大举猛攻相媲美，不过它自然而然地结束了，尽管在这个时刻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罗伯茨的士兵疲惫不堪，缺少汽油和补给。布赖恩·霍罗克斯将军的第三十军剩余人员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在同一个下午，那种把受到重创而又士气低落的德国人赶回北方的无情压力，就突然放松了下来。当英国人停顿下来，以便“重新装备，加注燃料和休息”的时候，在对安特卫普一事上就错上加错了。

第三十军年富力强的军长霍罗克斯将军，甚至都没有想到安特卫普。[注]就像英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一样，霍罗克斯的关注也集中在另外一个目标上：渡过莱茵河，迅速结束战争。刚刚在几个小

时前，蒙哥马利为他各个集团军的气势和干劲而兴高采烈，于是给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发了电报，说：“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样一个阶段，朝向柏林的一个真正强大而又猛烈的挺进，就有可能到达柏林并结束战争。”

在伦敦，荷兰亲王殿下与威廉明娜女王进行了商谈，然后给他在加拿大的妻子朱莉安娜公主打了电话。他敦促她立即飞到英国，准备一旦荷兰获得自由便返回荷兰。他们长期的流亡生活就要结束了。解放来到得会很迅速，他们必须做好准备。然而伯恩哈德却又心中不安。

在过去的72小时里，抵抗组织发来的电报一再强调，在荷兰的德国人惊慌失措，并一再说，开始于9月2日的撤退仍然在进行。现在，9月5日，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报告说，尽管德国人仍然一片混乱，但这个集体大逃亡却似乎慢了下来。伯恩哈德也听取了荷兰流亡政府首相的报告。格布兰迪首相有点尴尬。显然他9月3日的广播为时过早，盟军部队毋庸置疑尚未越过荷兰边界。亲王与首相分析原因，为什么英军按兵不动？毫无疑问，从他们收到的地下组织电报来看，荷兰的形势是清楚的。

伯恩哈德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军事事务依赖于他的顾问们，但他对眼前的事态却大惑不解。注如果德国人仍然是一片混乱，如果正如他的抵抗组织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几辆坦克的一次挺进”，就能“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解放国家———那么英国人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也许是因为蒙哥马利不相信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认为他们外行或者不可靠？伯恩哈德找不出别的解释。否则，为什么英国人并不立即越过边界，而是一再犹豫呢？他不间断地与许多人保持联系，他的大臣们、美国的巡回大使安东尼·比德尔，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他由此明白，部队的推进是流畅的，形势也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改变。尽管如此，伯恩哈德还是更想得到第一手的信息。他做出一个决定：他想要求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允许他飞到比利时，尽可能快地看到蒙哥马利本人。他对盟军统帅部很有信心，尤其对蒙哥马利很有信心。即使是这样，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伯恩哈德也应该知道。

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简朴的帐篷司令部，就设在距离布鲁塞尔市中心几英里处的莱肯御花园里。他曾发出一份“仅限于艾森豪威尔阅读”的个人密码电报，现在他正在司令部里不耐烦地等待回音。电报迫切要求，要向柏林发起一次强大而又猛烈的挺进。电报是在9月4日深夜发出的，现在，9月5日的中午，这位唐突、精瘦的58岁阿拉曼英雄注正在等待回音，为战争的未来进程而烦恼。在诺曼底登陆的两个月以前，他就说：“如果我们的事情做得妥当，不犯错误，那么我认为德国将在今年退出战争。”蒙哥马利坚定不移地认为，在盟军攻占巴黎并渡过塞纳河之

前，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就已经铸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广阔前线方针”———也就是推动他的各个集团军稳固前进，朝帝国的边界进发，然后来到莱茵河———是在诺曼底登陆前制定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正确的。这个英国人认为，随着德国人混乱的突然崩溃，这个方针现在过时了，而这个战略仍旧“没有松动”。他所受到的所有军事训练都告诉他：“我们不能出了错而不受惩罚，而且……我们将面临一次给英国人民带来重大负担的漫长的冬季战役。”

8月17日，他曾向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奥马尔·N·布拉德利上将提出了一个孤军挺进的计划。他本人的集团军群以及布拉德利的集团军群，应该“待在一起，组成一个有40个师的坚固团体，它将会强大得无所畏惧。这支军队应该向东北方向挺进”。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将肃清英吉利海峡沿岸，并夺取安特卫普和荷兰南部。布拉德利的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其右翼位置在阿登高地，应该朝亚琛和科隆进发。蒙哥马利所提议的大规模强攻，基本的目标是：“在冬季来临之前夺取莱茵河上的桥头阵地，并迅速夺取鲁尔河地区。”他阐释说，这十有八九会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的计划，需要使用艾森豪威尔的4个集团军中的3个———英军第二集团军、美军第一集团军，以及加拿大第一集团军。至于第四个集团军，也就是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此刻正因其辉煌的推进而成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蒙哥马利也就未予考虑。他平静地提议，该集团军的推进应该停止。

大约48小时以后，蒙哥马利得知，他相信对他本人的主意做出积极回应的布拉德利，事实上却赞同由美军进行一次挺进，也就是由巴顿朝莱茵河和法兰克福进行大规模强攻。这两个计划都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不打算改变他的战略概念。盟军最高司令想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在情况允许的时候，既向鲁尔河挺进又向萨尔河挺进。在蒙哥马利看来，这不再是“广阔前线方针”，而是一个双重挺进的计划。他感到，现在每一个人都“各行其是”———尤其是巴顿，他似乎被给予了高度的自由。在蒙哥马利看来，艾森豪威尔决心坚持他原先的概念这一点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最高司令“事实上完全不了解地面作战的情况”。

蒙哥马利的见解是基于近来事态的一种令他生气的发展，他感到，这个发展贬低了他本人的作用。9月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接管了指挥权。由于最高司令认为蒙哥马利是“对阵战的大师”，所以把D日的袭击以及随后作战开始阶段的总作战控制权，交给了这位英国将军。这样一来，奥马尔·N·布拉德利上将的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也就处在了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8月底美国报纸的报道披露，布拉德利的集团军群仍然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作战，这在公众中造成了一片抗议浪潮，因而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上将立即命令艾森豪威尔，“立即直接指挥”所有地面部队。美军的各个

集团军又恢复了原先的指挥权。这个举动把蒙哥马利弄了个措手不及。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德吉恩冈将军后来说：“我认为蒙哥马利……绝没有想到这个日子会来得这么快。可能他希望这个一开始确立的指挥权会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我认为，对声望和民族感情的影响，或者对美国在兵员和武器上愈来愈大的贡献，他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显而易见，让一位英国将军和一个英国司令部无限期地保留对这些数量更为众多的美军编队的指挥，是一种不可能的局面。”[注]对他的参谋们来说这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对蒙哥马利来说却并非如此。他感到受到了公开的羞辱。[注]

蒙蒂以及他的上级、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都对艾森豪威尔很挑剔，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这两个人都认为，他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在于7月28日给蒙哥马利的一封信中，布鲁克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对战争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另外一次，他对这位最高司令的定论是，他有“一种最具魅力的个性”，但“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却具有非常有限的头脑”。蒙哥马利从来就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看出，艾克纯粹没有做这个工作的经验”，他感到，虽然历史将会把艾森豪威尔记载为“一个非常好的最高司令，但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他却是非常差劲，非常差劲”。[注]蒙哥马利愤怒了，于是开始鼓吹一个总体的“地面部队司令”概念，这是一个夹在各个集团军群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职位。他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干这个工作———那就是他自己。对于这场地下宣传活动，艾森豪威尔了然于胸却保持平静。这位最高司令其实同蒙哥马利一样固执，马歇尔将军给他的命令是清楚的，即使要有一位总体的地面部队司令，那也非他本人莫属。

直到8月23日以前，有关孤军挺进的计划，或者有关设立地面部队司令的想法，蒙哥马利都没有机会与艾森豪威尔直接讨论。8月23日，最高司令来到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吃午餐。饭后，烦躁的蒙哥马利以非同寻常的不理智，坚持要与最高司令私下交谈。他要求，应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排除在这次商谈之外。史密斯离开了帐篷，接着，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艾森豪威尔神情严肃，捺住性子，让他的下属就有关“一个坚定而又正确的决定”的必要性给他上了一课。蒙哥马利要求，艾森豪威尔应该决定，“主攻应该在什么地方”，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确保迅速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他一再要求进行“孤军挺进”，他警告说，如果最高司令继续“广阔前线战略，让整个前线都在前进，每一个人都一直在作战的话，那么前进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消失”。蒙哥马利警告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德国人就会赢得恢复元气的时间，战争就会在整个冬天继续，大有可能进入1945年。如果我们把补给品分摊开来，在一个广阔的前线上前进的话，我们就将处处薄弱，没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他看来，

只有一个方针：“或者是让右翼停下来，用左翼进行打击，或者是让左翼停下来，用右翼进行打击。”只能有一个挺进，一切都应该支持这个挺进。

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一个巨大的赌博。它可能产生迅速而又决定性的胜利，但反过来也可能造成灾难。他不打算接受所涉及的风险。他发现自己夹在两方之间，一方是蒙哥马利，另外一方是布拉德利和巴顿———每一方都鼓吹“主要的挺进”，每一方都想担当此任。

蒙哥马利素以行动缓慢的战术而声名狼藉，即使那战术是成功的；到这个时刻，他需要证明，他完全可以以巴顿的速度来利用形势；此刻巴顿的集团军已远远跑在别人的前头，渡过了塞纳河，正全速赶往德国。艾森豪威尔圆滑地对蒙哥马利解释说，不管孤军挺进可能有什么长处，他都几乎无法阻挡巴顿，无法让美军第三集团军突然停下来。“美国人民，”最高司令说道，“绝不会容忍让它停下来，而舆论是能赢得战争的。”蒙哥马利激烈地表示异议。“胜利才赢得战争，”他宣告，“要是把胜利给人民的话，他们就不会在意是谁赢得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不为所动。他认为，蒙哥马利的看法“过于狭隘”，这位陆军元帅并不“理解总的形势”，但他当时并没有这样说出来。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解释说，他想让巴顿继续东进，这样，美军和从南方推进的法国军队就可能会合。他非常简洁但是清楚地表明，他的“广阔前线方针”将继续。

蒙哥马利暂时把话题转到地面部队司令上。“得有人替你管理地面作战。”蒙哥马利声称，艾森豪威尔应该“高高在上，以便对涉及海陆空等方面的整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持超然的观点”。他从傲慢退却，态度转而谦恭起来。蒙哥马利说，如果这“涉及美国的舆论”，他将欣然“让布拉德利控制战役，在他的麾下效劳”。

艾森豪威尔迅速拒绝了这个建议。把布拉德利置于蒙哥马利之上，是英国人民无法接受的，反过来也一样，把蒙哥马利置于布拉德利之上，美国人也无法接受。他解释说，至于他本人的角色，他无法从亲自控制战役的计划上偏离开来。但是，为了寻找对一些迫切问题的解决办法，他打算对蒙哥马利做出一些让步。他需要海峡的各个港口以及安特卫普，它们对盟军的整个补给问题至关重要。出于这种考虑，艾森豪威尔说，暂时将优先考虑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向北方挺进。蒙哥马利可以使用在英格兰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眼下这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仅有的后备部队。除此之外，他还可以得到在他右边行进的美军第一集团军的支持。

用布拉德利将军的话说，蒙哥马利已经“在最初的小冲突上取胜了”。但这个英国人还远远没有满足，他坚信，艾森豪威尔已经错失了“巨大的机

会”。当巴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有同感——不过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艾森豪威尔不仅以美军第三集团军为代价，把补给的优先权给了蒙哥马利，而且还拒绝了巴顿向萨尔河大举猛攻的建议。在巴顿看来，这是“这场战争最重大的错误”。

在这场个性冲突和军事哲学冲突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很多事情发生了。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速度上已堪与巴顿的集团军相匹敌。到9月5日时，随着他的先头部队进入安特卫普，蒙哥马利更加确信，他的孤军挺进的概念是正确的，他决心要推翻最高司令的决定。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蒙哥马利坚信，德国人正濒临崩溃的边缘。

有这种看法的并不只他一个人，几乎每一个层次的司令部里，情报官员都在预告战争结束在即。最乐观的估计，系来自伦敦的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德国的形势已经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因而委员会认为，敌人已无力恢复元气。他们估计说，每一个迹象都表明：“在德国统帅部控制之下的有组织抵抗，不可能持续到1944年12月1日以后，而且……还可能结束得更早一些。”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也同样乐观，在8月底的时候，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总结宣称：“8月份的各个战役获得了成功，西线的敌人受到了惩罚。两个半月的苦战已经使欧战的结束在望。”现在，一个星期以后，他们认为，德军“不再是一支有凝聚力的军队，而是若干个企图逃跑的作战团体，一片混乱，甚至士气低落，缺少装备和武器”。英国国防部作战部那位保守的局长约翰·肯尼迪少将，甚至也于9月6日特别提到：“如果我们以近来的速度前进，那么28日的时候就应该到达柏林了……”

在这个乐观预言的大合唱当中，似乎只有一个持异议的嗓音。美军第三集团军的情报处长奥斯卡·W·科赫上校认为，敌人仍然有能力进行最后的挣扎，并警告说：“除非国内发生动荡——德国国防军有进行暴动的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否则德军将继续战斗，直到战死或者被俘。”注但对第三集团军兴高采烈的指挥官乔治·S·巴顿中将来说，他自己的情报官的谨慎估计，并没有什么意义。与北方的蒙哥马利一样，南方的巴顿现在离莱茵河只有100英里。他也认为，就像蒙哥马利所说，时间已经到了，应该“强出头，孤军深入，进入敌人的国土”，并结束这场战争。唯一的区别在于，究竟应该由谁来“强出头”。这两位指挥官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都为荣耀而竞标，因而现在为了获得那个机会而竞争。蒙哥马利怀着热情，把他的竞争范围缩小到了巴顿一人：一位统率一个整集团军群的英国陆军元帅，正在试图在速度上超过一位统率一个单一的集团军的美国中将。

在前线各地，成功的狂热强烈地影响了战役指挥官们。壮观地横扫法国和比利时，并有证据表明德国人到处都遭到了失败之后，人们自信地认为，

什么也不能阻止那个胜利的波涛，它将穿过齐格菲防线以及防线以外的地区继续前进，进入德国的心脏。然而，要使敌人立足不稳并一片混乱，就要求盟军不断地、持续地施压。对那种施压的支持，现在已经产生了一种几乎无人意识到的危机。那种使人飘飘然的乐观主义近乎自我欺骗，因为这个时候，艾森豪威尔的大军在从塞纳河兴奋地冲刺了200多英里之后，陷入了一个巨大的保养和补给难题。在6个星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而从未停顿的进军之后，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前进的势头突然消失了。当第一批坦克走到德国的门口，在一些地方开始试探西墙本身的时候，进军开始变慢了。盟军的追击结束了，是被它自己的成功扼杀了。

严重削弱进军速度的主要问题，是缺少港口。补给品并不短缺，但这些补给品却贮存在诺曼底，仍然要越过海滩运进去，或者是通过一个唯一可用的港口运进去，那个港口就是瑟堡———在先遣部队后面大约450英里的地方(注)。从那么远的后方，为4个全速追击的庞大集团军提供补给是一个噩梦般的任务。运输工具的缺乏，更是雪上加霜。铁路网不是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已遭到了轰炸，就是被法国的地下组织毁坏了，无法足够快地修复。输油管道现在只是在铺设和延伸。结果，从配给的口粮到汽油，什么东西都由公路运送，而卡车的短缺又令人沮丧。

追击日复一日地向更东边推进，为了能与追击齐头并进，每一种车辆都被逼得用来提供保障服务。火炮、高射炮以及备用的坦克从车上卸了下来，留在后面，这样运送它们的车辆就可以用来运送补给品。各个师的运输连都被调走了。英国人把整整一个军留在了塞纳河西边，这样它的运输工具就能为其余的快速前进部军队服务。因为活塞有缺陷，1400辆载重量为3吨的英军卡车无法使用，随着这个问题的发现，蒙哥马利的困难在逐渐增加。

现在，为了使追击不停顿地进行下去，人们做出种种艰巨的努力。一种传送带式的卡车车队———名字叫“货运快车”———向东方疾驶，卸下补给品之后，又折回西边再装上补给品，有些车队往往每天疲惫地来回运行600到800英里。即使所有可用的运输工具都昼夜不停地行驶，即使战场上的指挥官采取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各个集团军对补给品的要求仍然不能满足。由于负担超过了其能力，这个权宜之计的补给结构已经几乎到达崩溃点了。

除了严峻的运输问题之外，士兵们疲倦了，从诺曼底以来的弩炮式的进军后，设备也磨损了。坦克、半履带式车辆以及各种各样的车辆，已经行驶了这么长时间，因没有得到适当的保养不断地出故障。使一切都相形见绌的是，汽油严重短缺。艾森豪威尔的各个集团军，每天需要100万加仑汽油，但收到的却只是那个数量的很少一部分。

结果是严重的。在比利时，就在敌人从面前逃跑的时候，美军第一集团军却整整停顿了4天，因为它的坦克没有油了。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领先别的集团军100英里以上，而且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却不得不在默兹河[注]停顿了5天，因为装甲纵队的汽油用完了。当巴顿发现他定了40万加仑汽油，但由于照顾优先而被削减只收到32万加仑时，勃然大怒。他当即命令他那个前卫军的军长，道："尽快抬起你们的屁股前进，直到你们的发动机汽油用完，然后下车步行，该死的！"对司令部的参谋们，巴顿大发雷霆，说自己"面对两个敌人———德国人和我们自己的统帅部。我能够收拾德国人，但却没有把握胜过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他做出了尝试。巴顿坚信，能够不出几天便杀出一条路进入德国，于是他向布拉德利和艾森豪威尔发出强烈呼吁："我的士兵可以吃他们的皮带，"他怒吼道，"可是我的坦克得有汽油呀。"

在诺曼底给德国人带来的惨败，以及在突破之后对德国部队有条理而又迅速的歼灭，已经造成了后勤方面的危机。诺曼底登陆的计划者们本来想当然地认为，敌人将会在各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沿河防线坚守战斗，因此进军会更保守一些。据认为，在夺取了诺曼底滩头阵地和攻占海峡的各个港口之后，应该有一个停顿，以便对部队进行重组，把补给品聚集起来。预计的立足点将在塞纳河以西，而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到9月4日（D日的90天以后）才能到达塞纳河。敌人部队的突然崩溃以及朝东方的仓皇逃跑，使得盟军的时间表变得毫无意义。谁能够预见，到9月4日的时候，盟军的坦克部队会在塞纳河以东200英里的地方，并且进入了安特卫普？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们本来估计，大约要用11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在亚琛[注]的德国边界。现在，由于坦克纵队已经靠近帝国，盟军就把他们进军的时间表提前了几乎7个月。补给和运输系统本来是为慢得多的进军速度设计出来的，现在却承受着狂热的追击所带来的压力，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尽管后勤方面形势严峻，但谁也不想承认各个集团军必须很快停止前进，或者追击已告结束。"师级以上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每一个人都一门心思认为，只要再加上几吨补给品，他就能够继续向前冲去赢得这场战争……因而，每一个指挥官都乞求和要求，应该比所有其他人都有优先权，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又确实都有可以迅速利用的机会，这就使得这些要求完全顺理成章了。"即便如此，普遍的乐观也感染了最高司令。这让他认为，进军的势头能够维持下去，足以在德国人还没有机会防御之前，便攻破齐格菲防线，因为，他在"整个前线"看到了敌人"崩溃"的迹象。9月4日，他命令布拉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将攻占萨尔河和法兰克福地区"。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将攻占鲁尔河和安特卫普"。

这个宣布让巴顿也似乎平静下来。现在他确信，只要有足够的补给品，他

强大的美军第三集团军就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抵达萨尔工业区，然后继续一路全速赶到莱茵河。[注]而在随处可见的空前的胜利气氛中，蒙哥马利用他在9月4日发出的密码电报，再次坚持不懈地强调了他的论点。这一次，他远远超出了8月17日的提议，也远远超出了8月23日与艾森豪威尔的交谈。这位英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员坚信，德国人已经崩溃了，他相信，他不仅能够抵达鲁尔河，而且还能一路全速直达柏林本身。

在给艾森豪威尔的有9个段落的电报中，蒙哥马利再次清楚地说明了那些理由，他坚信进行一次“真正强大而又猛烈的挺进”的时刻已经到来。有两个战略机会向盟军敞开，“一个经由鲁尔河，另外一个经由梅斯和萨尔河”。但他又认为，由于“我们并不拥有足够的资源，所以无法维持两个这样的大举猛攻”。只有一个大举猛攻存在着机会———那就是他的大举猛攻。在蒙哥马利看来，那个挺进，也就是“经由鲁尔河”进行的北方挺进，“有可能带来最佳和最快的结果”。为了确保成功，蒙蒂的孤军挺进将需要“所有的保障资源……毫无保留的保障资源”。他现在明显对任何其他的考虑都不耐烦了。他在公开表明他本人的计划是有价值的，而且他的技能也是有价值的，他自信他本人就是那个能够马到成功的人。别的作战行动则是能够剩下多少后勤支持就进行多少。他提醒最高司令，这是不可能妥协的，他拒绝考虑进行两个大举猛攻的可能性，因为“那将把我们的保障资源一分为二，使得哪一个挺进都不是猛烈的”，其结果就是“拖长战争”。蒙哥马利认为，问题是“非常简单而又清晰的”，而时间又“极其重要……因而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这位自威灵顿[注]以来最得人心的英国指挥官，既言辞刻薄又态度专横，他一门心思想着他的信念。他分析说，考虑到严峻的后勤形势，他的孤军挺进理论比两个星期以前更站得住脚了。蒙哥马利以他倔强的方式———而且毫不在乎对方对他电报的口吻会有什么看法———不仅是在为最高司令提出一个举措，这位陆军元帅也是在指定一个举措。艾森豪威尔必须让别的集团军在原地停下来———尤其是必须让巴顿的集团军在原地停下来———这样所有的资源就能放在他的孤军挺进的后面。这份编号为M-160的电报结尾，是蒙哥马利傲慢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你正到这一边来，不妨做一短暂访问，讨论一下，”他提议道，“如果这样，我将乐于在明天午餐的时候见到你。不要以为当前我能离开这场战役。”自己的结束语几乎就是无礼，但蒙哥马利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他感到焦虑的是，这个能彻底消灭德国人的最后机会绝不能丧失。他就像帽贝[注]一样，抱住他的孤军挺进计划不放。因为他确信，艾森豪威尔也一定意识到了，进行最后一击的时间已经到来。

在瑟堡半岛西部的格朗维尔，在别墅的卧室里，盟军最高司令读了蒙哥马

利编号为M－160的电报，既愤怒又难以相信。55岁的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不现实的”，是“异想天开”。蒙哥马利有三次用孤军挺进计划把他纠缠得火冒三丈。艾森豪威尔本来以为，他已经在8月23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有关战略的冲突。然而现在，蒙哥马利不仅再次鼓吹他的理论，而且还提出要一路冲到柏林去。艾森豪威尔通常是平静而和蔼的，现在却发脾气了。“除了蒙哥马利以外，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可行的！”他朝他的参谋大发雷霆道。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放海峡的各个港口，尤其是安特卫普港。这一点为什么蒙哥马利就不能理解呢？对于所存在的那些具有诱惑力的机会，最高司令太清楚了。但正如他对盟军最高副司令英国皇家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以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助理参谋长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所说，蒙哥马利“侈谈率领一支军队进军柏林，而这支军队又要从海滩取得绝大部分补给品，这是异想天开”。

陆军元帅的电报，到来的时机是不可能更糟糕的了。最高司令此刻正在床上撑坐着，他的右膝由于受伤而用石膏固定着，而蒙哥马利对此一无所知。然而，艾森豪威尔心绪不宁，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在9月1日，也就是4天以前，他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主要部分留在伦敦，自己来到欧洲大陆亲自指挥。他在格朗维尔附近的朱卢维尔设立了一个小小的进军指挥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由于各路大军运动速度惊人，结果艾森豪威尔滞留在离前线400多英里的地方———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电话或者电传设施。除了无线电和一个基本的传令兵系统之外，他无法立即与在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交流。除了这些战术上的不适外，他又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那是他对主要指挥官们进行的一次例行飞行访问之后受的伤。9月2日，他在沙特尔[注]与美军高级将领们开了一个会，返回的时候，由于风大和能见度低，艾森豪威尔的飞机无法在司令部的机场上降落，而是在他的别墅附近的海滩上降落的———是安全降落，不过在尽力帮助飞行员把飞机拖离水边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严重地扭伤了右膝。这样一来，在战争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关头，正当最高司令试图控制地面战役，而由于事件发展得如此迅速，有必要立即做出决定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却动弹不得了。

尽管蒙哥马利———对布拉德利和巴顿来说同样如此———可能感到，艾森豪威尔“完全不了解地面作战的情况”，但只是距离才使得这种论点说得通。艾森豪威尔优秀的、英美参谋融为一体的参谋部，对战场上日复一日的形势的认知，比他的将领们所意识到的要多上许多。虽然他期望作战指挥官们能够表现出主动性和敢作敢为，但只有最高司令和他的参谋们才能够综观全局，并做出相应的决定。老实说，在这个过渡阶段，虽然艾森豪威尔正在亲自控制，但似乎又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由于最高司令角色的复杂性所致。联合指挥绝非易事，由于艾森豪威尔

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且不折不扣地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才使得这个系统运转了下来。为了盟国和睦的利益，艾森豪威尔可以对战略进行修改，但不会把小心谨慎的习惯抛到九霄云外，正如最高司令后来所说，他无意让蒙哥马利“像一把匕首似的孤军朝柏林大举猛攻”。[注]

他对蒙哥马利不只是容忍，还一次又一次地让步，这往往让他自己的美国将领们愤怒。然而似乎蒙哥马利却“总是什么都想要，但一生中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快过”。[注]艾森豪威尔说，他理解蒙哥马利的怪癖，而这个英国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怪癖。“注意，人们告诉过我他的童年，”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当你举行一场比赛，比赛的一方是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注]，而另外一方是一些不入流的学校的时候，有些入伍的年轻人就感到有点自惭形秽。这个人一生都在试图证明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这位陆军元帅的看法，却清楚反映出他的英国上级有关盟军应该如何作战的信念。

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蒙哥马利在提出这种看法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却总是让美国指挥官们感到不舒服。艾森豪威尔是最高司令，又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广泛授权，他首要关心的是把盟军聚集在一起，迅速赢得战争。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一些参谋，包括许多英国人，都认为蒙哥马利难以忍受，也都说他让人难以忍受，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却从未评论过他，除了在私下里同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议论之外。事实上，最高司令对蒙哥马利的积怨，比任何人知道的都深得多。艾森豪威尔感到，这位陆军元帅是“一个精神变态者……这样的一位自我中心者”，以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完美的……他一生中从未犯过错误”。现在艾森豪威尔不打算让他犯下一个错误。“拆掉在瑟堡的美国人这堵东墙，”他告诉特德，“当然不会补上要赶往柏林的英国人这堵西墙。”

虽然如此，与英国爱将之间越来越大的不和，仍然让艾森豪威尔深感不安。最高司令决定，在之后的几天内，他将与蒙哥马利会晤，力图澄清他所认为的误解。他将再次详细地解释他的战略，希望能得到同意，不管那个同意会来得多么勉强。会晤以前的这段时间里，有一件事情他明确表了态。他坚定地拒绝了蒙哥马利的孤军挺进计划，以及他进军柏林的申请。9月5日晚，在一封给陆军元帅的密码电报中，他说道：“我虽然同意你有关向柏林的一个强大而又猛烈地挺进的构想，但我却不同意它在这个时刻发动却不进行其他的一切部队调动。”最高司令认为，“西线的德军大部现在已经被消灭了”，应该利用那个成功，“立即突破齐格菲防线，在一个广泛的前线上渡过莱茵河，并夺取萨尔河和鲁尔河。我打算以最快的速度来做这件事”。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些步骤将“钳制德国的主要工业区，并在很大程度上消灭它进行战争的能力”，艾森豪威尔继续说，开放勒阿弗尔

港注和安特卫普港是绝对重要的，然后才能发动进入德国的任何“强大的挺进”。但是眼下，艾森豪威尔强调，“不管怎么重新安置我们当前的资源，都不足以维持向柏林的挺进”。

艾森豪威尔的决定用了36个小时才到了蒙哥马利那里，而且到达的又只是电报的后半部分。这结尾的两段，蒙哥马利是在9月7日上午9点收到的，开头的部分直到9月9日才到达，那是又过了48个小时之后。蒙哥马利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再次证实，最高司令“脱离战斗太远了”。

从蒙哥马利所收到的电报第一个片段可以足够清晰地看到，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的计划，因为该片段中有这么一句话：“不管怎么重新安置我们当前的资源，都不足以维持向柏林的挺进。”蒙哥马利立即发出一封电报，激烈地表示不同意。

随着追击的减弱，蒙哥马利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德国人的抵抗正在变得顽强。蒙哥马利的电报尤其集中在补给品的短缺上，在电报中，蒙哥马利声称只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半，因而“我无法这样长久坚持下去”。他拒绝从朝柏林大举猛攻的计划上偏离开来。在他的电文中，立即开放安特卫普这个极其重要港口的明显必要性甚至都没有提及，却强调说：“一旦加来海峡有一个港口能为我运转，我就将另外需要大约2500辆载重量为3吨的卡车，外加平均每天约1000吨的空运物资，以使我能够赶到鲁尔河并最终到达柏林。”由于这全都“非常难以解释，”因而陆军元帅“不知道是否可能”让艾森豪威尔来看他。他坚信不疑，认为最高司令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确信自己的计划能奏效，拒绝承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是决定性的。但他无意飞往朱卢维尔去尝试改变艾森豪威尔的主意。这样的外交手腕不是他性格的组成部分，尽管他充分意识到，能够让对方采纳提议的唯一希望，就是要与最高司令面对面会晤。蒙哥马利既愤慨又激动，等待着艾森豪威尔回复。当伯恩哈德亲王来到司令部向他表示敬意的时候，发现这位英国陆军元帅几乎正与世隔绝，焦躁易怒。

伯恩哈德是在6日晚上来到法国的，带着一小批参谋人员、三辆吉普车、他的名叫马丁的锡利哈姆 犬注，以及一个鼓鼓的公文包，里面是荷兰地下组织的报告。他们一行人乘坐三架达科塔型飞机，在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欧洲大陆，伯恩哈德本人开着其中一架。他们从亚眠注机场开车前往北边50英里处的杜埃，并在7日一大早便动身前往比利时和布鲁塞尔。在位于莱肯的司令部里，亲王受到了霍罗克斯将军的接待，霍罗克斯把他向蒙哥马利的参谋们做了介绍，并把他带到陆军元帅的面前。“他的心情很坏，显然不高兴见到我，”伯恩哈德回忆道，“他心事重重，而且可以理解的是，王室成员在他的地区出现，是一种他不能够轻易免除的责任。”

这位陆军元帅以这次战争中最伟大的英国军人而知名，用伯恩哈德的话来说，这个名气使得他成了“几百万英国人心中的偶像”。36岁的亲王对蒙哥马利心怀敬畏。与艾森豪威尔的无拘无束、几乎随便的举止不同，蒙哥马利的举止让伯恩哈德难以轻易地与他交谈。从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言辞刻薄且直言不讳，他向伯恩哈德清楚地表明，伯恩哈德在他的地区出现“令他担忧”。蒙哥马利既不圆通，也不解释，情有可原地告诉亲王，要访问那支荷兰部队的司令部是不明智的———那支部队就是艾琳公主旅，隶属于英军第二集团军，驻扎在迪斯特附近，离前线还不到10英里。伯恩哈德是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非常想访问迪斯特，并没有立即对此做出回答，相反，他开始讨论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蒙哥马利无视他的讨论，又返回到原先的话题，告诉亲王：“你不可住在迪斯特。我不能允许。”伯恩哈德被惹恼了，他不得不指出，他是“直接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供职，而不是在陆军元帅的指挥之下”。这样一来，根据伯恩哈德对这次会晤的记忆，从一开始，“不管对错与否，我们就互相留下了坏印象”。（注事实上，后来艾森豪威尔支持蒙哥马利有关迪斯特的做法，不过他也确实说过，伯恩哈德可以待在布鲁塞尔，“靠近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那里可能需要你的出现”。）

伯恩哈德继续回顾地下组织的报告中所反映的荷兰形势。蒙哥马利被告知，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瓦解了，随之又被告知了抵抗组织的构成。伯恩哈德说，就他所知，这些报告是准确的。按伯恩哈德的说法，蒙哥马利反驳说：“我不认为你的抵抗人员能够对我们有多大用处。因而我认为这一切完全没有必要。”陆军元帅的直言不讳令伯恩哈德着实吃了一惊，他“开始意识到，蒙哥马利显然不相信来自我在荷兰的特工人员的任何消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几乎不能责怪他。我推测，对他在进军过程中从法国和比利时的抵抗力量得到的那些误导的信息，他已经有点厌烦了。但是，在眼前这件事情上，我认识那些牵涉到的荷兰抵抗组织，我认识那些主持抵抗组织的人，而且我知道这些信息确实是正确的”。因而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伯恩哈德让陆军元帅看电报档案，引用一个又一个报告中的话，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你为什么不立即发动进攻呢？”

“我们不能依靠这些报告。”蒙哥马利告诉他，“恰恰因为荷兰抵抗组织声称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仍然在撤退。”伯恩哈德不得不承认，撤退“缓慢了下来”，而且也有“重组的迹象”。不过在他看来，仍然有立即发动进攻的充分理由。

蒙哥马利不为所动。“不管怎么说，”他说道，“尽管我非常想发动进攻并解放荷兰，但由于补给的问题，我无法这么做。我们缺少弹药。我们的坦克缺少汽油，倘若我们确实进攻的话，那些坦克就可能会陷于困境。”伯恩哈德深感震惊。他在英国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以及他本人的顾问那里

所得到的信息，都使他确信，荷兰的解放将是几天之内的事情。“自然我想当然地认为，蒙哥马利作为现场指挥官，对形势的了解强过其他任何人，”伯恩哈德后来说道，“然而我们绝对了解德国人的每一个细节———部队的兵力、坦克和装甲车的数量、高射炮的阵地———而且我知道，除了在最前线上的抵抗之外，后面没有什么力量。我担心死了，因为我知道，随着每一天的过去，德国人的力量也将增长。我无法说服蒙哥马利。事实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无关紧要。”

然后蒙哥马利非同寻常地披露：“我也像你一样，急切地要解放荷兰，但我们打算用另外一种甚至更好的方式来解放荷兰。”他停顿了下来，想了一会儿，然后几乎称得上勉强地说道：“我正计划在我的部队前面进行一次空降行动。”伯恩哈德大吃一惊，立即有若干个问题来到他的头脑。计划在哪个地区空降？空降行动将在何时进行？目前的进展如何？然而他却忍住了，没有问。蒙哥马利的态度表明，他不会再说什么话了。行动明显处在计划阶段，亲王得出的印象是，只有陆军元帅和他的几个参谋知道这个计划。虽然没有被告知更多的细节，伯恩哈德现在却心怀期冀，荷兰的解放仍然就在眼前，尽管蒙哥马利原先谈到补给欠缺。他必须有耐心，必须等待。这位陆军元帅的声望是令人敬畏的，伯恩哈德既信任这个声望，也信任这个人本身。亲王感到又有希望了，因为“不论蒙哥马利做什么，他都会做好的”。

艾森豪威尔还是同意了蒙哥马利的要求，于是定于星期日也就是9月10日会晤。他并不特别期待他与蒙哥马利的会晤，也不期望像他原先预料的那样，这位陆军元帅会发表一些喜怒无常的言论，然而却有兴趣了解，在蒙哥马利作战行动中的一个方面上，有了一些进展。尽管最高司令必须对所有的空降计划予以批准，但却允许蒙哥马利对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进行战术上的使用，允许他在涉及部队的使用上制订一个可行的计划。他知道，起码从4日开始，蒙哥马利就一直在悄悄探讨进行一次空降行动，以便渡过莱茵河夺取一个桥头阵地的可能性。

6个星期以前，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成立，司令员是美国人刘易斯·海德·布里尔顿中将，从那时起，艾森豪威尔就一直在寻找能够使用那支部队的目标以及合适的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直在催促布里尔顿和集团军的各位指挥官，制订出大胆而又富有想象力的空降计划来，要求在敌军营地背后的腹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各种各样的任务被提出了，也被接受了，但所有的任务又被取消了。几乎在每一个情况中，都是因为进军迅速的地面部队已经到达了计划由伞兵夺取的目标。

蒙哥马利原先的提议是要求布里尔顿的空降部队在韦塞尔镇的西边夺取一个渡口，韦塞尔镇就在荷兰与德国边界的德国一边。然而，那个地区的密集防空防御工事，迫使陆军元帅做了改变。他接着选择的地点，是在荷兰

更朝西一些的地方：位于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这是在德军前线的背后75英里多的地方。

这个计划被称为“彗星行动”，到9月7日的时候，“彗星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后来，恶劣的天气加上蒙哥马利对他部队所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德军抵抗的关切，行动又被迫推迟。本来在6日或者7日可能获得的成功，到10日的时候又似乎有风险了。他首先感到，这个时候发动一次空降进攻，将会意味着延误安特卫普港的开放。然而最高司令却仍然对进行一次空降进攻的可能性神往不已。

在这些流产了的行动当中，有一些几乎是在最后的时刻被取消的，它们给艾森豪威尔制造了一个大难题。每次，当一项任务到达开始阶段的时候，那些运送汽油到前线的部队运输机就得在地面停飞待命。宝贵的空运补给吨位的损失，使布拉德利和巴顿大声提出抗议。他们宣告，在进行持续追击的时刻，对汽油的空运远比空降任务更为重要。艾森豪威尔急于使用空降部队，华盛顿也敦促他使用空降部队———不论是马歇尔上将，还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H·阿诺德上将，都想看看布里尔顿新的盟军空降集团军能够有什么作为———因而艾森豪威尔不想使他训练有素的空降师搁浅。相反，他坚持应该一有机会就使用那些空降师。事实上，在追击正在减缓的这个时刻，把部队空投到莱茵河的对岸可能就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在9月10日的这个上午，当他飞往布鲁塞尔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最重要的就是开放安特卫普这个至关重要的港口，其余的事情全都位居其次。

蒙哥马利却并非如此，他抱定决心，迫不及待，正在布鲁塞尔机场等待艾森豪威尔的飞机着陆。他以个性鲜明的精确性，针对这次会晤，将自己的论据进行了提炼加工。他已经与英军第二集团军的迈尔斯·C·邓普西将军交谈过，也已经与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交谈过，布朗宁是英军第一空降军的军长，也是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副司令。布朗宁正在耳房里，等待这次会晤的结果。邓普西由于关注在他面前愈来愈强硬的抵抗，并且从情报部门的报告中得知，新的敌军部队正在进入，于是要求蒙哥马利放弃空降进攻阿纳姆大桥的计划，相反他提议，应该集中兵力夺取位于韦塞尔的莱茵河渡口。邓普西断言，即使与一次空降行动一起进行，英军第二集团军也不足以强大得能够单凭自身向正北大举猛攻抵达阿纳姆。他认为，最好与美军第一集团军朝东北方向的韦塞尔同时进军。

无论如何，攻入荷兰境内现在都已经刻不容缓。英国国防部已经告知蒙哥马利，德国人首次研发出来的V－2型火箭，已经在9月8日落在伦敦了，它们的发射地点，据认为是在荷兰西部的某个地方。不管是在接到这个信息之前还是之后，反正蒙哥马利改变了他的计划。按照原先的设计，“彗星行动”要求只使用一个半师的兵力———英军第一空降师和波兰第一伞兵旅。他认为，那支军队力量太弱，难以奏效。结果，蒙哥马利取消了“彗

星行动”，提出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空降建议。到目前为止，只有陆军元帅的几个高级军官听说过此事，而且由于担心布拉德利会对艾森豪威尔产生影响，他们就煞费苦心，确保不让在英军司令部里面的美国联络官获得计划的蛛丝马迹。在这个时刻，布朗宁中将以及在英格兰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也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对蒙哥马利新的空降计划一无所知。

由于膝部受伤，艾森豪威尔无法下飞机，因而会谈也就在飞机上进行。就像8月23日时的情况一样，蒙哥马利决定了参加会议的人选。最高司令带来了他的副手、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还带来了一位主管行政的助理参谋长、中将汉弗莱·盖尔爵士。蒙哥马利简慢无礼地让艾森豪威尔把盖尔排除在会谈之外，同时又坚持让他本人的行政和补给官迈尔斯·格雷厄姆中将留下。要是换了另外一位不那么好说话的上级，就大有可能对蒙哥马利的态度提出异议，但艾森豪威尔还是捺着性子，答应了陆军元帅的要求。于是盖尔将军离开了。

蒙哥马利立即抨击了最高司令的广阔前线方针，他不断地提到艾森豪威尔在前一个星期发来的一叠函件，要求注意到最高司令的前后矛盾之处，也就是说，并没有清楚界定“优先”的意思。他认为，他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并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所许诺的在补给品上的“优先”，而巴顿向萨尔河的大举猛攻，却被允许以蒙哥马利的军队为代价而进行。艾森豪威尔平静地回答说，他从来也没有因为给蒙哥马利“绝对优先”，而把别人全都排除的意思。蒙哥马利重申，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错误的，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只要这两个“忽动忽停而又不连贯的挺进被允许继续”，让补给品在他本人与巴顿之间分开，那么“谁也不能成功”。蒙哥马利说，艾森豪威尔必须在他和巴顿之间做出选择。蒙哥马利的语言是如此激烈、放肆，致使艾森豪威尔突然伸出手来，拍着蒙哥马利的膝盖，告诉他：“冷静一下，蒙蒂！你不能这样对我讲话。我是你的上司。”蒙哥马利的愤怒消失了。“对不起，艾克！”他小声说道。注

这个异乎常态但又似乎真诚的道歉，并不是事情的结束。对他的“孤军挺进”，蒙哥马利继续顽固地据理力争，尽管语气不那么尖刻了。艾森豪威尔全神贯注地听着，对那些论点表现出了同情，但他本人的见解却并没有改变，广阔前线进军将继续下去。他清楚地告诉了蒙哥马利原因。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注他当时说道：“你的提议是这样———如果我把你所要的一切补给品全都给你，你就能直达柏林———直打到柏林吗？蒙蒂，你发疯了。你不能这样做。那简直是活见鬼了！如果你试图那样，用一个长的纵队进行孤军挺进，你就不得不投入一个又一个的师，来保护你的侧翼免受攻击。假使你确实夺取了莱茵河上的一座桥，结果会怎样？你不能长时间依赖那一座桥来为你的大举猛攻提供补给品。蒙蒂，你不能这样

做。”

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说法，蒙哥马利当时回答道：“我将顺利地给他们提供补给品。只要你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我就能抵达柏林并结束这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的拒绝是坚定的。他强调说，必须先开放安特卫普港，然后才可能考虑进行进入德国的任何主要的大举猛攻。蒙哥马利这时打出了他的王牌：事态的最新发展——从在荷兰的地点对伦敦进行的火箭进攻——使得立即进军荷兰成为必要，他完全明白，这样一种大举猛攻应该怎样开始。蒙哥马利提议，为了攻进德国，应该使用几乎整个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进行一次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攻击。

他的计划是“彗星行动”的一个扩大而又不切实际的翻版。蒙哥马利现在想使用3个半师——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一○一空降师、英军第一空降师以及波兰第一伞兵旅，由这些空降军队先于他的部队在荷兰夺取一系列的渡口，其主要的出击目标是阿纳姆的下莱茵河桥。蒙哥马利预料，德国人会以为他将走最近的路线，朝东北方向大举猛攻，前往莱茵河和鲁尔河，因而他特意选择了一条北方的“后门”路线，前往帝国。空降兵的突然袭击，将会为他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坦克部队打开一条走廊，坦克将全速通过被缴获的桥梁，前往阿纳姆，渡过莱茵河到彼岸。一旦这一切全都完成，蒙哥马利就能转而东进，从侧翼包抄齐格菲防线，冲进鲁尔河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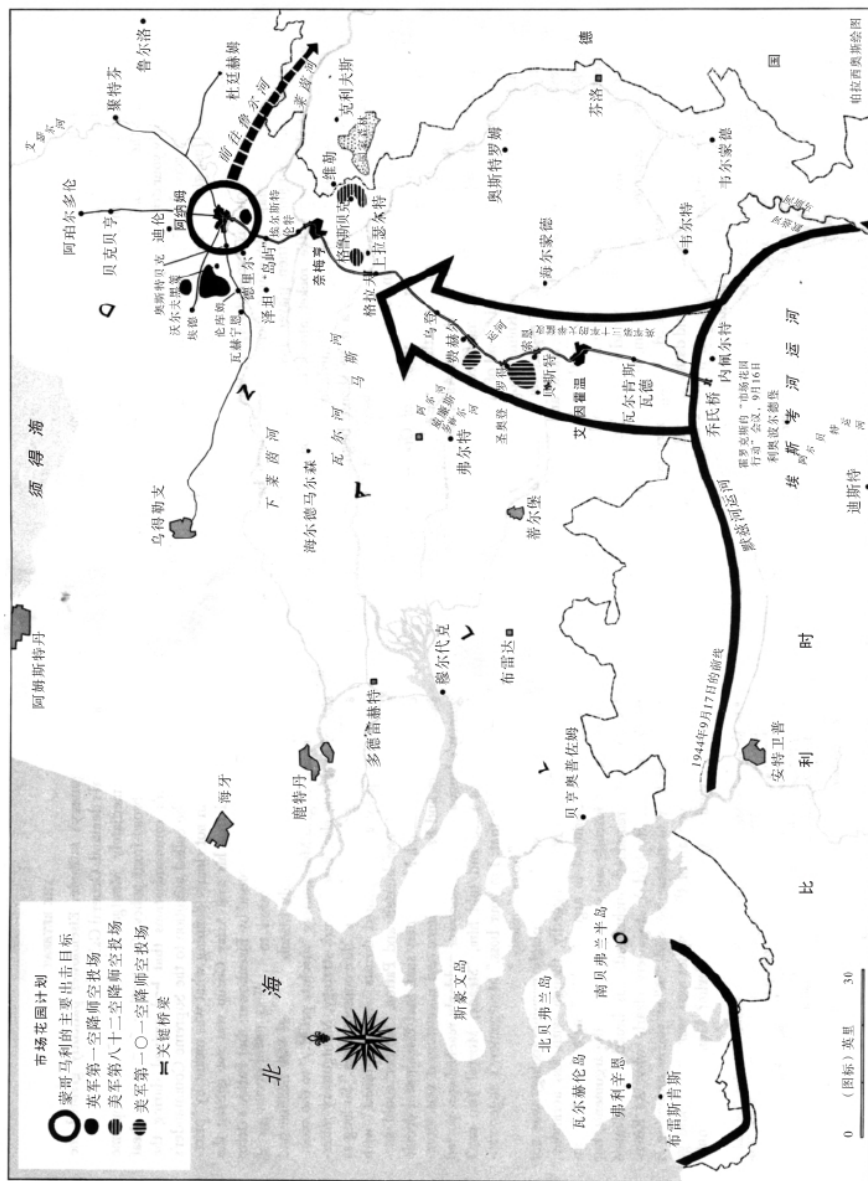
艾森豪威尔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他受到了感染。这是一个大胆、富有绝妙想象力的计划，恰恰是他一直在为长期闲置的空降师寻找的那种大规模进攻。但现在最高司令却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他同意进行这个进攻，那么安特卫普港的开放就得暂时拖延，给巴顿的补给品也得转而给他人；然而，蒙哥马利的提议又能够给奄奄一息的进军再次带来活力，也许能够推动追击，渡过莱茵河并进入鲁尔河地区。艾森豪威尔由于被这个计划的大胆吸引住了，因而不仅予以批准，[注]而且还坚决要求这个行动应该一有可能就进行。

然而最高司令又说，这个进攻是一个“有限的进攻”。他对蒙哥马利强调，他认为，这次空降部队与地面部队的联合行动，“只不过是向莱茵河和鲁尔河北进的一个延伸”。根据艾森豪威尔对这次交谈的记忆，他对蒙哥马利说：“我告诉你我将做什么，蒙蒂。为了让你渡过莱茵河，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因为我想要一个桥头阵地……不过我们得先渡过莱茵河，然后才能谈别的事情。”蒙哥马利继续争论，但艾森豪威尔就是不改变主意。陆军元帅垂头丧气，不得不接受他所谓的“折中办法”，会议就以这种气氛结束了。

艾森豪威尔离开之后，蒙哥马利便在一张地图上为布朗宁中将概述了这个行动。举止高雅的布朗宁是英军中鼓吹空降作战的先驱人士之一，他看到，这个行动要求，伞兵和滑翔机运送的部队将夺取一系列渡口———其中有5个是重要的桥梁，包括马斯河、瓦尔河和下莱茵河这几条大河上的桥梁———它们在荷兰边界与阿纳姆之间，跨度达64英里。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保持这个走廊的畅通———在大多数地方只有一条公路通向北方———而英军的装甲部队将在那个走廊上大举猛攻。装甲部队的全速推进要想获得成功，那些桥梁就得全部完好无损地夺取下来。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但空降部队一直受到的培训恰恰就是进行这种突然袭击。尽管如此，布朗宁还是心中不安，他指着阿纳姆的下莱茵河上最北边的那座桥，问道："装甲部队到我们这里要用多少时间？"蒙哥马利爽快地回答道："两天。"布朗宁仍然专心致志地看着地图，说道："我们能够坚守四天。"然后他又说道，"不过长官，我认为我们可能去的是一座过于遥远的桥。"注

蒙哥马利下令，那个萌芽中的概念（此后它将拥有代号"市场花园行动"———"市场"涵盖的是空降部队的空投，"花园"代表的是装甲部队的大举猛攻）要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他坚决要求，进攻必须在几天之内发动。他告诉布朗宁，要不然就太晚了。蒙哥马利问道："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就绪？"在这个时刻，布朗宁只能斗胆提出："行动预定最早是15日或者16日。"注

布朗宁带着蒙哥马利的框架计划，担负着在几天之内就得为这样一个巨大的任务做出准备的紧迫重压，立即飞回英国。他的空军基地位于伦敦郊外的里克曼斯沃思附近，被称为穆尔公园高尔夫球场基地。他一在基地着陆，便给20英里以外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打电话，通知了该集团军司令布里尔顿中将以及他的参谋长弗洛伊德·L·帕克斯准将。时间是下午2：30，帕克斯注意到，布朗宁的电话里含有"在这个司令部里对'市场'的第一次提及"。



由于一无所知而措手不及的军官并非只是空降集团军的司令员们。对陆军元帅最持批评态度的人非奥马尔·N·布拉德利上将莫属，蒙哥马利的大胆计划不仅给布拉德利留下了深刻印象，还使他大吃一惊，他后来回忆说：“倘若这位虔诚、滴酒不沾的蒙哥马利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我也不可能更为吃惊……尽管我从未接受这个

冒险，但却坦率承认，它是这场战争中最富有想象力的冒险之一。”注

它确实是这场战争中最富有想象力的冒险之一，但蒙哥马利还是不满。他现在甚至更进一步地督促盟军最高司令，同时又恢复了作为他军事生涯特色的那种谨慎、完美主义的思维。蒙哥马利提醒艾森豪威尔，除非为了这个“被精选出来的挺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能够获得额外的补给品和运输工具，否则市场花园计划最早也不可能在9月23日以前启动，甚至可能推迟到9月26日。布朗宁估计，到15日或者16日市场计划就可准备就绪了，但蒙哥马利关切的是花园计划，花园计划即地面作战行动。他再次要求得到他一直想得到的东西：绝对的优先权，在他看来，绝对的优先权将确保成功。艾森豪威尔在9月12日的案头日志上写道：“蒙蒂的提议是简单的———‘把一切东西都给他’。”艾森豪威尔担心，任何延误都可能危及市场花园计划，所以也就依从了。他立即派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去见蒙哥马利。史密斯向陆军元帅保证，将每天给他1000吨的补给品，外加运输工具。除此之外，还向蒙哥马利许诺，巴顿向萨尔河的大举猛攻将停止。陆军元帅把这个反应称为“扣人心弦”，并因为这个“扣人心弦”的反应而兴高采烈，他相信，他终于把最高司令争取了过来，使他接受了他的观点。

尽管蒙哥马利部队面前的抵抗已经强硬了起来，但他仍然认为，荷兰的德国人，在他们前线的坚硬外壳后面并没有多少力量。盟军的情报证实了他的估计。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报告说，在荷兰“步兵预备部队为数甚少”，而且甚至那些为数甚少的步兵预备部队也被认为是“低层次的部队”。据认为，敌人“在其长时间而又匆忙的撤退之后，仍然一片混乱……那个地区虽然可能有数量众多的小股德国人”，但他们却几乎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蒙哥马利现在认为，他能够迅速冲破德军的防御工事。之后，一旦他渡过莱茵河并朝鲁尔河进发，他就看不出艾森豪威尔还怎么会阻止他发动大举猛攻。他分析，最高司令将不会有多少选择，而只能让他继续朝柏林进发———从而结束这场战争，按照蒙哥马利的说法就是，“迅速而又顺理成章地”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充满自信地把9月17日，星期日，定为市场花园行动的D日。注他所设计的这个才华横溢的计划，将会成为这整个战争最伟大的空降行动。

对于市场花园行动，并非每一个人都像蒙哥马利一样有把握，起码他手下的一位高级军官就有理由担忧。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员迈尔斯·邓普西将军，并没有对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这就与陆军元帅不同。从这些报告上，邓普西的情报参谋们整理出了一幅画面，表明在艾因霍温和阿纳姆之间，德军的力量在迅速增加，而艾因霍温和阿纳姆之间恰恰是计划中空降部队要空投的地区。甚至还有一份荷兰人的报告说，“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编队已经被派往荷兰，重新进行装备”，而这些编队据

说也是市场花园计划所涉及的地区。邓普西把这个消息又送给了布朗宁的英军第一空降军，但这个信息并没有得到蒙哥马利或者蒙哥马利的参谋们的支持性认可。这个使人感到不祥的信息，甚至都没有被情报总结包括进去。事实上，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到处弥漫的乐观主义气氛当中，这个报告完全被忽视了。

7



为了拯救冯·扎根上将在加来海峡被围困的第十五集团军的余部，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了赌博，现在这个赌博正在得到回报。自9月6日以来，在夜幕的掩护下，由两只老掉牙的荷兰货船、几只莱茵河上的驳船以及一些小船和木筏所匆匆组成的船队，便一直在3英里宽的斯海尔德河河口两岸之间往来，把士兵、火炮、车辆甚至马匹运送过去。

尽管在瓦尔赫伦岛上有强大的海岸火炮进行保护，以免受来自海上的攻击，但令德国人感到吃惊的是，盟军的海军部队并没有试图干预。瓦尔特·波普少将本来预料运送他的已是残兵败将的第五十九步兵师的船队，将会“在水上被炸飞”。在他看来，从布雷斯肯斯到弗利辛恩之间那一个小时的行程，“乘坐着被完全笼罩在黑暗之中的船只，暴露在险境之中而又没有防卫能力，是一种令人最不愉快的经历”。德国人猜想，盟军完全低估了这个撤离的规模。当然，盟军对此是知晓的。因为不论是冯·伦德施泰特，还是B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由于极其需要增援，都要求快速，所以白天也进行了一些运送。立即，盟军战斗机就对这些小船队进行了狂轰滥炸。黑暗不管是多么令人感到不愉快，却要安全得多。

这个行程最危险的部分在斯海尔德河的北岸。那里，由于受到盟军空袭的不断威胁，冯·扎根的部队不得不走一条单一的大马路，那条马路从瓦尔赫伦岛向东，穿过贝弗兰半岛，然后进入荷兰大陆。这个逃跑路线的一部分，在与大陆相接的那个狭窄地带上，距离安特卫普以及在阿尔伯特运河上的英军营地只有几英里远。令人费解的是，英国人甚至都没有认真地试图对北岸进行进攻，以触发这个捕捉机的弹簧，使它突然关上，从而切断这个地峡的基础。逃跑路线保持畅通。尽管不断遭到盟军的空袭，但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将会最终抵达荷兰大陆———而且是在蒙哥马利市场花园行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抵达荷兰大陆。

第十五集团军与其说是由于有计划的设计而被救了出来，毋宁说是被运气救了出来，而与此同时，运气的对立面出现了：那就是命运，那个意外的、无法预测的命运介入了。在大约80英里以外的地方，是威廉·比特里希中将能征惯战的精锐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它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到达

了阿纳姆附近的露营地。按照陆军元帅莫德尔9月4日的指示，比特里希缓慢地把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从战斗中脱离出来，以便“重新装备和休整”。莫德尔选择了阿纳姆地区。这两个减员的但却仍然强悍的师，被展成扇形，进入阿纳姆镇的北边、东边和南边。比特里希把第九党卫军装甲师安排在阿纳姆的北边和东北一个巨大的长方形防区，在那些地方，该师的大多数士兵和车辆处在高地上，很方便地躲藏在一个树木茂密的国家公园里面。第十装甲师则是在东北、东和东南方向的一个半圆里面扎营。这样一来，这两个师得到了伪装，躲藏在附近的森林、村庄和城镇里面———那些村庄和城镇是贝克贝亨、阿佩尔多伦、聚特芬、鲁尔洛以及杜廷赫姆———都是在可对阿纳姆进行打击的距离之内，有些部队甚至就在郊区的一两英里之内。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说：“莫德尔选择阿纳姆附近，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因为那是一个平静的防区，没有什么事情在发生。”

这个遥远的、闭塞的地方可能会对盟军具有的战略价值，显然被忽视了。9月11日上午，莫德尔的一个参谋小组被派遣出去，要为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寻找一个新的地点———要在阿纳姆寻找一个新的地点。

35岁的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是莫德尔的一位副官，身为莫德尔司令部的行政和运输官员，他后来回忆道：“我们访问了贝克贝亨和鲁尔洛的第九和第十党卫军的司令部，以及在杜廷赫姆的比特里希将军指挥所。然后我们又仔细检查了阿纳姆本身。阿纳姆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良好的道路网和极好的食宿条件。但只是当我们开车到了西边的远郊区奥斯特贝克时，才找到了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在离阿纳姆市中心只有2英里半的这个富裕的住宅村，有几家旅馆，其中的一家旅馆，就是豪华舒适的白色墙面的哈滕施泰因旅馆，旅馆有一个空间宽广的月牙形草坪，那个草坪向后面延伸，进入一个公园似的环境，鹿在里面漫步而不受打搅；还有一家旅馆，即塔弗尔贝格旅馆，它比哈滕施泰因旅馆小一点，是一幢树木形状的两层楼，有一个用玻璃罩住的走廊以及一些门上镶着镶板的房间。赛德尔豪泽尔后来回忆，由于这些设施令人称羡，“住宿膳食尤其令人称羡”，所以一行人立即向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推荐奥斯特贝克，说该地是“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理想地点”。莫德尔批准了这个决定。他决定，参谋部的一部分人员将住在哈滕施泰因旅馆，而他本人将住在更为僻静、不那么豪华的塔弗尔贝格旅馆。赛德尔豪泽尔中尉大喜过望。自从他任职以来，司令部从未在一个地方待过几天以上的时间，现在他“期望着能安静下来，有机会把衣服洗洗”。莫德尔指示，到9月15日，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要在奥斯特贝克完全运转起来———奥斯特贝克距离那个广袤的荒原和牧场大约3英里远。而英军第一空降师则定于9月17日在该地着陆。

---

1. 海尔德兰（Gelderland），荷兰中东部省份，与德国接壤。

2. 党卫军分为普通党卫军和武装党卫军两种。武装党卫军又分为：1.近卫团，2.骷髅队，3.战斗队。

3. 骷髅画（skull - and - crossbones），由骷髅和交叉的大腿骨组成，象征死亡或危险。

4. 艾因霍温（Eindhoven），荷兰北布拉班特省城市，1232年设市。

5. 菲利浦电器公司，荷兰的跨国公司，1891年成立，称为菲利浦公司，1912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取现名。

6. 这是幽默说法，“斧头节到了”，就是他们该挨斧头了。

7. 赛易斯 - 英夸特吓坏了。在阿珀尔多伦，他躲进他的地下司令部里——那是一个由水泥和砖建成的巨大地堡，耗资250000多美元——里面会议室、通信设备和个人套房一应俱全。这个地堡今天还在。在入口处附近的水泥外墙上，有“六又四分之一”这个数字的划痕，“六又四分之一”是这位讨厌的特派员的绰号。这是荷兰人忍不住划上去的；在荷兰语中，赛易斯 - 英夸特与“六又四分之一”的发音几乎一样，念作“zeseneenkwart”。——原注

8. 上艾瑟尔省，荷兰东北部的一个省。

9. 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又称圣衣会，中世纪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于12世纪建立于叙利亚的加尔默罗山。

10. “谁也不会认为在德军中可能发生的场面，却被人们目睹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尔特，格尔利茨在其《德国参谋部史》一书中写道，“海军向北方进发，却又没有携带武器，同时又在出售他们多余的制服……他们告诉人们，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正在回家。装载着军官、他们的情妇和大量香槟酒和白兰地的卡车，试图一直撤退到莱茵兰（莱茵兰是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统称——译者按）那里去，因而有必要设立特别的军事法庭，来审理这种案子。”——原注

11. 圣优西比乌斯（St.Eusebius，？—310），意大利籍教皇（310年4月至8月在位），对接纳基督教受迫害时变节者重新入教持有异议，被罗马皇帝放逐西西里岛至死。

12. 达豪集中营（Dachauconcentrationcamp），德国第一个纳粹集中营，1933年3月10日建立，在慕尼黑以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主营之外，还有约150个分营分散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统称达豪集中营。

13. 圣卡尼修斯（St.PeterCanisius，1521－1597），天主教耶稣会学者、教义师，生于尼德兰。

14. 鹿特丹是荷兰第二大城市，世界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海港。

15. 须得海（ZuiderZee），位于荷兰西北部。原为北海一海湾，1932年后经筑堤岸拦截，同北海分开，内部相当大一部分已改造为圩田，剩余水面称作艾瑟尔湖。

16. 希尔克尼斯（Kirkenes），挪威最东北端的一个小镇，位于挪威的芬马克郡（provinceofFinnmark），在邻国芬兰的东边，可以说是西欧的最北端。

17. D日，即盟军在法国北部的开始进攻日，即1944年6月6日。详见作者另一著作《最长的一天》。

18. 波希米亚人（Bohemian），也意为流浪汉、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希特勒中学毕业后想做艺术家，去维也纳两次投考美术学院，均落榜。伦德施泰特又认为，希特勒是“业余战略家”，所以他才有“波希米亚下士”之说。

19. “希特勒来信的言外之意就是，冯·伦德施泰特‘要求被免职’，这使冯·伦德施泰特受到了伤害。”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告诉我，“在司令部里，我们一些人实际上认为，他曾要求被免职，但情况并非如此。冯·伦德施泰特否认他曾要求被免职——他也从未想过要求被免职。他愤怒极了——事实上他愤怒得发誓说，他将永远也不在希特勒的手下进行指挥。他知道，他本意并非如此，因为对冯·伦德施泰特来说，在军事上的服从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原注

20. 沃利蒙特，《希特勒司令部内幕，1935—1945》，第697页。——原注（又，译者按：“只说单音节的字”，也就是比如只说“是”或者“不是）”。

21. 瓦尔特·格尔利茨是《陆军元帅凯特尔回忆录》一书的主编，按照格尔利茨的说法（见该书第10章，第347页），冯·伦德施泰特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不管你会下什么命令，我都会尽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有关冯·伦德施泰特的反应的说法，依据的是他的前任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少将的回忆录。“我什么也没有说，”冯·伦德施泰特告诉他，“要是我张开嘴的话，希特勒就会‘对我’讲上3个小时。”——原注

22. 准尉副官（regimentalsergeantmajor，或sergeantmajor），即营或者团的行政助理。

23. 万塞（Wannsee），在柏林的西南郊，与市区相隔有湖泊（万湖与哈

弗尔湖），所以是“与世隔绝”。

24. 克里特岛（Crete），在希腊南部。

25. 安特卫普在比利时北部，马斯特里赫特在安特卫普的东边，是与比利时接壤的荷兰边界城市，列日是比利时城市，在马斯特里赫特以南。阿尔贝特运河在安特卫普与马斯特里赫特之间，在列日和马斯特里赫特之间也有运河。所以这条防线覆盖了比利时的东北部。

26. 希特勒再次利用了他最资深的军官冯·伦德施泰特，任命他为军人荣誉法庭的庭长，该法庭对涉嫌的军官们进行了判决。冯·伦德施泰特平静地屈从于元首的要求。他后来解释说：“倘若我不屈从于他的要求，我可能也会被看作叛国者。”冯·伦德施泰特的解释从来也没有令他的许多将军伙伴们满意，他们私下里因为他屈从于希特勒的要求而谴责他。——原注

27. 希特勒怀疑，隆美尔也与未遂行刺有牵连，三个月之后隆美尔死去了。隆美尔在家里养病期间，希特勒让他做出选择：要么因为叛国罪而接受审讯，要么自杀。10月14日，隆美尔吞下了氰化物。希特勒宣告，帝国最孚众望的陆军元帅，“死于在战场上所负的伤”。——原注

28. 克累弗（Kleve），德国西北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城市。

29. 瓦尔赫伦岛（WalcherenIsland），荷兰的一个地区，原先是一个岛，位于荷兰的西南部，在斯海尔德河的河口处。又，斯海尔德河（ScheldtRiver）是西欧河流，全长270英里，源出法国北部，经比利时，在荷兰境内注入北海。

30. 加来海峡（PasdeCalais），即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多佛尔海峡（StraitofDover）。

31. 莫德尔曾两次告诉希特勒，他无力既担任西线总司令，又担任B集团军群司令。“我们难得看见他，”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回忆说，“莫德尔讨厌文牍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战场上。”西线作战部部长博多·齐默曼中将在战后写道，尽管莫德尔“是一个完全有能力的军人，”但他却往往“要求太高，而且太快地提出要求”，这样一来，“就可能看不见实际上可能的情况”。他有一种“挥霍他的兵力”的倾向，齐默曼又说，“由于他过于频繁地不在现场，又提出难以捉摸且出尔反尔的要求，致使参谋工作受到了损失”。（见美国陆军部军事史主任办公室保存的齐默曼的手稿，手稿序号308，第153—154页。）——原注

32. 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IISSPanzerCorps），第二是军团的序号，即这

是第二装甲军团，又是党卫军的装甲军团。可理解为，这是第二装甲军团，又名党卫军装甲军团。

33.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德国人有关这个时期的记载是模糊的，而且往往是令人费解的。命令发布了，却又从来没有被收到，又再次发出，却又被撤回或者更改了。有关莫德尔的命令存在着相当大的混乱。按照B集团军群作战日志的说法，调动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的命令，是在9月3日的晚上发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命令就是永远没有被收到。而且，根据记载，比特里希是在48小时以后收到了指示，要他监督部队的改组和恢复，这不仅涉及第九装甲师，还涉及第二和第一一六装甲师。值得玩味的是，第十装甲师并没有被提及。我无法找出任何证据，说明第二或者是第一一六装甲师到达了阿纳姆地区（看来他们是继续在前线作战）。按照比特里希本人的文件和日志的说法，他是在9月4日接到了莫德尔的口头命令，并相应地只是率领第九和第十装甲师前往北方。这两个师，按照他们的师长的说法，在9月5日至6日开始慢慢撤退。——原注

34. 洛林是法国的一个地区，与德国毗邻。普法战争（1870—1871）法国战败后，曾部分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还法国。法语拼写是Lorraine，德语拼写是Lothringen。由于有这个历史背景，所以德国人施图登特把洛林笼统算在“德国各地”之内，不能说是犯了常识性错误。

35. 尽管场面混乱，但爱马的施图登特仍然不厌其烦地在日记中记下，“这些巨大的牲口是苏格兰的克莱兹代尔马、法国的佩尔什马、丹麦马和荷兰的弗里斯兰马”。希特勒的军队与盟军军队不同，从来也不是完全摩托化，这一点与普遍的看法正相反。甚至在德军力量最强盛的时候，他们运输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也是用马拉完成的。——原注

36. 见查尔斯·B·麦克唐纳的《齐格菲防线战役》（TheSieg□friedLineCampaign），第124页。麦克唐纳的这卷书是美国陆军史丛书中的一部，这本书与马丁·布卢门森的《突围与追击》（Breakoutand Pursuit）一起，最精确地描绘了德军在西线惨败的军事画面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论述这一时期的另外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也许因为是在战后不久写成而更加生动的著作，是米尔顿·舒尔曼的《西线的失败》（DefeatintheWest）。——原注

37. 资产负债表（balancesheet），会计学术语，即显示收支总差额的报告书。当然这里用作比喻。

38. 德军在人员和装备上的损失令人难以置信。在诺曼底入侵后的92天

里，有30万名德军阵亡、受伤或者失踪；还有20万名德军被围困，他们保卫着“最后的防线要塞”，也就是各个港口以及在英吉利海峡内的海峡群岛。大约有53个德军师被消灭了，而大量的装备散落在法国和比利时各地，起码有1700辆坦克、3500门火炮、成千上万辆装甲车和马拉的或者摩托化的运输工具，还有堆积如山的装备和补给品，从轻武器到巨大的弹药临时堆积处一应俱全。伤亡人员中还有两位陆军元帅以及20多名将军。——原注

39. 布卢门特里特将军长期担任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也是他的最信任的密友，他在9月5日被韦斯特法尔将军所取代，奉命返回德国，这令冯·伦德施泰特感到恼火。冯·伦德施泰特抗议这个改变，但却无济于事。然而，布卢门特里特确实参加了在阿里姆贝格举行的一些早期的会议，直到9月8日才离开司令部。——原注

40. 这是回应上面的一句话，言外之意：由于盟军来不及赢得胜利，才给了德军重整旗鼓的宝贵时间。

41. 近卫团是保卫国王或者女王的部队，这里用作定语，说明这个装甲师隶属于近卫团。

42. 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已故的B·H·利德尔·哈特，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写道：“这是一个多重的失误——从蒙哥马利以下四位指挥官的失误。”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B·麦克唐纳在《巨大的努力》一书中，同意利德尔·哈特的看法。他把这个失败称为“二战最大的战术错误之一”。有关为安特卫普所付出的代价，最精彩也最详尽的论述，毫无疑问当属R·W·汤普森的《85天》一书，我同意他的看法，即丧失机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疲惫不堪”。他写道，第十一装甲师的官兵，“他们坐在、站在或者躺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觉，全无表情，完全是精疲力竭”。如果我们接受他的理论，那么罗伯茨的第十一师能够以同样的气势继续大举猛攻，就大可怀疑了。尽管如此，汤普森还是认为，“倘若有一个指挥官随时关注着这场战斗，每小时每天都关注，同时又具有能够看到前景的指挥灵活性的话”，那么安特卫普以及它的那些极其重要的入口，就可能轻易夺取。——原注

43. 在其回忆录中，霍罗克斯非常坦率地作了解释。“我的解释是，我的眼睛完全集中在莱茵河上，别的一切似乎都是次要的。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斯海尔德河将会布雷，而且在这个水道被清理干净、两岸的德军被肃清以前，我们是不能使用安特卫普的……毫无疑问，要是拿破仑的话，他是会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但霍罗克斯却没有意识到。”他也欣然承认，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抵抗，“我们的每辆军车仍然有可行驶100英里的汽油，而且可以得到另外一天的补给”。那会是“相当大的风险”，不过“我认为，倘若我们

冒这个险并直接继续前进，而不是在布鲁塞尔停顿下来的话，欧战的整个进程就可能改变”。——原注

44. 这位年轻的亲王，尽管被女王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时候，涉及他的军事背景却非常坦率。他告诉我：“除了战前在（荷兰的）军事学院上了一门课之外，我没有战术上的经验。我又在英国继续学了各门课程，但我的大部分军事知识是通过实践学来的，那就是通过阅读和与我的军官们讨论。然而，我从来也不认为我有足够的经验，能够做出战术上的决定。我依靠我的参谋们，他们非常称职。”伯恩哈德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他仔细地保存着1944年的个人日记，他大方地提供给我使用。在他的日记里，他用非常小的字记录下了每一个行动，从打来的电话到军事会议以及正式的聚会，几乎每分钟的活动都记录下来。根据他本人的记录，我估计，在这个阶段他平均每天工作约16个小时。——原注

45. 阿拉曼是埃及北部的一个村庄，在阿拉曼战役（1942年11月）中，蒙哥马利把隆美尔赶出埃及，被誉为“阿拉曼的蒙哥马利”。

46. 见弗朗西斯·德吉恩冈少将的《战争中的将军们》一书，第100—10l页。——原注

47. 在丘吉尔的强烈要求下，英王乔治六世于9月1日封蒙哥马利为陆军元帅，这让蒙哥马利和同他一样被激怒了的英国公众多少得到了点抚慰。——原注

48. 本书作者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采访。——原注（又，本段中，蒙蒂是蒙哥马利的昵称，艾克即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49. 欲更详尽地了解盟军情报部门的估计，请见福里斯特·C·波格博士的《最高统帅部》一书，第244—245页。——原注

50. 瑟堡（Cherbourg），法国西北部港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51. 默兹河（MeuseRiver），源出法国东北部，流经比利时，在荷兰西南部注入北海，其下游即马斯河（MaasRiver）。

52. 亚琛在德国西部边界，对面就是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和比利时的列日。

53. 巴顿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始终是有新闻价值的，但令人难忘的却是这位将军未被记载下来的话，由于他的词汇丰富多彩，这些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见诸报端。我作为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出席了9月第一周的记

者招待会，当时他以自己典型的方式，阐述了他对付德国人的计划。巴顿扯着他的高嗓门，用手嘭嘭地捶着地图，宣告：“在第三集团军的前面，也许有5000个，也许有1万个纳粹杂种待在他们的水泥散兵坑里。现在，如果艾克不再对蒙蒂给予支持，而把那些补给品给我的话，那么我就能像鹅拉屎一样突破齐格菲防线。”——原注

54. 威灵顿（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以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指挥英、普联军击败拿破仑而闻名。

55. 帽贝（limpet），一种海洋贝类动物。

56. 沙特尔（Chartres），法国城市，位于巴黎西南厄尔河左岸。

57. 为蒙哥马利说句公道话，必须指出，他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像一把匕首似的孤军朝柏林大举猛攻”一语。他的想法是把40个师一起投入，朝柏林大举猛攻——这当然不是匕首似的挺进——但这话却被当成他说的了。在我看来，在以后举行的许多次战略会议上，这句话伤害了他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事业。——原注

58. 这是对本书作者说的话。在一次录音采访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几乎为我再现了在与蒙哥马利进行激烈争论时他的情感。当我告诉他我已经采访了这位陆军元帅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打断我的话，说道：“你不用告诉我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他说我对战争一无所知——对吧？注意，我所感兴趣的只是把这件事情真实而又合乎逻辑地记下来，因为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必须做出推断……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我不会过于看重将军们的记忆，包括我的记忆。因为记忆是一件不太可靠的事情……该死的，我不知道你在英国听到了什么，但英国人却从来也不懂美国的指挥体系……那整个该死的事情（二战）结束以后……我从未听见英国人唱过什么该死的赞歌。而且你现在也不会听到，尤其是不会听到像蒙哥马利这样的人唱赞歌……他的同事们——他们有关他说的话，我做梦也不想重复……即使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而名垂青史，我也不会在乎。他并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但如果他那样名垂青史的话，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他人身攻击得非常厉害，以为美国人没有功劳，尤其是我没有功劳，与这场战争毫无关系，我最终干脆不再与他交流……我恰恰对与一个恰恰不能说实话的人交流没有兴趣。”本书作者敦促读者记住，在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这位最高司令从未公开谈论过蒙哥马利这位陆军元帅，他这里所表达出来的见解是首次披露。——原注

59. 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是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

60. 勒阿弗尔（LeHavre），法国北部港口城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61. 锡利哈姆犬（Sealyhamterrier），威尔士的锡利哈姆庄园培育的小猎犬。

62. 亚眠（Amiens），法国北部城市。

63. 见波格的《最高统帅部》，第280页。——原注

64. 在蒙哥马利的回忆录中，提到这次会议的时候，“我们谈得很好”。但他又确实说明，在进行战略争论的这些日子里，“可能我在敦促他接受我的计划的时候，走得稍微远了一些，而又没有充分考虑到他所承担的沉重的政治负担……在回顾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经常纳闷，我是否是在充分理会了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之后再批驳他的看法。我认为我是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惊叹于他的耐性和宽容”。——原注

65. 这是艾森豪威尔对本书作者说的。——原注

66. 按照斯蒂芬·E·安布罗斯在其《盟军最高司令》一书中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告诉安布罗斯道：“我不仅批准了……我还坚决要求进行。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莱茵河上的一个桥头阵地。如果这一点能够完成的话，我就非常愿意为别的一切军事行动提供服务……”见该书第518页的脚注。——原注

67. 此处的“一座过于遥远的桥”，原文是“abridgetoofar”，本书的译名“遥远的桥”即来源于此。

68. 见《第一次计划会议的会议记录》，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作战档案，第1014 - 1017号。——原注

69. 见奥马尔·N·布拉德利上将，《一个军人的故事》，第416页。布拉德利还说：“我事先并没有介入这个计划。事实上，蒙哥马利先是把这个计划设计出来，又兜售给了艾克，过了几天，我才从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里的我们自己的联络官那里得知这个计划。”——原注

70. D日（D - Day），即预定进攻发起日，或者计划行动开始日。比如，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北部的开始进攻日，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D日。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istory of the greatestbattle of world war II

第二部 计划

part two the plan

1



9月10日薄暮时分，布朗宁将军与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晤刚刚过去几个小时，刘易斯·H·布里尔顿中将就召开了讨论市场行动的第一次会议。他的司令部位于桑宁希尔公园，附近就是上流社会使用的阿斯科特赛马场，距离伦敦35英里，27名高级军官挤进了布里尔顿地图排列成行的大办公室里。在布朗宁将军简要介绍了蒙哥马利的计划之后，布里尔顿告诉军官们，由于时间紧迫，因而“现在做出的重大决定将不可改变———而且这些重大决定必须立即做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而且也没有什么指导方针。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派出一支庞大的空降部队，深入到敌人前线的背后，这支空降部队配备有车辆、火炮和设备，能够独自进行战斗。与市场行动相比，以前的空降进攻是小巫见大巫，然而为那些小的空降进攻作准备，就已经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了。现在，为了替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伞兵和步兵滑翔机空降行动作准备，布里尔顿和他的计划者们却只有不到7天的时间。

布里尔顿所关切的最大的事情，并不是最后期限，而是这个行动有可能像以前的几次行动一样，也被撤销。他长时间闲置不用的空降部队急切地想参加战斗，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士气问题。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各个精锐的、训练有素的师已经退出战斗，而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上的地面部队却胜利地横扫法国和比利时。人们普遍感觉，胜利就在眼前，因此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参加战斗之前，战争可能就已经结束了。

将军丝毫不怀疑，他的参谋部有能力满足这个棘手的、为期一周的市场行动进度表的要求。在制订以前的空降计划的时候曾经有过多次“预演”，因而他的司令部和各师的参谋部已经来进入了一个高速有效的阶段。除此之外，在为“彗星行动”和其他被取消了的行动所制订的计划里面，有大量的东西可以立即被市场行动所采用。例如，在为流产的“彗星任务”做准备的时候，受命参加那次行动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和波兰旅，就曾对阿纳姆地区做了彻底研究。尽管如此，市场行动的大多数概念还是意味着极大地扩充计划———而这一切都是消耗时间的。

布里尔顿将军表面上是自信和平静的，但他的参谋部人员却注意到他一支又一支地抽着香烟。他的桌子上有一个镶在框子里的语录，将军经常让他的参谋看这个语录。语录是：“好比说，有一万名士兵从天而降，来到许多地方，在还没有来得及做出无限度的恶作剧之前，国君就能够把一支部队聚集起来，把他们击退，这样一位有能力用部队覆盖国土、保卫国家的国君，又在哪里呢？”(注)这句话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的。

布里尔顿被这位18世纪的政治家兼科学家的想象力迷住了。“甚至在160年以后，”他告诉他的参谋们，“理念还是一样。”不过富兰克林若是在今天的话，他也会为市场行动的复杂性和规模所困惑。为了从天上进攻荷兰，布里尔顿计划空降大约35000名兵力———几乎是进攻诺曼底时所用伞兵和滑翔机空投步兵的两倍。

按照布里尔顿的说法，那就是“像雷鸣似的突然夺取桥梁”，然后坚守那个狭窄的由一条公路组成的进军走廊，让执行花园行动的英军地面部队畅通无阻———从他们在荷兰与比利时边界附近的进攻路线，一直到北边64英里外的阿纳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要使用三个半空降师，有两个将是美军的空降师。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的第一○一空降师，就在布赖恩·霍罗克斯上将的第三十军坦克部队的前面，第一○一空降师的任务是，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之间的一个15英里的地段上，夺取各个运河渡口和河流渡口。在他们的北边，詹姆斯·M·加文准将富有经验的第八十二师，将负责格拉夫和奈梅亨市之间的区域，那大约是一个10英里长的地段。他们要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这两条大河上的渡口，尤其是要夺取位于奈梅亨的那座巨大的多孔大桥，那座多孔大桥加上入口，几乎有半英里长。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个最为重要的攻击目标，就是阿纳姆及400码宽的下莱茵河上的重要渡口，那座钢筋水泥筑成的三孔公路大桥，加上水泥坡道，长约2000英尺。对它的夺取被安排给了英国人和波兰人———罗伯特·E·罗伊·厄克特少将的第一空降师，以及在他指挥下的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阿纳姆与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距离最远，它就是这次行动的奖品。倘若没有莱茵河上的渡口，那么蒙哥马利要解放荷兰、包抄齐格菲防线、就像在跳板上跳一样跃进到德国的鲁尔河工业区这个大胆的攻击计

划，就会失败。

要把大军带到300英里以外的目标，必须设计出一个复杂精细的空降计划，它要求进行三个不同的军事行动：运输、保护和再次补给。为了起飞，将需要至少24个机场。布里尔顿计划使用在他指挥下的每一架可以操作的滑翔机———那是一个超过2500架滑翔机的巨大机群。除了运送吉普车和火炮这样的重设备之外，这些滑翔机还要运送那支35000人的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余的兵力将通过降落伞空投。要检测所有的飞机，把载荷空间分配出来，把重设备和货物装载进去，还要准备好部队的编制名额。

滑翔机只是制定空降计划中的一个问题。运送伞兵的飞机和拖曳滑翔机的拖曳飞机，必须从为进军部队提供补给品的正常任务中转移出来，停飞，为市场行动随时待命。在进攻之前以及进攻期间，必须提醒轰炸机中队的机组人员，简要介绍他们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任务。将需要来自英格兰各地的成群的战斗机中队———有1500多架战斗机来为空降部队护航。复杂精细的空运模式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在英格兰和荷兰之间的航线得设计出来，以避开敌人的猛烈防空炮火，以及同样危险的飞机相撞的可能性。空中和海上的营救行动，再次补给任务，甚至为了欺骗敌人而在荷兰的另外一个地区进行的仿真伞兵空投，也都计划出来了。据估计，总共将有约5000架各种型号的飞机介入市场行动。要制订出计划，并为这个巨大的机群做好准备，起码需要72个小时。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次会议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行动究竟是应该在白天进行，还是晚上进行。以前的重大空降行动都是在月光下进行的，但半明半暗的状态导致了寻找着陆区时的混乱，部队难以集中以及不必要的伤亡。将军因而下令，这个巨大的空降攻击将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在空降行动的历史上，这种规模的白天空投以前从未进行过。

除了意欲避免混乱之外，布里尔顿还有别的理由。定于进行市场行动的那一个星期，是没有月光的，因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夜间着陆。除此之外，布里尔顿之所以选择白天进攻，还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它是第一次可行。盟军的战斗机在战场上方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而实际上不存在来自德国空军的干扰。但德国人却拥有夜间战斗机，在夜间空投的过程中，对于排成纵队的移动缓慢的运兵飞机和滑翔机来说，那些夜间战斗机可能是有效的、毁灭性的。德国的防空力量是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前往市场行动空投地区通路的高射炮火地图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德军防空阵地。那些图表所依据的，是空中照相侦察飞行所拍摄的照片，以及在飞往德国时途经荷兰的轰炸人员的经历，那些图表看上去令人生畏———尤其是因为，滑翔机除了在座舱内有保护铁甲之外并没有别的保护铁甲，而C－47

型兵员运输机和拖曳飞机也没有自行封口的油箱。尽管如此，布里尔顿还是认为，在攻击之前和攻击期间，敌人的防空阵地能够被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集中进攻压制住。无论如何，大多数高射炮都是由雷达来指导的，因而其效率在夜晚和白天没有区别，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损失都在可以预料之中。另外，除非恶劣的天气和大风介入，空降部队在白天进攻，能够非常精确地空投在着陆地带，确保部队迅速集中在那个走廊里。“其优点，”布里尔顿告诉他的指挥官们，“远远大于其风险。”

布里尔顿进行了他最后的宣布。为了指挥这个巨大的行动，他任命他的副手————那位过分讲究的47岁的弗雷德里克·“男孩”·布朗宁中将————担任英军第一空降军的军长。这是一个精彩的选择，尽管它让马修·B·李奇微中将感到失望，李奇微是这个空降集团军中另外一个军————第十八空降军的军长。不过布朗宁曾经被推举，指挥那次流产的“彗星行动”，“彗星行动”虽然是一次小行动，所使用的也仅仅是英国和波兰的空降部队，但在概念上却与市场花园行动类似。现在，根据蒙哥马利所设计出来的这个扩大了的、富有新意的计划，美国伞兵将第一次接受一位英国空降指挥官的指挥。

面对聚集在一起的空降部队指挥官们，布朗宁作了一个乐观的总结。他谈话的结束，是那种始终使他在部下面前成为一个英雄人物的绘声绘色的自信。他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布朗宁将军情绪高涨，为我们终于要出发了而高兴。他告诉我们，‘目标就是要在地面上铺一个空降部队的地毯，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上面通过’。他认为，这个单独的行动掌握着战争进程的关键。”

布朗宁的热情是具有感染力的。这次大会议结束以后，接着又召开了一些持续通宵的小参谋会议。散会的时候，没有几个军官意识到，在布里尔顿和布朗宁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摩擦。起初，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成立的时候，英国人抱有很高的希望，以为布朗宁是英国的资深空降权威，又是使用伞兵的一位先驱，因而会被任命为该空降军的军长。但由于这个新组建的集团里军美国人在兵员和装备上占有优势，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也就到了美国人布里尔顿将军的手中。

在级别上，布朗宁比布里尔顿早6个月晋升为中将，尽管这个美国人是一位杰出的空军战术军官，但以前却从未指挥过空降部队。除此之外，两个人在个性上也有巨大的差异。布里尔顿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先是在远东和中东，后来又担任在英格兰的美军第九航空队(注)司令。他坚韧不拔，专心致志，一定要达到目的的热情却又为一种安静、无动于衷的举止所掩盖。现在，布里尔顿将以他美国职业军官所特有的决心和具有威慑力的战术，去执行这个令人

生畏的任务。

布朗宁是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注]的军官，也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他同样决心要证明伞兵的价值，但他以前从未指挥过一支空降部队。与布里尔顿形成对照的是，“男孩”布朗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他举止优雅，服饰整洁得无懈可击，带有一种潇洒自信的派头，那种潇洒自信往往被误解为傲慢，不仅美国人会这样误解，他手下的一些指挥官也会这样误解。虽然他喜怒无常，有时过于不耐烦，但他作为空降理论家的声望，在艳羡者当中却被传为佳话。尽管如此，他还是缺乏其他一些军官所拥有的作战经验，比如英军第六空降师的理查德·盖尔将军，以及经验丰富的美军指挥官加文将军和泰勒将军。而且布朗宁还需要证明，他拥有最有经验的空降指挥官李奇微将军的那种行政工作天才。

几天以前，发生了一个事件，使得布里尔顿与布朗宁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9月3日，布朗宁已经向布里尔顿申明，只有36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便试图发动一次空降攻击是危险的。自从6月6日的D日以来，有17个空降行动准备好又被取消了。在布里尔顿担任指挥官的33天时间里，他急于投入战斗，因而计划几乎以每周一个的速度被制订出来，却没有一个计划到达发动的阶段。布朗宁注视着空降计划的大批量生产，对其中的仓促和风险极其关切。朱顶雀行动I是计划在比利时境内的英国军队前面进行空投，当这个行动9月2日被取消的时候，布里尔顿又迅速在快速前进的军队前面找到了新的目标，提议发动朱顶雀行动II，以作为朱顶雀行动I的替代，并定于9月4日上午发动进攻。

对于这个事件，布里尔顿后来回忆：“布朗宁对朱顶雀行动II非常不安，认为其中严重缺乏信息、照片，尤其是缺乏地图。结果，‘男孩’声称，无法向他的部队恰当地介绍情况。”布朗宁断言，空降行动“不应该准备时间这么短就尝试”。布里尔顿对此原则上同意，不过他告诉他的副手，“敌人的瓦解要求我们冒风险”。这两个人之间不一致的结果，就是布朗宁生硬地声明，他将书面提出抗议。几个小时后，他的信到了。由于“我们在意见上的尖锐不一致”，布朗宁信中说，他再也没有能力“继续担任盟军第一空降军的副司令”。布里尔顿并没有被吓倒，立即开始考虑接替布朗宁的人选。他提醒李奇微将军，要“作好接替的准备”。当朱顶雀行动II被取消的时候，这个微妙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第二天，布里尔顿说服布朗宁撤回他的辞呈。

现在，他们的不一致被放在了一边，两个人都面对着为市场行动作准备这个巨大而又复杂的任务，不管布朗宁有什么保留意见，对于面前的任务来说都是次要的了。

在最初的会议上，有一个决定布里尔顿无法做出：就是构成那个地毯的空降部队，究竟应该怎样被运送到目标去。在这个最大的问题被解决之前，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无法制订出详尽的计划来。事实是，空降部队的机动性取决于运送他们的飞机的机动性。除了滑翔机之外，布里尔顿没有自己的运输工具。为了达到完全的突然性，理想的计划要求参加市场行动的三个半师应该在同一天、同一个小时，被运送到着陆区域。但这个行动的巨大规模却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不论是飞机还是滑翔机都极其短缺，因而飞机必须飞行不止一次。其他的因素也迫使他们采取不同的步骤。每一个师都有不同的作战要求。例如，在进攻开始的时候，运送泰勒将军第一○一空降师的飞机，所运送的士兵必须多于设备，这样该师才能完成指派给他们的任务：即在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内，就与参加花园行动的地面部队会合。还有，泰勒的士兵必须迅速与在他们北边走廊上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会合。在那里，加文将军的部队不仅必须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上令人生畏的桥梁，而且还得坚守位于东南方向的格鲁斯贝克山脊，不能让德国人进入那里，因为它俯瞰着农村地区。给加文的特殊任务也带来了特殊的要求，由于在会合之前，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作战时间要长于第一○一空降师，因而加文所需要的就不仅是部队，而且还有火炮。

在更北边的地方，厄克特将军率领的英军第一空降师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不同。英军第一空降师要坚守阿纳姆大桥，一直到被解围为止。要是走运的话，德军的反应将足够迟缓，这样，在敌人的兵力真正增强之前，地面部队就能够接应到这些仅装备轻武器的伞兵。但在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达之前，厄克特的士兵将不得不坚持下去。厄克特不可能派部队到南边与加文会合，因为那样会耗费他的兵力，也就是说，在空降地毯的最远端，英军第一空降师将不得不比别的任何人都坚守更长的时间。由于这个原因，厄克特的兵力是最多的，由于增加了波兰的伞兵，再加上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注]，他的师得到了增强——一旦简便机场在阿纳姆地区确定位置并准备好，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就将被空运过来。

11日上午，在对可能获得的飞机进行了一夜忙乱的评估和分析之后，保罗·L·威廉斯少将把他的报告交给了布里尔顿。威廉斯是美军第九运输机空军兵团[注]司令，他负责市场行动的整个航空运作。他汇报说，滑翔机和飞机十分短缺，即使全力以赴，在D日充其量也只能把布朗宁总兵力的一半部队空运进去。必不可少的物品，比如火炮、吉普车和其他定于由滑翔机运送的货物，只能在严格优先的基础上被包括进去。布里尔顿敦促他的空军指挥官们探讨在D日进行两次空运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这个建议是不切实际的。“由于白天变短以及所涉及的距离，考虑一天进行一次以上的空运是不可能的。”威廉斯将军说，那太冒险了。他指出，那样将没有时间进行保养或者对作战带来的损坏进行修理，而且也几乎肯定“会由于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疲劳而带来伤亡”。

布里尔顿为飞机的短缺和时间的限制所束缚，他作了一些一般的评估：将会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对荷兰的桥梁和地形拍摄航空侦察照片；两天的时间必须准备出各个地区的地图，并分发下去；情报必须搜集起来并进行分析；必须准备出详尽的作战计划。所有决定中最为关键的是：布里尔顿被迫修改市场行动的计划，使之适应于现存的空运能力。他必须分批运送他的兵力，在3天的时间段内把那三个半师空运到他们的目标去。风险是巨大的：德军的增援部队可能比任何人的预料都快地到达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防空炮火增强；而且始终还有天气恶劣的可能，雾、大风、突然的风暴，在一年的这个时候全都可能出现，并造成灾难。

更糟糕的是，一旦到了地面，伞兵和滑翔机空降的步兵，在到达的时候没有重炮或者坦克，将会是极其脆弱的。霍罗克斯将军第三十军的坦克纵队，由于使用的是一条狭窄的公路，也就不能全速驶过64英里到达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外的地方，除非布里尔顿的士兵夺取了那些桥梁并让进军路线保持畅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空降部队解围。由于被隔绝在敌军营地背后很远的地方，补给又依赖于空运，因而可以预料，随着每一天的过去，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增加，被围困的伞兵充其量只能在他们的“空降场”[注]里坚持几天的时间。如果英军装甲部队的大举猛攻被耽搁，或者前进得不够快，那么空降部队就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垮，被消灭。

还有别的事情可能出错。如果泰勒将军的“尖叫的老鹰”[注]，没有能够夺取在英军第二集团军坦克先头部队前面的那些桥梁，那么加文将军和厄克特的部队能否夺取他们各自在奈梅亨和阿纳姆的目标，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的部队将陷于孤立。

某些典型的空降风险将不得不被接受：那些师可能被滑翔机空投在错误的地区，或者着陆在错误的地区；进攻开始的时候，渡口就可能被敌人摧毁；恶劣的天气使得飞机不可能再次运送补给品；而且，即使所有的桥梁都被夺取了，那个走廊也可能在任何地点被切断。这些，只不过是所有难以预料的事情当中的几个而已。计划者们是在速度、大胆、精确性和突然性上打赌———这一切全都源自一个地面和空降行动同时进行的精确计划，而这个计划又相应地把赌注押在德军的瓦解和兵力不足上。市场花园行动的每一个环节，都与下一个环节丝丝相扣，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就可能给全局带来灾难。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种风险不得不被接受，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再次出现。除此之外，根据来自蒙哥马利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有关敌人兵力的最新情报，空降部队司令部感到，空降部队将会遇到“编制各异的组织紊乱的敌人”。据估计，“在地面部队赶来解空降部队之围以前，能够集中起来的敌军机动兵力不会大于一个加强旅（大约3000人），而且坦克和火炮数量甚

少”。据预料，“飞行和着陆将会隐患四伏，完好无损地夺取桥梁目标与其说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毋宁说是一件突然和混乱的事情”。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计划者们不曾考虑进去的。情报总结最后的话似乎多余———“如果空降行动获得成功，地面部队的进军将会非常迅速。”

弥漫在布朗宁将军英军第一空降军司令部里的那种乐观主义，令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深为不安。这位25岁的情报处长感到，他几乎是参谋部里唯一的一个人，在对市场花园行动持有某种怀疑。几乎每天都从蒙哥马利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部传来对敌人力量的乐观估计，这些乐观估计厄克特并不认同（这位厄克特与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伯特·厄克特少将，毫无亲戚关系）。9月12日，星期二上午，距离D日只有5天的时间了，这时他对市场花园行动的怀疑已经几近惊恐。

他的感觉是由来自邓普西将军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个谨慎信息激发起来的。邓普西的情报参谋们引用了荷兰人的一个报告，警告说，在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德军增强了兵力，并谈到，出现了“受到重创的装甲部队的编队，相信他们是要在荷兰重整旗鼓”。诚然，这个情报是含糊的。邓普西部队的报告由于缺乏任何种类的确认，因而不论是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还是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最新的情报总结都没有将其包括进去。厄克特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他就在军司令部里，一直收到来自荷兰联络官员们类似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就像邓普西的参谋们一样，他也相信这些消息。把他本人的情报加在从邓普西的司令部收到的情报上，厄克特少校认为：有理由确信，起码两个德军装甲师的部队正在阿纳姆地区的某个地方。但证据是贫乏的！那些部队的身份并没有得到确认，兵力如何也不得而知，而且他也无法说出，他们究竟是在重整旗鼓，还是仅仅通过阿纳姆。然而，正如厄克特后来所回忆的，他“确实是非常担忧”。

自从彗星行动开始及至市场花园行动的演变以来，厄克特少校的恐惧就一直在增长。他一再表达对这个行动的反对，“对参谋部里任何一个愿意听的人表达他的反对”。他“非常坦率地承认被市场花园行动吓坏了，因为这个行动的弱点就在于那种臆断，即德国人不会进行有效的抵抗”。厄克特本人确信，德国人正在迅速恢复元气，在荷兰境内拥有的士兵和装备可能比任何人所意识到的都多。在他看来，整个计划的实质，就是“依赖于这个难以令人置信的概念，即一旦各个桥梁被攻占，第三十军的坦克就能在这个狭窄得可恶的走廊里猛冲———实际上这个走廊只不过是一条穿越低洼湿地的堤道，坦克无法转动———然后就能像一个新娘进入教堂一样走进德国。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德国人会滚过来投降”。

在计划会议上，“每一个人都不顾一切地意欲启动空降行动”，对此，厄克特少校越来越感到吃惊。当前的形势被与德国人在1918年的崩溃不断地进行比较。厄克特记得，布朗宁将军也许是反映了蒙哥马利的观点，同时又

反映了“其他几位英国司令员的观点，他考虑要进行另外一次伟大的突破”。这位忧心忡忡的情报官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战争到冬天就会结束，“对阿纳姆的进攻可能是空降部队能够投入战斗的最后机会”。在提到市场花园行动的时候，大家甚至用了一个轻松的比喻———“它被描述为一个‘社交聚会’”———厄克特却只剩下惊恐。布朗宁将军的声明尤其令他不安，将军说，空降进攻的目标是，“空降部队铺下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中通过的地毯”。他认为：“这个独一无二的陈词滥调能产生这样的心理效果，使许多指挥官昏昏欲睡，进入一种被动的、绝对没有想象力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中，对德国人的抵抗，除了不屈不挠的勇敢之外，任何别的反应都设想不出来。”他认为，司令部里的气氛非常不现实，因而在一次计划会议上，他问：“那个‘地毯’到底是由活着的空降部队构成，还是由死去的空降部队构成？”

他后来说：“要让他们面对形势的实际情况是绝对不可能的，那种要在战役结束之前参加战役的个人渴望，让他们完全盲目了。”但年轻的厄克特确信，邓普西将军的警告是精确的。他认为，在阿纳姆附近有德军的装甲部队，但他需要获得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这个报告。厄克特了解，一个装备着可以从空中倾斜拍照的特殊相机的战斗机中队，驻扎在附近牛津郡的本森，这个中队此时正沿着荷兰海岸搜寻导弹发射场。

9月12日下午，厄克特少校要求皇家空军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侦察搜索。敌人的坦克为了避免被发现，会躲藏在森林里或者是伪装网的下面，大有可能逃脱高空飞行摄影。厄克特的要求被允准了：将在阿纳姆地区上空进行低空飞行，而且将尽可能快地得到结果。如果有坦克在那里的话，那么所拍摄的照片就能向所有相关人员证明，厄克特少校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现在，空降师的师长们根本没有时间直接核实情报机构的报告，他们依赖于军司令部或者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以获得最新的评估。每一位师长都能从经验中明白，等到他收到这个信息时，可能已经是几天以前的事情了。尽管如此，普遍的看法还是：没有什么理由预料敌人会进行强大的抵抗。结果，市场花园行动所涉及的风险，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了。

布里尔顿将军和布朗宁将军把计划概述出来，确定了攻击目标并在空运能力上做出了决定，每一个师长就立即制订出他们自己的作战计划。对空投场和着陆场的选择享有优先权，富有经验的空降部队指挥官们从以前的行动得出结论，获得胜利的最好机会取决于攻击部队能够在离他们攻击目标最近的地方空投。更为理想的是，就在他们的目标上着陆，或者迅速行军就可到达目标，如果要夺取桥梁的话，就更需如此。由于可用的地面运输工具不足，因而为这些地点准确定位就极其重要了。

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非常清楚，必须为了获得最好的效果而选择空投地点。在D日，虽然泰勒将会拥有大多数的“尖叫的老鹰”，也就是他的伞兵，但他的工兵部队、火炮和第一○一空降师的大多数运输工具，却只能在D日的一两天以后到达。泰勒研究了第一○一空降师将要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之间坚守的走廊的东南端，迅速注意到，在公路的那15英里地段上，他的部队必须攻占两个主要的运河渡口，还有至少9座公路桥梁和铁路桥梁：在费赫尔，阿尔河和威廉斯运河上面有4座桥梁，其中的一座是主要的渡口；向南5英里的地方，在圣奥登罗德，下多梅尔河上的一座桥梁必须夺取；距离那里4英里，是第二个主要的运河渡口，它在索恩村附近的威廉明娜运河上；而西边，在没有教堂的小村庄贝斯特的附近有一座桥梁；再朝南5英里，在艾因霍温，上多梅尔河上的4座桥梁也得攻占。

泰勒研究了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之间平坦的地形，以及该地呈纹理状的水路、堤岸、沟渠以及两旁植有树木的马路，决定把主要着陆场定在几乎就是他攻击地区的中央，就在一个树林的边缘，那个树林离索恩不到1英里半，大致是在艾因霍温和费赫尔的中间。他将让他的两个团，第五○二团和第五○六团在这个地带着陆。第五○二团受命进攻圣奥登罗德和贝斯特的目标，第五○六团受命进攻索恩和艾因霍温的目标。第三个团，也就是第五○一团，将在费赫尔北边和西边的两个地区着陆，它们离那4座极其重要的桥梁只有几百码。对他的士兵来说，在没有后备部队支援的情况下，那是一个要在D日完成的令人生畏的任务，但泰勒认为：“要是走运的话，我们能够取得成功。”

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任务要更加错综复杂。它10英里长的防区，比第一○一空降师的防区要宽。在走廊的这个中央地段，位于格拉夫的马斯河上那座1500英尺长的巨大九孔桥，以及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4个小一些的铁路和公路渡口中的至少一个，必须予以夺取。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几乎就在这个有9万居民的城市中央，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出击目标。除非那个俯瞰着奈梅亨西南两英里地区的格鲁斯贝克高地被坚守住，否则，到那时这些地方没有一个可以说“被夺取了”。而在东边，是沿着德国边界的巨大森林带———国家森林———德国人可能在那里聚集，准备发动进攻。当加文将军向军官们说明对他们的期望的时候，他的参谋长罗伯特·H·威内克上校提出了异议。“要做到所有这一切，我们需要两个师。”加文的话却很简短。“就这样，我们要用一个师来做。”

加文记得第八十二空降师在西西里和意大利所进行的进攻，当时他的部队是分散的，分散到离空投场有35英里远。（该师通常开的玩笑是：“我们总是使用瞎子飞行员。”）因而决心，这一次就让他的士兵在他们的目标上着陆。按照优先的顺序，他决定出击目标是：首先，格鲁斯贝克高地；其次，格拉夫的大桥；第三，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那些渡口；第四，

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因为敌人大概会迅速做出反应，”加文后来回忆道，“所以我决定把我的伞兵的最大部分，空投在格鲁斯贝克高地和国家森林之间。”在格鲁斯贝克附近他选择了两个着陆区域，第一个距离山脊约1英里半，在奈梅亨东南3到4英里处，他的第五○八团和第五○五团，再加上司令部的参谋们，将在那里着陆。第三个团，也就是第五○四团，将空投在格鲁斯贝克高地的西边，位马斯河和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之间的那个三角地带，它距离格拉夫大桥的东端约1英里，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的大桥西边2英里处。那座极其重要的格拉夫大桥德军可能已经准备毁掉，为了确保攻占这座大桥，他又制订计划做出了一个补充，即第五○四团的一个连将被空投到距离大桥西端半英里的地方。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击以前，第五○四团将从两端向大桥猛冲。

显然，那座伟大的奈梅亨大桥，是他所有出击目标中最重要的目标，也是整个市场花园行动的关键。但是加文也同时意识到，要是不能坚守住其他的出击目标，瓦尔河的这个渡口单凭自身是没有用处的。布朗宁将军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最初的几座桥梁没有被攻占，如果敌人坚守着格鲁斯贝克高地，那么供花园行动的部队通行的那个走廊将永远不会打开。因而布朗宁特别指示，在夺取那些最初的目标之前，加文不得尝试对奈梅亨大桥发起进攻。

虽然加文对他的部队过于分散感到担忧，但却对整个计划感到满意。只有一个方面令他伤脑筋，那个方面也曾让泰勒伤过脑筋：支援部队在D日的一两天后到达之前，他的整个师将不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他又不知道，他的士兵将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对市场花园行动尚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在经验丰富的第八十二空降师里，士气还是一如既往地高涨：他的许多士兵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三次作战跳伞。“会跳的吉姆”加文，年仅37岁，是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准将，他毫不怀疑，“不拘常规的人”将能完成任务———他的士兵自称“不拘常规的人”。(注)

最为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分配给了一位谦虚而又沉默寡言的职业军官，罗伯特·罗伊·厄克特少将，他是英军第一空降师以及附属波兰旅的42岁指挥官。

厄克特与布朗宁将军以及他的美国同事们不同，他是一位非常职业的军人，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作战并战绩卓著。但他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他将第一次指挥一个空降师作战。布朗宁之所以选择了他，是因为他“打起仗来兴奋”。但厄克特却对此任命感到惊讶，他一直认为，空降部队是“结构紧密的组织、封闭的家伙、完全是排他的”。然而他又对自己率领这支精锐部队的能力抱有信心。一旦这支部队到了地面上，基本的作战规则仍然是一样的，而且他把他的空降师看作“非常训练有素的步兵部

队”。

尽管有长期的作战经验，厄克特却在为一件事情苦恼：他从来没有跳过伞，也没有乘坐过滑翔机。“我甚至会晕机。”他后来谈到。9个月以前，即1944年的1月份，厄克特接过了指挥权，当时他向布朗宁将军建议，作为新的师长，自己也许应该接受一些跳伞训练。布朗宁给厄克特的印象是，一个“动作灵活优美的、衣着非常洁净整齐的人，显出一副焦躁不安的鹰派人物的样子”。布朗宁给厄克特的回答是，他的任务就是让他的师做好准备，以便进攻欧洲大陆。布朗宁看了看这位身高6英尺、体重200磅的苏格兰男人，又说道：“把跳伞留给年轻人去做吧。你不仅个头太大，而且也上了年纪。”注

在那几个月漫长的训练过程中，厄克特“经常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一种军事上的旱鸭子”。他意识到，自己“被密切注视着，那种注视虽非怀有敌意，却明显是一些空降军官对他持有保留，而且还有几个军官并不掩饰他们的保留。我是在接受审判，我的行动正被受到审理。那是一个尴尬的职位，但又是一个我所接受的职位”。慢慢地，厄克特对该师的自信而又从容的管理，把他的军官们争取了过来。而在伞兵当中，厄克特之得人心远比他自己所知道的要多。第一空降师第一伞兵旅的列兵詹姆斯·W·西姆斯，他记得“将军的高度自信以及他的平静”。师司令部的中士约翰·雷特，他的印象是，“凡是必须做的工作，厄克特将军都做了。他并不只是让某个别人去做。将军不拘礼节”。通信兵肯尼思·约翰·皮尔斯称他为“一个使人愉快的大个子。他叫我们‘儿子’，要是知道我们的名字的话，就直呼其名”。而从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中士罗伊·欧内斯特·哈奇那里，厄克特赢得了最高的赞美。哈奇断言说：“他是一位该死的将军，不在乎做一位中士的工作。”注

令厄克特感到失意的是，他的师并没有被选中参加诺曼底登陆，“那个夏天乏味地过去了，为一个又一个的行动做了计划，结果只看到计划又都被取消了”。现在，他的“红毛鬼子”注正“渴望作战”。他们几乎放弃了。“我们称自己是‘夭折之师’”，第四伞兵旅的乔治·S·鲍威尔少校回忆说，“我们以为，我们是被留着用于胜利大游行了。”按照厄克特的看法：“有一种倦怠与愤世嫉俗的危险混合，正缓慢地爬进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被训练得很好，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参战，就会失去那种状态。我们准备好了，并且愿意接受任何事情，包括所有的‘如果’。”

厄克特的主要目标———市场花园行动的奖品———就是阿纳姆下莱茵河上的那座钢筋水泥公路桥。除此之外，厄克特的士兵还有两个次要的目标：一是附近的一座漂动的浮桥，一是上游的一个复线铁路渡口，那个渡口距离城镇2英里半。

分配给厄克特的任务呈现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有两个问题尤其令人担心。关于这个地区的密集防空防御工事的报告表明，有一些敌军部队就在阿纳姆大桥附近聚集；而要把他的英国和波兰伞兵全都空运到目标，将需要3天时间，对此厄克特也感到不安。这两个问题，都对厄克特选择着陆地点有直接影响。与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一空降师不同，他不能在几乎就是主要目标的地方挑选区域，甚至也不能在靠近主要目标的地方挑选区域。理想的办法是让部队在河的两边，在阿纳姆大桥的附近着陆，但那里地形却又很不理想。渡口的北出口，直接进入了人口稠密、建筑物密集的阿纳姆市中心。按照报告的说法，在南出口附近，低的圩田(注)不论是对士兵还是对滑翔机来说，都过于湿滑松软。“我自己的许多指挥官，”厄克特记得，“非常愿意在南边着陆，即使那里湿滑松软。也确实有一些指挥官准备冒受伤的风险在北边跳伞———就在城镇上跳伞。”

此前一个星期，参加其他任务的轰炸机机组人员报告说，在阿纳姆渡口附近以及北边7英里处的迪伦机场，防空炮火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有些皇家空军指挥官，因为他们手下的飞行员被安排拖航滑翔机运载厄克特的部队，于是强烈反对把着陆区域定在靠近阿纳姆大桥的地方。如果着陆在大桥南出口附近，那么拖航飞机在放下滑翔机之后转向北方的时候，就会遭遇到机场上空的猛烈高射炮火；而转向南方几乎同样糟糕，因为飞机要冒着与第八十二空降师相撞的风险，第八十二空降师那时正在11英里以外的奈梅亨空投。厄克特面对着两难境地：他或者可以坚持要皇家空军把他的部队送到临近大桥的地方，或者可以在阿纳姆镇以外更远的地方选择空投区域，但这个选择又带来种种别的危险———时间延误、攻击突然性的丧失，以及德国人可能做出的抵抗。风险实际上将大大增加，因为在D日，厄克特将只拥有他的师的一部分。“我的问题在于，在第一次空运的时候，要有足够的人着陆，”厄克特回忆道，“不仅要能夺取城镇里的主要桥梁，而且还要能为随后的空运守卫空投区域和着陆区域。为了在第一天夺取主要桥梁，我的兵力减少到了只有一个伞兵旅。”

面对着这些限制，厄克特向布朗宁呼吁，一定要有更多的飞机。他对军长说，在他看来，“美国人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布朗宁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向厄克特保证，飞机的分配“完全是根据轻重缓急，而不是由于美国人的高压”。他解释说，整个行动必须从南方到北方进行计划，“从下到上”进行计划；在走廊的南部和中央地段的出击目标必须“首先夺取，以便让地面部队通过。否则的话，第一空降师将会被消灭”。

布朗宁将军把一个俱乐部大楼用作自己的司令部，俱乐部附近就是穆尔公园的高尔夫球场，厄克特的指挥车队就在这个高尔夫球场上。在指挥车里，厄克特仔细看着地图，对形势细细地进行着思考。阿纳姆北边的一个国家公园里有一些开阔地带，但这些地带太小了，而且地形也不合适。它

们充其量可能容纳一支小的伞兵部队，但却不能容纳滑翔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另外的广阔区域着陆，这些开阔的荒野和牧场四周是松树林，海拔250英尺，位于阿纳姆的西边和西北边。这些荒野坚硬而又平坦，对滑翔机和伞兵来说几乎称得上完美。它们在每一个方面都很理想———除了一个方面以外，这个地区距离阿纳姆大桥6到8英里。皇家空军不断反对在大桥的附近空投，面对这种反对，厄克特不得已决定在这些远的地点空投。“别无他法，”他回忆说，“只有接受这些风险，并为这些风险做出计划。我无可选择。”注

9月12日，厄克特已经把他的计划准备完毕。地图上勾勒出的是5个着陆和空降区域，那些区域在沃尔夫黑策附近，大约位于阿纳姆西北4英里，分布在从阿纳姆到阿姆斯特丹一条铁路的两边。三个地点在沃尔夫黑策的北边，两个在南边，而南边的那两个区域，又构成了一个约有一平方公里的不规则的盒子状地带。这些地点距离阿纳姆大桥最少都6英里远，最远的那个地点，在沃尔夫黑策的西北，有8英里。

在D日，有两个旅将投入进去———一是菲利普·皮普·希克斯准将的第一机降旅，确定由它坚守空投场；一是杰拉尔德·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它将冲向阿纳姆以及阿纳姆的公路、铁路和浮桥。带路的将是一支由吉普车和摩托车组成的摩托化侦察部队。厄克特期望，C·F·H·弗雷迪·高夫少校那支分成4个炮兵装甲连的、拥有275名士兵的高度专业化部队———英国军队中唯一一个此种性质的部队———能赶到公路桥并坚守住，直到该旅的大部队到达。

第二天，也就是D日后的第一天，约翰·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第四伞兵旅将要到达，预定要到达的还有机降旅的余部；在第三天，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将着陆。厄克特为波兰人标出了一个第六空投场———按照预期，D日后的第二天，大桥将被攻占，高射炮炮台将被摧毁，所以波兰人要在下莱茵河的南岸埃尔顿村附近空投，该地位于阿纳姆渡口南边大约1英里处。

尽管必须接受这些风险，但厄克特感到自信。他相信自己有了“一个合理的军事行动和一个好的计划”。他认为，伤亡可能“大约百分之三十上下”；考虑到进攻的错综复杂的性质，他认为这个代价并不是太昂贵。9月12日傍晚，他向他的指挥官们简要介绍了这次行动，厄克特记得，“每一个人似乎都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

然而，有一位指挥官却深感疑虑。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波兰第一伞兵旅的这位身材修长、52岁的领导人确信，“我们是要参加一场惨烈的斗争”。这位波兰军事学院的前教授在第一次听说彗星行动的时候，就向

厄克特将军和布朗宁将军阐明了他的立场。当时他要求厄克特用书面给他下达命令，这样“我就不会为这场灾难负责”。他同厄克特一起访问了布朗宁，并说“这个任务大有可能不会成功”。布朗宁问为什么。索萨博斯基记得：“我告诉他，用我们所拥有的兵力尝试，就会是自杀，而布朗宁回答说：‘不过，我亲爱的索萨博斯基，‘红毛鬼子’和英勇的波兰人能做到一切！’”

现在，一个星期以后，当他听厄克特讲话的时候，索萨博斯基想：“英国人不仅严重低估了德国人在阿纳姆的力量，而且似乎还对阿纳姆对于德国人的祖国所具有的意义一无所知。”索萨博斯基认为，对德国人来说，阿纳姆代表着“通往德国的门户，我预料德国人是不会让它敞开的”。他并不认为“那个地区的部队水准很低，只有几辆被打烂的坦克呆坐在那里”。当厄克特告诉聚集起来的旅长们，第一空降师的空投地点“距离出击目标起码6英里”的时候，他大惊失色。要抵达大桥，部队的主力将要“行军5个小时，何以能够达到突然性？德国人再傻，也会立即知道我们的计划”。

计划中还有一个方面，索萨博斯基也不喜欢。他所辖旅的重装备和弹药，要在前一次空运中由滑翔机运进去。这样，当他的部队在南岸着陆的时候，他的补给品将会在北岸着陆区域。等到波兰人着陆的时候，如果大桥没有被攻占，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厄克特详细地解释计划的时候，索萨博斯基吃惊地得知，如果到那个时候大桥仍然在德国人手中的话，将期望他的波兰部队去攻占大桥。

尽管索萨博斯基感到焦虑，但在9月12日的情况简介会上，他却一直一言不发。“我记得，厄克特要大家提问题，但谁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他回忆道，“每一个人都若无其事地坐着，跷着二郎腿，显得很厌烦。我想就有关这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说点什么，可我不能够说出来。实际情况是，我不得人心，说的话有谁会听？”

后来，在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里，当整个空降行动由所有的指挥官来审查的时候，别人对计划的英军部分深感疑虑，但他们也同样是一言不发。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詹姆斯·M·加文准将，当他知道厄克特选择的着陆地点的时候大吃一惊，对他的作战指挥部部长约翰·诺顿中校说：“天啊，他可不能当真。”诺顿也同样深感震惊。“他是当真的，”他神色严肃地说道，“但我可不愿意尝试。”在加文看来，“不论是在大桥上面空投，还是在靠近大桥的地方空投，即便一开始就蒙受百分之十的伤亡，都比冒着在远处的空投场着陆的风险”，要好上许多。他“感到吃惊的是，布朗宁将军并没有对厄克特的计划提出质疑”。尽管作如此之想，他还是一言不发，“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人具有广泛的作战经验，当然完全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2



要是能够避免的话，党卫军冲锋队队长（少校）泽普·克拉夫特可不想再移动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人员不足的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训练后备营，一直奉命来回穿越荷兰。现在，到达这里仅仅5天之后，这支部队又奉命离开奥斯特贝克村———而下达命令的又不是克拉夫特的上级，而是德国国防军的一位少校。

克拉夫特强烈反对。他的三个连的主要部分驻扎在村子里，其余人在阿纳姆，还有1000名党卫军新兵预计马上就到，来进行培训。那位德国国防军少校并不让步。“这我不管，”他不客气地告诉克拉夫特，“你得搬出去。”克拉夫特反击了。这位野心勃勃的37岁军官只接受他的党卫军上级的命令。“我拒绝！”他说道。那位德国国防军军官并没有被吓倒。“让我把事情给你说清楚，”他说道，“你得搬出奥斯特贝克，因为莫德尔的司令部要搬进来。”

克拉夫特迅速平静下来，他不想同陆军元帅莫德尔发生冲突。尽管如此，这个命令还是让他耿耿于怀。克拉夫特搬出去了，但走得不是非常远，他决定让他的部队在奥斯特贝克西北处的树林和农场里露营，离沃尔夫黑策村不远。他选定的那个地点，恰巧在沃尔夫黑策公路的边上，位于英格兰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让英军第一空降师着陆的那些区域之间，而且堵住了英军进入阿纳姆的路线。

3



阿纳姆的地下情报机构负责人亨利·克纳普感到，自己担任的这个新角色是安全的。他不让妻子和两个女儿参与他的活动是为了保护她们，在4个月前他就离开了家，搬到了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他的总部在莱奥·C·布里巴尔特医生的办公室里，布里巴尔特医生是一位非专科普通医师。穿着白大褂的克纳普现在是医生的“助手”，而某些“病人”则是属于他的情报网的通信员和信使———40个男人和女人，还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

克纳普的工作，是一个耗费时间而又令人沮丧的工作。他得评估收到的情报，然后用电话把情报传递出去。阿纳姆抵抗力量负责人皮特·克鲁伊夫给了克纳普三个电话号码，每个号码都是12到15位数字，他得记在脑子里。克纳普从来也不知道，他是给哪里或者给谁打电话。给他的指示是，要轮

流拨打每一个号码，一直到接通为止。

搜集情报的方法甚至更为复杂。克纳普的要求通过网络被传达下去，而他从来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特工获得了情报。如果一个情报似乎靠不住，克纳普就对自己的情报进行审查。这时他收到了几个有关敌人在奥斯特贝克活动的报告，这既令他好奇又大惑不解。

一位戴着参谋徽章的德国军官霍斯特·斯莫克尔少校，访问了在伦库姆、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的若干个商店，并且命令把种种补给品送到奥斯特贝克的塔弗尔贝格旅馆。克纳普感到好奇的是所要的东西，其中有一些是难得的食品，还有荷兰人现在难得再看到的别的特色食品，例如杰尼弗牌杜松子酒。

除此之外，德国的通信兵也一直在忙着铺设一大批杂乱无章的电话电缆，那是给郊外的几家旅馆铺设的，包括塔弗尔贝格旅馆。克纳普认为，结论是明显的：一个德军高级司令部正在搬进奥斯特贝克。但又是哪一个司令部呢？那位将军是谁？他到了没有？

对克纳普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阿纳姆地区及其周围的敌军兵力的最新情况。他知道，每一个城镇都有别的情报人员正在送回情报，而他"只是一个巨大的搜集系统中一个小的齿轮"。

他后来回忆，在两个星期之前，"阿纳姆地区几乎没有德国兵力"。而此后，军事局面有了惹人注目的改变。目前，德军兵力的增长已经使克纳普惊恐不安了。克纳普报告说，根据他的网络所提供的情报，在过去的7天里，"几个师的余部包括装甲部队，正在阿纳姆及其周边地区重新组织，或者是正在进入德国"。现在，更具体的消息到来了。他的情报人员报告说，在阿纳姆北边和东北出现了坦克。克纳普认为，"一个或者甚至两个装甲师的部分兵力"到了这个地区，但他们的身份和确切地点，到目前为止尚不得而知。

克纳普需要迅速知道详情。他急迫地向他的网络下达命令，他要求提供有关装甲部队活动更为精确的情报，他需要立即知道，在塔弗尔贝格旅馆的"新房客"的身份。

25岁的沃特·范·德克拉茨从未听说过亨利·克纳普。他在地下组织中的联络人是一个叫"扬森"的人，那人住在阿纳姆的某个地方。扬森分配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塔弗尔贝格旅馆。范·德克拉茨被告知，一个高级德国军官到达了，他要搞清楚在旅馆外面的参谋车是否"带有显示身份的三角旗或者司令旗"，如果有的话，他要报告旗帜上的标志色和符号。

范·德克拉茨注意到，在旅馆的周围，德国人的活动激增，德国宪兵队和哨兵已经进入那个地区。他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从彼得山路上的哨兵当中通过，彼得山路途经塔弗尔贝格旅馆。他决定蒙骗过去。

当他匆匆走向旅馆的时候，立即被一个哨兵叫住了。“可是我必须过去，”范·德克拉茨告诉那个德国人，“我在街那边的加油站里上班。”那个德国人让他过去了，另外三个哨兵只是草草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在走过塔弗尔贝格旅馆的时候，范·德克拉茨迅速看了看门口和旅馆的车道。泊在那里的汽车都没有显示身份的标识，不过在旅馆前门旁边，却有一个棋盘式样图案的黑、红、白三色金属三角旗———这是德军集团军群司令的军阶标志。

9月14日，星期四下午，亨利·克纳普得到了他的网络消息。有几个提供消息的人报告说，装甲部队、坦克和装甲车的巨大编队，在阿纳姆北边的一个半圆形地区里扎营；在贝克贝亨、埃普斯以及艾瑟尔河两岸有部队；甚至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报告，说是有“20到30辆虎式坦克”。准确地说，究竟有多少个部队被涉及，他无法确定。他能够清楚确定身份的只有一支部队，而这也是出于偶然。他的一位特工注意到，在几辆坦克的上面，有“奇怪的记号———是颠倒的字母F，而在字母的脚上又有一个球”。克纳普查看了一本特殊的德国手册，从而得以把那支部队的身份辨认出来。他立即给他的电话联络人打电话，报告说，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注]出现了。根据这位特工的报告，克纳普确定了它的位置，大致是在北边，位于阿纳姆和阿珀尔多伦之间，又从那里向东到聚特芬。

此后不久，他得到了有关塔弗尔贝格旅馆的消息，他也把这个报告传递出去了。那个意味深长的黑、红、白三色棋盘图案三角旗，本身就不言而喻。在西线的这个部分，只有一位德军集团军群司令官。尽管克纳普是把这个消息当作传闻报告上去的，但在他看来这位军官一定是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

4



奥斯特贝克以东25英里，在杜廷赫姆郊外的一个小城堡，就是威廉·比特里希将军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司令部，在这里，比特里希与他所剩下的两个师的师长举行了一个会议。比特里希情绪很坏，几乎无法控制他的脾气。他遭到了重创的装甲军团的前景，现在比一个星期以前要糟糕得多。比特里希焦急地等待着在士兵、装甲车和装备上的补充，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到达。相反，他的兵力甚至被削弱。他接到了命令，要他派两支作战部

队到前线去。一支要与德军第七集团军一起，试图阻挡亚琛附近的美国人；而在英军坦克部队成功地攻破阿尔贝特运河防线，渡过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并且在靠近荷兰边界处的内佩尔特夺取桥头阵地之后，要他派遣另外一支去增援库尔特·施图登特将军的第一伞兵集团军。现在，英军正在集结，以便再次发动攻势———B集团军群的情报处长称那是一个“在即的”进攻———这个时候，比特里希通过陆军元帅莫德尔，收到了“在柏林的那些傻瓜们下达的一个发疯的指示”。他遭到了重创的师当中的又一个，要被调拨出去，撤退到德国境内。

比特里希曾经是位狂热的纳粹，他现在则刻薄地谴责这个命令。“对于柏林的命令，以及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一门心思耍花招的阿谀奉承之徒，”他感到“既作呕又厌倦”。比特里希有勇气，有能力，他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穿着军装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国空军担任中尉，并两次负伤。后来，有几年的时间，他在一家证券经纪人事务所里工作。然后，比特里希再次入伍，成为德国的一个秘密航空队的成员，在8年的时间里教苏联人飞机驾驶技术。希特勒上台后，比特里希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德国空军，在30年代中期，他又转而加入了武装党卫军，在武装党卫军里提拔要快一些。注

在诺曼底，比特里希对希特勒领导才能的信念开始动摇。他站在陆军元帅隆美尔一边，反对希特勒“战斗到最后一人”的疯狂哲学。有一次他向隆美尔吐露：“我们受到上面如此糟糕的领导，使得我再也不能执行没有道理的命令了。我从来也不是机器人，也不打算当机器人。”在7月20日的密谋发生之后，他以前的司令官埃里克·赫普讷大将被当作密谋者处以绞刑，比特里希得知此事以后，对他的参谋们大发雷霆，说“这是德国军队最黑暗的一天”。比特里希对希特勒军事领导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很快就传到了柏林。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说：“我的话被汇报给了帝国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于是比特里希这个名字在希特勒的司令部里就不再被提到了。”只是由于西边的德国前线几乎崩溃，一种需求比特里希军事专长的形势，同时也由于富有同情心的指挥官们的态度，才使得他免于被召回。即使如此，希姆莱也仍然“急于要让他返回德国谈谈”。对希姆莱的邀请，比特里希丝毫不抱幻想。莫德尔也丝毫不抱幻想，他决心要把比特里希留在西线，于是断然拒绝满足希姆莱要把比特里希送回的一再要求。

现在，怒不可遏的比特里希向他的师长们概述了柏林的最新计划，他手下的师长是第十党卫军弗伦茨贝格装甲师注的师长海因茨·哈梅尔准将，第九党卫军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中校。对于这个计划，哈策尔已经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那里略知一二。比特里希告诉哈策尔，他的第九师要立即上火车去德国，在德国，他的师要部署在科布伦茨东北方向的齐根附近。而哈梅尔的第十师要待在荷兰。第十师将在当

前的位置，阿纳姆的东边和东南，被重新装备，充实实力，准备再次投入战斗。

38岁的哈梅尔虚张声势的热情，为他从他的手下那里赢得了“弗伦茨贝格师头儿”（deralteFrundsberg）这个亲昵的绰号。他对比特里希这个决定感到不快。在他看来，“比特里希是一如既往偏爱霍亨施陶芬师，这也许是因为，在他当上军团司令以前，那个师就是他的，也许也是因为哈策尔原先是他的参谋长”。尽管他并不认为“比特里希有意不公平，但结果似乎是霍亨施陶芬师总是获得轻松的工作”。

比他年轻的那位与他职位相当的人物，32岁的瓦尔特·哈策尔，则对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尽管他认为“能够到柏林休假的可能性似乎是值得怀疑的”。理想的情况是，他期望在重新装备之后，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霍亨施陶芬师”。硬汉哈策尔的脸上有一块马刀留下的伤疤，他私下里满怀希望，希望现在能够实现他的野心：晋升到与一位党卫军师长地位相称的军衔———准将。虽然如此，在比特里希概述整个计划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部分哈策尔不喜欢。

尽管他的师损耗很大，但仍然比哈梅尔的师强大。霍亨施陶芬师通常有9000人，现在不到6000人，弗伦茨贝格师大约有3500人。哈策尔有接近20辆马克V型豹式坦克，但却不是全都可以使用。然而，他却拥有数量可观的装甲车辆———自行火炮、装甲汽车以及40辆装甲运兵车，它们全都配备以重机枪，有些还配备以火炮。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几乎没有坦克，而且极其缺乏各种各样的装甲车辆。这两个师都仍然拥有令人畏惧的火炮、迫击炮以及防空部队。比特里希说道，弗伦茨贝格师将留在后面，为了加强弗伦茨贝格师，哈策尔要尽可能地把他的运输工具和装备转给哈梅尔。哈策尔对此持怀疑态度。“在内心深处，”哈策尔后来回忆说，“我完全明白，倘若我把我屈指可数的坦克或者运兵车交托给哈梅尔的话，它们将永远不会被归还。”哈策尔并没有对这个决定提出异议，但他无意放弃他所有的车辆。

哈策尔老早以前就学会了怎样节约使用资源，他所拥有的车辆实际上比比特里希所了解到的要多———这包括从法国的漫长撤退过程中所缴获的美国吉普车。他决计通过“玩弄一些文字游戏”，来无视这个命令。他把履带、轮子或者火炮从他的车辆上卸下来，从而能够在他到达德国之前，使它们暂时无法可用，与此同时，那些车辆又可以在他的装甲力量统计报表上，被列为丧失了作战能力。

比特里希继续说，即使有了从哈策尔师所调拨的额外人员和车辆，弗伦茨贝格师仍然兵力不足。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向柏林强调形势的紧迫：把事实直接提交给党卫军的作战司令部。也许到那个时候，补充兵员和增援部队

才会前来。但比特里希无意访问柏林，哈梅尔被任命为特使，这让他吃了一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了我，而不是哈策尔，”哈梅尔记得，“不过我们急切需要士兵和装甲部队，也许比特里希认为，一位将军可能说话分量更重一些。整个事情要对陆军元帅莫德尔保密。因而，由于我们预料在阿纳姆地区不会有任何麻烦，所以决定我将在9月16日傍晚前往柏林。”

比特里希命令哈策尔和哈梅尔之间装备上的交换，以及被调拨了人员和装备的霍亨施陶芬师向德国的转移，要立即开始。他又补充说，陆军元帅莫德尔要求，在这个行动进行的时候，要组织起小股的机动进攻部队（Alarmeinheiten），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即可投入使用。哈策尔私下里断定，这样一来，他“最好的部队将最终会被送上火车”。比特里希期望，整个装备转移和调动将在9月22日完成。哈策尔想，每天有6趟火车前往德国，这个任务的完成能够大大提前。他认为，他最后的也是最优秀的部队，恰好可以在3天后动身前往祖国———具体时间大约是9月17日的下午。

一个可能使士气低落的谣言正在四处传播。9月14日，在荷兰的几个德国高级军官说，一次空降部队的攻击将要发生。

这个话题源自希特勒的作战部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之间的一次交谈。约德尔担心的是，盟军可能从海上入侵荷兰。约德尔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沿用他通常的战术的话，有可能使用空降部队当作海上进攻的前奏。冯·伦德施泰特尽管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相比之下，他则确信，伞兵的空投将与对鲁尔河的进攻协同进行），但仍然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B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莫德尔。莫德尔本人虽与伦德施泰特的看法一样，但还是不能对约德尔的警告置若罔闻。他给在荷兰的德国武装部队司令、那位神经过敏的空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森下达命令，要他把陆军、海军、空军，以及荷兰武装党卫军的人员混杂的匮乏兵力，全派遣到海岸上去。

自从约德尔9月11日打电话以来，惊恐就在司令部的各个阶层传了下来，尤其是通过德国空军的渠道传了下来。尽管入侵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对盟军空降部队空投的恐惧却仍然在增长。每一个人都在猜测可能空投的地点。从地图上看，德国空军的一些指挥官认为，北海岸和阿纳姆之间那些大的开阔地区，是可能的着陆区域。还有一些指挥官，他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英军再次发起攻势，从位于内佩尔特的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进入荷兰，他们不知道，伞兵是否会与那个进攻协同作战，被空投到奈梅亨地区。

9月13日，第三航空队司令、德国空军大将奥托·德斯洛赫，听说柏林对设在科布伦茨的冯·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感到担心。德斯洛赫非常忧虑，于是

在第二天给陆军元帅莫德尔打了电话。他回忆说，莫德尔认为柏林对入侵的惊恐是“一派胡言”。陆军元帅根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最后他邀请我去他在奥斯特贝克的塔弗尔贝格旅馆新司令部里吃饭”。德斯洛赫谢绝了，“我不想做俘虏”，他告诉莫德尔。就在挂上电话以前，德斯洛赫又说：“我要是你的话，就会离开那个地区。”德斯洛赫记得，莫德尔大笑起来。

在阿纳姆北边的迪伦机场，空降部队可能进攻的消息传到了德国空军战斗机司令员瓦尔特·格拉布曼少将那里，他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会谈。当格拉布曼表达出德国空军的恐惧的时候，克雷布斯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谈这种事情吧。不管怎么说，他们将会在哪里着陆？”格拉布曼走到一张地图前，指着阿纳姆西边的地区，说道：“在这里的任何地方。这块荒地对伞兵来说是完美的。”格拉布曼后来回忆说，克雷布斯“大笑了起来，提醒我说，我若是继续这样说的话，就会使自己显得可笑”。

荷兰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长、党卫军中将汉斯·阿尔宾·劳特，也听到了这个谣传，可能是从他的上级克里斯蒂安森上将那里听到的。劳特确信，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包括空降进攻。劳特是荷兰纳粹恐怖的总设计师，他预料荷兰的地下组织随时都会发起进攻，人民随时都会起义。他决心镇压任何一种暴动，所采取的就是简单的应急手段，那就是每杀死一个纳粹，就处决三个荷兰国民。两星期前，在德国人撤退和荷兰纳粹逃窜到德国以后，劳特就立即宣布处于“紧急状态”，他手下的警察对即使是微乎其微介入了荷兰抵抗运动的人，都进行了无情的报复。男人和女人被逮捕、杀死或者是送进集中营。一般的公民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各省之间的一切旅行都被禁止，更具有限制性的规矩被强加上了。任何人，如果被发现在宵禁期间待在街上，就可能未经警告便被射杀。在荷兰南方各地，由于预料英军要发动攻势，荷兰人被逼迫做劳工，为德国国防军挖战壕。在奈梅亨，劳特威胁要把整个家庭扔进集中营里去，以此达到了他在劳动力上要求的配额。任何种类的聚会都被禁止了。“要是看到有五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劳特的一个布告警告说，“他们就将遭到德国国防军、党卫军或者警察部队的射击。”

现在，由于英军从南边的进攻在即，柏林又警告说在北方可能有一次空中和海上的进攻，因而劳特的世界开始解体了。他吓坏了。注 劳特得知莫德尔在荷兰，于是决定去寻求安慰，动身前往塔弗尔贝格旅馆。9月14日傍晚，劳特与莫德尔以及莫德尔的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会晤。劳特告诉他们，他“确信，盟军现在将在荷兰南部使用空降部队”。他感到，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莫德尔和克雷布斯对此并不同意。莫德尔说，精锐的空降编队太“珍贵了，他们的训练太昂贵了”，不能任意使用。陆军元帅莫德尔预

料，蒙哥马利将会从内佩尔特进攻荷兰，但形势并没有紧急到足以说明使用空降部队是合理的。还有，由于攻击部队在南边将被三条宽阔的河流隔开，因而他认为，英军向阿纳姆的进攻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奈梅亨还是阿纳姆，距离英军都太远了。除此之外，莫德尔继续说，蒙哥马利“从战术上讲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绝不会把空降部队用于鲁莽的冒险”。

9月15日，一位犯人来到了弗里德里希·基尔斯韦特尔少校的司令部。基尔斯韦特尔少校是德国国防军在荷兰的反情报处副处长，他的司令部位于奥斯特贝克西边的德里尔贝亨村。时至今日，这位犯人来到他的司令部的时候，基尔斯韦特尔少校对他已所知甚多。这位28岁头脑迟钝的克里斯蒂安·安东尼厄斯·林德曼斯，由于身材高大（6英尺3英寸，体重260磅），而以绰号“金刚”知名。关于他，有材料翔实的卷宗。林德曼斯是在荷兰与比利时边界附近被一支巡逻队逮捕的，那是英军营地和德军营地之间的一个无人区。起初，由于身穿英军的作战服，林德曼斯被当成一名盟军士兵，但在瓦尔肯斯瓦德附近的营指挥所里，令审问他的人惊讶的是他居然要求见赫尔曼·吉斯凯斯中校———他是在荷兰的德国间谍头子，又是基尔斯韦特尔的上级。在打了几个电话以后，林德曼斯的俘获者们甚至更加吃惊了，他们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即开车把这位犯人送到德里尔贝亨。林德曼斯本人却没有表现出惊讶。他的一些同胞以为，他是一位坚定的荷兰地下组织成员，但德国人却知道他的另外一种身份———间谍。“金刚”是一位双重间谍。

林德曼斯于1943年当了叛徒。当时他表示愿意替吉斯凯斯做事，以换取他当时的情妇和他的弟弟亨克的释放，他弟弟亨克被盖世太保当作地下组织的成员逮捕了，据说正等着被处决。吉斯凯斯欣然表示同意，从那以后，林德曼斯就很卖力地为德国人效劳。他的变节造成了许多地下基层组织被渗透，众多荷兰和比利时的爱国者被逮捕和处决。尽管林德曼斯为人粗鄙，爱吹牛，酗酒无度，陷在对女人的无法满足的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但到目前为止却神奇地没有暴露出来。然而，许多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认为，他是一个会带来威胁的危险人物，这与布鲁塞尔的某些盟军军官不同，“金刚”给那些盟军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果是，林德曼斯现在正为英军的一支情报部队工作，接受一位加拿大上尉的指挥。

在吉斯凯斯不在场的情况下，基尔斯韦特尔第一次与林德曼斯打交道。林德曼斯向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伟大的金刚”，但基尔斯韦特尔很快发现，这位身材高大的吹牛者令人厌恶。林德曼斯把他最新的任务告诉了基尔斯韦特尔：那位加拿大情报军官派他来，是要提醒在艾因霍温的地下组织领导人，不要再把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通过“逃跑路线”送到比利时，因为英军预定要从内佩尔特桥头阵地突破，朝艾因霍温进发，所以要把那些飞行员藏匿起来。林德曼斯曾用5天的时间走过营

地，所以能够向基尔斯韦特尔介绍英军集结的某些细节。他平淡地说，进攻将在9月17日发动。

英军行动在即，这算不上什么新闻。就像别的每个人一样，基尔斯韦特尔也预料进攻随时都会发生。林德曼斯还告诉基尔斯韦特尔事态的另外一个进展。他报告说，与英军的进攻同时，在艾因霍温的另外一边进行的伞兵空投也计划好了，以便帮助攻占这座城镇。对基尔斯韦特尔来说，这个消息根本就讲不通。既然英国陆军凭着自身的力量就能轻而易举到达艾因霍温，为什么还要使用伞兵呢？也许是因为林德曼斯的信息似乎不现实，或者更可能是因为基尔斯韦特尔对“金刚”反感，所以他告诉林德曼斯继续执行他的任务，然后返回英军营地。基尔斯韦特尔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对林德曼斯的情报没有怎么用心考虑，因而就没有直接传递给德国国防军司令部，相反，他是通过党卫军安全与情报局传递出去的。他还给吉斯凯斯口述了一份他与林德曼斯交谈的简要备忘录，当时吉斯凯斯因为另有任务而不在场。吉斯凯斯一直认为“金刚”是可靠的，但他直到9月17日的下午才收到这个备忘录。

5

★ ★ ★

从现在算起不到48个小时，市场花园行动就要开始了。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中将在办公室里，愈来愈惊恐地听着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局长、英军少将肯尼思·W·斯特朗披露的最新消息。斯特朗说，毫无疑问，在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有德国的装甲部队。

几天来，斯特朗和他的参谋们一直在审查和评估每一个情报，努力确定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的去向。自9月的第一个星期以来，盟军与这些部队就没有了接触。这两个师都受到了重创，不过据认为他们不可能完全被消灭。有一种看法是，他们可能已奉命返回了德国。现在荷兰地下组织的信息又讲述了一个不同的说法：那两个失踪了的师又被发现了。

斯特朗向史密斯汇报说，第九党卫军装甲师在荷兰，第十装甲师大概也在荷兰，“十有八九是要重新装备坦克”。斯特朗汇报说，这两个师究竟还剩下多少人，他们的作战能力究竟怎样，谁也无法说清。但有关他们的位置却不再有任何疑问了，他们肯定就在阿纳姆附近。

史密斯对市场花园行动深感担忧，而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对失败的可能性感到惊恐”，因而他立即与盟军最高司令进行商谈。史密斯告诉艾森豪威尔，定于阿纳姆着陆的英军第一空降师，“没有能力抵抗两个装

甲师”。固然有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这两个师的兵力问题，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史密斯认为，应该给市场花园行动增加兵力。他认为，阿纳姆地区需要两个空降师（大概史密斯考虑，要把经验丰富的英军第六空降师额外派出去，这个师的师长是理查德·盖尔少将，该师曾在诺曼底登陆过程中得到了成功的使用，但没有被包括在市场花园行动里）。史密斯告诉艾森豪威尔，否则的话，计划就必须修改。“我的感觉是，”他后来说道，“如果我们不能在那个地区空投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美军空降师当中的一个转移过来，那个师将在更北边形成那块‘地毯’，以增援英国人。”

艾森豪威尔考虑了这个问题以及它的风险。根据这个情报，几乎就在进攻前夕，有人正敦促艾森豪威尔推翻蒙蒂的计划———那个艾森豪威尔本人批准的计划。这意味着，要挑战蒙哥马利的指挥才能并且搅乱已经微妙的指挥形势。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另外一个选择向他敞开着：市场花园行动可以被取消，但做出这个决定的唯一理由，却是一个孤零零的情报。艾森豪威尔想当然地认为，蒙哥马利是在他面前的敌人兵力最好的裁判员，他会相应地做出计划。艾森豪威尔对史密斯解释说，“我不能告诉蒙蒂，怎样去处理他的部队，”也不能“取消这个行动，因为我已经向蒙蒂开了绿灯”。如果要做出改变的话，那也应该由蒙哥马利做出。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准备让史密斯“飞往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就此事与蒙哥马利进行讨论”。

比德尔·史密斯立即前往布鲁塞尔。他发现蒙哥马利既自信又热衷。史密斯解释了他对阿纳姆地区装甲部队的惧怕，并强烈提议，计划可能需要修改。蒙哥马利“嘲笑这个主意。蒙蒂感到，最大的抵抗将会是来自地形上的困难，而不是德国人。他一再说，如果我们这些身在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人愿意帮助他克服后勤上的困难的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他并不担心德国人的装甲部队。他认为，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按照预定的计划顺利进行。”这次商谈无果而终。“起码我是试图阻止他，”史密斯说道，“但却一点也不顶用。蒙哥马利纯粹是轻率地对我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注]

就在蒙哥马利与史密斯商谈的时候，自英吉利海峡彼岸，令人震惊的证据来到了英军第一空降军司令部。那天早些时候，皇家空军有特别装备的空中照相侦察中队的战斗机，在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飞行侦察之后，从海牙返回了。现在，办公室里情报军官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拿起放大镜，检查5张斜角[注]照片———那是飞机拍摄的条幅式侦察照片中的“最后几张”。在过去的72个小时里，人们为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且被评估了，但只有这5张照片把厄克特长期惧怕的事情显示了出来———德国装甲部队清楚明显地出现了。“这就是最终压断骆驼腰的那根稻草[注]

，”厄克特后来回忆道，“在那里，在照片上，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坦克———如果说不是正好就在阿纳姆着陆和空投区域的话，也是非常靠近着陆和空投区域。”

厄克特少校带着照相证据匆匆来到布朗宁将军的办公室。布朗宁立即接见了他。厄克特把照片放在布朗宁面前的桌子上，说道：“看看这些吧。”将军一张一张地研究了照片。尽管厄克特不再记得原话，但如果他没有完全记错，布朗宁说的是：“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用这些来烦自己。”然后，关于照片上的坦克，他继续说，“不管怎么说，它们大概不会顶用。”厄克特目瞪口呆。他无助地指出，那些装甲车，“不管是否顶用，都仍然是坦克，而且它们还有火炮”。回过头来看此事，厄克特感到：“也许是由于对情报一无所知，所以布朗宁将军不打算接受我对照片的评价。我的感觉还是那样———每个人都非常急切地要行动，结果不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

厄克特并没有意识到，布朗宁参谋班子的一些成员认为，这位年轻的情报军官是过于热心了。演出就要开始，大多数军官急于快一点，渴望快一点，厄克特悲观主义的警告令他们恼火。正如一位高级参谋军官所说：“他的看法带有神经紧张而又疲惫不堪的色彩。他有点歇斯底里，毫无疑问是过劳引起的。”

在与布朗宁会面后不久，军部的医官访问了厄克特。“我被告知，”厄克特回忆说，“我极其疲惫———可谁又不是极其疲惫呢？我还被告知，我也许应该休息，休假。我下台了。我成了司令部里的一块痛，结果就在进攻前夕，我被从现场调走了。我被告知，要我回家。我无话可说。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计划而且最为担心，但它仍然要成为一场大演出，而奇怪的是，我又不想被落在后面。”

6



9月16日，星期六，中午时分，德国人的公告张贴在阿纳姆各地的布告牌上。

根据反间谍警察的命令，特宣布如下：

夜晚期间，在沙尔普斯德里夫特的铁路高架桥上，发生了一起炸药袭击。

号召全体居民予以合作，追查这次袭击的肇事者。

如果在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中午12点以前，还没有找到他们，若干

名人质将被枪毙。

我呼吁你们所有的人都能予以合作，好让那些没有必要的牺牲者被饶过一命。

代理镇长利拉

在一个地下室里，阿纳姆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会面了，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对铁路高架桥的破坏，做得非常拙劣。阿纳姆情报组长亨利·克纳普从一开始就对这个任务感到不愉快，他感到“当要搞破坏的时候，我们全都十分业余”。在他看来，“集中精力为盟军提供情报，而把拆毁东西的工作留给那些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的人去做，要好得多”。阿纳姆地下组织的负责人、38岁的皮特·克鲁伊夫，问别人有什么看法。尼古拉斯·查凌·德博德提议，成员们应该自首。克纳普记得，他当时想：“这是为了在桥上炸出的一个小洞而要付出的一个过于昂贵的代价———人质们、无辜的人们的生命。”盖伊斯伯特·扬·纽曼感到内疚，他与哈里·蒙特弗罗伊、阿尔贝特·多伊斯、图恩·范·达伦等人，参与了获得制造炸药的材料，制订了破坏行动的计划。谁也不想让无辜的人们遭受苦难，然而又应该怎么办呢？克鲁伊夫听每一个人说完，然后做出了他的决定。“组织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即使无辜的人们可能被枪毙。”他下令。尼古拉斯·德博德记得，克鲁伊夫看了看聚集起来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谁也不得向德国人自首。这是我的命令。”亨利·克纳普感到担心。他知道，如果德国人沿用他们通常做法的话，那么10到12个市民领袖———其中有医生、律师和教师———就将在星期日，在阿纳姆的一个广场里被公开处决。

7



在盟军的整个指挥系统中，对有关阿纳姆地区出现德军装甲部队情报的评估搞得一团糟。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情报总结第26号是于9月16日发出的，那是市场花园行动就要开始的前夕，该总结包含了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惊恐的那个不祥的警告，但是，这个总结遭到了忽视。总结的一个地方写道：“据报告，第九党卫军装甲师，大概还有第十装甲师，正在朝荷兰的阿纳姆地区撤退；在那里，他们大概能从一个军需库获得新的坦克，据报告那个军需库是在克利夫斯地区。”

这个信息，蒙哥马利在与史密斯会晤的时候就已经拒绝相信，现在，又在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里受到了轻视———而就是这个司令部最初注意到，9月10日“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编队”出现在荷兰。9月14日，邓普西的情报参谋班子出了最严重的纰漏，他们把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的德国人描述为“软弱，士气低落，若是面对一场大规模的空降进攻，

就可能整个崩溃”。现在，他们从最初的立场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排除了装甲部队的出现，而这又是因为，邓普西的参谋们不能在任何一张侦察照片上发现敌人的装甲车。

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布里尔顿将军的首席情报官、英军的安东尼·塔斯克中校，也不打算接受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报告。他仔细审度了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并且断定，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德军在阿纳姆“已知存在的相当规模的高射炮防御工事之外，又有多大的增加”。

看来，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蒙哥马利司令部的乐观看法。英军第一空降军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是我们情报的主要来源，他们给我们的情报，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厄克特将军，则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允许有任何事情破坏在海峡两岸大行其道的乐观主义。”

然而，除了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有关“失踪的”装甲车的报告之外，还有别的证据说明德国人在增强兵力，但这也只是被草草看上一眼。在前线，在霍罗克斯将军第三十军的花园行动部队的前面，情况一目了然，正有愈来愈多的德国部队进入防线。10天以前在安特卫普犯下的战略错误，现在开始加剧，并威胁到市场花园行动的宏伟设计。正在充实施图登特将军前线的德国部队，恰恰就是从斯海尔德河河口逃脱出来的那些师的散兵游勇———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遭到重创的士兵，而盟军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集团军一笔勾销了。情报军官们注意到，尽管德军在数量上增加了，但防线上的新部队，却“被认为不能够抵抗任何坚定的进军”。而战斗在比利时与荷兰边界的任何一位英国兵却都能够说明，情况并非如此。[注]

在离前线不到10英里的地方，比利时北方的利奥波尔德斯堡这个肮脏的矿业城镇里，那些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被吉普车和巡逻车阻塞了。所有马路似乎都通向火车站对面的一家电影院———这个平淡无奇的影剧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观众。霍罗克斯中将第三十军的军官们———第三十军是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他们将穿过荷兰向北大举猛攻，与伞兵会师———他们聚集在街道上，在入口处转来转去，与此同时戴着饰以红圈帽子的宪兵在检查他们的证件。这是一群富有特色、生气勃勃的人，这令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注]步兵师第二一四旅的旅长休伯特·埃塞姆准将油然想到，这就像“和平时期，军队在一场定点越野赛马中集结起来，或者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一次游行示威”[注]。他被指挥官们色彩斑斓的服装迷住了，他们头上戴的东西形形色色，惹人注目。谁都没有戴钢盔，而是戴着贝雷帽。颜色众多的贝雷帽上带有各个著名的团的骄傲的徽章，其中有爱尔兰近卫团、近卫步兵第一团、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注]苏格兰近卫团、威尔士近卫

团，以及皇家骑兵卫队、皇家后勤部队和皇家炮兵部队。每一个人的服装都是既漫不经心又着意华丽。埃塞姆注意到，大多数指挥官都穿着“狙击手的伪装服、伞兵的夹克衫或者吉普车驾驶员的外套，里面穿着色彩明亮的宽松长裤、灯心绒裤子、粗呢马裤甚至普通马裤”。许多人没有戴普通领带，而是炫耀地戴着领巾式领带，或者“色彩各异的长围巾”。注

爱尔兰近卫团装甲部队的指挥官、名声在外的J·O·E·（“乔”）范德勒中校，体格结实，脸色红润，身高6英尺，他是爱尔兰近卫团军官们那种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高雅姿态的典型。41岁的范德勒穿着通常的作战服：黑色的贝雷帽，伞兵的多色伪装夹克衫，灯心绒裤子和高筒橡皮靴。除此之外，范德勒还一如既往，在屁股上用皮带吊着一把口径为45毫米的科尔特自动手枪，而塞进他的夹克衫里的是一条色彩艳丽的翠绿色长围巾，对他的坦克手们来说，这翠绿色长围巾已经成了一个象征。远在英格兰的那位穿戴过分讲究的将军“男孩”·布朗宁要是看见了，一定会皱眉头。甚至霍罗克斯也曾经冷冰冰地告诫范德勒：“要是德国人抓住你，乔，”他说道，“他们会以为是抓住了一个农民。”但在这个9月16日，甚至霍罗克斯也没有了英军参谋军官那种通常的、在穿着上无懈可击的高雅姿态，他并没有穿衬衫，而是穿了一件带有罗纹的马球汗衫，在作战服的外面是一件无袖的皮短外套，令人想起一个英国自耕农的服装。

当讨人喜欢的霍罗克斯沿着拥挤的影剧院通道走来的时候，四周的人都朝他打招呼。他所召集的这个会议，让大家非常激动。人们急于再次继续战斗。从塞纳河到安特卫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往往平均一天前进50英里，但自从9月4日“重新装备、加油和休息”的那次灾难性的三天暂停以来，进展就艰难了。随着英军前进势头的消失，敌人就迅速恢复了元气。在自那以后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星期里，英国人的进军降低为爬行。由乔·范德勒的爱尔兰近卫团的装甲部队在前面带路，近卫团装甲师用了4天的时间，才推进了10英里，攻占了在内佩尔特附近的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上的那座极其重要的桥梁，而第二天，他们就要从那里发起进入荷兰的进攻。对于德国人的抵抗，霍罗克斯并不抱有幻想，不过他确信，他的部队能够突破敌人的坚硬外壳。

上午11点整，霍罗克斯迈步走上舞台。聚集在那里的人都知道，英军的攻势就要再次发动了，但蒙哥马利的计划有着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因而在场的军官当中只有几个人知道细节。离市场花园行动的D日不到24个小时了，陆军元帅手下的指挥官们此时首次得知这场进攻。

挂在电影院银幕上的是一幅巨大的荷兰地图。彩色的带子沿着一条单一的马路向北方蜿蜒蛇行，越过一个个大河的障碍，穿过瓦尔肯斯瓦德、艾因霍温、费赫尔、乌登、奈梅亨等城镇，再从那里前往阿纳姆，这是一段大

约64英里的路程。从那里，彩色的带子继续蛇行，又有大约30英里，到达须得海。霍罗克斯拿起一根长长的指示棒，开始作简要指示。“这是一个你们将要告诉你们的孙子的故事，”他告诉听众，然后停顿了一下又说，“而且他们将会烦得要命。”这让聚集起来的军官们乐不可支。

在听众当中，柯蒂斯·D·伦弗罗中校是来自美军第一○一空降师的联络官，也是在场为数不多的美国人当中的一位，军长的热情和自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柯蒂斯记载，军长讲了一个小时，“只是偶尔看了看笔记”。

霍罗克斯一步一步地解释了市场花园行动的复杂之处。空降部队将先行一步，其出击目标是：攻占在第三十军前面的各座桥梁。霍罗克斯将下达进攻开始的命令。根据天气，地面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刻预定是下午2点。在那个时刻，350门火炮将齐射，形成一个持续35分钟的巨大火炮火力网。然后，在下午2点35分，由一拨一拨发射火箭的台风型坦克引路，第三十军的坦克将从他们的桥头阵地冲出来，“沿着主要的马路疾驶”。近卫团装甲师将荣幸地在进攻中担任先导。在他们的后面，将是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和第五十诺森伯兰师[注]，然后是第八装甲旅和荷兰的艾琳公主旅。

霍罗克斯强调，将“不得停顿，不得停止”。近卫团装甲师要“拼命地不断前进”，一直前往阿纳姆。霍罗克斯相信，从桥头阵地发起的突破，将“几乎是立即的”。他预计，近卫团装甲师的第一批坦克将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到达艾因霍温。如果敌人足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在空降部队夺取之前就把所有的桥梁炸掉，那么随后赶来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步兵师的工兵，就将带着人员和筑桥设备冲向前去。霍罗克斯解释说，这个巨大的工兵行动，倘若需要的话，可能会牵涉到已经在利奥波尔德斯堡地区的9000名工兵和大约2277辆车辆。第三十军的整个装甲纵队，将两辆并排，每英里35辆，塞满主要的马路。车辆交通将是单向的，霍罗克斯预计，“在60个小时里，将有2万辆各种车辆通过公路前往阿纳姆”。

46岁的阿伦·阿代尔将军是著名的近卫团装甲师的师长，他听着霍罗克斯的讲话，心中想，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不过他认为也有“可能棘手”。他预料，最糟糕的时刻，将会是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桥头阵地突破的时候。尽管他充分预料到德国人会进行抵抗，不过一旦突破成功，前进就“不会困难”。除此之外，他对那支将率先进攻的部队———乔·范德勒中校的爱尔兰近卫团———有完全的信赖。

乔·范德勒记得，当得知他的坦克部队将在突破中担当先头部队的时候，心中想：“啊，天哪！不要再是我们了。”范德勒感到骄傲的是，他经验丰富的部队被选中了，然而他也知道他的士兵疲倦，他的部队人员不足。自从诺曼底登陆以来，不论是在人员上还是在坦克上，他都没有得到什么补

充；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留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计划”。不过他接着又想到，穿过德军营地直接猛击，实际上又会需要多少时间来进行计划呢？在他的旁边是他的堂弟，36岁的贾尔斯·范德勒中校，他是乔手下第二营的营长。“对于那个在单辆坦克形成的前线上飞驰穿过德军的抵抗的计划”，贾尔斯“惊恐万状”，在他看来，这不是正确的装甲战。他回忆说，他是“把我所拥有的不管什么疑虑都吞下了：我屈从于一种奇怪而又强烈的激动，就好像在赛马起跑线上的支杆处一样”。

影剧院里有三个人，对他们来说，这个宣布产生了深深的个人感情。荷兰的艾琳公主旅的高级军官们曾经率领他们的部下，从诺曼底一路作战打过来。一开始，他们和加拿大人并肩作战；然后，在布鲁塞尔陷落以后，他们被调入英军第二集团军。现在，他们要回家了。尽管他们期盼着荷兰的解放，但旅长阿尔贝特·史蒂夫·德瑞特尔·范·史蒂文宁克上校，他的副手夏尔·帕于德·德·莫尔唐热中校，以及参谋长约克希尔·扬·贝拉尔茨·范·布洛克兰少校，却对荷兰解放的实现方式怀有严重的疑虑。史蒂文宁克上校认为，这整个计划是有风险的。莫尔唐热的印象是，有关眼前的事情，与实际情况所允许的相比，英国人显然准备不足。按照他的说法：“事情搞得似乎非常初级。首先，我们将攻占这座桥，然后攻占那座桥，跃过这条河……前面的地形，由于有河流、沼泽、堤坝和低地，因而将极其困难———这一点，从我们提交的许多材料中英国人应当已经非常清楚。”33岁的参谋长布洛克兰，不能不想到以往的军事史。“我们似乎违背了拿破仑的格言，即除非你有起码百分之七十五的成功把握，否则永远也不要作战。然后，那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五就可以听天由命了。英国人把它颠倒了，是让百分之七十五听天由命。我们要赶到阿纳姆，只有48小时的时间，哪怕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出了差错———一座桥被炸掉了，或者德国人的抵抗比预期强硬一些———我们就会赶不上日程。”布洛克兰还有一个个人的担忧：他的父母住在奥斯特贝克村，距离阿纳姆大桥只有2英里半。

在军衔低于旅参谋长的军官当中，只有为数甚少的人听到了这个简要指示，其中的一位就是爱尔兰近卫团21岁的中尉约翰·戈尔曼。他受到整个事情的激励，认为霍罗克斯“最为春风得意”。戈尔曼后来回忆，这位军长“运用了他的一切机智和幽默，在更具有戏剧性或者更具有技术性的要点当中，点缀着小小的幽默的离题的话。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的人”。戈尔曼尤其满意于花园行动，因为“要由近卫团警卫军率先开始，他们的角色将会是极其具有戏剧性的”。

会议结束指挥官们朝外走去，要向他们的部队作简要指示的时候，年轻的戈尔曼第一次感到，他“对成功的机会私下里有了怀疑”。他记得，他在一张地图的面前逗留，心中想，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可行的军事行动———也仅仅只不过是可行”。实在是有“太多的桥梁”了！他对地形本身也

没有热情，他认为，那是不怎么适合于坦克行进的区域，而且“坦克单行前进，会使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但由于已经许诺，发射火箭的台风型坦克将给予支援，这又使人放下心来。还有一个也算明确的许诺，也使人放下心来。戈尔曼记得，几个月以前的一天，他因为作战勇敢而接受了蒙哥马利亲自颁发的军人十字勋章。[注]在那个授勋仪式上，蒙蒂说道：“倘若打赌的话，我就会说，战争到圣诞节的时候就会结束，这应该是一个不赔不赚的赌注。”戈尔曼回忆说，霍罗克斯“告诉我们，这次进攻能够结束战争”。“在前往北方的过程中”，戈尔曼能够发现的唯一的其他可能，“似乎就是将要在埃斯考运河或者其附近，度过一个沉闷的漫长冬天”。他相信，蒙蒂的计划“拥有数量恰好的闯劲和胆量。如果能有机会在圣诞的时候赢得战争，那么我就支持继续前进”。

平坦、灰色的比利时乡下，由于有煤田和炉渣堆，就使人联想到威尔士的许多地方。现在，在比利时的乡下，那些要为邓普西英军第二集团军开路的人，听说了这个计划，也听说了有关阿纳姆的许诺。在侧路的边上，在露营地区以及营地里，士兵们围在他们的军官四周，了解自己将在市场花园行动中所要发挥的作用。29岁的爱德华·G·泰勒少校记得，当贾尔斯·范德勒中校告诉他的军官们，爱尔兰近卫团将打头阵的时候，从聚集起来的军官当中传出了“几乎是呻吟的声音”。“我们认为，”他回忆说，“在攻占了埃斯考运河上的那座桥以后，我们应该休息一下，那座桥我们用乔·范德勒的名字命名，叫‘乔氏桥’。但我们的指挥官却告诉我们，我们被选中是一种巨大的荣幸。”尽管泰勒希望能够撤销这个决定，但也是同样这样认为。“我们习惯于单辆坦克的前进，”他记得，“而在单辆坦克的前进的情况下，我们依靠的就是速度和支援。似乎谁对此也不担心。”

但刚刚21岁的巴里·奎南中尉，却是“极其惴惴不安”。他要在米克·奥科克上尉的指挥下，第一次与打头阵的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中队一起投入战斗。奎南的步兵将按照苏联人的风格，在坦克的后面行进。在他看来：“前面的河流的数量似乎是不祥的。我们并不是水陆两栖部队。”然而奎南感到骄傲的是，他的士兵将“在整个英军第二集团军中打头阵”。

也是21岁的鲁珀特·马哈菲中尉生动地记得，他被告知，“如果这个行动成功的话，那么家里的妻子儿女就会免于德国人的V－2型导弹的威胁”。马哈菲的母亲住在伦敦，那时候伦敦正遭受猛烈的轰炸。尽管他对进攻的前景感到激动，却也认为，那条一直通往阿纳姆的孤零零的马路，是“一条可怕的漫长道路”。

23岁的罗兰·S·兰顿上尉被弹片击伤以后，在野战医院待了5天，现在刚刚回来，他得知，他不再是爱尔兰近卫团第二营的副官了，相反他被指派担任米克·奥科克上尉突击中队的副指挥。对于这个指派他兴高采烈。在兰顿

看来，这个突击似乎是一件马到成功的事情。花园行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成功。“对所有的人来说，显然德国人是瓦解了，吓坏了，缺乏凝聚力，只能够进行零星的战斗”。

并非每一个人都这么自信。皇家工兵部队的A·C·C·托尼·琼斯中尉，21岁，当他听着这个计划的时候，心中想，这“显然将会非常困难”。那些桥梁是整个行动的关键，正如一位军官所说，“第三十军的大举猛攻，就像用一根棉线穿7根针，只要一根针没有穿过去，我们就会有麻烦。”对于24岁的爱尔兰近卫团老兵蒂姆·史密斯来说，这次进攻“只是另外一场战役”而已。在这一天，他最关心的是纽马基特举行的著名的圣莱杰赛马注。他得到了有关赛马的特别情报，说是一匹名叫德黑兰的马，将由著名的职业赛马骑师戈登·利查兹驾驭，这匹马“一定会赢”，他与营司令部的一位一等兵一起，把身上的每一个便士都押在了德黑兰的身上。如果市场花园行动要成为赢得这场战争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今天德黑兰就应该赢得圣莱杰赛。令他惊奇的是，德黑兰果然赢了。他现在完全确信，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成功。

有一个人“肯定感到不舒服”。28岁的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是皇家空军的一位战斗侦察机飞行员，他在近卫团装甲师的军官们当中感到自己完全不在适当的位置上。他是空军联络队的一员，当突破开始的时候，空军联络队将从地面把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召来。他的轻型装甲车（代号为“酒杯”），车顶是帆布的，车里有迷宫似的通信设备，将紧随乔·范德勒中校的指挥车冲在前面。洛夫感到没有保护，不能自卫———皇家空军的这个联络队所拥有的唯一武器，是左轮手枪。范德勒说“滚动的掩护炮火将以每分钟200码的速度向前推进”，这位壮实的爱尔兰人把洛夫的小小的侦察车，描述为一个“装甲的信号站，能够与天上的飞行员直接通信”。当洛夫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忧虑增加了：“我得到的清晰印象就是，我将是负责把头上台风型战斗机的‘出租车站’召来的唯一的一人。”这个想法让他放心不下。洛夫对无线电装置所知甚少，而且以前也从未担任过地对空的战术军官。然后，令他如释重负的是，他又得知，有一位专家———空军少校马克斯·萨瑟兰，将在第二天时与他一起，为一开始的突击处理通信问题。洛夫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应该首先就自告奋勇。他之所以接受这个工作，只不过是“因为我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不错的节奏变化”。

有一种改变让爱尔兰近卫团的团长伤透脑筋。在夺取埃斯考运河上的桥头阵地的过程中，乔·范德勒失去了“一位亲密而又受人尊敬的朋友”———他的广播车，车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喇叭样的扩音器，那辆车被德国人的一枚炮弹摧毁了。在英格兰进行培训的全部时间里，以及在诺曼底大进军的过程中，乔都是使用这辆车向他的部队广播，而在每次活动之后，由于他是位古典音乐爱好者，他也总是放上一两张唱片———所选的并非总是令近

卫团士兵感到愉快的乐曲。那辆车被炸成了碎片，那些古典音乐唱片的碎片与范德勒最喜欢的流行乐曲的碎片一起，洒落在乡下各地。这个损失让乔悲伤，但他的爱尔兰近卫团士兵却并不感到悲伤。他们认为，前往阿纳姆的大举猛攻将会足够艰巨，因而不必再听乔的扩音器刺耳地播放出的他当前的主题歌曲《赞美主并送来弹药》了。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伞兵和滑翔机空降步兵部队，已经来到集结地区，为起飞的时刻做好了准备。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军官们使用地图、照片和比例模型，向他们的部下一次次下达简要的指示。准备工作是巨大而又一丝不苟的。在24个空军基地（8个英军基地，16个美军基地）里，运送兵员的飞机、牵引飞机和滑翔机的巨大机群，被核对过了，加上油，装上火炮、吉普车等装备。伦敦以北大约90英里，詹姆斯·M·加文准将的“全是美国人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在林肯郡格兰瑟姆镇四周的一群机场里，与外部世界隔绝了。罗伊·厄克特将军的“红毛鬼子”、英军第一空降师，以及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中的一些人，也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南边，在纽伯里镇，大致是在伦敦以西80英里的地方，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的第一○一空降师的“尖叫的老鹰”，也被“密封起来”了。在同一个地区而且一直延伸到多塞特郡的，是厄克特师的余部。他的部队大多数要直到17日的上午才会转移到机场里去，不过在没有教堂的小镇、村庄以及靠近出发地点的露营地里，他们也做好了准备。现在每一处，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空降部队都在耐心等待起飞，等待那个从空中进攻荷兰的历史时刻。

与任务本身相比，有些人对被密封起来更感到忧虑。拉姆斯伯里村附近一个机场里的安全预防措施，使得第一○一师第五○二团的下士汉斯福德·维斯特焦躁不安。飞机和滑翔机“停在乡下各地几英里的地方，到处都有警卫”。他注意到，机场围着铁丝网，“外面是英国的警卫，里面是我们自己的警卫”。维斯特“感觉，我们的自由失去了”。第五○八团的列兵詹姆斯·阿勒代斯，在拥挤的帐篷城里，试图对铁丝网和警卫视而不见。他一再检查他的装备，“到最后装备几乎都破损了”。阿勒代斯无法摆脱那种感觉，即“我们就像被判了死刑的人，等着被带出去”。

另外一些人的忧虑，主要是有关他们执行任务的机会。以前的许多作战行动都被取消了，结果第五○六团的一名新兵、19岁的列兵梅尔文·艾斯尼克夫（他从美国到达的那一天是6月6日，正是第一○一空降师跳伞进入诺曼底的那一天），在到达集结区的时候，他仍然不相信会出发。艾斯尼克夫想：“为了这个任务接受了长期而艰苦的训练，我不想被挡在后面。”然而他差点儿就被挡在后面了。他试图点燃一个用来烧热水的临时代用燃油炉，于是把一根划着的火柴扔进了一个油桶里，看见没有什么动静，艾斯尼克夫便“把头伸在油桶的上面，朝里面看，而油桶却爆炸了”。刹那间他

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立即想到：“现在我做了这事。他们不会让我去的。”幸运的是没过几分钟，他的脸上不再燃烧了，他的眼睛又能看见了。不过他相信，在跳伞进入荷兰的第一○一师的人员当中，他是唯一没有眉毛的人。

第五○二师24岁的上士丹尼尔·扎帕尔斯基“坚持完成了跳伞训练；希望降落伞折叠得正确，希望田野柔软，希望我没有在树上着陆”，他急于出发。尽管他在诺曼底受伤的腿还没有痊愈，但扎帕尔斯基仍然相信，他的伤“并不是严重得足以让我不能尽到正常的责任”。他的营长，那位讨人喜欢的罗伯特·G·科尔中校，却并不这样认为，他拒绝了扎帕尔斯基的恳求。扎帕尔斯基并没有被阻止住，他绕过了科尔，从团部的外科医师那里获得了一份书面声明，证明他可以参加战斗。尽管扎帕尔斯基与科尔曾经在诺曼底并肩作战，但现在上士却“让科尔臭骂了一顿，这是他的作风。他说我是一个傻瓜波兰佬，不切实际，累赘而且不讲道理”。不过他还是让扎帕尔斯基参战了。

雷蒙德·S·霍尔上尉是第五○二团的牧师，他有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的问题。他“非常急于返回参战，与我的士兵们在一起”。但他也在诺曼底负了伤，现在医生们不让他跳伞。他最终被告知，可以乘坐滑翔机。牧师吓坏了，他是一位跳伞老手，认为滑翔机很不安全。

对死亡的恐惧，或者对不能有良好表现的恐惧，让另外的人不安。勒格兰德·约翰逊上尉是一位22岁的连长，他宿命般地“听天由命”，因为他想起了，在诺曼底登陆以前第一○一师进行的一次夜间空降进攻的过程，“非常恐怖，九死一生”。他确信，他将不会完成任务后返回。尽管如此，这位年轻的军官还是“打算尽可能折腾一下”。约翰逊确信他不喜欢白天空投的主意，那可能造成更多的伤亡。而另一方面，这一次“我们将能够看见敌人”。为了掩盖他的焦虑不安，约翰逊与他的伞兵伙伴们打赌，赌的是谁将能喝到第一杯荷兰啤酒。约翰逊的一位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担心得“几乎麻木”了，他“不知道怎样把这次白天跳伞与诺曼底进行比较，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还没超过48个小时，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就忘掉了他的麻木，英勇地拯救那位宿命的约翰逊上尉的生命。

22岁的技术军士马歇尔·科帕斯，他的担心也许比大多数人更有理由。他是一名“伞降信号员”，进攻开始时“伞降信号员”们将首先跳伞，为第一○一师标出空投场。科帕斯回忆说，在诺曼底空投的时候，“在伞兵主体开始跳伞之前，我们有45分钟的时间，而现在我们只有12分钟的时间”。科帕斯和他的朋友———29岁的军士约翰·鲁道夫·布兰特，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倘若在地面作战的是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而不是英国人的话”，他们两个人都会感觉好一些。“我们以前从来也没有和英国兵一起作战过。”

在格兰瑟姆地区，列兵约翰·加齐亚大为震惊，加齐亚是一位曾经在第八十二空降师参加过三次跳伞作战的老兵。在他看来，市场花园行动“纯粹是发疯”。他心里想：“艾克已经和德国人站在一边了。”

既然市场花园行动实际上已经在运作了，第八十二空降师第五○八团的营长路易斯·门德斯中校，也就毫不犹豫地在一个特别话题上畅所欲言了。门德斯中校还清晰而痛苦地记得他所在的团在诺曼底的夜间经历，所以对那些将在第二天运送他的营投入战斗的飞行员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先生们，”门德斯冷冰冰地说，“我的军官们已经把这张荷兰地图和空投场牢记在心，我们为出发做好了准备。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当我带着我的营去听简要指示的时候，我拥有将永远被人们记住的做好战斗准备的最优秀的一个营的兵力。等到我在诺曼底把他们集合起来的时候，一半的人已经失去了。我命令你们：要么把我们扔进荷兰，要么把我们扔进地狱，但一定要把我们整个地一起扔进一个地方。”

24岁的一等兵约翰·艾伦，是一位曾经三次跳伞的老兵，在诺曼底负的伤尚在痊愈中，他豁达地对待这次行动。“在夜间跳伞的时候他们从来也没有击中我，”他庄重地告诉他的伙伴们，“而现在他们将能看见我，一枪就把我射下来。”参谋军士拉塞尔·奥尼尔，以前有过三次夜间跳伞作战的经历，他确信，他的“爱尔兰好运就要用完了”。当他听说第八十二空降师定于白天跳伞的时候，他写了一封永远也没有发出的信———“今天晚上你可以在你的窗户上挂上一颗金星注了，妈妈。德国人有甚至在我们着陆之前就打击我们的良好机会。”第五○四团的列兵菲利普·H·纳德勒，为了使气氛轻松起来，散布了几个谣言———尽管在散布谣言的时候，他可能把气氛搞得更糟糕了。他最喜爱的那个谣言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德国营地，里面是党卫军在露营，那个营地就在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个空投场里。

给他的排下达的简要指示并没有使纳德勒感动。第五○四团的一个出击目标，就是位于格拉夫的那座桥。下达简要指示的那位中尉把士兵聚集在他的周围，掀开沙盘模型上的盖子，说道：“士兵们，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地。”他把指示棒落在那座带有“格拉夫”字样的桥上面。纳德勒第一个做出了评论。“是的，我们知道那地方，中尉，”他说道，“不过我们是要在哪个国家伞降？”注

第五○四师第二营的爱德华·韦勒姆斯少校也认为这座桥的名字相当不祥，尽管那些给他的大队作简要指示的军官突然把发音变了，把它念作“格里韦桥”。

这些简要指示造成了复杂的反应。19岁的下士杰克·邦默认为：“六个或者八个星期以后我们就会回家了，然后他们就会把我们派到太平洋。”21岁

的列兵利奥·哈特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出发。他听说———也许是由于列兵纳德勒散布的谣言所带来的后果———在总的跳伞地区有4000名党卫军。

38岁的埃德温·比德尔少校记得，有一位列兵，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在当地村庄举行的一次兑奖售物活动中赢得的一只活野兔的安全。这位列兵感到惧怕的是，他的宠物因为太驯服了，所以不论他走到哪儿都跟着他，但它可能在跳伞之后不会活下来了，即使是活下来，也可能最终进入炖汤的锅。

在位于格兰瑟姆地区的斯潘霍机场附近，英军第一空降师第四伞兵旅的帕特·格洛弗中尉正为默特尔担忧，默特尔是一只棕红色的鸡，从初夏以来格洛弗就把它当作宠物养着。“伞兵鸡”默特尔的脖子上系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又系在降落伞的伞翼上，进行过6次训练跳伞。一开始，它待在系在格洛弗左肩膀上的一个带拉链的小帆布包里，然后，在距离地面50英尺的高度时，他再把它放出来。到现在，默特尔已经成专家了，格洛弗可以在300英尺的高度就把它放出来。默特尔发疯似的拍打着翅膀，发出嘶哑的尖叫声，之后仪态万方地飘落在地上。格洛弗回忆说，在那里，“这只相当温柔的宠物鸡就会在地上耐心地等着，等着我着陆后把它抱起来”。伞兵鸡默特尔要去阿纳姆，那将是它的第一次作战跳伞。但格洛弗并不打算冒不必要的风险。他计划把默特尔放在它的包里，一直到他在荷兰着陆。

第一机降旅的基地在南方，离基维尔不远，该旅23岁的一等兵悉尼·纳恩，巴不得能从他的“宠物”那里脱开身。他认为这个营地是“一场噩梦”。纳恩已经等不及地要去阿纳姆或者别的任何地方，只要能离开那只纠缠不休的鼹鼠足够远就行，那只鼹鼠老是钻进他的床垫里。

英军第一空降师，是在从多塞特郡以南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延伸开来的基地里待命，对该师的士兵们来说，普遍感觉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终于要参战了。除此之外，作简要指示的军官们还强调了这个事实，即市场花园行动能够缩短这场战争。对这些从1939年就一直在作战的英国人来说，这个消息是使人飘飘然的。第二十一独立伞兵连的中士罗恩·肯特听说，“这次行动的成功甚至可能让我们夺取柏林”，而且在阿纳姆的地面抵抗，“将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和骑自行车的老年人构成”。第一伞兵旅的中士沃尔特·英格里斯也同样自信，他认为，这场进攻将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红毛鬼子”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保住阿纳姆大桥48个小时，直到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到达，然后这场战争就实际上结束了”。英格里斯预料，他将在一个星期以后返回英格兰。第一伞兵旅的一等兵戈登斯派塞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次行动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在我们靠近的时候，几个在幕后活动的德国人将惊恐地退缩”；而第一机降旅的一等兵珀西·帕克斯在得到下达的简要指示以后则感到，“我们在阿纳姆遭遇到的，将是一帮混杂的德国厨子和办事员”。珀西说，坦克的出现“只是被顺便提了一句，我们被

告知，我们的空中掩护将会强大得让我们上面的天空变黑”。卫生员杰弗里·斯坦纳斯预料只能见到“两三个长了疝气的营”；而通信兵维克托·里德则“期望能看到德国的空军妇女辅助队”，他认为，“空军妇女辅助队将是唯一保卫阿纳姆的德国人”。

有些能够合法地待在后方的人，也急于出发。第一机降旅炮兵部队的中士艾尔弗雷德·鲁利埃就是其中之一。这位31岁的伞兵发现他没有被列入参加阿纳姆行动的名单，尽管鲁利埃是作为炮手受的培训，但当前却是在他的营司令部做军人食堂的代理中士。由于他有烹调专长，他似乎可能在这个工作上度过战争的剩余时间。艾尔弗雷德·鲁利埃曾两次向军士长约翰·西利恳求，恳求能被包括在进攻之中，但每一次都被拒绝了。第三次恳求的时候，阿尔夫强调了他的理由。“我知道，这次行动能够缩短战争，”他告诉西利，“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女，但如果这次进攻能够让我回家更快保证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我就想参战。”西利为他开了后门。阿尔夫·鲁利埃的名字被加在将前往阿纳姆的名单上了——在阿纳姆，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位军人食堂的中士助理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位传奇人物。

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的普遍高涨情绪当中，某些军官和士兵当中却有着一些怀疑的暗流。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忧虑，尽管他们谨慎地掩盖着他们的感情。第一伞兵旅的下士丹尼尔·摩根斯认为，“市场行动是一个可笑的行动”。还有，“在距离出击目标六七英里的地方空投，然后一路作战穿过一座城市到达出击目标，实际上是自找麻烦”。团部军士长J·C·洛德是职业军人，他也这样认为。“这个计划有点难以预料，”他感到。对于有关敌人已经兵力不足、精疲力竭的言论，他也不怎么认可。他知道“德国人绝非傻瓜，而是一位非凡的勇士”。J·C·洛德的举止甚至能吓坏他所负责的老兵（有些人在他的背后甚至敬畏地称他为“耶稣基督”），不过他仍然没有把他的不安显露出来，因为“那对士气来说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埃里克·麦凯上尉的工兵们的一项任务，就是快速赶到阿纳姆那座主要的公路大桥，拆掉预料中的德国人的爆炸物，他对这整个行动抱有怀疑。他想，这个师“在距离出击目标8英里的地方空投，可能与在100英里以外的地方空投没有什么两样”。突然袭击和“闪电般的迅速打击”的长处，无疑将会丧失。麦凯悄悄地命令他的部下，每一个人所携带的弹药和手榴弹数量加倍，他还亲自向连里的每一个人简要介绍了逃跑技巧。

27岁的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一空降师通信兵部队的副指挥，他尤其关切他的通信手段。他所担心的，除了那些主要的指挥装置之外，还有那些称之为“22”的小一些的器械，在对阿纳姆进行攻击期间，将在厄克特和各座桥梁之间使用“22器械”。“22器械”最好的传输和接受效果，是

在直径为3到5英里的距离之内。由于空投场在距离出击目标7到8英里的地方，所以可以预料其性能是不确定的。更糟糕的是，这些器械还必须与布朗宁的空降军司令部进行有效的信号接收，按照计划，该空降军要进攻奈梅亨，那是在空投场南边大致15英里的地方。使问题愈加严重的还有地形。在阿纳姆的主要公路大桥和着陆地区之间是城镇本身，另外还有茂密的森林地段和郊区的新建住宅区。另一方面，一支独立的收集资料的联络部队，被称为“鬼怪式”联络部队，它被组织起来为的是把对情报的评估和直接的报告收集起来，并传递给战场上的每一位指挥员，在这里就是传递给空降军的布朗宁将军。而“鬼怪式”部队却并不为自己使用的“22器械”的传输范围担心。25岁的内维尔·海中尉负责的是“鬼怪式”部队受过高级培训的专家，他甚至“有点藐视皇家通信兵部队”，他的部队倾向于把皇家通信兵部队当作“穷堂弟”对待。海和他的操作员使用一种特殊的天线，能够在“22器械”上进行超过100英里距离的传输。

即使海能获得成功，可以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使用各种各样的通信手段（注），迪恩－德拉蒙德还是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上级汤姆·斯蒂芬森中校谈到，“在行动的最初阶段，这些器械是否能够满意地运转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斯蒂芬森同意他的话，但即使如此，还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在突然袭击中，预计部队将非常迅速地靠拢阿纳姆大桥，因此可以相信，部队与司令部脱离联系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而迪恩－德拉蒙德听说，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将会恢复正常，厄克特的指挥部将会与已经在桥上的第一伞兵旅在一起”。迪恩－德拉蒙德回忆说，尽管他并没有完全放心，“但就像别的每一个人一样，我也深受普遍态度的影响，那普遍的态度就是：‘不要消极，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捣乱，让我们开始进攻吧。’”

现在，最后的决定所依赖的，并不是人而是天气。从最高司令部往下，高级军官们焦急地等待着气象报告。如果考虑到满足蒙哥马利的最后期限还有不到7天的时间，那么市场花园行动实际上已经完全准备就绪了，不过还是需要起码3天的好天气的预告。9月16日傍晚，气象专家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除了一大早有一些雾之外，以后三天的天气将是晴朗的，没有什么云也没有风。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布里尔顿中将迅速做出决定。在下午7点45分发给他手下指挥官们的密码电传电报说：“确认花园行动，17日，星期日。要回音。”在他的日记里，布里尔顿记载：“我们终于参加战斗了。”他心中想，这个夜晚他将能睡个好觉，因为正如他对他的参谋们所说的那样，“我既然做出了决定，就不再担忧了”。

在拥挤的飞机库、帐篷城和尼生式活动房屋（注）里，等待的人们得知了这个消息。格兰瑟姆附近的英军第一空降师通信兵部队的军士食堂里，在壁炉上方的一面大镜子上有人用粉笔写道：“还有14个小时……绝不会取消。”中士霍勒斯·霍克·斯皮维注意到，随着每一个小时的过去，变化的数

字也一次次用粉笔写上。为那些永远没有实行的行动所做出的简要指示，斯皮维已经厌倦了，对他来说，镜子上的那个总是在减少的数字是迄今最好的证明，这一次“我们肯定是要出发了”。

在所有的基地里，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官兵们作了最后一刻的准备。已经向他们发出了意义明确的简要指示，他们的武器已经检查过了，他们的货币已经兑换成了荷兰盾，现在，这些被隔离的伞兵除了等待，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有些人用这个时间写信，“庆祝”他们第二天上午的出发，有的把个人的东西包装起来之后睡觉，或者参加马拉松式的打牌游戏，玩的牌有21点、扑克牌戏、桥牌等，不一而足。第一伞兵旅第二营20岁的中士弗朗西斯·蒙克，一个又一个小时地玩21点。让他惊奇的是，他连续不断地赢。蒙克看着他面前那堆不断增长的荷兰盾，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百万富翁。他期望，“战斗之后在阿纳姆能够玩得非常痛快”，在他看来，那场战斗将“只会持续48个小时”。让这位中士与德国人算账，这个时间够用了。就在72个小时以前，蒙克的弟弟，一位17岁的皇家空军上士试图在200英尺的高空从他被击毁的轰炸机上跳伞时，被打死了，他的降落伞没有能够完全打开。

在格兰瑟姆南边，位于科蒂斯莫村的一个基地里，第四伞兵旅的中士乔·森利正在进行安全巡逻，以确保“没有一位伞兵能溜出基地，进入村子”。在返回飞机场的时候，森利看见，中士金格尔·格林把一个瘪了气的足球扔向空中。金格尔是一位体育教师，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大个子”。格林敏捷地接住球，又把球扔向森利。“你用这个球到底要干什么？”森利问道。金格尔解释说，他要把这个瘪了气的足球带到阿纳姆，“这样在结束之后我们就能在空投场玩上一会儿”。

在肯特郡的曼斯顿，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陆军上士乔治·贝利斯也盼望着能有一些娱乐活动。他听说荷兰人喜欢跳舞，因而仔细地把他跳舞用的平底轻便鞋装了箱。第一伞兵旅通信兵部队的通信兵斯坦利·C·科普利，为他的相机购买了额外的胶卷。由于预计不会遭遇到多少抵抗，他认为，那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可以给荷兰的乡下和城镇拍摄一些照片”。

有一个人带着他几天以前在伦敦买的礼物。当荷兰被占领的时候，荷兰海军32岁的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开着他的扫雷舰逃了出来，驶往英格兰。从那个时候起，他就隶属于荷兰流亡政府，做着各种各样的文案工作，处理信息和情报。几天以前，沃尔特斯被要求前往荷兰，作为隶属于厄克特将军司令部的军政府和民事工作队成员。根据提议，沃尔特斯将担任空降部队解放的荷兰领土的军事长官。“那是一个使人吃惊的提议———从办公椅来到滑翔机。”他回忆道。他隶属于希拉里·巴洛上校手下的一支部队，巴洛是第一机降旅的副旅长，被指派在阿纳姆被攻占以后，担任阿纳姆的防区司令，而沃尔特斯将担任他的助手。现在，沃尔特斯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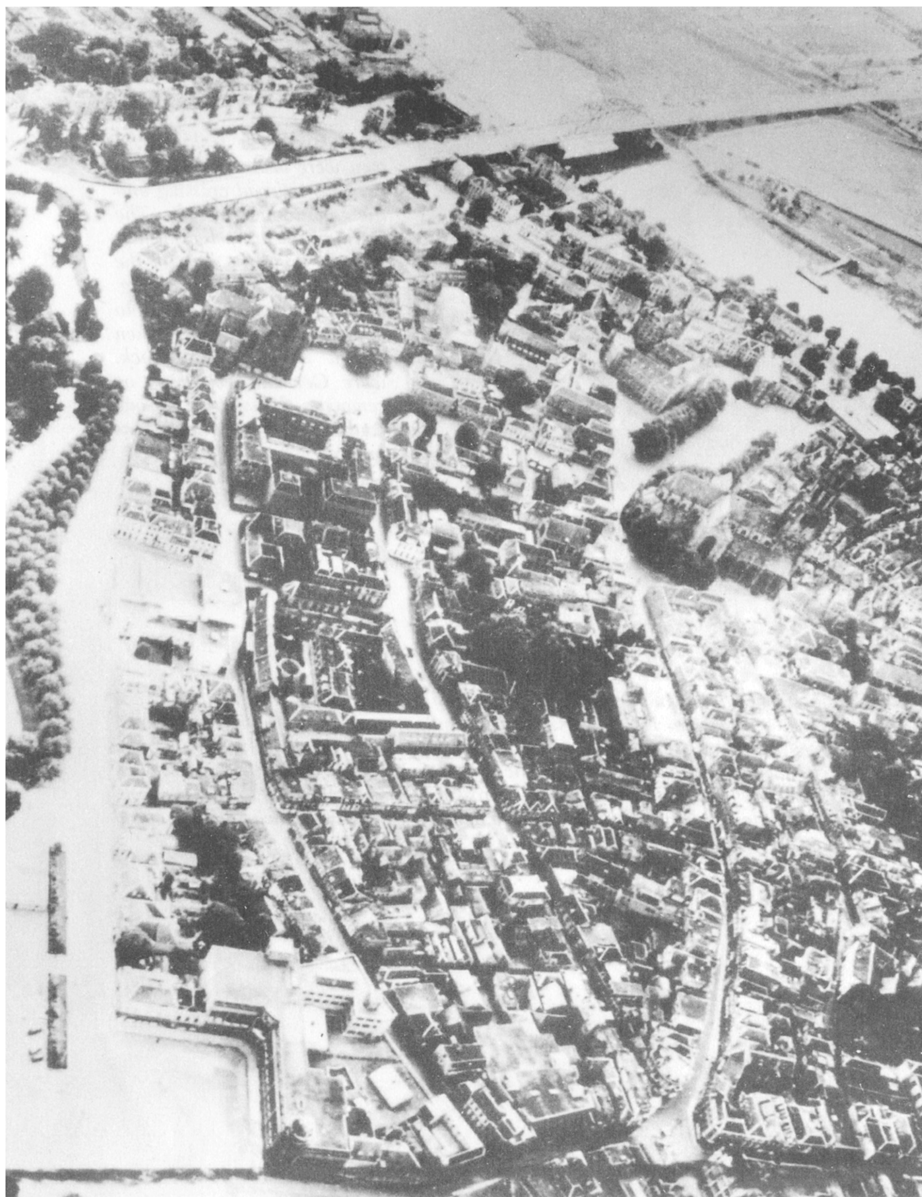
返回荷兰的前景而激动。“被这种乐观主义所感染，凡是告诉我的事情我都相信。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次行动将会非常困难。似乎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进攻将非常容易。我预计我将在星期天着陆，星期二回家，在希尔维萨姆与妻子和孩子团聚。”沃尔特斯为妻子玛丽亚买了一块表，为女儿买了一只两英尺高的玩具熊，四年前他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婴儿。他希望如果他把玩具熊带进滑翔机的话，谁也不会在意。

31岁的约翰·弗罗斯特中校，要率领被指派去攻占阿纳姆大桥的那个营，他把猎狐时吹的铜号连同他的作战服一块儿装了箱。那只铜号是皇家猎狐队的成员们送给他的，在1939至1940年的时候他是那个猎狐队的队长。平时训练的时候，弗罗斯特会用那只铜号集合他的士兵，在这次行动中他也将这样做。对于白天跳伞，弗罗斯特并没有感到不安。简报会上所给的信息，“已经使我们感到，德国人是虚弱的，士气低落，那个地区的德国部队肯定是层次很低，装备差劲”。但弗罗斯特确实曾对空投场怀有疑虑。他被告知：“在大桥南边的圩田不适合伞兵和滑翔机。”他纳闷，既然如此，“如果是这么不适合”，为什么那些波兰人还要在大桥的南边空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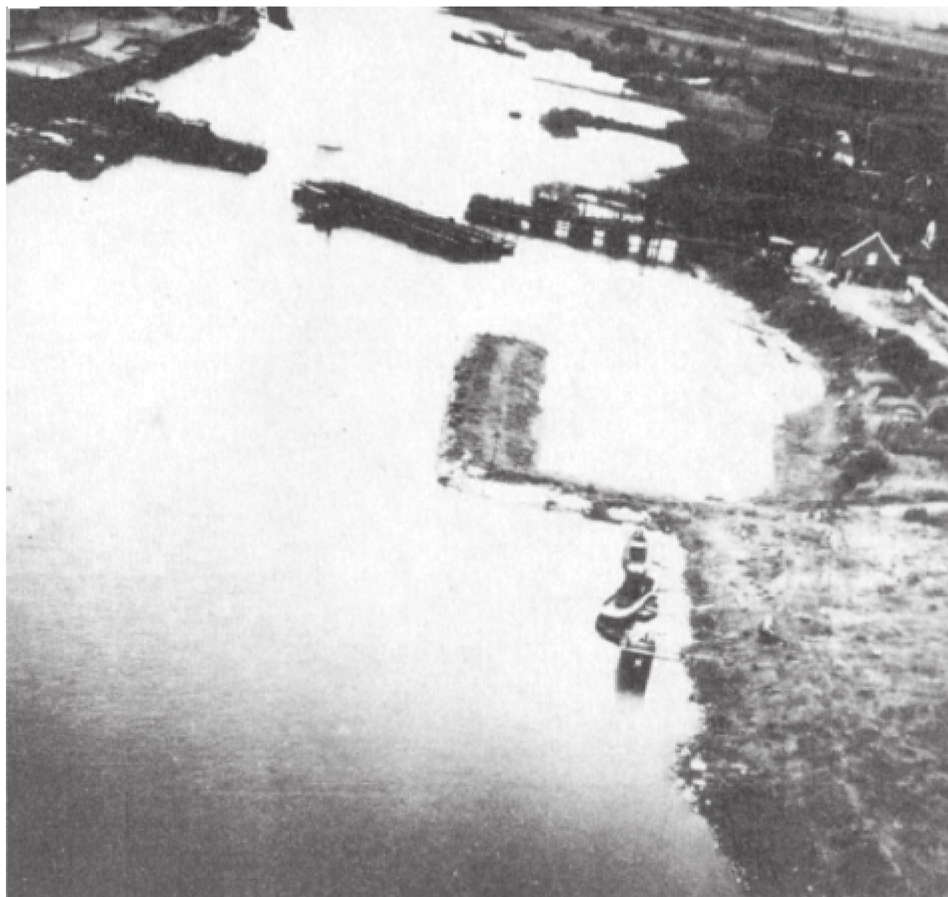
尽管弗罗斯特急于参加战斗，但却“不喜欢前往荷兰”，他暗自希望能在最后一刻取消或者推迟。他喜欢林肯郡的斯托克罗克福德地区，希望“也许能再待上一两天，只是做我以前所做过的一切愉快的事情”。但与这些想法在一起的，还有别的想法，那些想法“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现在该离开了”。9月16日，弗罗斯特睡得很香。尽管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认为阿纳姆战役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又确实告诉他的勤务兵威克斯，把他的枪、子弹、高尔夫球杆和无尾礼服，装进随后出发的参谋车里。

军士食堂现在空无一人，在食堂的壁炉上方的那面镜子上，有一个最后的记录，那是在人们还没有忙得顾不上的时候乱涂乱画上的。写的是：“两个小时以后出发……绝不会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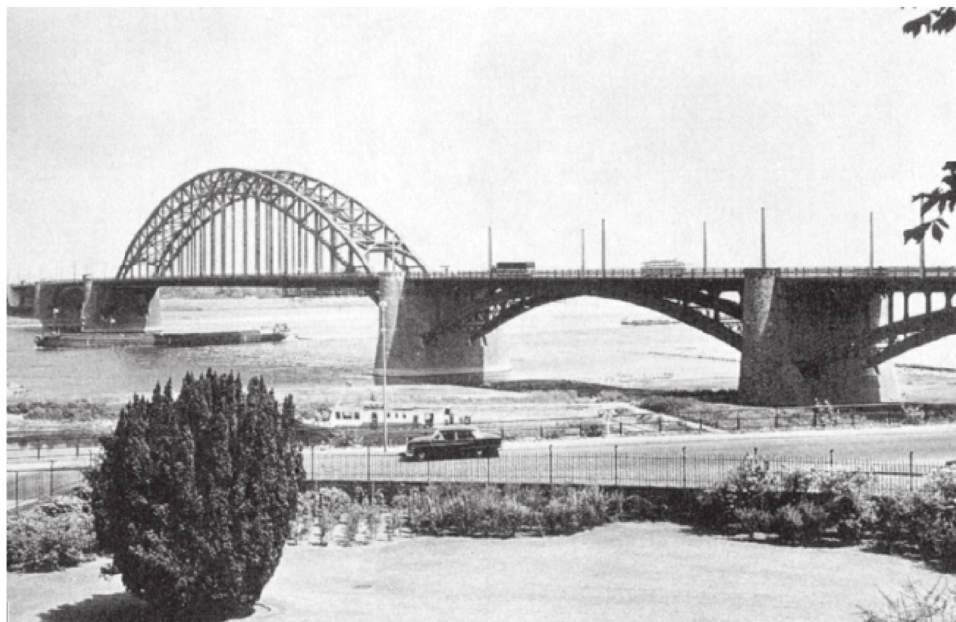




在将由英、美和波兰空降部队夺取的所有渡口当中，最上边的那一座就是在下莱茵河上的阿纳姆大桥。该桥将由厄克特少将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和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夺取，是蒙哥马利要在1944年结束战争的关键。照片显示，大桥与相连的林荫大道，一直向后面延伸到那座音乐厅建筑群（下前方）。



桥梁：厄克特的士兵还要攻占阿纳姆铁路渡口以及浮桥。德国人已经炸毁了阿纳姆铁路渡口，而浮桥的中间一段则是缺失的。浮桥照片是在进攻开始的11天之前由英国皇家空军拍摄的，照片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德国人是更换了中间那一段，还是拆掉了中间那一段？谁也不知道，但命令已经下达，还是要发起进攻。



奈梅亨大桥

加文准将的第八十二空降师迅速攻占了马斯河上的1500英尺长的格拉夫大桥，还攻占了霍伊曼运河大桥。但由于命令上的混乱以及德国人的迅速反应，他们在第一天并没有能够攻占瓦尔河上的奈梅亨大桥，奈梅亨离阿纳姆11英里远。19日，在英美军队的联合进攻中，渡口陷落了，当时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对瓦尔河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攻击，这次攻击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奥马哈海滩登陆”。（译者按：奥马哈是在诺曼底的一个狭窄海滩，D日登陆的一个地点。事件细节详见作者《最长的一天》。）



格拉夫大桥

霍伊曼运河大桥



索恩的渡口

在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阵地的南边，泰勒少将的第一〇一空降师攻占了除一座桥梁之外的所有桥梁：因为在索恩的渡口被炸掉了，这使得市场花园行动的进度推后了36个小时。

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在战略上极度对立。蒙哥马利认为，最高司令优柔寡断，“没有做这个工作的经验”；艾森豪威尔则认为，这位在英国最孚众望的陆军元帅是“自我中心者，自以为一辈子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新任司令员布里尔顿中将，以前从未指挥过伞兵部队。他与该集团军的副司令、英国人布朗宁中将不和。在制定进攻计划的几个小时以前，布里尔顿收到了布朗宁的辞呈。



布朗宁是英国最杰出的空降作战权威，当被任命指挥市场花园行动的时候，他撤回了辞呈。在此以前，他从未对一个空降军进行过在作战上的控制。



（从左到右）近卫团装甲师师长阿代尔少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霍罗克斯中将，他的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和步兵将进行大举猛攻；罗伯茨少将，他的第十一装甲师攻占了安特卫普，但又停了下来，以便“加油，重新装备和休息”，这也就使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主力得以抵达荷兰，参加针对市场花园行动的攻击。



美军第一〇一空降师师长泰勒少将，与英军第十二军军长里奇中将会晤；



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员邓普西上将，与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加文准将交谈。



亨利·克纳普



皮特·克鲁伊夫

荷兰特工亨利·克纳普，与阿纳姆地下组织领导人皮特·克鲁伊夫，他们于9月14日警告伦敦方面，在阿纳姆有德军的装甲师。



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是布朗宁的情报处长，他也在英国皇家空军拍摄的侦察照片上发现了德军的坦克。他的警告无人理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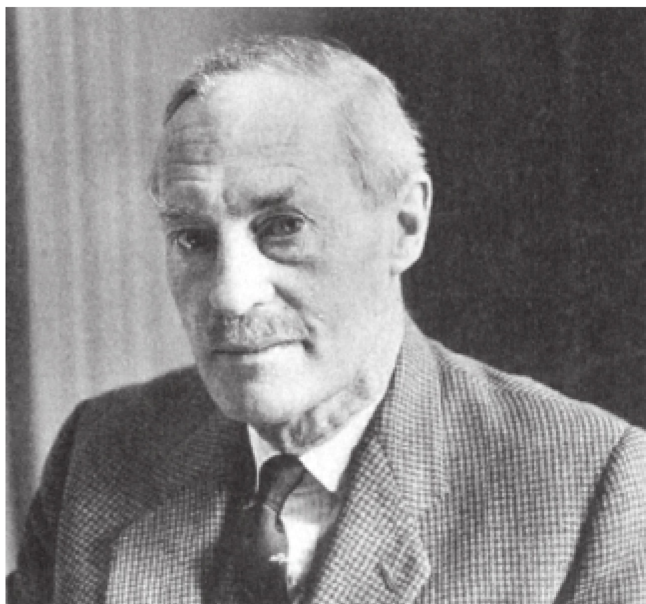
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少将，他虽然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作战指挥官，但也是第一次指挥伞兵师。他不仅没有觉察到德军的装甲部队，而且还不得不让他的部队在距离关键性的阿纳姆大桥6到8英里的地方着陆。进攻刚一开始，通信就中断了，厄克特将军在德军营地的后面与自己的司令部失去了联系，不得不躲藏了39个极其重要的小时。



希克斯准将



哈克特准将



麦肯齐上校



索萨博斯基少将



拉思伯里准将

由于厄克特“失踪”，希克斯准将不得不指挥该师。

当第四伞兵旅在9月18日着陆的时候，哈克特准将由于资格较老，便质疑希克斯是否有权指挥该师。

厄克特的参谋长麦肯齐上校使进行争论的准将们平静了下来。

与此同时，索萨博斯基少将以及他的波兰第一伞兵旅，由于天气恶劣而耽搁了两天多的时间，而且他们对阿纳姆的真正形势一无所知。

第一伞兵旅旅长拉思伯里准将本应该掌握师的指挥权，但却受伤了，就像厄克特将军一样被认为是“失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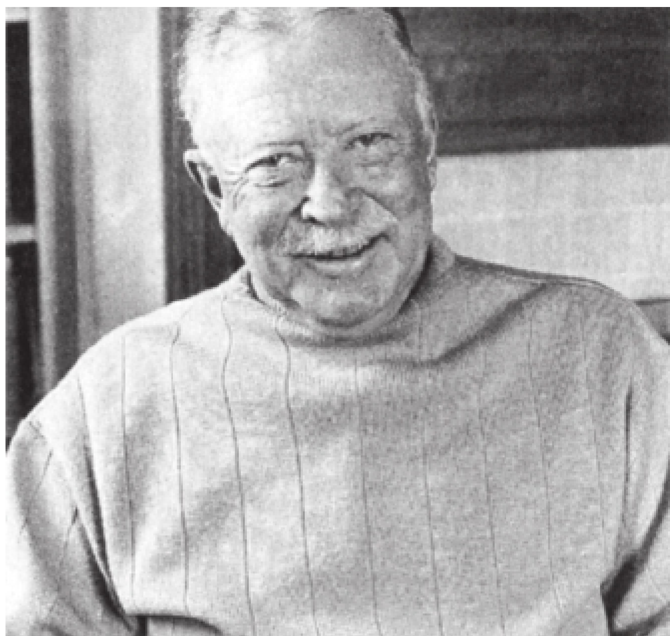
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和他的士兵们，与10倍于己的敌人交战，抵挡德军的两个装甲师，坚守阿纳姆大桥的北入口。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战壮举之一。



另外一位守桥英雄埃里克·麦凯上尉（30年后的照片），尽管几乎弹药用尽，却要求德国人投降。



麦凯上尉（图中掌舵的那一位）受伤被俘，但却拒不放弃。他与伙伴们逃跑了，顺流而下漂到奈梅亨。



J·O·E·范德勒上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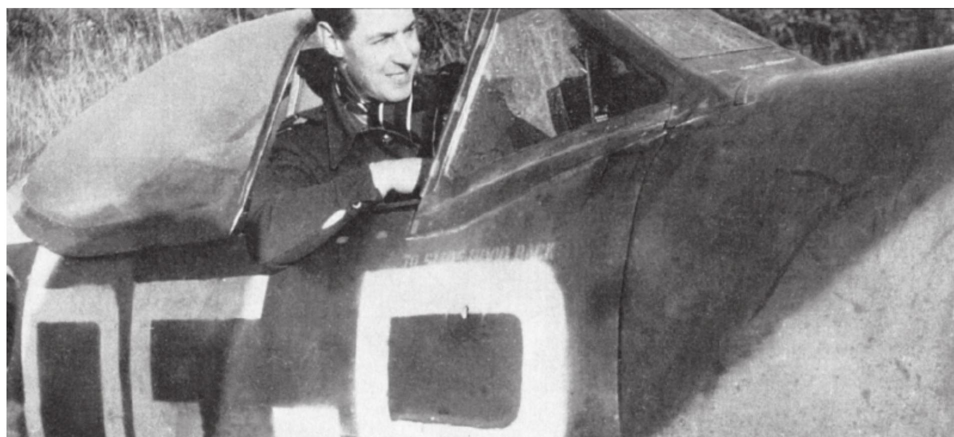
贾尔斯

爱尔兰近卫团的坦克部队，率先从荷兰与比利时边界进行装甲突破。这里的照片上是该坦克部队的司令员J·O·E·范德勒上校，以及他的堂弟贾尔斯，贾尔斯是一位营长。



范德勒与贾尔斯在1944年。在距离阿纳姆大桥上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和

他的士兵们6英里的地方，德国人成功地阻挡住了范德勒的坦克部队。



英国皇家空军中尉洛夫，在坦克大举猛攻期间担任地对空通信官，他奇怪自己怎么会自告奋勇担任这个工作。



洛德·罗茨利最先与英军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少将的孤军取得了联系。



海中尉，他的“鬼怪式”无线电部队终于替厄克特联系上了地面部队。



查特顿上校是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他力主对阿纳姆大桥进行一次大胆的滑翔机奇袭。倘若他的计划被采纳的话，那么大桥就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攻占。但查特顿由于提出了这个主意，反而被称为“一个刺客和残忍的凶手”。



凯恩少校所在的师在奥斯特贝克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凯恩少校虽然数次负伤，却仍然继续反击敌人的坦克。



伦敦霍布森父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克莱尔·米勒小姐，她制作了布朗宁的飞马旗这与在阿纳姆的荒诞传说相左。那传说认为，飞马旗是布朗宁的妻子、小说家达夫妮·杜莫里埃（名作《蝴蝶梦》的作者——译者按）制作的。米勒小姐还在伞兵的制服上缝上了500个小罗盘，那些小罗盘后来帮助许多伞兵逃脱了出来。



朗斯代尔少校[右]的“朗斯代尔部队”一直坚守到最后。



范德弗特中校



库克少校

在英美联军进攻奈梅亨大桥的过程中，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库克少校领导了前所未有的瓦尔河渡河，夺取了大桥的北端。与此同时，范德弗特中校与英军一起，进攻大桥的南部入口。



戈尔曼中尉



威尔斯鲍斯基中尉

军人十字勋章获得者戈尔曼中尉，对整个作战行动有他自己的“怀疑”。他感到，谁也无法行动快得足以拯救在阿纳姆大桥上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和他的士兵。

威尔斯鲍斯基中尉奉命，率领一个连去攻占贝斯特的大桥，据认为那里“防御薄弱”。那个地区实际上有1000多名被忘却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部队，结果他们把第一〇一空降师的一个整团都卷了进去。



格洛弗中尉，在阿纳姆跳伞的时候还带着他的名叫“默特尔”的宠物鸡。“伞兵鸡默特尔”被打死了，格洛弗在作战当中还为它举行了一个正式的葬礼。



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一空降师的通信兵部队的副指挥，他怀疑他的通讯设备是否能起作用，但又同其他每个人一样，“和普遍的态度随波逐流”，那就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惹事。”



塔克上校是美军第五〇四团的团长，他的部队渡过了瓦尔河，对英军坦克部队的迟缓深感震惊。他原以为，会有一支特遣部队全速冲过这11英里，到达阿纳姆，给大桥的保卫者解围。塔克说，英国人反而“停下来喝茶”。



冯·伦德施泰特是帝国的最有才干的陆军元帅，在诺曼底惨败之后被希特勒解职，又在9月份被起用。西线的形势是灾难性的，因而冯·伦德施泰特认为，盟军能够在两个星期之内入侵帝国并结束战争。他在拯救第十五集团军上所使用的战略，是挫败蒙哥马利的市场花园计划的一个主要因素。



陆军元帅莫德尔，被冯·伦德施泰特称为一位“不错的军士长”，他没有能够阻止盟军在西欧的大举猛攻，但却碰巧在盟军空降进攻的几天前，把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调进了阿纳姆地区。被缴获的市场花园计划在48个小时之内就交到了他的手中，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莫德尔硬是不相信。





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司令比特里希中将（这里分别是他在1973年和在1944年），对缴获的市场花园计划一无所知，但却正确地推断出，盟军的主要出击目标就是阿纳姆大桥。





帝国的空降专家施图登特大将（在1973年和在1944年），为空降部队的空投规模所震惊，“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够有这样的兵力为我所用”。



哈策尔中校1973年



哈策尔中校1944年

英军实际上是在阿纳姆地区的两个装甲师当中着陆的，令那两个装甲师的师长大吃一惊。那两位师长分别是第九党卫军“霍亨施陶芬”师的哈策尔中校、第十党卫军“弗伦茨贝格”师的哈梅尔少将。





哈梅尔少将



双重间谍、“金刚”林德曼斯越过前线，告知德国人，英军将在9月17日发动地面进攻。与战后英国报纸上的报道相反，林德曼斯对空降进攻的规模一无所知。



德斯洛赫上将



克拉夫特少校

德国空军的德斯洛赫上将对空降进攻的可能性深感担忧，因而他拒绝访问莫德尔。克拉夫特少校的那个营碰巧在位于英军空投场边缘的阵地上。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里的莫德尔的司令部里，第一个得知盟军空降部队在不到两英里之外的地方空投的人，是赛德尔豪泽尔中尉。“他们正好跳在我们的大腿上！”有人这样告诉他。



艾因霍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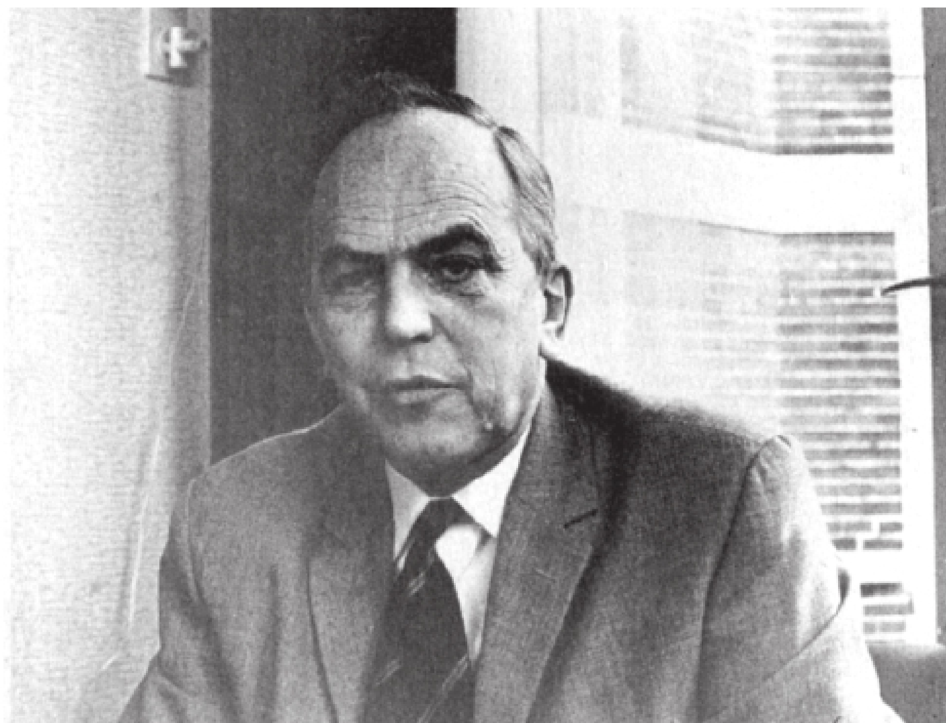
伯恩哈德亲王到达被解放了的艾因霍温，以及他在1973年。有关市场花园计划中的地形上的困难，等到咨询伯恩哈德或者他的总参谋部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而有关阿纳姆的德军装甲部队，亲王从荷兰地下组织所获得的详细情报，又没有受到重视。



艾因霍温在1973年



在奥斯特贝克的荷兰人本来预料会获得解放，却又发现自己正陷于残酷的战斗之中。“蒙哥马利很快就会到这里。”乐观的英国人告诉17岁的安赫·范·马尔南。



扬·沃斯奎尔无法摆脱一种“无望的感觉”。



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日记中写道，奥斯特贝克已经成了“最血腥的战场之一”。



凯特·特尔霍斯特与儿子米歇尔在战争期间



凯特·特尔霍斯特与丈夫扬在1973

凯特勇敢地把她的家向英军伤员开放。在战斗期间，一段时间里有300多名伤员挤在的家里。扬原先是一位荷兰上尉，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军没有使用德里尔渡口渡过莱茵河。在制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的过程中，德里尔渡口完全被忽视了。



德里尔渡口

1. 言外之意就是，大规模兵力的突然空降，是谁也无法抵挡的，因为你无法在国土之内处处、时时设防。（又，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科学家。）

2. 航空队（airforce），美国空军最大的战术编制单位。

3. 近卫步兵第一团（GrenadierGuards），即著名的皇家步兵卫队第一团。

4. 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52ndLowlandDivision），第五十二是师的序号，而它又是苏格兰低地的师，意即它是第五十二师，又名苏格兰低地师。

5. 空军兵团（command，或者aircommand），指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航空队的最大编制单位。

6. 空降场（airhead），指在敌方境内强行建立的空降场。

7. “尖叫的老鹰”（ScreamingEagles），即美军第一○一空降师。ScreamingEagles如果用作美国俚语，意思是“退役军人证章”。这里指泰勒的部下，当然不可能是“退役军人证章”，而是他们的绰号。

8. 这里的“常规”，原文是“lawofaverages”，也可译作“概率”，即“你不能永远赢，也不能永远输”这种理念。他们自称“逃避常规”，言外之意就是他们总是赢。

9. 在他们第一次面谈的时候，厄克特还戴着他的准将徽章，穿着紧身苏格兰高地师的格子呢裤子（格子呢紧身短裤），套着鞋罩。会见结束的时候，布朗宁指着厄克特的裤子，说道：“你不妨穿得合适一些，脱下那条格子呢紧身短裤。”——原注

10. “该死的将军”，原文是“bloodygeneral”，这里的“bloody”是俚语，意为“该死的”，是一种温和友好的咒骂，同中文一样，当然不可从字面上理解之。

11. 红毛鬼子（theRedDevils），俚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北非的德军对英国陆军伞兵团的称呼。

12. 圩田（polder），指荷兰等国家围海而造的低田。

13. 滑翔机飞行团的团长乔治·C·查特顿上校回忆，当时他想奇袭，“一支由五六架滑翔机构成的兵力在桥附近着陆，并攻占桥梁。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但显然别人谁也看不出这种需要，我清楚记得，因为提出了这个建议，我被称为一个该死的凶手和刺客”。——原注

14. 克纳普从来不知道他的联系人是谁，只知道他的报告被传递给一个绝密单位，被称之为“阿尔布雷希特小组”。他知道，他打的电话是长途电话。那个时期，荷兰的电话是4位数。有一个才华横溢的电话技师名叫尼古拉斯·查凌·德博德，为地下组织成员设计出了一个方法，根据这个方法，通过使用某些电话号码，他们能够绕过当地的电话交换台，自动在荷兰各地通话。——原注

15. 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原是神圣罗马帝国一个王朝的名字，即霍亨施陶芬王朝（HohenstaufenDynasty）。奠基人是腓特烈伯（1105年卒），其继任的统治者当中，有大名鼎鼎的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即神圣

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等。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系以霍亨施陶芬命名。第九是各个装甲师当中的序号，且它又是党卫军的装甲师，该师又名霍亨施陶芬师。

1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特里希被怀疑为战犯，并因此在监狱里待了8年，1953年6月22日被无罪获释。要找到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们是困难的，要采访他们也是困难的，不过比特里希以及他手下的军官们却对我帮助极大，让我弄清楚了迄今为止在阿纳姆战役中的许多未知事件。比特里希想要我澄清他的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情。在英国人各种各样的叙述中："我被描述为一位希望能当上指挥的音乐家，"他告诉我，"不过那些作者把我和我的兄弟混为一谈了，我兄弟是格哈德·比特里希博士，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钢琴家和指挥。"——原注

17. 弗伦茨贝格（GeorgvonFrundsberg，1473—1528），日耳曼军人，哈布斯堡王室的忠实臣仆，曾先后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对外作战。1509至1525年间屡次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这个师的名称意为：这是第十装甲师，又是党卫军的装甲师，又名弗伦茨贝格师。

18. 战后，在他安全的单人牢房里，劳特向荷兰审问者们承认："当时我提心吊胆……我不得不让抵抗力量瘫痪。"1949年1月12日，一个荷兰法庭认为他的罪名成立，罪名范围广泛，包括"迫害犹太人，流放居民让其进行奴隶劳动，劫掠，没收财产，非法逮捕，扣押……以及对无辜平民进行杀戮以报复其对占领当局的冒犯"。他于1949年3月25日被处决。——原注

19. 战后，一些英国报纸指责，正是由于林德曼斯准确地描述出了阿纳姆是空降的主要出击目标，才使得德国的装甲部队在那里等候，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9月10日会面并决定进行市场花园行动之前，比特里希的军团已经抵达了阵地。林德曼斯不可能知道有关对阿纳姆的进攻以及这个行动的巨大规模的任何事情。而且，盟军有关日期、空投场的部署等决定，是在林德曼斯离开布鲁塞尔、越过德军营地很久以后做出的。第二个经常被重复的说法就是，林德曼斯被带到位于弗尔特的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的司令部进行审问，有人提出，施图登特大将这位空降专家正确地评估了这个报告，并发出了警报。施图登特断然否认了这个说法。"一派胡言，"他告诉我，"我从未见过林德曼斯。实际上，我战后才在一个战俘营里第一次听说这整个事情。真相是，在进攻发生之前，德军司令部的任何人都一无所知。"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后不久，怀疑便落在了林德曼斯身上，于是他被荷兰人逮捕了。"金刚"这个十足的登徒子，一直到最后都名副其实。1946年7月，在对他进行审判的48小时之前，在一家监狱

医院里，人们发现林德曼斯失去了知觉，旁边是一位监狱里的护士。在一个古怪的“爱情契约”中，他们两个人都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林德曼斯死了，那个姑娘幸存了下来。——原注

20. 有关情报的这个部分，我所依据的，是S·L·A·马歇尔将军提供给我的资料。马歇尔将军是二战欧洲战区的首席撰史人，他欣然让我看他论述市场花园行动的各个专著，还有他在1945年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访谈录，该访谈录记下的，就是这里所讲的史密斯先后与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会晤。——原注

21. 斜角照片，也就是既不是垂直拍摄，也不是水平拍摄。

22. “这是最终折断骆驼的腰的那根稻草”是一句常用的英语俗语，意即致命一击。

23. 英军少将休伯特·埃塞姆，在其卓越著作《德国战役》一书（第13页）写道：“在8月底和9月的上半月，盟军的情报参谋们对实际形势的理解有误，他们降低到这样一个层次，那是在1917年帕辛代尔战役的时候，黑格的首席情报官约翰·查特里斯准将达到的那种层次。当时，战时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指控，查特里斯“只挑选那些适合于他的想象的数字和事实，然后又相应地发布给人以希望的报告”。在1917年的弗兰德战役的各个时期，查特里斯报告说，敌人“崩溃”，“遭到重创”，“后备部队甚少”，甚至“在逃窜”。按照官方的英国史的说法，在1917年7月31日到11月12日之间，在帕辛代尔周围相继发生的可怕战斗中，伤亡总数高达244897人。——原注

译者按：黑格（DouglasHaig，1861—1928），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战场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因推行消耗战略而造成英军大量伤亡；他于1919年被封伯爵。帕辛代尔（Passchendaele）是比利时的一个村庄，是1917年英军伊普尔（Ypres，比利时城市）攻势中的突出部，全部被战争所毁。弗兰德（Flanders），位于历史上低地国家的西南部，大致包括今天的比利时西部、法国北部和荷兰西南部。

24. 韦塞克斯（Wessex）是英格兰西南部一地区。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步兵师，意即这是第四十三步兵师，又名韦塞克斯师。

25. 索尔兹伯里（Salisbury），英格兰南部城市。

26. 科尔德斯特里姆（Coldstream），苏格兰博德斯行政区贝里克希尔区的一个小自治市，著名的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于1650年在这里建立。

27. 在其历史著作《战争中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步兵师》中，埃塞姆写道：“未来的检查军容风纪的人”可能会记得，“当英国陆军的士气在其历史

中最为高涨的时候，军官们就穿着认为最适合于他们生活条件和作战条件的服装”。——原注

28. 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是英格兰的一个郡。第五十诺森伯兰师，意即它的部队序号是第五十师，又名诺森伯兰师。

29. 诺曼底战役期间，在康城作战的时候（译者按：康城[Caen]，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卡尔瓦多斯省省会，距离英吉利海峡14公里。1996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人把此地作为阻止英国与加拿大军队进军的防线），他率领一组三辆谢尔曼型坦克，与4辆德国坦克不期而遇，其中一辆是60吨重的虎式坦克。他的士兵利索地摧毁了敌人的装甲，戈尔曼猛烈地撞击那辆巨大的虎式坦克，并在那辆坦克试图逃跑的时候，摧毁了它的火炮，杀死了里面的坦克手。——原注

30. 纽马基特（Newmarket），英格兰东南部城镇，著名的赛马中心。圣莱杰赛（StLegerrace），英格兰三王冠马赛之一，1776年由陆军上校圣莱杰创办，1778年用他的名字命名，限三龄马驹参加。

31. 金星（goldstar），表示有家庭成员战死疆场。

32. “格拉夫”，英文是“Grave”，意为“坟墓”。这里的言外之意是：“我们要去坟墓，但不知道是哪个国家里的坟墓。”

33. 阿尔夫（Alf），艾尔弗雷德（Alfred）的昵称。

34. 有关英军第一空降师在阿纳姆大桥活动的最精确的叙述之一，见于埃里克·麦凯所写的《阿纳姆大桥战役》一文，载于《布莱克伍德杂志》1945年10月号。——原注

35. 包括在通信配置当中的，是皇家空军提供的82只鸽子。这些鸽子的鸽舍在伦敦地区——这就是说，如果它们在空降兵的着陆和德国人的打击之后还活着的话，它们就将飞行大致240英里才能传递信息。——原注

36. 尼生式活动房屋（Nissenhuts），由英国采矿工程师尼生（PeterN.Nissen，1871—1930）设计的瓦楞铁皮半圆顶和水泥地面的活动房屋，用作士兵宿舍。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istory of the greatestbattle of world war II

第三部 进攻

part three the attack

1



巨大的飞机编队发出的隆隆声震耳欲聋。位于牛津郡和格洛斯特郡的英军滑翔机部队基地的四周，马和牛惊慌失措，在田野里乱窜。在英格兰的南部和东部，成千上万的人吃惊地注视着。在一些村庄和城镇里，交通堵塞，人们停了下来。在快速行进的火车里，旅客们互相拥挤着，朝窗外凝视。各处的人们都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因为那是一种他们谁也没有见过的景象。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空降部队离开了地面，飞向目标。

碰巧，在1944年9月17日，这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特殊的宗教仪式正在英格兰各地举行，纪念“那些勇猛的少数人”，也就是那几个皇家空军飞行员，四年前他们无畏地向希特勒的德国空军挑战，打得他们陷于停顿。当做礼拜的人们跪下来祈祷时，飞机螺旋桨持续而又强烈得使人无法忍受的嗡嗡声，把一些仪式的声音完全淹没了。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正演奏着庄严的《圣母马利亚颂》，那原本昂扬的风琴乐音听不见了。人们三三两两离开他们坐着的长椅，与已经聚集在街道上的人群待在一起。在街上，伦敦人朝天上凝望，被喧闹声惊得不知所措，那是一个又一个飞机编队在低空飞行，从他们头上飞过。在伦敦北边，一个救世军

注乐队由于无法忍受这噪声而停止了演奏，但那位低音鼓鼓手，却眼睛盯着天空，用力敲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鼓点：三点一线———那是V字，在莫尔斯电码中，V代表“胜利”（victory）。

对旁观者来说，牵引着滑翔机的飞机的巨大洪流，已经清楚地揭示出了这

次进攻的性质。但当英国人民得知他们目睹了有史以来所构想的最重要的空降攻势的开始阶段，却已经是6个小时以后的事情。红十字会工作者安杰拉·霍金斯的一番话，可能最好地总结了那些看见这个巨大机群飞过的人们的反应。从火车的窗子边，她吃惊地朝上凝望着，只见一浪高过一浪的飞机，就像“成群结队的紫翅椋鸟”从天上飞过。她确信：“这次进攻，不管目的地是在什么地方，都一定会带来战争的结束。”

对于自己的出发所造成的这个令人敬畏的景象，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官兵，就像地面上的平民一样没有准备。对动身前往荷兰的伞兵、滑翔机运送的步兵以及飞行员们来说，机群的规模之大、场面之壮丽使他们惊愕。阿里·D·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是隶属于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位荷兰军官，他认为，这个景象是“难以置信的。盟军所拥有的每一架飞机，都一定参与了这个单一的行动”。事实上，参与的飞机大约有4700架———这是在一个单一的空降任务中所曾经使用过的最大数目。

行动是在拂晓前的几个小时开始的，并持续了整个上午。一开始，1400多架盟军的轰炸机从英国的机场起飞，对市场花园行动地区里的德国防空阵地和部队集结地进行了狂轰滥炸。然后，从上午9：45开始，在此以后的两小时又一刻钟的时间里，2023架运送兵员的飞机、滑翔机以及滑翔机的拖航飞机，从24个美军基地和英军基地蜂拥上天[注]。45架运送伞兵的C－47型飞机，排成一个长的编队飞行。更多的C－47型飞机以及英军的轰炸机———哈利法克斯型、斯特林型、阿尔伯马尔型———牵引着478架滑翔机。这些数量巨大的运送装备和兵员的滑翔机，似乎形成了无穷无尽的空中列车，它们在拖航飞机的后面，拴在300英尺长的绳索尾部，反弹着上下跳动。在小一些的霍萨型和韦科型滑翔机当中摇晃着飞行的，是大而细长的哈米尔卡型飞机，每一架这种飞机的运载能力是8吨，能够承载一辆小型坦克，或者两辆装上大炮和弹药的3吨重的卡车。在这些巨大编队的上面、下面和侧翼，给它们护航的，是几乎1500架盟军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有英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暴风雨型战斗机、蚊子型战斗机，有美军的雷电型战斗机、闪电型战斗机、野马型战斗机，以及可以低空俯冲的轰炸机。天上的飞机是如此众多，结果第一○一空降师的尼尔·斯威尼上尉记得：“就好像我们能够一直飞行，然后一路去到荷兰”。

英军滑翔机部队是首先起飞的。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那个走廊里，与美国人相比，厄克特将军是更北边的地方，而且要求也不同，因而在第一次空运中，就需要最大数量的人员、装备和火炮———尤其是反坦克炮———以便攻占和坚守他的攻击目标，一直到地面部队能够赶来接应。因而，他的师的主要部分是滑翔机运送的：有320架滑翔机，运送着菲利普·皮普·希克斯准将第一机降旅的人员、运输工具和火炮。他们将在下午1点多钟的

时候，到达位于阿纳姆以西的着陆区域。30分钟后，分乘在145架运送飞机上的杰拉尔德·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就将开始伞投。由于不灵便的滑翔机和拖航飞机要慢一些———每小时120英里，而运送伞兵的飞机是每小时140英里———所以这些巨大的“空中列车”得先起飞。从格洛斯特郡和牛津郡的8个基地里，滑翔机和拖航飞机在机场跑道上徐徐行进，然后以之前从未尝试过的起飞速率升上天空：一分钟起飞一个组合。此后组成队形尤其复杂而且充满危险。这些飞机缓慢地升高，向西飞行，越过布里斯托尔海峡注。等拖航飞机和滑翔机的速度同步了，它们就成对地朝右边靠拢列成梯形编队，然后返回，飞过起飞的基地，向着伦敦以北的哈特菲尔德镇上空的集结点飞去。

当英军第一个滑翔机系列在布里斯托尔海峡的上方组成队形的时候，12架英军斯特林型轰炸机和6架美军C-47型轰炸机，就在上午10：25起飞，前往荷兰。在这些飞机里，是美军和英军的伞降信号员———这些人将首先着陆，为市场行动的部队标出着陆区域和空投场。

与此同时行动的是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伞兵，他们乘坐着625架运送兵员的飞机和50架C-47型牵引滑翔机，从林肯郡格兰瑟姆镇周围的基地起飞了。第九运输兵团的飞机以令人吃惊的精确性，以5到20秒钟的间隔离开地面。他们一浪高过一浪，在剑桥郡马奇镇的上空会合，又从那里以三个平行的系列，向前飞越奥尔德堡注的海岸。

同一时间，从格林哈姆康芒四周的南部机场，第一○一空降师乘坐424架C-47型飞机，外加70架滑翔机和拖航飞机，升上了天空。他们编队以后，也通过了哈特菲尔德上空的交通控制点，然后朝东飞行，在布拉德韦尔湾越过海岸。

这个庞大的机群排成3架一排的巨大纵队，绵延约10英里宽、100英里长，自英格兰乡下的上空掠过。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军第一空降师，在前往奈梅亨和阿纳姆的途中，沿着北边的线路飞行。与他们一起飞行的，有一个由38架滑翔机组成的特殊系列，它运送着布朗宁将军的军司令部，前往奈梅亨。南边的路线上，美军第一○一空降师越过了布拉德韦尔湾，飞往在艾因霍温以北不远的空投场。到上午11点55分的时候，整个部队———20000多名官兵、511部辆战车、330门火炮以及590吨的装备———都离开了地面。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詹姆斯·J·科伊尔中尉，从只有1500英尺的高度，俯瞰着英格兰的乡下，他看见一些修女从一个女修道院的院子里挥手。他想：“这个晴朗的日子和修女们组成了一个具有油画性质的画面。”他朝她们挥手，不知道“她们是否知道我们是谁，到哪里去”。

对空降部队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次飞越英格兰旅行的开始阶段，情绪是轻

松的。对第一伞兵旅的列兵罗伊·爱德华兹来说："一切都是如此安详，就像乘坐公交车前往海边旅游一般。"列兵A·G·沃伦德记得："这是一个完美的星期日。是一个适合在乡间小路漫步、在小酒馆里喝上一品脱酒的上午"。

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乔治·S·查特顿上校，为运送布朗宁将军的那架滑翔机导航，他把这个星期日描述为"极其晴朗的一天。似乎不可能是我们正在起飞，去参加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役"。布朗宁的随行人员和装备给查特顿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将军在一起的，是他的勤务兵、司令部的医官、厨师，以及他的帐篷和私人吉普车。布朗宁坐在一个装沃辛顿牌啤酒用的空板条箱上，一边是飞机驾驶员，另一边是副驾驶，查特顿注意到，他"衣着干净利落，穿着巴拉瑟亚军服呢的作战服，扎着擦得锃亮的萨姆·布朗武装带注，穿着有形似刀刃折缝的裤子，带着一面有皮套的闪闪发亮的镜子，还有一个轻便手杖、一双一尘不染的灰色小山羊皮手套"。查特顿说，这位将军"情绪极其高涨，因为他意识到，他已经到达他事业的一个顶峰。四周有一种极其欢快的气氛"。

在另外一个滑翔机系列里，那位被指派执行市场花园行动最困难任务的安静的苏格兰人，也就是第一空降师的罗伊·厄克特将军认为，"想要不因为我们终于动身而感到激动，是困难的"。然而这位颇得人心的军官脑子里，仍一如既往想着他的士兵和摆在前面的工作。同布朗宁一样，他也带着随行人员。那架霍萨型滑翔机载着他的副官罗伯茨、勤务兵汉考克、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G·A·佩尔牧师大人、一名通信兵、两名宪兵、他们的摩托车以及将军的吉普车。厄克特把滑翔机里面上上下下看了看，感到一阵良心上的剧痛。他想到他的伞兵们，他们负担沉重，带着背包、枪支和装备，拥挤进沉重的运输机里面。厄克特只带着一个小的肩背包、两只手榴弹、一个地图盒子和一个笔记本。他为自己的舒适感到不安。

几乎直到起飞的时刻，厄克特还被要求做出困难的决定。在动身的几个小时以前，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接到了美国空军一位高级军官的电话。是不是要轰炸在沃尔夫黑策的那家精神病院？麦肯齐汇报说，那个美国人"想得到厄克特的亲自保证，里面的人是德国人而不是疯子；否则的话，美国人将不能承担责任"。那个精神病院靠近该师的集合地点，位置危险，厄克特的参谋班子认为是由德国人坚守的。麦肯齐承担了责任。"责任自负！"那个美国人回答道。厄克特批准了他的参谋长的行动。"我的意思是尽可能作好准备，这就是要做的一切！"他记得。

当麦肯齐就要前往他本人的滑翔机时，厄克特把他私下里带到一边。"瞧，查尔斯，"他告诉麦肯齐，"要是我出了什么事，指挥权的接替将首先是拉思伯里，然后是希克斯和哈克特，按照这个顺序。"厄克特的选

择是根据经验做出的。“谁都知道，拉思伯里是我的副手，”他后来回忆说，“哈克特军衔比希克斯高，但年龄小得多，我确信在处理步兵上希克斯要更有经验。我的决定绝不是对哈克特指挥能力的反映。”厄克特反省，也许他应该早一些把他的决定告诉他的每一个准将，不过他“坦率地认为，这整个问题是非常不合实际的”。这个师既失去厄克特又失去拉思伯里的机会，微乎其微。

现在，所有的决定都做出了，厄克特无所事事地注视着，“战斗机中队掠过了滑翔机的行列”。这是他第一次乘坐滑翔机进行作战旅行，他提前吃了两三片防晕机的药片。他的喉咙干燥，吞咽有困难。他还意识到：“我的勤务兵汉考克正在注视着我，他的脸上有关切的表情。就像每一个别的人一样，他也预料我会晕机。”厄克特并没有晕机。“我们是在一个巨大的飞机洪流之中，我集中在各种印象上。我们投入了战斗。我们制订了一个好的计划。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更接近那座大桥，但我并没有老是想这件事情。”

尽管这个庞大的机群在起飞的时候表现出了运作上的高效率，但不幸和事故却也几乎立即发生了。就在起飞之前，一架滑翔机的左舷机翼，被一架斯特林型轰炸机的螺旋桨打了下来。没有人受伤。运载机降旅的艾伦·哈维·考克斯中尉的滑翔机，在费力升空的时候陷入了困境。低空的云挡住了滑翔机飞行员的视线，他无法与他的拖航飞机的尾部排成行。滑翔机飞向一个方向，拖航飞机飞向另外一个方向，这样一来牵引绳索有可能缠绕滑翔机的机翼，使滑翔机倾覆。滑翔机飞行员由于无法与他的拖航飞机重新校直，所以只好一把抓住红色顶部的松脱控制杆，解开了缆绳。考克斯的滑翔机在泰晤士河畔桑福德的一块干草地上着陆了，但没有受到损伤。一个更为古怪的事故，发生在一架运载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士兵的C－47型飞机上，那些士兵面对面地坐在飞机的两侧。起飞5分钟后，下士杰克·邦默看见，“就在我对面的人身后的载货舱口弹开了”。空气的力量几乎把人们从舱口吸到外面的天空里去。邦默回忆说，当他们绝望地抓住东西不放的时候，“飞行员优美地翻了个筋斗，舱口又砰的一声合上了”。

一等兵悉尼·纳恩，原先是急于离开他在基维尔的基地以及那只老钻进他床垫的鼹鼠，现在则为能活着感到幸运。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平静飞行以后，他的滑翔机钻进了云彩里。在从云堆中穿出来的时候，滑翔机飞行员看见，牵引绳索在左舷机翼上缠住了。纳恩听见，滑翔机飞行员在与拖航飞机上的对讲机上说：“我出麻烦了！我出麻烦了！”接着就把缆绳解开了。“我们似乎完全停在空中。”纳恩记得，“然后滑翔机的机头下垂，我们歪歪扭扭地朝地面飞速而去，牵引绳索在旁边飘扬着，就像一根断了的风筝线一样。”纳恩坐着，“吓呆了”，听着风在机身旁呼啸着，“希望在滑翔机里拴住吉普车的锁链能够承受住拉力”。然后他听见飞行员提醒他

们："振作起来，伙计们。我们到了！"滑翔机触到了地面，反弹上去，又再次触到地面，然后慢慢地停了下来。在突然出现的寂静中，纳恩听见飞行员问道："你们这些伙计们都没事吗？"每一个人都没事，大家又返回基维尔基地，于9月18日在第二次空运中飞了出去。

别的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在威尔特郡的上空，悲剧打击了一个滑翔机系列。皇家空军中士沃尔特·辛普森，坐在一架斯特林型轰炸机用普列克斯玻璃注制造的回转炮塔里，注视着拖在后面的霍萨型滑翔机。突然，"滑翔机似乎就要在中间裂开，那个样子就好像，尾部与前部脱离了"。辛普森吓坏了，于是朝机长喊道："上帝啊，滑翔机断开了！"牵引绳断了，滑翔机的前部沉了下去，就像"一块石头一样落地"。斯特林型轰炸机离开了飞行编队，逐渐降低高度，返回去确定飞机残骸的位置。飞机的前半部分在一块地里被发现了，尾部无处可寻。在标明了地点以后，机组人员返回基维尔基地，由吉普车带着来到失事的地方。在那里，辛普森看见，那个样子"似乎就是一个被践踏了的火柴盒"。士兵们的尸体还在里面。辛普森无法估计那里有多少个死人——— "只是一堆胳膊、腿和身子"。

等最后一个系列到达英国海岸的时候———北边的飞行纵队越过了在奥尔德堡上空的飞行检查点，南边的飞行纵队飞过了布拉德韦尔湾———有30架运载兵员和装备的滑翔机落了下来。拖航飞机的发动机故障、折断了的牵引绳以及在某些地方的浓雾，造成了这些飞行夭折。按照军事标准，这个行动的开始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伤亡轻微，而且落下来的士兵以及落下来的大多数货物将在以后的空运中乘飞机到达，但尽管如此，损失无可置疑会带来伤害。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日子，每一个人、每一件装备，对厄克特将军来说都是重要的，可是在这一天，他的23架滑翔机所装载的人和货物失去了。等到前往阿纳姆的部队到达其空投场和着陆区域的时候，指挥官们才发现，这些损失是多么至关重要。

现在，当这个长长的空中列车蜂拥着飞过英吉利海峡，把陆地落在后面的时候，一种新的期待开始弥漫这个庞大机群。那种"星期日郊游"的情绪在迅速消失。当一个个美国系列飞过海滨胜地马盖特注的时候，第一○一空降师的列兵梅尔文·艾斯尼克夫看见，右边就是多佛尔的白色悬崖。从这个距离来看，那些白色悬崖就像他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家乡附近的阿迪朗达克山脉的灰白色山腰。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下士D·托马斯，从飞机的一扇敞开的门朝外凝望着，一直到他的祖国的海岸线消失，这时他发现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从马奇镇和哈特菲尔德镇的集结出发点，空降纵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导航设施的帮助：雷达信标、特殊的有罩灯光以及无线电测向信号。现在，北海舰船上的灯塔开始为飞机导航。另外，成群结队的工作艇———北部路

线有17艘，南边的飞行路线有10艘———在水面上伸展了开来。在一架牵引着一架4吨重的霍萨型滑翔机的飞机里，空军上士威廉·汤普森坐在操纵装置前，在他看来，“用不着怎么导航。我们下面的那些工作艇所展示的样子，就像横跨海峡的踏脚石一般”。但这些迅速移动的海军舰艇所做的事情，远非仅是帮助指示方向，他们是一个巨大的海空救援行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已经忙碌了起来。

在越过北海的30分钟行程中，人们看到，有一些滑翔机在灰色的海水里上下颠簸，这时，水陆两栖飞机在低空盘旋，把它们的位置标明出来，一直到救援艇到达这个地点。搜集情况的鬼怪式联络部队的内维尔·海中尉，“完全超脱地”注视着，“两架滑翔机坠落了，还有一架在做水上迫降”。他拍了拍他的下士的肩膀。“朝下面看，霍布柯克，”海喊道。那位下士朝下瞥了一眼，海记得，“我几乎能够看得见，他的脸色发青了。”海迅速安慰那个人道：“没有什么要担心的。看，那些船已经把他们打捞出来了。”

上士约瑟夫·基奇纳驾驶着一架滑翔机，他也同样被海空救援艇的速度所深深感染。他发现有一架滑翔机在漂浮，而那艘救援艇已经赶到旁边。“他们是如此迅速地把人们打捞出来，我甚至认为他们连脚都没有湿。”他回忆道。上士西里尔·莱恩驾驶的一架滑翔机里面的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不过却幸运能够活着。莱恩注意到，在摇摆着的黑色霍萨型滑翔机所组成的空中列车中，有一架滑翔机缓慢地脱离了位置。他被迷住了，注视着那架霍萨型滑翔机摆脱出来，几乎是从容地朝海上下降。当它击中海水的时候，一圈白色的泡沫出现了。他不知道“那些可怜的家伙是谁”。这时，牵引着滑翔机的那架斯特林型轰炸机上的右舷螺旋桨慢了下来，之后停下了。当飞机的速度降低的时候，莱恩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境地，要飞到为自己的飞机拖航的那架飞机的前面”。他立即松开了牵引绳，他的副驾驶大声喊道：“作好准备，水上迫降！”他们能够听见，在后面的座舱里，步枪的枪托撞击着滑翔机的胶合板机身，那是那些发狂似的乘客们在试图打开一个逃生的通道。莱恩迅速降低高度，回头一看，吓坏了，只见那些绝望的伞兵们“已经在滑翔机的顶部打开了一个洞，两侧正开始折断”。莱恩惊呼道：“别这么干！系好安全带！”然后，随着沉重的砰的一声，滑翔机碰撞上水面。当莱恩浮出水面的时候，他看见飞机残骸在大约30英尺以外的地方漂浮。座舱一点影子也没有，不过他的每一位乘客倒都有了交代。没出几分钟，所有的人都被捞了起来。

在这个第一次空运中总共有[注]架滑翔机做了水上迫降；它们一落水，海空救援部队便以精彩的表现，救出了几乎所有的机组人员和乘客。然而，又是厄克特的部队被削弱了———在那8架滑翔机当中，有5架是飞往阿纳姆的。

在飞越海峡的过程中，敌人除了对一架落水的滑翔机做了一些长距离的、不精确的炮击之外，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第一○一空降师走的是南部路线，那将使该师飞过盟军占领的比利时，这个师的飞行几乎完美。但当荷兰的海岸线出现在远方的时候，北部纵队中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军的伞兵们，开始看到那种使人感到不祥的、能说明问题的、一阵阵灰色和黑色的高射炮火的烟雾———那是德国的防空炮火。当他们在只有1500英尺的高度继续飞行的时候，从荷兰海岸线外的瓦尔赫伦岛、北贝弗兰岛和斯豪文岛所发射的敌人炮火，已是清晰可见，斯海尔德河河口的防空军舰和驳船上的炮火也是清晰可见。

护航的战斗机开始脱离编队，与火炮阵地交火。在飞机里人们能够听见，力道已尽的炮弹碎片碰撞着C－47型飞机的金属侧面。第八十二空降师有战争经验的列兵利奥·哈特，听见一名新兵问道："这些凹背单人坐椅是不是防弹？"哈特只是怒视了他一下，这些轻金属做的椅子连一块用力扔出的石头都挡不住。在另外一架C－47型飞机上，列兵哈罗德·布罗克利记得，有一名补充兵员在纳闷："喂，下面的那些黑色和灰色的烟雾是什么？"在谁也没有来得及回答之前，一块弹片穿透了飞机的底部，砰的一声击在了一个野战炊具上，但并没有把炊具打坏。

有战争经验的伞兵们用不同的方式掩盖他们的恐惧。上士保罗·纽南看见，"那种高尔夫球似的熟悉的红色曳光弹正迂回向我们飞来"，于是就假装打盹儿。曳光弹差一点就击中了列兵肯尼斯·特鲁阿克斯的飞机。"谁也没有说话，"他回忆道，"只有一两个勉强的微笑。"中士比尔·塔克曾在诺曼底经历过防空炮火，他老是"恐惧会从下面被击中"。他感到，如果坐在三件空军的防弹衣上，就"不会那么毫无防御能力"。列兵鲁道夫·科思记得，他感到"就像坐在我自己的钢盔上一样，不过我知道我需要把它戴在头上"。

有一个人更关切来自内部的危险而不是外部的危险。副驾驶员比尔·奥克斯中士，尽力要使他的霍萨型滑翔机在空中飞行平稳，他回过头来看他的乘客们的状况如何。令他感到恐怖的是，有三个伞兵正"平静地坐在地板上，在一个小厨灶上用军用饭盒煮茶。另外五个人正站在四周，拿着缸子等待把茶水倒进去"。这促使奥克斯采取行动。他把飞机操纵杆交给正驾驶，匆匆向机尾走去，心想滑翔机的胶合板地板随时都会着火。"或者，甚至更糟糕的是，我们装载在拖车里面的迫击炮炮弹可能会爆炸。那个小小的野战炉传出来的热是可怕的。"他怒不可遏。"我们只不过是稍微煮一下。"一名伞兵安慰地告诉他。奥克斯匆匆返回到飞行员座舱，把事情向正驾驶伯特·沃特金斯上士作了汇报。正驾驶微笑了。"告诉他们，茶煮好的时候别忘了我们。"奥克斯一屁股坐进他的座位上，把头埋进手里。

尽管护航战斗机让大多数海岸高射炮阵地安静下来，但一些飞机被毁坏，

一架拖航飞机和它所牵引的滑翔机，以及一架运送兵员的C－47型轰炸机，在斯豪文岛的上空被击落了。那架拖航飞机强行着陆，结果机组人员全部阵亡。那架滑翔机，是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韦科型滑翔机，在半空中粉碎了，而在附近的英军纵队中飞行的丹尼斯·芒福德少校，可能看见了这个景象。当那架韦科型滑翔机解体的时候，他吓呆了，只见“人和装备从飞机上洒落出来，就像玩具从圣诞彩包爆竹8中洒落出来一样”。其他人看见，那架运送兵员的C－47型轰炸机坠毁了，装在飞机下面成捆的装备，被曳光弹点着了。“黄色和红色的飘带似的火焰在黑色的烟雾中出现。”阿瑟·弗格森上尉回忆道，当时他正在附近的一架飞机上。没出几分钟时间，那架C－47型轰炸机就熊熊燃烧起来。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站在他的飞机门里面，注视着伞兵从被击中的飞机上跳伞。“当我们的人在使用伪装的降落伞时，我能够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清点他们，并且看到他们全都安全地逃脱了。”

尽管那架飞机被火焰吞没，但飞行员却想方设法使飞机保持平稳，一直到伞兵们开始跳伞。然后卡迈克尔看见，又有一个人离开了飞机。“陆军航空兵团使用的是白色的降落伞，所以我认为，他一定是机长。”他是最后一位离开的。几乎是立即，那架熊熊燃烧的飞机就俯冲下去，全速冲进了斯豪文岛的一个洪水泛滥地区。卡迈克尔记得，“在碰撞的时候，一个白色的降落伞在飞机的前面鼓扬了起来，大概是被坠毁的力弹出来的。”对詹姆斯·梅加拉斯中尉来说，那架坠毁的C－47型轰炸机的景象具有一种“可怕的效果”。梅加拉斯是他飞机上指挥跳伞的军官，原先曾告诉他的部下，他将“在到达空投场的5分钟之前”，下令“起立，钩上挂钩”。现在，他立即下达了这个命令。在许多别的飞机里，指挥跳伞的军官做出了与梅加拉斯同样的反应。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参加战役了———而且，事实上，对空降部队而言，到达空投场和着陆区域，现在不过是30到40分钟以后的事情。

2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夜间普遍遭到了轰炸，现在又有了针对阿纳姆、奈梅亨和艾因霍温的空袭，但德国人却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整个指挥系统，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威胁上：英军第二集团军，将从其在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上的桥头阵地再次发起攻势。

“指挥官们和部队、我本人，尤其是我的参谋班子，面对着困难，承担着过重的负担，过于焦虑，结果我们只想到有地面上的军事行动。”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回忆道。施图登特是德国杰出的空降专家，现在他的司令部

在弗尔特附近的一个村舍里，大致是艾因霍温西北21英里的地方，他正在司令部里做“官样文章———堆积如山的文件，那些文件甚至跟着我进入了战场”。施图登特走了出去，来到一个阳台，朝着那些轰炸机注视了几分钟，然后，并没有放在心上，又回去做他的书面工作。

瓦尔特·哈策尔中校，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的指挥官，现在他已经把他打算移交出去的装备，全都移交给了他的竞争对手、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的海因茨·哈梅尔将军。哈梅尔现在已经到了柏林，这是遵照比特里希的命令，而莫德尔又不知情。最后一批装载着哈策尔的“丧失能力的”装甲兵员运输车的平板车，准备由凌晨2点开的火车拉到德国。由于自诺曼底登陆以来一再受到轰炸，因而哈策尔“对飞机也就不怎么理会”。他认为，在荷兰上空的巨大轰炸机编队，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他和他富有战争经验的坦克手们知道：“轰炸机一天几次，向东飞往德国又返回，是家常便饭。我和我的部下由于不断遭到炮击和轰炸，已经变得麻木了。”埃贡·施卡尔卡少校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的首席医官，哈策尔与施卡尔卡一起，从位于贝克贝亨的司令部出发，前往霍恩德罗兵营，那是阿纳姆以北大约8英里的地方。在该师约有600名士兵的侦察营面前举行的一个仪式上，他将给营长保罗·格拉布讷上尉授予骑士十字勋章。授勋以后，将会有香槟酒和一顿特殊的午餐。

在位于杜廷赫姆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部里，威廉·比特里希中将也同样没把空袭放在心上。对他来说，“这是家常便饭”。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在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塔弗尔贝格旅馆里，注视着这些轰炸机编队有一些时间了。司令部里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飞行堡垒”注中队，是在夜间轰炸德国之后返回，而且别的飞行堡垒机群照常对德国进行永无休止的轰炸，他们正在向东飞行，前往别的目标。至于对当地的轰炸，轰炸机把没有使用的炸弹投弃在鲁尔河上，并且往往因此而投弃在荷兰本土，也并不是非同寻常的事情。莫德尔和他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相信，这些轰炸和低空扫射是“削弱敌人力量的作战行动”———是英军开始地面攻势的前奏。

对于荷兰上空愈演愈烈的空袭活动，有一个军官不是完全不放在心上。大约120英里以外，在位于科布伦茨附近阿里姆贝格的西线总司令的司令部里，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尽管他仍然相信，空降部队只是在对鲁尔河地区发动进攻的时候才会使用———却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在9月17日上午的报告附件第2227号中，他的作战部局长记录，冯·伦德施泰特要求莫德尔调查一下，是否有海军和空降部队正在对荷兰北部进行入侵的可能性。记录上写道：“总的形势，以及敌人侦察活动的值得注意的增加……使得西线总司令要再次调查军舰进攻和机降作战行动的可能性……调查的结果要报告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希特勒）。”

这个电报到达莫德尔司令部的时候，大致就是那个庞大机群的第一批飞机越海岸线的时候。

上午11点半，在阿纳姆上空，黑色的烟柱升到天空，烈火在整个城市燃烧，这是3个小时近乎饱和的轰炸所带来的后果。在沃尔夫黑策、奥斯特贝克、奈梅亨和艾因霍温，一座座建筑被整个夷为平地，街道被炸得坑坑洼洼，瓦砾和玻璃随处都是，伤亡每一分钟都在增加。甚至就是现在，低空飞行的战斗机也正在扫射各个地方的机枪和高射炮阵地。荷兰人或者是在教堂、家里、地下室和庇护所里挤作一团，或者鼓起鲁莽的勇气，在街上骑自行车或者从屋顶上张望，他们的情绪在恐惧和欢欣鼓舞之间交替。谁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在南边，距离奈梅亨83英里的地方，就是马斯特里赫特，它是第一个被解放的荷兰城市，美军第一集团军是9月14日入城的。许多荷兰人预料，美国步兵随时都会来到他们自己的城镇和村庄。从伦敦进行广播的橘子无线电台，在一个个忙乱的新闻快报中，加深了这种印象：“时间几乎到了。我们一直等待的事情终于就要发生了……由于盟军进军迅速……有可能部队还没有带荷兰钞票。如果我们的盟友拿出法国或者比利时钞票……望予以合作，在卖东西收款的时候接受这个钱……农民应该把庄稼收割完，把收成交出来……”伯恩哈德亲王在一次电台讲话中，敦促荷兰人：“当盟军解放荷兰领土的时候，不要用献花或者献水果来表示欢乐……过去，敌人曾在献给解放者的东西当中藏有炸弹。”大多数荷兰人头脑中最主要的想法，就是确信这些密集轰炸是盟军入侵的前奏———地面攻势的开始。就像他们的德国征服者一样，荷兰人对即将发生的空降进攻也一无所知。

扬·沃斯奎尔和伯莎·沃斯奎尔，正在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岳父家里躲避。他们夫妇认为，在他们地区里的轰炸目标，是塔弗尔贝格旅馆里莫德尔的司令部。沃斯奎尔记得，那个晴朗的日子“是完美的轰炸天气”。然而他却发现，难以“把正在到来的战争，与成熟的甜菜香味和成百棵向日葵的景象扯在一起，向日葵的梗被它们沉甸甸的头压弯了。似乎不可能出现人们死亡、房屋燃烧的可能性”。沃斯奎尔自己平静得奇怪。从他岳父家的前阳台，他注视着战斗机从头顶掠过，确信它们是要去低空扫射那个旅馆。突然，一个德国士兵出现在花园里，没有戴钢盔，也没有带步枪，只穿着衬衫和裤子，他客气地问道：“我可以在这里躲一躲吗？”沃斯奎尔盯着那个人。“为什么？”他问道，“你们有战壕啊。”那个德国人微笑了。“我知道，”他回答说，“不过战壕里面满了。”那个士兵走向前，来到阳台。“这是猛烈的轰炸，”他告诉沃斯奎尔，“不过我认为奥斯特贝克并不是目标。他们似乎更集中在村子的东边和西边。”

沃斯奎尔听见，屋子里有说话的声音。这个家庭的一个朋友刚刚从沃尔夫黑策地区赶来。她告诉他们，那里遭到了猛烈的轰炸，许多人死了。“恐

怕，”她颤抖着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沃斯奎尔看着那个德国人。“也许他们是因为莫德尔而轰炸塔弗尔贝格旅馆的。”他婉转地说道。那个德国人神情木然。“不，”他告诉沃斯奎尔，“我不这么认为。那里没有落下炸弹。”后来，那个士兵离开以后，沃斯奎尔出去调查伤亡的情况。谣传各种各样。他听说，阿纳姆遭到了猛烈的轰炸，沃尔夫黑策几乎被夷为平地了。他想，毫无疑问盟军正在行进，随时都会到达。他既欢欣鼓舞，又感到悲伤。他记得，在诺曼底进攻的过程中，位于诺曼底的康城就成了一片瓦砾。他确信，他和他的家人找到躲藏处的奥斯特贝克，将是一个变成废墟的村庄。

在沃尔夫黑策四周，树林里隐藏的德国人的弹药正在爆炸，那座著名的精神病院遭受了直接的打击。行政楼周围的4个分馆式病房被炸平了，45名病人死亡（之后死亡人数将增加到80人以上），还有更多人受了伤。60个吓坏了的住院者，大多是妇女，正在毗邻的树林里无目的地走动。由于停电，副院长马里乌斯·范·德贝克医生就无法召集别人帮忙。他不耐烦地等着医生们从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赶来，他知道他们一定会听到消息，也一定会来的。他需要尽可能快地与外科小组建起两个手术室。

其中的一位“住院者”，亨德里克·沃伊堡，实际上是在这家精神病院隐藏起来的地下组织成员。“当时，”他回忆说，“实际上德国人并没有在这家医院里面，尽管他们确实在附近有阵地，在树林里存放着大炮和弹药。”在轰炸的过程中，当军火存放处被击中的时候，正在一座楼的阳台上的沃伊堡被击倒在地板上。“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他记得。“从军火存放处飞来的炮弹嗖嗖地落进医院，杀死杀伤了许多人。”沃伊堡狼狈地站起来，在低空扫射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帮助护士们在草地上展开白床单，组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整个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在他看来，好像“这个地方将很快满地都是死人和濒临死亡的人”。

在阿纳姆，消防队拼命要把蔓延的火势控制下来。迪尔克·希丁克是一个由15个人组成的老式消防队的队长（他手下的人推着两辆大车，一辆装着卷好的水龙带，另一辆装着梯子），他接到命令，前往德国人占据的威廉斯兵营，该兵营遭受了低空飞行的蚊子型飞机的直接打击。尽管兵营在熊熊燃烧，但希丁克从阿纳姆消防队总部得到的指示却非同寻常：他被告知，让兵营烧掉，但要保护周围的房屋。当消防队到达的时候，希丁克看见，要拯救兵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火势太猛烈了！

从父亲在威廉广场28号的公寓套间里，格尔哈杜斯·吉斯伯斯看见，周围的一切都被烈火吞没了，不仅兵营在燃烧，而且附近的中学和中学对面的皇家餐厅也在燃烧。热气非常强烈，吉斯伯斯记得，“我们窗子上的玻璃突然波动起来，接着就完全融化了”。一家人立即从大楼里撤离，爬过砖瓦

木料来到广场。吉斯伯斯看见，德国人从兵营的爆炸瓦砾中跌跌撞撞走了出来，鼻子和耳朵里流着血。有轨电车司机亨德里克·卡雷尔来到威廉大街并不是出于故意。由于轰炸造成电力短路，卡雷尔的淡黄色有轨电车靠惯性滑行，稍微倾斜了一下，在广场上停了下来。在那里，他发现还有一堆有轨电车，那些电车同他的车一样，也是靠惯性滑行进入了广场，无法离开。透过烟雾、人群和瓦砾，卡雷尔看见，皇家餐厅的服务员们从燃烧的房屋里逃出来，服务员们顾不上管那几个朝大门跑去的就餐者，而自己直接从窗户跳了出来。

在位于阿纳姆大桥东南的市煤气厂里，技工尼古拉斯·翁克对投弹手的技巧感到钦佩。他朝莱茵河的对面望去，看见有12个防空阵地被摧毁了，只剩下一门炮，但炮管是扭曲的。现在城市没有了电，翁克也就面临着自己的问题———再也不能制造煤气了。那3个巨大的储气罐里剩余的燃料用完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除了煤和柴火之外，阿纳姆现在没有电，没有供暖，也没有做饭的燃料。

成千上万的人在堂里与外界隔绝。教堂司事扬·迈恩哈特记得，单是在那个巨大的荷兰归正会(注)大教堂里，就有1200人。“即使我们已经清楚地听见炸弹在外面爆炸，”他说，“约翰·格里森牧师大人也仍然平静地继续讲道。断电的时候，风琴停下了。会众当中有一个人走向前来，开始用手拉着风琴的风箱。”然后，在汽笛、爆炸和隆隆的飞机声中，风琴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全体会众站立起来，唱起荷兰国歌《威廉颂》。

一个加尔文教派的教堂位于阿纳姆火车站附近，抵抗组织成员盖伊斯伯特·纽曼在这里听多米尼·伯特讲道。纽曼感到，甚至这剧烈的轰炸也不足以威慑住德国人，使他们不敢把他们的威胁付诸现实，那威胁就是：为了对抵抗组织对高架铁路的进攻进行报复，他们将在这一天的某个时间，处决平民人质。当他听到多米尼·伯特有关“你的行为对上帝和你的同胞所负有的责任”的布道的时候，他的良心让他不安了，他决定，礼拜一结束，他就向德国人自首。离开教堂以后，纽曼走过杂物满地的街道，来到一个电话前，在那里，他给皮特·克鲁伊夫打了电话，把他的决定告诉了这位地区指挥官。克鲁伊夫直言不讳，而且十分果断。“拒绝，”他告诉纽曼，“继续你的工作。”不过克鲁伊夫的话不会成为最终的决定，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拯救那些人质。

在南边11英里外的奈梅亨，轰炸机以极高的精确性击中了德国人的防空阵地，结果只剩下一个阵地仍然在开炮。那个巨大的、高耸的PGEM发电站，为整个海尔德兰省(注)提供电力，它只受到皮毛的损坏，不过高压线断了，整个地区断了电。PGEM发电站附近的一个人造丝工厂受到严重损坏，成了一片火海。这个城市的许多房屋被直接击中了。炸弹落在一个女

子学校和一个大的天主教联谊中心上。在瓦尔河对岸的伦特村，一家工厂被摧毁，德军弹药存放处爆炸了。

在城市的空袭指挥部，工作人员点着蜡烛工作，他们被蜂拥而来的报告弄得越来越糊涂了。半黑暗中，阿尔贝图斯·乌尔扬伏案工作，给送来的报告登记，发现自己每过一分钟就多一分困惑。分布广泛的轰炸，并没有清楚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只不过在奈梅亨周边的所有德国阵地都遭到了进攻。进入城市的主要通道———瓦尔布鲁赫路、圣安那斯特拉特路、格鲁斯贝克路———现在被封闭了。看来是要努力把这座城市孤立起来。

就像在阿纳姆一样，奈梅亨的大多数人也在躲避那些正继续低空扫射街道的战斗机，但住在离瓦尔河大桥不远的伊莱亚斯·布罗克坎普却爬上了屋顶，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让布罗克坎普吃惊的是，德国人的市长办公室的人员也爬上了屋顶，市长办公室与布罗克坎普的家隔着5幢房子。布罗克坎普记得，那些德国人“显得非常焦虑。我明显是高兴极了。我甚至说，天气好极了”。

护士约翰娜·布雷曼看到，在飞机低空扫射过程中，德国人惊慌失措。从瓦尔河大桥南边的一幢公寓大楼二层楼的窗户上，布雷曼护士朝下看，只见“德军伤兵互相搀扶着往前走。有一些伤兵瘸得相当厉害，我可以看到，许多人扎着绷带。他们的紧身短上衣是敞开的，大多数人甚至都懒得戴上钢盔。紧随其后的是德国步兵。当他们朝大桥走去的时候，一看见有荷兰人从窗户朝外窥视，便朝窗户开枪”。当这些德国人来到大桥通道时，就马上开始挖掘散兵坑。“他们到处挖，”布雷曼小姐记得，“在通往大桥的街道旁边挖，在附近长满草的地方和树下面挖。我确信，进攻开始了，我记得，我当时想，‘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个多么美丽的作战景象啊。’我有着一种期待的感觉。”布雷曼小姐当时的期待，并没有包括几个月之后她的婚姻———几个月之后，她将嫁给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军士长查尔斯·梅森，而现在，梅森将乘坐第13号滑翔机，在她的公寓套间西南2英里的格鲁斯贝克高地着陆。

在市场花园行动主要出击目标边缘上的一些城镇和村庄，蒙受了同主要目标一样严重的毁坏，而救援服务，即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在艾因霍温西边大致5英里处没有教堂的小村子策尔斯特附近，热拉尔杜·德维特躲在一块甜菜地里，并没有听见空袭警报。他看见高空中有飞机，突然间炸弹就像雨点般落了下来。德维特正要去拜访费尔德霍芬村的兄弟，费尔德霍芬村在南边4英里处，现在，他转过身来离开马路，一头钻进田边的一个沟里。此时此刻，他发疯似的急于回到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11个儿女身边。

尽管飞机在低空扫射，但德维特还是决定冒险回去。他抬起头来，朝田地

对面望去，看见“甚至树叶也烧焦了”。他把他的自行车留在后面，从沟里爬出来，跑过那片开阔地。当靠近村子的时候，他注意到，本来应该落在艾因霍温城外韦尔斯哈普机场的炸弹，却直接落在小小的策尔斯特村上了。德维特能看到的只是废墟。有几幢房屋在燃烧，还有些房屋倒塌了，人们四下站着，神情茫然，哭泣着。德维特所认识的范·海尔蒙特太太是一位寡妇，她认出了他，于是求他与她一起，用一块床单盖住一个死去的男孩。她满脸泪水，解释说她无法自己做。这个孩子的头被削掉了，但德维特还是认出，这是邻居的儿子的尸体。他迅速盖住了尸体。“我什么也不再看了，”他记得，“我只是试图尽可能快地回家。”当他接近自己家的时候，住在对面的一个邻居试图把他留住。“我的血都快要流干了，”那个人大声说道，“我被炮弹碎片击中了。”

这时，德维特看见他的妻子阿德里安娜，正站在街上哭。她朝他跑去。“我以为你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告诉他，“快来。我们的蒂尼被炸到了。”德维特从受伤的邻居身边走了过去。“除了我的儿子我什么也不想。当我走到我儿子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他右边的身子被炸开了，右腿几乎被炸掉。他仍然完全清醒，要水喝。他的右臂已经不见了。他问我他的右臂怎么样了，我为了安慰他，便说‘你正躺在你的右臂上面。’”当德维特在孩子身边跪下来时，一个医生到了。他告诉我，不要再抱任何希望，德维特记得，“因为我们的儿子要死了”。德维特把孩子抱在怀里，朝杜克·乔治雪茄厂走去，那里建了一个红十字站。但在他到达工厂之前，他14岁的儿子就在他的怀里死去了。

在这片恐怖、混乱和希望之中，没有几个荷兰人看见盟军空降部队的先头部队。大约中午12点40分，12架英军斯特林型轰炸机飞到阿纳姆地区的上空。中午12点47分，4架美军C－47型飞机在艾因霍温以北的荒野上空出现，而另外两架则在奈梅亨西南的旷野上空飞过，那片旷野靠近上拉瑟尔特镇。飞机里是英军和美军的伞降信号员。

扬·彭宁斯的农场毗邻伦库姆荒原，距离沃尔夫黑策不到2英里，他在返回农场的时候，看见飞机从西边飞来，而且是低空飞行。他以为他们是回来轰炸铁路线的，于是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准备如果飞机扔炸弹的话，他就钻进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当飞机来到伦库姆荒原的上空时，感到愕然的彭宁斯看见：“一个个包裹落了下来，接着伞兵出现了。我知道，在诺曼底盟军就使用了伞兵，我确信，这就是我们进攻的开始。”

几分钟以后，扬骑着自行车来到他的农场，朝他的妻子喊道：“出来呀！我们自由了！”然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伞兵走进了他的农家宅院。彭宁斯既茫然又敬畏，与他们握了手。他们告诉他，不出半个小时，“我们将还有几百个人来到”。

汽车司机扬·佩伦也看见伞降信号员在伦库姆荒原着陆。他回忆说："他们几乎是无声地落了下来。他们纪律严明，立即开始在荒原上钉木桩。"就像在铁路线北边的别的伞降信号员一样，他们正在标明着陆区域和空投场。

南边15英里处，在上拉瑟尔特镇附近，19岁的特奥多鲁斯·罗洛夫斯在躲避德国人的时候，突然被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伞降信号员解放了，那些伞降信号员是在他家农场附近着陆的。他记得，那些美国人是"侦察兵，我非常害怕这几位勇士会轻易被干掉"。那些伞降信号员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发现这个年轻的荷兰人会说英语，便迅速招募了罗洛夫斯，让他当向导和翻译。罗洛夫斯确认了他们地图上的阵地，便给他们指路，来到选定的着陆地点。罗洛夫斯着迷地注视着那些伞兵用"彩条和烟火炉"给这个地区标明位置。没出3分钟，一个镶在黄色镶板上的"O"形字和蓝紫色的烟，就给这个地区清晰地标出了轮廓。

那4架运送第一○一师伞降信号员前往艾因霍温以北区域的C－47型飞机，遭遇到了猛烈的防空炮火。一架飞机在烈火中被击落了，只有4位幸存者。另外3架飞机继续飞行，伞降信号员们在第一○一师的两个区域精确地进行了伞投。到中午12点54分，市场花园行动整个地区的空投场和着陆区域都被确定和标明出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国人还是没有发出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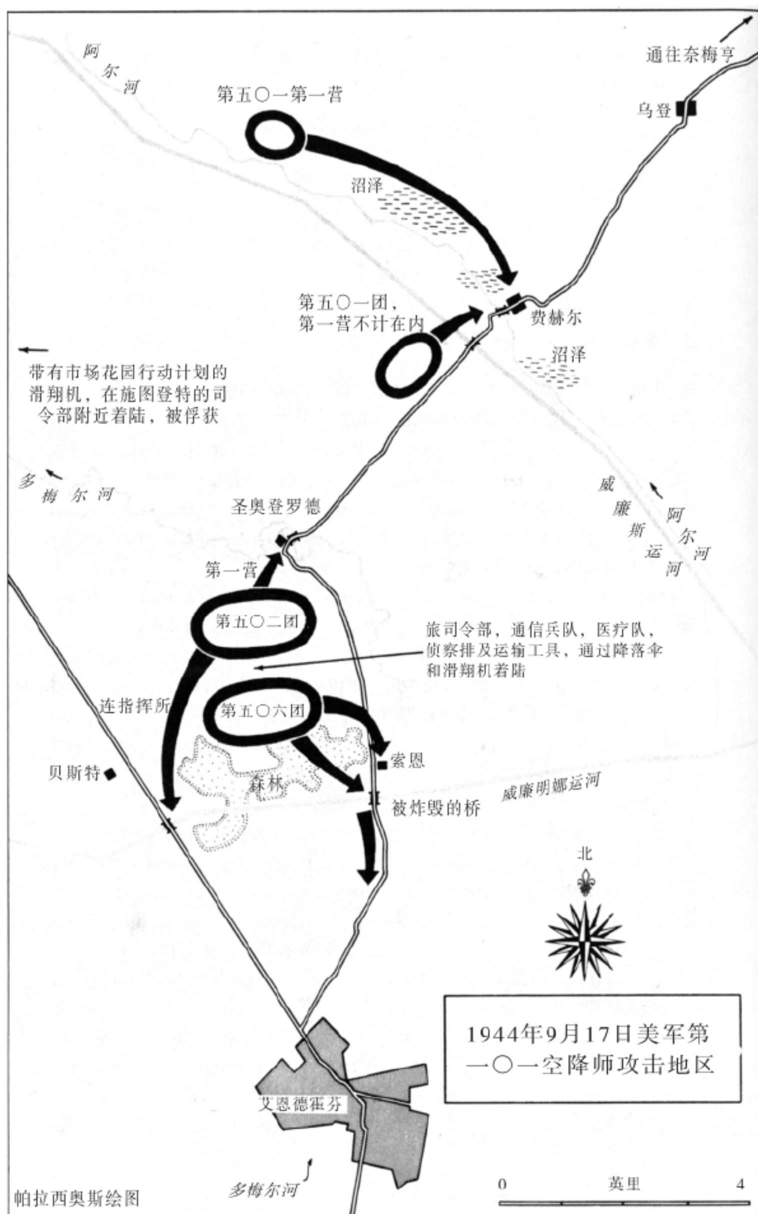
在霍恩德罗兵营，霍亨施陶芬师的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中校，为刚刚被授勋的保罗·格拉布讷上尉祝酒。几分钟以前，哈策尔看见有几个降落伞落在阿纳姆以西的地方。但他并不感到吃惊，他认为，那是跳伞逃脱的轰炸机机组成员。在奥斯特贝克，塔弗尔贝格旅馆，陆军元帅莫德尔正在喝午餐前的开胃酒——一杯冰过的摩泽尔白葡萄酒，与他一起喝酒的是他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作战处军官汉斯·冯·滕珀尔霍夫上校，以及司令部的副官莱昂德加德·弗莱贝格上校。行政军官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记得："每当陆军元帅待在司令部时，都是过分地准时。我们总是在13点整的时候下来吃午餐。"而这正是市场行动部队的进攻发起时刻。

3

★ ★ ★

现在，运载着第一○一空降师的C－47型飞机的巨大行列，排成紧密的编队，隆隆地飞过盟军占领的比利时。在布鲁塞尔以北大约25英里处，机群向北拐，朝荷兰边界飞去。这时，飞机里的人朝下面看，第一次看见了他们的地面友军，也就是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他们的地面进攻将与空中袭

击同步进行。这是一个壮观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景象。霍罗克斯将军第三十军数量巨大的装备，覆盖了每一块田野、小径和马路。集结起来的坦克纵队、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和运兵车，以及一行又一行的火炮，摆开了架势，为突击做好了准备。在坦克天线上，三角旗迎风飘扬，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站在车辆上面，拥挤在田野里，向天上的空降部队挥手。摇曳升空的橘黄色的烟，为英军的前线标明了位置，对面就是敌人。



战斗轰炸机飞速掠过地面，在前面带路，前往空投场，试图把飞机编队面前的一切都清理干净。空降进攻之前，密集轰炸已经把许多防空炮台夷为平地，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伪装网突然掀开，把隐藏的敌人阵地显露出来。有些人记得，他们看见，大干草堆的顶部敞开了，露出了掩体内口径

为88毫米和20毫米的大炮。尽管战斗轰炸机的进攻可谓彻底，但要使敌人的抵抗安静下来却是不可能的。在艾因霍温以北，距离他们的空投场不过7英里远的地方，第一○一空降师就遭到了猛烈的高射炮火。

一等兵约翰·西波拉正在打盹，突然“高射炮的刺耳爆炸声，以及弹片撕裂我们的飞机的声音”，把他惊醒了。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西波拉也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因而几乎无法移动。除了步枪、背包、雨衣和毯子之外，他的肩膀上还挂着子弹带，口袋里全都是手榴弹、配给的口粮，还有他的主降落伞外加备用降落伞。除此之外，在他的飞机里，每一个人还带着一颗地雷。他回忆说：“我们左翼的一架C－47型飞机突然着火，然后又有一架着火，我心中想，‘天啊，我们是下一架了！我怎么才能从这架飞机里出来呢！’”

他的C－47型飞机在剧烈震动，似乎每一个人都同时叫喊起来：“让我们出去！我们被击中了！”指挥跳伞的军官命令：“起立，钩住。”然后他平静地开始检查装备。西波拉能够听见士兵们喊道：“一号好了。二号好了。三号好了……”西波拉是即将连续跳下的一组伞兵中的最后一位，等到他能够喊“二十一号好了”的时候，似乎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然后绿灯亮了，士兵们赶紧跳了出来，徐徐降落，降落伞在他们的上面像鲜花盛开。西波拉朝上望去，看他降落伞的伞衣状况如何，结果看见，他刚刚离开的那架C－47型飞机开始熊熊燃烧。他一直注视着那架飞机在烈火中坠落。

尽管爆炸的炮弹包围了飞机，但飞机编队并没有犹豫不决。空军第九运输兵团的飞行员们保持着他们的航向，没有偏离。少尉罗伯特·奥康奈尔记得，他的编队飞行得非常密集，使得“我以为，我们的飞行员就要把机翼伸进在左边飞行的飞行员的耳朵里去”。奥康奈尔的飞机着火了，红色的跳伞预警灯亮了，“过道里烟雾弥漫，以至于我都无法向后看到我操纵杆的顶部”。士兵们咳嗽起来，叫嚷着要出去。奥康奈尔“用背抵着门，把他们挡回去”。飞行员平稳地向前飞行，没有采取任何规避动作，奥康奈尔看到，飞行编队正在逐渐降低高度，减慢速度，为跳伞做好准备。奥康奈尔希望，“如果飞行员认为飞机就要坠落，他会及时给我们打开绿色信号灯，让士兵们出去”。那位飞行员平静地驾驶着他着火的飞机，飞行在正确的航向上，一直来到空投场的上方。然后绿色信号灯亮了，奥康奈尔和他的士兵们安全地跳了伞。奥康奈尔后来得知，那架飞机强行着陆，结果损毁了，但机组人员幸存了下来。

运送部队的飞行员们全然不顾自身的安危，驾驶着飞机穿过高射炮火，来到空投场的上空。“不要为我担心，”一架燃烧着的C－47型飞机的飞行员、少尉赫伯特·E·舒尔曼，用无线电对他的飞行指挥官说。“我将在空投场的上空把这些士兵空投下来。”他确实在空投场的上空把士兵们空投了下来。伞兵们安全地离开了飞机。几分钟以后，这架飞机在熊熊烈火中坠

毁。上士查尔斯·A·米切尔震惊地注视着，飞他左边的那架飞机正从左舷发动机喷出火焰来。米切尔看见，当那位飞行员在航向上持续飞行的时候，整个一组伞兵连续从烈火当中跳了下来。

悲剧并没有在那里停止。一等兵保罗·约翰逊的位置在飞机的前部，就在驾驶员座舱的旁边，这时飞机正好在中间被击中，两个油箱都着了火。在飞机上的16名伞兵、驾驶员和副驾驶当中，只有约翰逊和另外两名伞兵跳了出来。他们不得不从飞机里的死人身上爬过去，这样才得以跳伞。每一位幸存者都被严重烧伤，约翰逊的头发完全被烧掉了。这三个人落在了德国人的一个坦克野营地区。在一个壕沟里击退了敌人，坚守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们全都负了伤，接着被制伏，当了俘虏。

另外一架飞机，正当绿灯亮的时候，站在门口的那位领跳伞兵被打死了。他朝后一仰，倒在下士约翰·奥尔托梅尔的身上。他的尸体被迅速搬到一边，小组的其他人跳了伞。而当另外一组连续跳下的伞兵飘落到地上的时候，一架失控的C－47型飞机撞上了其中的两人，飞机的螺旋桨把他们切成了碎片。

甚至在接近空投场的可怕时刻，这些美国人也一如既往找到了幽默。就在塞西尔·李上尉站起来要把降落伞钩住的时候，飞机被击中了，弹片在他刚刚离开的座位上撕开了一个口子。旁边，一个伞兵喊了一句让人恶心的话：“好了，他们给了我们一个茅坑！”在另外一架飞机里，少尉安东尼·博雷利确信他瘫痪了。绿灯亮了，每一个人都把降落伞钩住了———只有博雷利除外，他动不了。博雷利当上军官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是执行他的第一次作战任务，并在连续跳下的一组伞兵当中排在第一号，他意识到，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令他尴尬的是，他把皮带钩在座位上了。列兵罗伯特·博伊斯不顾师部牙科医生的好意，还是登上了行程，本来由于他的牙病，师部牙科医生用“免于参战”把他一笔勾销。博伊斯是一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在连长的干预下，他获准参战了。除了一颗牙齿出了毛病之外，他还有别的担忧。伞兵有几种新的创新———机关枪腿上有降落伞包、某些降落伞上有能迅速解开的吊带，以及作战靴而不是跳伞靴———这都使得他和别的许多人神经紧张。尤其是，伞兵们担心，他们的吊伞索会钩住他们新作战靴上的搭扣。当飞机在临近目的地的地方低空飞行的时候，博伊斯看见下面的荷兰平民向上伸着两个手指头，以表示胜利的V字形打招呼。这就是博伊斯需要的一切。“嘿，瞧，”他朝别的人喊道，“他们伸出两个手指头，说明我们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各占百分之五十。”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能够到达空投场的可能性，似乎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第五○六团的团长罗伯特·F·辛克上校看见，“巨大的高射炮火正前来迎接我们”。当他朝门外望的时候，飞机猛烈地震动起来，辛克看见，机翼的一部分折断了，悬吊着。他转向那组要连续跳下的伞兵，说道：“是啊，机

翼断了。”令他感到宽慰的是，“似乎谁也没有对此多想。他们可能估计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到达空投场了。”

在第2号飞机，辛克的主任参谋查尔斯·蔡斯中校看见，他们的左翼着火了。托马斯·马尔维上尉记得，蔡斯盯着看了一分钟，然后婉转地说道：“我猜他们撵上我们了。我们最好还是走吧。”当绿灯在两架飞机里亮起来的时候，伞兵们安全地跳了伞。蔡斯乘坐的那架飞机在地上燃烧起来。辛克的那架飞机，人们认为它带着被损坏的机翼，安全地返航回到了英格兰。

类似的猛烈高射炮火包围了第五○二团的机群，两个空军大队的飞机几乎相撞。有一个机群略微偏离了航向，进入了第二个机群的航路，使得第二个机群爬高，结果这批伞兵跳伞的高度比原计划高了一些。在一个机群的领先飞机中，有师长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以及第五○二团第一营的营长帕特里克·卡西迪中校。卡西迪站在门口，看见空军大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起火。他数了一下，只有7个降落伞落了下来。然后，左边另外一架C－47型飞机也燃烧起来，但所有的伞兵都从那架飞机跳了出来。卡西迪被这架熊熊燃烧的飞机迷住了，竟没有看见绿灯已亮。泰勒将军正站在他的身后，轻声说道：“卡西迪，灯亮了。”卡西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的，长官。我知道。”然后跳了伞。泰勒紧跟着他跳了伞。

在泰勒将军看来，第一○一师的跳伞是“非同寻常的成功，几乎就像一场演习”。在最初计划的时候，泰勒的参谋班子预计伤亡将高达百分之三十。在从英格兰登机的6695名伞兵当中，实际跳伞的有6669人。尽管高射炮火猛烈，但C－47型飞机以及战斗机飞行员的勇敢，却给了第一○一师一个几乎完美的跳伞。虽然有一些部队是在空投场以北1到3英里的地方空投的，但他们的着陆地点非常靠近，因而得以迅速集结。只有两架飞机没有到达空投场，而空军第九运输兵团凭着他们的英勇决心，冲锋在前，不顾一切伤亡，把伞兵们送到他们的目的地。在运送第一○一师的424架C－47型飞机当中，每4架就有1架受到了损坏，有16架被击落，机组人员阵亡。

滑翔机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后来，当这些机群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原先的70架滑翔机，只有53架顺利到达索恩附近的着陆区域。尽管有的滑翔机未能飞完全程，尽管敌人的高射炮火猛烈，尽管有的强行着陆，但这些滑翔机最终还是把它们所运送的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人，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吉普车和拖车，送到了目的地。[注]现在，泰勒的“尖叫的老鹰”开始朝他们的出击目标前进———那就是英军地面部队前面的，那个延伸15英里的极其重要的走廊上面的那些桥梁和渡口。

★ ★ ★

在弗尔特附近，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和他的参谋长赖因哈德上校，站在将军居住的那个村舍的阳台上，“纯粹是目瞪口呆，就像傻子一样”。施图登特清楚地记得：“不论我们朝哪里望去，都能看见排列成行的飞机———战斗机、兵员运输机和货运飞机———在我们的上空飞过。我们爬上屋顶，想更好地了解一下，这些部队究竟要到哪里去。”密密麻麻的飞机似乎是飞往格拉夫和奈梅亨的方向，而且在南边不过几英里的地方艾因霍温和索恩附近，他能够清楚地看见兵员运输机———一架又一架的飞机飞了进来，并空投伞兵和装备。有些飞机飞得非常之低，使得施图登特和赖因哈德本能地迅速低下头。“在司令部的庭院里，我们的文书、军需官、司机和通信兵们都来到空地上，用各种各样的武器射击。照例，我们自己的战斗机连影子也没有。”施图登特彻底被难倒了。“我说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说不出这些空降部队在向哪里去。在这些时刻，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位置的危险。”施图登特这位伞兵专家，对此既极为敬佩又极为妒忌。“这个雄伟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既反思又渴望我们自己能够进行空降行动，我对赖因哈德说：‘噢，但愿能够有这样的手段由我来使用。只一次，拥有这么多的飞机！’”赖因哈德想的完全是眼前的事情。“将军先生，”他告诉施图登特，“我们得采取对策！”他们离开屋顶，回到施图登特的办公室。

仅仅是头一天晚上，在他的日常报告中，施图登特就已经警告说：“马斯河—斯海尔德河运河南边繁忙运行的车辆表明，进攻即将发生。”问题在于：进攻已经开始了吗？如果是已经开始的话，那么这些空降部队的目标就是艾因霍温、格拉夫和奈梅亨周围的桥梁。所有的桥墩都准备好了要拆除，并由特别的工兵部队和保安小分队把守。每一个渡口都安排了一个桥梁指挥官，严格命令他们一旦发生进攻就炸桥。“盟军的明显动向，”施图登特想到，“就是在这个形势中使用空降部队，在我们能够炸桥之前把这些桥梁夺取下来。”此时此刻，施图登特甚至并没有想到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的重要性。“给我接莫德尔！”他告诉赖因哈德。

赖因哈德抓起电话，却发现电话线断了。司令部已经与外界断了联系。

大约37英里之外的奥斯特贝克，在塔弗尔贝格旅馆里，莫德尔的行政官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发火了。“你昨天晚上的觉还没有醒吗？”他冲着一台野战电话机喊道。军士尤平格尔是那个有250个人的连队当中的一位，该连系由赛德尔豪泽尔指挥，被安排来保护莫德尔。尤平格尔重复了他说过的话。在沃尔夫黑策“滑翔机正在我们的腿上着陆”！他坚持道。赛德尔豪泽尔摔掉电话，冲进作战室，在那里把这个信息向一位吃惊的中校做了汇报。他们一起匆匆赶到餐厅，莫德尔和他的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正在那里吃午饭。“我刚得到消息，滑翔机正在沃尔夫黑策着陆。”那位校官

说道。作战处处长滕珀尔霍夫上校瞪着眼睛发愣：克雷布斯的单片眼镜掉了下来。“唔，我们正等着它呢。”滕珀尔霍夫说道。

莫德尔跳了起来，匆匆下达了一些命令，要司令部撤离。当他走出餐厅收拾自己的东西时，朝身后喊道：“他们是要找我和这个司令部！”几分钟以后，莫德尔只拿着一个小箱子，冲出了塔弗尔贝格旅馆的大门。在人行道上，他的箱子掉在地上，箱子蓦地打开了，把他的内衣裤和梳洗用具掉了出来。

赛德尔豪泽尔看到，克雷布斯急匆匆地跟着莫德尔来到外边，结果“他甚至都忘记戴帽子、带手枪和扎皮带了”。滕珀尔霍夫甚至都没有时间取下作战室的作战地图。司令部的副官弗莱贝格上校也是同样行色匆匆，当他从赛德尔豪泽尔身边走过的时候，喊道：“别忘了带上我的雪茄。”在汽车里，莫德尔对他的司机弗罗姆贝克说：“快！去杜廷赫姆！比特里希的司令部！”

赛德尔豪泽尔一直等到汽车驶去，才回到旅馆。在作战室里，他看见，作战地图仍然摆在桌子上，上面标明了从荷兰一直到瑞士的阵地。他把地图卷起来，随身带走，然后命令哈滕施泰因旅馆和塔弗尔贝格旅馆里面的人立即撤离。他说道，所有的交通工具，“每一辆小汽车、卡车和摩托车，都要立即离开”。在动身前往杜廷赫姆之前，他所收到的最后一个报告就是，英国人离这里不到两英里了。慌乱之中，他全然忘掉了弗莱贝格的雪茄一事。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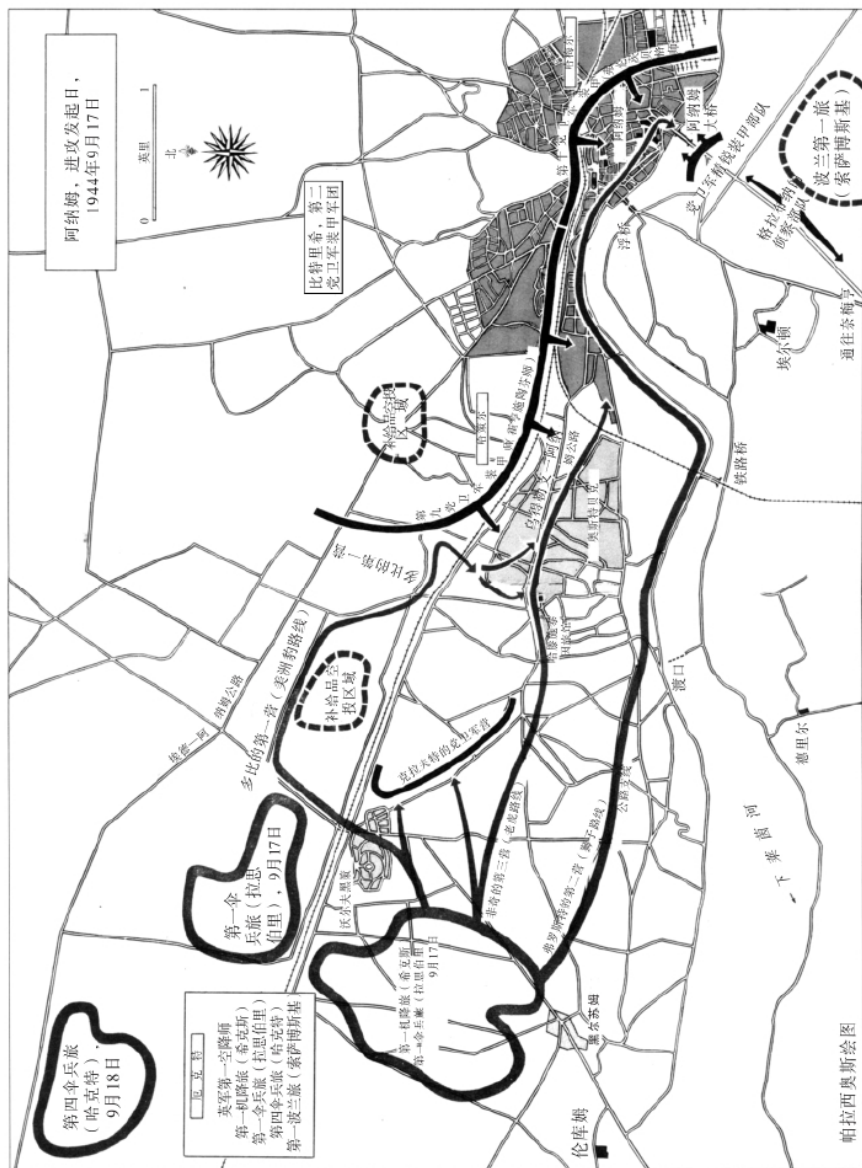
★ ★ ★

在地面上弥漫的烟雾、燃烧的建筑物的烟火包围中，强大的英国滑翔机群着陆了。由橘黄色和深红色的尼龙带子标出的那些地区，已经开始像巨大的飞机停机场了。蓝色的烟从沃尔夫黑策附近的两个着陆区域袅袅升起，那两个着陆区域，一是北边的“雷耶斯营地农场”，一是西南的“伦库姆荒原”。从这些区域，排列成行的拖航飞机和滑翔机朝后面伸展，几乎有20英里，一直伸展到斯海尔托亨博斯镇附近他们的飞机进场着陆点，该镇位于奈梅亨的西南方向。成群的战斗机保护着这些行动迟缓的行列。交通非常拥挤，让飞行员们想起了伦敦忙碌的皮卡迪利广场周围上下班高峰时的拥挤状况。

这些机群———每一组与下一组有4分钟的间隔———在平坦、有着水路纹理的荷兰乡下低空飞行。曾经向飞行员们简要指示过的、要他们认出的

那些地标，现在正从他们下面流过：宽阔的马斯河与瓦尔河，再往前面，就是下莱茵河。然后，当每一个编队开始下降的时候，人们能看见阿纳姆就在右边，看见了他们极其重要的出击目标，铁路桥梁和公路桥梁。皇家空军曾经预料，将会有猛烈的防空炮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巨大的滑翔机队列，实际上并没有遭遇到抵抗。攻击前所进行的轰炸，在阿纳姆远比在艾因霍温地区有效。进场着陆的时候，没有一架拖航飞机或者滑翔机被击落。

皇家空军和滑翔机飞行员团技术精湛的飞行员们，以时钟般的精确性，来到了这些区域的上空。当滑翔机从拖航飞机上脱落时，它们的拖航飞机旋转着向上空飞去，以给紧随其后的组合腾出飞行空间。这些错综复杂的机动动作和繁忙的飞行，本身就带来了问题。中士飞行员布赖恩·汤布林记得，在着陆区域的上空拥挤混乱。“天空中有滑翔机、拖航飞机、绳索和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回忆道，“你不得不一直当心。”



上士维克托·米勒驾驶着一架霍萨型滑翔机，他回忆说，当他来到下莱茵河上空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安静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更远处，他突然发现了他的着陆区域，那里有“三角形的树林，一个小小的农场在远处的角落里若隐若现”。几秒钟后，米勒听见拖着他的滑翔机的斯特林型拖航飞机领航员的声音。“喂，二号。准备好了吗。”米勒确认准备好了。“祝你好

运，二号。”领航员告诉他。米勒立即解开缆绳。他的拖航飞机消失了，那根拖航缆绳紧跟在它的后面呼啦呼啦地飘动。米勒知道，那根缆绳将被丢落下来，“在那架斯特林型飞机转向回家的航向之前，作为离别礼物丢给敌人”。

滑翔机的飞行速度降低，田野隐约临近了。米勒要求把阻力板放下一半，于是他的副驾驶汤姆·霍林斯沃斯中士立即推了一下控制杆。“当从机翼下面落下来的大阻力板让我们的速度减了下来的时候”，一瞬间滑翔机颠簸起来。米勒估计，现在离着陆区域不到1英里了。“我提醒汤姆，留神他旁边的滑翔机。有一架滑翔机滑了过去，在我们的上方不到50码远”，而令米勒感到吃惊的是，“那架滑翔机又晃动着进来，飞在同一个航向上。另外一架滑翔机则似乎是从右侧向我们飘来。我认为，那位驾驶员甚至并没有看见我们，他太专注于怎样落在田野上了”。为了避免碰撞，米勒故意在迎面而来的那架滑翔机的下面俯冲。“一个巨大的黑色形体从我们的座舱上面闪了过去，它离我们太近了，让我无法喜欢它。我的精力完全集中在怎样才能完好无损地降落上，结果都无暇顾及敌人是不是在朝我们开火———而且对敌人的开火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法子可想。”

米勒继续下降，“树梢朝我们的飞机底板跳去，过了机翼。当地面突然出现的时候，另外一架滑翔机来到了旁边。我拉回方向盘，让飞机达到水平状态，我们触到了地面，跳跃了大约3英尺高，又落下以便停住。汤姆已经使劲关上了制动器，于是我们便在犁过的地上歪歪扭扭滑过。然后轮子沉没在松软的泥土里，我们慢慢停了下来，离一排粗壮的树木不到50码远。”静谧之中，当低压气穴引起的持续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过后，米勒听见远处有轻武器在开火，噼啪作响。“不过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另外一架滑翔机撞上我们之前，或者它在我们上面着陆之前，从滑翔机里跑出来。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人。我甚至没有停顿，而是径直从活动舷梯门里跳出来，摔在4英尺下的荷兰土地上，摔得相当厉害。”

通信兵格雷厄姆·马普尔斯乘坐的那架滑翔机，由于空域拥挤，又盘旋着飞回到着陆区域的上空。“不过到这时，我们已经没有力量了，”马普尔斯记得，“我看见树枝从滑翔机的门里穿过。那些树正好把地板扯碎，而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飞机机头着地，栽在了地上。我能够听见，每一个东西都在折断，就像干树枝在啪啪折断一样。我们完全是用机头着的陆，不过除了几处划痕和瘀痕之外，谁也没有受伤。”后来飞行员告诉马普尔斯，他曾经把滑翔机拉了上去，以避免与另外一架滑翔机相撞。

许多滑翔机在克服了漫长的旅行中的所有问题之后，却在触地着陆时候酿成了灾难。上士乔治·戴维斯站在他空空的霍萨型飞机旁边，注视着别的滑翔机进来。戴维斯是最先着陆的人之一，他把第一机降旅的32名官兵带了

过来。他看见，有两架滑翔机“几乎是肩并肩地在着陆区域颠簸前行，撞进树丛里，那两架滑翔机的机翼都被扭断了。几秒钟以后，另外一架霍萨型飞机隆隆地进来了。一看它的速度，戴维斯就知道它永远也不会及时停下。那架滑翔机猛地撞上了树干。一个人也没有出来。戴维斯与他的副驾驶威廉斯上士一起跑向那架滑翔机，朝普列克斯玻璃覆盖的座舱里面张望。座舱里的每一个人都死了。一门口径为75毫米的榴弹炮，由于固定它的链条挣断，压死了那组炮手，并切断了驾驶员和副驾驶的头。

中尉迈克尔·当西驾驶的那架滑翔机，载着一辆吉普车、一辆拖车以及来自一个炮兵连的6名炮兵，他的滑翔机刚着陆，便看见一架巨大的8吨重的哈米尔卡型飞机触地了。“土地松软，”他回忆道，“我看见那架哈米尔卡型飞机的机头把前面的泥土掘了出来。”重量和地速(注)使得飞机深陷进去，最后把那个巨大的尾巴翘在空中，而飞机背朝下翻了个个儿。当西知道：“试图把他们挖掘出来是毫无用处的。霍萨型飞机的上面是平的，但哈米尔卡型飞机的驾驶员坐着的地方却有一个小凸面，因而我们知道飞行员们肯定报销了”。

上士戈登·詹克斯驾驶着另外一架哈米尔卡型飞机，在进场着陆的时候，也看见这架飞机失事，于是立即推断，前面的地太松软了。他立即决定不在这块地上着陆。“我认为，如果我们直接俯冲的话，”他记得，“就将有足够快的速度，可以让我使飞机与地面保持一段距离，一直到我们越过篱笆，安全地进入下一块平地。”詹克斯向前推动操纵杆，俯冲下去，然后在地面上方几英尺的地方达到水平状态。詹克斯让这架巨大的飞机缓慢地越过篱笆，“把飞机像一片羽毛一样轻轻地落在较远处的地上”。

现在，在着陆区域的各个地方，士兵们正在拔掉滑翔机尾部上的插销，打开门，把火炮、装备、军需品、吉普车和拖车卸下来。一等兵亨利·布鲁克所在的滑翔机的士兵，就像别的许多人一样，发现卸货说说容易但做起来很难。“保护铁丝网上有8个销子，以把滑翔机的尾部固定住，”布鲁克解释说，“在英格兰进行演习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正好用两分钟的时间把尾部打开，把吉普车和拖车卸下来。在作战的时候，情况却不同了。我们把铁丝网切断，把销子拔出来，但机尾就是不动。”布鲁克和别的伞兵最终不得不把机尾砍掉。一等兵J·W·克鲁克也同样失意，不过附近的一辆吉普车过来帮了他们的忙，它用自己的缆绳把机尾拽开了。

在这两个着陆区域的每一处，人们开始从失事的滑翔机残骸里抢救货物。两架巨型哈米尔卡型飞机的坠毁，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它们装载了两门能发射17磅重炮弹的火炮，外加上3吨重的卡车和弹药拖车。不过第一机降轻武器团炮兵的15门口径为75毫米的榴弹炮，全都安全地到达了。

乘坐滑翔机到达的人大多都能回忆起，在着陆以后立即面临的是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怪异恐怖的静谧。然后，从集合地点，人们听见苏格兰风笛发出高腔尖声，吹奏起《苏格兰人之歌》。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在伦库姆荒原边缘的士兵们看见，荷兰平民正在毫无目的地闲逛着穿过树林，或者在惊恐地躲藏。鬼怪式联络部队的内维尔·海中尉记得："那是一个令人头脑清醒的景象。有些人穿着白色的医院病号服，似乎被医务人员成群地驱赶着。男人和女人四处蹦蹦跳跳，挥动着手臂，大笑着，含糊不清地说个不停。他们显然疯得非常厉害。"树林里面人群的声音让滑翔机驾驶员维克托·米勒大吃一惊，然后，"成群的穿着白色衣服的古怪的男人和女人鱼贯而行，走了过去。"只是到了后来，伞兵们才得知，这些举止奇怪的平民是遭到轰炸的沃尔夫黑策精神病院里的病人。

厄克特将军是在伦库姆荒原着陆的，他也被那种静谧所感染。他回忆说："那安静令人难以置信。非常不真实。"当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在树林边建起师战术司令部的时候，厄克特朝伞兵的空投场走去，那是在400码以外。现在是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到达的时间，从远处传来飞临的飞机嗡嗡声。当人们抬起头来看那些排成长列的C－47飞机的时候，各个地方的忙碌活动也暂停了下来。在伞兵降落的过程中，轻武器和高射炮的火力就像在滑翔机着陆过程中一样有限，而且时断时续。下午1点53分以后的15分钟时间里，天空满是色彩鲜艳的降落伞，那是第一伞兵旅开始跳伞了，大约650个降落伞包，降落伞是鲜亮的黄色、红色和棕色———载着枪支、弹药和准备———迅速地从川流不息的伞兵当中落了下来。别的载有补给品的降落伞，是在士兵跳伞之前从飞机上推下来的，它们载着各种各样的货物向地面飘落，其中有小型折叠式自行车。许多已经负荷过重的伞兵也带着大背包跳了伞。从理论上讲，这些大背包应该是在人触地之前用绳子放下来的。有几十个大背包突然从伞兵身上脱离了，摔在空投场里，其中几个装的是珍贵的无线电接收机。

英军列兵哈里·赖特是从一架美军的C－47飞机上跳伞的，他自空中降落的时候，既丢了钢盔又丢了大背包。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团军需官罗伯逊中士跑了过来。赖特的前额血流如注。"你是被高射炮火击中的吗？"罗伯逊问道。赖特慢慢地摇着头说："不是，中士，"他说，"是那个该死的美国佬。我们跳伞的时候飞机速度太快了。"罗伯逊给他包扎了伤口，然后，令赖特感到吃惊的是，罗伯逊又从他的粗帆布背包里取出一块猪肉馅饼，送给了这个伤号。"我当时几乎震惊得要死去了，"赖特回忆说，"首先，罗伯逊是苏格兰人，其次，作为军需官，他从未送给任何人任何东西。"

空投场各地似乎都发生了古怪的事情。中士诺曼·斯威夫特着陆时所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军士长莱斯·埃利斯，埃利斯正抱着一只死了的鹧鸪从他的面前经过。吃惊的斯威夫特问，这只鸟是从哪里来的。"我落在它身上

了，”埃利斯解释道，“谁知道呢？以后若是我们饿了的话，这就会相当不错。”

工兵罗纳尔多·埃默里刚刚从他的降落伞里爬出，一个上了岁数的荷兰妇女便从地里一路小跑过来，一把抓起降落伞，又快速跑开，让人大吃一惊的埃默里瞪大双眼目送着她。在这块地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下士杰弗里·斯坦纳斯背负着过重的装备，落在了一架滑翔机机翼的上面。那个机翼像蹦床一样弹起来，又把斯坦纳斯抛到空中。他两只脚落地，站在了地上。

罗宾·弗拉斯托中尉在重重地摔下之后精神恍惚，有几分钟的时间躺着一动也不动，努力确定自己的位置。他意识到：“在我的四周有数量多得难以置信的尸体、集装箱正在落下，而飞机也在继续把伞兵倾倒下来。”弗拉斯托决定，要迅速离开空投场。当他挣扎着要从降落伞吊带摆脱出来的时候，听见一种古怪的声音。他朝四下张望，看见二营营长约翰·弗罗斯特中校从旁边走过，同时吹着他的铜质猎号。

弗罗斯特也被列兵詹姆斯·W·西姆斯注意到了。西姆斯甚至在着陆以前那一天就过得非同寻常。西姆斯本来始终是与皇家空军一起飞行的———西姆斯回忆说，皇家空军的态度是：“不要担心，小伙子们，不管怎样，我们都会把你们送到目的地”———结果他看见送他的飞行员是一个美国人，因而大为震惊。“他是一位中校，戴着那种柔软的帽子。他穿着飞行服，敞着衣襟，叼着一根大雪茄。我们的中尉非常帅气地向他行军礼，问他在起飞的时候，士兵们是否应该到飞机的前面去。”那个美国人咧着嘴笑了笑。“嗨，见鬼，不，中尉。”西姆斯记得他是这样说的，“要是得在跑道上拖着飞机的屁股的话，那么跑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会让这架该死的破飞机离开地面。”西姆斯的军官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尽管西姆斯喜欢他的长官，但在注视着弗罗斯特走过的时候，他的耐心还是到达了极限。他坐在地上，四周是他的装备，他咕哝道：“老约翰尼·弗罗斯特[注]走过去了，一只手里拎着一把口径为45毫米的手枪，另外一只手里拎着那个该死的号角。”

在空投场和着陆区域各处，该师的5191名士兵安全地抵达了，各支部队正在集合，列队出发。厄克特将军“不可能更得意了。一切都似乎进展得极好”。军士长约翰·C·洛德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这位老伞兵回忆说：“这是我所曾参加过的最好的一次演习。每一个人都平静，而且有条不紊。”但厄克特在起飞之前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仍然让洛德不安。他记得，当他四下张望，看见士兵迅速集合，而又没有可与之搏斗的敌人的时候，他心中想：“哪有这么好的事。”别的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当一组人准备动身时，彼得·斯坦福斯中尉听见斯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小声说：“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不喜欢。”

在着陆时负有最紧迫任务的人，是第一空降师侦察部队43岁的弗雷迪·高夫少校。高夫要率领一支由四个连组成的中队，乘坐装备有重武器的吉普车，在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徒步的步兵营到达之前，全速赶到大桥。高夫和他的士兵跳伞进入该区域，然后寻找他们的地面运输工具，这些工具是由滑翔机带进来的。高夫迅速确定了他的第二把手戴维·奥尔索普上尉在着陆区域中的位置，得知了一些坏消息。奥尔索普报告说，为其中的一个连准备的全部运输工具———大致是22辆车辆———没有到达。在原定要飞往阿纳姆的320架滑翔机当中，有36架丢失了，随之丢失的是高夫的A连要使用的吉普车。尽管如此，不论是高夫还是奥尔索普都认为，还是有足够的车辆，可以全速赶往阿纳姆大桥。高夫下令出发。随着他的战斗力的削弱，现在，一切得看德国人的反应了。

6



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第一个让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的德国高级军官，是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威廉·比特里希将军。下午1：30，比特里希收到了来自德国空军通信网的第一份报告，说空降部队正在阿纳姆周围地区着陆。第二份报告是几分钟以后来到的，说攻击地区是阿纳姆和奈梅亨。比特里希无法与陆军元帅莫德尔司令部里的任何人取得联系，并且也不能与阿纳姆的城防司令官或者弗尔特的施图登特将军取得联系。虽然形势不明朗，但比特里希立即想到了冯·扎根将军的第十五集团军，该集团军的大部已经渡过斯海尔德河河口，逃进了荷兰。“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次空降部队的进攻，旨在遏止冯·扎根的集团军，避免它与我们的余部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出击目标大概就是，英国陆军将大举猛攻，越过莱茵河，进入德国。”比特里希认为，如果他的推论正确，那么这个军事行动的关键，就应该是那些阿纳姆和奈梅亨之间的桥梁。他立即让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霍亨施陶芬师的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中校，参加了为保罗·格拉布讷上尉授勋后的午餐会，他“正在喝汤”的时候，比特里希的电话来了。比特里希简短地说明了形势，然后命令哈策尔“向阿纳姆和奈梅亨的方向进行侦察”。霍亨施陶芬师要立即出发，坚守阿纳姆地区，消灭在奥斯特贝克附近、阿纳姆以西的空降部队。比特里希提醒哈策尔：“迅速的行动是极其重要的。攻占和夺取阿纳姆大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比特里希命令弗伦茨贝格师———其师长哈梅尔将军此时正在柏林———朝奈梅亨进发，“去夺取、坚守和保卫该市的那些桥梁”。

哈策尔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把原定于1个小时之内乘坐火车前往德国的霍亨施陶芬师的最后一批部队，从火车上卸下来。包括那些“丧失了作战能力的”坦克、半履带式车辆以及装甲运兵车，这些车辆他是一直决心不给哈梅尔的。哈策尔看着格拉布讷。“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他问道，“这些车辆被拆开，装在火车上了。”在这些车辆当中，有40辆属于格拉布讷的侦察营。“你能用多少时间把这些履带和大炮安上去？”哈策尔问道。格拉布讷立即把他的工兵们召集起来。“我们将在3到5个小时之内做好出发准备！”他告诉哈策尔。“在3个小时之内做完！”哈策尔厉声说道，同时朝他的司令部走去。

尽管比特里希将军是根据错误的理由做出了正确的估计，但他却让蒙哥马利的情报军官拒绝考虑进去的装甲师运转了起来。

那位奉命离开奥斯特贝克、前往陆军元帅莫德尔司令部的军官，发现他及其所部士兵的基地，就在英军的着陆区域里。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训练后备营的营长、党卫军少校泽普·克拉夫特，吓得“反胃”了。他的新司令部是在沃尔夫黑策旅馆里，距离伦库姆荒原不到1英里。在附近露营的是他的两个连，第三个连被留在阿纳姆备用。从旅馆里，克拉夫特能够看到，荒原里“拥挤着滑翔机和部队，有些就在几百码之外”。他本来一直以为，空降部队要组织起来需要几个小时，但当他注视的时候，“英国人正在各处集合出发，准备作战”。他无法理解，这样一支兵力怎么会在这个地区着陆。“我所能想到的具有任何重要性的唯一的军事目标，就是阿纳姆大桥。”

这位吓坏了的指挥官知道，除了他的这个不满员的营之外，附近没有其他的德国步兵。克拉夫特决定，在援兵到来之前，“要由我来挡住他们，不让他们到达大桥———如果大桥是他们要去的地方的话”。他各个连的阵地大致形成了一个三角，这个三角的基地———也就是沃尔夫黑策马路———几乎与伦库姆荒原接壤。在克拉夫特司令部的北边，是从埃德至阿纳姆的大马路，以及那条从阿姆斯特丹到乌得勒支，再到阿纳姆的铁路线；在南边，乌得勒支马路经由伦库姆和奥斯特贝克，进入阿纳姆。由于没有足够的兵力维持从一条马路到另外一条马路之间的战线，所以克拉夫特决定，坚守大致从北边的铁路到南边的乌得勒支—阿纳姆公路之间的阵地。他匆忙命令他的后备连离开阿纳姆，与在沃尔夫黑策村的该营的其余部队会合。机枪排被派了出去，坚守战线的两端，而部队的余部则在树林里呈扇形散开前进。

尽管兵力缺乏，但克拉夫特却有一种新的实验武器可以使用：那是一种多炮管的、用火箭推进的发射筒，能够发射超大型的迫击炮弹。[注]有几台这样的发射筒留给了他，用于训练。现在他打算使用它们，以迷惑英国

人，带来一种兵力更加强大的印象。与此同时，他命令各个由25名士兵组成的进攻小组进行锐利的突袭，这可能使那些伞兵立足不稳。

当克拉夫特正下达指示的时候，一辆参谋车轰响着来到了他的司令部面前，阿纳姆城防司令库辛少将匆匆走了进来。库辛以极快的速度从阿纳姆开车出来，为的是亲自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途中，他遇见了朝东前往杜廷赫姆的陆军元帅莫德尔。莫德尔在马路上短暂地停了一下，指示库辛命令部队进入作战准备，并告知柏林事态的发展。现在，库辛朝荒原对面望去，看见英军规模巨大的空投，因而目瞪口呆。他几乎是绝望地告诉克拉夫特，他将设法在下午6点的时候给该地区送来援军。当库辛动身开车返回阿纳姆时，克拉夫特提醒他，不要走那条从乌得勒支到阿纳姆的公路，他已经接到报告，说英国伞兵正在那条公路上行进。“走旁的路吧，”克拉夫特告诉库辛，“大马路可能已经阻塞了。”库辛铁着面孔。“我能顺利通过的！”他回答道。克拉夫特注视着那辆参谋车朝公路疾驶而去。

他确信，库辛的补充兵员将永远不会到达，而他小小的兵力被制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就在他把部队部署在沃尔夫黑策公路沿线的时候，克拉夫特就派自己的司机、列兵威廉·劳去收拾他的私人物品。“把它们装在车里，开到德国去，”克拉夫特告诉劳，“我想我不会活着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在柏林附近的巴特萨尔诺，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将军，与武装党卫军作战部局长汉斯·尤特讷少将进行了交谈，并扼要地介绍了比特里希的兵力不足的第二装甲军团的困境。哈梅尔坚持说，如果要想让该军团继续成为一支有效的作战部队，那么“比特里希对人员、装甲、车辆和火炮的急迫要求就必须得到满足”。尤特讷许诺将尽力而为，但又提醒说，“在这个时候，每一支作战部队的力量都损耗了”，每个人都想得到优先，而他又不能许诺立即给予帮助。当两人交谈的时候，尤特讷的副官带着一份无线电报走进了办公室。尤特讷读了电报，然后一言不发递给了哈梅尔。电报写道：“空降部队进攻阿纳姆。立即返回。比特里希。”哈梅尔冲出办公室，上了他的汽车。从巴特萨尔诺开车去阿纳姆，需要11个半小时。对他的司机泽普·兴特霍尔策下士，哈梅尔说道：“回阿纳姆———像魔鬼那样开！”

7



英军第一空降师通信兵部队副指挥安东尼·迪恩 - 德拉蒙德少校，无法理解眼前出了什么差错。曾几何时，他的无线电接收机能完好地收到拉思伯里

准将那个旅的信号，那是在该旅前往出击目标时，其中包括阿纳姆大桥。但现在，当拉思伯里的各个营更靠近阿纳姆的时候，无线电信号却一分钟比一分钟弱了。迪恩－德拉蒙德的通信兵报告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报告既令他不安又令他困惑。他们根本无法与一些装载在吉普车上的无线电接收机取得联系，而从别的地方接收到的信号也太微弱了，几乎听不见。然而拉思伯里旅的各个营，以及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侦察部队，又不可能会在两三英里之外的地方。

尤其令迪恩－德拉蒙德关注的，是拉思伯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厄克特将军的作战指挥，又至关重要。迪恩－德拉蒙德决定派一辆吉普车带着无线电接收机和机务员，去收听拉思伯里的信号，然后再把那些信号传送到师部。他指示这个队伍，在师部与拉思伯里的移动通信系统中间的一个地点把设备装置起来。时间没过多久，迪恩－德拉蒙德便听见了这个中继队伍转发的信号。他们的无线电接收机的范围似乎大幅减少了———原本，这种“角度为22度”的无线电接收机，最低限度也应该能够起码在5英里的范围之内有效运作———而且信号也很微弱。他推论，不是无线电接收机未能正确行使功能，就是机务员的位置不好，没有把信号送出来。在他倾听着的时候，信号一度甚至完全消失了。迪恩－德拉蒙德无法用无线电与任何人取得联系，一支乘坐两辆带有无线电接收机吉普车的美军通信机务特别队伍，也无法用无线电与任何人取得联系。这支特别队伍是在17日起飞的几个小时之前，匆匆组建起来并来到英军空降师司令部的，他们将操作地对空的“非常高频率”的无线电接收机，以便召集战斗机，进行近距离的支援。在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这些带有无线电接收机的吉普车本来可能使情况大为不同，但情况恰恰相反，它们却被发现毫无用处。这两辆吉普车上的无线电接收机都没有调整好频率，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把战斗机召进来。这个时刻，战斗还没有开始，英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就已经完全失效了。

8



就像接到了信号似的，当运送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飞机靠近空投场的时候，德国人的大炮开火了。詹姆斯·M·加文准将朝下望去，看见地面炮火从与马斯河—瓦尔河运河平行的一条战壕里喷射而出。在树木茂盛的地区，敌人那些一直沉默躲藏到现在的排炮，也开火了。在注视着的时候，加文揣测，他以一种预料到的风险做基础而为第八十二师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否可能会失败。

这个师负责坚守市场花园行动走廊的中段，因而就有范围广泛的出击目

标，从南到北约10英里，从西到东12英里。加文将在格拉夫大桥的西端附近空投一个伞兵连，该桥将通过奇袭攻击予以夺取，除此之外，加文还挑选了三个伞降地区和一个大的着陆区域。那个大的着陆区域将能容纳他的50架韦科型滑翔机，另外加上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的英军第一空降军司令部的38架霍萨型和韦科型滑翔机。加文命令，只有一个空投场，也就是在上拉瑟尔特北边的那一个，将由伞降信号员把它标出来，而另外的三个，靠近格鲁斯贝克山脊和德国边界，则故意不予标出。加文的伞兵和滑翔机，将在没有供识别的灯标或烟雾的情况下着陆，目的是在着陆地区迷惑敌人。在第八十二师着陆大约13分钟以后，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将着陆。

加文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敌人的坦克可能突然从沿着德国边界的国家森林里出现，森林就在他最大的滑翔机着陆区和空投场的东边。出于这个原因，他下达了两个非同寻常的命令：为了既保护他的师又保护布朗宁的司令部，他指示伞兵要在靠近他们能够从空中发现的任何防空排炮的地方跳伞，并尽可能快地使那些排炮成为无用之物。这是空降历史中的第一次，他们将在整整一个营的野战炮兵中间伞降，他们要踏上的那个直接面对着森林的区域，距离德国边界大约1英里半。现在，看着猛烈的防空炮火，考虑到国家森林里可能有敌人的坦克，加文很清楚，尽管他已经为几乎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了计划，但第八十二师官兵面对的仍会是一个棘手的任务。

加文手下那些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从来都没有忘记，在圣母教堂村他们遭到了屠杀。由于意外地伞降在那个村子里，他们落地时便遭到了德国人机关枪的射击，许多人的降落伞落在电话线上以及村庄广场四周的树上，他们无助地挂在那里被杀死了。直到圣母教堂村最终被本·范德弗特中校夺取之后，那些死了的伞兵才被割断绳子放下来埋葬。现在，当第八十二师准备在荷兰上空伞降的时候，有人对仍然在他们身后用钩子固定着的人喊道："记住圣母教堂村！"尽管边跳伞边用枪扫射是一种有风险的做法，但许多伞兵还是在跳伞过程中扣动他们的扳机。

布赖恩德·博丁上尉在格鲁斯贝克山脊附近的空投场下落时，看到自己正好是从一些德国防空补充兵员的上面下降，大炮正在瞄准他。博丁开始用他的四五式科尔特牌手枪射击。"突然我意识到，"博丁记得，"这是多么的徒劳，用我不起眼的小手枪瞄准，与此同时又在大口径的大炮上方来回摆动。"博丁在靠近高射炮的地点着了陆，把炮组人员全都俘虏了。他认为，那些德国人是"吓了一大跳，结果一炮没打响"。

詹姆斯·J·科伊尔中尉以为，他正要在一个德国人的帐篷医院上面着陆。突然，敌军从帐篷里涌了出来，开始朝架在环形防线四周的口径为20毫米的高射炮跑去。他于是也从手枪皮套里拔出了他的四五式手枪，但降落伞开

始来回摆动起来，让科伊尔飘离了那个帐篷。其中一个德国人转头向科伊尔的方向跑来。“我连一枪都无法朝那个德国佬发射过去，”科伊尔回忆道，“这一瞬间，我的手枪指向地面，而到了下一瞬间，却又瞄准了天空。我确实还够清醒，又把那把科尔特牌手枪放回皮套，这样我就不会丢掉它，也不会在我摔倒的时候打着自己。”在地上，甚至在试图从降落伞吊带里摆脱出来之前，科伊尔就再次拔出了手枪。“那个德国佬现在只在几码远的地方，不过他的动作显示好像他不知道我的存在似的。我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是朝我跑来，他只是在逃跑。”当那个德国人从科伊尔身边匆匆跑过的时候，扔掉了枪和钢盔，科伊尔可以看出，“他只是一个孩子，大约18岁的样子。我无法朝一个没有武器的人开枪。我最后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他正在朝德国边界跑去。”

当曳光弹开始撕裂降落伞的伞盖的时候，列兵埃德温·C·劳布勃然大怒，他有意地使降落伞侧滑，这样他就能在那个高射炮的旁边着陆。劳布并没有卸下他的降落伞吊带，而是在身后拖着他的降落伞，手持冲锋枪突然袭击那些德国人。他杀死了一个德国人，抓获了其余的人，然后用可塑炸弹炸毁了高射炮的炮管。

尽管官方认为，在格鲁斯贝克地区降落的第五○五团和第五○八团遇到的抵抗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这些区域四周的树林里，还是有数量可观的防空炮火和轻武器火力。第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并没有等候集合，而是以单兵或者小组形式，蜂拥着越过这些小股的抵抗部队，并迅速制伏了他们，把他们俘虏。与此同时，战斗机在树梢上面飞速掠过，用机关枪朝敌人的炮台射击。而在对抗这些低空进攻方面，德国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几分钟的时间里，就有3架战斗机被击中，之后在树林的附近坠毁。上士迈克尔·乌莱蒂奇看见了其中一架。那架飞机横向翻滚着越过了空投场，当它最终停下来的时候，只有机身完好无损。几分钟以后，飞行员出现了，好像并没有受伤，他站在飞机的残骸旁，点燃了一支香烟。乌莱蒂奇记得，那位被击落的飞行员仍然和连队待在一起，做了一名步兵。

从陆地上，上士詹姆斯·琼斯看见，一架P－47型飞机在大约1500英尺的高度上着了火。他预料，飞行员将会跳伞逃生，但飞机却落了下来，在空投场上滑行，然后折断。机尾啪的一声断了，发动机滚到一边，座舱在田野里停了下来。琼斯相信飞行员一定是死了，但当他注视的时候，飞机的座舱盖朝后滑动敞开了，然后“一个一头黄发的小个子，没有戴帽子，腋下夹着一支四五式手枪，向我们跑来”。琼斯记得，他问道：“老弟，你干吗不跳伞呢？”那位飞行员咧着嘴笑了。“该死，我害怕跳伞。”他告诉琼斯。

就在着陆并收拾好自己的装备之后，参谋军士拉塞尔·奥尼尔注视着一架P－51型战斗机俯冲下去，对附近一个隐藏着的德国阵地进行低空扫射。飞机在飞过机枪掩体两次以后被击中了，但飞行员却将飞机盘旋起来，安全

地以飞机的腹部着了地。按照奥尼尔的说法："这个家伙跳了出来，朝我跑来，同时喊道：'给我支枪，快！我知道那个德国佬在哪里，我要抓住他。'"当奥尼尔在身后凝望着他的时候，那位飞行员一把抓过一支步枪，全速朝树林跑去。

在18分钟之内，第八十二师的第五○五团和第五○八团的4511名伞兵、工兵和70吨重的装备，在他们的空投场上及其附近着了陆，这些地方包括树木茂盛的高地以东的格鲁斯贝克镇。当官兵们集合起来，走出空投场，前往出击目标的时候，特别的伞降信号员队伍又为炮兵的空投、第82师的滑翔机部队以及英军的军司令部标出了界线。到目前为止，加文将军冒着预料到的风险的行动，获得了成功。然而，尽管在这两个团之间的无线电联系立即建立起来了，但与第五○五团一起跳伞的加文，要想知道在西边8英里之外所发生的事情，却为时过早，那里是第五○四团的伞降地，位置在上拉瑟尔特的北边。他还不知道，对格拉夫大桥所进行的特别攻击是否正按计划进行。

就像八十二师的其余飞机一样，运送鲁本·H·塔克上校第五○四团的137架C－47型飞机，在接近上拉瑟尔特空投场的时候，遭遇到了时断时续的高射炮火。和在别的地区一样，飞行员们保持航向，到下午1点15分的时候，大约2016名人员开始跳伞。有11架飞机稍微向西转了方向，朝一个小的伞降点飞去，那个伞降点在格拉夫附近的马斯河上，位于那座极其重要的1500英尺长的9孔大桥旁边。这些C－47型飞机运载着爱德华·韦勒姆斯少校的第二营的E连，前往第八十二师的最关键的出击目标，他们的任务，就是从西边的入口突然袭击大桥。而韦勒姆斯第二营的余部，则要从上拉瑟尔特出击，前往大桥的东边。如果不能迅速而且完好无损地夺取格拉夫大桥，那么市场花园行动的紧凑安排就不能维持下去。失去这座大桥，可能意味着整个行动的失败。

当E连的飞机朝西边的攻击点飞去时，排长约翰·S·汤普森中尉能够清楚地看见马斯河、格拉夫镇和他右边上拉瑟尔特附近第五○四团的大规模跳伞，然后，他又看见了自己所在的连队将要空降的壕沟成列的田野。当汤普森还在注视的时候，这个连别的人已经跳出了飞机，朝格拉夫大桥落下去，但在中尉的C－47型飞机里面，绿灯还没有闪亮。当绿灯闪亮时，汤普森看到，他们就处在一些建筑的正上方。他等了几秒钟，看见了对面的田野，于是和他的排一起跳了下去。由于出了一个幸运的差错，他和他的士兵落地的地方距离大桥的西南端只有大约500码或者最多600码远。

汤普森听得见，从格拉夫方向传来了起伏不定的射击声，但在大桥的四周似乎一切都是安静的。他不知道，他究竟是该等到连队的其他人赶到，还是现在就用他排里的16个人来进行攻击。"既然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因而我就决定进攻。"汤普森说道。汤普森派下士休·H·佩里回去见连长，要

他送去一个简短的信息："我们要前往大桥。"

来自镇子和附近建筑物的射击现在更猛烈了。汤普森率领他的排隐蔽在附近的排水沟里，士兵们在前往大桥的时候，不得不在深达脖子的水中跋涉。他们开始遭到一个靠近大桥的高射炮塔的射击，汤普森注意到抱着口袋的敌军士兵们正在渡口附近的一座建筑里跑进跑出。他认为，那一定是一个维修工厂或者发电厂。汤普森害怕，那些德国人是在把爆破炸药送到大桥，准备把桥炸掉，他于是迅速部署士兵，包围那座建筑，然后开火。"我们用机关枪扫射这个地区，攻占了发电厂，发现有4个德国人死了，1个人负伤，"汤普森回忆说，"显然，他们抱着的是他们的个人装备和毯子。"突然，有两辆卡车从格拉夫沿着马路疾驶过来，朝大桥开去。汤普森的一个士兵击毙了其中一个司机，那辆卡车歪歪扭扭地驶离了马路，车上的德国人乱作一团，爬了出来。第二辆车也立即停了下来，车上的士兵跳到地上。汤普森的士兵开火了，但那些德国人并没有表现出作战的意愿。他们没有还击，而是跑开了。

那个高射炮塔仍然在开火，不过这个时候，炮弹只是从这个排的头上飞过去。"那些炮手无法把那门22毫米的高射炮压得足够低来射击我们。"汤普森记得。排里的火箭筒手列兵罗伯特·麦格劳，朝前面爬去，在大约75码的距离上发射了三发火箭弹，其中有两发射进了塔的顶部，于是那门大炮不再发射炮弹了。

虽然在河对岸桥的远端一个炮塔里，还有一门配对的口径为22毫米的大炮在发射，但汤普森和他的士兵还是摧毁了电力设备和电缆，他们怀疑它们与炸桥的炸药相连接。然后，这个排在大桥西南入口的马路上设置了路障，埋下了地雷。在他们摧毁的那个高射炮塔里，他们发现炮手死了，但口径为20毫米的火炮却没有损坏。汤普森的士兵立即用这门大炮，朝河对岸的那个高射炮塔开炮。他知道，他们排将很快得到从后面赶来的E连其余人的支援，而且稍后不久还会得到韦勒姆斯少校全营的支援，就是现在，韦勒姆斯少校的那个营正从上拉瑟尔特急速前进，以便夺取大桥的东北端。就汤普森中尉而言，他认为主要的出击目标已经夺取了。注

现在，塔克的第五○四团的其余两个营，就像轮子上的辐条一样，正在向东进发，前往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那三个马路渡口和铁路桥。急速前往那座大桥的，还有第五○五团和第五○八团的部队，他们决意要从对面一端夺取渡口。对于市场花园行动的进军来说，这些出击目标并非全都至关重要。加文希望，在攻击的突然性和随之带来的混乱当中，能够把这些目标全部夺取，但在开始时，除了至关重要的格拉夫大桥之外，再夺取一个目标就足够了。

为了把敌人搞糊涂，为了保卫他的阵地，为了保护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并在伞兵们前往他们的出击目标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帮助，加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榴弹炮———现在，第三七六伞兵野战炮兵营的火炮正在到来。在以前的作战行动中，曾经空投过小股的炮兵部队，但他们被散开在很大的地方，集合和射击的行动都十分缓慢。此刻前来的这个有544名士兵的炮兵营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丰富经验的伞兵。在运送这个营的48架飞机当中，装载有大炮———12门口径为75毫米的榴弹炮，每一门榴弹炮都拆卸成7个部分。这些榴弹炮将被首先空投，然后空投大约700轮次的炮弹。C－47型飞机鱼贯飞临，大炮迅速相继滚落下来，军火和士兵随即伞降，全都几乎完美地完成了着陆。

有一个事故，却差点儿造成了行动的停顿。率领第三七六营的威尔伯·格里菲思中校在跳伞时摔断了脚踝，不过他的部下迅速劫掠了一辆荷兰手推车，推着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种情形，”奥古斯丁·哈特少校回忆说，“上校[注]被推着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同时又吼叫着，命令每一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集合。”集合完毕，格里菲思又被手推车推到加文将军面前，在那里他报告说：“长官，大炮进入阵地，随时可以开火。”恰好一个小时，这次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空投之后，整个营集合起来，而其中的10门榴弹炮已经开炮了。

第八十二师的野战炮兵着陆14分钟以后，运载着反坦克营、工兵、师司令部人员、火炮、拖车和吉普车的韦科型滑翔机，开始进入着陆区。离开英格兰的50架滑翔机中，除了4架之外，全部到达了荷兰。然而，并非全都是在它们的着陆区域着陆，有些滑翔机偏离了一两英里。有一架滑翔机的副驾驶是安东尼·杰德齐斯基上尉，这架滑翔机摆脱拖航飞机的时间晚了一些，杰德齐斯基恐怖地看到，“我们直接朝德国人冲去，进行着一次一架滑翔机的进攻”。驾驶员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开始寻找着陆的地方。杰德齐斯基记得，到达地面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机翼插在一个大干草堆里，另外一个机翼插在一个篱笆里，而机头插在地里。当我看到泥土在我的膝盖上时，我都不知道脚是否还是我身体上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听见一门口径为88毫米大炮讨厌的炮声，于是，我们就在丝毫说不上平坦的地方，把吉普车拖了出来，乘上它，急速朝我们自己的地区驶去。

他们比约翰·康奈利上尉走运，康奈利的驾驶员在进场着陆的过程中被打死了。康奈利以前从未驾驶过滑翔机，此时他抓起操纵装置，就在边界的德国一侧把这架韦科型滑翔机降落了下来，地点在6到7英里以外的地方，维勒镇附近。只有康奈利和另外一个人没有被捕获。他们躲藏起来，等待夜幕的降临，最终，两人在9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回到他们的部队。

第八十二空降师总计成功地带进了7467名伞兵和空降兵。最后在这个地区

着陆的，是运送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的军司令部的35架霍萨型和韦科型滑翔机。有3架滑翔机在前往空投场的途中丢失了，其中两架是在到达欧洲大陆之前丢掉的，而第三架是在弗尔特的南边、施图登特将军的司令部附近坠毁的。布朗宁的司令部几乎就是在德国边界上着的陆。“高射炮火如果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而且几乎没有敌人的抵抗，”布朗宁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我们在国家森林西边大约100码的地方降落，我的滑翔机离布朗宁的滑翔机大致有50码远。”

率领着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乔治·S·查特顿上校，操纵着布朗宁的霍萨型滑翔机。飞机在一个电缆上刮掉了一个前轮，然后滑进了一块卷心菜地里。“我们出来了，”查特顿回忆道，“布朗宁朝四周看了一下，说道：‘老天作证，我们到了，乔治！’”在不远处，沃尔什准将看见布朗宁越过着陆区，朝国家森林跑去。几分钟以后他返回了，向沃尔什解释说：“我想成为在德国撒尿的第一位英国军官。”

在布朗宁的吉普车卸下来时，几发德国人的炮弹在旁边爆炸了。查特顿上校立即扑向最近的一个壕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布朗宁站在我的上方，就像某种探险者一样，问道：‘乔治，你在那里面究竟要做什么？’”查特顿坦率地说道：“我在很好地躲藏，长官！”“唔，你可以很好地不再躲藏了，”布朗宁告诉他，“我们该走了。”从紧身短上衣的一个口袋里，布朗宁取出了一个包着面巾纸的小包裹，他把小包裹递给查特顿，说道：“把它放在我的吉普车上。”查特顿打开面巾纸，看到里面有一面三角旗，三角旗栗色的背景上面，是一匹淡蓝色带有双翼的飞马，这是英军空降部队的标记。[注]三角旗在吉普车的保险杠上飘扬着，花园行动部队的司令官开车离开了。

在阿纳姆以西的伦库姆荒原，内维尔·海中尉，这位受过高级培训的专家、收集情况的“鬼怪式”联络部队的负责人，正在大惑不解。他的专家组把无线电接收机，连同专用天线安装了起来，期望能立即与布朗宁将军的军司令部取得联系。海中尉在着陆时优先考虑的事情，就是与军部接通，并给出他的位置。早些时候他已经得知，师部的通信系统出了故障。他先前认为，问题将会出现在皇家陆军通信兵团的那些缺乏经验的机务员身上，但始料不及的是，他所遭遇到的困难却是出自自己的部下。“我们在着陆区域安装好设备，尽管有松树树林遮蔽着，但以前在比这糟糕得多的乡下我们也能够接通，”他记得，“我们一试再试，但什么也没有接收到。”在能够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之前，他无法把厄克特将军那个师的进展告知布朗宁将军，也无法把布朗宁的命令转发给英军第一空降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荷兰的电话系统却在充分运转，包括奈梅亨的PGEM发电厂当局所拥有和操作并与全省联系的一个特别电话系统。倘若海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么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在荷兰抵抗力量的帮助下，拿起电话来。

在15英里以外的地方，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已经开始出现焦虑，司令部设在格鲁斯贝克山脊的边上。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两个大无线电接收机在着陆时都损坏了，布朗宁的无线电接收机是安全着陆的，他将其中的一台分配给了第八十二师，这确保了他与加文将军的通信能够立即进行。军部的通信部已经与邓普西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空降军在英格兰的后方司令部取得了无线电联系，布朗宁也与第一○一师取得了联系，但通信部却未能用无线电与厄克特的师取得联系。沃尔什准将认为，军通信部难辞其咎。“在这次行动的计划做出之前，我们要求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司令部通信部，”他说道，“我们震惊地认识到，我们的无线电接收机不够好，司令部里的通信兵能力差，又没有经验。”虽然布朗宁能够指挥并影响第八十二师、第一○一师，以及霍罗克斯的第三十军，但是此时此刻，阿纳姆的那个至关重要的战役，却在他的控制之外。正如沃尔什所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在阿纳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一种逐渐生成的瘫痪已经开始影响蒙哥马利的计划了。但在这个早期阶段，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地区，大约2万名盟军官兵身在荷兰，他们要去为花园行动的庞大部队夺取桥梁，并保持走廊的畅通。按预定计划，花园行动的先头坦克部队，将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与第一○一师的伞兵们会合。

9



在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附近一家大工厂的平屋顶上，英军第三十军司令布赖恩·霍罗克斯将军，注视着巨大的空降滑翔机编队的最后一架飞机，从他正在等待的坦克上空飞过。自上午11时以来，他就一直待在屋顶上，如他所说：“我有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巨大的机群景象是“给人以安慰的，但我却一点也不抱幻想，不会以为这将是一场容易的战役”。他一丝不苟地把每一个可能的意外事件都考虑了进去，他甚至命令部下，有关食品、汽油和弹药，能携带多少就携带多少，“因为我们有可能出乎意料地靠我们自己”。有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将军无法排遣，不过他并没有与任何人讨论过这件事———他不喜欢在星期日进攻。“在这场战争期间，我所参加的凡是在星期日发起的战斗或者进攻，没有一个是完全成功的。”他拿出双筒望远镜，研究那条白色缎带般的马路，马路朝北延伸，通向瓦尔肯斯瓦德和艾因霍温。霍罗克斯感到满意的是，空降攻击已经开始了，他于是下令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开始进攻。下午2：15，随着雷鸣般的咆哮声，大约350门火炮开火了。

这个轰炸破坏力极强，成吨的炸药猛击着前面的敌人阵地。当爱尔兰近卫

团的坦克笨拙地移动到出发线的时候，那片覆盖纵深5英里，集中在一个宽1英里的前线的飓风般的炮火，使得大地在爱尔兰近卫团的坦克下面震颤。先头装甲兵连的后面，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开始缓慢地从停放阵地驶出，准备在第一批坦克出发的时候列成战阵。天空上，就像在“出租车候车站”注等候客人的发射火箭的台风式战斗机群，正在不断盘旋，等待爱尔兰近卫团的指挥官乔·范德勒中校指示他们冲向前面的目标。下午2点35分，基思·希思科特中尉站在三连先头坦克的炮塔上，朝他的麦克风喊道：“驾驶员，前进！”

坦克从桥头阵地隆隆驶出，以每小时8英里的速度在马路上前进。现在，炮兵的炮火烟幕升了起来，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在装甲车的前面爬行着。坦克手们能够看见，炮弹就在他们前面不到100码的地方爆炸。当各装甲连向前推进，被吞没在掩护炮火的烟尘当中的时候，士兵们有时都不知道，坦克究竟能否安全地处于他们自己的炮火后面。

跟在先头连后面的，是乔·范德勒中校和他的堂弟贾尔斯的巡逻车。范德勒站在自己的车上，能够看见，不论前面还是后面，步兵们坐在坦克上，每一辆坦克都用黄色的长条旗予以标记，为的是向空中的台风型战斗机表明身份。“那种喧闹声是无法想象的，”范德勒记得，“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现在，先头坦克已经冲出了桥头阵地，正在越过荷兰边界。三连连长米克·奥科克上尉用无线电回答：“进军情况良好。先头连已经突破。”然后，只有几秒钟，画面改变了。正如范德勒所回忆的：“德国人开始真正黏住我们。”

德国炮手隐蔽在马路两边十分隐秘的加强阵地里，他们不但在掩护炮火的猛烈轰炸中活了下来，而且还等候着，让掩护炮火从他们上面通过。德国人没有开火，让最先的几辆坦克过去。然后，在两分钟之内，先头连的3辆坦克和下一个连的6辆坦克便被击中，失去了战斗力。那些坦克燃烧着，毁坏了，在半英里的马路上狼藉一片。“我们刚刚越过边界便遭到了伏击，”西里尔·拉塞尔中尉回忆说，“突然，前面的坦克不是侧滑越过了马路，就是在原先的地方燃烧。我突然可怕地意识到，下一辆坦克就是我正坐着的那一辆。我们跳进了路边的壕沟里。”正当拉塞尔向前走去，要看看排里的其他人情况如何的时候，一挺机关枪开了火。他胳膊中弹，朝后跌落进壕沟里。对拉塞尔来说，战争到此结束。注

一等兵詹姆斯·多加特的坦克被击中了。“我记得，我并没有看见或者听见爆炸，”他说道，“我突然平躺在了一个壕沟里，坦克倚靠在我的上方。我的胸前有一支布伦式轻机枪，旁边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胳膊几乎被打断了。不远处，另外一个人也死了。坦克着火了，我回想不起来，坦克手当中有谁活着出来。”

巴里·奎南中尉在先头连的最后一辆坦克里，他记得，他的谢尔曼型坦克向左折进了一个壕沟，奎南认为，驾驶员在试图绕过前面正在燃烧的坦克。但坦克随即被一发炮弹击中了，驾驶员和副驾驶都被炸死了。谢尔曼型坦克燃烧起来，奎南的炮手“试图从坦克的舱口盖爬出来，同时把我从回转炮塔上拉出来，这时我意识到，我们的坦克中弹燃烧了”。从坦克爬出来的时候，奎南看到，别的坦克从后面跟了上来。那些坦克也一辆又一辆地被击中。“我看到，有一辆坦克的指挥官试图不让吞没了整个坦克的那片火焰烧着他的脸。”

突破在真正开始之前就被阻挡住了，9辆毁坏的坦克现在堵住了道路。从后面赶来的连队无法前进，而即使他们能够绕过那些坦克残骸，隐蔽的德国炮手也会逐个瞄准射中他们。为了使进攻继续，范德勒召来了那些能够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机，坦克发射出紫色烟雾炮弹，以标明疑似的德军阵地，在这些烟雾的指引下，战斗机发着尖锐刺耳的声音俯冲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台风型战斗机作战，”范德勒回忆说，“那些飞行员的胆量使我惊愕。他们飞了进来，每次一架，就在我们自己的掩护炮火当中飞过去。有一架飞机就在我的正上方解体了。那真是难以置信———大炮在发射，飞机在咆哮，人们在喊着、咒骂着。就在这一切当中，师部问战斗进行得怎样。我的副指挥干脆举起麦克风，说道：‘听吧。’”

就在飞机朝下猛扑向它们的目标的时候，范德勒派了一辆装甲推土机，把燃烧的坦克推出马路。在几英里长的马路上，一片混乱喧闹的战斗场面，一直朝后延伸到范德勒本人的汽车，以及皇家空军的通信车，这些通信车正按照需要召唤台风式战斗机进行俯冲。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是战斗侦察机的飞行员，却又附属于通信部队，他现在确信他根本不应该自告奋勇做这个工作。当空军少校马克斯·萨瑟兰指挥着台风型战斗机的时候，洛夫从通信车里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黑色的烟雾从前面的马路上滚滚升起，一辆就在通信车面前的反坦克大炮运输车着火了。当洛夫注视的时候，一辆运送布伦式轻机枪的履带式小型装甲车正运载着伤员沿马路返回。有一个人的肩膀被炸掉了，衣服烧焦了。“我确信我们被包围了，”洛夫说道，“我吓坏了，不断地纳闷，为什么我不待在空军里，我本来就属于空军嘛。”

按照罗兰·S·兰顿上尉的描述，在后面更远处停止前进的纵队里，那些正在等候的坦克手们，感到了“一种奇怪的无能为力。我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兰顿看到，步兵正赶来，清理马路两边的树林，他们的前面是两辆运送布伦式轻机枪的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兰顿认为，这些士兵可能是第四十三步兵师的一个先头部队。“突然我看见，这两辆装甲车都被抛到了空中，”兰顿记得，“他们触到了敌人的地雷。”当烟雾消散的时候，兰顿看到，“尸体挂在树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尸体，要说得出是不可能的。每

一个大的树枝上都挂着尸体的碎片”。

台风型战斗机就在离他们几码远的地方射击，英军步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神色严肃地把躲藏在战壕里的德国人找出来。一等兵多加特刚刚从着陆的那个壕沟里逃出来，他的坦克又被击中了。他快速跑过马路，跳进了敌人一个空无一人的狭长掩体。“与此同时，有两个德国人———一位是没有穿外套的年轻人，另外一位是个大约30岁的相貌粗鲁的坏蛋———紧随着我从对面跳了进来。”多加特说道。多加特毫不犹豫，踢了那个年纪大的德国人的脸，那个年轻一点的德国人立即吓得投降了。多加特端着步枪，押送他们沿着马路往回走，“身边是川流不息的其他德国人，他们全都用手抱着头跑。那些跑得太慢的人，屁股上就会被迅速踢上一脚”。

那些毁坏了的坦克现在已经被清理出去，从树林里，壕沟里，在干草堆四周以及马路上，又传来了斯特恩式轻机枪的突突射击声，那是步兵在肃清残敌。近卫团的士兵们毫不宽容，对狙击手尤其不宽容。士兵们记得，那些战俘被命令在马路上快步行进，当他们慢下来时，就立即有刺刀戳他们。有一个战俘在越来越长的行列中试图逃走，但附近有不止一个连的盟军步兵，有几个步兵回忆———用其中的一个人的话来说就是———“那个念头一进入他的脑子，他就被击毙了。”

乔·范德勒看到，战俘被押送着经过他的巡逻车。当一个德国人走来的时候，范德勒发现了一个突然的动作。“那个杂种拿出一枚他藏起来的手榴弹，扔向我们的一辆运炮车。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运炮车被炸毁了，我看见我的一个军士躺在马路上，一条腿被炸掉了。从各个方向射来的机关枪子弹把这个德国人打成了筛子。”

在他的指挥所里，霍罗克斯将军得到了消息，说马路正逐渐被清理出来，步兵尽管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却已经击溃了两翼的德国人。正如他后来所说：“那些爱尔兰人[注]已经对被敌人射击感到厌倦了，他们突然发了脾气，这些伟大的战士们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也许火气最大的，莫过于第二营的情报官埃蒙·菲茨杰拉德上尉了，他审问了被俘的一门反坦克炮的炮组人员。按照贾尔斯·范德勒中校的说法：“菲茨杰拉德有一种有趣的榨取情报的方式。他是一个巨人般的大个子，能说一口精彩的德语，但却带有一种蹩脚的口音。他素来的做法就是拔出手枪，抵着德国人的肚子，站得尽可能地近，冲着那人的脸大声提问。”范德勒始终认为，其结果“确实极令人满意。在审问了这个炮组的人员之后没过几分钟，我们的坦克便以值得赞扬的精确，逐个击中了德国人伪装起来的反坦克阵地，马路得到了充分的清理，使我们得以继续进军”。

爱尔兰近卫团的许多人认为，中士伯蒂·考恩改变了这个战斗的形势。考恩指挥着一辆带有发射17磅重炮弹大炮的谢尔曼型坦克，他发现了德国人的一个反坦克阵地，只打了一炮，就把它摧毁了。在战斗的过程中，指挥该连的爱德华·G·泰勒少校吃惊地看到，有一个德国人正站在考恩的坦克上面指挥作战。他看见，那辆坦克穿过马路不停地开火，接着，由于泰勒本人也在忙着，于是忘记了这个事件。后来泰勒得知，考恩击毁了3门德国大炮。“当我能腾出时间的时候，去向他表示祝贺，”泰勒说道，“考恩告诉我，他的坦克上面的那个德国兵，是他攻占的第一个阵地的炮组负责人，那个炮组投降了。”那个德国人受到了菲茨杰拉德上尉的审问，然后又被送回给考恩，在考恩那里他显得“非常合作”。

爱尔兰近卫团又上路了，但持续不断的战斗还在继续。德国人的外壳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坚硬得多。在俘虏当中，有著名的伞兵营的人，令英国人惊讶不已的是，还有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富有作战经验的步兵：他们是威廉·比特里希将军派去增援施图登特第一伞兵集团军的作战部队。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有些俘虏被发现是属于冯·扎根将军的第十五集团军。爱尔兰近卫团的作战日志记载：“我们的情报部门在一整天的时间都是既惊讶又义愤，一个又一个的德国团出现了，而那些德国团根本就没有权利出现在那里。”

霍罗克斯将军本来预料，他的先头坦克将会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内的时间里”，行驶13英里到达艾因霍温。宝贵的时间丧失了，爱尔兰近卫团只能行驶7英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到达瓦尔肯斯瓦德。至此，市场花园行动已经不祥地落后于预定的时间了。

为了尽可能地机动，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的滑翔机带进来的大多是吉普车，而不是火炮。英国人晚到了艾因霍温，这个事实是一个打击。泰勒本来希望，能够得到连绵15英里走廊里的坦克手们大炮的支持，而那个走廊又是“尖叫的老鹰”所必须控制的。泰勒的荷兰联络官发现了形势的真相———美军第一○一空降师将不得不比预期时间更久地独立作战———而且几乎立即就要独立作战：在抵抗力量的帮助下，他们使用电话得知英国人那儿现在正发生什么事情。

泰勒的伞兵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占了费赫尔，那是走廊最北边的出击目标，同时又攻占了费赫尔的4个渡口———那是在阿尔河和威廉斯运河上的铁路桥和公路桥。激烈的战斗也许会接踵而来，然而，这4个出击目标在两个小时之内就攻占了。再往南，在费赫尔与索恩的中间，圣奥登罗德镇以及该镇多梅尔河上的公路渡口，相对来说攻占得轻而易举。按照荷兰的官方电话工作日志的说法，国家电话交换局的一位忠诚话务员约翰娜·拉图沃斯听见：“一个清楚明白的美国嗓音，在下午2点25分的时候出现在圣奥登罗德1号线上，要求接瓦尔肯斯瓦德，随后的通话持续了40分钟。”

美国人迅速得知，花园行动的先头部队还没有到达瓦尔肯斯瓦德。现在看来，已经延误了的霍罗克斯坦克部队，不大可能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走廊南端的艾因霍温，而这样时间就会太晚了，无法帮助美国人夺取并控制那些分布广泛的目标。第一○一师的官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现在，他们遇到了难题。

在泰勒的出击目标当中，最为紧迫的就是索恩的威廉明娜运河上的公路桥，大致在艾因霍温以北5英里处。作为万一这个主要的交通干线被炸掉时的应急计划，泰勒决定夺取贝斯特运河上的一座桥，那是在西边4英里的地方。由于这座桥被认为是次要的，所以只派了第五○二团的一个连去贝斯特，而且据认为，只会有几个德国人在那里。泰勒的情报部门并没有意识到，施图登特大将的司令部，就在第一○一空降师的空投场西北方向约10英里处，而且刚刚到达的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正驻扎在附近的蒂尔堡。这些兵力中，有瓦尔特·波普少将遭到重创的第五十九步兵师，外加上数量可观的火炮。

刚刚接近大桥，H连就用无线电发出信息，说它遇上了敌人的路障，遭遇到有力的抵抗。这个信息标志着一场伤亡惨重的战斗的开始，这场战斗不仅将持续整个夜晚，还会延续到随后两天的大部分时间。以一个连的单独作战行动开始的战斗，最终把一个整团以上的人都卷了进去。但H连英勇的官兵，尽管伤亡惨重，却已经在减弱德国人最初的、强大得出乎意料的打击了。

当H连向位于贝斯特的大桥进发的时候，罗伯特·F·辛克上校的第五○六团也正前往位于索恩的那个主要公路大桥。在部队抵达村子北郊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然后他们遭到德国人一门口径为88毫米大炮的轰击。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先头部队用一支反坦克火箭筒摧毁了这个炮位，击毙了炮组人员。美国人穿越街道进行战斗，到了离运河还不到50码的时候大桥被炸掉了，瓦砾落在这些伞兵的四周。辛克上校原定在晚上8点以前攻占艾因霍温及其各个渡口，对他来说，这座大桥的丧失是一个痛苦的打击。有三个人———詹姆斯·拉普拉德少校、米尔福特·F·韦勒中尉以及中士约翰·邓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冒着炮火纵身跳进运河，向对岸游去。这个营的其他人或者效法他们游水或者坐上划艇划过去。在南岸，他们制伏了德国人的抵抗，建起了桥头阵地。

这座大桥的中央支柱仍然完好，第一○一师的工兵们立即开始建造临时渡口。帮助不期然地出现了。荷兰平民报告说，有数量可观的黑市木料，被一个承包商储藏在附近的一个汽车库里。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工兵们使用大桥的中央支架以及劫掠来的木料，在运河上架起了一座新桥。辛克上校回忆说：“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座桥都不是令人满意的，但它确实使我能够把团里的其他人送过河去，是排成单人纵列过去的。”在建桥装

备送达之前，位于索恩的市场花园行动走廊的这一段，已经沦落为一个供单人行走的木头制作的人行小道。

10



陆军元帅莫德尔在到达比特里希将军位于杜廷赫姆的司令部时，仍然心烦意乱。正常的情况下，他到达这里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但今天，由于他沿途多次停下，命令各个地区的指挥官做好应对空降攻击的准备，结果使行程大大超过了一个小时。尽管这位陆军元帅似乎是平静的，但比特里希却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几乎击中了我！他们要打的是司令部！想想吧！他们几乎击中了我！'"

比特里希立即把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最新情报告诉了他。盟军意图的清晰画面尚未出现，不过比特里希却告诉了莫德尔他本人的推测：攻击的目的是牵制第十五集团军，与此同时，英军第二集团军则朝鲁尔河大举猛攻，这就要求盟军夺取奈梅亨大桥和阿纳姆大桥。莫德尔完全不同意。"阿纳姆大桥并不是出击目标。"他说道。这些空降部队将改变方向，向东北方向进军，前往鲁尔河。莫德尔认为，形势仍然太不明朗，无法做出任何最终的结论，而令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空降部队是在奈梅亨地区着陆呢。尽管见解不同，他还是认可了比特里希已经采取的措施。

比特里希仍然抓住大桥的话题不放。"陆军元帅阁下，我强烈要求立即摧毁奈梅亨和阿纳姆的大桥。"他说道。莫德尔惊讶地看着他。"它们不会被摧毁，"他坚定地告诉比特里希，"不管英国人的计划是什么，这些大桥都是能够守住的。不，绝对不！这些大桥不能炸掉。"然后，莫德尔放下这个话题，"我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司令部，比特里希。"在比特里希能回答之前，莫德尔又再次沉思着说，"你知道，他们几乎击中了我。"

位于弗尔特的司令部里，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面对着一个窘境：他的第一伞兵集团军被空降攻击分成了两半。由于没有电话通信，现在完全依赖于无线电，因而他无法指挥分离的军队。眼下部队正在各自为战，没有协调一致的指挥。后来，他交了一次重大而又难以置信的好运，在他司令部的附近有一架韦科型滑翔机被击落了，从里面发现了一个没有损坏的公文包，公文包被匆匆送给了他。

"真是难以置信，"施图登特说道，"公文包里是敌人这次军事行动完整的进攻命令。"施图登特和他的参谋们钻研着这些被缴获的计划。"它们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空投场、走廊、出击目标，甚至还有所介入的师的名字。一切！我们立即就看出了战略上的含义。他们不得不在我们摧毁那些

大桥之前，攻占那些大桥。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就是：‘这是报应。报应！历史正在重复自己。’1940年我们在荷兰的空降行动中，我手下的一名军官违背了严格的命令，携带记录我们整个进攻详情的文件参战，而这些文件又落入了敌人之手。现在它又整整转了一圈。我知道了，我该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莫德尔尚不知道该做什么。施图登特从未感到这么沮丧，由于他的通信设施出了故障，所以直到将近10个小时之后，他才能够把有关市场花园行动的秘密置于莫德尔的掌握之中。那秘密就是，阿纳姆大桥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缴获的计划清楚表明，那是蒙哥马利进入鲁尔河地区的必经之路。

这是莫德尔最喜欢的那种战斗：一种要求有即兴发挥、胆量尤其是速度的战斗。从比特里希的司令部里，莫德尔给西线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打了电话。他以带有个人特点的鲁莽描述了形势，要求立即增援。“能够打败这个空降攻击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最初的24小时里猛烈打击。”他告诉冯·伦德施泰特。莫德尔要求派防空部队、自行火炮以及步兵，而且他要求，他们夜幕降临的时候就能前往阿纳姆。冯·伦德施泰特告诉他，能够派得出的增援部队将要上路。莫德尔转向比特里希，洋洋得意地说道：“嗨，我们要有援兵了！”莫德尔决定在杜廷赫姆指挥作战，尽管他显然已经从匆匆离开奥斯特贝克的震惊中恢复了过来，这一次却不想再冒被打个措手不及的风险了，他拒绝在城堡里面食宿，而要在城堡庭院里的园丁小屋里指挥战斗。

比特里希的先见之明已经产生效果了。哈策尔的霍亨施陶芬师的一些部队正在迅速前往战场，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哈梅尔本人预计将在夜间从德国返回——也在行进。比特里希已经命令哈策尔，把他的司令部移到俯瞰城市的阿纳姆北郊一所中学里，转移正在进行。但哈策尔已经急不可耐了，原定于下午早些时候前往德国的装甲车，仍然在重新装备履带和大炮。哈策尔已经把那些最靠近英军着陆区域和空投场的部队，转移进了阿纳姆以西的一些封锁性阵地，眼下他只有几辆装甲小汽车、几门自行火炮、几辆坦克以及一些步兵。尽管如此，但哈策尔仍然希望，通过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能够使英军陷于停顿并把他们弄糊涂，直到他的师的主体再次做好战斗准备。

奇特的是，哈策尔甚至都不知道，泽普·克拉夫特少校的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训练后备营就在这个地区，而且此刻正是位于英军空降部队道路上的唯一部队。哈策尔把兵力集中在进入阿纳姆的那两条主要公路上：一是从埃德通往阿纳姆的马路，一是从乌得勒支通往阿纳姆的马路。他确信，那些伞兵必须要使用这些主要的干线，所以把部队部署在一个跨越这两条公路

的半圆形屏障上。由于疏忽，或者也许是因为此刻他兵力不够，哈策尔没有把任何兵力部署在一条安静的公路支线上，那条支线与莱茵河的北岸平行，是英军能够走上阿纳姆大桥的唯一没有设防的路线。

11



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穿着作战伪装服，戴着有特色的防撞头盔，背负着沉重的武器和弹药，正在前往阿纳姆。在行军的伞兵纵队当中，夹杂着拖着大炮的吉普车、装载着枪支和补给品的四轮大车。当罗伊·厄克特将军注视着他们通过时，记起了几个月前霍罗克斯将军对他的恭维。“你的士兵是绝好的士兵！”霍罗克斯敬佩地说。厄克特当时认为这话言过其实，而在这个星期日，他不再那么想了。当第一伞兵旅出发的时候，厄克特心中涌起了一阵骄傲。

计划要求，拉思伯里旅的三个营将在阿纳姆会合，每个营都从不同的方向前进。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第二营，被给予了那个首要的出击目标：弗罗斯特的部下要沿着靠近莱茵河北岸的一条公路支线行军，前去攻占那座主要的公路桥；在途中，他们要攻占那个大渡口西边的铁路桥和公路桥。第三营，在J·A·C·菲奇中校的率领下，将沿着乌得勒支通往阿纳姆的马路前进，从北边靠近大桥，从而支援弗罗斯特。一旦这两个营的投入成功，D·多比中校的第一营就要沿着埃德通往阿纳姆的公路———这是最北边的路线———进军，占领城市北边的高地。拉思伯里给每条路线都起了一个代号。多比的路线，也就是那条最北边的路线，定名为“豹子”；菲奇的路线，也就是那条中间的路线，定名为“老虎”；而弗罗斯特的路线，也就是那条最关键的路线，则定名为“狮子”。弗雷迪·高夫少校侦察连的吉普车将在整个旅的前面疾驶，对他们的期望是：到达大桥，发起突击夺取大桥，并坚守大桥直到弗罗斯特到达。

厄克特认为，到目前为止开端的阶段进展顺利，对这时师内部通信手段的故障，他并没有惊恐。在北非的沙漠战役中，他经常经历暂时的信号中断。希克斯准将第一机降旅的任务，是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为空运坚守着陆区域和空投场，既然厄克特无法用无线电与第一机降旅取得联系，所以他便开车前往希克斯的司令部。他得知，该机降旅已经进入阵地，此刻希克斯正在别的地方指挥他的各个营。在希克斯的司令部里，厄克特却得到了一个消息，攻占阿纳姆大桥计划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出了差错：他被告知———是被错误地告知的———弗雷迪·高夫少校的大多数侦察车，在滑翔机失事中失去了；希克斯司令部里所有的人，谁也不知道高夫去了什么地方。厄克特没有等希克斯返回，便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司令部。他需

要迅速找到高夫并制订出某个可供选择的计划，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是要提醒拉思伯里尤其是提醒弗罗斯特，第二营是单独作战。弗罗斯特将无法得到计划中的高夫的突然进攻的帮助，而去攻占阿纳姆的桥梁。

在师部，更坏的消息在等待厄克特。“不仅毫无高夫的消息，”厄克特回忆说，“而且除了收到一些短程的信号之外，司令部的通信手段完全失效了。第一伞兵旅，甚至外部世界，都无法联系到。”厄克特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看到，将军踱来踱去，“焦躁不安，急于得到消息”。厄克特命令他的信号军官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调查“通信系统的紊乱，看看无线电设备出了什么毛病，然后纠正过来”。通信员也被派了出去，前去寻找高夫。由于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又没有新的信息，焦虑的厄克特决定不再等待。通常他会在师司令部里指挥战斗，但现在，他开始感到这场战斗绝不能按正常的情况进行了。他转向麦肯齐，说道：“我想我要亲自出去看一下，查尔斯。”麦肯齐并没有试图阻止他。“在那个时候，”麦肯齐回忆说，“既然我们实际上得不到任何信息，那么出去看看似乎并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厄克特动身去找拉思伯里了，吉普车里只带着他的司机和一个通信兵，时间是下午4点30分。

沿着那条北部的豹子路线———也就是埃德通往阿纳姆的马路，弗雷迪·高夫少校的第一机降旅侦察部队，在路上花的时间比预计的要少。尽管A装甲连的车辆未能到达，但高夫却在下午3点30分，与其他的连一起从着陆区域出发了。他自信，他有足够的吉普车，可以对大桥尝试进行突袭。“事实上，”他记得，“我把几辆吉普车留在后面的着陆区域了，以备后用。我们赶往阿纳姆的吉普车绰绰有余。”高夫甚至还从他的部队里派出了12个人朝南边前进，以便与第二营会合，并沿着狮子路线前往大桥。他并没有意识到，A装甲连吉普车的丧失已经引起一阵谣传和一些错误的情报。(注)

从一开始，高夫就对他的侦察部队在阿纳姆计划中的作用，持有保留意见。高夫极力主张，不应该进行突袭，而是应该派出侦察吉普车，在这三个营的每一个营前面组成掩护屏障。“这样的话，”他说道，“我们就会迅速发现到达大桥的最佳而且最容易的方式。”他要求，如果这不行的话，就用滑翔机带进一支轻型坦克部队来护送突击部队。这两个要求都被拒绝了，然而高夫却仍然持乐观态度：“我一点都不担心。据认为在阿纳姆只有几个上了岁数的灰白头发的德国人，以及一些老掉牙的坦克和大炮。我预料胜利将唾手可得。”

现在，当他们沿着豹子路线迅速前进的时候，这支部队的先头吉普车，突然遭到了德国人的装甲车和22毫米大炮的伏击。高夫的副手戴维·奥尔索普上尉，碰巧把这个时间记下了：正好是下午4点。高夫超车，以便行驶到

纵队的前面进行调查。“正当我要到前面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厄克特要立即见我。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高夫说道，“我是由拉思伯里管的，我想我起码应该告诉他我出发了，但又不知道他在哪里。这支部队现在正在进行一场炮火猛烈的战斗，被压在沃尔夫黑策郊外铁道附近的防御阵地里，动弹不得。我认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不会有麻烦，所以我转了回去，前往着陆区域的师司令部。时间是在下午4点30分。”

恰恰在厄克特将军动身去寻找拉思伯里的那个时刻，高夫正快速返回师部，去向厄克特汇报。

在三条战略行军路线的各个地方，第一伞兵旅的官兵都遇见了成群结队兴高采烈、歇斯底里的荷兰人，许多来自农场和边远小村子的老百姓，从伞兵一离开着陆区域就跟着他们，而随着人群的增长，欢迎就似乎压倒了行军本身。埃里克·麦凯上尉与弗罗斯特上校的第二营一起，在最南边的路线，也就是狮子路线上行走着，这种节日气氛令他不安。“我们受到荷兰老百姓的牵累，”他说道，“他们招手，欢呼，鼓掌，给我们送来苹果、梨以及喝的东西。但他们干扰了我们的进程，让我充满了惧怕，害怕他们会暴露我们的阵地。”罗宾·弗拉斯托中尉记得：“我们行军的第一部分，具有一个胜利游行的性质，老百姓欣喜若狂。这一切是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我们几乎都要预料会看见霍罗克斯第三十军的坦克，从阿纳姆出来迎接我们。人们在马路上排列成行，用大盘子端着啤酒、牛奶和水果送了上来。在迫使他们意识到德国人的进攻是可能的这一点上，我们遭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安赫·范·马尔南的父亲是奥斯特贝克的医生，安赫回忆说，她接到了在黑尔苏姆的特罗姆珀家打来的兴高采烈的电话，黑尔苏姆就在伦库姆荒原英军着陆区域的南边。“我们自由了。自由了！”特罗姆珀家告诉她，“英国兵在我们家的后面空投了，正在前往奥斯特贝克。他们太好了！我们抽运动员牌香烟，吃巧克力。”安赫放下电话。“高兴得都要发疯了。我们全都跳了起来，兜着圈子跳舞。就是这样！一次进攻！真让人高兴！”17岁的安赫几乎无法等到她的父亲回家。范·马尔南医生正在一个病人的家里接生，安赫认为，这“非常恼人，尤其是现在，因为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一个荷兰纳粹”。伊达·克劳斯太太，是奥斯特贝克一位牙医的妻子，也是范·马尔南家的朋友，她也听说空降部队正在途中。她极度兴奋，在箱子和缝制品碎片中寻找她所拥有的每一片橘黄色，她打算当英国人到达奥斯特贝克的时候，就带着她的三个小孩子冲出去，举着手工缝制的橘黄色小旗迎接这些解救者们。

扬·沃斯奎尔正在奥斯特贝克他岳父母的家里躲藏，他本人想沿着乌得勒支马路前去迎接伞兵。同时又要避免岳父同他一起去，这让他苦恼。老人家是固执的：“我78岁了，以前从未参加过战争，我想看一看战争。”沃斯奎

尔的岳父最终被说服了，待在花园里，而沃斯奎尔则加入到川流不息的其他平民当中，出去迎接英国人，但在奥斯特贝克郊区，他们被一个警察挡了回去。“这太危险了，”警察告诉人群，“回去吧。”沃斯奎尔慢慢地走回家，途中他与那个曾经见过的德国士兵不期而遇，在上午轰炸开始的时候，那个德国兵曾要求躲避。现在那个士兵穿着制服和伪装外套，头戴钢盔，手持步枪。他给了沃斯奎尔一些巧克力和香烟。“现在我要离开了！”他说道，“英国兵要来了。”沃斯奎尔微笑了。“呃，你要回德国了。”他说道。那个士兵端量了沃斯奎尔几秒钟，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不，先生，”他告诉沃斯奎尔，“我们将战斗。”荷兰人注视着德国人走开了。“现在开始了，”沃斯奎尔心中想，“可是我能做什么呢？”他在院子里焦躁地踱来踱去。他可做的只有等待。

荷兰农夫和他们的家人，并没有受制于警察的限制，也没有受制于要求他们待在家里的警告，而是蜂拥在每一条行军路线上。走在中间的那条路线，也就是老虎路线上的准尉副官哈里·卡拉汉记得，一个农妇从人群中挣脱出来，拎着一罐牛奶朝他跑来。他向她道谢，那个女人微笑着说道：“好，英国兵。好。”但是，就像在南边那条路上的埃里克·麦凯一样，卡拉汉这位经历过敦刻尔克撤退的老兵，也为围绕着部队的平民数量伤脑筋。“他们在我们旁边沿途跑着，戴着袖章，系着围裙，别着小小的缎带，全都是橘黄色的。”他记得，“孩子们把橘黄色的小布片别在他们的裙子或者短上衣上，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尖叫着。男人中的大多数都在伸手抓他们的背包，要递给他们巧克力。这是一种如此不同的气氛，结果士兵们就好像在进行演习似的。我开始担心起狙击手来了。”

果然如同卡拉汉惧怕的那样，这个胜利大游行突然停止了。“这一切全都发生得如此迅速。”他说，“头一分钟，我们正在平稳地向阿纳姆进军，可下一分钟，我们就散开在壕沟里了。狙击手开火了，三个死去的空降兵横躺在马路上。”这位准尉副官老兵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他发现，前面大约50码的树丛里有火苗蹿出。在荷兰人散开的时候，卡拉汉率领12个士兵冲向前去。他在一棵树的面前突然停下，朝上看着。有什么东西在闪耀。他举起他的斯特恩式轻机枪，直接朝树上扫射。一把施迈瑟式自动手枪啪的一声落在地上，当卡拉汉沿着树干向上看去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德国人松沓沓地悬荡在一根绳子上。

现在，在中间的那条路线上，菲奇中校第三营的其他人也突然进行了一场意外的遭遇战。列兵弗雷德里克·贝内特刚刚把一些苹果递给周围的伞兵，一辆德国的参谋车突然快速从马路上驶来。贝内特用他的斯特恩式轻机枪扫射。那辆汽车戛然刹住试图倒退，但是太晚了。贝内特旁边的每一个人都开始射击，汽车猛地停了下来，车身上尽是窟窿。当伞兵们小心翼翼走近的时候，他们看见司机的半个身子挂在车门外面，一位德国高级军官尸

体的一部分伸在另外一扇门的外面。在贝内特看来，“他似乎是某个高级德国军官”。他的确是一位高级德国军官。阿纳姆城防司令库辛少将，没有理会党卫军少校泽普·克拉夫特不要走那条乌得勒支至阿纳姆主要马路的警告。注

许多人回忆起，在行军的第一个小时之后———下午4点30分左右，德国人第一次认真的抵抗开始了。然后，那三个营当中的两个———在北边路线上的多比营，以及在中央路线上的菲奇营———意外地与敌人“打了就跑”的猛烈进攻进行交战。高夫少校的侦察部队现在由奥尔索普上尉指挥，他们正不顾一切地试图找到一条路，以便从侧翼包抄德国部队，为多比的第一营开路。但是，按照奥尔索普的说法：“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被面前的敌人兵力阻滞了。”侦察部队的伞兵威廉·钱德勒记得，当他的C装甲连勘察地形的时候，“德国人的子弹来得太近了，太密集了，飞过去的时候几乎令人感到灼痛”。

这个营在靠近沃尔夫黑策的时候，几乎被彻底挡住了。“我们停了下来，”列兵沃尔特·博尔多克回忆说，“然后我们又再次出发。然后我们停了下来，挖掩体防守。然后，我们又再次出发，改变了方向。我们的进展取决于先头连的成功。一路上迫击炮弹和子弹不断骚扰我们。”在一个篱笆的旁边，博尔多克看见了一位他认识的中士，他负了重伤躺在那里。再往前，又发现了一位中尉闷燃着的尸体，他是被一颗含磷炸弹击中的。对另外一名士兵罗伊·N·爱德华兹列兵来说，“那就像在整个下午，我们不断地在乡下迂回绕行，陷入运动作战之中”。

敌人林荫大道的凶猛进攻，让伞兵们大吃一惊。在北边路线上的列兵安德鲁·米尔本，听见南边的远处传来枪炮声，片刻间因为一营被安排坚守在阿纳姆北边的高地而感到高兴。然后，在靠近沃尔夫黑策的时候，米尔本意识到，纵队已经向南转弯，离开主要马路了。他看见了火车站，靠近车站的地方有一辆坦克。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兴高采烈。“天哪！”他想到，“蒙蒂是对的。第二集团军已经到了这里！”然后，当坦克的回转炮塔缓慢转过来的时候，米尔本看见坦克上漆着一个黑色的十字。突然，他似乎看到到处都是德国人。他俯身跳进一个沟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开始寻找一个好的地点，以便把他的维克斯式机关枪架起来。

中士雷金纳德·伊舍伍德也看见了这辆坦克。一辆拖着一门轻型火炮的吉普车开了上来，开始转圈，以便与它交战。“他们的一位军士喊道，‘我们最好比他们先开炮。否则我们就被击中！’”伊舍伍德回忆道，“火炮像闪电一般转了过来，当我们的人喊‘开炮’，的时候，我听见德国指挥官也喊‘开炮’那些德国兵一定比我们早十分之一秒把他们的炮弹发射了出来。”坦克炮直接击中了对手。吉普车爆炸了，炮组人员被炸死。

混乱在增加，各处都传来极为强烈的枪炮声，多比上校现在清楚，前面的抵抗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要猛烈。他不认为仍然还有占领阿纳姆北边高地的可能性。他无法通过无线电与拉思伯里准将取得联系，他的伤亡每一分钟都在增加。多比决定把部队向更南边一点的地方转移，试图与正在前往阿纳姆大桥的弗罗斯特会合。

通信手段的故障，以及随即造成的指示欠缺，使得各个营的营长不可能清楚地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在不熟悉的乡下，所携带的地图又往往被发现是不精确的，因而各连和各排也频繁地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库辛将军是被菲奇上校的第三营击毙的，就在击毙库辛将军的马路附近一个十字路口，英国人受到党卫军少校克拉夫特的迫击炮和机枪的沉重打击。行军的纵队溃散了，士兵们分散进入了树林。发出尖锐刺耳声音的迫击炮弹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爆炸，朝每个方向掷出致命的碎片。

通信兵斯坦利·海斯清晰地记得敌人的强烈骚扰。他快速跑向树林。奔跑的时候把一台备用的无线电发射机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拾发射机的时候，脚踝被击中了。海斯勉强爬进了树林，当他倒进低矮树丛的时候，他意识到在他旁边的那个人是德国人。“他年轻，就像我一样被吓坏了，”海斯说道，“不过他却用我的战地绷带给我包扎了脚踝。没过一会儿，迫击炮的炮火使我们俩都再次负伤，我们只是躺在那里，等人把我们抬走。”海斯和那个年轻的德国人一起待在那里，直到天完全黑了以后，英军的担架兵才发现他们，并把他们撤离出去。

就像第一营一样，第三营也被压得动弹不得。在马路上行军两个小时之后，这两个营都走了不到两英里半的路程。现在，菲奇上校得出的结论，就像在北边那条马路上的多比的结论一样：他也得找到一条赶往阿纳姆大桥的替代路线。时间是珍贵的，而大桥还有足足4英里远。

在沃尔夫黑策周围的树林里，党卫军少校泽普·克拉夫特确信他被包围了，他估计，英军与他不满员的营的人数比例为20：1。他认为他的防御是“发疯”，甚至几乎无法相信他的封锁行动已经取得了成功。火箭推进的迫击炮已经在英国人当中造成了浩劫，而且他的部下现在报告说，沿着乌得勒支至阿纳姆公路行进的伞兵们，在一些地方陷于停顿，而在别的一些地方则好像完全放弃了大马路。克拉夫特仍然认为，他的部队是该地区唯一的德国部队，他对长时间阻止英军不抱幻想。他的迫击炮弹正在用完，伤亡严重，而且他的一位中尉还开了小差。尽管如此，克拉夫特还是对“我的小伙子们有胆量的冲劲”感到兴高采烈。这位野心勃勃的克拉夫特，后来就有关他的精锐部队训练后备营的战斗，给希姆莱写了一份令人厌恶的邀功请赏的报告，他并不知道，他的“小伙子们”此刻正得到瓦尔特·哈策尔中校霍亨施陶芬师的坦克、火炮和装甲车的支援，该师就在克拉夫特本人司令部东边只有一两英里的地方。

弗雷迪·高夫少校彻底被难倒了。厄克特召他返回师部的命令，并没有暗示这位将军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高夫离开第一营的豹子路线时，随身带着他侦察部队的4辆吉普车和护卫队。现在，在师司令部，厄克特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也无法让他搞清楚厄克特的意图。麦肯齐说，将军去寻找拉思伯里准将了，拉思伯里的司令部沿着南边的狮子路线，跟在弗罗斯特上校的那个营后面。高夫带着他的护卫队，又再次动身出发了。想必在那条路线的某个地方，他将能够不是找到厄克特将军，就是找到拉思伯里准将。

12



厄克特将军的吉普车沿着乌得勒支至阿纳姆的公路疾驶，又驶离主干道，进入一条能把他带到弗罗斯特狮子路线的旁路上。没过几分钟，他就赶上了第二营的断后部队。他们正沿着马路两侧，成单行纵队行进着。厄克特能够听见远处传来了枪声，但在他看来，“并没有紧迫感。每一个人都在缓慢地行进着”。厄克特驱车沿着鹅卵石的马路迅速前进，赶到弗罗斯特司令部所在的那个连，结果发现弗罗斯特正在前面，与遭遇到德国人抵抗的先头部队在一起。“我试图透露出一种紧迫感，我希望他们能把那种紧迫感传达给弗罗斯特，”厄克特写道，“于是便把侦察连的厄运告诉了他们。”厄克特得到消息，说拉思伯里为了了解三营的情况，去了中间的那条马路，于是他又顺原路返回。他与高夫再次失之交臂，时间只差几分钟。

在到达老虎路线上第三营的断后部队的时候，厄克特将军被告知，拉思伯里到前面去了。他跟了过去。在乌得勒支至阿纳姆公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厄克特找到了准将。这个地区正遭到迫击炮毁灭性的打击。“迫击炮弹正以令人不安的精确性，落在这个十字路口，落在第三营的许多人正在隐蔽的那块林地上，”厄克特后来写道，“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真正的证据，说明德国人的反应有着什么样的速度和决心。”

厄克特与拉思伯里在一条狭长掩体里隐蔽着，讨论了这个形势。两位军官都对目前的缓慢进展感到担忧，而现在通信手段的关键性缺失又使得他们本人的指挥陷于瘫痪。拉思伯里与第一营完全失去了联系，与弗罗斯特也仅仅是有断断续续的交流。显然，他们两人只能够在他们碰巧所在的地方指挥作战。眼下拉思伯里最关心的，是如何使第三营离开那个十字路口，从周围的树林里走出来，再次前进。厄克特决定，尝试用吉普车上的无线电与师司令部取得联系。当他走近吉普车的时候，看见车被一枚榴弹炮击中了，他的通信兵受了重伤。尽管那台发射机似乎没有受到损坏，但厄克

特却已无法与师部联络了。“我诅咒那糟透了的通信手段，”厄克特后来写道，“拉思伯里劝我不要试图返回我本人的司令部。现在，在我们与着陆区域之间，敌人随处可见……我认为他是对的……于是我留了下来。但正是在这个时刻我意识到，我正在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一营和三营的官兵正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小规模的激烈战斗。冷酷无情而又不顾一切的武装党卫军虽然在人数上占少数，但却得到半履带式车辆、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他们正使得北边两条马路上英军的进军沦落为爬行。在混乱当中，士兵与军官彼此分开，各连分散进入树林，在路旁或者在房屋的后花园里作战。“红毛鬼子”们一开始对德国装甲部队的力量感到惊讶，现在已经缓过劲来，尽管他们蒙受了沉重的伤亡，却或者以个人或者以小组，顽强地进行反击。虽然如此，一营和三营按照计划到达阿纳姆目标的机会，仍然是微乎其微。现在，一切都依赖于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的二营了，二营正稳定地沿着下莱茵河马路前进，那是德国人已经不再过多考虑的次要路线。

尽管弗罗斯特的营曾数次短暂地受阻于敌人的炮火，他却拒绝让他的部下散开。他的先头部队是A连，在迪格比·泰瑟姆 - 沃特少校的率领下向前强行军，士兵掉队也不等待，让他们加入到从后面跟上来的连队。从先遣部队抓获的俘虏口中，弗罗斯特得知，党卫军的一个连正在挡住阿纳姆的西边入口。全营开着自己的吉普车和缴获来的一些交通工具，在前面和两边进行侦察后，又继续前进。下午6时刚过，弗罗斯特的第一个出击目标，也就是偏奥斯特贝克东南方向的下莱茵河铁路桥，出现在眼前。按照计划，维克托·多弗少校的C连离开队伍，朝河边奔去。当他们靠近时，大桥空无一人，没有设防。21岁的彼得·巴里中尉，奉命率领他的排过河。“我们动身的时候，那里是安静的，”巴里回忆说，“当我们跑过田野的时候注意到，到处都是死去的牲畜。”当巴里距离大桥不到300码时，他看见，“有一个德国人从另外一边跑上了桥。他来到桥的中央，跪下来，开始做什么事情。我立即叫一个班开火，叫另外一个班向桥上冲。这时候，那个德国人已经消失了。”

巴里回忆说，他们“上了桥，开始全速跑去。突然，一个巨大的爆炸发生了，桥在我们的面前被炸毁了”。皇家工兵部队的埃里克·麦凯上尉感到，这个冲击震撼着大地。“一股橘黄色的火焰冲上来，然后黑色的烟在桥上升起。我认为，从南岸数，在桥第二个跨度的那一段被炸掉了。”麦凯说。桥上，在烟雾弹的掩护下，巴里中尉命令他的士兵离开桥的残骸，返回北岸。而当他们开始移动时，躲藏在河对岸的德国人开火了。巴里的腿和胳膊被击中，还有两个人负了伤。麦凯从一开始就对这次作战行动感到不安，他记得，他注视着伞兵们在烟与火中返回时想到：“唔，第一座被炸掉了。”弗罗斯特上校则要豁达一些了。“我知道，那三座大桥当中有一

座被炸掉了，但这并不重要。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利条件。”现在是下午6点30分，还剩下两座桥。

13



霍亨施陶芬师的工兵们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哈策尔原先计划要送回德国的那些坦克、半履带式车辆和装甲运兵车，全都再次装配起来。现在，刚刚授过勋的保罗·格拉布讷上尉，与他做好了准备的拥有40辆车的侦察营一起，从阿纳姆北边的霍恩德罗兵营出发了。哈策尔给他的指示是，大面积搜索阿纳姆与奈梅亨之间的地区，以便估计那个地区盟军空降部队的力量。格拉布讷迅速穿过阿纳姆，并且通过无线电告知司令部，那座城市似乎被遗弃了，没有迹象说明有敌人的部队，接近下午7点时，格拉布讷的部队越过了阿纳姆公路大桥。在大桥南端1英里的地方，格拉布讷停下车报告说：“没有敌人。没有伞兵。”轻装甲车队一英里又一英里地缓慢行驶着，在公路的两边巡逻，格拉布讷的无线电信号一直传递着相同的信息。在奈梅亨，消息仍旧没有改变。按照霍亨施陶芬师司令部的指示，格拉布讷接着在奈梅亨的郊区巡逻，然后返回司令部。

格拉布讷的部队与弗罗斯特二营的先头部队，大约以一个小时的时间差交错而过。甚至就在格拉布讷驱车驶出阿纳姆城的时候，弗罗斯特的部下则正在城内，悄悄地接近他们剩余的出击目标。莫名其妙的是，尽管比特里希将军下达了清楚明确的指示，但哈策尔还是没能彻底守住阿纳姆大桥。

14



天色黑下来的时候，弗罗斯特上校加快了该营前往下一个目标的步伐，那个目标就是在阿纳姆大桥西边不到1英里处的那个浮桥渡口。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的A连仍然打头阵，在阿纳姆西郊的高地上，他们再次短暂受阻。敌人的装甲车和机枪，迫使连队离开马路，进入附近房屋的后花园。弗罗斯特从后面赶来，发现有10个德国人被A连的一个孤零零的士兵看守着，他后来写道：他猜测，“迪格比的后花园策略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该连又再次向前冲去”。弗罗斯特又返回了营部。黄昏时，一阵阵炮火不时地扫过马路，当士兵们前进的时候，他们走过损坏了的车辆，还有若干名死去或者负伤的德国人———弗罗斯特想，这是明显的证据，说明“迪格比的进展非常令人满意”。

该营迅速穿过阿纳姆的街道，到达那座浮桥，停了下来，面对着他们的第二个挫折。这座浮桥的中央一段已经被拆掉，桥已经毫无用处了。麦凯上尉看着被拆开的渡口，认为："在这整个搞砸了的行动中，它具有代表性。我本人的想法是，现在我们得夺取那另外一座该死的桥。"他朝远处凝望。在不到1英里远的地方，那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桥在黄昏最后的亮光中露出了轮廓。

在三营的老虎路线上，厄克特将军时断时续地前往阿纳姆，毫无疑问，他知道他被困住了。天越来越黑，敌人的突袭又在不断地骚扰着行军，他已经没有可能返回师司令部了。他的心情郁闷。"每迈出一步，我都希望能够知道别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就在夜幕降临之前，厄克特得知，三营的先头连队已经到达了奥斯特贝克的郊外，"在某个叫作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地方……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厄克特后来写道，"拉思伯里在与营长菲奇讨论之后，叫大家停了下来"。

在远离马路的一幢大房子里，厄克特与拉思伯里准备过夜。房主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荷兰人，他并没有理会将军因给他和他的妻子带来不便而表示的歉意，将楼下一间能俯瞰大马路的前屋给了两位军官。厄克特烦躁不安，无法放松下来。"我不断地询问是否与高夫或者弗罗斯特取得了联系，但不论是从我的司令部还是从任何一个别的什么人，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那座大桥阴森森地耸现在前面。单是那些水泥坡道自身就是巨大的综合建筑群，马路在坡道的下面，从西向东沿着河伸展开来。在两侧，房屋和工厂大楼的屋顶与坡道的高度齐平。巨大的桥梁入口，以及横跨莱茵河的高高拱形大梁，在暮色之中显得令人生畏。终于，这就是那个主要的出击目标了———蒙哥马利胆大妄为的计划的核心———而为了到达这里，弗罗斯特的部下已经在行军中作战了将近7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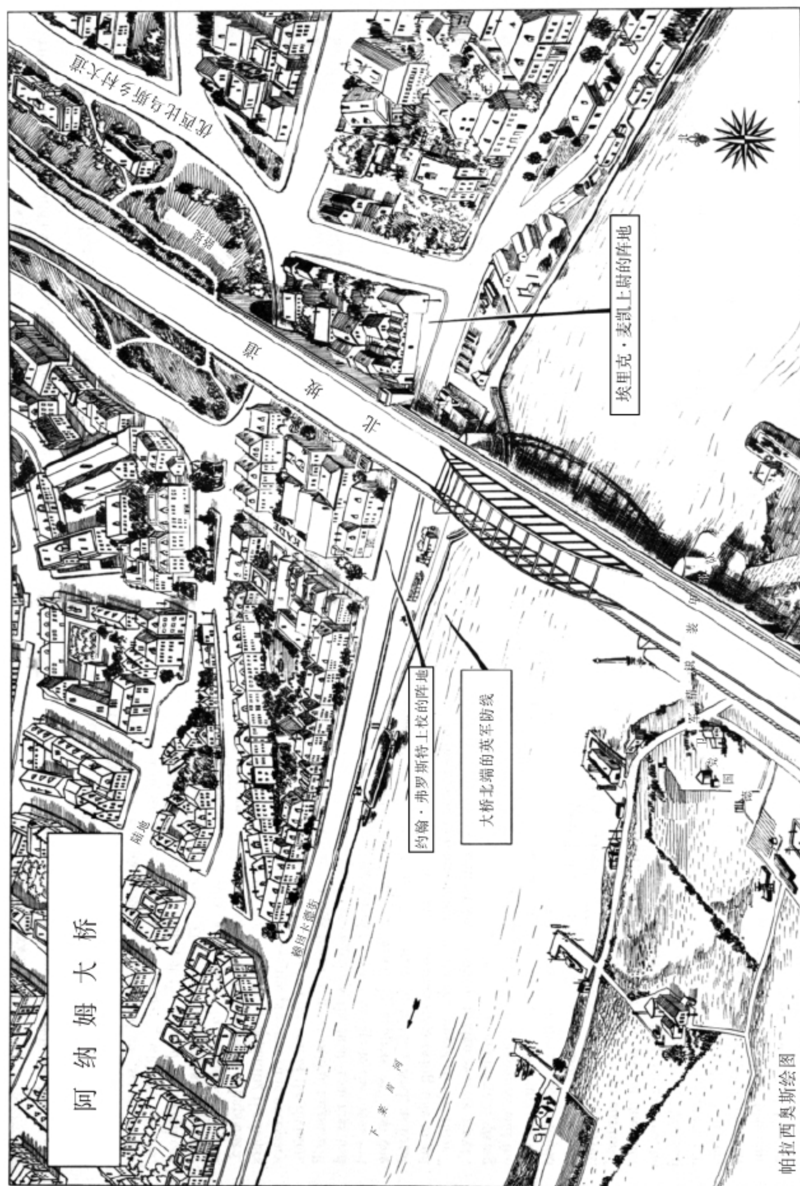
现在，当二营的先头部队靠近大桥的时候，率领A连某排的罗宾·弗拉斯托中尉，对"它难以置信的巨大高度"感到吃惊。弗拉斯托注意到，"在每一端都有碉堡，甚至在这种被遗弃的普遍气氛中，它们也显得险恶"。黑暗之中，A连悄悄地在北端的巨大支座下面进入阵地。在他们的上面，车辆在缓慢地隆隆行驶着。

皇家工兵部队的埃里克·麦凯上尉，经由一条条镶嵌画般的街道，靠近了大桥，来到一个通往大桥的小广场。他记得："当我们在街道当中走过的时候，那种安静令人压抑，我们的周围似乎到处都有什么在轻轻地运动。士兵们开始感到那种紧张，我希望能尽快到达大桥。"突然，黑暗被来自一条小街的德国人的炮火撕裂了。工兵的一辆运送炸药的手推车被炸飞，火焰把人们照得一清二楚。麦凯立即命令他的部下带着设备跑过广场。他们

不顾德国人的炮火，全速跑了过去。没过几分钟，也没有损失一个人，他们就来到了大桥。麦凯研究了北坡道下面的地形，看见在东边有4幢房子。“其中一幢是一所学校，它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角落里，”他记得，“我认为，谁占据了这些房子也就占据了大桥。”麦凯迅速命令他的工兵进入学校。

晚上8点过后不久，弗罗斯特上校和营司令部到达了。弗罗斯特已经派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的B连带着反坦克炮前往附近路堤上方的高地，以保护本营的左翼，并让A连能够脱身全速冲向大桥。[注]在多弗少校的率领下，C连得到的指示是跟随先遣部队进入城市，夺取德国城防司令部。现在，在桥上，弗罗斯特无法用无线电与这两个连取得联系。他迅速派遣通信员去确定他们的下落。

弗罗斯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命令A连的各排上桥。当士兵们开始通过的时候，德国人活跃起来。士兵们遭到了来自北端的碉堡，以及来自桥南端的一辆孤零零的装甲车的扫射。一个排的兵力，在埃里克·麦凯携带着火焰喷射器的皇家工兵的帮助下，开始越过房屋最上面的一层，那些房屋的屋顶和阁楼上的视线，与坡道在同样的高度上。与此同时，弗拉斯托中尉的那个排费劲地穿过地下室和地窖，从一幢房子走到另外一幢房子，最后来到麦凯所处的位置。各就各位之后，他们攻击了那座碉堡。弗罗斯特回忆说，当火焰喷射器喷射火焰的时候，“地狱似乎打开了。天空照亮了，机枪射击一片喧闹，爆炸接二连三，燃烧着的弹药噼噼啪啪，有一门加农炮砰然作响。附近一幢木建筑被包裹在火焰里，痛苦和恐惧的尖叫声传了出来。”[注]现在，弗罗斯特也能够听见，弗拉斯托的步兵反坦克炮[注]打进了碉堡。这场短暂的野蛮战斗似乎是突然结束的，碉堡里面的枪炮安静下来。弗罗斯特看见，在烈火当中，德国士兵蹒跚着朝他的士兵们走去。A连已经成功地清理了大桥的北端，北端现在是他们的了。但是现在，牵制性的炮火和爆炸着的弹药，使得冒险第二次冲锋以夺取大桥南端的行动成为一种自杀。要是早上半个小时的话，弗罗斯特是能够取得成功的。[注]但现在，在南岸，一群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已经进入了阵地。



弗罗斯特再次尝试与克劳利少校取得联系，他想找出一些船只的正确位置，克劳利的连可以乘坐这些船过河进攻南岸的德国人。无线电通信手段再次失效。更糟糕的是，甚至通信员也无法找到那个连；而且他们还报告说，看不见有船。至于C连，派出去与他们联系的小分队在德国城防司令部附近被压得动弹不得，正在激战。

弗罗斯特的士兵们神色严肃地朝阿纳姆大桥的对面望去。坚守南端的德军到底兵力如何？甚至现在A连也认为，只要能找到船工和船只，就有机会突袭过河夺取南端。

但那个机会已经失去了。这是阿纳姆战役中的一个巨大反讽，因为下莱茵河本来能够在着陆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渡过去。就在西边7英里的地方，在赫维多普村———弗罗斯特的营在前往出击目标的途中就经过了该村———有一个巨大的钢索渡口，它能够摆渡汽车和乘客，在北岸的赫维多普和南岸的德里尔之间，它全天都在下莱茵河的正常航道上来回摆渡。对这个渡口，弗罗斯特一无所知，而且它也从未列在厄克特的出击目标之中。在对市场花园行动进行一丝不苟地计划的过程中，攻占阿纳姆大桥的一个关键———在德里尔的那个渡口———却被完全忽视了。注

弗雷迪·高夫少校跟在弗罗斯特营的后面，走在那条狮子路线上，终于赶上了拉思伯里的旅司令部。他迅速找到副旅长托尼·希伯特少校。“将军和准将在哪里？”高夫问道。希伯特不知道。“他们一起在什么地方，”他告诉高夫，“但他们全都离开了。”高夫现在是完全糊涂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回忆说，“我试图与师部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所以我只好决定，继续跟在弗罗斯特后面走。”高夫离开希伯特，又再次动身了。

天黑的时候，高夫和他的伞兵们驱车进入了阿纳姆，发现弗罗斯特和他的部下坚守着在大桥北端附近的阵地。高夫立即问厄克特在哪里。就像希伯特一样，弗罗斯特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还以为厄克特回到师部了呢。高夫再次尝试用无线电联系，现在令他更加担忧的是，在沃尔夫黑策附近他所指挥的侦察部队也没有任何消息。他再次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高夫命令他疲劳的士兵进入一座紧靠着大桥的建筑。高夫爬上房顶，恰好看见大桥的整个南端“在烈火中炸飞了”，那是弗罗斯特的士兵第一次试图夺取这个远端。“我听见巨大的爆炸声，大桥的整个南端似乎全都着火了。我记得有人说，‘我们大老远地赶到这里，结果却让这座该死的桥烧掉了’。”高夫本人片刻间也惊恐起来。然后，他透过烟雾看到，只是那座碉堡和一些存放弹药的棚屋被毁掉了。高夫既担心又疲惫，转身进屋，休息了几个小时。那一整天，他一条又一条路线地走，为的是寻找厄克特。现在，在大桥这个地方，起码有一个问题解决了。他又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他将在那里待着。

这个晚上，除了守卫大桥的北端，免遭南边敌人的进攻之外，弗罗斯特中校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仍然没有与他那两个失踪的连取得联系，现在，在俯瞰大桥位于一处角落的一幢房子里，弗罗斯特建起了营司令部。二营密码组的一等兵哈罗德·巴克记得，从房子的前窗户，司令部的人员能够朝外看到那条坡道。“屋子的边窗能让我们直接看到大桥，”巴克说道，“我们

的通信兵把天线伸到屋顶的上面，不断移动无线电发射机，但却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

自那以后不久，旅司令部到达了，在弗罗斯特附近一幢房子的阁楼里安顿下来。在与军官们商议了以后，弗罗斯特认为，很显然，现在的一营和三营，要么是在老虎路线和豹子路线上受到了阻碍，要么是在阿纳姆的某个地方，在大桥的北边作战。由于没有通信手段，就不可能清楚地说出发生了什么。但如果那两个营不能在夜间到达阿纳姆，那么德国人就会拥有宝贵的时间，足以把在本部和师的其他部队之间的地区封锁起来。除此之外，弗罗斯特还担心，那座大桥仍然可能被炸掉。在工兵们看来，炮火产生的热已经烧断了铺设在大桥到城镇之间的任何保险丝，并且所有可以见到的钢缆都已经被切断了，但是谁也不能肯定是否还有电缆，它们可能藏在什么地方。而且，弗罗斯特回忆说：“炮火甚至使得任何人都不能走到桥上，去卸掉可能仍然在那里的炸药。”

但阿纳姆大桥的北端是在弗罗斯特掌握之中的，他和他勇敢的士兵们无意把它放弃。尽管他担心那两个失踪的连，担心其他部队，但却没有把他的担忧表现出来。他访问了大桥附近几幢房子里临时营舍里的各个排，发现他的士兵“士气高昂，而且他们也有一切理由士气高昂”。列兵詹姆斯·W·西姆斯回忆说：“我们感到非常自鸣得意，因为上校开玩笑并对我们问寒问暖。”

在营司令部，现在，弗罗斯特本人在一天当中第一次安顿下来。他啜饮着一大缸子茶，心中想，总的说来形势并不是太坏。“在荷兰着陆之后的7个小时时间里，我们穿越了8英里危险的、困难的乡下……这确实是一件不错的武功。”弗罗斯特尽管坐立不安，但也像他的士兵一样，是乐观的。他现在拥有一支由各个兵种组成的大约500人的部队，他充满信心，认为丢失的那两个连将会来到他所在大桥的地方。不管怎么说，他充其量也只需要再坚守48个小时了———48个小时以后，霍罗克斯将军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就会到达。

15



从柏林到西部前线，盟军的突然进攻让德国统帅部大吃一惊。反应既凶猛又迅速的，只有阿纳姆一地，在那里，英军第一空降师几乎就空投在比特里希将军那两个装甲师的头上。而在别的地方，困惑而糊涂的指挥官们试图确定，9月17日的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是否确实就是对帝国的一次进攻的开端。已经预料到，英军将从比利时发起地面进攻。所有能用得上的预备部队，包括冯·扎根将军的第十五集团军，都损耗严重，士兵们除了他

们所携带的步枪以外几乎没有别的武器，这些预备部队都被投入防御阵地，以对抗那种威胁。战壕挖掘了出来，战略阵地建造了起来，他们全力以赴，要让英国人为了获得每一平方英尺的地面而不得不战斗。

谁也没有预见到，空降部队将会与英军的地面进军同时使用。这些空降进攻，是否就像柏林所惧怕的那样，是通过海路进攻荷兰的前奏？在夜晚的那几个小时里，当参谋官们试图分析形势的时候，有关额外的空降进攻的报告进一步令人困惑了。美国的伞兵，其兵力不为人知，部队番号仍没有确定，他们在艾因霍温—奈梅亨地区，而英军第一空降师显然已经在阿纳姆周围着陆。但现在新的消息又谈到，在乌得勒支郊外有伞兵，而另一个完全令人晕头转向的报告则声称，空降部队已经在波兰的华沙着陆了。注

在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位于科布伦茨的司令部里，普遍的反应是吃惊。注脾气暴躁、有贵族气派的冯·伦德施泰特，与其说是对这次进攻的性质感到惊讶，毋宁说是对指挥这次进攻的人感到惊讶，他推断，那个人一定就是蒙哥马利。一开始，冯·伦德施泰特怀疑这些突然的、显然是陆空联合的作战行动，是否就是艾森豪威尔进攻帝国的攻势的开端，这位陆军元帅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相信，巴顿和朝萨尔河大举猛攻的美军第三集团军，造成了真正的危险。为了与这个威胁作斗争，冯·伦德施泰特已经投入他最好的部队去击退巴顿疾驶的坦克。现在，这位德国最有名望的军人，暂时被搞糊涂了。他从来也没有预料到，艾森豪威尔的主要攻势是由蒙哥马利领导，他始终认为，蒙哥马利“过于谨慎，过于受习惯的支配，过于仔细周到”。

他对蒙哥马利所做动作的大胆感到震惊。从莫德尔的司令部雪片般飞来的电报，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调子，愈加表明了这个进攻的突然性和严重性：“我们必须考虑到，夜间将会有更多的空降部队着陆……敌人显然认为，他的进攻极为重要，英军针对施图登特取得了最初的较大的成功，已经向瓦尔肯斯瓦德推进……这里的阵地尤其至关重要……迅速而又强大的预备队的缺乏，正在增加我们的困难……B集团军群实际上已经捉襟见肘，其总的形势是危急的……我们要求，尽可能快地给我们装甲车、火炮、重型机动反坦克武器，以及防空部队，而且绝对不可少的是，我们应该日夜在空中都有战斗机……”

莫德尔用这些话作结：“……盟军主要集中在我们前线的北翼。”这位军官的意见，冯·伦德施泰特尊重过的次数屈指可数，他曾经尖刻地称他具有一位优秀的军士长的资质，而这次就是冯·伦德施泰特难得尊重他的意见中的一次。在他电报的这个片段中，有关这些令人吃惊的进展，莫德尔让冯·伦德施泰特摆脱了最后的怀疑。的确，B集团军群的“北翼”，就是蒙哥马利

利。

在夜晚的那几个小时里，不可能估计在荷兰的盟军空降部队的兵力，但冯·伦德施泰特却确信，能够预料还会有空降着陆。现在不仅有必要把德国前线的所有裂缝都堵住，而且还有必要同时为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找到预备队。冯·伦德施泰特不得不再次赌上一把。他的司令部发出了电报，把在亚琛面对着美国人的部队从阵地里调出来。这些动作是有风险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部队将不得不立即向北开拔，而等到他们能够参战，最少也是48个小时以后了。冯·伦德施泰特又给德国西北边界的那些防区下达了进一步的命令，要求所有可用的装甲部队和防空部队，前往荷兰安静闭塞的地方，这位陆军元帅现在确信，第三帝国迫在眉睫的危险就在那些地方。甚至就在德国的铁骑士为了支撑他的防御体系而彻夜不停地工作的时候，他也仍然默想着这个形势的奇怪之处。负责盟军的这个巨大攻势的军官是蒙哥马利，对此他仍然感到惊讶。

当载着威廉·比特里希将军的参谋车从他位于杜廷赫姆的司令部出发，赶到阿纳姆的黑暗街道的时候，夜色已经很黑了。比特里希决心亲自看一下出了什么事情。他在城市各处察看，火仍然在燃烧，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这是上午轰炸带来的后果。比特里希后来说，许多地区的死亡士兵以及闷燃着的车辆，都表明“发生过激战”。然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并没有获得清晰的印象。有两名在阿纳姆邮政总部的电话女话务员，比特里希后来授予了她们铁十字勋章，他从那两名女话务员收到的报告中得知，大桥已经被英军伞兵攻占了。比特里希大怒。他曾特别命令哈策尔要守住大桥，但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现在至关重要的是瓦尔河上的奈梅亨大桥，在美国人夺取之前必须得到保护。比特里希获得成功的唯一机会，就是要粉碎盟军沿着走廊所进行的袭击，并把英军挤压在阿纳姆地区，让其陷于停顿。现在，阿纳姆北端的伞兵，以及奋力要抵达伞兵那里的那几个散开的营，必须全部消灭。

落入库尔特·施图登特大将手中的那份绝密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最终来到了其新司令部里的陆军元帅莫德尔手中。莫德尔已经放弃了在杜廷赫姆城堡庭院里的那个园丁农舍，向东南移动了大约5英里，来到小村庄特尔博格附近。施图登特用了近10个小时的时间，才找到陆军元帅的去处，并用无线电把这个文件传了过去。市场花园行动计划是分成三个部分来到的，现在已经解码，因而也就全被揭示出来了。

莫德尔和他的参谋们专注地研究这个计划。在他们的面前，是蒙哥马利的全部意图：所使用的空降师的名称，在3天的时间里要进行的一系列空运和再次补给，着陆区域和空投场的精确位置，关键性的大桥出击目标———甚至还有所涉及的飞机飞行路线。哈策尔后来从陆军元帅本人那里得知，莫德尔说，这个计划是“异想天开”。它是如此异想天开，以至于在

最初几个关键的小时里，莫德尔居然拒不相信。

这些计划过于适当了，过于详细了，也就失去了可信性。莫德尔向他的参谋们提出，文件是这样精确，这使它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他再次强调了他本人的坚定信念，即在阿纳姆西边着陆的部队，是取道博霍尔特和明斯特，向鲁尔河发动大规模空降进攻的先头部队，博霍尔特和明斯特在东边大约40英里处。他警告说，应该预料还会有额外的空降着陆，而且他们一旦集结起来，就毫无疑问将突然向北转向，然后向东。莫德尔的推断并非没有根据。正如他对参谋们所说：“如果我们要相信这些计划，假定阿纳姆大桥是真正的出击目标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部队直接空投在大桥上？这里，他们来到的是适合集结的巨大开阔地区，不仅如此，还是在西边8英里的地方。”

莫德尔并没有告知比特里希有这个计划。“在战争结束之前，”比特里希说道，“我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不知道，莫德尔为什么不告诉我。不管怎么说，这些计划将只不过是确认我本人的见解，即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避免空降部队与英军第二集团军会合——而为了会合，他们当然需要这些桥梁。”在比特里希手下的一名军官，确实知道这个文件的消息。哈策尔中校也许是在陆军元帅的参谋们之外的唯一一名军官，莫德尔曾与之谈到这个计划。哈策尔回忆说：“莫德尔总是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好准备，所以他不是完全不重视这个计划。他告诉我，他无意被控制住。”只有时间才能告诉德国人，这个文件是否真实。尽管这位喜怒无常、难以捉摸的陆军元帅并不打算完全接受这个摆在他面前的证据，但它却给他的大多数参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德尔的司令部既然手中有了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因而就把那些空投行动通知了所有防空部队，根据计划，空投将在几个小时以后进行。

起码，有一个臆断被放弃了。总司令部的行政官古斯塔夫·赛德尔豪泽尔中尉回忆说，根据所缴获的文件，莫德尔现在的看法是，他和他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司令部，原来根本就不是空降部队的攻击目标。

16



就在约翰·弗罗斯特中校夺取了阿纳姆大桥北端的时候，对11英里以外另外一个首要出击目标的小心翼翼的逼近才刚刚开始。在走廊当中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防区的中央，位于奈梅亨的那座横跨瓦尔河的五孔公路桥，是霍罗克斯将军的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前往阿纳姆的途中，将通过的最后一个渡口。

詹姆斯·M·加文少将的第五○四伞兵团，以引人注目的成功夺取了奈梅亨西南8英里处的那座关键性的格拉夫大桥；而在大约晚上7点30分的时候，第五○四团和第五○五团的一些部队，夺取了霍伊曼村的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一个渡口，该渡口在格拉夫正东不到5英里的地方。加文本来希望把运河上的三个渡口以及一座铁路桥全都夺取，但希望落空了。在第八十二空降师夺取之前，德国人把那些桥炸掉了或者严重破坏了。然而，在着陆后的6个小时里，加文的伞兵已经形成了一条将由英军地面部队通行的路线。除此之外，格鲁斯贝克高地附近第八十二师的空投场与国家森林之间的那个地区，第五○五团的巡逻队进行探察的时候，只遭到了微乎其微的抵抗；而夜幕降临时，第五○八团的其他伞兵还夺取了荷兰与德国边界上的一块3英里半长的林地，那块林地在格鲁斯贝克高地空投场的北边，一直通向奈梅亨的东南郊。现在，第八十二师的四个关键出击目标当中，已经有3个掌握在手中，这样，一切就看对奈梅亨那座1960英尺长的公路桥的夺取了。

尽管布朗宁将军已经指示加文，等到格鲁斯贝克周围的高地被夺取以后，再前往奈梅亨渡口，但加文却自信，第八十二师的所有出击目标在第一天就能全部夺取。加文在大约24个小时之前对形势作了估计，然后把第五○八团的团长罗伊·E·林德奎斯特上校喊来，指示他派一个营全速赶往大桥。加文分析，在空降部队着陆所造成的惊讶和混乱当中，非常值得赌上这一把。“我提醒林德奎斯特，在街道上行进有被发现的危险，”加文记得，“我指出赶到大桥的方法，就是从城市东边接近大桥，而不要从建筑物多的地区穿过。”不管是因为他没有听明白，还是因为他想先把最初的几个任务完成，反正林德奎斯特本人的回忆是，一直到该团的其他出击目标获得成功之后，他才把他的伞兵投入到对大桥的攻击。一营的营长是小希尔兹·沃伦中校，林德奎斯特给一营下达的命令是，坚守格鲁斯贝克至奈梅亨的那条公路的防护阵地，那是在城市东南大约一英里多的地方。沃伦的任务是保卫该地区，并与在西边和东边的该团的另外两个营会合。沃伦回忆说，只有在这些任务完成以后，他才可以准备进入奈梅亨。这样一来，沃伦的那个营并没有从东边的平坦农田朝大桥猛攻，而是不知不觉直接来到了加文试图避免的那些建筑物非常多的地区中央。

沃伦完成了其他任务之后，夜幕已经降临了。现在，珍贵的时间已经丧失，走在前面的各个连开始缓慢穿过奈梅亨安静的、几乎是被遗弃的街道。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赶到通向大桥南入口的环形交叉路口。还有一个转移注意力的目标。荷兰地下组织报告说，准备炸毁这个巨大渡口的引爆装置，在邮电局主楼上。只是在沃伦的部队已经开始朝大桥移动之后，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才送到他们那里。一个排被匆匆派到邮电局，在那里，工兵们制伏了德国看守，又切断了电线，炸掉了他们所认为的引爆操纵装置。事实上，这个装置究竟是不是真的与大桥上的炸药连在一起，谁

都永远不会确凿知道，但现在，起码线路和电话交换台被破坏了。当这个排试图撤退，再次加入大部队中的时候，他们发现敌人从后面包围了过来。他们被切断了退路，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们不得不在邮电局里继续抵抗，一直到援兵到来。

与此同时，沃伦的其他部队靠近通向大桥的一个公园时，突然遭到机枪和装甲车炮火的猛烈轰击。那位被安排在第八十二师里的荷兰军官阿里·D·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记得："大炮突然向我们开火，我能看见从炮口发出的火光。它们似乎在我们的四面八方。"贝斯特布罗尔赫还没有来得及举起他的卡宾枪射击，左手、肘部以及右手的食指就被击中了。(注)对下士詹姆斯·R·布卢来说，在变得一片漆黑的街道上激烈进行的那场令人恐惧的战斗，就像一场噩梦。"我们立即参加了白刃战。"布卢记得。当时他正在与一等兵雷·约翰逊一起走在街道上，两人都端着上了刺刀的M－1型步枪，结果与党卫军部队撞上了。约翰逊试图用刺刀刺其中的一个德国人，布卢用一把近战两刃短刀奔向一名军官。"我们奉命不得开枪。如果近战，就要使用匕首和刺刀。但是，"布卢回忆说，"那把近战两刃短刀似乎太短了，因而我使用了我的冲锋枪。这个战斗也就结束了，但几乎是立即，一门自行火炮开始朝我们的方向开炮。我们向前移动，来到公园与别的排会合。"列兵詹姆斯·阿勒代斯记得，他听见有人喊要卫生员到前面来，但"子弹正呼啸着穿过街道，黑暗中又是一片混乱，结果人们不知道别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一座用砖砌成的校舍周围建起了一个环形防线。我们听见，就在前面，防线的外面，有德国人的说话声，还有伤员的呻吟和叫喊声。我们无法赶到大桥。最后我们才觉得，德国佬把我们挡住了。"

德国佬确实是把他们挡住了。保罗·格拉布讷上尉的侦察营，原先差一点就在阿纳姆大桥遇见弗罗斯特，现在则是已经到达了奈梅亨，远远早于出发晚了的美国人。

在有史以来这个最伟大的空降袭击的第一天，到午夜的时候，英军和美军的伞兵，或者是正在前往他们的主要出击目标，或者是一边作战一边前往目标。在几个漫长的小时里，他们行军，与强大而又顽强得出乎意料的敌人进行了残酷的遭遇战，终于夺取了大多数目标，而策划者们原先预料那些目标是应该迅速而又轻易就夺取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第二营的英勇士兵们，坚守在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从那里开始沿着走廊一直往南，就是罗伯特·辛克上校第一○一营的伞兵们，他们正在那里艰难地修复索恩的大桥，那是一种既凶猛又抱定决心的心境：他们必须让公路保持畅通，好让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坦克和步兵长驱直入。在这个午夜时分，伞兵们并不怀疑他们很快就将被解围，或者原定于在18日到达的增援部队和补给品将会进一步加固他们的阵地。尽管有严重的伤亡、混乱以及通信手段上的挫折，但这支空降集团军的官兵们却十分乐观。总的说来，这并不是一个糟

糕的星期日远足。

17



送海因茨·哈梅尔少将从柏林返回的飞驰的汽车，在快到阿纳姆的时候，这座城市的上空出现一道红色的光。经过这个长途旅行，哈梅尔又忧虑又疲倦，他来到在鲁尔洛的弗伦茨贝格师司令部，结果发现他的指挥所此时是在费尔普，费尔普在阿纳姆东北大约3英里处。在那里，他找到他的参谋长帕伊什中校，帕伊什显得疲惫不堪。“谢天谢地你回来了！”帕伊什说道。他迅速向哈梅尔简介了那天发生的事件，以及从比特里希将军那里接到的命令。“我惊得目瞪口呆，”哈梅尔回忆说，“一切都是混乱的，让人捉摸不定。我非常疲倦，但形势是如此严峻，因而我立即给比特里希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去见他。”

比特里希也没有睡觉。哈梅尔被带进来以后，比特里希马上开始概述形势。他既生气又沮丧，在地图上面俯下身子。“英军伞兵在这里着陆了，在阿纳姆的西边，”他告诉哈梅尔，“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实际兵力或者意图。”这位军团司令指着奈梅亨和艾因霍温，说道：“美国空降部队在这两个地区夺取了立足点。与此同时，蒙哥马利的部队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向北边发动了进攻。我确信，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部队隔开。在我看来，出击目标就是那些桥梁。一旦夺取了这些桥梁，蒙哥马利就能长驱直入，进入荷兰的中央，再从那里进入鲁尔河地区。”比特里希挥了挥手，“莫德尔不同意。他仍然相信，将还会有空降部队在莱茵河的北边、阿纳姆的东边和西边空降，然后朝鲁尔河地区进军。”

比特里希解释，哈策尔的霍亨施陶芬师，已经奉命去肃清阿纳姆西边和北边的英军。荷兰的武装部队司令克里斯蒂安森将军，已经接到指示，让他的部队———若干个防御和培训营的混合，接受汉斯·冯·特陶中将的指挥。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两翼的霍亨施陶芬师，努力攻占英军的着陆区域和空投场。

比特里希继续说，弗伦茨贝格师负责阿纳姆东边和奈梅亨南边的所有活动。比特里希用手指戳着地图，告诉哈梅尔：“奈梅亨大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除此之外，阿纳姆大桥以及一直往南到奈梅亨的这个地区，也是你的责任。”比特里希停顿下来，在屋子里踱着步子。“你的问题，”他告诉哈梅尔，“已经被搞得更加困难了。哈策尔没有把装甲部队留在阿纳姆大桥北端。英国人现在在那里。”

哈梅尔听着，愈来愈惊恐地意识到，由于阿纳姆大桥在英国人手中，所以

就没有办法让他的装甲部队迅速渡过莱茵河，直下奈梅亨。阿纳姆大桥的东边，也没有另外一座跨越大河的桥梁渡口。他的整个师就不得不在潘讷登村的一个摆渡码头被摆渡过去，潘讷登村在阿纳姆东南大约8英里处。比特里希预见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已经命令摆渡行动开始。那将是一种缓慢、拖拉、绕道的抵达奈梅亨的方式，而且要把该师的卡车、装甲车和人员摆渡过去，将会用掉哈梅尔的一切资源。

哈梅尔离开比特里希司令部的时候问他的司令员："为什么不在不太晚的时候炸掉奈梅亨大桥呢？"比特里希的口吻是反讽的。"莫德尔断然拒绝考虑这个主意。我们进行反攻的时候可能需要它。"哈梅尔惊愕地瞪大了眼睛。"用什么来进行反攻呢？"他问道。

夜色之中，哈梅尔再次动身，前往潘讷登。他的部队已经在行进，前往渡口了，马路上塞满部队和车辆。在潘讷登，哈梅尔明白了他在路上亲眼看见的混乱状况的原因。车辆堵塞了街道，形成了巨大的交通拥挤。在河边，用橡皮筏子组成的临时代用渡船正在缓慢地运送卡车漂浮过河。哈梅尔从他的参谋长那里得知，有一个营已经到达了对岸，已经在前往奈梅亨的途中。有一些卡车和小一些的车辆也渡过了河，但到目前为止，重一些的装甲设备还没有装上。在帕伊什看来，如果这个缓慢、笨重的轮渡不能加速的话，那么9月24日以前，弗伦茨贝格师就不可能在阿纳姆—奈梅亨地区投入战斗。

哈梅尔知道，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将不得不重新夺取阿纳姆大桥，从而打开通往奈梅亨的公路路线。9月17日，是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一天，在这个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德国人的一切沮丧，都集中在一个固执的人身上———那个人就是在阿纳姆大桥上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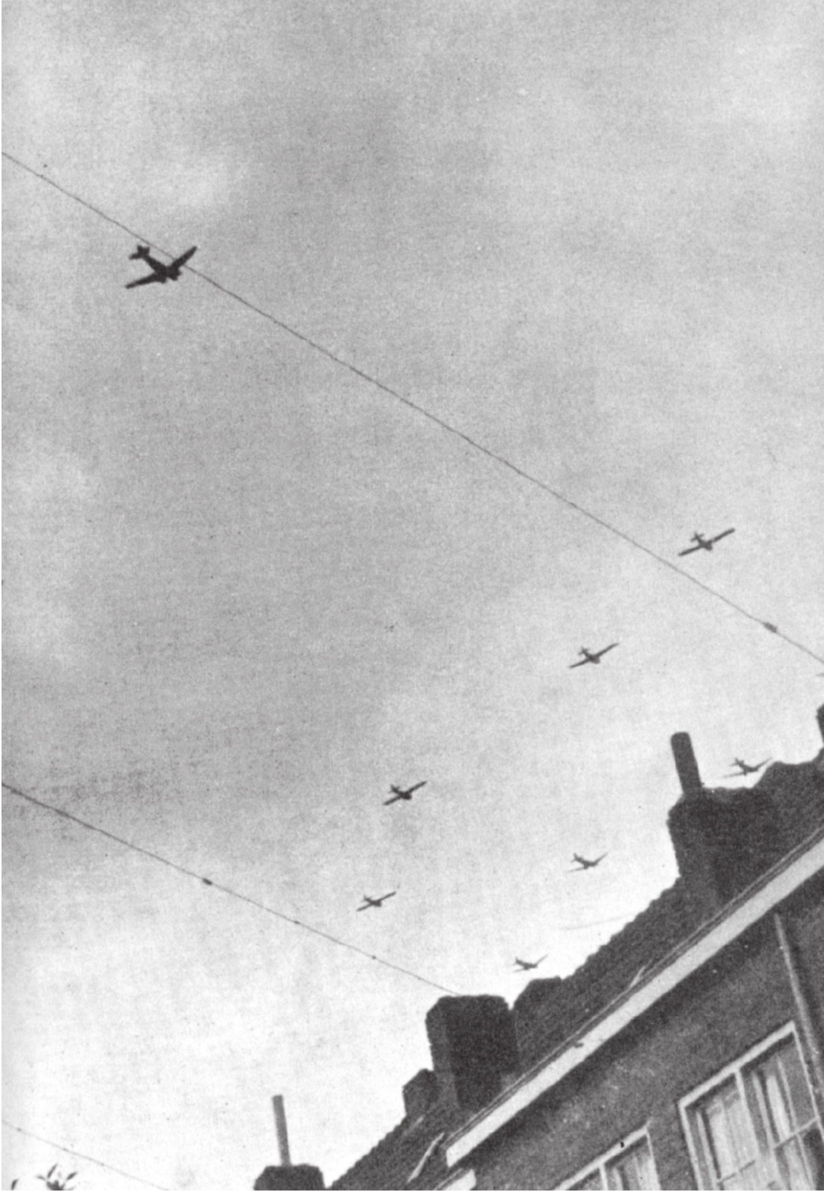


荷兰人确信，荷兰就要解放了，他们全然不顾危险，爬上屋顶，注视着兵员运输机和滑翔机所组成的庞大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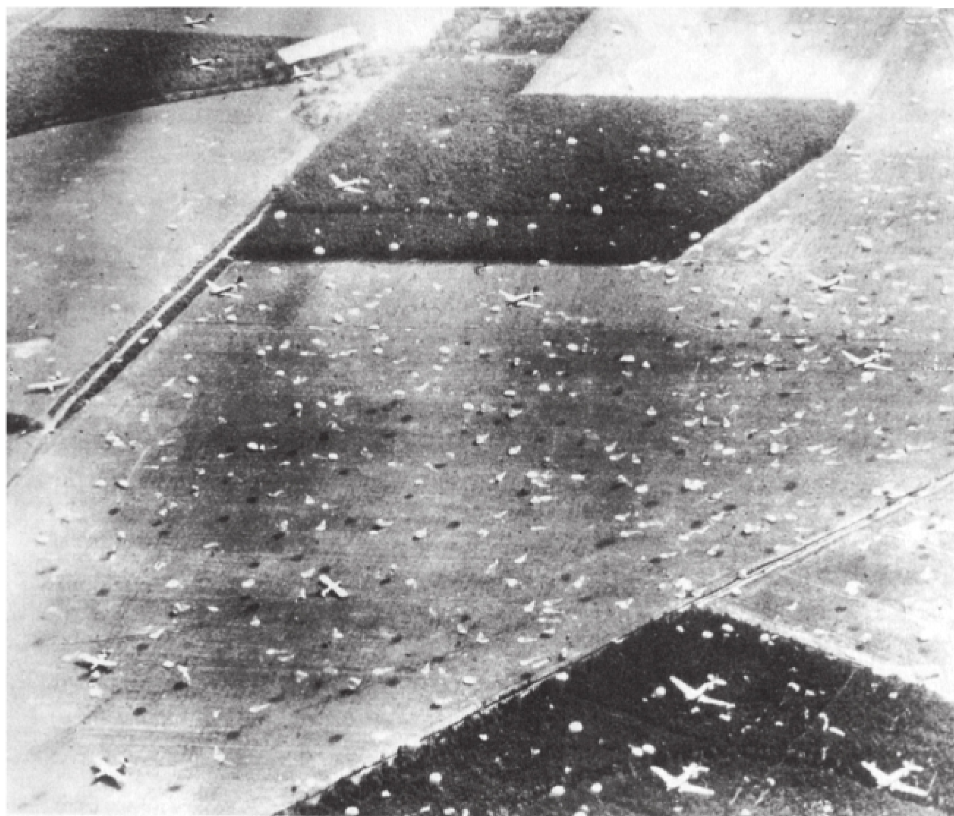


英军伞兵登上飞机前往荷兰。

一架美国韦科型滑翔机正在装军车。



飞机牵引着美军第一〇一空降师的滑翔机飞过艾因霍温的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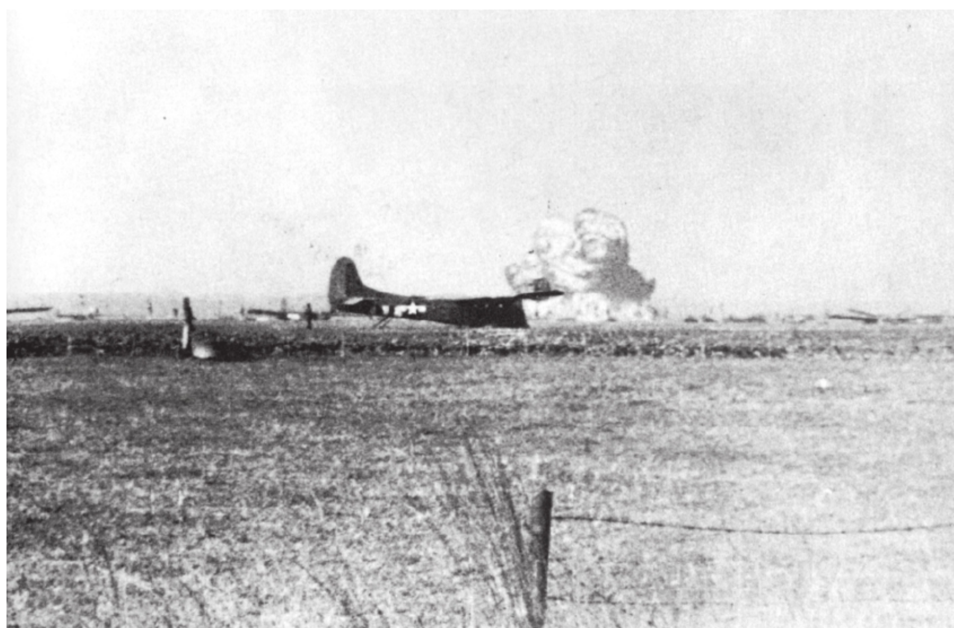


英军第一空降师的滑翔机和伞兵在阿纳姆附近着陆。



在英军伞兵部队防区的一次补给品空投。

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官兵在格鲁斯贝克的上空大规模跳伞。



在韦科型滑翔机后面的一架拖曳飞机在阿纳姆空投场坠落，爆炸了。



巨大的霍萨型滑翔机的尾部被迅速拆下，以便把货物卸下来。



阿纳姆城防司令库辛将军不顾警告，走了那条错误的马路，结果被英军伞兵击毙。



炮兵指挥官谢里夫·汤普森中校（左）从霍萨型滑翔机里卸设备。



近卫团装甲师的一辆装甲车从一辆被击毁的德国装甲车旁边经过。地形上的困难，以及宽度只容一辆坦克行驶的狭窄马路，阻碍了进行大规模强攻的装甲部队的进军。



在走廊上，一辆补给品卡车被直接击中，爆炸了。

在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一支德国巡逻队向前移动。



空军中士维克托·米勒



空军中尉亨利·金



空军中尉戴维·洛德

空军中尉戴维·洛德驾驶着他的着了火的达科他型飞机，在空投场的上空一圈又一圈盘旋，试图把珍贵的补给品投下来，并且获得了成功。英军伞兵们目睹了他的这个绝无仅有的勇敢行动，这次飞行的唯一的幸存者是空军中尉亨利·金。（译者按：洛德阵亡了。）勇敢的滑翔机飞行员的典型是空军中士维克托·米勒。他成功地使他的庞大而又笨重的飞机着陆。他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另外一架滑翔机可能“在我的上面坠落”。



中尉托尼·琼斯



重伤的伞兵



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伞兵们

中尉托尼·琼斯被霍罗克斯将军称为“勇敢者中的最勇敢者”，他紧紧跟随着坦克，冲过奈梅亨大桥，切断了德国的炸药引爆线。一位负了重伤的伞兵被匆匆送往伤亡人员收容站。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伞兵们穿过奈梅亨市郊。



英军“红毛鬼子”们穿过阿纳姆的瓦砾堆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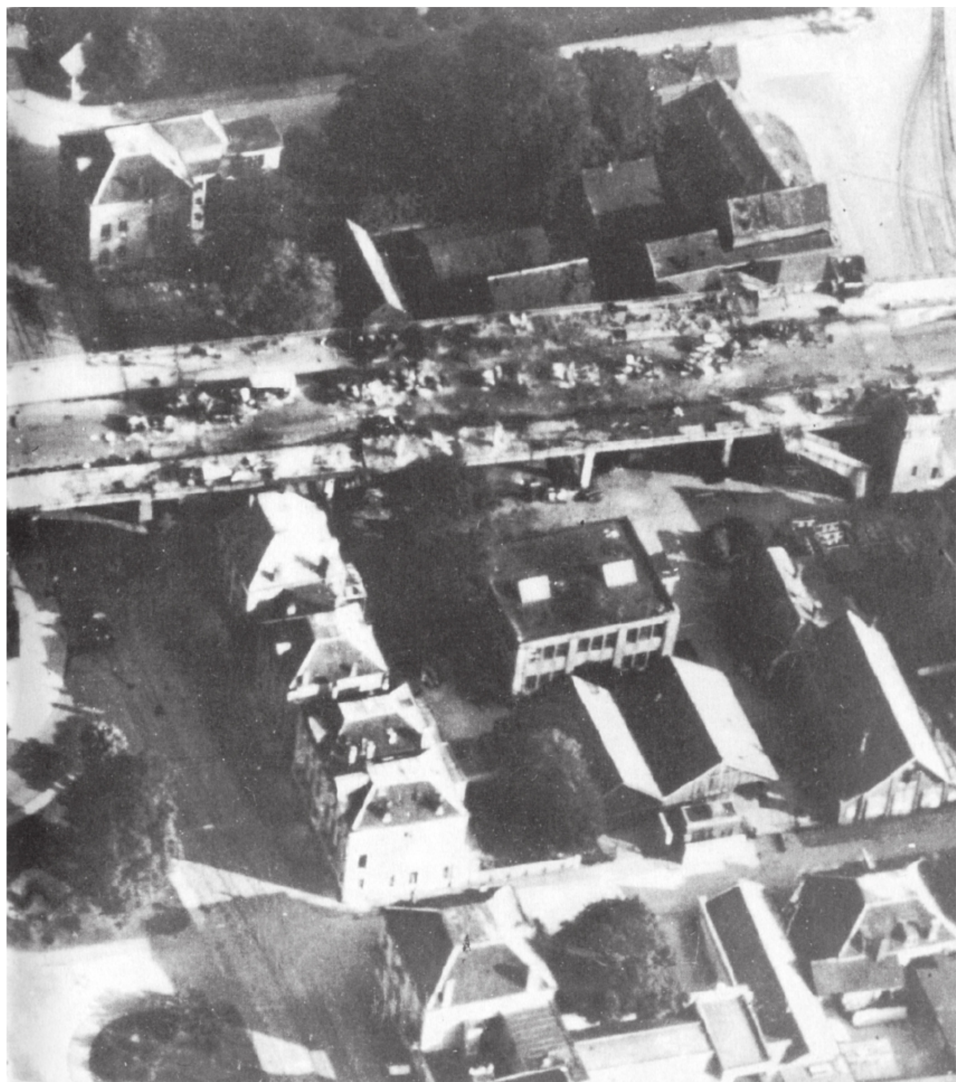
安东·德克森在茨瓦特路14号的家，厄克特将军被困在德军营地后面的时候，就躲藏在这里。



美军第一〇一空降师的伞兵们在通过艾因霍温的时候，受到荷兰人的欢迎。



地形上的困难在单行的坦克道上清楚地表现出来，近卫团装甲师的纵队在“孤岛似的”堤岸顶的马路上停下了。



在阿纳姆大桥，弗罗斯特上校与麦凯上尉的士兵成功地击退了德国装甲部队的一次进攻，击毁了12辆打头阵的装甲车。德国指挥官格拉布讷在进攻中阵亡。



埃贡·施卡尔卡少校是霍亨施陶芬师的医官，他在休战期间交换伤员的过程中进行了合作。这位党卫军显然为他的未来感到担忧，因而要求英军医官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1973 年的克瑙斯特



[从左到右]陆军元帅莫德尔；比特里希将军：一条腿的克瑙斯特少校；以及海因茨·哈梅尔准将，他们在讨论战况。克瑙斯特的虎式坦克，挡住了英军为解救保卫阿纳姆大桥的官兵而发动的最后一次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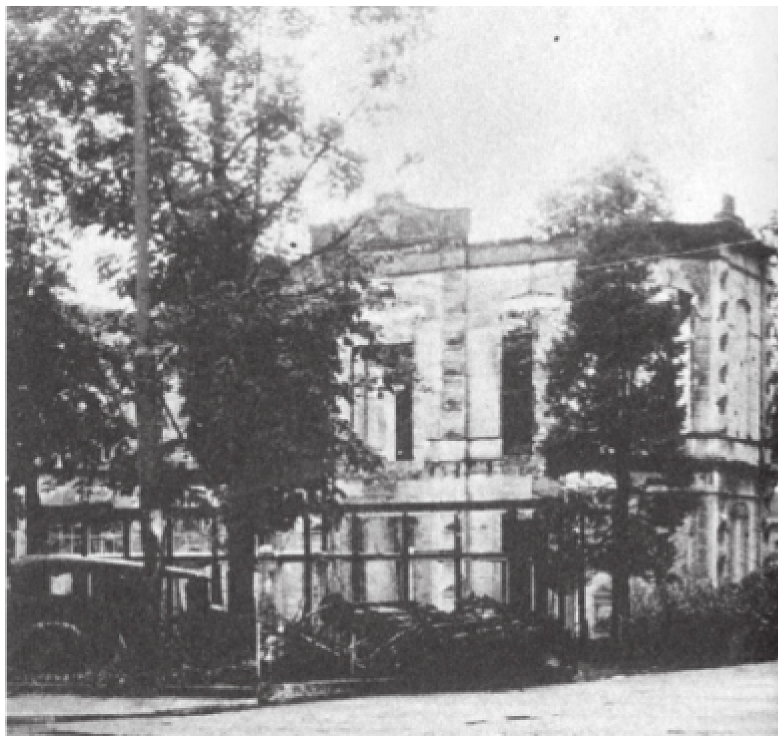


地下组织迅速逮捕了和德国人勾结的荷兰女人[上]，并给她们剃了光头[下]。



奥斯特贝克的哈滕施泰因旅馆，是此次战役过程中厄克特将军的司令部。





战役前和战役中的斯胡努尔德旅馆。


HUIZE
TAFELBE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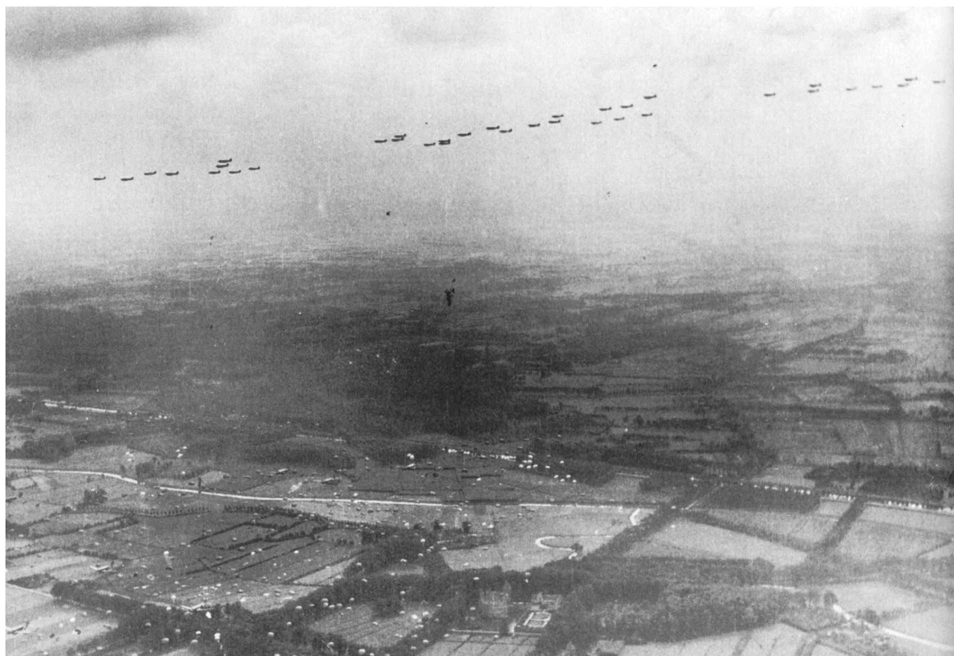
战役前和战役中的塔弗尔贝格旅馆。



也许对这场战争的最优秀的新闻报道来自阿纳姆。陆军摄影师刘易斯和沃克这两位中士，正与一位荷兰姑娘一起进餐。



伦敦的《每日快报》的战地记者艾伦·伍德，用他从战场上发来的才华横溢的电讯令英国振奋。



有35000名兵力的盟军空降集团军的集结，因为恶劣的天气而放慢了速度。在进攻的第二天，第一〇一空降师的降落伞星星点点地散布在乡下。



迪格比·泰瑟姆一沃特少校1973年



迪格比·泰瑟姆一沃特少校**1944**年

在阿纳姆大桥，迪格比·泰瑟姆一沃特少校（这里分别是他在1973年和1944年）撑着一把伞，向敌人发起古怪的冲锋，从而激发起了士兵们的士气。



安德鲁·米尔本在当时



安德鲁·米尔本在1973年



塔菲· 布雷斯



艾尔弗雷德·鲁利埃在当时



艾尔弗雷德·鲁利埃在1973 年

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被隔绝了，没有补给品，在这里，卫生员塔菲·布雷斯用临时代用的纸绷带，救了机枪手、下士安德鲁·米尔本一命，米尔本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双手。另外一位英国英雄，是中士艾尔弗雷德·鲁利埃，他在战斗当中炖了热汤给饥饿的部队送去。



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



杜沃·范·德克拉普

英军的一个重大失算，就是没有动用荷兰地下组织。在所有人当中，最垂头丧气的，当属荷兰联络官、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和杜沃·范·德克拉普。他们曾努力组成一支作战部队，但最终却是徒劳。



德克·范·贝克



格尔哈杜斯·吉斯伯斯

在奥斯特贝克，面包师德克·范·贝克看到，“情况正在变坏”，但却发誓要继续“把面包烤到最后”。珍本书书商格尔哈杜斯·吉斯伯斯，他的书店就在德国兵营的隔壁，他是那些最早意识到英军的阿纳姆进攻注定要失败的人之一。



约翰努斯·彭西尔利用了德国人的混乱，“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把一大批武器运走了。



盖伊斯伯特·纽曼宁可自己和同伴自首，也不愿让12个无辜的人因为9月15日对铁路高架桥的未遂破坏而被处决。阿纳姆抵抗力量领导人克鲁伊夫拒绝了这个要求。



在进攻前的轰炸中，抵抗力量地下工作者阿尔贝图斯·乌尔扬看到，奈梅亨被轰炸机孤立了。



电话技师尼古拉斯·德博德由于使用了秘密线路，因而得以把极其重要的情报传递给地下组织和盟军。



德国人彻底摧毁了英军的据点。英军伞兵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周围坚守阵地。阵地后面是关押德国俘虏的网球场。



废墟当中一辆被炸毁的德国坦克。



下奥斯特贝克的教堂几乎完全被摧毁了。



格拉夫顿少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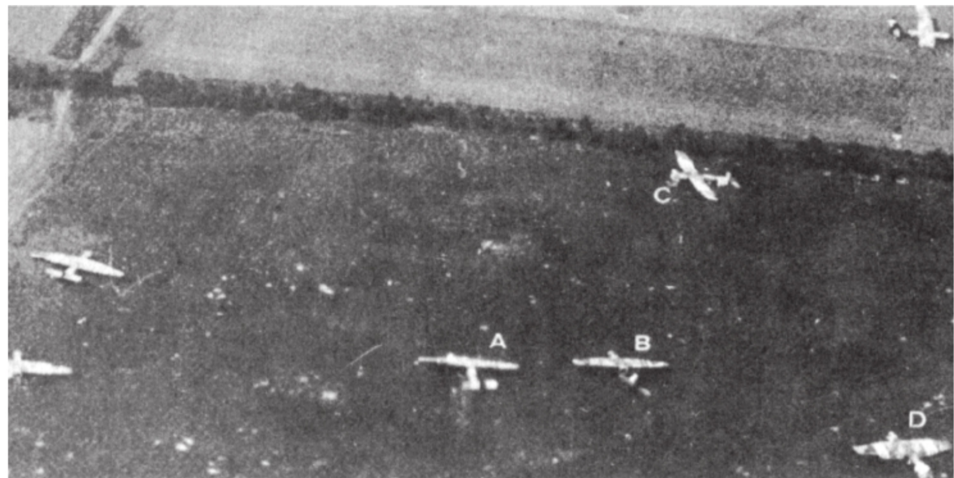
蒂利上校



蒂利上校得知，他的多塞特团要渡过莱茵河作最后的抵抗，而与此同时厄克特师的余部则要撤离，于是蒂利便对他的第二把手格拉夫顿少校吐露道：“他们是在抛弃我们。”在参加阿纳姆进攻的10 000个英国人当中，只有2 323人安全地渡过了河。下面是幸存者当中的一些人。



一个藏在一颗303口径的子弹中的密码，它本应该在撤离前发射出去。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在逃跑的时候，由于激动而忘记了给他的指示。后来在他的作战服口袋里发现了这颗带密码的子弹。



20世纪60年代晚期，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一次航拍过程中，让专家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在阿纳姆附近的荒原上，有一些看起来像是飞机的东西。在进行了仔细检查之后，地图测绘员们发现，那些幽灵似的形象是滑翔机的轮廓。1944年市场花园行动之后，失事的滑翔机被烧掉了，在荒原上留下了难以去掉的痕迹。罗伯特·沃斯奎尔证实了这些黑色的轮廓，罗伯

特是扬与伯莎的儿子。他把战时的航拍照片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照片进行了对照，并把他的研究成果交由皇家地理学会学报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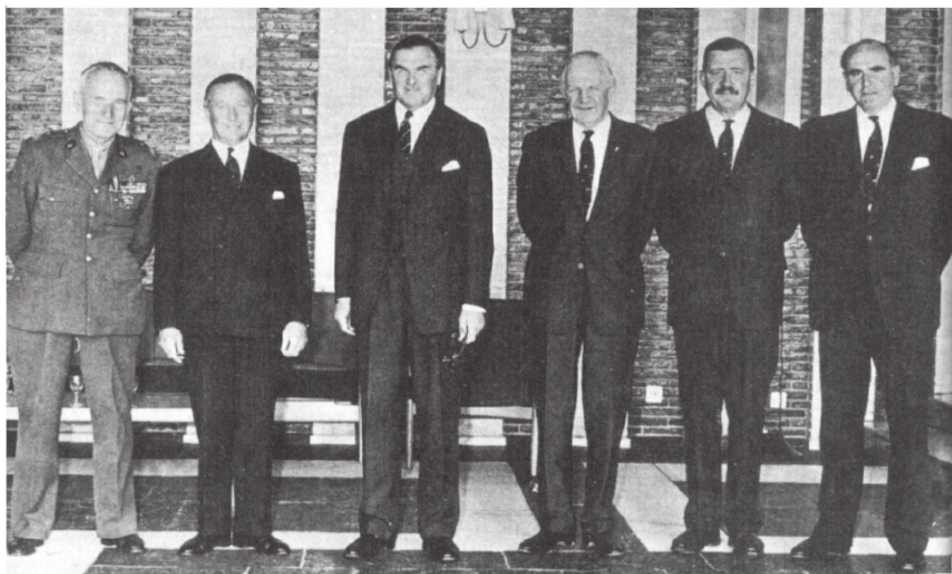




詹姆斯·M·加文将军



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



1973年，空降进攻的主要人物：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詹姆斯·M·加文将军；第一〇一空降师的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从左到右，1966年］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将军；约翰·哈克特将军；罗伊·厄克特将军：C·F·高夫上校；约翰·弗罗斯特将军；格雷姆·沃拉克准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索萨博斯基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的波兰，有一段时间在英国做了一位普通的工人。在本书写作期间，他去世了。

---

1. 救世军（SalvationArmy），国际基督教慈善组织，1878年由英国牧师W·布斯（WilliamBooth，1829—1912）创建，其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类似军队。

2. 许多官方报道说，第一批市场行动飞机起飞的时间是上午10：25。也许他们想到的是导航飞机的起飞时间。对飞行日志和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时间表研究一番，显然可见，空运是在上午9：45开始的。——原注

3. 布里斯托尔海峡（BristolChannel），在威尔士南部和英格兰西南部之间。

4. 奥尔德堡（Aldeburgh），英格兰萨福克郡萨福克沿海区的一个教区和城镇。

5. 萨姆·布朗（SamBrowne，1824—1901），英国将军，武装带的首创者。

6. 普列克斯玻璃（plexiglass），一种透明塑料材料，用以制造飞机座舱罩、镜片等。
7. 马盖特（Margate），英格兰肯特郡萨尼特区的一个城镇，位于泰晤士河口湾南面，18世纪成为著名的海滨浴场。
8. 彩包爆竹（cracker），装有礼物、玩具等的彩色纸筒，拉开时噼啪作响。
9. 飞行堡垒（FlyingFortress），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B - 17重型轰炸机。
10. 康城（Caen），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卡尔瓦多斯省省会。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人把此地作为阻止英国和加拿大军队进军的防线。
11. 荷兰归正会（DutchReformedChurch），荷兰最大的基督教会，前身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成立的荷兰国家教会。
12. 海尔德兰（Gelderland），荷兰中东部省份，与德国接壤，省会就是阿纳姆。
13. 这是一种以摩泽尔河命名的德国酒。摩泽尔河（Moselle，或者Mosel）发源于法国东北部，流经卢森堡，在德国的科布伦茨汇入莱茵河。
14. 由于市场花园行动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由英国人进行的军事行动，所以没有几个美国记者得到授权去报道这次进攻。没有一位美国记者被派到阿纳姆。有一位隶属于第一○一师的美国记者是来自合众社的沃尔特·克朗凯特，他是乘坐滑翔机着陆的。克朗凯特回忆说："我以为滑翔机的轮子是用来着陆的。想象一下吧，当我们在地上打滑、轮子碰到地面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啊。还有一件令我震惊的事情。我们全都发誓说，我们的钢盔是固定住的，可是在撞击之下飞了出去，似乎比飞来的炮弹还要危险。在着陆以后，我一把抓住我所看见的第一个钢盔，抓住我可信赖的小行囊，里面有那台奥利韦蒂牌打字机（译者按：奥利韦蒂牌打字机是意大利奥利韦蒂公司出品的名牌打字机），然后朝运河爬去，运河是会合点。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有六七个家伙在我后面爬。看来我是拿错了钢盔。我戴的钢盔后面有两个匀整的条纹，表明我是一位中尉。"——原注
15. 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Circus），伦敦的一个剧场和餐馆集中的娱乐中心。
16. 地速（groundspeed），即飞机飞行时相对于地面的水平速度。

17. 约翰尼（Johnny），是约翰（John）的昵称。（又，这里讲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性格不同，对英国人来说，美国人大大咧咧的样子让人不放心，以为他不负责任。）

18. 这种武器不应该与德国的小型迫击炮投掷器——6膛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亦译多级火箭发射器）——混淆起来。克拉夫特断言，这些实验性的发射器只有4台。我没有能够核对这个事实，不过在西线我并没有发现有类似武器的记录。毫无疑问，它的使用给英军带来了毁灭性的效果。无数目击者描述了这种超大型迫击炮弹的呼啸声和冲击力，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英军的任何战后报告中都没有对这种武器的讨论。——原注

19.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的《阿纳姆战役》一书第96页，特别谈到了阿纳姆的英军，并且同样指出了英军通信系统的瑕疵。他声称："美军的空中支援队伍训练不足……其灾难性的后果，就是直到这次军事行动的最后一天……才给空降部队提供了有效的近距离的空中支援。"似乎没有任何信息说明，是谁在分配频率上出了差错，那些美国人的名字也不为人所知。战役当中发现，在那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这两个队伍们本来拥有也许能够改变整个历史进程的手段，但这两个队伍却永远也没有被找到。然而这两个作战队伍却是已知参加了阿纳姆战役的仅有的美国人。——原注

20. 第八十二师的战后报告以及第五○四团团长塔克上校的战后报告都阐明，大桥是在下午2：30被"夺取"的。但韦勒姆斯少校的说法却是，由于大桥仍然遭到炮火的骚扰，所以第一批从东北端渡河的人，实际上是在下午3：35过的河。但不管怎么说，汤普森中尉率领的E连的那个排，从下午1：45便坚守那座桥，使它免于被炸掉，一直到下午5点被描述为"安全"时为止。——原注

21. 格里菲思是中校，但哈特少校回忆的时候是在战后，格里菲思可能已经是上校了。

22. 有的叙述说，布朗宁的三角旗是他的妻子、小说家达夫妮·杜穆里埃做的。（译者按：杜穆里埃［1907—1989］，英国女小说家和剧作家，以长篇小说《吕蓓卡》［Rebecca，1938］闻名，《吕蓓卡》更以据此改编的电影《蝴蝶梦》为国人所知，"吕蓓卡"是音译。1969年被授予英帝国女爵士勋位。）"对不起，"她写道，"我让那些制造神话的人失望了……但凡是见过我纫针的人都会知道，这是我做不来的。然而，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想法，而且会让我的丈夫很开心。"实际上，这面三角旗是伦敦的霍布森父子有限公司制作的，是在克莱尔·米勒小姐的监督下制作的。根据布朗宁的指示，就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米勒小姐还用手工把小罗盘缝进500件衬

衫的领子和皮带里。——原注

23. 这是比喻。原文是“cabrank”，加引号，这引号本身就说明是比喻，也就是说，那些战斗机就像在候车站等候客人的出租车一样。

24. 也就是说，他由于负伤，不能继续参加战斗了。

25. 那些爱尔兰人，即爱尔兰近卫团。

26. 在关于阿纳姆的传说中，有关被缴获文件的故事，就像间谍林德曼斯的故事一样，也总是被包含进去。有些报道声称，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是在一名美国上尉的尸体上找到的。我采访了施图登特，并仔细看了他所有的文件。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证实那个公文包是由一位上尉带着的。在英国和美国的官方记载中，也没有这样提到。大概，既然施图登特说计划来自“一架韦科型货运滑翔机”，就被普遍认为，飞机上只有美国人。然而，布朗宁将军司令部的一部分人是乘坐韦科型滑翔机飞往荷兰的，而其中的一架就在施图登特的司令部附近坠落。不管怎么说，不管那些人员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我都认为，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计划由一位上尉掌握，是极不可能的。首先，计划的分发非常小心，其次，每一份都编了号，只限于分发给高级参谋人员。——原注

27. 一些有关阿纳姆战役的报道声称，高夫的部队无法作战，因为他的许多车辆未能用滑翔机送达。“如果那可以称之为失败的话，”高夫说道，“那么那个失败也并不是因为缺少吉普车，而是因为没有人提醒我们，事实上，第九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就在那个地区。”——原注

28. 那天上午，陆军元帅莫德尔在向东边逃跑的时候给库辛下达了命令，库辛奉莫德尔的命令告知希特勒的司令部：盟军着陆了，莫德尔险些遇难。盟军的攻击使得希特勒歇斯底里地担心起来。“如果这里出现这样的混乱局面，”他推测，“在这里，我是和我的最高统帅部——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坐在一起。唔，那么，这就是最有价值的猎物。这是明显的。如果我一拳就能获得整个德国部队的话，我就将毫不犹豫地拿出这里的两个伞兵师去冒险。”——原注

29. 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巴思爵士R.E.厄克特（与威尔弗雷德·格雷特霄克斯合著）《阿纳姆》，第40页。——原注

30. 弗罗斯特回忆说：“我有一张从德国俘虏那里获得的地图……它指出了敌人一个装甲车巡逻队的路线，因而我意识到，德国人的兵力是在我的左边。”——原注

31. 有几个报道说，火焰喷射器偏离了方向，火焰并没有击中碉堡，而是击中了几个装有炸药的木屋。——原注

32. “步兵反坦克炮”（Piat）是英军使用的一种短距离的弹簧承载的反坦克炮，重量为33磅，能够发射穿甲弹，穿透4英寸的经过回火的装甲钢板。——原注

33. 荷兰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说，那天晚上7：30他来值班的时候，大桥被遗弃了，没有警卫。按照范·库埃克的说法，早些时候，当空降部队开始着陆的时候，由参加过一次大战的25名老兵组成的大桥卫戍部队开了小差。——原注

34. 在给厄克特下达的正式命令中，似乎并没有提到德里尔渡口是一个出击目标。在情况简介会上所使用的皇家空军的侦察照片，清楚地表明了渡口的存在，而且人们必须假设，在制订计划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这个地方被讨论过了。然而，当我就这个问题采访厄克特将军的时候，他告诉我：“我回想不起那个渡口曾经出现过。”当厄克特最终得知那个渡口的存在时，已为时太晚，没有用处了。厄克特说道：“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士兵可以送到河的对岸。”然而，在口头命令中，工兵们得到提醒：“对所有的渡口、驳船和拖船的夺取，对于帮助第三十军的随后进军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然而，显然在计划的最后阶段，这些命令不予优先考虑，因为它们从未正式下达。“没有人告诉我们在德里尔的渡口，”弗罗斯特上校告诉我，“而这本来是可以使情况大为不同的。”——原注

35. 皇家空军确实在乌得勒支周围的一个广阔地区空投了伞兵人体模型，这在几天的时间里转移了一些德国部队的注意力。部队并没有在华沙空投，这个报告可能是在传输过程中变得含糊了，或者纯粹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所带来的结果。——原注

36. “当我们第一次把空降部队的进攻告知冯·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时，”莫德尔的作战部部长汉斯·冯·滕珀尔霍夫上校告诉我，“西线总司令似乎并不感到不安。事实上，那种反应几乎是意料之中的冷漠。之后反应迅速改变了。”——原注

37. 西线总司令也没有被告知有这个被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在莫德尔给冯·伦德施泰特有关这些文件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这个计划。出于某种原因，莫德尔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计划看在眼里，因而没有把它呈送高一级的司令部。——原注

38. 这就是说，莫德尔原先臆断，空降部队的攻击目标是他和他的司令

部，现在才明白并非如此。

39. 几天以后，医生告诉贝斯特布罗尔赫，那根食指必须截掉。“我告诉他们，绝对不能，”贝斯特布罗尔赫说道，“那是我的指头，我不想让它被截掉。除此之外，它还将会毁掉我的钢琴演奏。”他至今还拥有那根手指头。——原注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istory of the greatestbattle of world war II

第四部 围困

part four the siiege

1

★ ★ ★

黎明时分从莱茵河升起的雾，在阿纳姆大桥以及大桥四周的静谧、黑暗的房屋上面盘旋。距离大桥的北坡道不远，那条与历史悠久的内城连接的长长的风景如画的林荫大道———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向后延伸到北边和东边的市郊，最后来到圣乐厅，这是阿纳姆最受欢迎的音乐厅。这个星期天，9月18日，在微弱、朦胧的光线之中，海尔德兰这个古老的首府似乎被人遗弃了。在街道、花园、广场或者公园里，没有人走动。

从在大桥北端周围的阵地里，弗罗斯特的士兵可以第一次看到这座城市的住宅和市政建筑，那是一些散乱扩展开来的建筑群：法院、省政府大楼、国家档案馆、市政厅、邮政总局，西北方向不到1英里的地方就是火车站。在更近一点的地方，是圣优西比乌斯教堂，它以其305英尺高的尖塔而傲视城市。弗罗斯特的士兵，在一个由18幢房屋组成的环形防线上，从破碎的窗户和刚刚挖掘的散兵坑里小心翼翼地朝外看着，但却没有人意识到，这座伟大的教堂现在却有着一种不祥的意义。在夜间，德国狙击手们已经进入了塔楼。他们仔细地隐藏着，就像英国人一样，也在紧张地等待天大亮。

争夺大桥的战斗整夜都在激烈进行。午夜时分曾经暂时平静了一下，却只是短暂的停顿。战斗再次爆发的时候，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参加了单打独斗。夜间，弗罗斯特的士兵曾两次试图突然袭击大桥的南端，结果两次都被击退。这两次冲锋都是约翰·格雷伯恩中尉率领的，他脸上严重受伤，但

仍然待在桥上监督所有的士兵撤退到安全的地方。[注]后来，一辆又一辆卡车的德国步兵试图强行过桥，结果遭遇到英军伞兵的密集火力。弗罗斯特的士兵用火焰喷射器把那些车辆点燃了。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在这片火海当中被烧着了，尖声大叫着落入100英尺以下的莱茵河。燃烧着的橡胶的刺鼻气味，以及从车辆残骸中旋转升起的浓密黑烟，使双方的救援队都受到了阻碍，双方的救援队在桥上遍地的尸体当中寻找伤员。一等兵哈罗德·巴克就在这样的一支救援队当中，他正把伤员抬进由弗罗斯特的士兵坚守的一幢房子的地下室。在黑暗的地下室里，他看到一些东西，他以为有几支蜡烛在燃烧。地板上全都躺着受伤的伞兵，巴克突然意识到，他所看到的是一些伤员身上发出亮光的小碎片。那些人被含磷炮弹的碎片击中，于是便在黑暗中发出亮光。

莫名其妙的是，在阳光照耀的最初的时刻，战斗再次停止了，就好像双方都正在深深呼上一口气。弗罗斯特营司令部的马路对面，就在大桥坡道下面的一条小街上，埃里克·麦凯上尉对一些房子进行了一次静悄悄的侦察，他小小的工兵队伍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个小组，现在就控制着这些房子。在一次噩梦般的恶战过程中，麦凯最终守住了4幢房子中的两幢，并在其中的一幢房子里设立了指挥所，那是一幢砖结构的校舍。德国人在进行反攻的时候，爬过了经过景观美化的庭院，朝房屋里投掷手榴弹。德国人进入大楼，与英国人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几乎是寂静的白刃战。麦凯的士兵遍布于各个地下室和一个个房间，用刺刀和匕首把成群的敌人驱逐了回去。然后，麦凯带着一小群人冲了出去，尾随着撤退的德国人进入灌木丛。英国人再次用刺刀和手榴弹击溃了敌人。麦凯的双腿被炮弹碎片击中，一颗子弹刺穿他的钢盔，擦伤了他的头皮。

现在，在核对他的伞兵的时候，麦凯发现了一些情况与他本人相似的伤员。问题严重的是，补给品的形势不好。有6支布伦式轻机枪、弹药、手榴弹和一些炸药，但没有反坦克武器，食品甚少，除了吗啡和战地绷带之外，没有医药补给品。除此之外，德国人还切断了供水。现在，手头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他们饭盒里面剩下的东西。

尽管这次夜间作战是可怕的，麦凯却仍然抱有一种强烈的决心。“我们一直做得不错，我们的伤亡相对而言是轻微的，”他回忆说，“除此之外，随着阳光的出现，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在做什么事，而且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尽管这样说，麦凯还是像弗罗斯特一样，并不抱什么幻想。在这种最殊死的战斗———在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幢房子又一幢房子、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里的战斗中，他知道，大桥上的英军守备部队被消灭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德国人显然是希望单凭人数上的优势，就能够在几个小时里粉碎弗罗斯特小小的兵力。针对这样强大而又集中的进攻，能够拯救大桥上勇敢的守卫者们的只能是第三十军的到达，或者是第一伞兵旅其他

营的到达，那些营仍然在试图杀出一条血路，进入这座城市。

对于那些在大桥附近作战的党卫军士兵来说，那是一个恐怖不断的夜晚。哈策尔上校显然对他已经挡住了厄克特的各个营而感到满意，但却低估了那些已经到达大桥北端的人的数量和能力。哈策尔甚至并没有费心下令把他为数甚少的几门自行火炮带上来作为支援。相反，针对坡道四周房子里的英军阵地，他把一个又一个班的党卫军投了过去。这些强悍部队中的大多数人记得，他们遇见的敌人是他们所遭遇到的最凶猛的士兵。

党卫军班长阿尔费雷德·林斯多夫，21岁，是一位曾经在苏联打过仗的有经验的士兵，他正在一列前往阿纳姆的货运火车上，在车上被告知他的班将被重新装备。当林斯多夫和他的士兵到达阿纳姆车站的时候，那里乱成一团。来自形形色色编制的部队在乱兜圈子，排成队，然后开拔出去。林斯多夫的部队被告知要立即向城内的一个指挥所报到。在那个指挥所里，一位少校把他们编进了第二十一精锐装甲团的一个连。这个班在到达的时候没有武器，但到星期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已配备了机枪、卡宾枪、手榴弹，还有几门反坦克导弹发射器（Panzerfauster）[注]。他们对有限的弹药提出了疑问，转而被告知，补给正在运送途中。“这时，”林斯多夫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打仗，战役在哪里，而且我以前也从未去过阿纳姆。”

在城市的中心，有证据说明，猛烈的巷战已经发生了。林斯多夫第一次得知，英国伞兵已经着陆，正在坚守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似乎谁也不知道那支队伍兵力有多大。他的班在一个教堂里面集合起来，被下达了命令。他们将要渗透到大桥坡道两边的房子背后，把那里的英国人驱逐出去。林斯多夫知道这种战斗是多么致命，他在俄国前线的经验已经给出了教训。他所率领的是久经沙场的年轻老兵，他们认为这场战斗将会是短暂的。

在通往大桥的整个地区，这个班看到，房子被炸得严重损坏，他们不得不在瓦砾当中费力地慢慢走着。当他们靠近英国人在大桥北端所建立的环形阵地时，遭遇到猛烈的机枪射击。他们被压制得动弹不得，无法来到距离大桥入口600码的距离以内。一位中尉要求能有人自告奋勇，越过广场，把爆破炸药扔进机枪火力似乎最猛烈的那座房子里。林斯多夫自告奋勇了。在火力的掩护下，他冲过广场。“我在一个地下室窗户附近一棵树的后面停了下来，射击就是从那个窗户里发出来的。我把炸药扔了进去。然后跑回我的人那里。”林斯多夫躺在瓦砾当中，等待炸药爆炸，他回头望去，只见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幢高房子，有一些德国工兵正在那里掩蔽，正在这时，这座高房子突然被炮弹击中了。这座房子的正面全都坍塌了，把所有人都埋了进去。林斯多夫突然意识到，他自己的人就是在那里，整个班将会被消灭。这时，他扔进地下室的爆破炸药在离他不远的街道上爆炸

了———英国人又把炸药从窗户里扔回来了。

夜幕降临时，各个班开始渗入房子，以便把英国人找出来。林斯多夫的出击目标是一幢红色的大屋，他被告知那是一座学校。他的班朝那幢房子奔去，很快就遭遇了警觉的英国神枪手，他们迫使德国人躲进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党卫军们打碎窗子开起火来。英国人立即在隔壁的一幢房子里隐蔽起来，于是又一场激烈的交火开始了。“英国人的射击是致命的，”林斯多夫回忆说，“我们几乎无法探出身来。他们朝头瞄准，士兵开始在我的身边倒下，每一个人的前额都有一个整齐小孔。”

由于伤亡不断增加，德国人就直接朝英国人占领的那幢房子发射了反坦克导弹。炮弹射进房子的时候，林斯多夫的班便发起了冲锋。“那次交战是残酷的，”他记得，“我们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一码又一码地把他们推回去，我们蒙受了可怕的损失。”在混战当中，这位年轻的班长又奉命回去向他的营长汇报；他再次被告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英国人赶出去。林斯多夫回到他的士兵那里，命令全班向前猛冲，他们像下雨般地投掷手榴弹，让英国人不断遭到攻击。“只有这样，”林斯多夫说道，“我们才能取得优势，继续前进。当我从德国过来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我会突然在一个有限的地段参加殊死的战斗。与我在俄国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战斗相比，这次战斗要更加艰难。这是持续的、近距离的肉搏战。到处都有英国人。街道多半是狭窄的，有些地方不超过15英尺宽，我们在不过几码远的地方互相开火。我们打上一阵子，才能夺取几英寸的地方，把一个又一个的房间清理干净。那绝对是地狱！”

林斯多夫小心翼翼地朝一幢房子奔去，在一个敞开的地下室门口，瞥见了一顶英国钢盔，片刻间还露出了伪装网的轮廓。当他举起胳膊要投掷手榴弹时，听见一个低沉嗓音呻吟的声音。林斯多夫没有把手榴弹投掷出去，而是悄悄地走下地下室的台阶，然后大声喊道：“举起手来！”这个命令毫无必要。用林斯多夫的话来说：“我的面前是一个吓人的景象。这个地下室就像一个藏骸所，里面全是英国伤兵。”林斯多夫抚慰地说着话，他知道那些英国人不会懂他的话，但却可能领会他的意思。“好了，”他告诉那些伤员，“没关系。”他把他的随军卫生员叫了过来，然后把俘虏们集中起来，命令那些英国人回到他本人的营地进行护理。

当那些伞兵们被带出地下室的时候，林斯多夫开始寻找一位能够行走的伤员。令他吃惊的是，那个人低低地呻吟了一声，倒在林斯多夫的脚下，死去了。“那颗子弹是打我的，”林斯多夫说道，“英国人在保护他们自己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在试图拯救他们的伤员。刹那间我呆若木鸡。然后我出了一身冷汗逃了出去，跑了。”

由于英国伞兵在学校四周不屈地坚持着，林斯多夫知道，即使他的精锐士

兵也没有强大到足以迫使对方投降。星期一，破晓的时候，他与他大大减员的班又撤退回到了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林斯多夫与一位炮兵指挥官不期而遇，林斯多夫告诉他："把那些英国人赶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把那幢房子炸掉，一块砖又一块砖地炸掉。相信我的话吧，这些是真正的男人。在我们把他们炸飞之前，他们是不会放弃那座桥的。"

军士长埃米尔·佩特森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他隶属于帝国劳工团（Reichsarbeitsdienst），由于德国的人力短缺愈来愈严重，佩特森和他35个人的排就被转到一支防空重炮部队，然后又被转到一支步兵部队。他们是从法国一路撤退过来的。

在星期天的下午，佩特森的排在阿纳姆车站等待，他们要被运回德国进行重组。现在他们又被动员起来，一位中尉告诉他们，他们要与在城市里着陆的英国空降部队交战。"我们加入的那支部队有250个人，"佩特森回忆说，"谁也没有武器。只有我和另外四个人有自动手枪。"

佩特森的部下非常疲倦，他们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吃饭了，这位军士记得，他当时想到，倘若火车不晚点的话，这个排就会吃上饭，就会不参加这个战役，就会到达在德国的家。

在党卫军的一个兵营里，这群人领到了武器。"形势是可笑的，"佩特森说，"首先，我们谁也不愿意同武装党卫军一起战斗。他们享有一种残酷无情的名声。他们给我们的武器是老掉牙的卡宾枪。要打开我的卡宾枪，我得在桌子上猛敲一下。当我的人看见这些旧武器的时候，准确地讲他们的士气并不高。"

费了一些时间，才把这些枪收拾得可以使用，而且这支部队也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似乎谁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参战。

最终，黄昏的时候，这群人被带走，来到城防司令部。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房屋空无一人。他们再次等待。"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就是食物。"佩特森说道。最后，一位党卫军中尉来了，宣布这些人要穿过市中心，去莱茵河大桥。

这支部队以排为单位，沿着市场大街朝莱茵河走去。在黑暗当中，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但佩特森回忆说："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动静。偶尔我们听见远处有枪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有一两次我想，我看见了钢盔昏暗的侧影。"

在距离大桥不到300码远的地方，佩特森意识到，他们是在从一列列的士

兵当中经过，他猜，他所在的这支部队一定是要去接替这些人的。然后那些士兵当中的一位说了点什么，佩特森听不懂那个人说的话。佩特森立即意识到，那个人说的是英语。“我们是与一支英国部队并排进军，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前往大桥。”这个错误的身份大家突然都清楚了。一个英国嗓音喊道：“他们是德国佬！”佩特森记得他喊道：“开火！”

几秒钟之内，街道就回荡起机枪和步枪的开火声，那是两支部队在面对面地交战。一连串的子弹撕破了他的背包，差几英寸就击中佩特森。火力使他砰地倒在地上。他迅速在一位死去的伙伴后面掩蔽了起来。

“不管你朝哪里看，都有人从散开的阵地里射击，而且往往错误地朝自己一方开火。”佩特森记得。他开始慢慢地朝前爬去。他来到一道围着一个小公园的铁栅栏，爬了过去。在那里，他发现几个德国排的大多数别的幸存者正在树木和灌木丛当中隐蔽。英国人已经撤退到公园两边的一些房子里，现在，在这个小小的广场里，德国人开始遭遇到交叉射击。“我能够听见伤员的尖叫声，”佩特森说道，“英国人瞄准我们的阵地发射了照明弹，把我们的部队切成了几块。在不到5分钟时间里，我的排就有15个人阵亡了。”

就在黎明时分，英国人停止了射击，德国人也停下来。在晨光之中，佩特森看到，在动身前往大桥的250个人当中，一半以上不是阵亡了，就是负伤了。“我们从来也没有赶到大桥入口的附近。我们只是躺在那里受罪，没有得到自吹自擂的党卫军的支援，也没有得到一门自行火炮的支援。”佩特森说道，“这就是我们的阿纳姆战役的序曲。对我们来说，它不啻是一场大屠杀。”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英军第一空降师那两个失踪的营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大桥。他们三三两两，边作战边穿过了哈策尔上校在北边和西边的防御圈。许多人负了伤，饥寒交迫。他们将给弗罗斯特上校的部队增加医疗和补给的问题。不过在这些个小时里，这些掉队的人尽管疲惫不堪且又受伤，却是既骄傲又情绪高涨。因为他们来到了要他们来到的地方，那是在英格兰时给他们下简短命令的军官以及他们自己的指挥官要他们来到的地方。头一天下午，他们非常自信地从各个部队出发，源源不断地赶来，前往阿纳姆大桥，到18日黎明的时候，弗罗斯特估计现在在北入口有六七百人。虽然每过一个小时都有更多的伞兵来到大桥，但也有更多的机械化设备发出声音，那是哈梅尔将军的装甲部队进入了城市，进入了阵地。

甚至连德国装甲部队也发现，阿纳姆是一个危险吓人的地方。在城市各地的道路上，荷兰老百姓设置了路障。住在作战地区的男人和女人，冒着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子弹，开始收集死者的尸体———英国人、德国人以及他们自己同胞的尸体。第一营的中士雷金纳德·伊舍伍德，在马路上度过了一

个危险四伏的夜晚之后，终于在破晓时分来到了阿纳姆中心，在那里他看见了“一个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景象”。从地下室、地窖、花园和严重毁损的房屋里出现的荷兰人，正在收集尸体。“他们把受伤的人送到临时包扎所和设在地下室里的避难所，”伊舍伍德回忆说，“但死者的尸体却被堆放起来，就像一排排长的沙袋一般，头与脚相对排放着。”骄傲而又悲伤的阿纳姆市民，正在把朋友和敌人的尸体一起排起来，在街道上形成一个5英尺高、6英尺宽的人体路障，以阻止德国人的坦克到达大桥上的弗罗斯特。

对内城的市民来说，黎明并没有让他们从恐怖和混乱中解脱。火失去了控制，迅速蔓延。人们在地窖和地下室里挤作一团，没有几个人睡觉。那个夜晚，不时被炮弹的碰撞、迫击炮沉闷的轰击、狙击手射出嗖嗖的子弹，以及机枪断断续续的扫射所打断。奇怪的是，在老城区之外的地方，阿纳姆的市民却未受正在发生事情的影响，而且他们全然摸不着头脑。他们给在内城的朋友打电话，寻求信息，结果从吓坏了的房主们那里得知，一场酣战正在大桥的北端进行，英国人正坚守着大桥，抵御德国人的反复进攻。对打电话的人来说，显然德国部队和车辆正在从各个方向进入城市。然而荷兰人的信念并没有动摇，他们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带来的解放就在眼前。在城市的这些外城地区，人们像通常一样准备工作。面包店开门了，送奶工在挨门挨户送奶，而电话接线员、铁路雇员、公用事业工人———全都在岗。公务员正计划去上班，消防人员仍然试图跟得上越来越多燃烧着的房屋，而在阿纳姆北边几英里的地方，市动物园的园长赖尼尔·范·胡夫博士，正在照看他忐忑不安、紧张激动的动物。(注)也许唯一知道战斗达到什么程度的荷兰人是医生和护士们，他们整个夜晚都在不停地接电话。救护车全速穿过城市，把伤员收集起来，然后快速运到西北郊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以及城市之内的小私人疗养院。在阿纳姆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座城市已经是一个无人地带，而且形势将愈加糟糕。阿纳姆，荷兰景色最优美的地点之一，将很快就变成一个微型的斯大林格勒。

在内城的荷兰人却几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解放不会轻易到来。半夜，在距离大桥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优西比乌斯广场上的警察局里，27岁的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听见轻轻的敲击声。他打开门，看见英国士兵站在外面。范·库埃克立即请他们进来。“他们想得到有关建筑物的位置和地标的各种各样问题的答案，”他记得，“然后他们中的若干人离开了，开始越过马路，拼命朝大桥的方向跑去———所有这一切都做得尽可能地安静。”范·库埃克看到，在附近一位医生的家门口，英国人设立了一个迫击炮发射点，接着又有一门发射6磅炮弹的反坦克炮安置在医生的花园的一个角落里。到黎明时，范·库埃克看到，英国人已经在大桥的最北端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环形防线。在他看来，这些士兵的举动与其说像解放者，毋宁说更像神色严峻的保卫者。

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是一条紧靠大桥的蜿蜒的、有着带状草地的林荫大道，这条大道的另外一边，劳动调解员库恩拉德·赫勒曼正和他的未婚妻特鲁伊德·范·德桑德以及她的父母一起，待在他们的别墅里。他们整夜没有睡觉，听着一条街道之外的学校周围的开火声和爆炸声，那是麦凯上尉的士兵正在击退德国人。由于战斗紧张，所以范·德桑德一家以及赫勒曼，都躲进了房子中间部分下面的一个小的、没有窗户的地窖里。

现在，黎明时分，赫勒曼和他的未来岳父小心翼翼地偷偷上了楼，来到俯瞰林荫大道的一个二层房间。在那里，他们吃惊地朝下凝望着。一个死去的德国人，躺在这条景色如画的街道上一片金盏花上面，而且他们看见在草地的各处，德国人躲在单人狭长掩体里。赫勒曼顺着林荫大道朝右边瞥去，看见有几辆德国装甲车停在一堵高高的砖墙旁边，列阵等待。就在这两个人注视的时候，一场新的战斗又打响了。坦克上的机枪突然朝附近圣沃尔布加教堂的塔楼开火，赫勒曼看见，红色的细尘喷放出来，他只能假定伞兵们就在教堂里的瞄望阵地上。几乎立即，坦克的炮火得到了反击，于是在狭长掩体里的德国人开始用机枪朝街道对面的房屋扫射。其中一幢房子是一家戏装商店，橱窗里摆放的是穿着铠甲的骑士。在赫勒曼观看时，子弹打碎了橱窗玻璃，推翻了那些骑士。赫勒曼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转过脸去。他希望，这个景象并不具有预言性。

在北边几个街区之外，在音乐厅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天亮后不久，威廉·昂克便被街上部队运动的声音惊醒了。有人捶打他的房门，一个德国嗓音命令昂克和他的家人待在屋里，拉上窗帘。昂克并没有立即服从，他跑到前窗，看见街道的每个角落里都有扛着机枪的德国人。在圣乐厅前面，有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排炮，而让昂克无比吃惊的是，德国士兵正坐在排炮的旁边，他们是坐在从礼堂里搬到街道的椅子上。他们彼此随意交谈着，昂克注视着他们，心中想，他们那个样子好像不过是在等待音乐会开始似的。

这个地区最沮丧而又愤怒的平民，是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们。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几乎立即与大桥上的英国人取得了联系，但他们的帮助却被客气地拒绝了。阿纳姆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皮特·克鲁伊夫，派图恩·范·达伦和盖伊斯伯特·纽曼去奥斯特贝克，以便与英国人建立联系，他们也发现他们的帮助对方并不需要。纽曼记得，他曾提醒伞兵们那个地区有狙击手，并且忠告他们不要走大马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得到的命令只是前往大桥，他们将走给他们指明的路线，”纽曼说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害怕故意煽动肇事的破坏分子，因而根本不信任我们。”

现在，黎明，约翰努斯·彭西尔在地下室里，与他的抵抗组织工作人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彭西尔计划接管一个当地电台，播放一个宣言，说城市已经自由了。但纽曼打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主意。“情况糟糕，”纽曼报告

说，“形势是危急的，我认为一切都已经失去了。”彭西尔呆若木鸡。“你是什么意思？”他问道。纽曼现在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他说，英国人已经发现要穿过德国人的防线前往大桥是不可能的。彭西尔立即给皮特·克鲁伊夫打电话，克鲁伊夫建议，暂停一切计划中的活动———参加过那次会议的亨利·克纳普回忆说，那是“一个暂时的不介入”。但抵抗组织工作人员的长期希望被粉碎了。“我们为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彭西尔回忆说，“甚至如果必要的话牺牲我们的生命。相反，我们却坐着，没有用处，不被需要。现在越来越清楚，英国人既不信任我们，也不打算使用我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9月18日星期一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不论是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还是蒙哥马利，还是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任何指挥官，都对形势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而在这个时候，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却通过秘密的电话线，给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发去了一个报告，说英国人正在阿纳姆被德国的装甲师击溃。在第八十二师的文电日志中有这样的记录：“荷兰人报告说，德国人正在阿纳姆战胜英国人。”由于与阿纳姆作战地区没有直接的通信联系，所以这个信息实际上是盟军最高指挥部所收到的第一个暗示，即危机正突然降临在英军第一空降师的身上。

2



阿纳姆大桥西南7英里处，在小小的德里尔村的渡口码头，渡船工人皮特准备当天第一次渡过下莱茵河。那些一大早的通勤者，在河北边的镇子和村庄里上班，他们分成小组挤在一起，晨雾使他们感到很冷。乘客们谈论着阿纳姆西边以及阿纳姆市里面所进行的战斗，皮特并没有加入他们的交谈。他所关心的是渡船的操作以及每天都必须维持的日程安排，许多年来他都是这么做的。

几辆小汽车以及满是准备到河北岸储存和交易产品的农用大车，被首先装上了船。然后，推着自行车的男人和女人上了船。早晨7点整，皮特摆动着船下了河，渡船沿着缆绳流畅地运行着。这个行程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在北岸赫维多普村下面的斜坡靠岸后，乘客和车辆下了渡船。他们的上方，100英尺高的韦斯特博文山俯瞰着乡下。大多数通勤者走上了向东通往奥斯特贝克的马路，奥斯特贝克那座建于10世纪的教堂，高耸在长着橡树丛和覆盖着羽扇豆的荒原上。再远处，就是阿纳姆。

别的乘客正等待着摆渡回到德里尔。皮特再次接纳了去北岸的旅客，其中的一位旅客就是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两个星期以前，9月5日，荷兰人将永远把那一天当作疯狂的星期二来记住，在那一天，她看到了德国人发疯

似的撤退。在德里尔，征服者们并没有返回。在许多个月的时间里，科拉第一次感到自由了，但现在，她又再次感到忧虑。头一天伞兵着陆的消息所带来的欢乐被有关在阿纳姆激战的谣传减少了。尽管如此，科拉还是无法相信，德国人能够打败来解放她的国家的强大的盟军部队。

在河北边的赫维多普码头，科拉把她的自行车推出渡船，骑车去了奥斯特贝克以及当地的面包店。由于一个特殊的理由，她把贮存起来的少得可怜的糖的定量，交给了这家烘烤糕点的商店。在这个星期一，9月18日，巴尔图森罐头厂要庆祝其开业75周年，而科拉的母亲要庆祝其62岁生日。在许多个月的时间里，全家人将第一次团聚。科拉一大早就来到奥斯特贝克来取生日蛋糕，那生日蛋糕将既纪念公司的周年又纪念巴尔图森太太的生日。

朋友们曾试图说服科拉不要去，科拉不听。“能发生什么事情呢？”她问一位朋友，“英国人正在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战争几乎就要结束了。”

她的旅行平安无事。大清早的奥斯特贝克似乎是安宁的，在那里，英国部队行走在街道上，商店开门，到处是一种节日的气氛。眼下，虽然能够听见几英里之外的枪炮声，但奥斯特贝克是平静的，还没有被战斗触动。尽管她定做的蛋糕已经做好了，但面包师还是对她的来到感到惊讶。“战争差不多结束了！”她告诉他。她带着包裹，骑车返回赫维多普，等着皮特把渡船再次摆渡过来。在南岸，她返回到寂静得令人昏昏欲睡的小小的德里尔村，那里一如既往，没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3



在英军的着陆区域和空投场，那位担负着也许是最不令人向往的工作的军官，正在用他通常的能力做着那个也许是最不令人向往的工作。整个夜晚，菲利浦·皮普·希克斯准将的英军第一机降旅的士兵，击退了敌人一系列猛烈的进攻，那是冯·特陶率领的一支杂牌部队，在骚扰这个旅。希克斯的士兵在环形防线周围挖掘工事，坚守这些区域，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第四伞兵旅将于上午10时在这里空投，随后还将进行补给品的空投。希克斯保护下的这些区域，也是英军空降部队补给品的临时堆积处。

不论是希克斯还是他的士兵，都只睡了一两个小时的觉。德国人从树林里发起进攻，在一些地方把树林点着了，希望能把英国防御者们烧出来。“红毛鬼子”们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悄悄溜到敌人的背后，上了刺刀发起冲锋，把德国人逼向他们自己点着的火里。通信兵格雷厄姆·马普尔斯生动地记得那些激烈的夜间战斗。他和另外几个人偶然遇见了一个排的阵

亡的伞兵，他们被打垮了，被完全消灭了。“谁都没说什么话，”马普尔斯记得，“我们只是上了刺刀，径直进入树林。我们从树林里出来了，但德国佬却没能出来。”列兵罗伯特·爱德华兹曾参加过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斗，他回忆说：“我曾经历了所有那些战斗而没有负伤，但在荷兰的一天里，我交火的次数比别的所有交火加起来都多。”

那些没完没了的小规模战斗造成了伤亡。那天晚上，希克斯曾几次要求W·F·K·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给予炮兵支援，以便把敌人无休止地进攻逼回去。他现在知道，德国装甲部队正在阻挡前往大桥的那几个营，他真正惧怕的是，德国的装甲部队将会突破他脆弱的防御工事，把他赶出着陆区域和空投场。“我经历了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最糟糕的几个小时，”希克斯回忆说，“有两件事情是清楚的：一是我们实际上是在两个德国装甲师的上面着陆了，而那两个德国装甲师本来是不应该在那里的，尽管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一是德国人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做出了反应。”由于遭到来自西边冯·特陶的各支部队和来自东边哈策尔装甲部队的进攻，希克斯的携带轻武器的伞兵，除了坚守直到解围，或者直到增援部队和补给品安全着陆之外，已别无选择。

厄克特将军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是在伦库姆荒原的着陆区域里过的夜，那里距离希克斯的指挥所大约3英里。激烈的战斗已经使师部从树林里移了出来，又回到阔野里。在那里，在那天晚上的其余时间，司令部的参谋们都把滑翔机当作藏身之地。麦肯齐所担心的，就是得不到厄克特的命令。“在9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根本听不到厄克特的任何命令，”他回忆说，“我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同拉思伯里的第一旅在一起，但通信系统中断了，那两位军官的指示我们都听不到。我知道，有关这个师的指挥权得很快做出决定。因为始终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厄克特或者是被俘了或者是阵亡了。”

星期一一大早，由于仍然没有消息，麦肯齐决定与两位高级参谋官进行商谈，一是R·C·洛德－西蒙兹中校，另一个是P·H·普雷斯顿中校。麦肯齐把起飞前厄克特同他的交谈告诉了他们：万一厄克特出了什么事情，指挥权的接替顺序是拉思伯里，希克斯，然后是哈克特。现在，由于拉思伯里也失踪了，因而麦肯齐感到，应该与希克斯准将联系。另外两位军官表示同意。他们立即驱车前往希克斯的司令部。在黑尔苏姆至阿纳姆的马路边的一幢房子里，麦肯齐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了希克斯：“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据不足的报告，说弗罗斯特已经攻占了大桥，但一营和三营却陷于巷战，没有能够支援他。”

麦肯齐认为，现在的最佳举措，就是让希克斯拨出他的一个机降营，派往大桥。当哈克特的第四伞兵旅在上午晚些时候到达的时候，那个机降营就可以得到第四伞兵旅的增援。与此同时，希克斯被要求立即掌握该师的指

挥权。

希克斯似乎是目瞪口呆。他的部队已经兵员不足，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营可以派到大桥。好像英军的作战计划正在摇摇欲坠。如果弗罗斯特不能立即得到帮助，大桥就可能丧失；而如果着陆地区被攻占，那么哈克特的第四旅甚至在集结之前就可能被消灭。

除此之外，大家还心照不宣地公认，要求希克斯掌握指挥权的这个师，由于通信系统完全崩溃也由于没有指挥官，实际上已经处于解散之中。希克斯勉强派出了一个营的一半———这是他能拨出的一切———去保卫大桥。显然，这个决定是非常急迫的。大桥得守住！然后，麦肯齐记得：“我们终于说服了希克斯，他必须掌握师的指挥权。”

没有几个人曾经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被要求去接受一整个师的战场责任。希克斯很快就发现，通信系统的故障是多么严重地影响了所有的军事行动。从大桥上弗罗斯特那里收到的区区几个信息，是通过谢里夫·汤普森中校收到的，汤普森是第一机降旅轻武器团的炮兵指挥官。距离大桥二英里半，是奥斯特贝克的拉格教堂，汤普森从教堂尖塔上的一个观察所，与D·S·芒福德少校的炮兵指挥所建立起了无线电联系，芒福德的指挥所在大桥附近一个自来水厂的旅司令部里。汤普森与芒福德之间的这个联系，是可供希克斯支配的唯一可靠的无线电通信。

同样严峻的是，无论是与奈梅亨附近的布朗宁将军军司令部，还是与在蒙哥马利司令部的特殊的“鬼怪式通信网”装置，师部都没有建立起通信联系。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确实是到了英格兰，但它们大多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一个无线电接收装置传过去的，那套装置是为英国战地记者特地空运的。它的信号微弱、失真。有一个大功率的德国电台，与英国的无线电接收装置使用的是同样的频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师部能够接收到英格兰后方军司令部的信号，但却不能往回发出信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无线电接收装置发出去的那点很少的通信，是由穆尔公园里布朗宁的后方军司令部收到的，之又转发到欧洲大陆。这种传输耗时几个小时，当信息到达的时候，它们已经过时，往往实际上毫无意义。

希克斯既沮丧又担心，他当下就有三件要担心的事情：第一就是英格兰的天气；第二就是，他没有能力确认第二次空运的预定到达时间；第三就是，他没有手段可以把阿纳姆地区的真正形势告诉任何人。除此之外，他也无法提醒哈克特，英国人对着陆地区的控制危机四伏，而第四伞兵旅本来是期望要在排除了障碍而且得到保护的区域里空投的。

虽然不那么至关重要，但仍然棘手的是即将与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相遇。麦

肯齐告诉希克斯，这位火暴脾气的哈克特，在一着陆的时候，就会被告知厄克特有关指挥权序列的决定。“我知道哈克特的脾气，”麦肯齐回忆说，“我并不盼望这个见面。但告诉他实情又是我的责任，我是在执行厄克特将军的命令。我再也不能冒险认为厄克特将军和拉思伯里都没有出事。”

起码希克斯避开了那个需要慎重处理的冲突。这位新任师长脑子里有足够多的事情了。“形势不仅仅是令人困惑，”他记得，“简直是乱成一团。”

4



在阿纳姆西郊，当英军一营和三营挣扎着要赶到大桥的时候，以往整洁的公园和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被这场战斗搞得伤痕累累、坑坑洼洼。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玻璃、瓦砾以及紫叶山毛榉树的断枝。杜鹃花树丛以及青铜色、橘黄色和黄色的金盏花组成的浓密狭长绿化带，都被扯断了，践踏了，而荷兰人整洁住房后面的菜地也成了废墟。英军反坦克炮的炮口，从店铺和商场粉碎了的窗户伸了出来，而德国人的半履带式车辆则威胁着街道，它们故意倒车进入房屋，用房屋的瓦砾来隐藏自己。黑色的烟从燃烧着的英国车辆和德国车辆中喷涌出来，而当炮弹猛烈撞进据点的时候，瓦砾就像雨点一般落下来。伤者和死者扭曲的身体到处都是。许多士兵记得，他们看见，荷兰的男人和女人戴着白色的头盔，穿着画有红十字图案的白色宽大罩衫，从街道的两边冲出来，对炮火不予理会，把伤者和濒临死亡的人拽到隐蔽处。

这场奇怪而又致命的战斗，正在摧毁距离阿纳姆大桥不到两英里的市郊，这场战斗似乎没有计划，也没有战略。就像所有的巷战一样，它现在变成了一场在棋盘似的街道上的大规模而又凶猛的人打人的遭遇战。

“红毛鬼子”们身体寒冷，没有剃须，又脏又饿。战斗接二连三，使得大家只能偶尔“泡点”茶。弹药正在耗尽，伤亡正在增加，有的连减员已达到兵力的百分之五十。除了短暂的片刻小憩之外，睡觉是不可能的。许多人，由于疲惫不堪而且连续几个小时在行进，已经失去了一切有关时间的概念。没有几个人精确地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或者大桥还有多远，但他们却又抱定不屈不挠的决心，一定要赶到大桥。若干年以后，像在中间的路线———也就是老虎路线上的，由菲奇上校率领的三营的列兵亨利·贝内特这样的人将会记得，在不断出现的小规模战斗、狙击手的冷枪和迫击炮炮火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命令是不断发出的：“出发！出发！出发！”

厄克特将军离开师司令部16个小时了，而且也没有无线电联系，对他来

说，进攻的进程慢得使人痛苦。他在那座别墅里的几个小时一直是坐立不安的，凌晨3点的时候被唤醒，从那个时刻起，厄克特便与拉思伯里准将一同和三营在路上不断地行走。“激烈的遭遇战，短暂的开火，不断使整个纵队停下来。”厄克特说道。德国狙击手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威胁，令将军不安。他预料到，一些以前没有打过仗的士兵，将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害怕子弹”，但会迅速重新振作起来。相反，在一些街道上，单是狙击手的射击就减缓了整个营的进程。但厄克特并没有干涉菲奇的指挥，而是一直一言不发。“作为一名师长，卷入了一个营的遭遇战……我最不应该干涉了，但自始至终我又意识到，每一个珍贵的分分秒秒正在被浪费掉。”德国狙击手遭到了有效的处理，但把他们找出来所用掉的时间，却又让厄克特惊恐万分。

准尉副官约翰·C·洛德也同样惊恐。就像将军一样，洛德也因为这个耽搁而焦躁。“德国人的抵抗是猛烈的、持续的，但我们的耽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荷兰人造成的。他们一大早就出现在街道上挥手，微笑，给我们送来代用咖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在他们的树篱上盖上联合王国国旗[注]。他们就处在战斗当中，而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战斗正在进行。他们尽管完全是出于好意，却也会像德国人一样让我们停滞。”

突然，狙击手的猛烈开火被某种远远的更加严重的东西取代了：那是敌人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和自行火炮刺耳的爆炸声。此时，菲奇营的先头部队正在规模巨大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旁边，那是阿纳姆大桥西北不到两英里的地方。医院几乎就在那两条通向阿纳姆的主要马路的会合点上，而一营和三营正试图沿着这两条马路前往大桥。在这里，整个夜晚，霍亨施陶芬师的一些装甲部队一直在进入阵地。不论是在埃德通往阿纳姆的那条马路上的多比上校的一营，还是在乌得勒支通往阿纳姆的那条马路上的菲奇的三营，要想赶到大桥，都必须在这个会合点的一边通过。多比的一营首先感受到了哈策尔上校的狂热的党卫军部队的力量。

从覆盖着城市北边和西边入口的一个马蹄形环形防线，德国人已经迫使多比的部下离开了上面的那一条马路，进入周围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掩蔽起来。党卫军藏在屋顶上，狙击手藏在阁楼里，他们让先头部队经过而不予以阻碍，然后朝后面跟来的部队杀气腾腾地开火。在这种突然袭击所带来的混乱中，士兵们朝各个方向散开。

现在，德国人采用相同的策略，开始集中打击菲奇率领的三营。在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形势中，四位关键的军官———一营营长和三营营长、负责第一伞兵旅的军官，以及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师长———全都发现，他们在同一个小的、人口稠密的地区中陷入了瓶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莫德尔以及莫德尔在奥斯特贝克的指挥官们一样，厄克特将军和

拉思伯里准将也没有觉察到，他们被早就存在的敌人包围着。

来自身前身后的火力使英军的纵队陷入困境，他们散开了。一些人朝莱茵河边上的房屋跑去，更多的人跑进了附近的树林，而别的人———其中就有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则跑进了由一模一样的砖瓦房形成的狭窄街道里躲避。

厄克特一行人，在刚刚到达乌得勒支至阿纳姆马路附近一个街区的一座三层楼时，德国人就炮轰了这座楼。厄克特后来写道，他们并没有受到伤害，但德国人的装甲车则是“在穿过街道的时候，几乎是不经意间有了免疫力”。有一辆坦克隆隆地在街道上行驶着，其指挥官站在敞开的舱口里寻找目标。这时，彼得·沃迪少校，从厄克特的房子隔壁楼上的窗子里探出头来，内行地把一枚塑料炸弹投掷进敞开的回转炮塔里面，把坦克炸成了碎片。注其他的人以沃迪为榜样，摧毁了另外两辆坦克。尽管英国人凶猛地战斗着，但这些装备着轻武器的伞兵却绝非德国装甲车的对手。

厄克特本人的困境每一分钟都在增加，他极欲返回师司令部，并控制战斗。他认为，由于已经陷入战斗当中，他的唯一逃走的方式，就是上街，在混乱当中尝试穿过德国人的阵地。他手下的军官为他的安全担心所以不同意，但厄克特是固执的。他认为，这场激烈的战斗只不过是“连队规模的战斗”，而且由于英国人所占领的楼房尚未被包围，所以他认为，在德国人的力量增加并使包围圈牢固之前，他们一行人应该迅速离开。

一个匆忙的会议在战斗的喧闹声中召开了，会议期间，厄克特和军官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一辆英国的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在街道上哐啷哐啷地疾驶着，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德国人的炮火似的，然后它在大楼外面停了下来。一位加拿大中尉，名字叫利奥·希普斯，用厄克特的话来说，“好像拥有一种魔法保护的生存方式”，他从司机座位上跳了下来，全速跑向大楼。在希普斯的身后，是荷兰抵抗组织的夏尔·弗伦奇·拉布谢尔，他是在给希普斯做向导。这辆装甲车装载的是补给品和弹药，希普斯希望把它们送给大桥上的弗罗斯特上校。在到处都是德国装甲车的情况下，这辆小车及两位成员竟不可思议地幸免于炮火，并在途中碰巧发现了厄克特的行踪。现在，厄克特第一次从希普斯那里得知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消息远不是令人鼓舞，”厄克特后来回忆说，“通信手段仍然瘫痪。弗罗斯特在大桥的北端遭到猛烈的进攻，但仍然在坚守，而有关我的报告说我不是失踪了就是被俘了。”在听了希普斯的话之后，厄克特告诉拉思伯里当务之急“就是在我们被完全困住之前，冒险突围出去”。

厄克特转向希普斯，告诉这位加拿大人，如果完成去大桥上的任务之后能够到达师司令部的话，他要敦促麦肯齐，“为弗罗斯特的营组织起尽可能

多的帮助来”。厄克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他本人安全的代价，也要让弗罗斯特必须得到所需要的补给品和人员，坚守下去，一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达阿纳姆。

在希普斯与拉布谢尔离开之后，厄克特与拉思伯里着手进行他们的逃脱。外面的街道不断被敌人的炮火轰击扫射，楼房在炮弹的狠狠打击下正在坍塌。厄克特注意到，“在我们占领的楼房四周，有一堆越来越多的尸体”，他得出结论，通过街道离去是不可能的。两位指挥官与其他人一起决定，从楼房的后面离开。在楼房的后面，在掩护火力和烟幕炸弹的掩护下，他们或许能够逃脱。然后，他们希望利用一排排楼房的后花园里栽培的植物，能最终到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寻道返回司令部。

这条路径就像噩梦一般。在伞兵们制造出浓重的烟幕时，厄克特一行人冲出了后门，快速奔跑穿过一个菜地，爬上把楼房与其邻居分开的一道篱笆。当他们在下一个隐蔽处停留片刻时，拉思伯里的斯特恩式轻机枪意外走火了，差点击中厄克特的右脚。厄克特后来写道：“因为有一些士兵无法控制住他们的斯特恩式轻机枪，我指责过拉思伯里。让一位师长四处闪避是一件足够糟糕的事情……而我若是被自己手下的一位准将射出的子弹击倒，那就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太无可言表了。”

一行人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篱笆，有一次还爬过了一道10英尺高的砖墙，他们沿着整个街区的房子移动，最后来到了一条鹅卵石铺成的交叉街道。然后，他们被弄糊涂了，加之筋疲力尽，结果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失算。他们并没有转向左边，如果那样的话就可能给他们带来些许安全，相反他们却转向右边，朝圣伊丽莎白医院走去，直接走进了德国人的炮火之中。

跑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前面的是另外两位军官，一是旅司令部参谋部的威廉·泰勒上尉，一是三营的詹姆斯·克莱明森上尉。他们当中的一位突然叫喊起来，但不论是厄克特还是拉思伯里都听不懂他的话。在泰勒和克莱明森能够拦住两位高级军官之前，那两位将军已经碰上了迷宫般的交叉街道，厄克特看来，在那个地方，“一挺德国人的机枪正在朝我们每一个人射击”。当这四个人试图跑过其中的一条狭窄交叉口的时候，拉思伯里被击中了。

其余的人迅速把他拽出街道，进入了一幢房子。在那里，厄克特看到，一颗子弹射进了准将的后背下部，他似乎丧失活动能力了。“我们全都知道，”厄克特回忆说，“他再也不能行走了。”拉思伯里敦促将军，把他留下，立即离开。“你要是待下来的话，只能被切断退路，长官。”他告诉厄克特。当他们交谈时，厄克特看见一名德国士兵出现在窗户上。他举起自动步枪，近距离平射，那个德国人满是鲜血的脸消失了。现在，由于德国人在这么近的地方，不容置疑，厄克特必须迅速离开。在离开之前，他与

那对中年夫妇进行了交谈，那对中年夫妇是房主人，会说一些英语。他们许诺，战斗一有间歇便把拉思伯里送到圣伊丽莎白医院。为了使房主人免遭德国人的报复，厄克特一行人把拉思伯里藏在楼梯下面的一个地下室里，直到他能够被送去医院。厄克特记得，然后“我们从后门离开了，但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由带有篱笆的小花园组成的迷宫”。三个人并没有走远，但厄克特的生命，却完全可能是由那位55岁的安东·德克森所立即采取的行动给救下来的，安东·德克森是茨瓦特路14号一栋房屋的主人。

在极度混乱的射击当中，安东和他的妻子安娜、他们的儿子扬以及女儿赫米娜，正在房子后面的厨房里躲藏。德克森从窗子朝外瞥了一下，吃惊地看见，有三个英国军官跃过篱笆，进入他的后花园，朝厨房门口走来。他赶忙让他们进来。

由于无法交流———安东不会说英语，而厄克特一行人谁也不会说荷兰语———因而安东打着手势，试图警告那些英国人，这个地区被包围了。“街上有德国人，”他后来回忆说，“而在后面，也就是那些军官要去的那个方向，也有德国人。在这排花园的尽头，角落的阵地里也有德国人。”

德克森匆匆带着客人们上了一个狭窄的楼梯，来到一个楼梯平台，又从那里进入一间卧室。天花板上有一扇可以拉下来的门，上面有台阶通向阁楼。这三个人小心翼翼地从卧室的窗子朝外看，于是明白了为什么德克森疯狂地演出了一出哑剧。就在他们下面不过几英尺的地方，在沿街各处的阵地里都是德国部队。“我们靠他们太近了，”厄克特记得，“我能听得见他们的说话声。”

厄克特无法猜出，当他们进入房子的后门时，德国人是否发现了这一行人，也无法猜出他们是不是随时会冲进来。尽管德克森警告说，这个地区被包围了，但他仍然细细思考着那两个密切相关的风险：一是继续穿越那一连串的后花园，一是用手榴弹扫清道路，从前面的街道上冲下去。他准备不惜冒任何风险，也要返回他的司令部。他的军官们由于为他担忧，因而并不准备冒险。此刻，困难太大了。他们争论说，与让将军冒被捕或者可能死亡的风险相比，还是一直等到英军攻占这个地段要好得多。

厄克特知道，这个忠告是明智的，而且他也不想强迫他的军官们冒可能证明是自杀的风险。然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离开师指挥部时间太久了，对我来说似乎怎么样都比这个样子脱离战斗要好”。

履带发出的熟悉的嘎吱嘎吱声，迫使厄克特原地不动。这三位军官从窗子看到，一门德国自行火炮在街上缓缓驶来，直接停在了德克森家的外面。这辆装甲车的顶部，几乎与卧室的窗子齐平，炮组人员下了车，现在就在

下面坐着，边交谈边抽烟。显然，他们不再前进了，英国人预料，他们随时都会进到屋里来。

泰勒上尉迅速把阁楼的楼梯拉了下来，三位军官匆匆爬了上去。身高6英尺的厄克特蹲下身，四下看着，发现阁楼只能让人爬行而已。他感到“犯傻，可笑，无能为力，在战斗中当上了看客”。

房屋里现在安静了。作为一名忠诚的荷兰人，安东·德克森为这几个英国人提供了庇护所。现在，由于害怕厄克特被发现而可能遭到报复，他审慎地把家人转移到隔壁邻居的家里。在几乎没有空气的阁楼里，更没有食品和水，厄克特和他的军官们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希望不是德国人撤退，就是英国部队能到达。在这个星期一，9月18日，市场花园行动才进行了一天，德国人就已经几乎让阿纳姆战役停止了，而且使所有错误和失算雪上加霜的是，厄克特这位唯一可能给英军的进攻带来聚合力的人，却又被孤立在一个阁楼里，在德军营地之内陷入了困境。

对于保罗·格拉布讷上尉以及他的第九党卫军装甲师侦察营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又令人生厌的任务。盟军的伞兵并没有在阿纳姆和奈梅亨之间那块11英里长的地段着陆。对于这一点，格拉布讷是肯定的。但敌人的部队在奈梅亨。格拉布讷的几辆车过了瓦尔河大桥之后，立即就发生了一场短暂而又激烈的轻武器遭遇战。在黑暗当中，敌人表现得似乎根本无意继续与他的装甲车作战，格拉布讷向司令部报告说，至今盟军在城里似乎没有多少兵力。

现在，既然他的侦察任务完成了，于是格拉布讷命令，从有40辆车的部队中抽出几门自行火炮来保卫奈梅亨大桥的南入口。他带着侦察营的其余人员，朝北返回阿纳姆。头一天晚上，在过阿纳姆大桥的时候，他既没有看见伞兵也没有看见敌人有任何活动。然而，从无线电获得的信息中他得知，一些英军部队现在已经在大桥的一边了。哈策尔的司令部只是把他们称为“先头部队”。格拉布讷再次停了下来，这一次是在埃尔斯特镇停下来的，该镇大致处于阿纳姆和奈梅亨的中间。在那里，为了能使两座公路桥都在打击距离之内，他再次把他的一些装甲车留了下来。带着剩余的24辆装甲车，他快速朝阿纳姆大桥返回，以便把那里还剩下的小股敌人肃清掉。格拉布讷预料，这不会有什么困难。他强大的装甲部队将会干脆利落地冲过英军轻武器防御的工事，把他们摧毁。

上午9点30分，下士唐·卢姆从他在大桥附近的屋顶阵地上，激动地喊叫起来：“坦克！那是第三十军！”在附近的营司令部里，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听见了自己的观察员的喊叫。就像卢姆下士一样，弗罗斯特也感到了一阵飘飘然的兴奋。“我记得，我想，我们将荣幸地仅凭我们自己就把第三十军欢迎进阿纳姆。”他回忆说。其他的人也同样感到振奋。北入口相对的另

一边，在埃里克·麦凯上尉指挥所附近的坡道下面，士兵们已经听得见重型车辆在大桥上发出的回响。中士查尔斯·斯托里咚咚咚地爬上卢姆下士所在哨所的梯子。斯托里朝大桥南入口上升的烟雾瞥视过去，看见了卢姆所发现的那个纵队。他立即做出反应。这位参加过敦刻尔克撤退战斗的老兵全速下了楼梯，喊道：“他们是德国人！大桥上是装甲车！”

保罗·格拉布讷上尉的进攻部队的前锋，以最快的速度过了桥，出现了。德国司机们以非凡的技巧，向左边和右边急转，不仅避开了乱堆在桥上的闷燃着的车辆残骸，而且还直接穿过了一个雷区———那是英国人在夜间布下的一连串盘子样的特勒型地雷。在格拉布讷的5辆先头车辆中，只有一辆触了雷———而且也只是受了点表面上的损坏，那辆车还在继续前进。麦凯上尉吃惊地注视着，在坡道的他这一边，那些伪装起来的粗矮汽车当中的第一辆，不断地用机枪扫射，飞奔着冲下坡道，冲过英军的环形防线，直接驶向阿纳姆中心。麦凯看见，另外一辆几乎是立即驶了过去。“我们这一边没有反坦克炮，”麦凯说道，“我只是无能为力地注视着，又有三辆装甲汽车快速从我们旁边通过，上了林荫大道。”

格拉布讷强行快速通过大桥的大胆计划正在进行。在英国人的视线之外，在大桥的南入口，他排好了他的纵队。现在，半履带式车辆、更多的装甲汽车、兵员运输车，甚至还有几卡车的步兵，开始进军，卡车上的步兵从沉重的谷物麻袋后面射击。蹲伏在半履带式车辆后面的另外一些德国士兵，也在不断地射击。

格拉布讷先头车辆的突然突破，把英国人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迅速镇定了下来。在大桥的弗罗斯特一边的反坦克炮，开始进入射程。从整个北边地区，一种具有杀伤力的炮火覆盖了德军的纵队。从矮墙、屋顶、窗户和狭长掩体里，伞兵们用每一件可用的武器开火。在坡道的麦凯那一边，皇家工兵罗纳尔多·埃默里击毙了第一辆经过的半履带式车辆的司机和副司机。当第二辆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埃默里把它的司机也击毙了。那辆半履带式车辆就在坡道下面停下来不动了，车上的6名德国士兵弃车而逃，他们也被一个个地击毙了。

格拉布讷的纵队不间断地继续前进，又有两辆半履带式车辆缓慢地驶过了大桥。突然，混乱的场面降临在德国人的攻击之中。第三辆半履带式车辆的司机负伤了，他惊慌失措，猛地倒车，结果与后面的半履带式车辆撞在一起。这两辆车纠缠在一起，分不开，于是侧滑越过了马路，其中一辆燃起了熊熊大火。从后面赶上来的德国人，试图强行打开一个通路。他们给车辆加速，发疯似的要夺取北边的一边，结果彼此猛撞在一起，进入炮弹爆炸造成的那堆越来越大的车辆残骸之中。由于失去控制，有一些半履带式车辆碰到了坡道的边缘，因为撞击力量太大，结果从边缘翻过去，摔进了下面的街道。跟在半履带式车辆后面进行支援的步兵，也被无情地杀死

了。由于无法前进越过大桥的中央，幸存者们便快速返回到南边。

一阵暴风雨似的炮火来到大桥。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在奥斯特贝克，被丹尼斯·芒福德少校请来帮忙，现在汤普森中校的炮火，呼啸着轰击格拉布讷已经被击中的车辆。丹尼斯·芒福德少校是从那个用作旅司令部的阁楼里发出请求的，而那个阁楼就在弗罗斯特所在建筑附近。在这一片喧闹声中，传来了兴高采烈的英国伞兵的叫喊声，他们喊着这个战斗口号："嗨，穆罕默德！"这些"红毛鬼子"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战斗口号时，是在1942年北非干燥的山区里。注

战斗之激烈，让该地区的荷兰人目瞪口呆。兰贝特·斯哈珀与他的家人一起住在赖因卡德街———这是一条在大桥东西方向延伸的街道，他匆匆把他的妻子和九个孩子送到一个掩蔽所里。斯哈珀本人则待在家里，一阵弹雨穿过窗子，让墙变得坑坑洼洼，打碎了家具。在这猛烈的炮火下面，斯哈珀逃走了。在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看来，这场战斗似乎没完没了。"火力猛烈，"他回忆说，"一座又一座楼房或者被击中了或者在燃烧。同事和朋友们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楼房里，我们吃了不少苦头，隔壁的楼房着了火，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上的那些楼房也烧着了。"

在北入口附近的那条宽大的林荫道上，库恩拉德·赫勒曼未婚妻的家，距离麦凯上尉的指挥所只隔着几个门，现在他与范·德桑德家的其他人一起，待在地下室掩蔽所里。"有一种滑稽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别的喧闹声，有人说，那是在下雨，"赫勒曼记得，"我上了一楼，朝外边看，看到那是火。士兵们正在朝各个方向跑，整个街区似乎都在燃烧。战斗直接转移到林荫道上了，突然轮到我们了。子弹啪啪地射进房里，打碎了窗子，而楼上，我们听见了琴声，那是钢琴被击中了。还有，令人吃惊的是，范·德桑德的办公室里传来像是人打字的声音。那纯粹是子弹在咀嚼打字机。"赫勒曼的未婚妻特鲁伊德跟着他上了楼，她看见子弹击中了规模巨大的圣优西比乌斯教堂的塔楼。当她吃惊地注视着的时候，教堂上巨大时钟的金指针正在发疯似的旋转，特鲁伊德记得，那就好像"时间在飞速逝去"。

对于在大桥上作战的人们来说，时间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战斗的撞击、速度和凶猛，让许多人认为，战斗已经进行了许多个小时了。实际上，格拉布讷的进攻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哈策尔上校所珍惜的不让哈梅尔将军要去的装甲车辆，其中12辆在大桥的北边被摧毁了。剩余的装甲车辆脱离这场残杀，开回了埃尔斯特，但缺少了他们的指挥官。在这场激烈的、决不心慈手软的战斗中，保罗·格拉布讷上尉阵亡了。

现在，英国人在骄傲和胜利的情绪之中，开始对损失进行估价。随军卫生员和担架兵，不顾狙击手的无情射击，穿过烟雾和瓦砾，把双方的伤员抬

到掩蔽所里。大桥上的“红毛鬼子”们，在击退了装甲车的一次恐怖进攻之后幸存下来，这时二营的通信兵突然收到了第三十军发来的一个有力而清晰的信息，就像是对他们的成功表示祝贺一般。这些满是污垢、疲惫不堪的伞兵们想象，他们的磨难很快就要结束了。现在，毫无疑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就在不过几英里以外的地方。

从德国边界后面的各个机场里，成群结队的战斗机升空了。为了把飞机集结起来加油，附近的已经被损耗了的德国空军全力以赴，做出了努力。一个狂热的不眠之夜之后，战斗机从德国各地被匆匆派来，现在，在上午9点和10点之间，大约有190架飞机聚集在了荷兰上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摧毁市场行动的第二次空运。德国空军的将军们与持怀疑态度的陆军元帅莫德尔不同，他们相信，所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是真的，他们看到了一个可以取得重大成功的辉煌机会。从那些计划中，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知道了星期一的空运路线、着陆区域和空投时间。德国战斗机编队在荷兰的海岸巡逻，飞越已知的盟军飞行路线和空投场，等待向空降部队猛扑过去。盟军的空降部队定于上午10时开始空投。这些短程战斗机得到的命令是：着陆，再次加油，再次起飞。但空中至今什么也没有，预料中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出现。德国空军统帅部既困惑又失望，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的事情很简单。荷兰的天气是晴朗的，但英国的天气则不同，那里被雾覆盖。在各个基地，英国和美国的空降部队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在飞机和滑翔机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在这个关键性的上午，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而这个时候，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刘易斯. H.布里尔顿将军，就像参加第二次空运的士兵们一样，只好任凭天气的摆布。在与气象专家们磋商之后，布里尔顿不得不重新安排行动的开始时刻。那些在不断加强的德国兵力面前坚守的、在阿纳姆市内及其周围的士兵，还有在走廊里的美国人，现在必须再等上4个漫长的钟头。在下午2时之前，第二次空运不可能到达空投场。

5



阿纳姆南边57英里处的瓦尔肯斯瓦德，地面上的浓雾使得第三十军的坦克部队原定早晨6点30分出击的时间不得不推迟。然而，侦察车却仍然按计划动身了。他们从拂晓便开始巡逻，以摸清德国人的兵力。在东边，覆盖着欧石楠的沙滩和小溪，使得这个地区甚至让侦察车也难以通行。在村子西边，小溪和河流上面的木桥被认为太轻了，支持不住坦克。当位于中央的侦察车在瓦尔肯斯瓦德外面狭窄、只有一辆坦克宽的马路上移动的时

候，突然与一辆德国坦克和两门自行火炮不期而遇，当巡逻车靠近时，他们开了出去，朝艾因霍温驶去。从所有的报告来看，似乎进入艾因霍温的最快路线仍然是公路，尽管看见了德国的装甲车，而且可以预料，当英国人靠近城市的时候，还会碰到更多的德国装甲部队。现在，3个小时之后，霍罗克斯将军的坦克刚刚开始再次开动。当弗罗斯特上校的士兵在阿纳姆大桥与格拉布讷上尉的部队交战的时候，作为先锋的爱尔兰近卫团终于动身了，沿着大马路前往艾因霍温。

德国人强硬的抵抗，已经使霍罗克斯的计划受挫，那计划就是，在星期日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猛冲出去，在3个小时之内与在艾因霍温的泰勒将军第一○一空降师会合。17日，到夜幕降临时，乔·范德勒中校的坦克手们朝瓦尔肯斯瓦德只走了7英里，比那天的目标少了6英里。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表明，应该在夜间继续向前推进。近卫团装甲师的参谋长诺曼·格沃特金准将告诉范德勒，艾因霍温以外的索恩桥已经被摧毁了，在坦克过河之前，得先把建桥的设备带来。范德勒记得格沃特金当时说的话："明天再继续向前去艾因霍温吧，老兄，不过不用着急。反正我们已经失去一座桥了。"

士兵们对这个挫折一无所知，因而也就对耽搁感到不耐烦。约翰·戈尔曼中尉，在进攻之前曾经参加霍罗克斯将军举行的简介会，他当时就认为，需要越过的桥太多了。戈尔曼在几个星期以前接受了战功十字勋章[注]。现在却烦躁易怒。他原先的惧怕似乎是有理由的。戈尔曼急于出发，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近卫团装甲师居然在瓦尔肯斯瓦德过夜。他指出，习惯"似乎规定了，晚上睡觉，白天工作"，但戈尔曼感到，这样的行为习惯此时是不适用的。"我们必须前进，"他记得他当时说道。"我们不能等待。"鲁珀特·马哈菲中尉，也同样为近卫团的缓慢推进感到不安。"我开始朦胧感到良心上不安，"他说道，"我们的进军似乎比原先的打算要慢，而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迅速加快步伐，就不会按时到达阿纳姆。"

尽管皇家装甲兵团的侦察巡逻队警告说，有德国的装甲部队和步兵在等候，但爱尔兰近卫团在到达阿尔斯特村之前，却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阿尔斯特村位于前往艾因霍温的路途中央。但是不久，从公路两侧的松树林里，雨点般的步兵子弹吞没了这个纵队，一门孤零零的自行火炮与领头的坦克交战。很快，那门自行火炮被打得失去了战斗力，范德勒的部队继续隆隆地驶过村子。向北两英里，在横跨多梅尔河的一座小桥上，爱尔兰人又再次被耽搁了，这一次遇到的是猛烈的炮火。4门88毫米火炮的炮火覆盖了这座桥，配备以重机枪的步兵隐藏在附近的房屋里和水泥墙后面。打头的车辆立即停了下来，英军士兵从坦克里跳出，进行还击。

为了尽可能快地继续前进，范德勒决定求助于能发射火箭的台风型战斗

机，在头一天的进军中，那些飞行员曾技艺精湛地帮助过这个纵队。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现在全权负责地对空的通信，他把这个要求传递了出去。令他吃惊的是，他被拒绝了。在比利时，那些飞行中队因为大雾而停飞。洛夫回忆说，范德勒“怒不可遏”。他眯着眼睛看着荷兰上空的晴朗天气，挖苦地问洛夫：“皇家空军是不是被阳光吓坏了。”

整个纵队朝后延伸，几乎到了比利时边界，现在，他们被位置优越的敌人炮火拖住了。打头的坦克试探着向前徐徐移动，一门大炮直接朝马路开火，近距离的平射让坦克停了下来。当自己的坦克朝德国人开火的时候，范德勒要求派重炮来，并迅速命令巡逻队沿河向西移动，寻找桥梁或者车辆可以涉水而过的浅滩，以便包抄德国人的炮组，从后面发起进攻。

当英国的大炮开始与敌人交战时，一个钢铁的火力网呼啸着飞过了打头的坦克上空。但德国人位置优越，而且抱有坚定的决心，继续开火。战斗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范德勒因为这个耽搁而发怒，却又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

但在北边不到4英里的地方，有一支侦察部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侦察车在遍布水流的地形和沼泽当中，越过脆弱的木桥，进行了一次穿越乡间的迂回旅行。他们在回避德国阵地的时候，突然与艾因霍温北边的美国伞兵不期而遇。接近中午时，率领着皇家装甲兵团侦察部队的约翰·帕尔默中尉，受到了杰拉尔德·希金斯准将的热烈欢迎，希金斯是美军第一○一师“尖叫的老鹰”的副司令。帕尔默通过无线电，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的司令部：“小马倌已经与我们长着羽毛的朋友们接触上了。”[注]沿着走廊的三个极其重要的会合中的第一个，已经获得成功，这比市场花园行动的时间安排，整整晚了18个小时。

由于终于接触上了，讨论就立即转向了索恩大桥。等待中的英军工程兵部队需要了解完整的细节，以便把修复渡口所需要的材料和设备送上去。皇家工兵与范德勒的先头纵队一起赶向前去，准备进军。信息本来可以通过无线电传递，不过美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吃惊的英国人被无线电告知，要他们的工兵们给“索恩244”打电话。电话立即通过德国人控制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没出几分钟，索恩大桥的美国人便给英国工兵们送去了那个重要的信息，以让他们把合适的建桥设备送上来。

在阿尔斯特村，范德勒的坦克手们对德国人炮火的突然结束感到惊奇，那炮火曾使得他们在马路上长时间动弹不得。原来，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连打通了道路。一支英军侦察部队缓慢地沿着多梅尔河的西岸行进，在阿尔斯特村北边1英里处，在德国人阵地的后面，碰到一个渡口。该连从后面朝德国人的大炮发起冲锋，攻占了他们的阵地，结束了战斗。

滞留在阿尔斯特村的坦克手们，对这个行动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这个突然的平静是战斗中的一个间隙。领头的第二连由爱德华·泰勒少校负责，他正在斟酌是否应该利用这个中断，命令他的坦克向前冲，这时他发现，一个人在马路上骑着自行车朝纵队奔来。那个人在对岸停下来，跳下自行车，发疯似的挥舞着手臂，跑过桥。感到愕然的泰勒听见他说："将军阁下！将军阁下！德国佬走了！"

那个荷兰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自我介绍。科内利斯·洛斯，41岁。他是受雇于艾因霍温的一名工程师，不过住在阿尔斯特村。"马路，"洛斯告诉泰勒，"开通了，你们已经把村子入口处的唯一一辆坦克炸坏了。"泰勒回忆说，然后，"他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草图，上面有阿尔斯特与艾因霍温之间德国人的所有阵地。"

泰勒立即下令进军。坦克过了桥，上了马路，经过现在已成废墟的德军炮兵阵地。没出一小时，泰勒便看见，前面就是建筑无序扩张的艾因霍温，好像有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蜂拥在马路上，他们在欢呼、挥舞着旗帜。"现在使我们滞留下来的唯一障碍，就是荷兰的人群！"E·费希尔－罗少校用无线电给后面的纵队发去了这样的信息。在这种使人飘飘然的狂欢气氛当中，第三十军笨重的坦克部队将会用4个多小时穿过城市。直到下午7点过后，先头部队才到达索恩大桥，罗伯特·F·辛克上校疲惫不堪的工兵们正在那里干活，自从大桥被毁掉以来，他们就一直在那里修复这座极其重要的桥梁。

从一开始，这个同步进行的市场花园行动的日程安排就不允许出太多差错。现在，就像进入阿纳姆的英军的进军受挫一样，给索恩大桥带来的损坏，也是威胁整个行动的一个重大挫折。这个28英里的走廊——从比利时边界，向北到费赫尔——现在被英美联军控制着。美军第一○一师以非同寻常的速度，走完了走廊中的15英里公路，攻占了艾因霍温、圣奥登罗得和费赫尔这些重要城镇，其中的11个渡口只有两个没有攻占。然而霍罗克斯有2万辆车辆的增援纵队，却只能在索恩渡口被修好之后才能向前推进。英国工兵随着领头的坦克赶到前面，他们必须争分夺秒修复大桥，把第三十军送过威廉明娜运河，因为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只能走这一条路线，别无选择。

在制订计划的阶段，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知道，对于直接冲到走廊来说，索恩大桥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他也把一个次要的目标包括了进去。为了抵消像在索恩发生的这种挫折，泰勒已经命令，要攻占位于贝斯特村的那座100英尺长的运河公路桥。这座桥在大马路西边4英里处，它可以在紧急时刻使用。由于情报官员认为这个地区德国部队人数很少，因而只派了一个孤零零的连去夺取这座桥以及附近的一个铁路道口。

对于被派去夺取这座桥的美国部队来说，贝斯特注定要成为一种悲剧性的取名不当。(注)爱德华·L·威尔斯鲍斯基中尉的兵员得到了补充的连，在17日夜晚的凶猛作战中又大大减员了。在威尔斯鲍斯基的率领下，顽强的伞兵们沿着堤岸进行渗透，穿过沼泽，面对人数占压倒优势的德国兵力推进；有一次，他们来到距桥不到15英尺的地方，但齐射的火力又把他们挡回去了。在夜间各个不同的时间段里，有不同的消息传回来，有的说桥已经被攻占，而另外的报告则声称，威尔斯鲍斯基的连已经被消灭了。增援部队像威尔斯鲍斯基的连队一样，也迅速陷入了绝望的、远非势均力敌的搏斗之中。在第一○一师司令部里，情况被搞清楚了：在贝斯特有德军重兵集结。这个村子远不是防御薄弱，而是有将近1万名兵力———那是被人们遗忘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部队。贝斯特就像海绵一样，正在吸收越来越多的美军。当战斗在整个地区猛烈进行的时候，威尔斯鲍斯基和连里的几个幸存者就处在战斗的正中间。他们被包围得严严实实，结果连增援部队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而他们则继续在为夺取大桥而战。

中午时分，当英军和美军的先头部队在艾因霍温会合时，贝斯特的那座桥被德国人炸掉了。威尔斯鲍斯基和他的士兵离大桥太近，飞来的瓦砾使他们已有的伤亡更加重了。在别的地方，伤亡也同样惨重。罗伯特·科尔中校是第一○一师最生动有趣而又言辞尖刻的指挥官之一，他拥有荣誉勋章(注)，他阵亡了。荣誉勋章也将授予另外一位牺牲的军人。列兵乔·E·曼在桥上负了非常重的伤，两只胳膊都裹上了绷带，捆在肋部。他看见一枚德国人的手榴弹落在他所在的人群中。由于无法伸出胳膊来，他便扑在手榴弹上，救了他四周人的命。当威尔斯鲍斯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曼只说了一句话。“我的背没了！”他告诉中尉。然后他死了。

由于贝斯特桥失去了，所以市场花园行动的成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工兵修复索恩渡口的速度。市场花园行动的各个阶段之间是丝丝入扣的———每一个环节都依赖于下一个环节。现在，在这些丝丝入扣的阶段当中，索恩前面的马路却没有坦克部队，而坦克部队本来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应该在那条马路上行驶。蒙哥马利的大胆进攻正在走进愈来愈深的麻烦之中。

在走廊里越往前走，问题就越复杂。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走在中央，南面是泰勒将军的“尖叫的老鹰”，北边是阿纳姆的“红毛鬼子”们。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牢牢控制着格拉夫的那座1500英尺的桥，另外还有霍伊曼附近的那座小一点的桥。西南方向，在经过了一场爽快的战斗之后，第五○四团和第五○八团，从马斯河—瓦尔河运河的两边同时发起进攻，夺取了格拉夫至奈梅亨公路上的另外一座桥梁，那座桥梁位于霍宁胡蒂村，这就为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打开了进入奈梅亨的一条可替代的路线。但当那座被毁坏的索恩大桥阻挡英军向走廊的中间进军的时候，第八

十二师未能迅速夺取奈梅亨渡口，这造成了别的一些问题。在奈梅亨渡口，党卫军现在已在南入口挖掘战壕守卫，他们有很好的保护和隐蔽，一再击退第五○八团一个连的进攻。随着每一分钟过去，德国人的力量都在增强，而加文却抽不出更多的人来，全力以赴，夺取这座桥。因为在第八十二师巨大的驻扎地———一个南北10英里、东西12英里的地区，到处都有敌人一系列疯狂的、缺少规律的进攻，那些进攻预示着灾难。

在格拉夫至奈梅亨公路上的巡逻队，不断遭到渗透进来的敌军的攻击。下士厄尔·奥德法瑟正在随时注意狙击手，他在第五○四团的战地看见了三个人。"其中的一位正在从他的散兵坑里往外舀水，另外两位正在挖掘，"奥德法瑟回忆说，"我挥了挥手，看见其中的一位拿起了步枪。原来他们是德国佬，他们直接进入了我们的阵地，从我们自己的散兵坑里向我们开枪。"

再往东，格鲁斯贝克高地与德国边界之间那两个极其重要的着陆区域，也正迅速变成战场，因为一拨一拨的德国步兵正被投进来对付伞兵们。在那些低水准的德国步兵当中，有海军和空军的人员、通信部队人员、正在休假的军人、医院的护理员，甚至还有刚刚离开医院的康复期病人。下士弗兰克·鲁普记得，他看见的第一批德国人，穿着各种各样令人晕头转向的制服，佩戴着令人晕头转向的军衔徽章。他回忆说，进攻开始得如此突然，"我们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前哨基地外面遭到了伏击"。那些部队似乎是从乌有乡里出现的。在最初的几分钟里，哈罗德·根斯莫中尉抓获了一位过于自信的德国上校，那家伙吹嘘说："我的士兵将很快就把你们从这座山上直接踢下去。"他们几乎做到了这一点。

德国人成群结队，从维勒镇越过德国边界，从国家森林里出来，他们在人数上占有压倒优势，突破了第八十二师的环形防御阵地，迅速攻占了那些区域，抢占了补给品和弹药临时存放处。有一段时间，战斗是混乱的。第八十二师的防御者们尽可能长地坚守他们的阵地，然后缓慢撤退。这个地区的其他部队接到了通知，要快速赶往战斗现场。在奈梅亨附近的士兵一路强行军前往空投场，以给予额外的支援。

一种惊恐似乎正降临在荷兰人当中。列兵帕特·奥黑根注意到，当他们排从奈梅亨郊外撤退的时候，他在进城时看到的那些荷兰国旗，正在被匆匆取下。列兵阿瑟·荷兰人·舒尔茨[注]，是一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是排里一位勃朗宁自动步枪手[注]，他注意到："每一个人都神经紧张，我所能听到的，全都是反复一句话：'把前面和中央堵住。'"不管他朝哪里看，都能看见德国人。"他们在我们周围的每个地方，决心把从我们所在的区域赶出去。"每一个人都清楚，在德国装甲部队和经验丰富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这支估计约有两个营的德国部队，是被派来执行一项自杀式任务

的：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并坚守这些空投场———而这些空投场正是该师获得增援部队和补给品的生命线。如果德国人获得成功，那么他们就能在盟军第二次空运着陆时，将其歼灭。

这个时候，加文将军认为，预定的第二次空运已经离开了英格兰，已经没有办法让他们停下来，或者及时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加文就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清理这些地区，而且每一个可以战斗的伞兵他都需要。除了那些已经在交战的伞兵，唯一随时可用的预备部队就是两个工兵连。加文立即把他们投入了战斗。

这些伞兵与敌人在人数上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五，他们在迫击炮和火炮的支持下，整个上午都在作战，力图把这些地区清理干净。后来，许多士兵上了刺刀，沿着山坡朝德国人追去。在战斗进行得最猛烈的时候，加文得知，第二次空运下午两点才能到达。树林里仍然有形形色色的德国步兵大量出没，敌人的这些突袭预示着将会有更为集中而又坚决的进攻。加文确信，如果让他的部队在一个又一个的地区尽力对付，他是能够坚守住的，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眼下八十二师的形势岌岌可危。由于得到了信息说索恩大桥坏了，正在修理，因而他也就不能期望在D日的两天之后与英军会合了。加文焦急而担忧地等待着第二次空运，第二次空运将带来他所急需的火炮、弹药和人员。

6

★ ★ ★

从阿纳姆烟雾缭绕的废墟到索恩被毁坏的渡口，在散兵坑、在树林里、在堤岸的旁边、在炸坏的楼房的瓦砾中、在坦克上，以及在极其重要的桥梁的入口处，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士兵和与他们交战的德国人，都听见从西边传来了低沉的隆隆声。参加第二次空运的飞机和滑翔机，排成一个又一个纵队正在接近，让天空都变暗了。马达持续的、越来越响的嗡嗡声音，使英美联军和荷兰人民的心中再次充满了力量和希望。而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这个声音就像毁灭的前兆。战斗人员和老百姓都朝天空凝望，等待着。时间是9月18日，星期一，下午，马上就到两点。

这个军用机机群之庞大，甚至让头一天的那个景象相形见绌。在17日，飞行走了两个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北路，一个是南路。现在，恶劣的天气以及希望更能保护自己免遭德国空军的打击，使得整个第二次空运都走北路前往荷兰。4000架飞机压缩成一个巨大的纵队，覆盖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天空，机群高度从1000到2500英尺不等。

1336架美国C - 47型飞机和340架英国斯特林轰炸机，翼尖与翼尖并排飞行，它们组成了这个空中列车的主体。在这些飞机当中，有一些运送部队，其他的飞机拖航着数量大得惊人的滑翔机———1205架霍萨型滑翔机、韦科型滑翔机以及庞大的哈米尔卡型滑翔机。在这个100英里长的飞机队列的后部，是252架四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它们运送的是货物。在上方和两翼保护这些编队的，是867架战斗机———有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和发射火箭的台风式战斗机，也有美国的霹雳式和闪电式战斗机———他们在护航飞行。在起飞的时候，这第二次空运总共载着6674名空降部队士兵、681辆车辆和装了货物的挂车、60门火炮以及弹药，还有将近600吨的补给品，另外包括两辆推土机。

这个巨大的军用机机群，由于被高射炮火所笼罩便在斯豪文岛的荷兰海岸上着陆，然后向东朝内地飞去，前往斯海尔托亨博斯镇南边的一个交通控制点。在那里，由战斗机开路，这个纵队分成三个部分。美国机群以时间上的精确性，完成着困难而又危险的机动动作，突然转向南边和东边，朝第一○一师和第八十二师的区域飞去，与此同时英国的编队则朝北边飞去，前往阿纳姆。

就像在头一天一样，也有不少问题出现，尽管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一些。混乱、飞行中途的失败以及致命的不幸事故，尤其打击滑翔机机群。早在第二次空运到达空投场之前，就有54架滑翔机由于结构上的错误或者人为的错误而坠落。大约26架飞机在英格兰内地和英吉利海峡的上空飞行中失败，人们看到，其中两架在飞行过程中解体。还有26架在敌人领土上空距离约80英里的飞行过程中，被过早地释放下来，着陆的地方远离比利时和荷兰的着陆区域，落在德国边界后面。在一次古怪的事故中，一名惊魂未定的伞兵冲向驾驶舱，猛拉松脱杆，结果使得滑翔机脱离了它的拖航飞机。但是，总体上来说，部队的伤亡是比较低的，最大的损失，就像头一天一样，还是在珍贵的货物方面。厄克特的士兵似乎再次受到了命运的折磨———损失的载货滑翔机，一半以上是飞往阿纳姆的。

命运也摆布了德国空军。上午10点钟时，由于没有看见预料中的盟军机群的影子，于是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便把那190架飞机的一半以上撤回了基地，其余的飞机则在荷兰的北部和南部上空巡逻。当第二次空运飞机飞进来的时候，这些德国飞机的一半，有的不在自己原先的防区，有的正在加油。结果，只有不到100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和FW - 190式战斗机，匆匆前往阿纳姆和艾因霍温地区参加战斗。德国的飞机，没有一架能够穿越保护兵员运输机纵队的庞大的盟军战斗机网。在这次任务完成之后，盟军飞行员们声称，他们消灭了29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而美军只损失了5架。

当这个机群靠近着陆区域的时候，猛烈的地面炮火开始将其包围。缓慢移动的滑翔机队列，在靠近索恩以北的一○一师的空投场时，地面上一片阴霾和雨水，这在某种程度上掩蔽了自己，得以逃脱德国炮手的视线。但从贝斯特地区发射出的持续而致命的高射炮火，则射进了迎面而来的纵队之中。有一架滑翔机，大概运的是弹药，遭遇到高射炮火的猛烈打击而爆炸了，完全消失了。有4架拖航飞机，在释放它们的滑翔机时被相继击中了，两架立即着火，一架坠毁，另外一架则安全着陆。有3架滑翔机布满弹痕，在着陆区域坠机着陆，机上的人员神奇地安然无恙。在原定于前往泰勒将军的一○一师的450架滑翔机当中，总共有428架，带着2656名伞兵、伞兵的车辆和拖车，到达了着陆区域。

在北边15英里处，加文将军的第二次空运在滑翔机开始进入空投场时，受到了那里仍然在猛烈进行的战斗的威胁。给八十二师带来的损失高于在一○一师地区的损失。飞机和滑翔机飞进了冰雹般的高射炮火之中。德国炮手们尽管没有头一天那么精确，但也击落了6架拖航飞机，那是在它们释放了滑翔机之后陡直飞离的时候被击落的。其中一架拖航飞机的机翼被炸掉了，另外3架在烈火中坠毁，还有一架落在了德国境内。为了争夺着陆区域而进行的不顾一切的交火，迫使许多滑翔机在别的地方着陆。有些滑翔机着陆的地方距离它们的目标有3到 5英里远；还有一些最终去了德国；不过更多的滑翔机则决定就在它们预定的着陆区降落。每一个着陆区都成了无人地带，因为它们被炮弹和迫击炮炸得坑坑洼洼，而且还遭到机枪的交叉射击。许多滑翔机迅速进行硬着陆，结果摔坏了起落架，要么就是机头着地翻过身去。然而，飞行员们极端的机动动作奏效了，不论是部队还是货物，都令人吃惊地没有遭到多少伤亡或者损失。根据报告，没有一个人在着陆事故中受伤，只有45个人在飞行过程中或者在着陆区里因为敌人的火力而阵亡或受伤。在454架滑翔机当中，有385架到达了八十二师的地区，带来了1782名炮兵、177辆吉普车和60门大炮。起初据认为有100多名伞兵失踪了，但后来那个数目的一半以上在远处着陆，之后又走回了八十二师的营地。那些抱定不屈不挠决心的滑翔机飞行员们蒙受了最大的伤亡，有54人阵亡或者被列入失踪者名单。

尽管德国人并没有严重地阻碍第二次空运的到达，但针对在兵员运输机和滑翔机之后而到达的执行再次补给任务的轰炸机，他们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共有252架四引擎B－24型解放者号轰炸机，当其中的第一架靠近一○一师和八十二师的区域时，德军的高射炮炮手们已经找到了目标。战斗机在补给飞机的前面猛扑下来，试图压制高射炮火。但就像17日霍罗克斯的坦克开始突破时德国炮台所做的那样，现在敌军也忍着不开火，等战斗机飞过去。然后，他们突然开火了。没出几分钟，就有大约21架护航飞机被击落。

轰炸机编队跟在战斗机后面，以800到50英尺不等的高度飞了进来。这些区域上面的炮火和烟雾，把识别地点的彩烟和地面标识隐藏起来，这让飞机上甚至有经验的空投能手也无法确定合适的地点。每一架B－24型飞机都载着大约2吨重的货物，从飞机的隔舱，补给品开始随意落下，分散在一个宽广的地区。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在他们的空投场里到处乱跑，几乎就在德国人的眼皮底下，总算收回了他们百分之八十的补给品。一○一师就不这么走运了，他们的许多装备包裹，几乎直接落在了贝斯特地区的德国人当中，他们的再次补给品被收回的不到50%。身处走廊底部的泰勒将军的士兵们损失是严重的，因为原打算送给他们的100多吨货物，是汽油、弹药和食品。德国人的攻击破坏性极大，大约有130架轰炸机被地面炮火毁坏，7架被击落，另有4架坠毁。对于在走廊沿线被围困的美国人来说，那一天在开始的时候曾带来那么大的希望，但又迅速变成了为幸存下去而进行的一场残酷的战斗。

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第四伞兵旅的帕特·格洛弗中尉跳出了飞机，朝着埃德至阿纳姆的马路南边的空投场落去。当他的降落伞打开的时候，他感到猛地抽动了一下，于是便本能地伸过手去，拍打系在他左肩吊带上的那个带拉链的帆布包。在帆布包的里面，伞兵鸡默特尔咯咯大叫，于是格洛弗放心了。就像他在英格兰所计划的那样，默特尔正在进行它的第一次作战跳伞。

当格洛弗朝下面看的时候，似乎觉得下面的整个荒原都着火了。他能看得见炮弹和迫击炮在整个着陆区爆炸，烟与火滚滚升起，有一些伞兵，由于无法纠正他们的下降，正在落进火海之中。在远处，滑翔机正在把皮普·希克斯准将机降旅的其他兵力运来，格洛弗能够看见那里有飞机的残骸，人们在朝各个方向跑去。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可怕的差错。根据情况简介，格洛弗知道，阿纳姆应该只有少量守军，而这个时候，空投场应该是被清理得整洁安静。在第二次空运离开英格兰之前，没有迹象说明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然而在格洛弗看来，一场全面的战斗就在他的下面进行。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由于某种错误而正在错误的地方跳伞。

当他靠近地面时，机枪的突突声和迫击炮沉闷的砰砰声似乎把他吞没了。他触到了地面，小心翼翼地滚向他的右肩以保护默特尔，然后迅速解开他的吊带。不远处，格洛弗的勤务兵列兵乔·斯科特刚刚落地。格洛弗把装着默特尔的包递给他。“好好照顾它！”他告诉斯科特。通过覆盖着田野的烟雾，格洛弗发现了标明会合点的黄色烟雾。“咱们走！”他朝斯科特喊道。两个人动身出发，迂回着穿行，蜷曲着身子。不论格洛弗朝哪个地方看，都是一片混乱。他的心沉了下去。显然形势正变得十分严峻。

在J·L·沃迪少校下落的时候，也听到机枪射击发出的那种不祥声音，机枪的射击似乎是在到处痛打这个地区。“我无法理解，”他回忆说，“原先给我

们的印象是，德国人在逃跑，他们的士兵乱了套。”沃迪驾驶着降落伞，摆动着下降，他发现，空投场几乎让猛烈的炮火产生的烟雾遮蔽住了。沃迪在场地的南端着了陆，动身前往本营的会合点。“迫击炮似乎到处都在爆炸，我向前走的时候，看见伤亡无数。”沃迪快走到集结点时，迎面撞上了营部一位发怒的上尉，他是在头一天跳伞进入荷兰的。“你们来得太晚了，”沃迪记得那个人喊道，“你们意识到了吗，我们在这里等了4个小时？”那位军官激动起来，立即开始向沃迪简要介绍情况。“我听的时候震惊了，”沃迪记得，“那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即事情的进展并不像计划的那么好。我们立即组织起来，四下张望的时候，在我看来，前面的整个天空似乎都是一片火焰。”

沃尔夫黑策火车站西边有两个着陆区，一是金克尔荒原，一是雷耶斯营地，而在这两个着陆区里，伞兵和滑翔机运载的步兵似乎落进了一场猛烈的战斗中。从所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的文件里，德国人知道了着陆地区的位置，与在地面上的英国人不同，他们通过仍然占领着的海峡港口的雷达装置，比如在敦刻尔克的雷达装置，能够精确地计算出第二次空运到达的时间。党卫军部队和高射炮兵，匆匆脱离开在阿纳姆的战斗赶到这些区域。20架德国空军战斗机也经过导航飞了过来，正在持续地低空扫射这些地区。地面战斗同样激烈。为了把进犯的敌人从荒原里清理出去，英国人上了刺刀进行冲锋，就像他们在夜间和清晨时所做的那样。

迫击炮的轰炸击中了那些前一天着陆的滑翔机，把它们变成燃烧着的火团，那些火团又接着把荒原点着了。进行渗透的德军部队，用一些滑翔机来掩护他们的进攻，而英国人则亲自把那些飞机点燃，不让它们落入敌人手中。在这块田野的一个地段，大约50架滑翔机燃烧成了一片火海，皮普·希克斯准将的机降旅———其中有半个营已经被派到阿纳姆了———总算以顽强的意志守住了这个区域。伞兵和滑翔机的着陆，带来了2119名兵力，他们取得了远远超过空中和地面人员所能相信的成功。即使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空运的百分之九十也正在着陆———而且是着陆在正确的地方。

空军上士罗纳德·贝德福德，是一架四引擎斯特林型飞机的机尾射手，他发现，星期一的任务与他在星期天飞行的那一次迥然不同。当时，坦率地说，19岁的贝德福德对这种日常的飞行感到厌倦。现在，当靠近着陆区域的时候，炮火正在持续而且十分猛烈。贝德福德发现，有一个立在卡车上的高射炮炮台位于这个地域的边缘，贝德福德不顾一切，试图把自己的大炮对准它。他看得见自己发射的曳光弹弯曲着落了下去，然后那个炮台不再射击了。贝德福德兴高采烈。“我打中了他！”他喊道，“听，我打中了他！”当这架斯特林型飞机稳定地飞在航线上的时候，贝德福德注意到，周围的滑翔机似乎全都过早地脱离开了它们的拖航飞机，他只能假定，猛

烈的炮火使得许多滑翔机飞行员想解脱出来，以图尽可能快地落下。然后，他看见自己拖航的那架霍萨型飞机上的牵引绳脱落了。贝德福德注视着那架滑翔机突然下落，他确信，它将在着陆之前就与别的滑翔机碰撞在一起。“整个场面是混乱的，”他回忆说，“那些滑翔机似乎在陡直地进行俯冲，又恢复水平飞行，靠惯性滑行，那个样子就像要直接彼此相撞。我不知道它们怎么能够成功。”

中士罗伊·哈奇是一架霍萨型飞机的副驾驶，这架飞机载着一辆吉普车、两辆装满了迫击炮炮弹的拖车，还有3个士兵。当哈奇看见前面的高射炮猛烈开炮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们将怎么落下来。上士亚力克·扬是驾驶员，当他让滑翔机陡直俯冲，然后又恢复水平飞行的时候，哈奇吃惊地注意到，每个人似乎都朝着同一个触地点跑去———包括一头母牛，那头母牛就在他们的前面疯狂地奔跑着。不知怎么地，扬把滑翔机安全着陆了。士兵们立即跳了出来，开始打开飞机的尾部。在不远处，哈奇注意到，有3架滑翔机仰天躺着。突然，带着一种撕裂般的、刺耳的声音，另外一架霍萨型飞机在它们的上面坠毁了。那架滑翔机直接撞过来，切掉了哈奇的滑翔机的机头，包括座舱盖和飞行员座舱，而只是几分钟之前哈奇和扬就坐在那里。然后，那架飞机朝前滑行，就在他们的面前停了下来。

另外的滑翔机根本就没有到达着陆区域，有一些远在3英里之外的地方坠落。有两架是在莱茵河的南岸降落的，其中一架就在德里尔村的附近，士兵们把伤亡人员留给荷兰老百姓照看，自己则从已经被忘却却仍然活跃的德里尔渡口渡过了莱茵河，与他们的部队再次会合(注)。

有一些C－47型飞机在靠近着陆区域时被击中，燃烧了起来。着陆之前大约10分钟，中士弗朗西斯·菲茨帕特里克注意到，高射炮火密集地发射了上来，有一位年轻的伞兵金杰·麦克法登列兵，猝然一动，叫了起来，双手伸向他的右腿。“我被击中了！”麦克法登咕哝说道。菲茨帕特里克迅速给他检查了一下，然后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接着中士注意到，飞机似乎在颠簸。当他弯下身子朝窗外看时，飞行员座舱的门开了，调度员走了出来，神色紧张。“在边上站好，为红绿灯做好准备！”他说道。菲茨帕特里克看着那一排伞兵，他们现在挂上挂钩，准备跳伞。他能够看见，烟从左舷的发动机里冒出来。菲茨帕特里克领头跳了伞，当他的降落伞打开时，飞机全速俯冲了下去。在菲茨帕特里克触地之前，他看见那架C－47型飞机插进了右边的田野里，机头着地翻了过去。他确信，机组人员和金杰·麦克法登没有逃脱。

在另外一架C－47型飞机里，美国机组组长开玩笑地告诉弗兰克·D·金上尉道：“你们将很快落到那里，而我将回家吃腊肉和鸡蛋。”那个美国人在金的对面坐了下来。几分钟以后，绿灯亮了。金朝那位机组组长瞥了一眼。

他似乎睡着了，颓然后仰着，下巴压在胸口，手放在大腿部。金有种感觉，有什么事情不那么对头。他摇了摇那个美国人的肩膀，那人朝一边倒下了。他死了。在他的后面，金看见在机身上有一个大洞。好像是被一颗点五○的机枪子弹打穿的。金站在门口，准备跳伞，他看见火焰从左边的机翼冒了出来。“我们着火了，”他朝军士长乔治·加特兰喊道，“同飞行员核对一下。”加特兰朝前走去。当他打开飞行员座舱门的时候，一片烈火冲了出来，在整个飞机里蔓延。加特兰猛力把门关上，金命令士兵们跳伞。他认为，他们现在没有飞行员了。

当伞兵们跳出舱门时，加特兰估计，飞机离地面有200到300英尺高。他在着陆的时候碰伤了。他开始清点人数，有4个人失踪了。其中一个人还没有离开飞机便在舱门口被炮火杀死了；另外一个人跳了伞，但他的降落伞着了火；而加特兰和金得知，第三个人是在不远处着的陆；然后第四个人到了，还挂着他的降落伞。他是和飞机一起着陆的，他告诉他们，机组人员设法迫降着陆，而且他们还神奇地从飞机里走了出来。现在，在距奥斯特贝克15英里的地方，远离英军的营地，金一行人动身返回。当他们走开时，那架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熊熊燃烧着的C－47型飞机爆炸了。

在一些地区，伞兵们安全地跳了伞，但却发现自己是在波浪般燃烧的炮火当中降落。许多人拼命猛拉降落伞的绳子，以避开这些曳光弹，结果在着陆区的边缘着陆，落在茂密的树林里。有一些人，挣扎着要摆脱降落伞的时候被狙击手击中了。另外的人在远离着陆区域的地方着了陆。在一个地区，一个营中的一部分人降落在了德国人的身后，之后他们集结前往会合点，还带上了80名俘虏。

着陆区里，在密集火力的打击之下，伞兵们丢掉降落伞，迅速跑开隐蔽起来。小群受了重伤的人躺得到处都是。列兵雷金纳德·布赖恩特遭到一枚迫击炮炮弹的打击，严重脑震荡，一时间瘫痪了，他能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却一块肌肉也动弹不得。他无助地看着，而他同机的人则认为他已经死了，于是捡起他的步枪和子弹，匆匆赶往会合点。

许多士兵，对横扫着陆区又无休止的机枪和狙击手的射击感到吃惊，于是快速跑进树林隐蔽起来。几分钟后，这些地区除了伤亡人员之外，已是空无一人。中士金格尔·格林是位体育教练，他乐观地带来一个足球，准备于意料中的轻易战斗之后，在着陆区域中进行一场比赛。他跳了下来，猛地触地，结果折断了两根肋骨。自己在那里躺了多长的时间，格林并不知道，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除了伤亡人员之外，就他孤零零一个人了。他痛苦地坐了起来，几乎立即就有一个狙击手朝他射击。格林站起来，开始猛冲迂回，朝树林跑去，子弹在他四周砰砰作响。肋骨上的疼痛，一再迫使格林倒在地上，他确信他将会被击中。在荒原上滚滚而来的烟雾之中，他与那位狙击手的这个奇怪的决斗似乎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一次只能走

五六码远，”他记得，“我认为，我的对手要么是一个施虐狂的杂种，要么是一个该死的不高明的射手。”最终，格林紧抱着他受伤的肋骨，朝树林进行了最后的冲刺。到达树林的时候，他投进灌木丛，倚着一棵树滚了过去，正在这时，最后一颗子弹啪的一声射进了他头上的树枝，却没有给他带来伤害。在生命中最为绝望的状况之下，他跑了至关重要的几码。格林精疲力竭，疼痛难忍，他缓慢地从伪装服里面把瘪了气的足球取了出来，痛苦地把它扔掉了。

许多士兵将一直记得他们跳伞后那最初的可怕时刻。起码有12名伞兵回忆说，在金克尔荒原，为了躲避子弹和燃烧的树丛而跑着逃命的时候，看见了一位20岁的年轻中尉，他躺在荆豆丛里，负了重伤。当他无助地在降落伞上摇摆的时候，燃烧弹击中了他的双腿和胸部。当这位军官从空投场被移出来的时候，帕特·格洛弗中尉看见了他。“他痛苦得令人恐惧，”格洛弗记得，“而大家又不能动他。我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并且许诺，一有机会就派一名卫生员来。”列兵雷金纳德·布赖恩特，在空投场里从瘫痪中恢复了过来，他前往集结地区的时候，也碰巧遇见了这位军官。“当我走近他时，烟正从他胸部的伤口中冒出来。他的痛苦是可怕的。我们几个人同时来到他的面前，他乞求我们杀死他。”有一个人，布赖恩特记不清是谁了，缓慢地低下身来，把他自己的手枪递给中尉，手枪的扳机是扳起来的。当大家匆匆离开的时候，荒原上的火正在缓慢地移向那位受苦的军官躺着的地方。后来，救援队偶然看到了这具尸体。大家的结论是，这位中尉自杀了。(注)

第四伞兵旅旅长沙恩·哈克特准将，以带有他个人特征的精确性，在他为自己的司令部选定地点的300码之内着陆了。尽管敌人火力凶猛，但准将首先关心的事情却是要找到他的手杖，他是在下落的时候把手杖丢掉的。当他寻找手杖的时候，与一群德国人不期而遇。“他们吓坏了，可我比他们更吓坏了，”他回忆说，“但他们却似乎急于投降。”哈克特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粗暴地告诉他们等着，然后，在找回他的手杖之后，这位身材修长、小胡子修剪得十分整洁的准将平静地押着他的俘虏们走开了。

哈克特在心情最好的时候也是不耐烦的，动辄发火或喜形于色，他不喜欢此刻看到的景象。他本来期望，这些区域是安全而又井然有序的。现在，在他的军官们簇拥之下，他准备让自己的部队开拔。这时，厄克特将军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驱车赶到，来完成他痛苦的任务。麦肯齐把哈克特拉到一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告诉他，有关指挥权这个过分敏感的事情所做出的决定和结论”，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不在的时候，由皮普·希克斯准将负责该师。麦肯齐继续解释说，还在英格兰的时候，厄克特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即一旦他与拉思伯里失踪或者阵亡，就由希克斯接管。

麦肯齐回忆说，哈克特很不高兴。“瞧，查尔斯，我的级别比希克斯高，”他告诉麦肯齐，“因而我应该指挥这个师。”麦肯齐是坚定的，他说：“我完全理解，长官，但将军确实给了我接替的顺序，我们必须照办。另外，希克斯准将在这里已经有24个小时了，现在更熟悉形势。”麦肯齐说，倘若他“破坏这个运转机构，对它做出什么事情来”，那只能使事情更糟糕。

但在麦肯齐看来，显然事情不会到此为止。在厄克特和哈克特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不和。尽管这位易发作的准将完全有资格指挥，但在厄克特看来，他缺少年龄大一些的希克斯的步兵经验。除此之外，哈克特是机械化部队的人，而大家都知道，厄克特对机械化部队准将们的评价要低于步兵准将，长期以来厄克特都是在与步兵准将交往。有一次在公开场合，他曾开玩笑地提到哈克特，说他是“出了故障的机械化兵”———这句话哈克特并不觉得好玩。

麦肯齐告诉哈克特，他的第十一营要从这个旅里派遣出去，要立即出发，前往阿纳姆和阿纳姆大桥。对哈克特来说，这是最后的冒犯。他之所以对这个旅感到骄傲，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的素质，即它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整体化部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团队而作战的。现在它要被分开，分成几个部分，对此他感到惊骇。“我不喜欢在没有商榷的情况下被告知要放弃一个营，”他气呼呼地告诉麦肯齐，然后思考了一下，他又补充说，“当然，如果有哪个营要走的话，那就是第十一营。它是在空投场的东南角空投的，离阿纳姆和阿纳姆大桥最近。”但他要求，要用另外一个营来交换，麦肯齐回答说，他认为希克斯会给他一个营。这样，事情就暂时结束了。这位才华横溢、一触即发、精力旺盛的哈克特，向不可避免的事情屈服了。眼下，希克斯能够管理这场战斗，但哈克特却决心要管理他自己的旅。

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严酷而又令人讨厌的下午。第二次空运充斥着问题，厄克特将军和拉思伯里准将的命运仍然是个未知数，弗罗斯特上校的小小兵力在阿纳姆大桥的北端坚持着但又岌岌可危，而在两个准将之间，性格上的冲突正在增强，除此之外，又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灾难发生了。

希克斯机降旅的伞兵在人数上削减了，且由于持续的作战而疲惫不堪，他们绝望地注视着，有35架斯特林型轰炸运输两用飞机，正把补给品空投在每一个地方，但就是没有空投在空投场。原定要送给在阿纳姆的部队的87吨重的弹药、食品和补给品，只有12吨到了部队手中。其余的，广泛地散布在西南方向，落在了德国人当中。

在距离不到5英里的地方，在安东·德克森家里，厄克特将军仍然被德国人包围着。下面的街道上，那台自行火炮以及炮组人员非常靠近，所以厄克

特以及和他一起的那两位军官，不敢冒险说话或者移动。除了一些巧克力和水果硬糖，他们没有别的食物。水被切断了，也没有盥洗设施。厄克特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既不能休息，又不能睡觉，只是沉思着战役的进展以及第二次空运的到达，他不知道第二次空运推迟了，不知道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推进了有多远，也不知道弗罗斯特是否还在大桥上坚持着。“倘若那时我知道这个形势的话，”他后来回忆说，“我就会不顾军官们的担忧而尝试逃跑，不管有没有德国人。”厄克特安安静静，一言不发，他发现自己正死盯着詹姆斯·克莱明森上尉的八字须。“那浓密的毛茸茸的翘八字原先我都没有注意到，”他写道，“但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看。”那八字须让他恼火，它显得“愚蠢透顶”。

厄克特尽管满腹心事，却从来也没有想到他有关师内指挥链所做出的决定，这个紧急关头的指示正迅速地在希克斯和哈克特之间造成一种复杂的对抗。现在，9月18日，星期一的下午4点，厄克特离开他的司令部几乎一整天了。

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司令威廉·比特里希将军，被盟军第二次空运的巨大规模震惊了。陆军元帅莫德尔纠缠着他，要他迅速攻占阿纳姆大桥，而哈策尔上校和哈梅尔将军又敦促他增援，比特里希发现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阿纳姆以西的天空，由于有了几百个五彩斑斓的降落伞而像鲜花盛开一般，然后又充满了川流不息的滑翔机，当他神色严肃地凝视着天空的时候，他绝望了。他从德国空军的通信网得知，另外两个大规模空投已经开始了。比特里希试图猜测盟军的力量，他大大地高估了此刻在荷兰的英美联军数量。他认为，也许另外一个师已经着陆了，足以让胜利的天平向进攻者们倾斜。

在比特里希看来，盟军力量的加强与德国增援部队的到达，已经成了一场致命的赛跑。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量的人员和物资来到了他这里，而相形之下，盟军似乎有用之不竭的资源。他担心，他们可能在下一天再发起一次空降部队的空投。在荷兰的狭窄范围内，由于困难的地形、桥梁，以及靠近不设防的德国边界，因而那样一个规模的兵力可能意味着德国的灾难。

比特里希的部队，与在南边的施图登特大将的第一伞兵集团军之间，没有什么配合。尽管施图登特的部队不断得到冯·扎根第十五集团军余部的增援，但那支被摧毁了的部队，运输工具、枪炮和弹药都极其短缺，要重新把他们装备起来，需要若干天也许若干个星期的时间。与此同时，阻止蒙哥马利进攻的整个责任，都落在比特里希的身上，而他的最紧迫的问题，仍然是奈梅亨的渡口以及阿纳姆大桥北入口处英国人令人难以置信的防御。

只要盟军部队在那里继续抵抗，比特里希就会受阻，不能把他自己的部队沿着公路移动到奈梅亨。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正在努力渡过莱茵河，该师完全依赖于潘讷登的轮渡———这是一种缓慢而又乏味的渡河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阿纳姆的英国人开始犹豫和怀疑，他们是否有能力坚持的时候，比特里希却深深地担忧着这场战役的结果。他看到，帝国正危险地接近于遭到入侵，接下来的24个小时就可能见分晓了。

比特里希的上级的问题，在范围上要更加广泛。在B集团军群巨大前线的各个地方，陆军元帅莫德尔正在让部队勉为其难，试图阻挡美军第一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的无情进攻。尽管杰出的冯·伦德施泰特的官复原职，再次恢复了秩序和凝聚力，但他却为了获得增援部队而正在动用国家的最后一点人力。找到能把部队从一个地区运送到另一个地区所需要的汽油，也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而从希特勒的司令部得不到什么帮助。柏林一门心思想着的似乎是来自东边的苏联人的威胁，而不是盟军从西边的大举猛攻。

莫德尔尽管有别的担忧，却似乎自信能够战胜在荷兰的威胁，他仍然确信，那个国家的沼泽、堤岸和水陆障碍能够为他提供时间，从而阻止并打败蒙哥马利的进攻。比特里希却不这么乐观，他敦促莫德尔，应该在形势恶化之前采取几个重要的步骤。在比特里希看来，炸毁在奈梅亨和阿纳姆的大桥是必要的，而且是立即炸掉，但这个建议比特里希每一次提出来，都让莫德尔恼火。“莫德尔每天都访问我，他务实，总是要求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说，“他会就眼前的形势当场下达一系列的命令，但不论是哪次会议，他都不会待上足够长的时间来听完或者批准长远的计划。”比特里希担心，如果盟军突破，德国就会随之发生意外。而莫德尔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相反，他纠缠于细节问题：他尤其关心的，就是德国人未能再次攻占阿纳姆大桥。在受到这个含蓄批评的刺激之后，比特里希告诉陆军元帅：“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兵，还没有看见士兵作战这样艰苦。”莫德尔不为所动。“我要那座大桥。”他冷冰冰地说道。

在18日的下午，比特里希试图再次向不耐烦的莫德尔说明他对总体形势的看法。奈梅亨大桥是整个作战行动的关键，他争论说，如果把它炸掉的话，那么盟军进攻的头部和身子就会分开。“陆军元帅阁下，我们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炸掉瓦尔河上的渡口。”比特里希说道。莫德尔是固执的。“不！”他说道，“回答是不！”莫德尔不仅坚持认为大桥能够守得住，他还要求，施图登特的集团军和弗伦茨贝格师，应该在英美联军到达大桥之前就把他们挡住。比特里希直言不讳地说，他不相信盟军能被遏制住，他告诉莫德尔到目前为止，那个地区几乎没有德国的装甲部队，而且还有更严重的危险，即蒙哥马利势不可当的坦克力量将会获得突破。然后比特里希又表达了他的担忧，即预料还会有空降部队的空投。“如果盟军从南

边的大规模强攻获得成功，如果他们在阿纳姆地区再空投一个空降师，我们就完了，”他说道，“通往鲁尔河和德国的路线将被打开。”莫德尔没有受到影响。“我的命令不变，”他说道，“奈梅亨大桥不得炸掉，而且我要求在24个小时之内攻占阿纳姆大桥。”

其他人知道完成莫德尔命令的难度。霍亨施陶芬师的师长哈策尔中校已经无士兵可用，他的兵力全都参战了。没有额外的增援部队到达，而第二次空运的规模，又让人严重怀疑他的士兵是否有能力阻止和遏制住敌人。和比特里希一样，哈策尔也确信：“盟军所空投的，只不过是空降部队的一支先头部队。我确信，还会有空降，然后他们将大举猛攻，前往帝国。”由于装甲部队有限，哈策尔不知道他是否能够阻挡住敌人。然而，他却已经成功地使一个地方变得安全了———那就是他本人司令部的院子。在那里，他愤世嫉俗地置俘虏的权利于不顾，命令几百个英国伞兵，在警卫的看守下待在铁丝网里面。“我完全确信，”他回来回忆说，“皇家空军不会轰炸他们自己的部队。”

哈策尔自诩是一个亲英派（“我对英国的东西有种偏爱”），他曾经作为交换学生在大不列颠学习过。他喜欢在俘虏当中漫步，试图进行交谈，以练习他的英语，而且还希望能从中套出情报来。英国兵的士气留给深刻的印象。“他们傲慢不恭，自信自恃，只有老兵才能做到这样。”他回忆说。他的俘虏们的水准使哈策尔确信，战役远没有赢得胜利。为了使厄克特的部队立足不稳，同时也为了防止敌人发动任何种类的紧凑进攻，因而在18日傍晚，他命令霍亨施陶芬师“不惜任何代价，整个晚上都要不停地进攻”。

弗伦茨贝格师的师长哈梅尔将军，“由于太忙了，也就顾不上担心下面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在下莱茵河作战，忙得不可开交”。哈梅尔承担的任务是，既攻占阿纳姆大桥，又要保卫瓦尔河渡口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地区，因而他的问题要远比哈策尔严重。用渡船把部队渡过河，进展速度就像蜗牛爬行一般。部队、装备以及坦克，被装在临时扎成的橡皮筏子或者木筏子上，通向水边的道路变得一片泥泞。坦克和车辆从筏子上滑了下去，有一些甚至被水冲走了。更糟糕的是，由于盟军飞机不断进行低空扫射，几乎所有的摆渡和护航行动都得在夜间进行。在24个小时的时间里，哈梅尔的工兵只把两个营，连同他们的车辆和装备送进了阿纳姆—奈梅亨地区。固然，哈梅尔的士兵现在是在奈梅亨的中央以及公路桥的南边，但他仍然怀疑，他们能否阻止英美联军坚定不移的进攻。尽管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不得炸掉大桥，但哈梅尔仍然为不测做好了准备。他的工兵已经安放了炸药，并在北岸伦特村附近的一个路边地堡里设置了引爆装置。他希望，如果他们守不住的话，比特里希将能批准把公路桥和铁路桥炸掉。即如果比特里希不批准的话，哈梅尔也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英国人的坦克突破了，开始过河了，他就会违抗上级的命令，把这两座桥炸掉。

7

★ ★ ★

繁荣的奥斯特贝克村似乎被注入了一种气氛，欢快与不安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就像身处战斗中的一个岛屿一样，这个村子受到了来自三个方向的喧闹作战声的袭击。从西边的空投场，传来了大炮几乎不断的轰鸣声。在两边种了鲜花的街道上可以清楚听见，从西北方向传来机枪的嗒嗒连发和迫击炮的轰鸣。而在东边的方向，两个半英里之外的阿纳姆，黑色的烟覆盖在地平线上，在这个昏暗的背景之下，重炮的不断轰击发出了定音鼓似的声音。

头一天，部队和滑翔机着陆之前所进行的轰炸和低空扫射，已经在平民当中造成了伤亡，并且损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渗透进来的狙击手和方向不准的迫击炮的爆炸，同样在平民当中造成了伤亡，并且损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还没有严重侵袭奥斯特贝克。整洁的度假旅馆、景致如画的别墅和绿树成荫的街道，仍然大多没有被触及。然而变得明显的是，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战斗也就更加接近了。在各个地方，远处的爆炸所产生的震荡使窗玻璃突然裂成碎片，往往令人大吃一惊。烧焦了的纸、布和木头的碎屑，就像五彩纸片一般被风吹送着雨点般落在街道上，而在空气中，无烟硝化甘油火药发出刺鼻的气味。

星期日这天，奥斯特贝克满是部队，因为英国人几乎紧跟在仓皇离开的德国人后面到达了。在那个夜晚没有一个人睡觉。一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被吉普车低沉的嘎嘎声、履带式小型装甲车的哐啷哐啷声，以及行军士兵的沉重脚步声，搞得愈加激动了，这使得休息成为不可能。在18日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的调动一直在进行。村民们既欢欣鼓舞又感到忧虑，他们用荷兰国旗装饰着街道和房屋，当英国兵匆匆走过的时候，他们不断地把食物、水果和饮料硬塞给解放者们。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说，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了。现在，气氛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有些英国部队显然在村子里站稳了脚，而且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观察员，也已经占领了在下奥斯特贝克离莱茵河不远的那个建于10世纪的荷兰新教教会归正会的教堂的塔楼，但可以觉察到的是，部队的移动已经变慢了。到下午晚些时候，多数大街空无一人，令人不安。荷兰人注意到，反坦克阵地和布伦式轻机枪阵地，现在就在那条主要马路的战略点上。看见他们，村民们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扬·沃斯奎尔回忆说，当他在奥斯特贝克村中行走，试图发现究竟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英国军官正在命令平民把他们的国旗收起来。“这是战争，”他听见那位军官告诉一位村民，“你们就在战争当

中。”在他的整个行走过程中，沃斯奎尔注意到，人们的心情正在变化。亚尔普·康宁是一名当地的面包师，沃斯奎尔从康宁那里得知，许多荷兰人是悲观的。康宁说，有谣传说“事情的进展不好”。忧虑正在取代飘飘然的解放感。“英国人，”康宁说道，“在各个地方都正在被赶回来。”沃斯奎尔非常担心。康宁始终是消息灵通人士，尽管他的消息是沃斯奎尔听到的第一个坏消息，但它却证实了沃斯奎尔本人的惧怕。沃斯奎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笼罩天空、从镇子上面呼啸着飞往阿纳姆的炮弹，会越来越密集。沃斯奎尔再次记起了诺曼底地区的村庄所遭受到的可怕毁灭，因此再也无法摆脱一种迷惘而又不知所措的无助感。

还有一个买卖人，面包师德克·范·贝克，也像康宁和沃斯奎尔一样沮丧。他在上门送货的时候听到的消息，已经给他对盟军空投所产生的最初激动浇上了凉水。“要是战争来到这里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将做什么呢？”他问他的妻子里克。不过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将待在奥斯特贝克，继续烤面包。“人们得吃东西，”他告诉里克，“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是离开铺子的话，又能到哪里去呢？”范·贝克专心工作，试图让自己放心，一切都将会向最好处发展。几天以前，他收到了他每个月的小麦和发酵粉的配额，现在，他决心待下去让他的铺子继续开下去，他记得一位老面包师曾经告诉他一种方法，可以用少于通常数量一半的发酵粉做面包。他决定把他的补给品用到极致。他将继续烤面包，直到一切都过去。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斯胡努尔德旅馆和弗里维伊克旅馆，显然战斗已经变得严重了：这些通风、舒适的度假胜地正在变成伤员收容站。在斯胡努尔德旅馆，英国的卫生员和荷兰平民开始全面大扫除，准备接收伤员。地下组织成员扬·埃以克尔霍夫看到，德国人在匆匆离开的时候，搞得这家旅馆“像猪圈一样。到处都是食物。桌子被掀翻了，盘子砸碎了，衣服和设备散在各处。每个房间都乱丢着纸和垃圾”。额外的床垫从周围的居民家里搬了进来，放在楼下一层。一排排的床摆在接待室里，担架摆在用玻璃封起来的阳台上。荷兰人被告知，每一个房间包括地下室，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都会需要。埃以克尔霍夫得知，在阿纳姆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然而和他在一起工作的英国卫生员仍然乐观。“不要担忧，”他们当中的一位告诉他，“蒙蒂很快就会到这里了。”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正在建一个医院，17岁的安赫·范·马尔南过来给父亲帮忙，她注意到，在别的志愿者当中有了一种惊人的变化。“我们害怕，”她在日记中写道，“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我们有一种古怪的感觉，感觉在昨天和今天之间已经过了几个星期。”就像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一样，在塔弗尔贝格旅馆也有谣传，说蒙哥马利的部队正在路上。安赫写道：在等待他们迅速到来的时候，“我们不断朝楼上的窗子外面凝望。射击更猛烈了。有光和炮火，但大军尚未来到”。

在几个街区之外，那家装饰华丽的有12个房间的哈滕施泰因旅馆，位于公园式的环境当中，现在的样子则是荒凉的，被遗弃了。桌子和椅子以达利风格的凌乱[注]在优美的绿色草坪各处散放着，这是头一天火力猛烈的战斗造成的，而在桌椅当中躺着几个德国人的变了形的尸体。

27岁的威廉·吉宾，骑车来到这座大楼的前面，这家原本高雅的旅馆的样子让他作呕。1942年，他从奥斯特贝克镇租用了这座楼房，在他拥有这座楼房的几个月之后，德国人便进入这个镇子，征用了这家旅馆。从那时起，吉宾和他的妻子特鲁乌斯的地位便降低成了仆人。德国人允许他们打扫哈滕施泰因旅馆，监督烹饪，但旅馆的管理则是在德国人的手中。最后，在9月6日，吉宾被命令立即离开，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佣则被允许每天回来，以保持这个地方的干净。

17日，“因为盟军的着陆而乐疯了”，吉宾跳上自行车，从韦斯特博文山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在韦斯特博文山，他的岳父约翰·范·卡尔克斯霍顿开了一家能俯瞰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的山顶饭店，他刚好赶上看到最后的德国人离开。他跑进楼里，第一次感到，“旅馆终于是我的了”。但遗弃的气氛使他心慌意乱。在餐厅里，两张盖着白色织花桌布的长桌子为20个人安排了座位，有汤碗、银餐具、餐巾和酒杯，在每张桌子的中央，都有一个大的盖碗，里面盛着意大利细面条汤。吉宾触了一下，发现汤还温着。在餐具柜上面的银质上菜用具上，是主菜炸鲳鱼。

吉宾从一个房间漫步到另外一个房间，看着覆盖着华丽的金色缎子的墙壁，装饰华美的石膏天使和花环，以及天蓝色的天花板上点缀着金星的结婚套间。看到德国人并没有洗劫旅馆，他松了一口气。一个调羹都没有丢掉，冰箱里仍然满是食物。在到处转的时候，吉宾听见阳台上有说话的声音。他冲了出来，发现有几个英国士兵正在喝他的雪利酒[注]，8个空瓶子摆在地板上。在被占领了这么多天以后，吉宾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了。起码，德国人还让他所爱着的旅馆保持干净。“这就是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朝伞兵们大吵大叫，“打开我的地窖，偷了我的雪利酒。”英国人有些尴尬，进行了道歉，吉宾的怒气平息了。他再次被告知，他不能待在这里，然而英国人向他保证，他的财产将会受到尊重。

现在，一天之后，吉宾希望英国人已经过去了，离开了他的旅馆，于是便返回了。当他走近大楼的时候，他的心沉了下来。吉普车停在楼后面，而在网球场铁丝网的后面，他看见了德国俘虏。狭长掩体和火炮阵地已经在庭院的周围挖掘了出来，而且似乎到处都有参谋。吉宾沮丧了，于是便又回到了韦斯特博文山。下午时，他的妻子访问了哈滕施泰因旅馆，说明她是何人。“我受到了非常客气的对待，”她回忆说，“但又不允许我们搬回来。英国人就像德国人一样，也把旅馆征用了。”她心中想，还是有一种

安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到那个时候，吉宾夫妇就能真正经营他们所认为的奥斯特贝克最好的旅馆了。与她交谈的绅士的英国军官们并没有告诉她，从9月18日下午5时开始，哈滕施泰因旅馆已经是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司令部了。

奥斯特贝克弥漫着一种焦虑和欢乐交混的奇怪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与想到逐渐到来的战斗相比，一个事件更令许多居民害怕。白天的时候，犯人们被从阿纳姆监狱里放了出来。许多犯人是抵抗力量的战士，但另外的人则是危险的被判有罪的人。他们穿着带有条纹的囚服，从阿纳姆涌出来，有50多位最终来到了奥斯特贝克。“他们增加了一种最后的疯狂感，”扬·特尔霍斯特回忆说。特尔霍斯特原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炮兵上尉，后来做了律师，又成为奥斯特贝克抵抗力量的一位领导人。“我们把这些囚犯聚集起来，临时安置在音乐厅里。但问题是，应该对他们做些什么？眼下他们似乎是足够无害的，但在这些重罪犯当中，有许多人被关多年了。我们为最糟糕的事情感到害怕———尤其是为我们的女人感到害怕———当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自由的时候。”

特尔霍斯特在与囚犯们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只想离开这个当前的作战区域。渡过莱茵河的唯一路线，就是经由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渡船工人皮特断然拒绝合作，他不想让50名囚犯在南岸无法无天。除此之外，渡船现在停泊在北边，皮特想让它待在那里。经过几个小时不耐烦的谈判之后，特尔霍斯特终于得以让皮特把囚犯们送了过去。“看见他们离开我们是高兴的，”他记得，“与害怕德国人相比，妇女们更害怕这些囚犯。”特尔霍斯特慎重地坚持，还是应该把渡船送回到北岸，因为在北岸渡船可以被英国人使用。

特尔霍斯特原先是位陆军军官，看到英国人并没有立即夺取赫维多普－德里尔渡口，他感到大惑不解。当伞兵进入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他曾经就这个渡口询问过他们，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他们对这个渡口一无所知。他以前当过炮兵，他对英国人没有占领附近的韦斯特博文山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俯瞰莱茵河的唯一高地。谁用火炮占据着这个高地，谁就控制了渡口。除此之外，把哈滕施泰因旅馆选作英军司令部，也令他不安。他认为，毫无疑问，在韦斯特博文山高地上的那家饭馆及其楼房，是一个更为可取的地点。“请坚守渡口和韦斯特博文山！”他敦促英军的几位参谋。他们很客气，但不感兴趣。一位军官告诉特尔霍斯特：“我们不打算待在这里。由于大桥很快会在我们的手里，霍罗克斯的装甲部队马上会到达，我们也就不需要这个渡口了。”特尔霍斯特希望这个人是对的。如果德国人能够到达两英里之外的韦斯特博文山，那么他们的火炮就不仅能够控制渡口，而且还能把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司令部完全摧毁。英国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渡口，而且也向他们简要介绍了韦斯特博文山。除此之外特

尔霍斯特已经无能为力。事实上，这位前荷兰军官已经指出，在整个行动中最关键的疏忽之一———也就是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渡口和韦斯特博文山高地的战略重要性。倘若厄克特将军待在他的司令部里，并且控制作战的话，那么形势就可能及时得到矫正。注

希克斯准将在厄克特缺席的情况下指挥着该师，他几乎是每时每刻都面对着这个让他困惑的问题，即让自己熟悉处于困境的空降部队的复杂而又老是变化着的调动。由于司令部和各个营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出了故障，因而有关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多少精确的情报，希克斯因此无法判定与他对抗的敌人的兵力和潜力。来到他身边的少得可怜的消息，是由精疲力竭、尘土满面的通信员送来的，或者是由荷兰地下组织的各个成员送来的。通信员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送来情报，可是等他们到达司令部的时候，那些情报又往往毫无希望地过了时，而荷兰地下组织成员送来的情报，又往往不被理会或者被视为可疑。希克斯发现，自己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一个微弱的通信渠道———在奥斯特贝克与在大桥上弗罗斯特的部队之间，汤普森的炮兵与芒福德的炮兵进行的无线电联系。

第二营与终于到达大桥的勇敢的掉队者们，虽然遭到了重创，但仍然在坚守，但弗罗斯特的形势几个小时以来一直极其严峻，而且正在迅速恶化。“我们不断得到从大桥来的信息。要求增援和补充弹药，”希克斯回忆说，“敌人的压力和德军装甲部队的兵力，在各处都在增强，而我们与厄克特、拉思伯里、多比或者菲奇没有联系。我们也无法与在军司令部的布朗宁取得联系以说明形势的严峻，而且我们极其需要帮助。”从对俘虏的讯问中，希克斯现在知道，伞兵们所面对的是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和第十装甲师（弗伦茨贝格师）身经百战的党卫军。谁也不能告诉他，这些部队兵力是多么大，也不能估计正被投入过来与他对抗的坦克数量是多少。更为糟糕的是，希克斯不知道，原先进攻前的计划能否抵挡住德国人当前的压力。如果敌人得到重大增援，那么整个任务就会失败。

他知道，帮助也许正在到来。19日，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旅，将会在第三次空运中来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也应该到了，而且确实是已经晚了。他们离阿纳姆能够有多近，他们能否及时赶来解救，并使形势保持平稳？“尽管有这一切不利情况，”希克斯回忆说，“我仍然相信弗罗斯特能够守住大桥的北端，一直到蒙蒂的坦克部队来到。毕竟，大桥仍然是我们的出击目标，而且我的决定和行动全都是以夺取和坚守那个目标为中心。”在权衡了所有的因素之后，希克斯感到，他必须坚持原先的计划，当时哈克特准将也有同感。

哈克特第四伞兵旅原先的任务是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高地，阻止德军的增援部队到达大桥。但在设想这个计划的时候，据认为敌人的兵力将会是微不

足道的，充其量也仍是可以对付的。事实上，敌人的反应是如此迅速，兵力是如此集中而且有效，结果希克斯无法估计真正的形势。比特里希的军队坚守着阿纳姆的北边，他们已经在大桥上把弗罗斯特困住了，并且成功阻止了多比和菲奇的营对他们的解救。这两支部队的进军，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切断。在距离大桥不到一英里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周围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那两个营突然停了下来。正在前来增援途中的南斯塔福德郡团，以及哈克特旅的第十一营，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现在来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前面那一段敞开、无遮蔽的河边马路，然后突然枪声大作，”南斯塔福德郡团的列兵罗伯特·C·爱德华兹记得，“我们的样子一定就像靶场里的靶子。德国佬所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枪和迫击炮排列起来，对准这一个豁口———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宽———然后射击。”爱德华兹看到，他的副连长爱德华·韦斯上尉在队列中不懈地前后跑着，“完全不顾在他身边飞过的一切子弹，他的嗓子越来越嘶哑，喊着‘前进，前进，前进，D连，前进’”。

韦斯似乎在每一个地方。士兵在各处倒了下去。如果伞兵们停顿了或者犹豫了，韦斯便“立即来到他们身边，敦促他们前进。看见他笔直地站着，你简直无法趴着。你不能不效法他的榜样，穿过那个炮火的地狱”。爱德华兹扔出了几枚发烟炸弹，试图掩盖他们的前进，“然后又低下头，像野兔子一样跑了起来”。他绊倒在“成堆的尸体上面，在一摊摊的鲜血中摇晃着滑行，最后来到马路对面由房屋和楼房提供的掩蔽处”。在那里他发现，韦斯上尉在跑过的时候被击中了。“菲利普斯少校负了重伤。似乎谁也不怎么知道正在进行的是什么事情，或者我们下面该怎么做。”至于D连，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只剩下百分之二十，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继续对抗这样具有压倒优势的德国兵力。我们抱着希望，等待黎明的到来”。

那情形就像是在他们的师与在大桥上弗罗斯特的少得可怜的人之间，已经建起了一道坚固的墙。

哈克特交出了他的第十一营，作为交换，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第七营又给了他。自17日着陆以来，他们一直在守卫空投场。现在，他们同哈克特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一起，经由奥斯特贝克西北的沃尔夫黑策出发了。在那个地区，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将守卫约翰娜霍夫农场，那是一个着陆区，波兰旅的交通工具和火炮原定在第三次空运时到达那里。

哈克特的旅一开始是在那些区域作战，然后在开拔出来时也算平安无事，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已经占据了约翰娜霍夫农场四周的阵地。在那里，他们突然遭遇了强力坚守的机枪阵地的抵抗。一场激战开始了。天色越来越黑，下达的命令是先坚守阵地，然后在黎明的时候击溃敌人。夺取这个地区是极其重要的。索萨博斯基的伞兵将于19日在阿

纳姆大桥的南边着陆，那是一块圩田，考虑到高射炮火的因素，厄克特和皇家空军本来认为那块地方不适合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的着陆。原先预计，等到波兰人到达时，大桥已经在英国人的手里了。大桥如果不在英国人的手里，那么波兰人的任务就是去夺取它。在布朗宁的后方军司令部里，没有人意识到盟军在阿纳姆遭遇着正在恶化的挫折，因而，波兰人的空投仍然按照计划准时进行。如果弗罗斯特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波兰人的空投又获成功的话，那么即使是现在，市场花园行动仍然还有机会获得成功。

在各个地方，士兵们都在艰难地前往大桥。弗罗斯特所攻占的那条南边的马路，在许多人现在看来似乎是许久以前攻占的。列兵安德鲁·米尔本和别的营的一小组掉队者在那条马路上偷偷地走了过去，来到铁路桥废墟的附近，弗罗斯特的士兵在前往他们的主要目标途中，曾经试图攻占这座铁路桥。米尔本看见，在他左边的田野里，白色的小丘在黑暗中闪着微光。“他们是几十具尸体，荷兰人正在这个地方安静地移动着，用白色的被单盖住他们的同伴。”他回忆说。在前面，火染红了天空，大炮的偶尔闪光把大桥的轮廓显露了出来。整个下午，这一小群人一直被占优势的德国兵力阻挡着。现在，他们再次被压制得动弹不得。当他们在河边上的一座停船棚屋里躲避时，米尔本开始对究竟能否到达大桥感到绝望。这群人当中唯一的一位通信兵开始操作他的无线电，当大家围拢起来时，他突然接收到了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信号。米尔本听到，播音员用清晰、精确的嗓音叙述着那天在西线的事件。“在荷兰的英国部队，”报道说，“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在这座阴暗的停船棚屋里，有人嘲弄地笑了起来。“该死的说谎者！”米尔本说道。

当英军第一空降师勇敢的士兵们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候，国王陛下的两位准将却宁可为谁应该指挥这个师，而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端是由郁积不满继而愤怒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引发的。到18日傍晚时，他看到形势不仅令人忧虑而且“混乱不堪”，敌人似乎在各个地方都占了上风。英军的各个营分散在各处，而且作战时没有凝聚起来，都不知道彼此身在何处。许多部队缺乏通信手段，被困在建筑物密集的地区里，完全是碰巧才能遇见。在哈克特看来，显然，作战没有总的指挥或者协调。晚上晚些时候，易激动的哈克特仍然为麦肯齐有关师指挥权令人吃惊的宣布而感到难受，于是便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的哈滕施泰因旅馆，要与希克斯论个究竟。“他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的，”希克斯回忆说，“我正在作战指挥室里，从一开始我就清楚，由于他级别比我高，把指挥权交给我他不高兴。他年轻，意志坚定，而且相当好争论。”

起初，哈克特的不悦集中在希克斯从他那里调走了第十一营这个事情上，他要求说明该营被下达了什么命令，谁在指挥那个防区。希克斯回忆

说："他认为形势太不稳定了，而且明显不同意我做出的决定。"年龄大一些的希克斯耐心地解释，由于遭遇到德国人的强硬抵抗，所以当前的作战形势已经完全出乎意料，因此，每一个营现在都是为到达大桥而独自作战，而且尽管得到的指示是按照特定的路线前进，但各个营也得到了提醒，由于条件非同寻常，也可能出现一些交叉。两支或者三支部队可能发现，自己被迫进入了同一个临近地区。哈克特粗鲁地评论说："指挥的安排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希克斯同意他的评论，不过他又告诉哈克特，目标"是以我们所能有的任何方式，尽可能快地帮助大桥的弗罗斯特"。哈克特虽然同意应该迅速支援弗罗斯特，但又挖苦地提出，这可以以一种"更为协调的方式，用更多的大举猛攻和凝聚力"来做到。哈克特说得很不全面：一个协调的大举猛攻，可能确实能够成功地突破德国人的包围圈，到达弗罗斯特所在的地方，但由于缺乏通信手段，加之又频于应付德国人的不断进攻，因而希克斯没有什么时间组织起这样一种全力以赴的进攻。

两个人的交谈，又转到了哈克特的旅在第二天应该起的作用上。在希克斯看来，哈克特不应该试图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那块高地。"我感到，他若是长驱直入阿纳姆，帮助坚守大桥的北端的话，能更好地帮助弗罗斯特。"哈克特强烈反对，他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出击目标，而且他显得他知道那个出击目标应该是什么。他宣告，他将首先攻占约翰娜霍夫农场东边的那块高地，然后再"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以帮助在阿纳姆的军事行动"。哈克特的话语平静，陈述并不充分，避而不答对方的问题，但又相当辛辣，他坚持应该给他一个时间表，这样他就能"把我的行动讲述给每一个其他人"。哈克特要求有"一个合理的计划"，他说，否则，他将不得不"提出师的指挥权的问题"。

在希克斯一直圆通地称之为"我们的讨论"的过程中，司令部行政官P·H·普雷斯顿中校都在现场。普雷斯顿记得，希克斯的"脸拉得很紧"，转向他说道："哈克特准将认为，他应该指挥这个师。"哈克特对他用的这个措辞提出了抗议。普雷斯顿意识到，交谈变得过于紧张了，于是便立即离开房间，派值勤官戈登·格里夫去找参谋长麦肯齐上校。

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麦肯齐正在休息，却苦于无法入睡。"我在那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戈登·格里夫进来了。他告诉我，我应该立即下楼，那两位准将，希克斯和哈克特'正在激烈争吵'。我已经穿好衣服了。在下楼的时候，我尽力迅速思考。我知道争吵的原因是什么，或许我有必要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无意进入作战指挥室，彼此说些打趣话。我感到，在这个时刻，厄克特将军的命令正在受到质疑，我打算在一切事情上都支持希克斯。"

当麦肯齐走进房间的时候，两位准将之间的交谈突然停止了。“两个人都开始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麦肯齐回忆说，“而且我立即清楚的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希克斯抬头瞥了一下麦肯齐，似乎没把事情放在心上。“哦，哈罗，查尔斯，”麦肯齐记得他说道，“哈克特准将和我有了一点点的争吵，但现在好了。”希克斯确信“情况又回到了正常。我对哈克特相当肯定，当他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会执行我的命令的。”尽管哈克特可能显得接受了希克斯的新角色，但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改变。“皮普[注]的命令如果合情合理，我就接受，”他记得，“我被告知要做的事情，远不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倾向于坚持在两位准将中我作为资深准将的位置，并为我的旅的行动下达那些合情合理的命令。”[注]

在任何别的情况下，这两位准将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都只不过是一件次要的事情。那是两个勇敢而又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又出于相同的目的，暂时发了脾气。当时计划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如果想成功夺取阿纳姆大桥，就需要每一个士兵的共同努力，这样一来，在市场花园行动的资产负债表上[注]，指挥官之间的合作以及士兵们的凝聚力，也就至关重要了。既然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命运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情况就尤其如此。那个新的转折点就是：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地区，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所许诺的增援部队，正在从西线的各个地方源源不断地到达。

尼古拉斯·德博德，这位技术高超的技师，曾经为荷兰北方和南方的地下组织之间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电话联系，这一天他整天待在房间里。按照地区抵抗力量负责人皮特·克鲁伊夫的指示，德博德坐在一扇小边窗的旁边，那扇窗子俯瞰着费尔佩尔路，费尔佩尔路是一条宽阔的街道，从阿纳姆的东边通向北边的聚特芬。他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岗位，却接到了从西边远离市中心地方打来的电话，这些电话令他深感不安。地下组织成员报告说，在沃尔夫黑策和奥斯特贝克地区出了麻烦；有关解放的激动交谈停止了。到现在有几个小时了，他们所听到的，全都是形势正在恶化。德博德被要求不间断观察，看是否有德国人从北边和东边大量移动过来的迹象。到目前为止，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的信息是每个小时向地下组织司令部打一次电话传送的，那些信息都包含着相同的简短情报。“马路空无一人。”他一再这样报告。

夜间晚些时候，在他下一次打电话之前的大约20分钟，他听见了“装甲汽车的橡胶轮胎行进的声音，以及装甲车当啷当啷的声音”，他非常疲劳，走到窗前，凝视着费尔佩尔路。马路似乎像刚才一样空无一人，然后在远处，从悬挂在城市上方的火光中可以看到，有两辆庞大的坦克驶进了视线。它们并排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进着，直接驶向那条通向老城区的马路。

德博德睁大了眼睛注视，他看见除了这两辆坦克之外，还有卡车“运送着样子整洁的士兵，他们笔直地坐在座位上，步枪在他们面前。然后，又有更多的坦克，更多的士兵成排地坐在卡车上”。他立即给克鲁伊夫打了电话，说道：“看来德国的一个整集团军，坦克与其他武器齐全，正在直接进入阿纳姆。”

亨利·克纳普是阿纳姆地下组织的情报负责人，他曾在9月14日提醒伦敦，比特里希的第二装甲军出现了，现在他正从他的网络，收到有关德国增援部队的源源不断的报告。克纳普不再小心翼翼了，他直接给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司令部打电话，向值勤官报告。克纳普开门见山，告诉他：“一个纵队的坦克，其中有虎式坦克，正在进入阿纳姆，有一些正朝奥斯特贝克开去。”那位军官客气地要克纳普先别挂断。几分钟以后他回了电话，他感谢克纳普，又解释说：“上尉对这个报告感到怀疑。毕竟，他已经听到很多童话了。”注但英军司令部里面的怀疑主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皮特·克鲁伊夫通过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证实，起码“有50辆坦克正从东北方向开进阿纳姆”，沃尔特斯是荷兰皇家海军军官，他正为这个师担任情报联络官。

交战散发出来的恶臭弥漫了内城。在桥上，车辆的残骸高高地伸出水泥路肩，碎片散落在莱茵河沿岸的街道上。浓密的烟，用一层薄薄的油污给楼房和院子涂上了油渍。在整个滨水地区，几百场火燃烧着而无人理会。人们记得，大地由于大量炸药的震荡而不断抖动着，那是德国人在交战的这个第二天的最后几小时里，在和蒙哥马利的主要出击目标进行的惨烈争夺中，轰击北坡道上的英军据点。

午夜时分，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离开了他在坡道西边的司令部，前往环形防线以核对士兵的人数。尽管自从格拉布讷的装甲部队在上午时候开始进攻以来，战斗就几乎没有中止过，但士气仍然高涨。弗罗斯特为他疲倦、肮脏的伞兵们感到骄傲。整整一天，他们顽强地击退了一个又一个进攻。没有一个德国人或者车辆曾经到达大桥的北端。

下午，德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战术。他们试图用含磷弹药把英国人从他们的据点里烧出来。一门长炮管的150毫米大炮，把100磅重的炮弹直接投掷到弗罗斯特的司令部大楼上，迫使大家进入地下室。之后英国迫击炮校准了射程，直接命中，击毙了那门大炮的炮组人员。当伞兵们欢呼并嘲弄地发出嘘声的时候，别的德国人在炮火下冲了出来，把那门大炮拖了回去。环形防线各处的房屋在猛烈燃烧，但英国人在那些房屋里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然后才转移去别的阵地。所造成的破坏是令人惊惧的。燃烧着的卡车和各种交通工具，残破的半履带式车辆和成堆的冒烟的瓦砾，乱堆在每一条街道上。中士罗伯特·H·琼斯记得，这个景象就像“一个马尾藻海注，

上面漂浮着燃烧着的倒塌楼房、半履带式车辆、卡车和吉普车”。这场战斗变成了一种忍受的竞赛，弗罗斯特知道，他的士兵如果得不到帮助就无法取胜。

地下室和地窖里满是伤员。伯纳德·伊根牧师大人是营的随军牧师之一，詹姆斯·洛根上尉是营的医官，他们自北非战役以来就是朋友，现在他们用正在迅速减少的医疗补给品照料着伤亡人员。几乎没有剩下吗啡，野战绷带也用完了。士兵们动身前往大桥的时候，只带着可供48个小时用的少量口粮，现在，这些口粮快吃完了，而且德国人又切断了供水。伞兵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靠着他们所占领房屋的地下室和地窖里储存的苹果和为数不多的梨生存。列兵G·W·朱克斯记得，他的中士告诉士兵们：“你要是吃大量的苹果的话，就不需要喝水了。”朱克斯产生了一种幻觉，感到自己“最终被解救了，扎着血染的绷带，目空一切地与别人背靠背地站着，四周是死去的德国人、用完了的子弹盒，还有苹果核”。

弗罗斯特分分秒秒都在等待着，等待多比或者菲奇的解救营突破德国人的包围圈来到大桥，但没有等到。尽管作战的声音来自阿纳姆西边的方向，却没有迹象说明有大部队在运动。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弗罗斯特都在期望再次得到霍罗克斯第三十军的消息。自从上午收到那个孤零零的强大无线电信号以来，就再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消息了。那些费劲周折终于来到弗罗斯特身边的掉队者，他们带来的消息是，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仍然在走廊的远处。有的掉队者甚至从荷兰地下组织那里听说，那个纵队还没有到达奈梅亨。弗罗斯特既担心真是如此而又不能断定，于是决定不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别人。他已经开始认为，他为之感到自豪的第二营的士兵，从建营的时候就一直是由他指挥，现在他们将单独坚守下去的时间，将远远长于他认为可能坚持的时间。

在星期一的最后几个小时，弗罗斯特的希望就仰赖于第三次空运了，仰赖于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伞兵旅的预料中的到达。“他们定于在大桥的南边空投，”弗罗斯特后来写道，“而且我对他们将受到的接待感到担心……但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发现有一小伙朋友在迎接他们。”为了准备波兰人的到来，弗罗斯特组织了一个“机动的强击队”。弗罗斯特将使用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两辆装甲侦察吉普车和一辆履带式小型装甲车，他指望他们能够冲过大桥，并且在袭击造成的猝然和混乱当中，打开一个通道，把波兰人带过去。要率领这个小组的高夫少校，“彻底流露出了痛苦，对这个主意非常没有热情”。他曾在9月16日庆祝了他的43岁生日。高夫非常肯定地相信，如果要完成弗罗斯特的计划，他将看不到自己的44岁生日。㊟

据判断，波兰人在19号的10点以前不会着陆。现在，弗罗斯特巡视着他在

狭长掩体、机枪阵地、地下室和地窖里面的士兵们，提醒他们节约珍贵的弹药。他们只能在敌人靠近的时候才开枪，要做到弹不虚发。通信兵詹姆斯·海瑟姆正在用他的步枪瞄准一个德国人，这时上校的命令传达了下来。“站着别动，你这个笨蛋，”海瑟姆喊道，“这些子弹可是要花钱的。”

虽然弗罗斯特知道，减少射击率会帮助敌人改善其阵地，不过他也相信，德国人也会被误导，以为英国人不仅丧失了人数，也丧失了勇气。弗罗斯特确信，这种态度将使德国人付出昂贵的代价。

坡道的对面一边，与埃里克·麦凯上尉在一起的那一小伙人，已经在证明着弗罗斯特的理论。

在坡道下面那个弹痕累累、凹凸不平的校舍里，麦凯把他的小小兵力压缩进两个房间，在门厅里设置了几个士兵。以防止敌人试图渗入。麦凯刚把他的士兵安置好，德国人便用机枪和迫击炮发起了一次杀气腾腾的进攻。一等兵阿瑟·亨迪记得，火力是如此猛烈，结果子弹“嗖嗖地穿过破碎的窗户，把木地板劈开，我们既要快速避开发射来的子弹，又得快速避开飞来的木头碎片”。

当士兵们躲闪着隐蔽的时候，麦凯发现德国人带来了一个火焰喷射器，没过几分钟，学校附近的一辆炸毁的半履带式车辆便着了火。麦凯回忆说，然后“德国人放火烧了我们北边的那幢房子，房子猛烈燃烧，在我们的木头屋顶上下了一阵火花雨，木屋顶立即着火了”。在这一片混乱中，大家快速跑上屋顶，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使用学校的灭火器以及他们自己的伪装服，发疯似的灭火。在一等兵亨迪看来，那种臭气“就像在烧奶酪，烧肉。整个地区都被照亮了。阁楼里是一片酷热，而且德国人又一直在朝我们打冷枪。但最终火被扑灭了”。

当精疲力竭的伞兵们再次集中在那两个房间里时，麦凯命令士兵用伪装服和衬衫把脚包住。“石头地板上面有厚厚的碎玻璃、灰泥和碎铁片，楼梯由于有血而打滑。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脚下咯吱作响，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麦凯记得，当他就要下到地窖去察看伤员的时候，“出现了一道使人目眩的闪光和一个可怕的爆炸。我下面知道的事情，就是有人在扇我的脸”。在火燃烧的过程中，德国人带来了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想一劳永逸地摧毁这支小小的兵力。麦凯看见，校舍的整个西南角以及仍然在闷燃着的屋顶的一个部分被炸掉了，他既茫然又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各个教室现在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就像一个存骸所。“只是几分钟以后，”麦凯回忆，“就有一个士兵走过来说，他认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从其中的一个窗户朝外边望去。下面有许多德国人。足够滑稽的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四周的草地上站着。他们站在我们的各个方向，除了西边。他们一定是以为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把我们杀死了，因为我们不再射击

了。”

麦凯小心翼翼地在地板上绕着尸体走去，命令他的士兵取出手榴弹。“我喊‘开火’的时候，就用你们所有的一切东西开火！”他说道。麦凯回到东南边的那扇窗户，下达了命令。“小伙子们朝下面的人头上扔出了手榴弹，我们立即用所剩下的一切东西跟了上去，那是6挺布伦式轻机枪和14挺斯特恩式轻机枪，以最大的速度射击。”在嘈杂声中，伞兵们侧身在窗户边，在胯部开机关枪，同时喊着他们的战斗口号：“嗨，穆罕默德！”没出几分钟，反击就结束了。麦凯回忆说：“当我再次朝外面看的时候，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就是一张灰色的地毯。我们一定是消灭了30到50个德国人。”注

现在，他的士兵们着手收集死者和伤员。有一个人胸部中了15颗子弹，正处在弥留之际。另外5个人伤势非常严重，而且几乎所有的伞兵都在试图拯救熊熊燃烧的屋顶时被烧伤了。麦凯也再次被炮弹碎片击中，他发现，他的脚被弹片钉在靴子里了。皇家工兵平基·怀特是代理卫生员，不论是麦凯还是怀特都无法把那块弹片取出来，因而麦凯把他的靴子系得更紧一些，以便把肿胀压下去。在原先的50个士兵当中，现在只有21个士兵状况良好：有4人死去，25人负伤。尽管他没有食物，只有一点水，但却收集到了大量的吗啡补给品，因而能够减轻伤者的痛苦。“几乎每一个人都受了惊吓，极其疲倦，”他记得，“但我们却为自己获得了另外一个暂时的喘息空间。我纯粹认为情况不太光明，但我们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们告诉我们，一切正在按照计划进行。我用无线电与上校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我们的兵力情况，并且说我们全都情绪饱满，正在坚守。”

当一等兵阿瑟·亨迪试图睡上几分钟的时候，他听见了远处的教堂钟声。起初他以为，钟声是在宣告霍罗克斯坦克部队的到来，但那钟声并不平稳，也不连贯。亨迪意识到，一定是子弹或者炮弹弹片击中了钟。他想到在坡道的另外一边弗罗斯特上校的司令部周围的那些士兵，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全。他又听见了钟声，感到自己在颤抖。他无法使自己摆脱掉一种恐怖的、毁灭的感觉。

弗罗斯特急需得到的那个帮助，靠近得折磨人———不超过1英里，有4个营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莱茵河之间展开，他们正在拼命试图到达他那里。J·A·C·菲奇中校的第三营，一直在试图强行沿着狮子路线前进———也就是弗罗斯特两天前抵达大桥所使用的那条莱茵河边的马路。在黑暗中，由于没有通信手段，菲奇并没有意识到，另外三个营也在前进———即戴维·多比中校的第一营、G·H·利中校的第十一营，以及W·G·H·麦卡迪中校的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多比的士兵离他只有几百码。

9月19日，星期二，凌晨4点，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开始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阿纳姆市博物馆之间的建筑物密集地区穿过。在他们南边，狮子路线上，菲奇已经遭遇到了破坏力极强的抵抗，现在第一营正试图从那条路线上强行通过。起初，这三个营行动协调，取得了一些推进。然后，随着黎明的到来，夜幕的掩护就消失了。德国人的抵抗在整个夜晚都是不均衡的，现在却突然猛烈地集中起来。进军逐渐停顿了，因为这几个营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紧密的罗网之中，三面被敌人困住了，敌人几乎是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阵地里等待他们的到来。德国人准备进行一场大屠杀。

先头部队当场就被击中，停了下来，击中他们的是阻塞住街道的德国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北边铁路调车场的陡坡上，正在房屋里等待的机枪队从窗户朝外开火。多炮管的高射炮，从莱茵河对岸的砖厂进行平行射击，炮弹落进了多比的那个营，而当菲奇的士兵试图在下莱茵河边的那条马路前进时，那些平射的高射炮又转而猛烈打击菲奇的士兵。菲奇的那个营自两天前着陆以来，在作战中已经遭到了重创，现在被无休止的高射炮火切成了碎片，再也无法作为一支有效的部队而存在了。士兵们在混乱中溃散了。他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由于敞开的马路上没有保护物，他们被有条不紊地一批批枪杀了。“令人痛苦的是，”欧内斯特·塞科姆上尉说，“德国佬的弹药要比我们多得多。我们试图冲刺，从一个掩蔽物跑到另外一个掩蔽物。我刚刚开始冲刺，就遭遇到一阵致命的交叉炮火。我像土豆口袋一样倒下了。我甚至都无法爬行。”塞科姆的两条腿都被击中了，无助地注视着两个德国人走到他的面前。这位英国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要他们看看他的腿。他们弯下身来，检查了他的伤口，然后一位德国人站了起来。“对不起，豪普特曼先生，”注他告诉塞科姆，“恐怕对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卫生员叫了过来，于是塞科姆便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注

菲奇手下的一位军官碰巧发现，多比的部队出现在南边的那一条马路上，而第一营的士兵们尽管自己蒙受了重大的伤亡，却仍然匆匆朝菲奇一行人的可怜余部走去。多比现在一门心思要赶往大桥，但困难是巨大的。当多比进入密集的炮火中走到菲奇的士兵前面时，他本人也负了伤，被俘了（他后来又成功地逃脱了）。到那天结束的时候，据估计他的营只剩下了40个人。列兵沃尔特·博尔多克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直在试图赶到大桥，但那是个灾难。我们不断遭到迫击炮的轰击，而且德国人的坦克也直接朝我们疾驶而来。我试图用我的布伦式轻机枪打一辆坦克，但接着我们就后退了。我经过一条断了的供水总水管，一个穿着蓝色宽大罩衫的平民躺在排水沟里，水轻轻地在他的尸体旁边冲刷着。当我们离开阿纳姆郊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们是不会回来了。”

菲奇的士兵在试图跟着多比的营的时候，再次被打得狼狈不堪。行军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战后报告表明，这时在营的内部已是完全混乱。“在我们到达被拆掉的浮桥地区之前，进展是令人满意的，”第三营的报告说，“然后来自第一营的伤员开始从我们当中经过。重机枪、20毫米口径的火炮以及猛烈的迫击炮开始开火……每一分钟都有一个又一个小组的伤员被匆匆运回。”

由于兵力有完全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菲奇命令他的士兵回到莱茵亭，莱茵亭是河岸上一个大的饭馆建筑群，该营的余部可以在那里重组并占据阵地。“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返回去，”菲奇告诉他的伞兵们，“整个地区似乎被炮火覆盖，能够安全逃脱的唯一希望就是单独行动。”列兵罗伯特·爱德华兹记得，有一位中士，“他的靴子由于伤口流血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要冲出去，回到我们原先来到的那第一支有组织的部队”。菲奇上校没有到达莱茵亭，在那条致命的返回路上，他被迫击炮的炮弹炸死了。

由于一些古怪的情形，有两个本来永远也不应该到那里的人，却实际上进入了阿纳姆。安东尼·迪恩 - 德拉蒙德少校是师通信兵部队的副指挥，他对通信手段的故障感到震惊，于是便与他的勤务兵兼司机、一等兵阿瑟·特纳一起出去，要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星期一一大早，迪恩 - 德拉蒙德与特纳就一直在路上。首先，他们找到了多比的营的位置，他们在那里得知，弗罗斯特在桥上，多比正在准备发起进攻，以便突破到弗罗斯特那里。迪恩 - 德拉蒙德在河边的马路出发，赶上了第三营的一些士兵，他们正努力前往阿纳姆，于是迪恩 - 德拉蒙德便同他们一起前往。猛烈的炮火把这一行人吞没了，在随后进行的战斗中，迪恩 - 德拉蒙德发现自己正率领着一个他们的连长已经阵亡的连的余部。

迪恩 - 德拉蒙德记得，他们不断受到轻武器火力的打击，遭到包围。德国人朝士兵们投掷木柄手榴弹，而他则率领着一行人，沿着马路朝一个小水湾附近的一些房子走去。他能够看见，大桥就在前面。“我们只剩下两百码就能到达我决定要去的那些房子的时候，士兵们就像苍蝇一样跌倒了，”他回忆说，“我们减少到20人左右，而且我意识到，这个营的其他人现在远远落在后面，可能永远不会到达我们这里。”迪恩 - 德拉蒙德把士兵们分成三组，决定等天黑时到河边去，然后尝试游水渡河，到西边找师部。在角落里的一座房子里，他安顿下来等待，周围全都是德国人。前门传来了砰砰的开门声，于是迪恩 - 德拉蒙德和那三个同他在一起的士兵，全速跑到了房子的后面，把自己锁在一个小的盥洗室里。从这个小房间外面的喧闹声可以得知，显然德国人正在忙着把这幢房子改建成一个据点。迪恩 - 德拉蒙德落入了陷阱。在以后三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人将待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注

与此同时，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的那个营，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残酷巷战之后，也陷于停顿。进行反攻的德国坦克部队彻底击败了这两个营，迫使他们缓慢退却。

列兵莫里斯·福克纳记得，这两个营中的一部分人在蒙受了沉重的伤亡之后，来到了博物馆，结果却又与坦克部队不期而遇。“我看见，有一个士兵从窗户跳到一辆坦克的上面，想把手榴弹扔进去，”福克纳回忆说，“他被狙击手打死了，不过我认为，无论如何他大概已经陷于困境，他可能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列兵威廉·奥布赖恩说，形势“突然混乱了起来。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德国人带来了六膛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注听见那些呼啸的声音，我们被吓得精神错乱。我开始认为，似乎那些将军们无权让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一直纳闷，该死的第二集团军到底到哪里去了。”

列兵安德鲁·米尔本，在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附近，听见有人喊机枪手。米尔本走向前，被告知带上他的枪和一组人，到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那条马路的交叉口去，在那两个营脱离战斗的时候掩护和保护他们。米尔本把他的维克斯式机枪放在一辆吉普车里，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出发了。他把机枪架在十字路口一栋房子的花园里。几乎立即，他就似乎被他独自的战斗吞没了，迫击炮弹和子弹似乎直接对准了他。当伞兵们开始在他周围退却时，米尔本在他们前面不断射击，子弹呈现出了弧形。他记得，他听见一种快速移动的声音，就像风一样，然后又看见一道闪光。几秒钟以后他知道，那是他的眼睛和手出了毛病。他记得有人说：“天哪，他倒霉了！”

列兵托马斯·普里查德听见这句话，便跑了过去，现在士兵们正站在米尔本身旁。“他躺在已经扭曲的维克斯式机枪上面，两只手悬挂在皮肤上，一只眼睛从眼窝里掉了出来。我们开始喊叫卫生员过来。”不远处，米尔本最好的朋友、第十六野战救护队的下士特里·塔菲·布雷斯，听见有人在喊叫。布雷斯把刚刚处理好的一个被炮片炸伤的士兵留在后面，全速向前跑去。“快，”有一个人朝他喊道，“维克斯式机枪手负伤了。”布雷斯记得，他跑的时候能够听见机枪在几乎不停地射击，子弹和迫击炮弹似乎落得到处都是。他来到一群人面前，推搡着走了过去，令他恐怖的是，他看见米尔本躺在地上。布雷斯发疯似的工作着，把米尔本的胳膊包扎起来，在这个伤员的颧骨下面放上一块绷带，用以支撑他的左眼。布雷斯记得，他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地说话。“只是一点儿擦伤，安迪，”他不住地说，“只是一点儿擦伤。”布雷斯抱起他的朋友，把他抱到附近的一个包扎所，在那里，一位荷兰医生立即着手工作。接着，他又回到前线。注

布雷斯在似乎躺着几百个人的田野和马路上走了过去。“我在每一个人的旁边都停下来，”他回忆说，“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所能做的唯一事

情，就是脱下他们的伪装服，盖住他们的脸。”布雷斯尽了最大的力量处理了一名受伤的中士，然后当他准备再次动身的时候，那个人把手伸向他。“我挺不过去了，”他告诉布雷斯，“请抓住我的手。”布雷斯坐了下来，用双手捧着中士的手。他想到了他最好的朋友米尔本，想到了在这一天川流不息走过营地的许多人。几分钟以后，布雷斯感到被轻微拉了一下。他低下头，看见那位中士死了。

现在，英国人处于混乱之中，他们没有反坦克大炮，步兵用反坦克炮的弹药也用完了，而且伤亡重大。这场进攻变得一团糟。那两个营无法冲过圣伊丽莎白医院周围建筑密集的地区。但在迷宫般的街道中，有一场战斗却是既有效又成功，这个进攻攻占了茨瓦特路14号的一排房子，这正是罗伊·厄克特将军未能从中逃脱的那幢房子。

“我们听见，外面的自行火炮呼哧作响，履带发出格格声，”厄克特后来写道，“它开走了。”安东·德克森然后出现了，他“激动地宣布，英国人就在马路的尽头。我们跑下街道，我为我们再次取得联系而感谢上帝”。

厄克特从南斯塔福德郡团的一位军官那里得知，他的司令部现在是在奥斯特贝克一家名叫哈滕施泰因的旅馆里，他于是征用了一辆吉普车，冒着狙击手的弹雨全速驶去，终于到达了师部。

现在时间是早晨7点25分。将近39个小时，在战役的最关键的时期，他脱离开战役，失去了对战役的控制。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最先见到厄克特的是随军牧师G·A·佩尔。“消息一直不太好，”他回忆说，“据报道，将军被俘了，而且也看不见第二集团军的影子。”当佩尔在旅馆的台阶上往下走的时候，“正在登上台阶的不是将军又是谁呢。我们几个人看见他，但谁都一言不发。我们只是凝视着———完全惊呆了。”由于身上肮脏，“两天没有刮胡子，我看上去一定成了别的什么样子”。厄克特说。这时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冲了出来。麦肯齐盯着厄克特，告诉他：“长官，我们本来以为你永远离开了呢。”

麦肯齐迅速向焦急的厄克特简要汇报了他不在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并介绍了眼下的形势———师部所知道的形势。情况糟透了。厄克特辛酸地看到，他引以为骄傲的师被打散了，切成了一片一片。他想到了困扰着他的参加市场行动的部队的那些挫折：从空投场到大桥的距离；通信手段几乎全部出了故障；哈克特的第四旅由于天气的原因而延误，加上珍贵的再次补给品的丧失；还有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的缓慢进展。厄克特震惊地得知，根据报告，第三十军甚至还没有到达奈梅亨。在哈克特和希克斯之间的指挥权之争使人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这个争论是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本人没有预料到的失踪的时候产生的，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恰恰需要对战

役做出精确的指示。厄克特最感到悔恨的是在制订计划的最初阶段，由于过分乐观（让人难以置信），而没有对比特里希装甲军团的出现给予相应的重视。

所有这些因素，一个又使得另外一个更加复杂化，把这个师带到几乎毁灭的灾难境地。只是杰出的纪律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才把遭到重创的“红毛鬼子”们聚在一起。厄克特决心，要以某种方式逐渐灌输新的希望，把他的士兵们努力协调起来，甚至一直协调到连的层次。他知道，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向他的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士兵们，提出比任何时候都更高的要求。他别无选择。这个有献身精神、说话声音柔和的苏格兰男人看到，由于德国增援部队源源不断涌来，除非他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我的师就会完全被消灭”。甚至现在，要想拯救他所心爱的部队使之免于被消灭，也已经可能太晚了。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是多么令人绝望。简单地说，已经没有前线可言。现在除了波兰旅之外，他所有的伞兵都到达了，西边的主要空投场已经被放弃，而且除了提供再次补给品的地区之外，在他们周围由希克斯的士兵坚守的营地已经缩小，收进去了。他看到，哈克特正在进攻沃尔夫黑策东北方向的高地和约翰娜霍夫农场；第十一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正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作战；在下莱茵河马路上的第一营和第三营的进展没有消息。然而厄克特骄傲地得知，弗罗斯特仍然在大桥上坚守着。在战场态势地图的各个地方，红色箭头都表明，据新的报告，敌人的坦克和部队正在集中，有些实际上就部署在英军部队的背后。厄克特不知道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把他正在减少的兵力重组起来，并协调他们的进军，前往大桥，以最后一搏进行强攻。眼下，厄克特对一营和三营所遭到的残酷损失一无所知，他认为仍然还有机会。

“我突然意识到，”他记得，“谁在指挥城里的战斗？是谁在协调？拉思伯里负伤了，不再是在那里了。没有人被指定去制订计划。”当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希克斯准将来了。希克斯见到厄克特，并把师指挥权交还给厄克特，他高兴极了。“我告诉他，”厄克特说道，“我们得立即派人进城。要派一名高级军官，去协调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的进攻。我意识到，当时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码远，倘若我仍然待在城里并指挥的话，就可能会好一些。注现在，我派出了希拉里·巴洛上校，巴洛是希克斯的副手，他是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我叫他进城，把两边联系起来。我精确地说明了，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在什么地方，让他乘坐吉普车，带上无线电前去，并命令他搞出一次得到合适协调的进攻来。”

巴洛从来也没有到达那两个营。在途中的某个地方，他被杀死了。“他纯粹是消失了。”厄克特回忆说，他的尸体从来没有被找到。

波兰人在第三次空运中的到达，也几乎同样紧迫。现在他们将会在大桥的南入口着陆，将会直接落在已经做好了准备的敌人上面，这一点弗罗斯特太清楚了。厄克特推断，现在，德国人显然是得到了装甲部队的支援，这场空投可能会成为一场大屠杀。为了阻止他们，即使通信没有把握———谁也不知道能否把信息传递出去，厄克特还是发出了一个警告电报，要求更换一个新的空投场。在后方的军司令部里，这个电报从来也没有接收到。但这已无关紧要。还有一个挫折，浓雾覆盖了英格兰的许多机场，而参加极其重要的第三次空运的飞机和滑翔机，正准备从那些机场出发。

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不得不走的那个走廊，又再次敞开了。在位于阿纳姆南边46英里处的索恩，工兵们注视着英军的第一批装甲车隆隆驶过他们建起来的临时性的贝利桥。注近卫团装甲师又一次上路了，现在的挺进是由近卫步兵第一团打头。现在，9月19日的早晨6：45，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比预定时间晚了36个小时。

到目前为止，走廊的这个地段的人谁也猜不出，在最后算总账的时候，时间的丧失将意味着什么———而更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到来呢。北边35英里处，奈梅亨的那座瓦尔河大桥，仍然掌握在德国人手中。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担心，要是不能把它完好无损而且是迅速地攻占的话，德国人就会把它炸掉。

这个担心使得装甲部队的挺进愈加紧迫。对加文将军、对军长布朗宁将军以及对霍罗克斯来说，奈梅亨大桥现在是这个计划中最关键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指挥官们还不知道英军第一空降师的真正困境是什么。德国人的宣传广播吹嘘说，厄克特将军死了，注他的师被粉碎了，但从该师自身根本就没有传出任何消息来。在坦克纵队中，士兵们认为市场花园行动进展顺利。泰勒将军的“尖叫的老鹰”也这样认为。“对第一○一师的一个个伞兵来说，坦克的声音，坦克上大炮的景象，既是一个保证又是一个许诺，”S·L·A·马歇尔上将后来写道———“这是一种认为有一个计划的保证，并认为这个计划可能奏效的许诺。”

当坦克隆隆驶过的时候，泰勒将军第一○一师的伞兵们为他们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他们也应该感到自豪。他们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坚强抵抗，但仍然攻占和坚守住了从艾因霍温一直到费赫尔的15英里马路。沿途各地，当皇家装甲兵团、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坦克，以及强大的第三十军飞速驶过的时候，士兵们挥手欢呼。没出几分钟的时间，这个纵队便从索恩来到了费赫尔。接着，以蒙哥马利所展望的那种整个大举猛攻应该有的冲刺，这些装甲部队的先头部队，在两翼的欢呼、挥舞旗帜的荷兰人群当中，快速前进，于上午8点半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格拉夫。在那里，坦克部队与加文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会合了。“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他们那里，”下

士威廉·切内尔回忆说，他当时就在打头的装甲汽车中的一辆，“因为那些美国人并不心存侥幸，他们鸣枪示警，让我们停了下来。”

第一批坦克迅速继续前进，中午的时候到达了奈梅亨郊外。现在，那个至关重要的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的三分之二，已经被走过了。这条孤零零的马路，挤满了车辆，倘若不是那些警觉而又顽强的伞兵们为了使它保持畅通而作战，而死去，这条马路本来随时都会被切断。倘若蒙哥马利大胆的战略要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个走廊就是生命线，单是这个生命线就能维持这个成功。士兵们飘飘然，因为成功而激动。按照官方公告的说法，包括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的公告都说，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甚至没有任何信号暗示，一场可怕的困境正在缓慢地吞没阿纳姆的士兵们。

然而，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却感到不安。在18日下午，他与加文将军会晤了。这位军长没有得到阿纳姆的任何消息。除了荷兰地下组织少得可怜的情报之外，布朗宁的通信部队没有接到一个情况报告。尽管官方宣称，这个作战行动进展令人满意，但从他本人的后方司令部转过来的信息，以及从邓普西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得到的信息，都在他的身上激起了折磨人的担心。布朗宁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即厄克特可能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

有两个报告尤其令他焦虑。德国人在阿纳姆的力量和反应毫无疑问地证明，他们的力量比计划的制订者们所预期的要强大，反应要迅速。皇家空军空中照相侦察的信息表明，只有阿纳姆大桥的北端被英国人坚守着。但即使是现在，布朗宁也没有意识到，有两个德国装甲师就在厄克特的防区。布朗宁为通信手段的欠缺所烦恼，又被他的怀疑困扰着，于是便提醒加文：“今天必须把奈梅亨大桥夺下来。起码，明天得把它夺下来。”从第一次听说有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个时刻开始，布朗宁就一直为阿纳姆大桥担心。蒙哥马利自信地预料，霍罗克斯将会在48小时之内抵达那里。当时，布朗宁的看法是，厄克特的伞兵能够坚守4天的时间。现在是D日的两天以后，比布朗宁对该师单独行动能力的估计还少了一天，这时，尽管布朗宁还没有意识到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严重形势，但他还是告诉加文：“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赶到阿纳姆。”(注)

在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防区会合之后，布朗宁立即召集了一个会议。近卫团装甲师打头的装甲汽车被派了出去，把第三十军的司令员霍罗克斯将军接来，同时也把近卫团装甲师的师长艾伦·阿代尔将军接来。这两位军官与布朗宁一起，驱车前往奈梅亨东北方向的一个俯瞰着河流的地点。下士威廉·切内尔的车被挑中送其中的一位军官，从那个地方，切内尔与一行人一起站着观察大桥。“让我吃惊的是，”切内尔回忆说，“我们能够看见，德国军队和车辆在桥上来来往往，显然完全是毫不担心。没有打一枪，然而我们就在几百码远的地方。”

回到布朗宁的司令部之后，霍罗克斯和阿代尔第一次得知，在第八十二师的防区有德国人的猛烈抵抗。“我在到达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我们并没有拥有奈梅亨大桥，”阿代尔说道，“我想当然地认为，等到我们到达的时候，大桥就已经在空降部队手中了，而我们将纯粹是继续疾驶而过。”这位将军现在得知，加文的伞兵为了守住空降场而处于极大的困境，结果有几个连被从奈梅亨召回，来保护这些着陆区域，防止集结起了兵力的敌人的进攻。第五○八营的一些部队，在坚守着大桥入口的强大的党卫军部队面前，已经没有能力取得任何进展。布朗宁认为，能够迅速夺取大桥的唯一方式，就是坦克部队和步兵联合发起进攻。“我们将不只是使用空降部队来把这些德国人赶出去。”布朗宁告诉阿代尔。

奈梅亨大桥是市场花园行动中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由于布朗宁给英军伞兵坚持抵抗的限期就要到了，因而这个行动必须加速。仍然还有11英里的走廊要强行打开。布朗宁强调，必须以空前的速度夺取奈梅亨大桥。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少将心情烦躁，而且还不只是有一点儿沮丧。尽管比特里希将军不断施加压力，但他却仍然没有能够把弗罗斯特和他的士兵们从阿纳姆大桥赶出去。“我开始感到非常愚蠢了！”哈梅尔回忆说。

现在他知道，伞兵们的补给品和弹药几乎用完了，而且伞兵们的伤亡，如果用他本人的伤亡来做推测的话，也是非常大的。“我本来决定要用坦克和大炮的炮火施加压力，把他们坚守的每一座大楼夷为平地，”哈梅尔说道，“但考虑到他们作战这么顽强，我又感到，应该首先要他们投降。”哈梅尔命令他的参谋们安排一个暂时的休战，他们将挑选出一名英军战俘，带着哈梅尔的最后通牒去找弗罗斯特。被选中的士兵是一名刚刚被俘的工兵，21岁的中士斯坦利·哈利韦尔，他是麦凯上尉手下的一名皇家工兵。

哈利韦尔被告知，要他举着一面休战旗进入英军的环形防线。到了那里，他要告诉弗罗斯特，一位德国军官将会前来，与他商讨投降的条件。如果弗罗斯特同意，那么哈利韦尔将再次返回大桥，不携带武器与弗罗斯特站在一起，等那位德国军官到他们这里。“作为一名战俘，我应该在一送到了信并得到上校的回答之后，便返回到德国佬那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件事的后一部分。”哈利韦尔说。德国人把哈利韦尔带到接近英军环形防线的地方，在那里，他举着休战旗，进入英军的防区，来到弗罗斯特的司令部。哈利韦尔忐忑不安地向弗罗斯特说明了形势。他说，德国人认为，交战继续下去毫无意义。英军被包围了，没有解围的希望。他们或者死去或者投降，别无选择。弗罗斯特询问了哈利韦尔，得知“敌人似乎因为他们自己的损失而完全泄气了”。得知这个消息，他的精神暂时提了起来，他记得，他当时想：“只要更多的弹药能够到来，我们就能很快对我们的党卫军对手稳操胜券。”至于德国人进行谈判的要求，弗罗斯特给哈利韦尔

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见鬼去吧！”他说道。

哈利韦尔完全同意。作为一名战俘，他应该返回，但他不希望重复弗罗斯特的原话，而且他向弗罗斯特指出，穿过战线返回可能将是困难的。“由你来作这个决定。”弗罗斯特说道。哈利韦尔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了。“如果对你来说是完全一样的话，上校，”他告诉弗罗斯特，“那么我就要待下来。德国佬迟早会得到这个信息的。”

在大桥坡道的另外一边，埃里克·麦凯上尉刚刚得到了一个类似的邀请，但他却宁可误解这个邀请。“我朝外望去，看见一个德国佬站着，步枪上系着一块不是非常白的手帕。他喊道：‘投降！’我立即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想投降，不过也许说的是要我们投降。”在那座现在几乎已经被摧毁的校舍里，他的小小的兵力正在坚持着，在那里，麦凯仍然以为，那个德国人是在提出投降，于是认为这个主意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只有两个房间，”他说，“要是再加上俘虏，我们就会有点拥挤了。”

麦凯朝那个德国人挥舞着手臂，喊道：“从这里滚开。我们不接受俘虏。”卫生员平基·怀特来到窗口，与麦凯在一起。“滚（Raus）！”他喊道，“走开！”在一连串的嘘叫声和口哨声中，其他的伞兵们喊道：“滚开！回去决一胜负，你这个杂种。”那个德国人似乎明白了是什么意思。麦凯回忆说，他转过身去，迅速走回他自己的大楼，“仍然挥动着他肮脏的手帕”。

哈梅尔试图让在大桥上的精神饱满但又被围困的士兵们投降，这个尝试失败了。战斗又再次更为凶猛地开始了。

8

★ ★ ★

在英格兰格兰瑟姆镇附近浓雾弥漫的基地里，波兰第一伞兵旅正在等待起飞。空投的开始时刻原本定于上午10时，但天气却迫使它推迟了5个小时。现在这个旅将在下午3时到达。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这位极端独立、性情多变的波兰指挥官，在等待期间让士兵们在他们的飞机旁边待着。在52岁的索萨博斯基看来，英格兰每个早晨都是被雾笼罩。如果天气晴朗得比预期要快，命令也可能改变，索萨博斯基打算一接到通知便出发。他感到，现在每一个小时都是重要的。索萨博斯基认为，厄克特出了麻烦。

除了本能之外，索萨博斯基的感觉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但从一开始，市场

花园行动的概念就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确信，空投场离大桥太远了，难以产生突袭之效。除此之外，在英格兰似乎没有人知道阿纳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索萨博斯基在司令部里惊恐地发现，与英军第一空降师的通信联系出了故障。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只是阿纳姆大桥的北端在英国人的手中。既然计划没有改变，那么将在埃尔顿村附近的大桥南边空投的索萨博斯基的士兵，就要攻占大桥的另外一端。

但将军对信息的欠缺感到担心，他不能确信厄克特的士兵仍然在桥上。消息依赖于布朗宁后方司令部里的联络官们，而那些联络官又似乎对实际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他本来想，是不是应去在阿斯克特(注)的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走一趟，与集团军司令员刘易斯·布里尔顿将军直接交谈。外交礼节却使他不能如愿。他的部队在布朗宁将军的指挥之下，而索萨博斯基又不愿意绕过现有的军事渠道，计划上的任何改动都应该只是来自布朗宁，而他又没有接到任何改动指示。但是索萨博斯基还是感到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如果英国人只是坚守大桥的北端，那么敌人在南端的兵力就应该强大，而波兰人就大有可能面临殊死战斗。索萨博斯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定于装载在46架滑翔机里，从南边的唐安普尼基地和托兰特拉什顿基地出发，它们仍然定于在中午起飞。既然计划的那一个部分仍然没有改变，索萨博斯基就试图说服自己，一切会顺利的。

艾博特·斯马茨尼中尉也同样不安。他预定要率领连队越过阿纳姆大桥，占领城市东部的一些大楼，而如果大桥没有被攻占，他不知道将如何让他的士兵渡过莱茵河。斯马茨尼得到的保证是，渡口将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但自从他在1939年从德国人那里逃脱（他16岁的弟弟由此遭到报复，被盖世太保打死了）以来，斯马茨尼便一直教育自己：“要预料到出乎意料之事。”

波兰人等了一个又一个小时，而与此同时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雾仍然不散。下士乌拉代斯劳·科罗布开始神经紧张起来。“我想出发。”他记得，“站在飞机场的四周，并不是我有关杀死德国人的最佳方式的概念。”斯蒂芬·卡茨马里克中尉看着场地上集结的飞机，感到了“一种几乎令人感到疼痛的欢乐”。他也对无所事事地站在机场四周感到厌倦。他告诉他的士兵们，这次行动“是解放华沙的第二最佳选择。我们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径直走过厨房进入德国”。

但波兰人命中注定是要失望的。中午，索萨博斯基接到了新的命令。尽管飞机正在南边的机场里起飞，但在英格兰中部地区，那些基地却仍然因为天气恶劣而停飞。那天的跳伞被取消了。“这没有用，将军，”联络官乔治·史蒂文斯中校，对提出抗议的索萨博斯基这样说，“我们不能让你们出去。”攻击推迟到第二天的上午，也就是9月20日，星期三。“到时候我们

将试着在上午10点的时候出发。”他被告知。如果要把大量部队转运到南边的基地里去，时间是绝对不够用的。令索萨博斯基懊恼的是，他得知他的滑翔机补给空运已经离开了，正在前往荷兰的路上。这位将军因为不耐烦而怒不可遏。每过去一个小时，都意味着敌人的抵抗更加强大，而且第二天有可能带来更加艰难的作战———除非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索萨博斯基的滑翔机补给空运，装载着士兵、火炮和运输工具，正在飞往几乎全部被消灭的结局。第三次空运将是一场灾难。

低空飘过的云层覆盖了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整个南方路线。第三次空运的飞行方向，是美军第一○一师、美军第八十二师以及英军的空投场，这次空运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根据预计，到下午就应该晴天了。但相反，甚至就在各个编队升空的时候，条件就在恶化。一个又一个中队的战斗机被困在云层中，无法看见地面目标，因而不得不返回。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由于无法看到它们的拖曳飞机，许多滑翔机就割断缆绳，在英格兰地面紧急降落，或者降落在海峡里，整个系列行动不得不夭折，返回基地。

在确实起飞了的655架运送兵员的飞机和431架滑翔机当中，只有一半到达了空投场和着陆区域，尽管大多数运送兵员的飞机滑翔机组合能够安全地返回英格兰着陆，或者在别的地方安全着陆，但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敌人的猛烈地面炮火以及德国空军的进攻，加上恶劣的天气，却造成了大约112架滑翔机和40架运输机的损失。在原定于前往美军第一○一空降师的2310名士兵和68门大炮当中，只有1341名士兵和40门大炮到达了目的地。泰勒将军的士兵处于极大的困境，结果那40门大炮几乎一着陆便投入了战斗。

加文将军的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情况更糟。在这个时刻，对于向关键性的奈梅亨大桥发起的进攻来说，每一个伞兵都很重要，可加文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根本就没有到达。就像波兰伞兵们一样，基地也是在格兰瑟姆地区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的飞机和滑翔机，也无法起飞。更糟糕的是，在原定于要送给第八十二空降师的265吨补给品和弹药当中，只有大约40吨被收到。

在英军的防区里，厄克特不仅期待波兰人到来，而且还期待能够有一次满载货物的再次提供补给品的空降，但悲剧突然发生了。补给品空投区域已经被敌人侵占，尽管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要把承担这次任务的163架飞机引到一个新的地区———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南边空投，但是这个努力最终失败了。厄克特的士兵们什么东西都极短缺，尤其缺少弹药，他们看见，这些飞行编队穿过暴风雪式的防空炮火来到了。接着敌人的战斗机出

现了，向这些编队开火，并朝着新的补给品空投区域低空扫射。

在大约下午4点钟时，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G·A·佩尔听见有人喊：“第三次空运来了！”这位随军牧师记得，突然“声音可怕地渐渐增强了，在巨大的炮火齐射当中，连空气本身都颤动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朋友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佩尔在注视的时候，“十分痛苦，因为这些轰炸机通常是在夜间，在15000英尺的高度飞行，而现在却是在日光之下1500英尺的高度飞进来。我们看到，不止一架飞机在熊熊燃烧，然而却仍然继续在航线上飞行，直到把每一个集装箱都扔下来为止。现在，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遭遇到了可怕的抵抗。已经发出了信号，要求把补给品空投到我们司令部的附近，但几乎没有一件是空投到我们这里的。”

这些毫不动摇的飞行编队没有战斗机护航，仍顽强地飞行在航线上，把补给品投放在老的空投场里。地面上的士兵们绝望地试图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发射信号弹，点燃烟幕弹，挥舞降落伞，甚至把荒原的一些地方点着———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遭到俯冲下来的敌人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低空扫射。

许多士兵回忆说，有一架英军达科他型飞机的右边机翼着火了，飞进了现在由德国人坚守的空投场上空。中士维克托·米勒是一位在星期日第一次空运中着陆的滑翔机飞行员，他现在“忧心忡忡地看到，烈火几乎包围了机身的整个下半部分”。米勒在注视着等待机组人员跳伞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咕哝道：“跳！跳！”当飞机低空飞行的时候，米勒看见，发送员正站在门口，把集装箱推下去。他被迷住了，注视着那架着了火的达科他型飞机转了个圈，再次飞进来，而通过烟雾，他看见更多的集装箱滚落了下来。中士道格拉斯·阿特韦尔也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士兵们从他们的战壕里爬了出来，一言不发凝视着天空。“我们疲倦极了，既没有什么吃的又没有什么喝的，但在那个时刻，我只想到那架飞机。就好像它是天空中唯一的一架飞机。士兵们只是站在各自的地方，目不转睛———而那位发送员则不断地把包裹推出去。”飞行员把他燃烧着的飞机架稳，第二次缓慢地飞过。乔治·鲍威尔少校“充满了敬畏之情，因为他居然这样做。我无法让我的目光离开这架飞机。突然它不再是一架飞机了，而只是一个橘黄色的大火球”。当这架燃烧着的飞机一头栽进地里的时候，它的驾驶员31岁的空军上尉戴维·洛德仍然坐在操纵装置前。米勒朝树林的那一边望去，“只看见一个油腻的烟柱在上升，那个烟柱把一个勇敢的机组人员的长眠之处标示了出来，他们死了，为的是我们能有机会活下来”。

但米勒中士错了，在这架不幸的达科他型飞机的机组成员当中，有一位的确幸存了下来。空军中尉亨利·阿瑟·金，是这次飞行的领航员，他记得，

在差几分钟就到下午4点时，飞机接近空投场那一刻，被高射炮火打得右舷引擎着了火。洛德用对讲机说道：“每一个人都没事吗？离空投场还有多远，哈里？”金用对讲机回话：“3分钟的飞行时间。”飞机沉重地向右边倾斜，金看到，他们正在迅速失去高度。火焰开始沿着右翼朝主油箱蔓延而去。“下面的人需要这些东西，”他听见洛德说道，“我们要进去，然后再跳伞。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降落伞穿上。”

金发现了空投场，告诉了洛德。“好的，哈里，我能够看见了，”这位飞行员说道，“到后面，帮他们抬筐。”金朝后面走去，来到敞开的门前。高射炮火已经击中了用于移动沉重的补给品包裹的滚棒，发送员下士菲利普·尼克松，以及皇家陆军服务部队的3名士兵，已经在把装着弹药的8个沉重的挂篮推到门口。为了推这些挂篮，这些人已经脱下了他们的降落伞。这5个人一起把6个挂篮推了出去，这时红灯亮了，表明飞机现在已经离开了空投场。金走到对讲机那里。“戴夫”，他对洛德喊道，“我们还剩下两个挂篮。”洛德让飞机紧紧地向左边转。“我们要再回来，”他回答说，“坚持。”

金看到，他们接着来到大约500英尺的高度，洛德“就像驾驶战斗机一样驾驶着这架飞机。我努力帮助那几个皇家陆军服务部队的士兵再次穿上降落伞。绿灯闪亮了，我们把包裹推了出去。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洛德喊道：‘跳伞！跳伞！看在上帝分上，跳伞！’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我发现自己正在空中快速落下。我并不记得我拉了降落伞的开伞索，但我一定是本能地拉了。我平躺着重重地落在地上。我记得，我看了下手表，看到那只不过是我们遭到高射炮打击之后的9分钟。我的制服严重烧焦，我找不到我的鞋子。”

将近一小时之后，金偶然遇见了第十营的一个连。有人给了他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那位伞兵告诉他。金盯着他：“你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刚刚给你们空投了补给品。”那位士兵摇了摇头说：“你们是空投给了我们沙丁鱼罐头，但德国佬拿去了。”金无话可说。他想到了空军上尉洛德，想到了机组人员和士兵，他们脱下降落伞，不顾一切地努力要把珍贵的弹药包裹扔到下面焦急的部队那里去。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金还活着，而现在他刚刚得知，他的机组人员白白地做出牺牲。

在整个地区到处都有飞机坠机着陆，主要是在瓦赫宁恩和伦库姆附近。有些飞机最终在莱茵河南边坠落。中士沃尔特·辛普森记得，他听见驾驶员在对讲机上喊道：“天哪，我们被击中了！”辛普森朝外面看，看见左舷的引擎着火了。他听见引擎减速，接着飞机便俯冲了下去。吓坏了的辛普森记得：“飞机拖着它的尾巴飞过河的北岸，稍微抬高了一点，然后在水面上

弹射了过去，在河的南边着了陆。”

在与地面碰撞的时候，辛普森猛冲向前，被投掷在机身的一边。无线电操作员中士朗斯戴尔猛地向他撞去，蜷缩着身子躺在辛普森的身体上。飞机的内部变得一团糟，燃料在燃烧，辛普森能够听见火焰噼啪作响。当他试图从那位无线电操作员的下面把双腿挪动出来的时候，朗斯戴尔发出了尖叫，晕厥了过去。中士的后背折断了。辛普森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把他从紧急出口抱了出去。4位机组人员既茫然又震惊，已经在外面了。辛普森又回去，寻找还在飞机里面的其他人。他发现，投弹手失去了知觉。“他的一只鞋被炸掉了，脚后跟的一个部分掉了，两只胳膊全都折断了。”他回忆说。辛普森也把这个人抱了起来，放到飞机外面。尽管飞机现在正在熊熊燃烧，但辛普森还是第三次返回，去寻找那位工兵。工兵的一条腿折断了，他也被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德里尔村，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她的妹妹里特，以及她们的兄弟阿尔贝特，目睹辛普森的飞机落下来，三个人便立即跑到出事地点。“那是恐怖的，”科拉回忆说，“有8个人，他们中有几个人伤得可怕。我们把他们从燃烧着的飞机那里拖开，就在拖开的时候飞机爆炸了。我知道，德国人将会寻找机组人员。驾驶员是空军上尉杰弗里·利根斯，他没有受伤，我告诉他，我们将把他隐藏起来，同时把受伤的人送到村子的小诊所里。我们把他和另外两个人藏在附近的一个砖厂中，告诉他们我们天黑的时候回来。”那天晚上，科拉帮助村子里的唯一一位医生做手术，那位医生，桑德博布洛格医生是一个女人，她把投弹手的脚截掉了。战争终于来到了科拉的身边，也来到了小小的德里尔村。

总共，在100架轰炸机和63架达科他型飞机当中，有97架受到了损坏，13架被击落———而且，尽管飞行员们和机组成员们表现出了英雄主义，但厄克特受到重创的师并没有得到增强。空投下来的390吨补给品和弹药，几乎全都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据估计，只有大约21吨被盟军收到。

波兰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的空运，将陷入更为严重的问题。中士飞行员肯尼斯·特拉维斯－戴维森，是一架霍萨型滑翔机的副驾驶，在跟随着波兰人的空运离开英格兰之前，他就意识到，有关目的地的状况，信息几乎全无。路线是标在地图上了，波兰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的空投场也标出来了，但特拉维斯－戴维森说：“我们被告知，形势仍然不明。”有关着陆的唯一指示就是：“滑翔机应该在由紫色的烟雾所标明的地区着陆。”在特拉维斯－戴维森看来：“这个情况简直是荒唐的。”

然而，尽管信息欠缺，皇家空军的飞机却正确地确定了在约翰娜霍夫农场附近的空投场地点，在46架滑翔机当中，有31架抵达了该区域。当它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空中枪炮声大作。一个德国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中队，

击中了这些飞机中的许多架，把飞机薄薄的用帆布和胶合板做成的壳体打出了很多洞，打穿了吉普车的油箱，让一些吉普车着起火来。防空炮火击中了其他的飞机。而其余那些成功着地的飞机，是在一个战场当中着陆的。哈克特第四旅的伞兵们，由于正奋力从一支威胁着要打垮他们的敌军那里摆脱出来，因而无法及时到达高地以及高地另外一边的空投场，也就无法给该地区提供保护。当英国人与德国人激烈交战时，波兰人直接就在这场灾难性的战斗当中着陆了。在恐惧和混乱之中，波兰人从两边遭到了射击。滑翔机有许多已经着火了，它们要么在田野上坠落，要不就是一头撞上附近的树。波兰炮兵由于遭到交叉火力的打击而无法分清敌友，便既朝德国人还击，又朝英国人还击。然后，在匆匆把能用的吉普车和火炮卸下来之后，这些茫然的波兰人在炮火的攻击之下，离开了着陆区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地面上遭到的伤亡是轻微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知所措和感到震惊，却成了俘虏。大多数吉普车和补给品被摧毁了，在那8门极其重要的发射6磅重炮弹的反坦克炮当中，只有3门没有受损。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将军的担心被证明是有理由的，而且还远不止如此。波兰第一伞兵旅的磨难只是刚刚开始。

沿公路向南大约40英里的地方，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美军第一○一师的伞兵们此刻正在艰苦作战，以便让走廊保持畅通。但德国第十五集团军在贝斯特的猛烈防御正在消耗泰勒的兵力。越来越多的士兵陷于惨烈的交战之中，师的一位情报官苦笑地把这场交战称之为“在估计上的一个小小错误”。泰勒15英里长的防区，压力正在增大，“尖叫的老鹰”把这个防区新命名为“地狱的公路”。显而易见，现在，敌人的动机就是以贝斯特用作基地，把霍罗克斯坦克部队的先头部队切断。

集结在公路上的拥挤的车辆纵队，成为炮火容易击中的目标。推土机和坦克在马路上不断地四处开动，把车辆残骸从车队当中推出去，以便让纵队继续行进。自星期天以来，贝斯特，这个小小的次要出击目标，逐渐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以至于它可能会挫败泰勒在这段马路上的所有其他战斗。所以现在，第一○一师的师长决心要完全粉碎贝斯特的敌人。

星期二下午早些时候，在英军坦克部队的支援下，泰勒投入了几乎整个第五○二团，与冯·扎根的士兵交战。这个规模巨大的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刚刚到达的第三二七滑翔机飞行员团，以及公路上的英军装甲部队的支援下，二营和三营无情地肃清了贝斯特东边的森林地区。德国人陷于庞大的包围圈之中，不得不朝威廉明娜运河撤退，战线垮掉了。由于新的兵力投入战斗，这场一刻不停持续了将近46个小时的战斗，突然在两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泰勒的士兵获得了市场花园行动中的第一个重大胜利。300多名德军被打死了，1000多人被俘，同时还缴获了15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到下午晚些时候，”官方的历史书写道，“由于几百名德国人

投降，因而有命令传来，要把所有可用的宪兵队都派过去。”爱德华·威尔斯鲍斯基中尉，他就是在贝斯特大桥被炸掉之前差点儿把这座桥夺取下来的那个排长，在他本人首先被俘之后，现在又把他本人抓住的俘虏带了过来。由于手榴弹和弹药用光了，也由于他的周围全是伤亡人员———在他勇敢的排里面，只有3个人没有受伤———因而威尔斯鲍斯基最后投降了，他和他的士兵们被送进一家德军野战医院。现在，威尔斯鲍斯基和他的士兵们，其中有的负了伤，他们疲惫至极，浑身污垢，缴了那家德军野战医院的医生和护理员的械，返回师部，同时把他们的俘虏们也带了回来。

尽管这次交战获得了成功，但泰勒将军的困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就在贝斯特之战结束的时候，德国装甲部队就已经朝索恩刚建成的桥开赴过去，再次试图把走廊切断。泰勒亲自率领着他的司令部人员———这是他唯一可用的增援部队———匆匆赶往现场。一辆德国豹式坦克，在几乎就要到达大桥的时候，被火箭筒和反坦克炮击毁了，同样，另外几辆坦克也被迅速处理掉。德国人的进攻崩溃了，车辆继续前进，但“尖叫的老鹰”的警觉却不能放松。“我们的形势，”泰勒后来写道，“让我回想起早期美国的西部，当时在极其重要的漫长的铁路沿线任何地方，小的守备部队不得不与印第安人的突然进攻进行争斗。”

德国人的猛烈、迅速、打了就跑的战略，正在造成伤亡。在第一○一师中，接近300名士兵在地面战斗中阵亡、负伤或者失踪。在公路两边或者在贝斯特四周的田野里坚守阵地的士兵们，随时有被从两翼打垮的危险，而且每一个夜晚都带来独特的恐惧。黑暗当中，由于德国人渗透进了第一○一师的环形防线，所以谁也不知道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下一个散兵坑里的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在这些混乱而又突然的猛烈战斗中，士兵们会突然消失，当交火作战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朋友们将在战场上，在前线救护所，或者在野战医院里的死者和伤者当中寻找他们。

当贝斯特战斗结束，长长行列的俘虏被驱赶回师部的时候，31岁的参谋军士查尔斯·多恩，动身前去寻找他的长官勒格兰德·约翰逊上尉。还在英格兰的时候，跳伞之前，多恩几乎“担心得麻木”。22岁的约翰逊感觉也完全一样，他“对能否回来听天由命”。19日的上午，约翰逊把他的连投入到贝斯特附近的一次进攻之中。“不是进攻成功，就是被屠杀。”他回忆说。约翰逊记得，那场凶猛的战斗是“我所曾看见或听说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在那场战斗中，他的左肩被击中了。他的连从180人减少到了38人，又被包围在一块田地里，那里的干草垛在燃烧。约翰逊抵抗着德国人，直到前来解救的连队击退了敌人，赶来把幸存者转移出去。当约翰逊在人们的帮助下返回前线救护所的时候，又再次被击中，这一次是穿头而过。在营的救护所里，他的身体被放在受了致命伤的人当中，卫生员们称那是“死尸

堆”。在那里，在找了半天之后，军士多恩找到了他。多恩跪下身来，确信他还有一线生机。

多恩抱起这位无力活动的军官，把约翰逊和他连里的另外四位伤员放进吉普车，前往索恩的野战医院。被德国人打断的时候，多恩便把吉普车开进树林躲藏，当德国巡逻队继续前进的时候，他就再次动身。到达医院时，他发现有长长行列的伤员在等着治疗。多恩确信，约翰逊随时都会死去，于是便在成行的伤员当中走了过去，最后来到一位外科医生那里，那位医生正在检查伤员，以确定谁需要立即救助。“少校，”多恩告诉那位医生，“我的上尉需要立即治疗。”那位少校摇了摇头，说：“对不起，军士，”他告诉多恩，“我们会到他那里去的。他得排队等待。”多恩再次尝试：“少校，你如果不快点看他，他会死去的。”那位医生态度坚决。“我们这里有许多受了伤的人，”他说道。“我们一到他那里，你的上尉就会被治疗的。”多恩拔出他的45式手枪，扳起扳机。“那不会足够快，”他平静地说道，“少校，你如果不马上去看他，我就在你站着的地方一枪毙了你。”外科医生大吃一惊，盯着多恩。“把他带进来！”他说道。

在手术室里，多恩站在一边，他的45式手枪握在手中，与此同时那位医生以及一个医疗队给约翰逊做手术。在军士注视的时候，约翰逊被输了血，伤口被清洗了，一颗子弹从他的头颅中取了出来，另外一颗从他的左肩上取了出来。当手术结束，约翰逊被包扎好了之后，多恩移动了身子。他走到医生的面前，递上他的45式手枪。“好的，”他说道，“谢谢。现在你可以告发我了。”

多恩被送回第五○二团第二营。在那里，他被带到营长面前。多恩啪的一声立正。他被问道，是否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他的行为构成了应受军法审判的犯法行为。多恩回答说：“是的，长官，我意识到了。”营长踱来踱去，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军士，”他说道，“我正让你在押”———他停了下来，看了看手表———“在押整整有一分钟。”这两个人沉默地等着。然后军官看着多恩。“走吧，”他说道，“现在返回你的部队。”多恩敏捷地行了个礼。“是，长官！”他说道，于是离开了。(注)

现在，走廊上加文将军的那个防区，当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驶向奈梅亨的时候，对该城的各个渡口的迅速攻占也就具有了关键性的意义。在17日，德国人只派了几个士兵把守瓦尔河大桥的各个入口，而到了19日下午，加文估计，他遭到了5000多名党卫军精锐部队的抵抗，他们占据着良好的阵地，并得到了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支援。近卫团装甲师的主力部队仍然在前往这个城市的途中。只有英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在爱德华·H·古尔本中校的指挥下，近卫步兵第一团第一营的部队———可以用来发动进攻，而加文第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在10英里长的走廊里，因为迎击不断来犯的敌人

造成了兵力分散。加文的滑翔机步兵团的基地，设在浓雾笼罩的英格兰中部地区，没有能够起飞，由于这个原因，他只能派出一个营，与英军先头部队的坦克分队联合发起进攻。加文挑选了第五○五团的第二营，其指挥官是本·范德弗特中校。这次进攻，由于以速度和突然性为基础，也就更有成功的机会。加文认为，如果说有人能够帮助他取得成功，那个人就是生性矜持、说话柔和的范德弗特中校。注尽管如此，这次行动还是有着极大的风险。加文认为，英国人似乎低估了德国人的力量，而且确实是低估了。近卫步兵第一团的战后报告强调："据认为，只要列出坦克战阵来，大概就可以使敌人撤退。"

下午3点30分，联合进攻开始。这支部队迅速进入城市的中心，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在那里，约有40辆英军坦克和装甲车分成了两个纵队，美军部队则是或坐在坦克上，或跟随其后。在开路的坦克上面以及侦察车的里面，有12位专门挑选出来的荷兰地下组织的侦察员，由他们带路——其中就有22岁的大学生扬·范·胡夫，他后来的行为将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我不愿意使用他，"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D·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回忆说，"他似乎非常激动，但另外一位地下组织成员为他过去的行为担保。他乘坐一辆英军侦察车进了城，而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这支部队分开之后，一个纵队前往铁路桥，另外一个纵队与古尔本和范德弗特一起，走近瓦尔河上的那个主要的公路渡口。

在这两个地方，大批德国人正在等待。上士保罗·纽南记得，当他的排走近铁路桥附近的一个地下通道时，"就开始遭到狙击手的射击。由于有一千个地方可供狙击手躲藏，因而也就难以说出射击是从哪里来的"。士兵们扑倒在地，隐藏起来，之后缓慢地开始撤退。英军装甲车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坦克开始朝大桥行驶时，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近距离射击，把它们摧毁了。有一条宽阔的街道，克赖亨霍夫大街，它通向渡口西边的一个三角形公园。在那里，在三个方向面对公园的楼房里伞兵们重新组织起来，准备发动另外一次进攻。但德国人再次把他们击退。屋顶上的狙击手们，以及从一个铁路跨线桥上发射的机枪，不断地把士兵们压制在地上。

有一些伞兵记得，拉斯·帕克中尉用牙咬着一根雪茄，冲进空旷的地方，朝着屋顶扫射，把狙击手们的头压了下去。有人大声喊坦克来了，纽南记得："就在那个时刻，整个公园似乎充满了曳光的子弹，那些子弹来自我们左边，来自街道对面一个快速发射的自动武器。"纽南转向赫伯特·布法罗·博伊，博伊是苏族印第安人，注也是第八十二师一位有经验的伞兵。"我认为他们是要派一辆德国坦克来。"他说道。布法罗·博伊咧着嘴笑了说："唔，要是他们再带上步兵来，那就会是非常难对付的一天。"他告诉纽南。那辆德国坦克并没有出现，但一门口径为20毫米的反坦克炮却开火了。伞兵们用手榴弹、机枪和火箭筒继续战斗，直到命令传来，要先头

的各个排撤退，巩固所占领的阵地以便过夜。在士兵们撤出的时候，德国人放火烧了沿河的楼房，这就使得范德弗特的士兵们不可能渗透进去，攻占德军炮兵阵地并肃清进行抵抗的小股敌人。对铁路桥的进攻渐渐停止了。

在美国炮兵的猛烈炮火掩护下，第二个纵队向胡纳公园发起进攻，胡纳公园是一些装饰性的花园，通向公路大桥的各个入口。在这里，在一个环形交叉路口上，通向那座桥的所有马路会合了，而俯瞰着这个地区的，则是一个古代废墟，废墟里有一座有16边的教堂———瓦尔克霍夫教堂，它曾经是查理曼[注]的宫殿，后来又由巴尔巴罗萨[注]重建。在这个城堡里，敌人集结了起来。古尔本上校认为："德国鬼子可能多少知道我们想做什么。"他们确实知道一些。

卡尔·海因茨·奥伊林上尉的那个营，隶属于党卫军精锐装甲团，是首先在潘讷登渡过莱茵河的部队之一。奉哈梅尔将军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大桥，奥伊林于是用自行火炮包围胡纳公园地区，并把他的士兵部署在这个古老废墟中的教堂里。当英军坦克沿着通向公园的街道角落行驶时，他们遭到奥伊林的炮火轰击。坦克遭遇到齐射炮火，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撤了回来。范德弗特上校立即走上街道，命令一个迫击炮小组投入战斗，以提供掩护炮火，同时派出一个连前突。这个连的先头排在詹姆斯·J·科伊尔中尉的率领下，全速奔往一排面对着公园的附联式房屋[注]，片刻间遭到了轻武器和迫击炮的打击。副排长威廉·J·麦多夫中尉看到，这是"观测射击[注]，大炮和狙击手是由无线电指挥的。英军坦克在我们的前面掩护，同时，科伊尔中尉进入了能够俯瞰敌人整个阵地的一个街区建筑。别的排受阻，无法移动，形势显得十分恶劣"。

在英军烟雾弹的掩护下，麦多夫成功地带着连里的其他人前进，而连长J·J·史密斯中尉，则让他的士兵在科伊尔周围的房屋里巩固阵地。麦多夫回忆说："科伊尔的排现在可以完全看清敌人，但当我们开始把坦克向前开的时候，一些高速大炮开火了，而在此之前它们还没有开过火。有两辆坦克被摧毁了，别的坦克撤了下来。"当科伊尔的部下用机枪还击时，立即便把街道对面的反坦克炮火吸引了过来。天黑下来的时候，奥伊林的党卫军们试图渗透进美国人的阵地。有一组党卫军来到距离科伊尔的排只有几英尺的地方，他们被发现了，于是爆发了一场猛烈的交火。科伊尔的士兵有伤亡，有3个德国人被打死。后来，奥伊林派了卫生员把他的伤员带回去，而科伊尔的伞兵们则等待着，在受伤的德国人撤出之后再重新开始交战。交战当中，一等兵约翰·凯勒听见一种低沉的连续重击声。他来到窗前，吃惊地看到有一个荷兰人站在活动梯上，正在替换隔壁房子上的木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夜晚晚些时候，由于轻武器的射击仍在继续，因而进军的进一步尝试就推迟到了白天。英美联军的进攻，在距离瓦尔河大桥不到400码的地方戛然而止———而这正是前往阿纳姆的马路上的最后一道水上障碍。

在盟军的指挥官们看来，很清楚，德国人正在控制着各座大桥。布朗宁担心这些渡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于是在19日晚些时候召集了一次会议。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渡过那条400码宽的瓦尔河。加文将军曾经设计出了一个计划，在两军会合时向布朗宁提及过，当时这位军长曾经拒绝了这个方案。在这第二次会议上，加文再次提出了。“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夺取这座桥梁，”他对聚集在一起的军官们说，“我们得同时夺取它———从两边同时夺取。”加文敦促，“霍罗克斯工兵纵队的任何一条船，都应该立即快速送到前面，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英国人看着他，大惑不解。这位第八十二师师长脑子里想的，是突袭过河———用伞兵过河。

加文继续进行解释。在近三天的作战中，他的伤亡率是很高的———约200人死亡，700人受伤，还有几百个人失去了联系，或者是分散在各处，因而被列为失踪人员。加文分析说，如果生硬的正面进攻还要继续的话，他的损失将会越来越严重。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迅速而又廉价地夺取大桥的手段。加文的计划是，投入一支部队，在下游1英里处乘船过河，而与此同时，继续进攻，以便夺取大桥南边的各个入口。在坦克炮火齐射的掩护下，在德国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伞兵们将突然袭击河北边的敌军防御阵地。

然而完全的突然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条河太宽了，无法使整船的士兵不被发现，而且对面的河岸没有遮蔽，伞兵们一旦过了河，将不得不走过一段200码的平地。在更远的地方是一个堤岸，德国的枪手可以从那里居高临下向进攻的伞兵射击。而那个防御阵地也得夺下来。在加文看来，尽管可以预料会有重大伤亡，但与继续单独对南边的入口发起进攻相比，伤亡仍然要少得多。“如果市场花园行动想要获得成功，”他告诉布朗宁，“必须进行这个尝试。”

英军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乔治·S·查特顿上校记得，除了布朗宁和霍罗克斯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爱尔兰近卫团、苏格兰近卫团以及近卫步兵第一团的指挥官。嚼着雪茄的鲁本·H·塔克上校也出席了会议，塔克是第八十二师第五○四团的团长，加文选中了他的团，如果计划被批准的话，就由他的团进行这次渡河突袭。查特顿尽管专注地听加文讲话，却也注意到了聚集在一起的这些人之间的不同。“一位准将穿着仿麂皮的鞋子，坐在一个折叠座手杖上注，”他回忆说。“三位近卫团的团长穿着相当破旧的灯芯绒裤子，高帮皮靴，戴着在学校里用的旧长围巾。”查特顿想：“他们心情轻松，好像是在讨论一次演习似的，我不能不把他们与在场的美国人进行

比较，尤其是与塔克上校进行比较，塔克戴着一顶几乎把他的脸盖住的头盔。手枪放在他左胳膊下面的手枪皮套里，大腿上还用皮带扣着一把匕首。”让查特顿大为吃惊的是，“塔克偶尔咬下一块足够长的雪茄，再把它吐出来，而每次他这样做的时候，隐约的惊讶表情就闪现在那些近卫团的军官们脸上。”

但真正令人感到吃惊的，却是加文计划的大胆。“我知道，它听起来是另类的，”加文回忆说，“但速度是绝对重要的，甚至都没有时间进行侦察。当我继续谈下去时，塔克是屋子里唯一一位似乎不惊慌失措的人。他曾经在安齐奥[注]登陆，知道应该期待什么。对他来说，这个渡河就像第五○四团在布雷格堡[注]做过的那种演习。”尽管如此，这对伞兵们来说还是非正统的。布朗宁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回忆说，军长“现在对这个主意的大胆充满了敬意”。这一次，布朗宁批准了。

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船。霍罗克斯与他的工兵们进行了核对，得知他们携带了大约28条小帆布和胶合板船，这些船将在夜间匆匆送到奈梅亨。如果计划的制定能够及时完成，那么加文对瓦尔河所进行的微型诺曼底式的水陆两栖进攻，就将在第二天，也就是20日的下午1点开始。伞兵们以前从未尝试过这样的作战行动，但加文的计划却似乎提供了完好无损夺取奈梅亨大桥的最好希望。而每个人都认为，紧接着走廊上的另外一次迅速冲刺，将会把他们与阿纳姆的士兵会合起来。

在长满草的宽阔的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上，海因茨·哈梅尔将军亲自指挥，开始对桥上的弗罗斯特的士兵进行轰炸。他曾试图说服弗罗斯特投降，但是失败了。现在，对集合起来的坦克部队和炮兵的指挥官们，他的指示是明确的：他们要把伞兵们所坚守的每一座建筑物夷为平地。“既然英国人不从他们的洞里出来，我们就把他们炸出来。”哈梅尔说道，他告诉炮手们，“就在山墙的底下瞄准，一米一米地射击，一层一层地射击，一直到每一幢房子都倒塌为止。”哈梅尔决心已定，围困应该结束，既然别的做法已经失败了，那么这就是唯一的做法。“等我们结束的时候，”哈梅尔补充说，“除了一堆砖瓦之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哈梅尔在两门大炮之间平躺在地上，对准英军的据点校准他的双筒望远镜，指导开火。当头一炮对准目标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感到很满意，然后把望远镜交给他手下的军官。“我倒是想待在这里，”他回忆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作战经历。但由于英美联军正在进攻奈梅亨的那些桥，我不得不匆匆赶到那里。”哈梅尔离开之后，他的炮手们，以有条不紊、镰刀割草似的精确性，开始了那项把弗罗斯特剩余的阵地化为瓦砾的工作。

在第二营起初所占领的18座楼房当中，弗罗斯特的士兵现在只坚守着大约10座。坦克从东边和西边打击阵地，与此同时火炮把炮弹猛地投掷进那些

面对北边的阵地。火炮的齐射是冷酷无情的。“那是我所曾见过的最佳的、最有效的炮火，”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的列兵霍斯特·韦贝尔回忆说，“从屋顶开始，楼房就像玩具房屋一样倒塌。我看不出，有谁还能从这个火海中活着出来。我真的替这些英国人感到遗憾。”

韦贝尔看到，3辆虎式坦克缓慢驶向格鲁特市场，在机枪向大桥北入口一个建筑群的每一扇窗户扫射时，坦克“向每一栋房子打出一发又一发的炮弹”。他记得，在角落里有一座楼房，“它的屋顶落了进去，上面的两层开始倾颓，然后，就像皮肤从骨骼上脱落一样，前面的整堵墙落进了街道，把每一层都暴露了出来，英国人在那里拼命地爬”。韦贝尔记得，灰尘和瓦砾“很快就使人不可能再看见任何东西了。嘈杂声是可怕的，但即使如此，在嘈杂声之上我们也能听见伤员的尖叫”。

坦克轮番上阵，摧毁了莱茵河滨水区的房屋，以及在大桥本身下面的房屋。往往当英国人猛冲出来的时候，坦克就像推土机一样猛撞废墟，把那些地点完全夷平。在坡道的下面，在那座几乎被摧毁的校舍里的麦凯上尉司令部里，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估计，“高爆炮弹以每10秒钟一发的速度，射进大楼的南墙”。墙变得“相当热”，他回忆，“每一个人都多少受了伤。”然而伞兵们顽强地坚持着，“在天花板塌落，墙上出现断裂，房间变得不堪一击的时候”，便依次从那些房间里撤离。斯坦福斯骄傲地回忆说，在瓦砾之中，“红毛鬼子”们弹无虚发，“就像鼹鼠一样幸存了下来。德国兵就是无法把我们挖出来”。但在别的地方，士兵们发现，他们的阵地几乎让他们无法忍受。“德国人决定要把我们轰炸致死，”列兵詹姆斯·W·西姆斯解释说，“似乎让炮轰和迫击炮的炮击变得更重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是变得更重了。一个爆炸接着一个爆炸，一枚又一枚炮弹像雨点一样飞来，各自的爆炸汇合成为一个持续的滚动爆炸。”随着火炮的每一次齐射，西姆斯都重复着一个绝望的连续祈祷：“坚持！坚持！它不会持续多久的。”当他在狭长掩体里面独自蹲伏的时候，西姆斯闪过一个念头，他是“躺在一个刚刚挖好的坟墓里，正等着被活埋”。他记得，他当时想：“要是第三十军不赶快，我们就完了。”

弗罗斯特上校意识到，灾难终于降临在第二营身上了。前来救援的各个营还没有突破，弗罗斯特确信，他们再也不能来帮助他了。波兰人的空投没有实现。弹药几乎用尽。伤亡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每一个可用的地下室都人满为患，而且士兵们已经一刻不停地作战50多个小时了。弗罗斯特知道，他们不能更久地忍受这个惩罚了。在他的环形防线的各处，房屋在燃烧，楼房倒塌，阵地正在被侵占。他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他所珍爱的第二营，正在被埋在他周围的楼房废墟里。然而弗罗斯特并不准备帮敌人的忙。他绝望了，但决心直到最后也不让德国人得到阿纳姆大桥。

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情感。磨难对士兵们的影响，似乎就像对弗罗斯

特的影响一样。伞兵们共用弹药，从伤员那里所能找到的那点弹药，为正在吞没他们的那个末日做好了准备。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们害怕了。士兵们疲惫不堪，饥饿，疼痛，他们似乎对自己以及形势产生了一种幽默感，随着牺牲越来越明显，那种幽默感也就越来越增强。

伊根神父记得，他碰见弗罗斯特从厕所里出来。“上校的脸———疲倦，满是污垢，满脸胡茬儿———带着微笑明亮了起来，”伊根回忆说，“‘神父，’他告诉我，‘窗户粉碎了，墙上有洞，屋顶不见了。但它有一个链条，还在起作用。’”

后来，伊根试图穿过一条街道，去看望地下室里的伤员。这个地区遭到迫击炮的猛烈轰击，牧师尽可能地隐蔽着行走。“外面有一个人正在漫不经心地在街上溜达，此人是迪格比·泰瑟姆 - 沃特少校，最初就是他的那个连攻占的大桥，”他回忆说，“少校看见我畏缩不前，便走了过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雨伞。”伊根回忆说，泰瑟姆 - 沃特“打开雨伞，撑在我的头上。到处都有迫击炮炮弹雨点般落下，他说道：‘跟我来，神父。’”当伊根表现出不愿意的时候，泰瑟姆 - 沃特安慰了他。“不要担心，”他说道，“我有雨伞。”此后不久，帕特里克·巴尼特中尉碰巧遇见了这位令人敬畏的少校。巴尼特正在快速跑过街道，前往弗罗斯特命令他去坚守的一个新防御地区。泰瑟姆 - 沃特在护送伊根神父之后回来，又出去访问他缩小了的环形防线里的士兵，头上还撑着那把伞。巴尼特大吃一惊，于是便在途中停了下来。“那把伞对你不会有多少用处的。”他告诉少校。泰瑟姆 - 沃特佯装惊讶，看着他。“噢，天啊，帕特”(注)，他说道，“要是下雨了该怎么办呢？”

下午，轰炸继续进行，弗雷迪·高夫少校看见，泰瑟姆 - 沃特手里拿着伞，率领着他的连。坦克正隆隆行驶在街上，到处开火。“当看见那些庞大的马克Ⅳ型坦克几乎是近距离朝我们射击的时候，我几乎昏厥过去。”高夫回忆说。然后，这种紧张突然得到了缓解。“在那里，就在街道上，是泰瑟姆 - 沃特，正率领着他的士兵，端着刺刀，朝一些已经渗透过来的德国人冲去，”高夫回忆说，“他不知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一顶旧的圆顶礼帽，当他向前冲去时，还转动着那把破雨伞，那个样子活像查理·卓别林。”

还有一些别的幽默时刻，也同样令人难忘。在那个下午缓慢地过去的时候，营司令部受到猛烈轰炸，着了火。伊根神父下楼去地下室看望伤员。“唔，神父，”中士杰克·斯普拉特说道，斯普拉特被认为是营里的喜剧演员，“他们把不管什么东西都扔给我们，就是没有扔给我们厨灶。”他这话还没有说完，大楼又再次被直接击中。“天花板落了进来，给我们来了一场泥土和灰泥的淋浴。当我们又站起身来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正好有一个厨灶。”斯普拉特看着那个厨灶，摇了摇头。“我知道那些杂种就在附

近，”他说道，“但我认为他们听不见我们说话。”

将近傍晚时，天开始下雨了，德国人的进攻似乎也加强了。在大桥另外一边的麦凯上尉，打电话与弗罗斯特进行了联系。“我告诉上校，如果进攻在同样的规模上继续，我无法再坚持一个晚上，”麦凯写道，“他说他不能帮助我，但要我不惜一切代价坚持。”

麦凯能够看出，德国人正在慢慢地压缩弗罗斯特的兵力。他看见，英国伞兵正从河岸边燃烧着的房子里出来，朝几乎就在他对面的两幢房子急速跑去，那两幢房子还没有倒塌。“他们开始把我们团团包围，”他注意到，“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就得到帮助，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出去。我爬上阁楼，把无线电调到6点钟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播音员说，英军装甲部队已经到达了空降部队那里。”[注]

几乎立即，麦凯便听到下面一层的叫声。“虎式坦克正在开往大桥。”（这正好是德国时间下午7点，英国时间下午6点。）两辆这种60吨重的巨型坦克正从北边开进来。在大桥另一边的弗罗斯特，也看见了那两辆坦克。“在傍晚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它们显得难以置信的邪恶，”他着重提到，“它们就像一些史前的怪物一样，因为他们的巨大火炮从一边向另外一边旋转着，吐出烈火来。它们的炮弹穿过墙壁。随着爆炸而来的尘土和缓慢落下的瓦砾充满了过道和房间。”

麦凯所在大楼的整整的一边被击中了。“一些炮弹一定是穿甲弹，”彼得·斯坦福斯中尉说道，“因为它们从学校的一边穿透到另外一边，在每个房间里都打出了一个四英尺大的洞。”天花板掉了下来，墙出现了裂缝，而且“整个结构摇晃了”。麦凯盯着坡道上的那两辆坦克，心中想，结局来到了。“再来上这么两轮，我们就要被报销了。”他说道。但麦凯仍然认为，以那种自从他们到达以来所表现出的顽强和无畏的抵抗，他仍然可能“带着一队人出去，把它们炸掉。但就在这个时候，那两辆坦克倒车，撤回去了。我们还活着”。

在弗罗斯特的司令部里，伊根神父被击中了。炮弹开始打进来的时候，他在一段楼梯上进退两难，结果摔下了两段楼梯，倒在一楼。当他苏醒过来时，还有另外一个人，牧师不是孤独一人。伊根爬到那人的面前，看到那位伞兵快要死了。这时，另外一次炮火齐射击中了大楼，伊根再次失去了知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间和他的衣服都着火了，他绝望地在地板上滚动着，用双手把火打灭。他先前看见的那位伤员死去了。现在伊根无法使用他的双腿，在剧烈的疼痛之中，他慢慢地拖拉着身子朝窗户走去。有人喊他的名字，情报军官布基·布坎南中尉帮助他爬出窗户，让中士杰克·斯普拉特把他接住。在地下室里，詹姆斯·洛根医生正在工作，牧师与其他

伤员一起被放在地板上。他的右腿断了，他的后背和双手布满了细小的炮弹碎片。“我幸亏多少是置身事外”[注]，伊根回忆说，“我现在除了趴着身子，做不了多少事情了。”不远处，就是那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泰瑟姆 - 沃特，他负了轻伤，仍然试图给大家打气，仍然紧紧抓住他的那把伞。

偶尔在那种可怕的轰击中有一个停顿，麦凯上尉认为，那是德国人在装填弹药。在一次这样的间隔中，黑暗降临了，这时麦凯给疲倦的士兵们发放安非他明药片[注]，一个人两片。它对疲惫不堪而又精神不振的人产生的效果，是难以预料而又剧烈的。有些伞兵变得易怒且好争吵，还有的人产生了复视[注]，一时间无法瞄准。在那些受惊和负伤的人当中，有些人极其兴奋，还有的人开始产生幻觉。下士阿瑟·亨迪记得，有一个伞兵拽着他，把他推到窗前。“看，”他小声命令亨迪，“那是第二集团军！在对面的河岸上。看！你看见他们了吗？”亨迪悲伤地摇了摇头。那个人勃然大怒。“他们就在那里，”他喊道，“一清二楚。”

麦凯不知道，他小小的兵力能否活过这个夜晚。疲惫和伤病正在带来伤亡。“我在清楚地思考，”麦凯记得，“但我们没有吃的东西，也没有睡觉。我们每天限喝一杯水，而且每个人都受伤了。”由于弹药几乎用尽，于是麦凯让士兵用还剩下的少量备用炸药来自制炸弹。他打算在德国人的坦克返回时，做好一切准备。麦凯现在点了一下人数，向弗罗斯特报告说，他只有13名有能力作战的人。

在9月19日星期二的晚上，从大桥对面的阵地里，弗罗斯特看到，整个城市似乎都在燃烧。两个大教堂的塔尖正在猛烈燃烧，当弗罗斯特注视的时候，“挂在两个可爱的塔楼之间的那个十字架，在升到天空的烟雾的映衬下露出了轮廓”。他注意到，“燃烧着的木头发出的噼啪声，以及倒塌的建筑物发出的回声，似乎是怪异的”。在楼上，通信兵斯坦利·科普利坐在无线电设备面前，已经不再用莫尔斯电码发报了。现在他正在用明码发报。他不断地重复：“这是第一伞兵旅在呼叫第二集团军……来吧，第二集团军……来吧，第二集团军。”

在位于奥斯特贝克镇哈滕施泰因旅馆里的司令部里，厄克特将军拼命试图拯救他的剩余人员。弗罗斯特被切断了。每一个要到桥上与他会合的尝试，都被冷酷无情地击退了。德国的增援部队正在大量拥来。从西边、北边和东边，比特里希的部队正在持续把勇敢的英军第一空降师切成碎片。“红毛鬼子”们寒冷，潮湿，疲惫不堪，但仍然毫无怨言，他们在努力坚持用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击退坦克。对厄克特来说，形势是令人心碎的。只有迅速的行动才能拯救他勇敢的士兵。到9月20日，星期三上午的时候，厄克特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可以拯救他麾下的剩余人员，而且也许能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扭转形势。

9月19日———用厄克特的话来说是“一个黑暗而又灾难性的一天”———成为转折点。他所希望的能够灌输出来的那种凝聚力和魄力，来得太晚了。一切都失败了：波兰军队没有到来；货物空投成了一场灾难；而各个营在试图到达弗罗斯特那里的时候被摧毁了。这个师越来越被推向毁灭。对厄克特剩余人员的人数统计，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在19日的整个夜晚，与师司令部仍然有联系的各个营汇报了他们的兵力。尽管那些数字是非结论性的，不精确的，但它们仍然展现出了一个恐怖的结局：厄克特的师正处于消失的边缘。

在拉思伯里的第一伞兵旅当中，只有弗罗斯特的部队是作为一个协调的单位在作战，但厄克特并不知道第二营还剩下多少人。菲奇的第三营列出的单子，是大约50人，而且营长也阵亡了。多比的第一营总共剩下116人，多比本人负伤被俘。第十一营的兵力减少到150人，南斯塔福德郡团第二营减少到100人。这两个营的营长利和麦卡迪，都受伤了。在哈克特的第10营，现在有250人，而他的第一五六营，汇报说是270人。尽管厄克特师的总兵力要更多一些———上述数字并没有包括别的单位，比如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一个营、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第七工兵营、侦察和服务部队、滑翔机飞行员团，以及其他人———但他的进攻营却几乎不复存在。这些骄傲的部队的士兵们，现在分散成小组，茫然、震惊而且往往没有领导人。

作战是如此血腥，如此可怕，甚至连久经战斗锻炼的老兵也崩溃了。厄克特和他的参谋长意识到，一种惶恐的气氛渗透进了司令部，当时几个小组的掉队的人从草坪上跑过，喊叫着：“德国人来了。”往往，他们是年轻的士兵。“其自我控制暂时抛弃了他们，”厄克特后来写道，“我和麦肯齐不得不动手干预他们。”但别的士兵却是面对着可怕的困难在继续战斗。L·E·奎里佩尔上尉，面部和双臂都负了伤，仍然率领部下对德国人的一个双人机枪掩体发起了进攻，杀死了机枪手。当别的德国人投掷手榴弹，开始包围奎里佩尔一行人的时候，奎里佩尔把那些“木柄手榴弹”又掷了回去。这位军官命令士兵们离开他，他掩护他们撤退，继续投掷手榴弹，直到最后战死。注

现在，厄克特受到重创、受伤流血的剩余人员正在受到挤压，被赶回来。所有的马路似乎都在奥斯特贝克地区到达了尽头，他的部队主力以哈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分布在方圆几英里的地方，在西边是赫维多普村与沃尔夫黑策村之间，东边是从奥斯特贝克镇与约翰娜霍夫农场之间。厄克特计划在那个大致的走廊之内采取守势，该走廊到位于赫维多普村的莱茵河为止。他希望，通过把部队撤进来，就能够妥善使用他的兵力，坚持下去，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来到。

在19日的整个夜晚，都有命令要求部队撤退进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而在20日凌晨的时候，哈克特被告知，要他放弃第十营与第一五六营朝阿纳姆大桥发起进攻的计划，并且也要他们脱离战斗。“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做出的决定，”厄克特后来说道，“这意味着要放弃仍在大桥上的第二营，但我又知道，要到达他们那里，就像要到达柏林一样几乎没有可能。”在他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巩固阵地，形成一个防御性的矩阵(注)，并且努力控制住河北边一个小的桥头阵地，这样第三十军就能渡河来到我们这里。”

对赫维多普村与德里尔村之间运行的那个渡口的发现，是促使厄克特做出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他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计划来说，那个渡口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从理论上讲，通过那个渡口，援军可以从南岸到达。除此之外，在渡口两岸的码头上有一些坡道，将有助于工兵建起一座横跨莱茵河的贝利桥。不可否认，困难是巨大的。但如果奈梅亨大桥能够迅速夺取，如果霍罗克斯进军迅速，如果厄克特的士兵能够在他们的环形防线里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工兵在河上建起桥来———那是数量众多的“如果”———的话，那么仍然还有机会，让蒙哥马利得以在莱茵河对岸建起桥头阵地，并且向鲁尔河地区发起大规模强攻，即使弗罗斯特可能在阿纳姆被打垮。

在19日，从早到晚，厄克特的司令部都在不停地发电报，要求给波兰人一个新的空投场。通信手段虽然仍不稳定，但也略微有了改善。鬼怪式通信网的内维尔·海中尉，正在把一些电报送给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部，司令部又相应地把它们转给了布朗宁。20日的凌晨3点，厄克特收到军部的一份电报，要这位将军就波兰人的空投场提出建议。在厄克特看来，只剩下一个可能的地区。鉴于他的新计划，他要求那个有1500名兵力的空降旅，应该在小小的德里尔村渡口的南端附近着陆。

放弃弗罗斯特和他的士兵，是这个计划最使人痛苦的部分。在星期三上午8点钟时，厄克特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个立场向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和高夫进行解释。高夫使用芒福德与汤普森之间的无线电中继线，给师司令部打电话，与厄克特接通了。这是自17日以来，高夫第一次与将军取得联系，17日那天他奉命返回师部，结果发现厄克特却在行军路线的某个地方。“天啊，”厄克特说道，“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高夫简述了桥上的形势。“士气仍然高涨，”他记得他当时这样说，“但我们什么都缺。尽管如此，我们将继续坚持。”厄克特记得，接着“高夫问，他们能否得到增援部队”。

做出回答是不容易的。“我告诉他，”厄克特回忆说，“究竟是我向他们靠拢，还是他们向我们靠拢，我没有把握。恐怕你只能希望从南边得到救

援。”弗罗斯特接着来听电话了。“听见将军说话非常让人感到安慰，”弗罗斯特写道，“但他却无法告诉我任何真正鼓舞人的事情……他们自己显然也有巨大的困难。”厄克特“对他们所做出的良好努力表示个人的祝贺”，要求“把我的个人祝贺传达给每一个相关的人，我祝他们好运”。别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20分钟后，厄克特接到了从内维尔·海中尉的鬼怪式通信网发来的电报。电报说：

200820（发自第二集团军）。对奈梅亨发动的进攻被该城南边的据点阻挡。近卫团第五旅在前往该市途中。大桥完好，但被敌人占据。打算今天13时发起进攻。

厄克特立即告诉他的参谋们，通知所有部队。这是他今天得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可叹的是，厄克特有一支杰出的部队可以支配，这支部队的贡献倘若被接受的话，本来可能大大改变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严酷形势。在整个被占领的欧洲，荷兰抵抗力量当属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纪律的地下组织。在美军第一○一师和第八十二师的防区，荷兰人正在与美国伞兵并肩作战。泰勒将军和加文将军在着陆时所下达的最早的命令当中，就有把武器和炸药发放给地下小组的内容。但在阿纳姆，英国人却实际上对这些生机勃勃而又勇敢不屈的平民们的存在视而不见。阿纳姆的地下小组武装了起来，摆好了架势要立即给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提供帮助，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冷落，他们的帮助也遭到婉言拒绝。经过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之后，只有一个人曾经拥有权力可以进行协调，把抵抗力量融入英军的进攻中，而这个人也死了。希拉里·巴洛中校，曾经受到厄克特的委派，去协调西郊各个营摇摇欲坠的进攻，但这位军官在能够把他本人的使命充分执行之前，就阵亡了。

在最初的计划中，巴洛定于一旦战斗结束，便承担起阿纳姆的城镇警备长官和军政府长官的角色。他的助手兼海尔德兰省的荷兰代表，也已经被任命了，那人便是荷兰海军的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少校。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一个英国与荷兰的联合情报委员会便把绝密名单交给了巴洛，名单上列出的是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据悉他们是完全可靠的。“根据这些名单，”沃尔特斯回忆说，“巴洛和我将要对这些小组进行筛选，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来使用他们，情报、破坏、作战等。巴洛是知道我们真正任务是什么的唯一一个人。当他消失的时候，计划也就崩溃了。”在师司令部里，沃尔特斯被认为不是民政事务官员就是情报军官，当把那些秘密名单提交出来并提出建议的时候，他遭到了怀疑。“巴洛完全信任我，”沃尔特斯说道，“我很遗憾，司令部里的其他人并非如此。”

随着巴洛的死亡，沃尔特斯的手被束缚住了。“英国人感到纳闷，一个荷兰海军的人，居然和他们在一起，”他记得。逐渐地，他获得了有限的接受，尽管有些抵抗力量的成员被安排去工作，但他们人数太少，并且他们的帮助也来得太晚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把每一个人都核对得让司令部满意，”沃尔特斯说道，“而且那里的态度纯粹就是：‘我们能够相信谁呢？’”把阿纳姆地区的地下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委派任务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在英格兰，20日早晨快7点的时候，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得知，他的空投场换了地方。这个波兰旅现在将在距离原先地点几英里之外的一个地区着陆，在德里尔村附近着陆。他的联络官乔治·史蒂文斯中校带来的消息让索萨博斯基瞠目结舌。这个旅已经在机场里了，定于三个小时之后前往荷兰。在这三个小时里，索萨博斯基不得不针对他以前从未研究过的地区，重新设计他的进攻。先前的那些日子，都用在为阿纳姆大桥南入口埃尔顿村附近的空投制订计划上了。他后来回忆说，现在，“给我的仅是一个方案的骨架而已，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制订计划”。

有关阿纳姆的消息仍然少得可怜，不过当史蒂文斯向他简介这个新的计划———在德里尔 - 赫维多普村渡口，把他的部队摆渡过莱茵河———的时候，索萨博斯基明白，厄克特的形势变得糟糕了。他预见到了无数的问题，但他也注意到，“别的人似乎都不十分担心。史蒂文斯所得知的一切，其情形相当令人困惑”。索萨博斯基迅速把这个新的进展告诉他的参谋部，同时又把起飞从上午10点推迟到下午1点。他需要这个时间使他的伞兵重新适应新的形势，并制订新的进攻计划，而且这三个小时的延误，也可能使史蒂文斯获得有关阿纳姆的更新的信息。不管怎么说，索萨博斯基都怀疑他的部队能否在上午10点的时候飞出去。雾再次覆盖了英格兰中部地区，而且天气预报也不让人放心。“天气以及我们所收到的信息的不充分，使我非常焦虑，”索萨博斯基回忆说，“我不认为厄克特的行动进展顺利。我开始相信，我们可能是空投进入荷兰，结果却增加了失败。”

9



在阿纳姆大桥上，为数甚少的勇士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磅礴的藐视，几告终了。黎明时分，德国人再次进行了恐怖的轰炸。在清晨的光线中，那些曾经是房屋和办公楼的坑坑洼洼的荒凉废墟，又一次遭受到沉重的炮火轰击。在大桥的每一边，以及在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两侧被损毁搅动起来的废墟里，那些尚存的区区几个据点，正在被有条不紊地炸掉。那条曾经保护过大桥北入口的半圆形防线，几乎不复存在了。然而，虽然被火焰包

围，用碎石瓦砾做掩护，顽强的士兵们却分成小组继续战斗，不让德国人夺取大桥。

只是天生的那种勇气，才让弗罗斯特的士兵们支持到现在，阻挡住德国人达三天两夜，已经是足够凶猛也足够坚持不懈了。第二营，以及从别的部队三三两两加入到这支部队的士兵，（按照弗罗斯特的最高估计，这支兵力总数从来也没有超过六七百人）在他们的磨难中团结起来。骄傲和共同的目标把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们独自到达了一整个空降师的出击目标———而且坚持的时间，超出了这个师所本应坚持的时间。在那些绝望、焦虑的分分秒秒里，在等待根本就没有来到的援兵时，他们的共同心态，也许在一等兵戈登·斯派塞的想法中最好地总结出来了，他写道："是谁没有尽职尽责？不是我们！"

但现在，他们的忍耐几乎走到了尽头。这些"红毛鬼子"们躲避在废墟里和狭长掩体里，努力保护他们自己以及满是伤员的地下室，几乎一刻不停的敌人炮火使他们休克、脑震荡。他们扎着肮脏的血污的绷带，却又摆出一副狂妄的架势，好像是佩戴着荣誉徽章似的。他们终于知道，他们再也顶不住了。

这个发现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平静，完全没有了惊恐。就好像士兵们私下里决定，他们将战斗到结束———只要能够更多地激怒德国人就行。尽管他们知道，战斗几乎结束了，但士兵们仍然发明了一些新的方式，以使得战斗继续下去。迫击炮排的伞兵们把最后几枚炮弹发射了出去，发射的时候没有用三脚架，也没有用底座板，而是把炮筒抬起来，用绳子拴住。另外的人，他们发现，那些用弹簧承载的步兵反坦克炮导弹发射器，雷管已经用完了，于是他们尝试用火柴盒做成的导火索来引爆炸弹。在他们的周围，到处都有朋友躺在那里，死去了或者正在死去，但他们仍然找到了抵抗的意志，而且在找到抵抗意志的时候，还经常彼此逗乐。士兵们记得，有一位爱尔兰伞兵被一枚炮弹的爆炸震得失去了知觉，在终于睁开眼睛的时候，说道："我死了。"然后，他想了一下，又说道，"我不可能死。我在说话呢。"

在那个应该成为他们胜利行军的开端的星期天，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的猎号曾经把他们召唤到他那里，在弗罗斯特看来，他们将永远不会被打败。然而现在，这个黑暗而具有悲剧性的星期三，他知道，"实际上没有得到解救的可能性了"。

仍然能够进行战斗的士兵，充其量只有150到200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坡道西边被损坏的司令部大楼四周。超过300名的英国和德国伤员充满了地下室。"他们几乎是挤在彼此的上面，"弗罗斯特着重提到，"这使得医生和卫生员难以绕过去照料他们。"很快他将不得不就这些伤员做出决定。司

令部大楼几乎一定要被再次击中，弗罗斯特告诉弗雷迪·高夫少校，如果大楼被再次击中的话，那么他“看不出，我将怎么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出去，而让我们的伤员被烧死”。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措施，要在大楼被炸毁或者攻占之前，把伤员运送出去。弗罗斯特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却仍然相信他能够控制那些大桥入口一段时间，甚至能再控制上24个小时。但他的环形防线现在非常虚弱，他知道，“敌人如果抱定决心突袭的话，就能进入我们当中”。

在坡道的麦凯上尉一边，麦凯心中想，那座被摧毁的校舍“就像一个筛子”。麦凯后来回忆说：“我们孤零零的。东边的房屋全都被烧倒了，没有被烧倒的是南边那一座房子，那座房子是德国人占据着的。”而在校舍里，一个恐怖又加在另外一个恐怖的上面。“士兵们极其疲惫，而且肮脏，”麦凯写道，“每当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会反胃。他们面容憔悴，眼睛充血，有红眼圈，几乎每一个人都包扎着肮脏的绷带，到处都是血。”麦凯着重提到，当伤员被从楼梯上抬进地下室的时候，“在每一个楼梯平台上，鲜血都形成了水洼，像涓涓细流一样沿着楼梯流下。”他的剩余的13名士兵，“三三两两挤作一团，把守着阵地，而那些阵地实际上应该由两倍以上的兵力把守。唯一干净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武器。”在校舍遭到炮轰的时候，麦凯和他的士兵们，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击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在四周留下了人数是他们四倍的死亡的敌人。

上午慢慢过去的时候，作战在继续。然后，中午时分，这个顽强地藐视德国人的人受伤了。弗罗斯特记得，当他与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会面，讨论要派出一支作战巡逻队去清理这个地区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爆炸把他抛了起来，把他脸朝下扔在几码远的地方。一枚迫击炮炮弹几乎就在两个人的中间爆炸了。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人都活着，但弹片嵌进了弗罗斯特的左脚踝和右胫骨，而克劳利则是双腿和右臂被击中。弗罗斯特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耻辱，因为他未能“抵抗住那些似乎强行从我身上发出的呻吟声，尤其是因为道格(注)根本就一声不吭”而感到耻辱。弗罗斯特的勤务兵威克斯把这两位军官拽到掩蔽处，担架兵把他们连同其他的伤员一起抬进地下室。

在拥挤的地下室里，伊根神父试图使自己适应环境。在这个寒冷房间的昏暗隐秘处，那位早些时候曾帮忙把伊根救出来的情报军官布基·布坎南中尉，样子好像是筋疲力尽地倚靠着墙站立着。但布坎南已经死去了，炸弹爆炸的冲击波把他当场杀死，而没有留下痕迹。然后，恍惚而又仍然震惊的伊根看见弗罗斯特被抬了进来。“我记得他的脸，”伊根说道，“他显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地下室里的其他伤员，也看见了他们的营长。约翰·布伦特中尉是死去的布坎南的朋友，在布伦特看来，上校躺在担架上面的景象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这些下级始终认为，他是压制不住

的，”布伦特写道，“看见他那个样子被抬进来，令人伤心。他从未屈服于任何事情。”

在房间的对面，也受了弹片伤的列兵詹姆斯·西姆斯记得，有人焦虑地朝着弗罗斯特喊道：“长官，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在英格兰，索萨博斯基少将注视着他的旅登上排成长列的运送兵员的达科他型飞机。自从星期日以来，当手下的波兰人等待出发的时候，他就感到紧张在增强。星期二，他们从士兵临时营舍来到了机场，结果却发现，行动被取消了。在这个星期三的上午，在得知空投场换了地方之后，索萨博斯基本人又把飞行推迟了3个小时，以便制订出新的计划来。现在，将近下午1点钟，当背负着沉重负荷的伞兵们走向飞机的时候，焦急的气氛消失了。士兵们终于上路了，索萨博斯基注意到，“他们有一种几乎是轻松愉快的态度”。

他的心态却大为不同。在计划改变以后的几个小时里，他试图尽可能了解有关厄克特的形势以及新空投场的一切事情。他已经尽力为他拥有3个营的旅提供了信息，并一直传达到了排的层次，但信息是贫乏的。索萨博斯基感到，他们准备不足，几乎是“要跳进未知的领域”。

现在，当螺旋桨慢慢转动起来时，各营开始爬上将把他们带到荷兰的那114架达科他型飞机。索萨博斯基对装载过程感到满意，他本人被吊送上了领头的飞机。随着引擎转速的加快，这架达科他型飞机移动了，在跑道上缓慢地行驶着，又转了个弯，准备起飞。然后飞机却停顿下来。让索萨博斯基气馁的是，引擎减速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焦虑也在一点点地增长。他不知道，是什么在延误起飞。

突然，机舱门打开了，一位英国空军军官爬了进来。他沿着过道来到将军的身边，告诉索萨博斯基，指挥部刚刚接到命令，要停止起飞。情况是星期二的一个翻版：南边的各个机场是开放的，再次运送补给品的轰炸机正在起飞，但在格兰瑟姆地区，浓云正在密布。索萨博斯基不愿意相信。他能听见，当消息传达下去时，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们在咒骂。飞行又被延迟了24小时———直到9月21日，星期四，下午1点。

加文将军的滑翔机步兵团也再次停飞了。在对位于奈梅亨的瓦尔河进行极其重要的攻击的这一天，加文所极其需要的3400名士兵以及他们的枪炮和设备，却不能动身。德里尔 - 赫维多普渡口仍然在进行着作战行动。在这个关键的星期三，也就是D日后的第3天，那个波兰旅本来可能已经渡了莱茵河，来增援厄克特疲倦的伞兵们，但天气却再次打击了市场花园行动。

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终于准备，对在荷兰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发起反攻。

在9月20日，这个关键的星期三，整个走廊爆发了德国人一次接一次的进攻。

莫德尔的增援部队正不断到达，他确信他的兵力现在已经强大，足以消灭蒙哥马利的进攻。他计划，要挤垮在索恩村、费赫尔市和奈梅亨市之间的盟军走廊。他知道阿纳姆大桥几乎已在他的手中。而冯·扎根的第十五集团军———这支部队，蒙哥马利早在安特卫普的时候就把它忘记了———现在正慢慢地恢复元气，人员正在重新组织，弹药和补给品正在到达。不出48个小时，在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里，附件第2342号，莫德尔将用下述字眼，向冯·伦德施泰特报告冯·扎根的状况："第十五集团军渡过斯海尔德河的人员和设备总数，达到82000人、530门火炮、4600车辆、4000多匹马，以及大量有价值的物资……"注

莫德尔现在对冯·扎根进行接管的能力充满信心，结果他计划在72个小时之内，完全改组他本人的指挥结构。冯·扎根将指挥盟军走廊以西的B集团军群的所有兵力；现在正在得到系统化增援的施图登特的第一伞兵集团军，将被安排在走廊以东。莫德尔开始他锐利的、穿透性的进攻的时间已经到了。

20日上午，在索恩大桥，德军的装甲部队突然进入美军第一○一师的防区，几乎成功地夺取了大桥。只是泰勒将军的士兵以及英军的坦克部队所采取的迅速行动，才抵挡住了这次进攻。与此同时，当霍罗克斯的坦克纵队快速奔往奈梅亨的时候，泰勒防区的整个地段也承受着压力。

上午11时，在加文将军的地区，德国部队在一阵狂轰滥炸之后，从国家森林里出击，对第八十二师的右翼发起进攻。没出几个小时，一场全面的大举猛攻就在穆克地区形成了，威胁到了位于霍伊曼村的那座大桥。加文的部下正在奈梅亨，准备对瓦尔河发起攻击，加文匆匆从奈梅亨赶到这个现场，看到"我们所拥有的那唯一一座将让装甲部队通过的桥"，正岌岌可危。"对于拥挤进入奈梅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这座桥就必不可少。"他回忆说。他的问题是急迫的：第八十二师每一支可用的部队，都已经投入了战斗。加文匆忙要求英军的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注给予帮助。然后，他亲自率领进行反攻，于是一场激烈的冷酷无情的战斗开始了，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加文把部队前后挪动，就像挪动象棋棋子一样，坚持了下来，并最终迫使德国人撤退。他一直害怕从国家森林发起的进攻。现在加文和军长布朗宁将军知道，战斗的一个新的而且是更为危险的阶段开始了。在抓获的俘虏当中，有些是莫德尔强悍的第二伞兵军团的人。莫德尔的意图现在很明显：夺取关键性的桥梁，把走廊挤垮，粉碎霍罗克斯的坦克纵队。

就现在来说，莫德尔确信，盟军永远也不会在奈梅亨渡河，然后开车走完最后的11英里前往阿纳姆。他自信地告诉比特里希将军，他预计战斗将在这个星期之内结束。比特里希则不那么有把握，他告诉莫德尔，要是把在奈梅亨的所有桥梁炸毁的话，他会更放心。莫德尔看着他，愤怒地喊道："不！"

对自己的上级威廉·比特里希的态度，海因茨·哈梅尔少将感到恼火，他认为，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这位司令，对这场战斗采取了一种过于深谋远虑的态度。比特里希"似乎对在潘讷登村的渡河问题完全置若罔闻"，那些问题从一开始就使哈梅尔受到了牵制，在他看来，比特里希应当在那个地点待上足够长的时间，"亲自看看让20辆坦克渡过河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其中的3辆还是虎式坦克"。哈梅尔的工兵用了将近三天时间，才建起了一个渡口，能让大致40吨重的货物渡过莱茵河。尽管哈梅尔相信，作战行动现在可以加速了，但到目前为止，却只有3个排的坦克部队（12辆美洲豹型坦克）到达了奈梅亨郊外。其余的坦克，包括他的虎式坦克，正在阿纳姆大桥那里，在经验丰富的东线指挥官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的指挥下作战。

38岁的克瑙斯特，在1941年莫斯科附近的作战中丢了一条腿。哈梅尔回忆说："他重重地踩着一条木腿走来走去，尽管始终在疼痛，但却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然而，克瑙斯特也是哈梅尔不悦的原因之一。

为了支援弗伦茨贝格师，"克瑙斯特战斗队"（Kampfgruppe）被匆匆派到荷兰，它有35辆坦克、5辆装甲运兵车和1门自行火炮。但克瑙斯特手下的老兵却水准低下，他们几乎全都在某个时候负过重伤，在哈梅尔看来，他们"几乎就是伤残退役军人"。在正常状况下，这些人是不会参加战斗的。除此之外，克瑙斯特的补充兵员都很年轻，许多人只受过8个星期的培训。阿纳姆大桥的战斗已经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因而哈梅尔现在对奈梅亨的形势开始感到害怕。一旦英国人突破，他就会需要克瑙斯特的坦克部队来坚守阿纳姆大桥以及位于奈梅亨和阿纳姆之间的防御阵地。更多的装甲支援部队正在路上，包括15辆到20辆虎式坦克以及另外20辆美洲豹型坦克，但哈梅尔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到达，也不知道阿纳姆大桥是否畅通，从而可以加速他们向南边的大举猛攻。哈梅尔想象，即使夺取了阿纳姆大桥，之后也仍然需要一整天的时候，来清理那些车辆残骸，让车辆得以通过。

为了指导所有的军事行动，哈梅尔已经在多尔内堡村附近建立了一个前线指挥所，多尔内堡村在潘讷登村西边两英里、奈梅亨东北6英里处。从那里，他驱车向西，来到奈梅亨至阿纳姆的中间点，以便研究地形把防御阵地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突破，这些阵地就可以派上用场。他的侦察产生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不论是英军的坦克部队还是德军的坦克部队，似乎都不

可能离开公路。只有轻型车辆才能通行在路面薄弱的、砖铺的次要道路上注。他自己的那些坦克，在从潘讷登村渡河之后前往奈梅亨的途中，就曾在这样的马路上陷于泥沼，坦克的重量压碎了路面。奈梅亨至阿纳姆的主要公路，在一些地方是堤岸路，有9到12英尺高，两边是柔软的圩田，在这些高高的地段上移动的坦克，将会完全暴露，在天空的映衬下露出轮廓，选好址的炮兵能够轻易把它们逐个瞄准击中。眼下，哈梅尔没有能够覆盖公路的火炮，这样一来，在英军于奈梅亨突破之前，克瑙斯特的坦克和大炮渡过莱茵河进入阵地就刻不容缓了。

在返回位于多尔内堡村的司令部之后，哈梅尔从他的参谋长帕伊什上校那里听到了最新的报告。从阿纳姆那里传来了好消息：正在抓获更多的俘虏，大桥上的战斗正在走向终止，克瑙斯特相信，到下午晚些时候他就可以成功渡河。战斗也在奈梅亨进行着，卡尔·海因茨·奥伊林上尉尽管伤亡严重，却牵制了对方要夺取那里的铁路桥和公路桥的一切努力，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两个大桥入口处都被阻挡住了。在城市中心，英军部队也耽搁了下来，但局势更加危险一些。

奥伊林的报告反映了一种哈梅尔并不认同的乐观主义。最终，单是凭着数量上的优势，英军的装甲部队也无疑会越过德国人的防线。哈梅尔点燃一支雪茄，告诉帕伊什，他预料，“在48个小时之内，英美联军的全力进攻，将会投入到那座公路大桥上”。如果克瑙斯特的坦克部队和炮兵能够迅速夺取阿纳姆大桥，他们就可能挡住英军装甲部队的大举猛攻。哈梅尔知道，倘若装甲部队行动迟缓，未能及时迫使那一小群英国人离开阿纳姆大桥并清除大桥上的车辆残骸，他就必须不顾一切命令，把奈梅亨公路桥炸掉。

尽管他的考虑十分仔细，但却并没有想见到一个最为反常的计划：美国伞兵可能试图涉水过河，进行一次重大的水陆两栖袭击。

10

★ ★ ★

正在等待的伞兵们拥挤在距离渡河点不远的地方，那个地点是从奈梅亨铁路桥顺流而下1英里处。在星期二的整个晚上一直到星期三上午，当古尔本中校和范德弗特中校率领下的英美联军继续为争夺铁路桥和公路桥作战的时候，美英士兵在努力把那个通向河岸的地区扩大，这样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和重炮就能进入发射阵地，以支援这个水陆两栖袭击。台风型飞机将于进攻发起前30分钟低空飞过北岸，用火箭弹和机枪扫射整个地区。在地面上，坦克和火炮将对这个地点再轰击15分钟。然后，在坦克发出的烟

幕的掩护下，由27岁的朱利安·库克少校率领的第一拨士兵将出发，进行有史以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渡河。

指挥官们为了制订这个计划用了整整一个夜晚，计划也是尽可能地完美。但是，伞兵们渡过这个400码宽的河要乘坐的船只，却迟迟没有到达。进攻发起的时刻，原先定于下午1点，现在不得不推迟到下午3点。

美国人分成小组等待着，与此同时库克来回踱着步子。“那些该死的船在哪里？”他纳闷。加文将军以及第五○四团团长塔克上校告诉他，他的第三营将渡过瓦尔河进行袭击，从那以后，库克一直是“震惊而又目瞪口呆”。在这位年轻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看来，似乎“我们正被要求，全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一次奥马哈海滩登陆”。他的士兵当中，有许多人从未坐过小船。

焦急等待船只到达的，并不只有库克一人。中午之前，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已经收到了第一个清晰的暗示，说厄克特的形势严峻。这封鬼怪式联络部队的电报，是通过英军第二集团军的通信系统收到的，电报中说：

（201105）……高级编队仍然在主桥北端的附近，但并没有与主桥北端接触，也无法再次提供补给……阿纳姆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要求采取所有可能的步骤，以加快解救。战斗猛烈，抵抗极其强大。阵地不太好。

布朗宁极其不安。每一分钟都很重要，迅速夺取奈梅亨大桥，对于厄克特的士兵们的幸存来说是极其关键的。而在这个时刻，对阿纳姆的防御者的解救，几乎完全取决于库克和第三营———这是一个库克没有意识到的事实。

不管怎么说，船只不在近处，而且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些船是什么样子。整个夜晚，霍罗克斯将军和他的参谋们都在试图加快船只的到达。在后边的远处，在工兵的护送车队中，有3辆运载着船只的卡车，在挤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上一点点地向前移动着。在艾因霍温时，它们就被德国空军的一次猛烈轰炸耽搁了。城市的整个中心被炸毁了，几十辆运送补给品的卡车被摧毁，一个运送弹药的车队整个地被点燃了，使得这场大屠杀进一步加剧。现在，在瓦尔河渡口，在距离进攻发起时刻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仍然看不到卡车和那些极其重要的船只的影子。

攻击出发地点位于庞大的PGEM发电厂的东边，起初大家认为，可以直接从发电厂里渡河。在那里，在河的边缘，有一个小小的水湾可以为装船提供保护，因为那个地方德国人观察不到。塔克上校放弃了那个地点，因为它离敌人坚守的那座铁路桥太近了。当伞兵从码头区出现的时候，德国人能用机枪火力向每一个人扫射。在水湾的出口，有一股流速为每小时8到

10英里的水流，它的旋转也要更强一些。塔克计划把地点移到更西边的地方，让他的士兵跑步把船送到河边，放船下水，然后划船过去。但这也让库克少校担忧，以他所知，每只船大约200磅重，在装上士兵的装备和弹药时，那个数字大概会翻番。

一旦下水，每只船将运送13名伞兵外加3名工兵，工兵将把伞兵送过河。军事行动将是持续的，这些攻击船将一浪接着一浪，反复渡河，一直到库克的整个营，以及约翰·哈里森上尉指挥的另外一个营的一部分，全都过河为止。爱尔兰近卫团的爱德华·G·泰勒少校的坦克部队将给予火力支援，泰勒对这整个计划感到惊骇。“它把上帝的恐惧放在了我的心中！”泰勒回忆说。他问那位嚼着雪茄的塔克上校，他的士兵以前是否练习过这种军事行动。“没有，”塔克简短地回答，“他们正在进行在职培训。”

从发电厂的九楼上，库克与指挥着爱尔兰近卫团第二营的贾尔斯·范德勒中校，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北岸。就在他们站立处的对面，平地从河边向内地延伸200到300码，库克的士兵在登陆以后，将不得不越过这块没有保护的地段。在平坦河边的更远处，一个斜坡堤岸有大约15到20英尺高，堤岸的上面是一条从西向东的20英尺宽的马路。有一座矮而宽的房子，被称为荷兰农家堡垒，在马路之外大约800码的地方。库克和范德勒能够清楚地看到，敌人的部队处在堤岸上的适当位置，而且他们确信，观察所和火炮阵地就在堡垒的里面。库克记得，他当时想：“有人想出了一个真正的噩梦。”然而，在进攻发起时刻空军和炮兵的有效支援，将减弱德国人的抵抗，并使得伞兵迅速控制北岸。库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个支援。

范德勒认为，渡河可能被证明是“恐怖的，带有严重的伤亡”。但他打算让他的坦克部队在最大程度上给美国人以支持，他计划使用大约30辆谢尔曼型坦克———那是由爱德华·G·泰勒少校和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少校指挥的两个坦克中队。下午2：30，坦克将朝河开去，爬上堤岸，“并排地”爬上去，它们75毫米口径的大炮将排列成行，轰击远处的河岸。英军的这个轰炸，还将得到美军第八十二师的迫击炮和火炮的支援。总共，将有100门大炮轰击北岸。

库克的士兵们还没有看见过实际的出击地区，他们是在阔步行进的途中听到简短命令的。当他们到达时，河的宽度让每一个人都震惊了。“起初，给我们下达命令时，我们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约翰·霍拉伯德少尉回忆说。中士西奥多·芬克拜纳被确定参加第一拨进攻，他确信：“由于有烟幕，我们的机会是相当好的。”但I连的连长T·莫法特·伯里斯上尉却认为，这不啻是一个自杀任务。

第五○四团的新教随军牧师德尔伯特·库赫尔上尉也有同感。通常库赫尔不会与袭击部队一同前往，现在他要求允许他与库克的士兵在一起。“这是

我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他回忆说，“因为我是自愿前往的。完成这个计划似乎是不可能的，我感到，士兵们如果需要我的话，那就应当是在这次行动里。”

亨利·鲍德温·基普上尉，被称为这个营的百万富翁，因为他是美国费城比德尔家族的一个成员。他认为：“我们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在18月个几乎一直持续的作战中，我们什么都做过了，从跳伞，到建立桥头阵地，到用作山地部队和普通的步兵。但渡河却是某种别的事情！它听上去就不可能。”

按照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的说法，库克试图让气氛轻松下来，他宣告，他将模仿乔治·华盛顿的样子。“笔直地站立在船上，紧攥右拳，被推向前去，喊道：‘前进，士兵们！前进！’”H连的连长卡尔·W·卡普尔上尉，听说在阿纳姆发起的进攻出了麻烦，因而非常关切。他想“上那条该死的船，玩命地渡过河去”。他有一个好朋友在英军第一空降师里，他感到如果有谁在阿纳姆大桥上，那人就是“弗罗斯蒂”———约翰·弗罗斯特上校。

到下午2点时，仍然没有突击舟的影子，而要把正在前来的台风型飞机中队召回，已经为时太晚。在出击地点，库克的士兵和范德勒的坦克部队隐藏在河的堤岸后面，等待着。下午2点30分整，台风型飞机的打击开始了。这些飞机在头顶上面掠过，脱离开编队，一架接一架呼啸着俯冲下去，朝着敌人的阵地发射火箭和机枪。10分钟以后，当范德勒的坦克部队开始在堤岸上进入阵地时，那3辆运送突击舟的卡车到了。在还剩下20分钟的时候，库克的士兵们才第一次看到，这些轻而薄的可折叠式的绿色小船。

小船19英尺长，船底是用平的强化胶合板做的。船的两个边是帆布的，用木楔子固定住，从地板到舷边高度是30英寸。本来应该在每条船上有8个4英尺长的短桨，但许多船上只有两个短桨。士兵们将不得不用他们的步枪枪托来划船。

工兵们迅速组装船只。当每一只船被组装起来的时候，被安排在该船上的伞兵们就把他们的装备装在船上，准备朝河岸冲刺。在猛烈轰击对岸的火力网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那26只船终于组装完成。“有人喊‘前进’！”帕特里克·马洛伊中尉回忆说，“于是每个人都一把抓住舷边，开始用力拖着船朝河里跑去。”后方，炮弹呼啸着从士兵们的头上飞过，坦克从他们前面的堤岸上开炮，而白色的烟，在马洛伊看来是“相当的厚”，在宽阔的河面上飘过。袭击开始了。

攻击的第一拨大约有260名士兵———两个连，H连和I连，外加司令部的参谋和工兵，他们一到河边，让船下水便呈现出一种灾难的性质。被投入

到浅水中的船，陷在泥土之中，就是不移动。士兵们在浅水区挣扎着，翻腾着，把船抬到深水区，推开船，然后爬了上去。有些士兵在试图爬上船的时候，船又翻了。有一些船，由于装载超重，被陷在水流之中，开始旋转，从而失去控制，有些船则因为沉重的负荷而下沉。短桨丢失了，士兵从船上落水。卡尔·卡普尔上尉看到，这是一个“群体混乱”的场面。他的船开始沉没。“列兵勒加西落水了，开始下沉。”卡普尔记得。卡普尔跟随着他跳下了水，水流的迅速让他吃了一惊。他一把抓住勒加西，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但等我把他拉到岸边的时候，我就好像成了一个老人，精疲力竭”。卡普尔又跳上另外一条船，再次出发。汤姆·麦克劳德中尉的船几乎被水漫过，他以为他们正在沉没。“短桨在疯狂地划动，”他记得，而在这喧闹声之上，他所能听见的就是库克的嗓音，那是从附近的一条船上发出的，喊道：“别停！别停！”

这位少校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同时也在大声地祈祷着。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注意到，他已经与每一行歌词合上了节奏。“欢呼马利亚———承蒙上帝的恩典———欢呼马利亚———承蒙上帝的恩典！”库克随着短桨的每一次划动而吟唱着。[注]然后，在混乱当中，德国人开火了。

炮火是如此强烈而又密集，这让马洛伊中尉回想起“我们在安齐奥遭受到的最糟糕的轰击。他们正在用重机枪和迫击炮不断射击，大多数是从堤岸和铁路桥上射击的。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容易击中的浮标”。随军牧师库赫尔惊恐万状，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士兵的头被炸飞了。库赫尔一再不断重复着：“主啊，你的子民要不行了。”

从他在PGEM发电厂大楼的指挥所里，范德勒中校与布朗宁将军、霍罗克斯将军一起注视着，神色严肃，一言不发。“那是一个恐怖、恐怖的景象，”范德勒记得，“船实际上从水上被炸飞了。在炮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巨大的水柱间歇地喷上去，而从北岸发射的轻武器火力，又使得河就像一口沸腾的锅。”士兵们本能地开始蹲伏在船里。霍拉伯德少尉盯着脆弱的帆布船侧，感到自己“完全被暴露了出来，毫无还手之力”。甚至他的头盔也“似乎就像无边小便帽一样小”。

弹片撕裂了这个小小的舰队。那只运送着詹姆斯·梅加拉斯中尉所属排的一半人的船沉没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没有幸存者。艾伦·麦克莱恩中尉看到，有两只船被炸成了两半，伞兵们被扔进水里。在T·莫法特·伯里斯上尉的那条船四周，枪弹“就像雹子一样”倾泻下来，最后那位掌舵的工兵说道：“抓住船舵。我被击中了。”他的手腕粉碎了。当伯里斯俯下身来帮忙的时候，那位工兵又再次被击中，这一次是头部中弹。炮弹碎片击中了伯里斯的身体侧面。当那位工兵从船舷落入水中的时候，他的脚钩住了船舷上缘，使得他的身体起到了船舵的作用，让船转起圈来。伯里斯不得不把

这个死去的人推进水里。这个时候，又有两个坐在前面的伞兵被杀死了。

由于刮起了一阵疾风，烟幕被吹得七零八碎。现在德国的机枪手们一条船一条船地扫射。中士克拉克·富勒看到，有一些士兵，忙着要迅速过河，而又不顾一切试图躲避开炮火，结果“彼此对立地划着船，使得他们的船一圈圈地旋转着”，德国人轻而易举便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射死了。富勒“吓坏了，感到自己瘫痪了”。在渡河来到一半的时候，列兵伦纳德·G·特伦布尔突然被猛击到船的底下。他的船被直接击中，特伦布尔的脸上、肩膀、右臂和左腿受了伤，他确信他要流血死去。船进了水，疯狂地转着圈，接着又缓慢地漂浮回到了南岸，除了特伦布尔之外，船上的所有人都死了。

在指挥所里，范德勒看到，“巨大的缺口开始在烟幕中出现”。他的坦克手们发射了10多分钟的烟雾炮弹，但现在近卫团的每一种弹药都快要耗尽了。“德国人已经换了弹药，正在开始使用大家伙，我记得，我几乎是试图恳求美国人再快一些。显然这些年轻的伞兵们在使用突击舟方面没有经验，突击舟并不是容易操纵的东西。他们正在水面上作之字形行进。”

然后，第一拨到达了北岸。士兵们挣扎着从船上爬出来，开着枪，开始越过那块暴露的平地。中士克拉克·富勒，几分钟以前还吓得几近瘫痪，现在为还活着而高兴，以至于感到“兴高采烈。我的恐惧被一种突然冒出的鲁莽所取代。我感到，我能够把德军全都揍一顿”。范德勒在注视登陆的时候，“看见一两条船触到了河滩，立即又有三四条船触到了河滩。没有一个人停下。士兵们从船里出来，开始朝堤岸跑去。我的上帝啊，那是一个多么英勇的景象！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越过那块开阔地。我从未看见有一个人在未被击中之前倒下。我认为，最终成功渡河的人，占那个舰队的不到一半。”接着，令范德勒吃惊的是，“那些船又转过头来，开始返回，再运送第二拨”。布朗宁将军转向霍罗克斯，说道：“我从未见过更为英勇的战斗。”

当朱利安·库克的突击舟靠近河滩的时候，他跳了出来，拖着船，急于上岸。突然，在他的右边，他看见灰色的河水中发出了一种噗噗的翻腾声。“那个样子就像一个大的气泡，正在稳定地靠近河岸，”他记得，“我想我是有幻觉了，正在这时一个头盔的顶部打破了水面，继续向前移动。然后一张脸在头盔下面出现了。那是小个子机枪手、列兵约瑟夫·杰德里卡。他把30弹径的机枪子弹带绕在肩膀上，两只手各拎着一个子弹箱。”杰德里卡从船舷掉入水中，水深8英尺，他屏住气息，平静在河床上走着，直到在水面上出现。

卫生员们已经在河滩上工作，当汤姆·麦克劳德中尉准备返回，渡过瓦尔河再带一船伞兵过来时，他看见步枪已经插在阵亡者旁边的地上了。

下午4点刚过，在位于多尔内堡村的司令部里，海因茨·哈梅尔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根据报告：“一道白色的烟幕被投放在荷兰农家堡垒对面的河上。”哈梅尔以及他的一些参谋，匆匆驱车来到伦特村，伦特村在瓦尔河北岸，距奈梅亨大桥1英里远。那个烟幕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英美联军正在试图乘船渡过瓦尔河。不过哈梅尔仍然无法相信他本人的分析：河的宽度，守卫在北岸的兵力，奥伊林有关那天上午的乐观报告，以及他本人对在奈梅亨的英军和美军兵力的估计———全都表明这个行动是行不通的。但哈梅尔决定还是亲自看看。他记得：“我无意因为让这些桥梁落入敌人的手中，而被柏林逮捕和枪毙———不管莫德尔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朱利安·库克少校知道损失是可怕的，但现在他没有时间来估计损失。他的各个连队已经在那块暴露的河滩上登陆了。各分队密不可分地混合在了一起，而且一时间毫无组织。德国人正在用机枪扫射河滩，然而顽强的伞兵们却拒绝被火力压制住。他们或者是单独，或者是三三两两，朝堤岸奔去。“要么待在那里被打成筛子，要么前进。”库克记得。士兵们奋力前进，以机枪、手榴弹和上了刺刀的步枪为武器，向堤岸发起冲锋，把德国人狠狠地寻找出来。中士西奥多·芬克拜纳相信，他是最早赶到那条高高的堤坝马路上的人之一。“我把头探出马路，结果正好盯着一架机枪的枪口。”他回忆说。他忽地低下了头，但“枪口的火力把我的头盔炸飞了”。芬克拜纳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德国人的机枪掩体，听见手榴弹的爆炸声和人尖叫的声音。然后他迅速站起身来，上了堤岸马路，朝下一个机枪掩体跑去。

莫法特·伯里斯上尉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身体侧面的弹片伤，当他登陆时，他“因为还活着而高兴极了，结果都呕吐起来”。他径直朝堤坝跑去，朝他的士兵喊道，让“一挺机枪朝左翼射击，另外一挺机枪朝右翼射击”。士兵们照办了。伯里斯看见堤坝的后面有几幢房子。他踢开一幢房子的门，惊讶了，因为“有几个德国人还在睡觉，显然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伯里斯迅速掏出一颗手榴弹，拔下保险针，扔进屋子，然后砰地关上了门。

在烟雾、喧闹和混乱当中，第一拨的士兵记不得他们是怎么离开河滩的。下士杰克·邦默是一个通信兵，背负着沉重的通信设备，他只是向前跑。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可能的话要活下去”。他知道，他得赶到堤岸，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在到达堤岸顶上的时候，他看到“到处都是尸体，而且德国人———其中有一些还不到15岁，另外一些60岁以上———他们几分钟之前还在屠杀坐在船上的我们，现在却乞求饶命，试图投降”。士兵们因为他们的磨难而受到了太大的震惊，也因为朋友们的死亡而太愤怒了，因而不能接受许多俘虏。邦默回忆说，有一些德国人“立即被近距离射击杀死了”。

第一拨士兵们用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便制伏了堤坝马路上的德国防御者，他们因为这次渡河而悲伤和筋疲力尽，他们死去和负伤的同伴们躺在河滩上。并非所有的敌人阵地都被攻占了，但现在伞兵们可以蹲伏在原先的德国机枪掩体里，保护随后几拨人的到来了。第二次渡河中，又有两条船损失了。而在仍然猛烈的炮火轰击下，剩余11条船上精疲力竭的工兵们，又进行了五次强渡，最终把所有的美国人送过了血染的瓦尔河。现在，重要的一切，就是速度。在德国人充分理解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在他们把那些桥梁炸掉之前，库克的士兵们得夺取各个渡口的北端。

现在，堤岸防线已经被攻占了，德国人正在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去。库克的伞兵们对他们决不心慈手软。亨利·基普上尉评论说：“该营的剩余人员似乎变得狂热起来，而且由于狂怒而疯狂，士兵们片刻间忘记了害怕的意义。我从未目睹过，人性的这种变态会展现得像这一天这样激烈。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象，但却不是一个好看的景象。”

那些曾无助地坐在船上、朋友们又在周围死去的士兵们，他们或者是单独或者是以小组，用手榴弹、冲锋枪和刺刀，杀死了相当于他们死去朋友的人数四五倍的敌人。他们以残酷无情的效率，把德国人寻找出来，然后并不停下来休息也不重组，而是继续他们横冲直撞的攻击。他们冒着机枪火力，冒着就在前面的荷兰农家堡垒的高射炮组的猛烈轰击，在田野、果园以及堤岸后面的房屋里作战。有一些小组沿着下沉的堤坝马路朝正东方向奔去，前往各座桥梁，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小组猛烈攻击那座堡垒，对德军的炮火几乎置若罔闻。有一些伞兵背着手榴弹，游过围绕着堡垒的城壕，开始爬城墙。中士勒罗伊·里士满潜水游了过去，出其不意地俘获了保卫着那个砌高的堤道的敌军士兵，然后挥手让他的人过去。按照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的说法，伞兵们“设法爬上了堡垒的顶部，接着在下面的其他伞兵朝上投掷出手榴弹，手榴弹立即一个又一个地落入了小塔楼的炮眼”。德国防御者们迅速投降了。

与此同时，两个连队———伯里斯上尉的I连和卡普尔上尉的H连———的一些部队，正在朝那些桥梁冲刺。在铁路桥上，H连发现，德国人的防御是如此猛烈，以至于看起来美国人的进攻有可能被拖住似的。[注]然后来自南端以及奈梅亨的英美军队的持续压力，使得敌人突然垮掉了。令卡普尔吃惊的是，德国人开始“大规模地”越过大桥撤退———直接朝美国人的火炮撤退。从他在PGEM发电厂附近的坦克上，约翰·戈尔曼中尉“能够看到，好像有几百个德国人，又糊涂又惊慌，越过大桥直接朝美国人跑来”。在北岸，理查德·拉里维埃中尉和E·J·西姆斯中尉也看到，德国人跑来了。他们难以置信地看到，德国人丢下武器，匆匆朝北出口走去。“他们大批地走来，”拉里维埃回忆说，“而我们就让他们来———来到路的三分

之二的地方。”然后美国人开火了。

一阵弹雨迅速射向防御者们。德国人在各处倒下了———有些人掉进桥下面的主梁里，还有些人落入水中。260多人躺倒死去，许多人受了伤，还有几十个人停火之前就被抓了俘虏。在瓦尔河袭击开始后不到两个小时，那些桥梁中的第一座就陷落了。爱尔兰近卫团的爱德华·G·泰勒少校看见，“有人在招手。好长时间我一直全神贯注于那座铁路桥，结果那座桥成了对我来说唯一存在的东西了。我拿起无线电，给营部打了无线电话。‘他们在桥上！他们夺到桥了！’”时间是下午5点。近卫步兵第一团的托尼·海伍德上尉收到了泰勒的消息，发现消息“完全把人搞糊涂了”。这个消息指的是哪座桥？古尔本中校所率领的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士兵们，仍然在瓦尔克霍夫教堂附近，与范德勒中校的伞兵们并肩作战，而在那个地方，奥伊林的党卫军继续拒绝让他们夺取那座公路桥。海伍德记得，如果消息说的是那座公路桥已经被攻占了，那么“我无法明白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铁路桥完好无损、实实在在地掌握在了英美联军的手中，但德国人———不论是准备战斗到最后，还是吓得要离开阵地———却仍然还在桥上。美国人迅速在北端寻找，看有没有准备炸桥用的炸药。尽管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但大桥仍然还有接上电线、准备炸掉的机会。卡普尔上尉现在给库克少校打电话，敦促他尽可能快地派英军坦克过桥，他和I连的伯里斯上尉相信，有了这些坦克作为支援，他们就能抓住那个大奖，也就是在东边将近1英里处的奈梅亨公路桥。卡普尔回忆说，然后塔克上校来了。塔克说道，这个要求“已经转达了，德国人仍可能随时把这两座桥都炸掉”。库克的伞兵们没有犹豫，又出发赶往那座公路桥。

哈梅尔将军无法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眼睛放在双筒望远镜上，立于伦特村附近一个地堡的屋顶。这个阵地在瓦尔河的北岸，距离那座主要的奈梅亨公路大桥不到1英里，从这个阵地，他能够看见烟雾在他右边升起，能够听见战斗发出的巨响。但除了知道对方曾经试图在铁路桥附近渡河之外，似乎谁都不能准确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能够清楚地看到那座公路桥，桥上什么也没有。哈梅尔回忆说，然后“伤员开始到达了，我开始接到互相冲突的报告”。他得知，美国人已经过了河，“但一切都被夸大了。我不清楚，他们是坐10条船还是100条船过的河”。哈梅尔的脑子“在紧张地思考着，试图决定下面该做什么”，他与他的工兵们进行了核对。“我被告知，这两座桥都做好了被炸掉的准备，”他记得，“当地的指挥官得到了指示，要炸毁铁路桥。炸公路桥的引爆装置藏在伦特村地堡附近的一个花园里，有一个人守在那里，正在等待压下撞针杆的命令。”接着，哈梅尔接到了第一个清楚的报告：只有几条船过了河，而且战斗仍然在进行。他再次用双筒望远镜察看，看见公路桥仍然是清晰的，没有任何

活动。尽管他的“本能，是要把这座压在我肩膀上的麻烦的桥炸毁，但我却无意在绝对确信桥已丢失之前做任何事情”。哈梅尔决定，如果他不得不炸掉公路桥的话，他也将确保“桥上挤满了英军的坦克，让他们也在爆炸中飞上天去”。

在胡纳公园以及紧靠着公路桥南入口的瓦尔克霍夫教堂里，卡尔·奥伊林上尉的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正在为了活命而战斗。爱德华·古尔本中校的英军近卫步兵第一团，以及本·范德弗特中校的美军第八十二师第五○五团第二营，所组成的英美联军，发起的进攻是有条不紊而又残酷无情的。范德弗特的迫击炮和大炮轰击着德国人的防线，同时他的士兵们从一幢房子冲刺到另一幢房子。古尔本的坦克正在拉近它们与奥伊林不断缩小的防线之间的间隔，它们在通向会合点的各条街道上行驶，驱赶着面前的德国人，它们发射17磅重炮弹的大炮和机枪在轰击着。

德国人奋力还击。“那是我曾遭遇过的总量最大的炮火，”中士斯潘塞·沃斯特回忆说，沃斯特当时是一位19岁的老战士，自北非战役以来一直与第八十二师在一起。“我有了这种感觉，我可以伸出手来，用每一只手抓住子弹。”沃斯特趴在离瓦尔克霍夫教堂大约25码的一幢房子上的一个壁架上，从他的这个有利位置，能够朝下看见德国人的阵地。“公园各处都是散兵坑，”他记得，“所有的战斗行动，似乎都是以这些散兵坑以及一个中世纪的塔楼为中心。我看到，我们的人从右边和左边突出来，直接朝环形交叉路口发起冲锋。我们太急于赶到那座大桥了，结果我看见，有一些士兵爬到散兵坑，简直就是把德国人拽出来。”沃斯特本人的步枪枪管太热了，结果步枪里面的防腐润滑油开始从木头枪托里渗出来。

在这场杀气腾腾的交火继续的时候，沃斯特震惊地看到，范德弗特上校“溜达着过了街道，吸着一支雪茄。他在我待的那幢房子前面停了下来，抬起头说：‘中士，我想你最好还是去看看，你能不能让那辆坦克动起来。川范德弗特指着公园的入口，那里停着一辆英军坦克，坦克的旋转枪架关闭着。沃斯特从屋顶上爬下来，跑到那辆坦克那里，用他的头盔敲打着坦克的侧面。旋转枪架打开了。“上校要你们开动，”沃斯特说道，“来。我告诉你们朝哪里开火。”沃斯特走在坦克的旁边，德国人尽收眼底，他把目标指了出来。当范德弗特的士兵和古尔本的坦克部队火力增强的时候，敌人的防御圈便开始崩溃了。曾把盟军先前的每一次进攻都阻止下来的那条由反坦克炮组成的令人畏惧的防线，被消灭了。最后，只有环形交叉路口中央的4门自行火炮还在开火。然后，下午4点过后，在坦克部队和步兵发起的一次全力攻击中，这些自行火炮也被打垮了。当范德弗特的伞兵们用刺刀和手榴弹冲锋的时候，古尔本把他的坦克列成战阵，4辆并排冲进公园。一片惊恐中，德国人溃散了，他们撤退的时候，有一些人试图在大桥的大梁上隐蔽，另外一些人离开得要远一些，则是快速穿过英美联

军的炮火，朝着那座中世纪的堡垒跑去。在德国人经过时，几十名伞兵把手榴弹扔在他们当中。攻击结束了。“他们确实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沃斯特说道，“我们看见，他们径直从我们旁边冲过，冲向那条通往大桥的马路，有些人跑了过去，到了东边。我们感觉相当良好。”

近卫团装甲师的师长艾伦·阿代尔将军记得，他在指挥附近一幢大楼里的作战行动时，“咬紧牙关，害怕听见爆炸的声音，因为那会告诉我，德国人已经把大桥炸掉了”。他没有听见爆炸声。通往瓦尔河大桥的各条入口都畅通着，各个桥墩完好无损。

中士彼得·鲁宾逊的那支由4辆坦克组成的部队一直在等待，等的就是这个时刻。现在他们朝大桥驶去。注这位参加过敦刻尔克撤退的老战士，几小时之前就由他的连长约翰·特罗特少校通知待命，“随时准备夺取大桥”。德国人仍然在渡口上，特罗特提醒鲁宾逊：“我们不知道你过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大桥得夺下来。无论如何也不要停下来。”特罗特与中士握手，又开玩笑地说道：“不要担心。我知道你的妻子住在哪里，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会告诉她的。”鲁宾逊觉得没有什么可乐的。“你非常快活，是吧，长官？”他问特罗特。鲁宾逊爬上坦克，率先奔向大桥。

这支4辆坦克的部队从环形交叉路口右边，进入了胡纳公园。在鲁宾逊看来，“整个城镇都在燃烧。我左边和右边的楼房都着火了”。由于被烟雾所环绕，这个巨大的渡口显得“非常巨大”。当鲁宾逊的坦克隆隆向前行驶的时候，他不断用无线电向师司令部汇报。“别的每一个人都接到了命令，要停止广播。”他回忆说。鲁宾逊记得，在坦克哐啷哐啷进入大桥入口的时候，“我们遭到炮火的猛烈袭击。随着一声爆炸，承载着坦克一侧的履带的一只惰轮注被击中了”。坦克仍然在奔跑，尽管“无线电断了，我已经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鲁宾逊喊叫着要他的司机倒车，把他的坦克倒退到马路的一边。这位中士迅速跳出来，跑到他后面的那辆坦克，告诉那辆坦克的指挥官比林厄姆中士，要他出来。比林厄姆开始争论。鲁宾逊喊道，他是在下达“一个直接的命令。赶快从那辆坦克出来，到我的坦克里面去”。后面的第三辆坦克，其指挥官是中士查尔斯·佩西，那辆坦克驶出来，率先上了大桥。鲁宾逊跳上比林厄姆的坦克，命令其他的坦克跟上。鲁宾逊回忆说，当这4辆坦克前进的时候，他们遭受了轰击，轰击他们的是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它停放在河的另外一边，在一些正在燃烧的房子附近，他们同时也遭受到似乎是远处的一门自行火炮的轰击”。

范德弗特上校注视着这些坦克，他看见，那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开始发射了。“那相当壮观，”他回忆说，“那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用沙袋加固，在马路的一边，距离大桥的北端大约有100码远。一辆坦克与那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交火了大约四个回合，那辆坦克一直在发射弹径为30毫

米的曳光弹。在渐浓的夜色中，好看极了。”然后鲁宾逊的炮手、近卫团士兵莱斯利·约翰逊用另外一发炮弹击中了那门口径88毫米的大炮。鲁宾逊记得，德国人用手榴弹、步枪和机枪，在大桥的大梁上负隅顽抗。坦克上的机枪开始“干掉他们，就像推倒九柱戏的木柱一样”。而约翰逊，在对敌人的猛烈炮火进行反击时，“把炮弹连续发射出来，炮弹装填手能装填多快，他就发射多快”。在雹子般的炮火之中，鲁宾逊的部队哐啷哐啷地前进，现在靠近了公路大桥正中的标识。

薄暮时分，翻腾的烟雾塞满了远处的瓦尔河公路桥。在位于伦特村附近的前沿阵地上，海因茨·哈梅尔将军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火炮在他的周围各处砰砰作响，部队正在撤退，穿过村子，进入新的阵地。哈梅尔最害怕的事情现在发生了。美国人，出乎一切预料，已经成功地、大胆而又胜利地渡过了瓦尔河。在奈梅亨，卡尔·奥伊林上尉的乐观主义已经证明是无稽之谈，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个消息是简短的，奥伊林说，他被包围了，只剩下6个士兵。现在，哈梅尔确切无疑地知道，那些桥梁丢失了。他不知道，那座铁路桥是否已经被毁掉，但如果要炸掉那座公路桥的话，必须立即就做。

“一切都似乎是同时经过我的头脑，”他回忆说，“必须首先做什么事情？要采取的最急迫、最重要的行动是什么？这全都归结到那些桥梁上了。”他事先并没有与比特里希取得联系，以便“提醒他，我可能不得不炸掉那个公路桥。我本来以为，应该由比特里希来下命令，准备炸掉大桥”。因而，哈梅尔推论，尽管有莫德尔的命令，但“倘若比特里希处于我的境地，他也会把那座主桥炸掉。在我看来，不管怎么说，莫德尔的命令现在已经自动取消了”。那个时刻，他预料坦克一定会出现在公路桥上。

哈梅尔站在起爆箱旁边的那位工兵身边，审视着渡口。起初他未能发现任何运动。然后突然，他看见“一辆孤零零的坦克到达了中央，然后又有了第二辆，在它的后面和右方”。对着那位工兵，他说道：“做好准备。”又有两辆坦克出现在眼前，而哈梅尔还在等待着，等到那列坦克来到正中央时再下达命令。他喊道：“炸掉它！”那位工兵把撞针杆猛压了下去。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军坦克继续前进。哈梅尔喊道：“再炸！”工兵再次把起爆管的撞针杆猛地压下去，但哈梅尔所期待的巨大爆炸还是没有出现。“我等着要看大桥倒塌，坦克冲进河中，”他回忆说，“但相反，那些坦克不间断地向前移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他朝着他的焦虑的参谋们喊道：“我的上帝啊，他们两分钟后就要到这里了！”

哈梅尔向他的军官们厉声发出命令，告诉他们“要用每一件可用的反坦克炮和火炮，挡住埃尔斯特和伦特之间的马路，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会直接开进阿纳姆”。然后，让他沮丧的是，他得知，那座公路桥也仍然还站立着。他匆匆来到附近一个指挥所的一支无线电部队那

里，与他的前沿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和他的作战部长通了话。“斯托利，”哈梅尔说道，“告诉比特里希。他们过了瓦尔河了。”注

中士彼得·鲁宾逊的4辆坦克强行通过大桥。又有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停止了发射，鲁宾逊“认为，我们也把它打得不能运转了”。隐约耸现在前面的是一个路障，它由巨大的水泥块组成，路障有一个缺口，缺口的中央大约10英尺长。鲁宾逊看到，中士佩西的坦克成功地穿过缺口，在对面停了下来。然后鲁宾逊过去了，在佩西为那3辆坦克打掩护的时候，鲁宾逊又再次领先。鲁宾逊记得，“能见度是可怕的。我拼命地喊叫，努力为炮手、司机下达指示，并且同时告知司令部所有这一切。喧闹声是难以置信的，从大桥的大梁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射击声。”鲁宾逊看见，右前方三四百码的地方，在车行道的旁边又有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大炮。他朝自己的炮手喊道：“炮口直接对准400码之外，开炮。”近卫团士兵约翰逊把那门大炮炸成了碎片。当大炮周围的步兵开始逃跑时，约翰逊用他的机枪开火了。“那是一场屠杀，”他回忆说，“我甚至都不费心看潜望镜。他们人数是这么多，我只是扣动扳机而已。”他能够感到，坦克“在躺在路上的尸体上面颠簸而行”。

从旋转枪架上，鲁宾逊看见，他的3辆坦克仍然在前进而没有受到伤害。他用无线电对他们讲话，要他们“靠拢，继续前进”！这支部队现在靠近了大桥的北端。没过几秒钟，一门自行火炮开始发射了。“在我们的面前发出了两声巨响，”鲁宾逊回忆说，“我的马口铁制的帽子被炸飞了，但我并没有被击中。”鲁宾逊发射出了三四发炮弹，那门自行火炮和旁边的一幢房子“呼地燃烧起来，整个地区被照亮了，就像白天一样”。不知不觉之间，鲁宾逊的那支坦克部队已经过了大桥。

他命令炮手们停火，当尘埃落定的时候，他看见壕沟里有一些人影。起初他以为是德国人，接着“从他们头盔的样子我知道，他们是美国佬。注突然美国人一窝蜂地涌到坦克四周，拥抱我，亲吻我，甚至亲吻坦克”。T·莫法特·伯里斯上尉，他的衣服仍然湿漉漉的，浸满了渡瓦尔河过程中受伤时的鲜血，他对约翰逊咧着嘴笑。“你们这些人是我多年见到的最美的景象。”他说道。这个巨大的、多跨距的奈梅亨渡口，连同它各个几乎有半英里长的入口，完好无损地陷落了。在市场花园行动要攻占的各座大桥当中，倒数第二座现在已经掌握在盟军的手中了。时间是9月20日，下午7点15分。阿纳姆现在只不过在11英里以外的地方。

皇家工兵部队的托尼·琼斯中尉——霍罗克斯将军后来把他描述为“勇敢者中的最勇敢者”——他跟着鲁宾逊的部队过了大桥。琼斯仔细地寻找爆破器材，他是如此专注，甚至没有意识到，德国人正在朝他开枪。他回忆说，事实上“我并不记得看见了任何德国人”。在大桥中央的路障附近，

他发现，“有6条或者8条电线从栏杆上落了下来，落在人行道上”。琼斯立即把这些电线切断。不远处，他发现有十来个特勒型地雷整齐地堆放在一个狭长掩体里。他推断，“它们大概是要用于关闭路障上那个10英尺长的口子，但德国人没有来得及这样做”。琼斯取下起爆管，把它们扔进河里。在大桥的北端，他在其中的一个桥墩里发现了主要的炸药。他对“德国人为了炸桥而做的准备感到震惊”，那些马口铁制的炸药盒子，被漆成了绿色以便与大桥的颜色相一致，“它们被制造出来，可以精确地安装进它们附着其上的大梁上。每一个盒子都有一个相配的序号，它们里面总共装了大约500磅的梯恩梯”。这些炸药的设计是用电起爆，引爆装置仍然在其应在之处，与琼斯在大桥上刚刚切断的电线相连。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德国人没有能把大桥炸掉，除非英美联军突然而又猛烈的大举猛攻使他们没有来得及这样做。现在引爆装置被卸了下来，所有的电线都切断了，这座大桥对车辆和坦克来说是安全的了。

但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支将立即出发前往阿纳姆的英军装甲部队的特遣部队，却没有出现。

与英军第一空降师在走廊的最远端会合这件事情，沉重地压在美国人的脑子里。这些美国人自己就是伞兵，他们对那些仍然在前面作战的人怀有一种强烈的亲切感。库克的那个营在渡瓦尔河的时候损失惨重，他损失了他的两个连的一半以上———有134个人阵亡、负伤或者失踪———但从南北两端攻占奈梅亨大桥并打开朝北的马路的任务，却已经完成了。现在，库克和他的军官们迅速推进部队，进入了公路桥北端周围的一个环形防线，等待着，期望能看见坦克快速通过，去解救前面的英军伞兵。但过了大桥之后，就没有进一步行动。库克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本来预料，在天黑之前，坦克就会“拼命”奔向阿纳姆。

H连的连长卡尔·卡普尔上尉惴惴不安，因为他的朋友约翰·弗罗斯特上校“在那里的什么地方”。他的士兵也在北端发现并切断了电线，他确信，大桥是安全的。当他和拉里维埃中尉继续注视那座空荡荡的大桥时，卡普尔不耐烦地说道：“也许我们应该带一支巡逻队，牵着他们的手把他们领过来。”

库克营的欧内斯特·墨菲少尉，跑到其部队已经过了桥的中士彼得·鲁宾逊的面前，对他说：“我们已经清理了前面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现在该由你们进行对阿纳姆的进攻了。”鲁宾逊倒是想去进攻，但他已经被告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马路和大桥的北端”。他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

第五○四团的团长塔克上校，对英国人的延误大为光火。塔克本来以为，大桥一被攻占并清理了爆破器材，一支特遣部队就会从马路上冲刺过去。他认为，应该“就在此刻，在德国人未能获得喘息之前”冲刺过去。他后来

写道：“我们竭尽了全力才渡过瓦尔河，夺取了大桥的北端。我们只是站在那里，气急了，因为英国人安顿下来过夜，没有能够利用这个形势。我们无法理解。这纯粹不是我们在美国军队里做事情的方式———倘若11英里之外命悬一线的是我们的人的话，那就尤其不是我们的做事方式。我们会一直在前进，不停顿地行驶。要是乔治·巴顿的话，他就会这么做的，不管那是白天还是黑夜。”

A·D·德米特拉斯中尉无意中听到，塔克在与近卫团装甲师的一位少校争吵。“我想，一个最为难以置信的决定正在那里当场做出。”他回忆说。有一间小平房被用作指挥所，德米特拉斯听见，塔克在房子里愤怒地说道：“你的孩子们正在阿纳姆受苦。你最好还是过去。只有11英里远。”那位少校“告诉上校，在步兵赶上来以前，英军装甲部队不能前进，”德米特拉斯回忆说。“他们是按照书本打仗，”塔克上校说道，“他们已经‘入港停泊’过夜了。他们照旧停下来喝茶。”

尽管他的士兵兵力不到正常的一半，而且弹药几乎用完，但塔克还是想到要派第八十二师的伞兵们单独北上，前往阿纳姆。然而他也知道，加文将军绝不会赞同他的这个行动。第八十二师沿着它在走廊上的防区拖长了战线，提供不出这个人力。但加文同情并理解他的士兵，英国人本应该在前面大举猛攻。正如他后来所说：“军长布朗宁将军不过是位军人而已。倘若那个时刻是由李奇微指挥的话，我们就会接到命令，尽管我们有种种困难，也要上路，去救困在阿纳姆的人”。注

尽管他们明显是漫不经心，但英国军官———布朗宁、霍罗克斯、邓普西以及阿代尔———却也完全意识到，当务之急是继续前进。然而，问题是巨大的。霍罗克斯的那个军，汽油和弹药短缺，他看到了这样的迹象，即他的纵队有可能在奈梅亨的南边随时被夹断。战斗仍然在城市的中央进行，C·I·托马斯少将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由于远远地落在纵队后面，甚至还没有到达南边8英里处的格拉夫大桥。托马斯既小心翼翼又按部就班，因而跟不上英军纵队的步子。德国人在几个地点切断了马路，托马斯的士兵为了再次夺得马路并击退进攻进行了猛烈的战斗。德国人的进攻现在正在紧逼通往奈梅亨的那条狭窄走廊，尽管布朗宁将军对德国人进攻的凶残感到担忧，但他也认为，托马斯本来是能够前进得更快一些的。霍罗克斯则并不这么有把握。霍罗克斯对马路沿线的巨大交通阻塞感到关切，他告诉加文将军：“吉姆注，永远也不要试图为只在一条马路上的一个军提供所需物品。”

地形———蒙哥马利已经预见到而且莫德尔所指望的这个困难———极大地影响了从奈梅亨大桥继续前进的战术考虑。在率领着近卫团装甲师的阿代尔将军看来，显然，坦克部队到达了市场花园行动走廊中的最糟糕的部

分。面前的那条在奈梅亨和阿纳姆之间的绝对笔直的高堤坝马路，看上去就像一个“岛屿”。“当我看到那个岛屿的时候，心都凉了，”阿代尔后来回忆说，“你无法想象还有别的更不适合坦克的东西：陡峭的河岸，两边都是沟渠，能够轻易被德国人的炮火所覆盖。”尽管他有种种担忧，但阿代尔也知道，他们将“不得不碰碰运气”，但他实际上又没有步兵，而“在那条马路上前进，显然首先是步兵的任务”。霍罗克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坦克部队将不得不等待，直到步兵能够赶来并通过近卫团装甲师的纵队。几乎将是在18个小时之后，坦克部队才能够对阿纳姆发起进攻。

然而这位军长，像那些美国人一样，还是对能够迅速在走廊出发抱有希望。奈梅亨渡口一被夺取，认为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仍然在英国人手中的布朗宁将军便告知厄克特，坦克部队已经过河了。在差两分钟就到半夜12点的时候，布朗宁仍然对能够早些出发持乐观态度，于是发出了下述第二个电报：

202358……打算让近卫团装甲师……天一亮便全力以赴前往阿纳姆大桥。

大约45分钟之后，布朗宁得知未能及时把步兵带上来，于是又给厄克特发了第三封电报：

210045……在明天的进攻中，最优先考虑的是第一空降师，但不要期望在中午12点之前会有另外的进军。

在阿纳姆，那个“最优先考虑”来得太晚了。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的第二营的士兵们，已经被他们的悲剧命运包围了。在中士鲁宾逊的部队驾驶着坦克，哐啷哐啷地过了奈梅亨大桥巨大跨距的3个小时之前，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所率领的第一批共3辆德军坦克，已经终于打出一条路，上了阿纳姆大桥。

11



下午，与库克少校的第一拨伞兵开始强渡瓦尔河的同一时刻，埃里克·M·麦凯上尉下达了命令，从阿纳姆的那座校舍里撤离，他的士兵们在那里坚守了60多个小时———那是从9月17日的傍晚开始的。现在，从70码之外的地方，一辆虎式坦克把一枚枚炮弹发射进了大楼的南墙。“那幢房子现在在燃烧，”麦凯记得，“而且我听见，留在楼上的我的那点炸药也爆炸了。”在仍然能够移动的13个人当中，每一个人都只剩下了一个弹夹的子弹。麦凯在地下室里一瘸一拐地走着，做出了决定，让他的部队突围，战

斗到底。

他无意把伤员留在后面。由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带路，麦凯与两名士兵殿后，伞兵们把伤亡人员抬出了地下室。在辛普森为他们打掩护的时候，伤员被送进了旁边的一个花园里。“然后，就在辛普森朝隔壁的房子走去的时候，迫击炮的又一轮炮轰开始了，我听见他喊道：‘又有6个人负伤了。’我知道，”麦凯回忆说，“我们将被大规模屠杀掉———或者不管怎样，伤员将被大规模屠杀掉———如果我们试图带着他们一起逃脱的话。我朝辛普森叫喊，要他投降。”

麦凯把剩下的5个人集合起来，每一个人都配一只布伦式轻机枪，朝东边奔去———他相信，德国人不会料到他会走那个方向。他的计划是“在夜里隐匿起来，并试图再回到西边，与主力部队会合”。麦凯率领他的士兵越过马路，穿过马路对面已成为废墟的房子，来到了下一条街道。在那里，他们与两辆坦克撞了个面对面，伴随着坦克的有五六十名士兵。这6位伞兵迅速并排前进，一起朝那群大吃一惊的德国人扫射。“我们只有每人发射一个弹匣的时间，”麦凯回忆说，“两三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了。德国人就像装得半满的谷子口袋一样倒下了。”当麦凯朝他的小组喊着前往附近的一幢房子的时候，又有一名士兵被杀死了，另一人受伤。在到达临时掩蔽处后，麦凯告诉剩下的3个士兵：“这场战斗结束了。”他提议，伞兵们单独行动。“要是走运的话，”他说道，“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全都在大桥边再次相遇。”

士兵们一个个地走开了。麦凯躲进一个花园，在一个玫瑰丛的下面趴着。在那里，他取下他的军衔徽章，把它们扔掉。“我认为，我可以睡点觉了，”他回忆说，“我刚刚闭上眼睛，到达昏昏欲睡的阶段，便听见了德国人的说话声。我尽力轻声呼吸，而且由于我的衣服焦黑，满是血污，我认为我可以令人信服地显得就像死去一样”。突然“他的肋骨被狠狠地踢了一下”，他柔软地接受了这一踢，“就像刚刚死去的尸体一样”。然后他“感到，一把刺刀刺进了我的屁股，颠簸了一下卡在了我的骨盆上”。麦凯回忆说，奇怪的是，“那并不疼痛，只是在碰到骨盆的时候让我震惊。在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我才感到疼痛”。这激起了麦凯的愤怒。他费力地站了起来，拔出他的科尔特左轮手枪。“你把刺刀刺进一名英国军官，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叫嚷道。那些德国人对麦凯的爆发毫无准备，向后移动了，麦凯意识到：“要是还有子弹的话，他就能射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们无法还击，”他记得，“因为他们围着我成了一个圈。要是还击的话，他们就会击中自己人。他们的形势太滑稽了，结果我笑了起来。”当德国人盯着他的时候，麦凯轻蔑地把他的科尔特左轮手枪扔出了花园的墙，“这样他们就不能取来留作纪念”。

那些德国人强迫麦凯靠墙站着，开始搜他的身。他的手表以及他父亲留给

他的一个空的银质瓶子被拿走，但在他胸部口袋里的一张逃跑地图却被忽略了。一位军官把瓶子还给了他。当麦凯问手表的时候，他被告知："在你要去的地方不会需要它了，而我们又相当缺少手表。"他手举在头上，被押送到了一个关押英军俘虏的大楼里。麦凯从一群人走到另外一群人那里，提醒他们，他们的任务就是逃跑。突然，麦凯，这位在场的唯一一位军官，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审问。"我决定采取攻势，"他回忆说，"有一位德国中尉能说完美的英语，我告诉他，坚定但又客气地告诉他，对德国人来说一切全都结束了，我将欣然接受他们的投降。"麦凯记得，那位中尉惊讶地盯着他，但"这就是审问的结束"。

快到傍晚的时候，俘虏们被赶了出来，上了卡车，卡车载着他们向东前往德国。"他们在车后面放了一个警卫，这使得试图逃跑更加困难，"麦凯说道，"但我告诉小伙子们，蹲下来挤他，这样他就无法开枪了。"当他乘坐的卡车在马路上缓慢拐弯的时候，麦凯跳了下来，试图逃跑。"不幸的是，我选择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回忆说，"我落在距离一名哨兵不到三英尺的地方。我突然袭击他，试图扭断他的脖子。就在这时别的德国人来了，他们打得我失去了知觉。"麦凯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和别的俘虏挤在一起，那是在一家荷兰小旅馆的房间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起身来，靠着一面墙坐着，接着，在90个小时里第一次，这位年轻的军官熟睡了过去。注

傍晚时分，在弗罗斯特上校的司令部大楼四周，在坡道边上。大约有100个士兵，分成小组，仍然在凶猛地战斗着、坚持着。司令部的屋顶在燃烧，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只剩下最后几发子弹了。然而伞兵们似乎还是那么精神饱满。弗雷迪·高夫少校认为："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几个小时的话，我们就得救了。"

下午7点钟前后，第二营负了伤的指挥官醒了过来，因为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而恼火。弗罗斯特听见，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有一些显示出患有战斗疲劳症注的胡言乱语"。德国人仍然在轰击这座大楼，弗罗斯特意识到，地下室里现在塞满了200多名伤员，里面一派酷热。他试图挪动时，感到疼痛的冲击穿过了他的双腿。他派人把高夫叫来。"你将替我指挥，"弗罗斯特告诉少校，"但在做出关键性的决定之前必须先找我商量。"到现在，弗罗斯特开始意识到，他最惧怕的事情开始出现了：大楼正在烧倒，伤员有"被活活烤死"的危险。在黑暗屋子的各个地方，人们由于吸入了刺激性的烟而咳嗽。营的首席医官詹姆斯·洛根医生在弗罗斯特的旁边跪了下来。洛根说到了该把伤员搬出去的时候了。"我们得与德国人安排一次休战，长官，"洛根坚决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等了。"弗罗斯特转向高夫，命令他去安排，"但要把作战的士兵们带到别的大楼里，继续战斗。我感到了，即使大桥丢失了，我们仍然能够控制入口一段时间，也许

能控制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的坦克部队上来”。

高夫和洛根离开，去为休战作安排。洛根提议，打开大楼沉重的前门，打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出去。高夫对这个主意持怀疑态度。他并不信任党卫军，党卫军很有可能在对方举着红十字会旗帜的情况下开火。洛根又回到弗罗斯特那里，得到了如此进行的许可。当医生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弗罗斯特取下了他的军衔徽章。他希望“能消失在士兵们当中，也许以后能逃脱”。他的勤务兵威克斯，则出去找担架。

在不远处，伤员之一列兵詹姆斯·西姆斯，闷闷不乐地听见正在制订撤退计划。从逻辑上，他知道别无选择。“我们的阵地显然毫无希望了，”他后来回忆说，“弹药几乎用完了，几乎所有的军官和军士都死去或者负伤了，而且大楼正在熊熊燃烧，烟雾几乎让每一个人窒息。”他听见，弗罗斯特让体格健全的人和能行走的伤员“出去，突然逃跑”。西姆斯知道，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但我们要被留在后面这个消息，却不怎么被人接受”。

在楼上，洛根医生打开了前门。在两名勤务兵的陪同下，洛根举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走了出去，与德国人见面。战斗的喧闹声停止了。“我看见，有一些德国人跑到大楼的后面，那里停放着我们的吉普车和运兵车，”高夫记得，“他们需要用那些车辆来搬运伤员，我在脑子里向我们的剩余运输工具永远地挥手道别了。”

在地下室里，人们听见，走廊里传来了德国人说话的声音。西姆斯注意到，“德国人的纳粹军靴重重地踏在楼梯上”。地下室突然安静了下来。西姆斯抬起头，看见一名德国军官出现在门口。令他非常恐惧的是，“一名负了重伤的伞兵举起了他的斯特恩式轻机枪，但他迅速被制伏了”。西姆斯记得，那位军官“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于是厉声发出了一些命令。德国士兵鱼贯走进来，开始把伤员抬到楼上”。他们几乎是太晚了。当西姆斯被搬动时，“一块巨大的燃烧着的大梁几乎落在我们上面”。他敏锐地意识到，那些德国人是“神经紧张的，随便就会开枪，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配备的是英国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注

在一名患战斗疲劳症的伞兵帮助下，弗罗斯特被抬了上去，放在他曾拼命想守住的那座大桥边的堤岸上。在四周，他看到楼房在猛烈燃烧着。他看到，德国人和英国人“以最快的速度工作着，把我们抬出来，与此同时，整个场面被火焰照得明亮极了”。最后一名伤员被抬上来后没过几分钟，突然发出了一声轰鸣，大楼倒塌了，成了一堆火红的瓦砾。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正躺在他旁边的担架上，弗罗斯特转向克劳利，疲倦地说道：“唔，道格，这一次我们没有能够逃脱，是吗？”克劳利摇了摇头。“是的，长官，”他说道，“不过我们也让他们够受的了。”

当英军伤员又小心又惊讶地注视的时候，德国人以非同寻常的友好在他们当中走动着，分发着香烟、巧克力和白兰地。伞兵们辛酸地注意到，这些补给品大多是他们自己的，显然是从落入德国人手中的空投补给品中拿来的。当这些饥饿、口渴的士兵们开始吃的时候，德国士兵们在他们旁边跪着，为这场战役而向他们表示祝贺。列兵西姆斯盯着一行马克IV型坦克，那些坦克沿着马路向后延伸。有一个德国人看见了他的表情，便点了点头。“是的，英国兵，”他告诉西姆斯，“要是你们没有投降的话，到上午时那些坦克就是对付你们的了。”

但弗罗斯特顽强而又体格健全的士兵们，却并没有放弃。当最后一名伤员被抬出地下室的时候，战斗又再次开始了，就像一个小时以前那样猛烈。“那是个噩梦，”高夫回忆说，“不论你转到哪个方向，都是德国人———在前面，背后，以及两边。在休战期间，他们设法把一支大的兵力渗透进了这个地区。他们现在实际上占据着每一幢房子。我们实际上被打垮了。”

高夫命令伞兵们散开，躲藏起来过夜。他希望，在黎明的时候，能把兵力集中在河岸边一部分被毁的建筑里。甚至现在他仍然预料，到上午的时候就能得到解救，而且“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当士兵们出去进入黑暗之中时，高夫在他的无线电旁边蹲了下来。他把话筒紧放在嘴前，说道：“这是第一伞兵旅。我们不能坚守多久了。我们的阵地情形危急。请赶快。请赶快。”

德国人知道，战斗结束了，现在所剩下的，就是一次肃清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桥上有坦克，但坦克却无法通过。正如哈梅尔将军所预料的那样，积聚起来的车辆残骸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清理掉。直到9月21日，星期四的一大早，才最终清理出了一条单行通道，过桥的行动才得以开始。

星期四天刚亮，高夫和仍然待在环形防线里散开的士兵们，从他们的躲藏处出现了。救援并没有来到。德国人系统地占领了阵地，迫使现在已没有弹药的士兵们投降。幸存者们三三两两，未被察觉，他们分散开来试图逃跑。英国人的最后抵抗缓慢地、不服气地结束了。

高夫少校向自来水厂走去，他希望能躲藏和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尝试一路向西，走向厄克特指挥下的主力部队。就在自来水厂大楼的外面，他听见了德国人的说话声。高夫全速朝一堆柴火跑去，试图在柴火下面钻过去。他靴子的后跟露了出来，一个德国人一把抓住后跟，把高夫拽了出来。“我累死了，我只是抬头看着他们，笑了。”高夫说道。他的双手举在头上，被带走了。

在满满一屋子俘虏当中，一位德国少校叫高夫出来。他向这位英国军官行了一个希特勒式的敬礼。“我听说你是指挥官。”那个德国人说道。高夫警惕地看着他。“是的。”他说道。“我想向你和你的士兵们表示祝贺，”那个德国人告诉他，“你们是英勇的军人。我在斯大林格勒打过仗，显然你们英国人有许多巷战的经验。”高夫盯着这位敌军军官。“不，”他说道，“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巷战。下一次我们会好得多。”

在这最后几个小时当中的某个时刻，一条最后的信息由大桥附近的某个人用无线电发出了。不论是厄克特的司令部，还是英军第二集团军，都没有接收到，但在第九党卫军装甲师（霍亨施陶芬师）的司令部里，哈策尔中校的监听员们却清楚地听到了。多年以后，哈策尔已不能回忆起信息的全部，但最后的两句话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有弹药了。上帝保佑我王。”

在北边几英里处，在阿珀尔多伦的附近，列兵詹姆斯·西姆斯躺在一家德国部队医院外面的草地上，周围是负伤的伞兵，等待处理和治疗。这些士兵是安静的，在沉思。“我自然想到，我们白白地打了一仗，”西姆斯写道，“但我却不能不想到主力部队，主力部队是那么强大，然而却无法走上那最后的几英里来到我们这里。最难以忍受的事情，就是感到人家决定要把我们忘掉。”

12



9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40整，爱尔兰近卫团的罗兰·兰顿上尉被告知，他的坦克第一连要从刚刚夺取的奈梅亨大桥冲出去，前往阿纳姆。乔·范德勒中校告诉他，进攻发起时刻将是上午11点。兰顿表示怀疑，他认为，范德勒一定是在开玩笑。只给了他20分钟的时间，向他的连下达简单命令，让他们准备进行一次大的进攻。兰顿是在一张缴获的地图上被迅速下达简短命令的。“我们所拥有的另外一张地图，是一张没有详情的路线图。”他说。有关敌人火炮阵地的信息，就在一张孤零零的侦察照片上，表明在伦特村和埃尔斯特村之间有一个防空工事，而且“据称它可能不再存在了”。

在兰顿看来，这个计划的一切都是错的——尤其是，“他们实际上是要在20分钟之内发起这次进攻”。他的连要开辟道路，第二个连从后面跟上。兰顿被告知，有两辆坦克将载着步兵，更多的部队将跟上。然而他却不能指望得到多少炮兵的支援，而且在最初的突破过程中曾成功使用的台风型飞机的“出租车候车站”式的空中掩护，也不能立即得到，因为在比利

时，那些台风型飞机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停飞。尽管如此，兰顿得到的指示却是，“要发疯似的前进，赶到阿纳姆”。

乔·范德勒尽管没有向兰顿吐露他的感觉，但对这次进攻的结果是悲观的。早些时候，他与别的人，包括他的堂弟贾尔斯·范德勒中校，曾经过了奈梅亨大桥，去研究那条向正北通往阿纳姆的抬高了的“岛屿”公路。在这些军官看来，这条马路似乎是不祥的。乔·范德勒的第二把手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少校首先发话了。“长官，”他说道，“在这条该死的马路上我们一码也走不出去。”贾尔斯·范德勒同意。“这是一个试图开动坦克的荒唐的地方。”走廊上进军，在进行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尽管车辆已经以坦克单行向前移动了，但也总是在必要时可以在大马路之外调动的情况下实施。“这里，”贾尔斯·范德勒回忆说，“毫无能够离开马路的可能。一个堤坝堤岸，顶上是一条公路，要进行防御是极好的，但绝不是坦克施展的地方。”贾尔斯转向其他人，说道：“我只能想象，当德国人看见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幸灾乐祸地搓起手来。”然后他又说，“尽管如此，我们也得试试。我们得在那条该死的马路上冒险。”贾尔斯记得，“我们的进军根据的是一个时间计划。我们要以两个小时15英里的速度前进。”近卫团装甲师的参谋长格沃特金准将，已经简短地告诉他们：“就是要赶到目的地。”

上午11点整，兰顿上尉拿起侦察车上的话筒，用无线电发话：“前进！前进！前进！无论如何也不要停！”他的坦克隆隆驶过伦特村邮局，上了大马路。兰顿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心中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5到20分钟之后，他开始呼吸轻松一些了。敌人没有采取行动，兰顿“因为早些时候如此不安而感到有点羞耻。我开始纳闷，我到达阿纳姆大桥的时候要做什么。我以前真的没有想过”。

在领头的坦克后面，范德勒堂兄弟俩坐着他们的侦察车跟来了，在他们后面是空军中尉唐纳德·洛夫，洛夫坐在他的皇家空军地对空通信车上。同他在一起的，又是空军少校马克斯·萨瑟兰，萨瑟兰又安静又焦虑。在从默兹河—埃斯考河运河突围的时候，萨瑟兰曾指挥了台风型飞机的攻击，现在，当他爬上那辆白色装甲侦察车的时候，他告诉洛夫：“在阿纳姆的空降部队的小伙子们有很大的麻烦，急需帮助。”洛夫审视着天空，寻找台风型飞机，他确信，他们将会需要那些飞机。洛夫记起了那次突围时的恐怖状况，因而“根本不急于发现他本人所处的状况，与我在上一个星期天的情况相类似，在那个星期天，德国人一下子就把我们挡住了”。

爱尔兰近卫团的坦克稳定地前进，途中经过了左边的奥斯特豪特村，以及右边没有教堂的小村子雷森和本梅尔。从侦察车上，兰顿上尉能够听见，领先的坦克部队指挥官托尼·塞缪尔森中尉在宣告所在的位置。塞缪尔森大声叫道，第一辆坦克正在接近埃尔斯特的郊外。此时，这些爱尔兰人大体

在前往阿纳姆的中间点上。兰顿在听的时候意识到："我们单独出发了。"但在整个纵队里，紧张气氛正在放松。空军中尉洛夫听见空中传来了嗡嗡声，随后看见第一架台风型飞机出现了。在比利时，天气放晴了，现在空军中队出现在了眼前，一次出现一架。当那些飞机开始在头上盘旋的时候，洛夫和萨瑟兰重新坐下来，感到放心了。

在他的侦察车上，兰顿上尉正在察看地图。整个纵队已经过了这个次要的本梅尔村岔路口，拐向了右边。这时，兰顿听见了一声猛烈的爆炸。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谢尔曼型坦克的链轮慢吞吞地升到空中，飞到前面的树上"。他马上明白，领先的一辆坦克被击中了。塞缪尔森中尉在前面更远的地方，迅速证实了这个事实。

在远处，火炮开始发出轰鸣，黑色的烟雾旋转着翻滚着升上天空。行列的后面，鲁珀特·马哈菲中尉知道，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纵队突然停了下来。大家感到困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开始交战的时候，无线电上的说话声走了样，语无伦次。"似乎有大量的喊叫声，"贾尔斯·范德勒记得，"于是我告诉乔，我最好到前面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位爱尔兰近卫团的指挥官同意了。"尽可能快点告诉我！"他告诉贾尔斯。

兰顿上尉已经朝前面赶过去了。兰顿从停下的装甲车旁边缓慢向前挪动着，来到马路上的一个弯曲处。在前面，他看见那4辆领先的坦克，包括塞缪尔森的那辆坦克，全都被击毁了，有的坦克在燃烧。炮弹来自左边树林里的一门自行火炮，在埃尔斯特镇附近。兰顿命令他的司机把坦克开进道路弯曲处一幢房子的院子里。几分钟以后，贾尔斯·范德勒来到了他这里。立即，机枪的火力迫使两人隐蔽起来。范德勒无法返回他的装甲车并向他的堂兄乔报告。他大声朝他的司机下士戈德曼喊叫，把装甲车倒回去———那是一辆亨伯型装甲车，上面有一个舱口，边上有一扇门。他每喊叫一次，"戈德曼就会打开舱口的盖子，而德国人就会在他的上方猛烈射击，迫使他再次砰的一声把盖子关上"。最后，贾尔斯烦透了，于是沿着一条沟，爬着回到乔的指挥车那里。

乔·范德勒已经在厉声发出命令了。他用无线电要求炮火支援：然后，看到台风型飞机在头上飞行，于是命令洛夫叫飞机进来。在那辆皇家空军的汽车上，萨瑟兰拿起话筒。"这是酒杯……酒杯……"他说道，"请过来。"台风型飞机继续在头上盘旋。萨瑟兰绝望了，又再次召唤："这是酒杯……酒杯……过来吧。"没有反应。萨瑟兰和洛夫面面相觑。"无线电坏了，"洛夫说，"我们什么信号也接收不到。台风型飞机在我们的头上乱转，而在地面上，炮轰正在进行。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无望、最令人泄气的事情，我注视着那些飞机在天上，但却对此无能为力。"洛夫知道，这些缓慢旋转的飞机"已经得到指示，不得根据猜测而进攻任何东西。"这个时候，贾尔斯·范德勒已经来到他的堂兄这里。"乔，"他说道，"如果我们再派坦克

沿着这条马路前进，那就要成为一场血腥的谋杀。”这两个人一起前往兰顿上尉的阵地。

现在，爱尔兰近卫团的步兵已经下了坦克，进入到马路两边的果园里。兰顿已经接管了其中的一辆坦克，由于无法找到隐蔽处，也无法驶离马路，所以他便前后开来开去，试图朝树林里的那门自行火炮开火。他每发射一炮，“那门火炮便发射五炮，作为回应”。

那位步兵上尉，他的部队也面对着同一个目标，但现在却在一条沟里聚成一堆。那位步兵上尉怒不可遏。“你以为你到底是在做什么？”他冲着兰顿喊道。年轻的兰顿保持平静。“我是在试图击毁一门火炮，这样我们就能到阿纳姆了。”他说道。

当范德勒堂兄弟二人出现的时候，试图击毁火炮未获成功的兰顿从坦克里爬了出来，迎接他们。“那里乱成一团糟，”乔·范德勒记得，“我们什么都尝试了。没有办法把坦克移出马路，从那个该死的堤坝的陡峭的边上下来。我能够得到的唯一的火炮支援，来自一个野战炮兵连，但那个炮兵连对准目标的速度太慢了。”他的孤零零的步兵连被压制得动弹不得，却又无法叫台风型飞机过来。“想必我们能够在什么地方得到支援？”兰顿说道。范德勒慢慢地摇了摇头：“恐怕不能。”兰顿仍然坚持。“我们能够到达那里，”他恳求道，“我们如果得到支援就能出发。”范德勒再次摇了摇头。“对不起，”他说道，“你就在这里待着，直到接到新的命令。”

在范德勒看来，显然，在G·I·托马斯少将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步兵到达爱尔兰近卫团之前，是不可能再次发起进攻的。在他们到达之前，范德勒的坦克部队被单独搁浅在无遮蔽的抬高的马路上。只是一门对准这条抬高的马路上的自行火炮，就已经有效地把整个救援纵队挡住了，那个地方就在阿纳姆的6英里外。

这一行坦克往后，在埃尔斯特村的附近，有一个温室，它的窗户神奇地几乎全部完好无损。在温室对面，约翰·戈尔曼中尉愤怒地抬头盯着马路。在这个走廊更后边，在瓦尔肯斯瓦德村，这个纵队就曾受阻停止前进，从那时起戈尔曼就感到，他受到了驱使要移动得快一些。“我们从诺曼底一路赶来，攻占了布鲁塞尔，走了半个荷兰作战，而且过了奈梅亨大桥，”他说道，“阿纳姆和那些伞兵就在前面，几乎能看得见那最后一座该死的大桥，但我们被挡住了。我从未感到过这种病态的绝望。”

---

1. 圣优西比乌斯（St.Eusebius，？—310），意大利籍教皇（310年4月至8月在位），对接纳基督教受迫害时变节者重新入教持有异议，被罗马皇帝放逐西西里岛至死。

2. 格雷伯恩在阿纳姆战役中阵亡了。9月20日，他站在一辆敌人的坦克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的地方指挥他的士兵撤退到一个主要的环形工事。由于他在交战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忠于职守，死后获得了英国最高的军事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原注（译者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Cross］，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于1856年颁发的铜质勋章，授予有杰出功勋的英国军人。）

3. 反坦克导弹发射器（Panzerfauster），这是一种美国无后坐力的反坦克火箭筒的德国版，能够极其精确地发射20磅重的炮弹。——原注。

4. 在这个动物园里，有12000只信鸽，那是德国人从阿纳姆全城养鸽子的人那里收集来的。由于害怕荷兰人会使用这些鸽子传递报告，所以这些鸽子便被没收，养在动物园里。德国士兵每天都来清点鸽子的数目，甚至命令把死去的鸽子也留下来，等德国人来核对它们的注册号码。——原注

5. 他命令，属于南斯塔福德军团的半个营前往阿纳姆。这个营的另外一半在第二次空运的时候才能到达，那时这些部队也将动身，为哈克特的第十一营的进军补充兵力。——原注

6. 拉格（Laag）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有其独有的教义和崇拜形式。

7. 联合王国国旗（UnionJack），即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国旗，也就是英国国旗。

8. 此后不久，在勘察英军阵地的地形时，沃迪被一枚迫击炮弹炸死了。——原注

9. 伞兵们注意到，在那场战役中，阿拉伯人在彼此喊着口号的时候，似乎每次交流都用这两个字开头。在阿纳姆，这个战斗口号则有了特殊的意思。它使得北坡道两边的伞兵们能够确定，在各个楼房和地点的人当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因为德国人似乎不能发出这两个字的音。按照希拉里·圣乔治·桑德斯在其《飞往战斗》一书中的说法，这个战斗口号“似乎能激发起士兵们做出最大的努力”。

10. 战功十字勋章（MilitaryCross），授予英国陆军军官的十字勋章。

11. 这应该是在战场上通话时用的暗语。“长着羽毛的朋友”，应该就是一○一空降师的“尖叫的老鹰”，“小马倌”自然就是爱尔兰近卫团。

12. 贝斯特，原文是Best，字面意思是“最好的”，但对执行任务的美军来说，它恰恰是“最不好的”。所以“取名不当”。

13. 荣誉勋章（CongressionalMedalofHonor），由美国国会授予的最高军

功勋章。

14. 见科尼利厄斯·瑞恩著，《最长的一天》，第63、300页。——原注

15. 勃朗宁（JohnMosesBrowning，1855 - 1926），美国枪械和自动武器设计师，因设计自动步枪而闻名，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武装部队普遍使用勃朗宁设计的自动武器。

16. 随后在这些区域进行的为时4个多小时的疯狂而又混乱的战斗中，八十二师的一位最受人爱戴的军官、该师的最重量级拳击冠军安东尼·斯蒂芬尼奇上尉阵亡了。“我们一起走了这么远的路，”他告诉他的士兵们，“告诉小伙子们好好干。”然后他死了。——原注

17. 在对飞机数量进行整理的时候，有些不一致之处。美国人给的数字是总共3807架飞机，英国人给的是4000架飞机。上面所使用的总数，系来自布朗宁将军的军部战后报告，它表明，数字上的不同处似乎在于战斗机的数目。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有674架战斗机从英格兰的基地起飞，为第二次空运护航，但没有被包括进这个数字里的是193架在比利时基地里的飞机，而如果加上去的话，战斗机的总数就应该是867架。有关市场花园行动的空中军事行动的最好叙述，尤其是在涉及运送兵员的飞机方面，无疑是美国空军的官方杂志《师的史实研究》第97期中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是约翰·D·沃伦博士，题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中的空降行动》。——原注

18. 这个故事大概是杜撰的，但荷兰人愿意讲这个故事。按照奥斯特贝克的特尔霍斯特太太的说法，当英国伞兵和他们的装备，包括一门反坦克炮上了德里尔的渡船的时候，船工皮特面对着一种两难：他不知道是否应该让他们付费。等他们到达北岸的时候，皮特决定给他们免费。——原注

19. 尽管众多的目击者证实了这个故事，但我不想吐露这位军官的名字。有关他的自杀，仍然还有疑点。他既受大家喜爱又勇敢。他可能确实用自己的手枪自杀了，也可能是被狙击手杀死的。——原注

20. 达利风格的（Daliesque），是由人名派生出来的形容词。达利（Salvador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21. 雪利酒（sherry），原产于西班牙的一种白色或者深褐色的烈性葡萄酒。

22. 在荷兰著名军事史家西奥多·A·博尔里中校的几部专著中，也提出了相

同的观点。“倘若厄克特在那里的话，”他写道，“他完全可能放弃对大桥的防御，如果可能的话，把弗罗斯特的那个营召回来，把他原先的6个营以及刚刚着陆的第四伞兵旅中的3个营集中起来，在下莱茵河北岸的某个别的地方建立一个坚强的桥头阵地……让在韦斯特博文山的高地……成为这个桥头阵地的中心。在那里，他们便可以等待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到来。”——原注

23.　　圩田（polder），指荷兰等国围海而造的低田。

24.　　这里的“皮普”，即希克斯，全名是“皮普·希克斯”。上面的“查尔斯”，即麦肯齐，全名是“查尔斯·麦肯齐”。

25.　　我认为，这场争吵要远比上面的叙述激烈，但可以理解的是希克斯和哈克特这两位好朋友，都不愿意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有关所发生的事情，起码有四种不同的说法。我的重现所根据的是对哈克特、希克斯和麦肯齐所作的采访，还有在厄克特的《阿纳姆》一书第77—90页中的叙述，以及在希伯特的《阿纳姆战役》一书第101—103页中的叙述。——原注

26.　　当然这是比喻。资产负债表（balancesheet）表现的是一个公司的收支总差额。这里比喻的是，市场花园行动赢得了多少，又付出了多少，这当中的差额。

27.　　当然这是比喻。这里的童话（fairytale），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即“谎言，不可信的事情”。

28.　　马尾藻海（Sargassosea），北大西洋的一部分，在西印度群岛东北，以有大量马尾藻漂浮水面而得名。［这里的海（sea）是小写，用作比喻，所以才有“一个马尾藻海”一语。马尾藻是海藻的一种。］

29.　　战后高夫得知，霍罗克斯将军也一直在思考一个类似的主意。他记得，曾经有一支快速侦察部队走在英军纵队的前面，并与美军第一○一师会合，因而他认为，也完全可以由一支类似的快速侦察队碰碰运气，抵达阿纳姆大桥。“文森特·邓克利上校接到了命令，要他率领这支部队，”高夫说道，“而且就像我一样，他也承认，他整整一天都在因为想到这个而着慌，而老是小便。”——原注

30.　　“灰色的地毯”，喻指德国人的尸体摊开来，就像地毯一样。德国人穿灰色制服，所以是“灰色的地毯”。

31.　　这个德国人当然不会知道塞科姆的名字，这里的“豪普特曼先生”是德语中的常用名，类似于我们的“老张”、“老李”，随便说说，但大家都明白指的

是对方。

32. 在阿纳姆战役的大多数时间里，这家医院都是被英军和德军双方的医生和卫生员共同使用，来照看他们的伤员。塞科姆由于是德军的俘虏，于是便被送到了离德国边境大约5英里远的荷兰小镇恩舍德。在那里待着期间，他的两条腿都被截肢了。他于1945年4月被解放。——原注

33. 在9月22日，星期五，迪恩 - 德拉蒙德在离开阿纳姆大桥附近的这幢房子后不久便被俘了。在费尔普附近一座用来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他发现了一个可以藏身的壁橱。在这个狭窄的地方，他待了13天，给自己实行定量供应，只喝几口水，吃少量的面包。10月5日，他逃脱了，与荷兰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于10月22日晚被带到了位于奈梅亨的第一空降师战地医院。在阿纳姆的时候同他在一起的那三个人之一，迪恩 - 德拉蒙德的勤务兵阿瑟·特纳，也被俘了，也被带到了费尔普附近那座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最终他被送到了德国的一个战俘营，于1945年4月被解放。迪恩 - 德拉蒙德本人的故事，在他自己写的《返程车票》一书中，得到了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讲述。——原注

34. “六膛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德语，亦译“多级火箭发射器”。

35. 米尔本后来在奥斯特贝克的特尔霍斯特家的地下室里被俘了。他失去了左眼，两只手在阿珀尔多伦由一位德国外科医生截肢。在这场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待在德国的一个战俘营里。——原注

36. 当时厄克特被困在那个小阁楼里，自己能否逃走都是个问号；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两位中校的部队就在几百码远的地方，亲自指挥更是无从谈起。真是既悔之莫及又无可奈何。

37. 贝利桥（Baileybridge），即军用活动便桥，根据20世纪英国工程师贝利（DonaldC.Bailey）的姓命名。

38. 按照比特里希的说法，德国人从战俘中得知，厄克特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他还声称：“我们正在监听无线电信息和电话。”——原注

39. 英国人有关阿纳姆的许多报道，包括切斯特·威尔莫特杰出的《为欧洲而斗争》一书，都暗示说，布朗宁对厄克特此刻的形势的了解，实际上不止这些。对传递到军司令部的分散而又不确定的信息仔细检查一下便可得知，从阿纳姆防区发出的第一个直接信息，是在19日上午8：25到达布朗宁那里的。那一天后来，又有两个信息来到了，信息的内容是大桥的情况、部队的位置，以及要求空军支援。尽管发出了许多给出了真实情况的电报，但这些电报却没有被收到，而收到的这三个电报又恰恰没有表明厄克

特的师正在被有条不紊地消灭。某些人士批评蒙哥马利和布朗宁，说他们没有采取更迅速、更有效的步骤，但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因为此刻，他们对厄克特的严重问题实际上一无所知。——原注

40. 格兰瑟姆（Grantham），英格兰林肯郡城镇，因被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比》（1839）述及而闻名。

41. 阿斯克特（Ascot），在英格兰伯克郡的温莎 - 梅登黑德区，以赛马场闻名。

42. 这里的“哈里”即指亨利·阿瑟·金。“哈里”（Harry）是“亨利”（Henry）的昵称。

43. 戴夫（Dave），是驾驶员戴维·洛德的名字戴维（David）的昵称。

44. 空军上尉戴维·洛德是空战十字勋章的拥有者，死后又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后来，这三位皇家空军军官和那4位陆军发送员——空军少尉R·E·H·梅德赫斯特、空军中尉A·巴兰坦、下士尼克松、驾驶员詹姆斯·里基茨、驾驶员伦纳德·悉尼，以及驾驶员阿瑟·罗伯特姆——他们的尸体被辨认了出来，埋葬在阿纳姆的英军基地。——原注

45. 有关这个故事，我感激约翰逊太太。她最初是从第五○二团的副官休·罗伯茨上尉那里得知的。尽管罗伯茨上尉并没有提到那位营长的名字，但我却必须认定，那是二营的史蒂夫·查普伊斯中校。约翰逊上尉只记得，他是“6个星期以后在英格兰醒来——瞎了，聋了，哑了，轻了40磅，头上有一块大的保护性覆盖物”。后来，除了部分失明之外，他康复了。为了写这本书，我与军士多恩进行了通信并采访了他，他没有怎么多说他在拯救约翰逊上尉的生命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过他承认，他是起了作用。他写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否想要毙了那位医生。”——原注

46. 在诺曼底，范德弗特曾带着骨折了的脚踝，打了40天的仗。见《最长的一天》。——原注

47. 苏族（Sioux），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尤其是在达科他州的印第安人部落。

48. 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即查理大帝，他是法兰克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800—814），称查理一世。他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加强集权统治，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学术的中心。

49. 巴尔巴罗萨（Barbarossa），即绰号为“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

（FrederickI，1123—1190），是德意志国王（1152—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

50. 附联式房屋（attachedhouses），即各个房屋彼此相连。

51. 观测射击（observedfire），由地面上、飞机上和军舰上的观察员观测弹着点或者炸点所进行的射击。

52. 折叠座手杖（shootingstick），此手杖的顶端可以打开，用作座椅。

53. 安齐奥（Anzio），意大利拉齐奥区城镇。位于深入第勒尼安海的半岛上。1860年归属意大利。1944年1月22日盟军在此登陆。

54. 布雷格堡（FortBragg），美国地名。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

55. 帕特（Pat）是帕特里克（Patrick）的昵称。

56. 麦凯认为这个报道指的是阿纳姆。事实上，它讲的是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在奈梅亨的会合。——原注

57. 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他是牧师不是作战人员。

58. 安非他明，这里用的英文是benzedrine，即amphetamine，是一种中枢兴奋剂。

59. 复视（doublevision），也就是把同一个东西看成两个。

60. 奎里佩尔死后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原注

61. 所谓矩阵（box），也就是四周严密设防。

62. 长期以来，英国人就对荷兰地下组织保持警惕。1942年，纳粹在荷兰的间谍头子赫尔曼·吉斯凯斯成功地渗透进了荷兰的情报网。从英格兰派去的特工被捕获了，被迫为他工作。在20个月的时间里，在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引人注目的反情报行动中，几乎每一个跳伞进入荷兰的特工，都被德国人拦截了。作为一种安全审查手段，英格兰的监听员得到指示，要留意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无线电信息中故意的错误。然而由这些“双重间谍”发出的信息，都毫无怀疑地被英国情报部门接受了。直到有两个英国特工逃脱，吉斯凯斯的“北极行动”才告结束。由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哄骗了盟军，因而吉斯凯斯忍不住对他的漂亮之举吹嘘起来。在1943年11月23日给英国人的一封明语电文电报中，他说道：“致伦敦亨特和宾厄姆先生公司继任人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的理解是，你们一直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努力在荷兰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是在担任你们在荷兰的唯一代表。……倘若你们想要前

来欧洲大陆，在一个广泛的范围里访问我们，那么我们就将给你们的密使以迄今为止我们所给予的同样关注……”结果，尽管情报网被清洗了，彻底改组了——而且尽管荷兰抵抗组织与这些秘密活动是各自为政的——然而在市场花园行动之前，许多英国军官仍然得到提醒，不要对地下组织过于信任。——原注

63. 道格（Doug）是道格拉斯（Douglas）的昵称。

64. 尽管这些数字完全是从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里引用的，但它们似乎过分了，尤其是在火炮、车辆和马匹的数字上。第十五集团军渡过斯海尔德河以及在安特卫普周围的撤离，是由欧根·费利克斯·施瓦尔布将军指挥的。1946年，施瓦尔布给出了下述估计：65000人、225门火炮、750辆卡车和运货马车，以及1000匹马（见米尔顿·舒尔曼的《西线中的失败》，第180页）。这个出入，我无法解释，但施瓦尔布的数字显得要更实际一些。——原注

65. 科尔德斯特里姆（Coldstream），位于苏格兰。著名的英国科尔德斯特里姆近卫团于1650年在此建立。

66. 次要道路（secondaryroad），亦可译为“支路”，“公路支线”。

67. “‘上帝与你同在’太长了，”库克说道，“所以我不断重复‘欢呼马利亚’（划上一桨），‘承蒙上帝的恩典’（再划上一桨）。”基普上尉试图记住他在普林斯顿当船员的日子，但却发现自己是在神经质地数着“7 - 6 - 7 - 7 - 8 - 9”这些数字。——原注

68. 按照查尔斯·B·麦克唐纳在《齐格菲防线战役》第181页中的说法，德国人在那座桥上部署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包括34挺机枪、两门口径为20毫米的高射炮，以及1门口径为88毫米的防空陆战两用火炮。——原注

69. 据说有一面美国国旗升起在铁路桥的北方，在烟雾和混乱之中，英军的坦克手们以为，那面旗是飘扬在公路桥的远端———这意味着，美国人已经夺取了那个远端。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但在我进行的许多次采访中，却没有发现一个参与者能够证实此事。我曾在整个地区走了一遍，似乎难以想象，有谁在朝公路桥对面望去的时候，会把在西边1英里处飘扬的一面旗帜误认为是这个渡口的终点。——原注

70. 惰轮（idlerwheel），也就是空转轮。

71. 德国人要炸毁奈梅亨公路桥的尝试，这里是首次披露。在此之前，哈梅尔将军从未就这个问题接受过任何人的采访。直到今天，炸桥用的炸药

为何失效仍然是个谜。许多荷兰人认为，这个主要的渡口是年轻的荷兰工人扬·范·胡夫救下来的，19日，他被美军第八十二师的联络官阿里·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派进了奈梅亨，给伞兵们做向导。据认为，范·胡夫成功地渗透进了德军的营地，到达了大桥，在那里他切断了通向炸药的电缆。他很有可能这样做了。1949年，一个调查这个故事的荷兰委员会感到满意的是，范·胡夫确实切断了一些电线，但却无法证实是否单是切断这些电线就实际上拯救了大桥。炸药和传输线在瓦尔河的伦特村那一边，诋毁范·胡夫的人断言，他到达传输线而又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争论仍然在激烈进行。尽管证据对他不利，但就我本人而言，我倒愿意相信这个年轻的荷兰人，因为在这场战役的进程中作为地下组织的一员所起的作用而被德国人枪杀了，他确实救了这座大桥。——原注

72. 鲁宾逊是英国人，所以称他们“美国佬”。

73. 加文将军说：“我无法告诉你我的士兵们的愤怒和心酸。我在黎明时候找到了塔克，他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敬佩的军人就是英国军人，但英国的步兵领导人却或多或少并不理解空降部队的同志情谊。对我们的士兵们来说，只有一个目标：拯救他们在阿纳姆的伞兵兄弟们。那是个悲剧。我知道，塔克想去，但我绝不能让他去。我手头的事情应接不暇。除此之外，塔克和我的其他前线军官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英国人在那个时刻也有一些难题。——原注

74. 加文的教名是詹姆斯（James），吉姆（Jim）是詹姆斯的昵称。

75. 第二天，麦凯和另外3个人从德国的埃默里希镇逃跑了。和他一起逃跑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丹尼斯·辛普森中尉，他曾经率领一个小组从那个校舍里突围。这4个人一路走过乡村，来到莱茵河。他们偷了一条船，一路划下去，来到了奈梅亨的盟军营地。——原注

76. 战斗疲劳症（shell - shock），亦译“炮弹休克”或“弹震症”，即因战争的可怕经历而精神异常。

77. 斯特恩式轻机枪（Stengun），系二战中英军所使用，其两位发明者谢泼德［R.H.Shepherd］、特平［H.J.Turpin］，一为英军少校，一为英国文职官员。德国人用英国枪，这是盟军空投的武器落入了德国人之手的一个例子。

78.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军与德军曾进行过巷战。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istory of the greatestbattle of world war II

第五部 巫婆的大锅

part five der hexenkessel(the witches'canldron)

1



“蒙蒂的坦克部队在路上！”在收缩了的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各个地方———从狭长掩体、现在已经变成了据点的房子、十字路口阵地，以及树林和田野里———满是污垢、脸色灰白的士兵们欢呼着，传递着这个消息。在他们看来，这个漫长、陷于孤立的磨难就要到尽头了。厄克特将军的莱茵河桥头阵地，成了地图上的一个指头尖样的地点。现在，在这样一个地区，它长不到两英里，中心地带有一英里半宽，在莱茵河边的基地有一英里长，“红毛鬼子”们被包围了，从三面遭到进攻，正在慢慢地被消灭。水、医药用品、食品和弹药极为短缺，所剩无几。作为一个师来说。英军第一空降师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士兵们再次被能获得解救的希望振奋起来。就是现在，暴风雨般的炮火在头顶上面咆哮着，那是在莱茵河对岸，在南边11英里之外的地方，英军的中型火炮和重型火炮，在猛烈轰击距离厄克特的前线只几百码的德国人。

通过电报，布朗宁将军已经许诺厄克特，到星期四时，第三十军的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将会进入射程，而且团的炮兵军官们也已经清楚了目标的先后顺序。厄克特意志坚定的老兵们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迅速依从了。通过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的通信网，“红毛鬼子”们第一次获得了良好的无线电联系，强烈要求炮兵几乎就朝他们自己的阵地上面开炮。炮火的精确性是令人振奋的，其效果，就是吓得德国人不知所措。那些一次次几乎就要击溃这些胡须满面、衣衫褴褛的伞兵们的猛烈的坦克部队的进攻，又一次次地被英军的火炮击退了。

即使有这种受欢迎的解救，厄克特仍然知道，德国人如果集结兵力，进行一次协调的进攻，还是能消灭他的微不足道的兵力。然而，士兵们却认为，现在有一点点希望———有一个能在最后时刻夺取胜利的机会。在这个星期四，前景稍微光明了一些，厄克特拥有了有限的通信手段，并与第六十四中型火炮团的火炮支援取得了联系。他知道，奈梅亨大桥是安全而且畅通的：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在行进；而且，如果天气保持晴好的话，索萨博斯基将军的波兰第一伞兵旅的1500名新的伞兵，就会在下午晚些时候着陆。如果波兰人能够在德里尔与赫维多普之间迅速摆渡通过莱茵河的话，那么这个凄凉的画面就大有可能改变。

然而，如果厄克特要顶住的话，那么补给品就像索萨博斯基的士兵的到来一样紧迫。在头一天，总共300吨的补给品当中，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只给哈滕施泰因区域送来了41吨。在反坦克炮和火炮大量到来之前，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性。由于缺乏地对空的通信手段———那种特殊的美国超高频设备，在D日，也就是17日那一天，起飞前几小时才匆匆送到英国人那里，波长又设置错了，因而毫无用处———所以师部的军官们不得不承认，皇家空军似乎不打算放弃误伤的警惕而大胆突袭，可是空降部队的士兵们却知道，那种大胆的突袭是绝对必要的，并且准备好了要冒险。厄克特已经连续给布朗宁发去了一连串的电报，敦促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进攻“机不可失的目标”，而不要考虑“红毛鬼子”们自己的阵地。这是空降部队的作战方式，这并不是皇家空军的作战方式。即使在这个关键的阶段，飞行员们仍然坚持，敌人的目标应该以几乎是绘图式的准确性，来精确地标出其位置———对被围困的伞兵们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在不断缩小的空降场里被压得动弹不得。皇家空军没有进行一次低空攻击，而在环形防线的周围，一直伸展向东到阿纳姆，这些地方的每一条马路、每一块田野和树林，都有敌人的车辆和阵地。

“红毛鬼子”们缺少他们拼命敦促的空中打击，被围在环形防线里面，几乎一刻不停地遭受迫击炮的轰击，并且在一些地方进行肉搏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近卫团装甲师的纵队上，他们相信爱尔兰近卫团装甲师正在朝他们隆隆驶来。厄克特并不那么乐观，他知道，他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师，敌人在人数上起码是他们的4倍，而且他们遭受着火炮和坦克的轰击，伤亡人数还在持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规模庞大而又全力以赴的努力，才能拯救他的师。这个顽强、英勇的苏格兰人敏锐地意识到，德国人能够像蒸汽压路机一样压倒他小得可怜的兵力，因而即使在告诉他的参谋们，“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桥头阵地”的时候，他也不透露自己的内心想法。

环形防线现在分成了两个防区，皮普·希克斯准将坚守西边，沙恩·哈克特准将坚守东边。希克斯的西边防区，配备的士兵系来自滑翔机飞行员团、

皇家工兵部队、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余部、一些波兰人，以及来自各个部队的使用多种语言的其他伞兵。在东边，是哈克特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的幸存者们、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其他士兵，以及皇家炮兵的第一机降旅轻武器团的士兵。北边（靠近位于沃尔夫黑策村的铁路线），从这些主要的防御工事蜿蜒向上，在这里坚守的是博伊·威尔逊少校的第二十一独立伞兵连———他们是那些带路的伞降信号员，再就是R·佩顿－里德中校的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第七营。沿着南边的基地，从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中世纪教堂的东边，一直延伸到在西边的韦斯特博文山高地，哈克特指挥着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另外的士兵，以及一支五花八门的兵力，其构成是南斯塔福德郡团的余部、第一营、第三营和第十一营，以及在两次负伤的迪基·朗斯代尔少校率领下的各种服务部队———号称“朗斯代尔部队”。在那个地区的中心，是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主力部队，他们是处于困境的炮兵，炮组不断努力为这困难的防线效力，而他们宝贵的弹药补给正在迅速减少。注

在战后报告中的整洁地图上，每一支部队的地点都是先用铅笔画出，再用墨水描过；但多年以后，幸存者们却回忆说，实际上毫无环形防线可言，没有前线，各个部队之间没有区分，没有相互协调的作战。只有受到震惊、扎着绷带、满身血污的士兵。不论是哪里，也不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有了口子，他们就跑过去堵上。希克斯准将的士兵们顽强地保卫着桥头阵地的防区。当希克斯去访问精疲力竭的士兵们时，他知道，“这是结束的开始，我认为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我们试图保持一张合乎情理的面孔”。

在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与丹尼斯·芒福德少校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停止传输的时候，汤普森就怀疑，弗罗斯特在大桥上的英勇抵抗已经结束了。厄克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把希望寄托在近卫团装甲师的身上，希望他们的坦克部队能够及时抵达第二营的余部。注这座跨越莱茵河的孤零零的大桥———德意志帝国的最后一道自然防线———一直就是主要的出击目标，是蒙哥马利要迅速结束战争的跳板。要是没有了这座大桥，那么第一空降师的困境，尤其是弗罗斯特勇敢的士兵的苦难，也就白白地蒙受了。正如厄克特对弗罗斯特和高夫所说，他再也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了。他们的帮助，必须来自第三十军的速度和装甲部队的力量。

对厄克特来说，当务之急就是索萨博斯基的波兰人一着陆，就尽快让他们过河，进入环形防线。索道渡船尤其适合这个行动。厄克特的工兵已经用电报与军司令部进行了联系，说那是“一种第24等级类型的渡船，能够运载3辆坦克”。尽管厄克特对韦斯特博文山高地感到担忧，也对德国炮兵可能控制那里的渡口感到担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敌军部队到达那里。由于坚守环形防线的士兵是如此之少，因而只派出了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

第一营的一个排去保卫那个阵地。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守卫那个高地。查尔斯·奥斯本少校的英格兰苏格兰边境团的D连，在星期日着陆后很快就被给予了这个任务，但按照奥斯本的说法，“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坚守过韦斯特博文山。我被派了出去，进行侦察巡逻，以便安排各个营的阵地。然而，等到我完成了这个任务，返回司令部的时候，计划又改变了。”到星期四时，奥斯本的士兵“被相当零碎地调动出去，进入了哈滕施泰因旅馆附近的一个阵地”。而在那个极其重要的高地上，没有一兵一卒。

星期三，工兵部队已经派出了侦察巡逻队沿着莱茵河进行侦察，以便汇报渡口深度、河岸的状况以及河水的流速等情况。皇家工兵汤姆·希克斯认为，这个勘测是“为了在第二集团军试图在河上架桥的时候，给他们提供帮助”。希克斯与另外三名皇家工兵以及一位荷兰向导一起，乘渡船过了莱茵河。他看到，渡船工人皮特“用一根缆绳操作着，那位老人家用手卷绕着缆绳，似乎水流帮助渡船过河”。希克斯把一颗手榴弹系在降落伞的一根索具上，每隔1英尺打上一个结，以此探测水深，估量流速。星期三的晚上，在波兰人的空投场又改变为德里尔村之后，另外一个巡逻队被派到了轮渡地点。“那是一个自愿参加的工作，”南斯塔福德郡团的列兵罗伯特，爱德华兹回忆说，“我们要前往在赫维多普村的河边，找到渡船，待在那里，保卫渡船。”

黑暗之中，一名中士、一名下士、6名列兵和4名滑翔机飞行员动身了。“在我们一头钻进我们和赫维多普村之间树林浓密的乡间的时候，迫击炮弹和子弹在猛烈地落下。”爱德华兹说。有几次这一行人遭到了射击，一名滑翔机飞行员负伤了。这个巡逻队来到地图上标明了地点的河岸，却发现没有渡船的影子，渡船消失了。尽管仍然有可能渡船停泊在南岸，但巡逻队却被告知，他们将在河的自己这一边找到渡船。士兵们立即散开，在渡口北码头两边的四分之一英里地带寻找。寻找没有结果，工人皮特的渡船无法找到。爱德华兹记得，负责这个巡逻队的那位中士得出的结论是，那条船要么是沉了，要么是根本就不存在。天一亮，士兵们便放弃了寻找，开始了他们危险的返程。

只不过几分钟，猛烈的机枪火力又伤了巡逻队的另外三个人，一行人又撤回到了河边。在那里，中士认定，士兵们分开会更有机会返回。爱德华兹与下士和两位滑翔机飞行员离开了。在“与德国人进行了小遭遇战和小冲突之后”，他的小组来到了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教堂，正好一颗迫击炮弹落地爆炸。爱德华兹被摔在地上，他的双腿充满了“小的炮弹碎片，靴子里满是血”。在教堂隔壁的一幢房子里，一名勤务兵给他包扎了伤口，并要这位受伤的列兵休息。“不过他并没有说在哪里休息，”爱德华兹回忆说，“房子里的每一英寸空间都塞满了重伤号。伤者和死者所发出的恶臭，是某种可怕的东西。”他决定离开，前往连指挥部，指挥部位于一个

洗衣房，“为的是找个人向他汇报。我把渡口的情况告诉了一名军官，然后与一位滑翔机飞行员进入一个放武器的坑道。我不知道另外的人是否回来了，也不知道和我一起来到教堂的那几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了若干时间之后，厄克特将军仍然对弗罗斯特的命运一无所知，于是便给布朗宁发去了电报：

大批敌人正在进攻大桥。不足的兵力形势严峻。敌人从黑尔苏姆村以东、阿纳姆以西进攻。形势严峻，但师的余部围绕着哈滕施泰因旅馆组成了严密的环形防线。对这两个地方尽早解救是绝对必要的。仍然控制着赫维多普村的渡口。

这个电报是经由第六十四重型炮兵团的通信网发出去的。甚至就在发报的时候，师司令部就已经得知，渡船没有找到。厄克特的军官们认为，德国人把它炸沉了。但实际上皮特的渡船仍然在漂浮着，大概炮火把系泊渡船的绳索炸断了。渡船最终由荷兰平民，在大约1英里之外的那座被拆掉的铁路桥附近发现了，船被冲到岸边，仍然完好，但已为时太晚，没有用处了。“我们要是能够再靠近奥斯特贝克几百码进行寻找的话，就会找到它。”爱德华兹说。

星期四上午，在视察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防御阵地之后，厄克特返回司令部，听到了这个毁灭性的消息。波兰人的空投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可是他用索萨博斯基的士兵来增援环形防线的唯一迅速的方式却消失了。注

当运载着波兰第一伞兵旅的那个长长的纵队，前往位于德里尔村的空投场的时候，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从领先的达科他型飞机的窗子往下面看，于是“得知了真相，得知了我一直怀疑的事情”。飞机编队在艾因霍温转向北边，他看到，“下面的整个走廊里交通堵塞，几百辆车辆挤在一起，混乱不堪”。烟从马路上翻腾着升上来。公路的各个地点，都有敌人的炮弹在爆炸，卡车和其他车辆在燃烧，而且“到处都有车辆残骸堆积在两边”。然而，车队却不知怎么仍然在移动。然后，在过了奈梅亨之后，车辆的运动停止了。透过低空云彩，索萨博斯基能够看见那条“岛屿”马路，以及马路上面被堵塞的、停顿下来的坦克。敌人的炮火正落在纵队的头部。几分钟之后，当飞机倾斜着飞向德里尔村时，阿纳姆大桥隐约出现在眼前。坦克正在过桥，从北边驶向南边，索萨博斯基意识到，他们是德国人。他震惊了，目瞪口呆，明白英国人已经丢失了这座桥。

星期三晚上，由于对缺乏有关厄克特形势的信息感到焦虑，也“因为设想我有可能被我自己的政府军法审判”，索萨博斯基于是便把谨言慎行抛到九霄云外。他要求见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布里尔顿将军。与波兰伞兵旅进行联系的联络官是乔治·史蒂文斯上校，索萨博斯基情绪激动地对他强

调，除非“把厄克特在阿纳姆周围的确切形势告诉他，否则波兰伞兵旅就不起飞”。史蒂文斯大吃一惊，于是带着索萨博斯基的最后通牒，匆匆前往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部。星期四早晨7点，他带着从布里尔顿那里得到的消息回来了。史蒂文斯承认，是有混乱，但进攻将按计划进行；在德里尔村的空投场并没有改变，而且“赫维多普村的渡口在英国人的手中”。索萨博斯基气消了。现在，当朝下看着战斗的全景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知道得比布里尔顿多”。当他看到，在奥斯特贝克的周围以及前面，明显是德国人的坦克，而且冰雹似的防空炮火正飞上来迎接他的士兵时，索萨博斯基被激怒了，他认为，他的旅“正在一场完全是英国人的灾难中被牺牲掉”。几分钟之后，他从飞机的舱门出来了，穿过防空炮火编织的帷幕落了下来。这位严谨的50岁的将军注意到，时间是下午5：08。

正如索萨博斯基所惧怕的那样，这些波兰人跳进了一场大屠杀。和以前一样，德国人正在等着呢。从敦刻尔克注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跟踪这些编队并测定它们的时间，而现在，由于有了远远多于以前的增援部队，所以这个地区布满了高射炮。当波兰人靠近的时候，25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突然出现，从云层中俯冲出来，朝这些靠近的飞机扫射。

当索萨博斯基从空中落下时，他看见，有一架达科他型飞机正朝地面落去，它的两个引擎都在燃烧。下士亚历山大·科察尔斯基看见，又有一架飞机坠落了，在飞机坠毁之前，只有十来个伞兵逃脱了出来。斯蒂芬·卡茨马里克中尉被悬挂在他的降落伞下面，他祈祷着。他看见，有这么多的曳光弹，“地面上的每一门炮都似乎瞄准着我”。下士乌拉代斯劳·科罗布的降落伞全是窟窿，他在一位头被炸掉了的波兰同胞旁边着了陆。

不到两英里半之外的波兰人的空投，给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战斗造成了片刻的停火。德国人的每一门火炮似乎都集中在那些摇摆着的、不能自卫的人们身上。“好像敌人的所有枪炮都一块儿举了起来，同时发射。”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注意到。从不断的炮击中获得的暂时缓解太宝贵了，不可浪费：士兵们迅速利用这个机会移动吉普车和设备，挖掘新的火炮掩体，把剩余的弹药搬上来，再次安置掩护网，并把空的炮弹箱从拥挤的狭长掩体里扔出来。

罗兰·兰顿上尉的坦克先头连，大约6个小时之前在前往阿纳姆的途中被挡住了，现在，兰顿在6英里之外的那条抬高了的“岛屿”马路上，痛苦地注视着这场空投。这是他所曾见到的最恐怖的景象。德国飞机朝不能自卫的波兰运输飞机俯冲过去，“把它们从空中炸飞出去”。伞兵们试图从燃烧着的飞机里跳出来，“其中的一些飞机机头翻转，一头栽在地上”。士兵们的尸体“在空中翻滚，那些无生命的形体缓慢地飘下来，在触地以前就已经死亡了”。兰顿差不多要哭出来了。“那该死的空中支援在哪里？”他纳

闷，“我们在下午被告知，我们在朝阿纳姆发起进攻的时候不能得到空中支援，因为所有可用的空中支援都要给波兰人。它现在在哪里呢？是因为天气吗？胡扯！德国人能飞行，我们为什么不能飞行？”兰顿从未这样感到泄气，他真心实意地想，要是有了空中支援，他的坦克部队“就能到达在阿纳姆的那些可怜的杂种那里”。在焦虑和绝望之中，他突然发现自己呕吐得厉害。

尽管对飞机和高射炮炮火的野蛮联合攻击感到震惊，但波兰旅的大多数人还是神奇地到达了空投场。甚至在他们着陆的时候，高射炮火和装有烈性炸药的迫击炮弹，也在他们当中爆炸。那些炮火是奈梅亨到阿纳姆的那条高架公路上的坦克和高射炮，以及德里尔村北边的炮组发射出来的，而且索萨博斯基看到，甚至机枪也在整个地区瞄准射击。士兵们在空中遭到了打击，在地面上又陷入致命的交叉火力中，他们现在不得不杀开一条血路，离开空投场。索萨博斯基在一条运河附近着陆了。当他跑开隐蔽的时候，碰见了一名伞兵的尸体，“他躺在草地上，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伸展开身子，”索萨博斯基后来写道，“一颗子弹或者炮弹碎片整齐地切掉了他头颅的顶部。我不知道，在战斗结束之前，我将看到我的士兵当中还有多少人是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这个牺牲是否值得。”[注]

德里尔的所有居民都被德国人所做出的凶猛接待吓呆了，也被伞降吞没了。波兰伞兵们落在这个小村子的各个地方，落在果园里、灌溉渠里、堤坝的顶上、圩田里，也直接落在村子里。有些士兵落在莱茵河里，由于无法脱掉降落伞，而被河水冲走，淹死了。荷兰人不顾落在他们四周的炮弹和机枪子弹，跑去帮助这些倒霉的波兰人。在这些荷兰人当中，就有科拉·巴尔图森，她是红十字会队伍的一员。

这次着陆，以在德里尔村南边不到两英里的空投场为中心，令村民们大吃一惊。没有使用伞降信号员，而且荷兰地下组织对这个计划也一无所知。科拉·巴尔图森骑着一辆带有木质轮胎的自行车，在一条狭窄的堤岸路上朝南骑去，前往一个叫霍宁斯旷野的地方，伞兵当中似乎有许多人是在那里着陆的。她既震惊又害怕，看不出还有人能够穿过德国人的炮火活下来。她预料会有大量的伤亡。令科拉惊讶的是，她看到，士兵们冒着炮火，排好队伍，分成小组，跑向安全的堤岸。她几乎无法相信，这么多的人仍然还活着，但她想：“英国兵终于到德里尔了。”

她有多年没说英语了，但科拉是德里尔唯一一位熟悉这种语言的居民。科拉希望，她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红十字会护士的服务将会被需要，同时还希望能当翻译。她匆匆赶上前，看见士兵们在疯狂地朝她招手，显然是“警告我，要我离开这条马路，因为有炮火”。但在她的“激动和愚蠢”之中，科拉并没有意识到，敌人连续齐射的炮弹就在她的四周呼啸。她朝她

遇见的第一群士兵喊道：“哈喽，英国兵！”但他们的回答却让她不知所措。这些人说另外一种语言———不是英语。她听了一会儿。有几个波兰人曾被强征入伍，加入了德国军队，几年前曾在德里尔驻扎过。她几乎立即就听出来了，那种语言是波兰语。这让她更加困惑了。

由于在敌人的占领下生活了多年，科拉是警惕的。在这个时刻，几名英国伞兵，以及一架被击落的飞机的机组人员，就躲藏在巴尔图森家的工厂里。那些波兰人似乎也同样怀疑，因为他们在仔细打量着她。他们不会说荷兰语，但有几个人用蹩脚的英语或者德语，试探着问了一些有保留的问题。他们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德里尔有多少人？村子里有德国人吗？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在哪里？对巴尔斯坎普家农场的提及，让科拉用德语和英语滔滔不绝说了起来。这个农场在村子东边不远的地方，尽管科拉并不是德里尔村那个小小的地下组织的成员，但她却听到她的哥哥约瑟夫斯，一个积极的地下组织的成员提到，那个农场的主人是一个荷兰纳粹。她知道，有一些德国部队在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周围，在莱茵河的堤岸马路上，并在沿着河岸的砖建筑物里为高射炮配备了人员。“不要到那里去，”她乞求道，“那里全都是德国军队。”波兰人似乎并不相信。“究竟是否应该信任我，他们并没有把握，”科拉回忆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然而我极度害怕这些人会前往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害怕他们会落入某种陷阱。”她周围的那群人当中，就有索萨博斯基将军。“由于他没有佩戴明显的标识，样子和别的人完全一样，”科拉记得，“因而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个精瘦结实的小个子是将军。”她记得，索萨博斯基正在平静地吃苹果。他对她有关巴尔斯坎普家的农场的信息非常感兴趣；完全是出于偶然，那个地方被选作他的旅的主要会合地点。尽管科拉认为，这群人当中没有人信她的话，但索萨博斯基的军官们现在却立即派出了传令兵，告知别的小组有关巴尔斯坎普家农场的情况。这个吃苹果的精干小个子现在问道：“渡口在什么地方？”

一位军官拿出了地图，科拉指出了位置。“但是，”她告诉他们，“它不运行了。”自从星期三以来，德里尔村的人就没有见过那条驳运船。他们从皮特那里得知，缆绳被砍断了，他们推测，那条渡船已经被毁掉了。

索萨博斯基气馁地听着。在着陆以后，他就派出了一个侦察巡逻队去寻找那个地点，现在他的惧怕被证实了。“我仍然等待巡逻队的报告，”他回忆说，“但这个年轻女人的信息似乎是精确的。我衷心地感谢了她。”[注]——一个令人畏惧的任务现在摆在他的面前。要迅速派兵帮助在环形防线里的厄克特被围困的士兵，索萨博斯基就得让他的部队坐船或者坐筏子渡过400码宽的莱茵河———而且是在夜晚渡河。他不知道厄克特的工兵是否找到了船，也不知道他自己能够在哪里找到足够的船。索萨博斯基得知，他的无线电机务人员无法与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司令部取得联系。是否已经制订

了新的计划，他一无所知。

现在，当科拉和她的救护队着手帮助伤员时，索萨博斯基注视着，他的士兵在烟幕弹的掩护下出发，把那个地区里的一点点抵抗打垮了。到目前为止，他的旅所遭遇到的唯一的主要抵抗，系来自火炮和迫击炮。至今尚无装甲车出现，这柔软的圩田似乎不适合坦克。索萨博斯基既困惑又生气，于是便在一幢农庄住宅设立了旅司令部，等待来自厄克特的消息。当他得知，在他的有1500名士兵的旅里，有500名没有能够到达，他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改善。恶劣的天气迫使运送着几乎整整一个营的飞机飞行夭折，返回了英格兰的基地。在伤亡方面，他的剩余兵力已经付出了残酷的代价：尽管他没有得到精确的数字，但到夜幕降临时，只有大约750名士兵集结了起来，在他们当中又有几十人负了伤。

晚上9点，厄克特的消息到了，是相当戏剧性地来到的。由于无法通过无线电与索萨博斯基取得联系，所以厄克特司令部里的那位波兰联络官茨沃兰斯基上尉，便游泳过了莱茵河。“我正在看地图，”索萨博斯基记得，“突然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走了进来，他浑身滴着泥水，穿着短裤，披着伪装网。”

茨沃兰斯基告诉将军，厄克特“想要我们那天夜里过河，他将准备好筏子把我们摆渡过去。”索萨博斯基立即命令他的一些士兵，前往河边等待。他们在那里待了大半夜，但筏子并没有过来。“在凌晨3点时，”索萨博斯基说道，“我知道，由于某种原因，计划失败了。我把我的士兵撤了回来，进入一个环形阵地。”他预料，黎明的时候，“德国人将会发起步兵进攻，将会有猛烈的火炮火力”。“在这个夜里，在黑暗的掩护下”渡过莱茵河的所有机会，都“丧失了”。

大河对面的哈滕施泰因旅馆里，在早些时候，厄克特已经给布朗宁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文如下：

（212144）有24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得知在阿纳姆的我师部队消息。我师剩余部队在非常小的环形防线里面。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猛烈，随后是局部的进攻。最恼人的是自行火炮。我们伤亡严重。弹药几乎用完。在24个小时解救是绝对必要的。

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小小驻地里，就在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部附近，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伯恩哈德亲王，极度痛苦地关注着事态的每一个新的、折磨人的进展。荷兰本来可能在9月初便轻而易举获得解放，但现在却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伯恩哈德谁也不责怪。美国和英国的战士们，正在为了让荷兰摆脱掉一个残酷的压迫者，而献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尽管如此，伯恩哈德还是迅速对蒙哥马利以及他的参谋部不再抱有幻

想。到9月22日，星期五的时候，伯恩哈德得知，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埃尔斯特被挡住了，而波兰人是在德里尔村空降，而不是在阿纳姆大桥的南边空降，这位33岁的亲王发脾气了。“为什么？”他愤怒地质问他的参谋长皮特·多尔曼少将，“为什么英国人就是不听我们的？为什么？”

在为市场花园行动制订计划时，荷兰的高级军事顾问被排除在外了，而他们的忠告本来可能是非常宝贵的。“比如，”伯恩哈德回忆说，“倘若我们及时知道对空投场的选择以及在空投场与阿纳姆之间的距离，我的人自然会说话。”由于“蒙哥马利具有渊博的经验”，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部也就“对什么都没有提出异议，而是接受了一切”。但自从荷兰的将军们得知霍罗克斯的第三十军打算要走的路线那一刻起，他们便焦虑地试图说服每一个能听他们说话的人，警告他们，使用无遮蔽的堤岸马路是危险的。“在我们的军事参谋学院里，”伯恩哈德说道，“我们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无数次的研究。我们知道，要是没有步兵，坦克纯粹是不能在这些马路上运作的。”荷兰军官们一再告诉蒙哥马利的参谋们，除非步兵陪伴着坦克部队，否则市场花园行动的进程无法维持。多尔曼将军描述说，他“在战前就曾亲自在那个地区用装甲部队进行过试验”。

伯恩哈德说，英国人“对我们的否定态度不予理会”，尽管每一个人都是“出奇的客气，但英国人却宁可自己制订计划，我们的看法被排斥了。大行其道的态度是：‘不要担心，老兄，我们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伯恩哈德注意到，甚至现在，“一切都怪罪到天气上了。在我的参谋们得到的普遍印象是，英国人认为我们是一伙蠢材，因为我们居然敢于对他们的军事战术提出质疑”。伯恩哈德知道，除了几位高级军官外，他“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并不特别受人喜爱，因为我的话现在正不幸地被证明是对的———而一般的英国人不喜欢被一个该死的外国人告知，他错了。”注

从布鲁塞尔，伯恩哈德把事件的信息充分告知了64岁的威廉明娜女王，以及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他们也不能影响英国人的军事决定，”伯恩哈德说道，“若是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丘吉尔，那不论对女王还是对我们的政府都不会有好处。他绝不会干涉战场上的军事行动，蒙蒂的声望太高了。我们确实是无计可施。”

威廉明娜女王焦虑地关注着这场战役的进程，就像她的女婿一样，她本来也以为荷兰会迅速得到解放。现在王室成员们担心，如果市场花园行动失败，“德国人将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可怕的报复。女王预料，德国人绝不会有同情心。女王感情强烈地痛恨德国人”。

在这次行动进行的早期，伯恩哈德已经告知威廉明娜：“不久我们就会攻占王宫和王室庄园。”女王回答说：“把它们全都烧掉。”伯恩哈德大吃一

惊，结结巴巴地问道：“您说什么？”威廉明娜说道：“我决不会再次踏进德国人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我的椅子上的地方。决不！”伯恩哈德试图平息她的怒气：“妈妈，您有点夸张吧。毕竟，它们是非常有用的建筑。我们可以用蒸汽消毒，用滴滴涕消毒。”女王固执己见。“把那些宫殿烧掉，”她命令道，“我决不会踏进其中的任何一座。”亲王拒绝了。“女王生气了，因为我和我的参谋部占用了宫殿（没有把它毁掉），而没有先问她。她有好几个星期不同我说话，除了涉及公事之外。”

现在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们只能“等待和希望。事态的变化令我们心酸和气馁。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代价昂贵的错误居然是上层犯下的”。荷兰自身的命运使得伯恩哈德更加焦虑：“我知道，如果英国人在阿纳姆被赶回去，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针对荷兰人民所产生的后果将会是可怕的。”

2



奥斯特贝克，这个战争当中“安静的孤岛”，现在成了交战的核心。在不到72个小时的时间里———从星期三往后，这个镇子就被炸得一塌糊涂。火炮和迫击炮的炮火，把它炸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这个镇子的宁静的秩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遭到蹂躏的光秃秃的景色，弹坑搞得地面坑坑洼洼，狭长掩体留下条条伤痕，木头的碎片和钢铁的碎片一片狼藉，红砖的粉末和灰烬厚厚的一层。在被火烧黑的树上，衣服和窗帘的碎片在风中怪异地飘动着。用空了的黄铜制子弹盒，在街道上深没脚踝的尘土中闪闪发亮。马路上建起了临时路障，用的材料是烧坏了的吉普车和其他车辆、树木、门、沙包、家具———甚至还有浴缸和钢琴。在被部分拆掉的房子和棚屋的后面，在街道的边上以及成了废墟的花园里，躺着士兵和平民的尸体，是并排躺着的。现在成了医院的度假旅馆，立在草坪当中，草坪到处乱放着家具、绘画和打碎了的灯；而有着花哨条纹的天棚，本来是给宽大的阳台提供遮阴的，现在成了肮脏的碎布片悬挂着。几乎每一幢房子都被击中了，有一些被烧毁了，镇子里没有剩下几扇完整的窗子。这是个被蹂躏的海洋，德国人现在把它称之为巫婆的大锅（DerHexenkes□sel）[注]，在这里，荷兰人———大约8000到10000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挣扎着要活下去。他们拥挤在地下室里，没有煤气和水电，而且就像在许多防区里的部队一样，也几乎没有食品，这些平民照料着他们的负伤者，照料着英国保卫者，而且当德国人负伤的时候，他们照料着他们的德国征服者。

斯胡努尔德旅馆现在是直接位于前线的一个主要的伤亡人员收容站，在这

家旅馆里，旅馆主人的女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已经害怕过了。我们周围到处都躺着伤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死去。若是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又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变得超然于我们以前所依恋的一切。我们的财物失去了。我们的旅馆在每一面都损坏了。我们甚至都不想它一下。我们没有时间想它。如果这个争斗要既夺去英国人的生命，又夺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将献出我们的生命。

在巷子里，在田野里和屋顶上，在房子废墟中成了路障的窗子后面，在下奥斯特贝克镇的那座教堂附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四周的鹿苑里，精神紧张、眼睛凹陷的伞兵们被部署在阵地上。轰炸的喧闹声几乎是持续不停，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被震聋了。在奥斯特贝克，英国人和荷兰人被震得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时间没有了什么意义，事件也变得模模糊糊。士兵和平民彼此安慰，希望能得到解救，但又几乎精疲力竭，以至于对能否活下去并不担忧了。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第七营营长R·佩顿 - 里德中校着重提到："在一切艰苦当中，睡眠的缺乏是最难于抵御的。士兵们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睡觉。"正如第十伞兵营的本杰明·克莱格上尉所说："我记得，那种疲倦超出了别的任何东西———几乎到达被杀死也值了这种程度。"中士劳伦斯·戈德索普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太疲惫了，以至于"有时但愿我能负伤，这样就可以躺倒休息一下"。但任何人都得不到休息。

在环形防线的各处———从这个指尖形状的突出部最北端那座白色的德赖鲁尔德旅馆，（部队将其称之为"白宫"）一直到下奥斯特贝克那座建于10世纪的教堂———士兵们打着一种混乱得让人难受的仗，进攻者和保卫者的装备和兵力疯狂地混合在了一起。英国伞兵们往往发现，自己使用的是缴获来的德国弹药和武器。德国坦克正在被他们自己布下的地雷炸毁。德国人驾驶着英国人的吉普车，用缴获来的、本来打算空投给英军空降部队的补给品增强了自己。"那是我们所曾打过的最廉价的仗，"霍亨施陶芬师师长哈策尔回忆说，"我们有免费的食品、香烟和弹药。"双方攻占和再次攻占彼此的阵地，次数如此之多，结果在一个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几个人有把握地知道，是谁占领着他们旁边的地点。对在环形防线沿线的各个地下室里躲避的荷兰人来说，那种不断的交换是可怕的。

化学工程师扬·沃斯奎尔，把他的全家———他的岳父母、他的妻子伯莎，以及他们9岁的儿子亨利———搬到了翁德沃特医生家里，因为这位医生用沙包强化的地下室似乎要安全一些。在一个阶段的不停射击达到高潮时，英军的一支反坦克部队在他们的上面一层作战。几分钟后，地下室的门猛地打开，一名党卫军军官带着几名党卫军出现了，要求知道大家是否

藏了英国人。小亨利正在玩一个英军战斗机的炮弹壳。那位德国军官举起炮弹壳。“这是英国人的大炮上的，”他喊道，“每一个人都上楼去！”沃斯奎尔清楚，地下室里的人将会被全部枪毙。他迅速干预了。“瞧，”他告诉军官，“这是英国飞机上的弹壳。我儿子发现了它，纯粹是为了玩。”那个德国人粗鲁地向他的部下示意，于是这群德国人上了楼，没有伤害这些荷兰人。过了一些时候，地下室的门又一次猛地开了。令每个人宽慰的是，是英国伞兵进来了，沃斯奎尔心中想，他们的样子“奇异，穿着伪装服，头盔上仍然插着树枝。他们就像圣尼古拉(注)一样，分发了巧克力和香烟，那是他们刚刚从德国人的补给卡车里缴获的”。

列兵艾尔弗雷德·琼斯，是博伊·威尔逊少校手下的一位伞降信号员，他也陷入了战斗的混乱中。在斯胡努尔德旅馆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琼斯和一个排的人坚守着阵地，这时他们看见一辆德国参谋车驶来。晕头转向的伞兵们注视着。只见那辆车在他们隔壁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们张大了嘴看着，”琼斯记得，“只见司机为军官打开车门，给他行了一个希特勒式的礼，然后军官朝房子走去。”琼斯回忆说，然后“我们全都醒悟过来，开火了，我们把司机和军官全都抓获了”。

有一些与敌人的遭遇战，就不那么不受个人感情影响了。滑翔机飞行员团的迈克尔·朗中尉率领一个作战巡逻队，在登讷坎普十字路口附近环形防线的北突出部，穿过一片茂密的矮树丛，这时与一个年轻的德国人撞了个面对面。那个德国人携带着一支施迈瑟式冲锋枪，朗拿的是一支左轮手枪。中尉喊叫着让他的士兵散开，同时开火，但那个德国人比他快了“一刹那”。朗的大腿中弹，倒在地上，那个德国人“只是右耳朵擦伤”。让朗恐怖的是，那个德国人扔过来一枚手榴弹，“在离我大约18英寸的地方落了地”。朗发狂似的把那个“木柄手榴弹”踢到一边。它爆炸了，没有对朗造成伤害。“他搜了我的身，”朗记得，“从我的口袋里取出两个手榴弹，朝树林里我的人那里扔去。然后他平静地坐在我的胸口上，用那支施迈瑟式冲锋枪开火。”当那个德国人向矮树丛扫射时，炽热的弹壳落下来，掉进了朗的作战服敞开的领子里。朗恼火了，推着那个德国人，指着那些弹壳，叫喊道：“太热了（Sehrwarm）。”那个德国人仍然在射击，说道：“哦，是的！”于是挪动了一下身子，这样，用过的弹壳就落在了地上。过了几分钟，德国人停止了射击，再次搜了朗的身。他正要扔掉中尉的急救药箱，这时朗指着自己的大腿。德国人指着被朗的子弹擦伤的耳朵。在矮树丛里，他们四周全是射击声，这两个人包扎了彼此的伤口。然后朗被带走了，做了俘虏。

缓慢地，但又是确定地，环形防线正在被压缩，因为士兵们被杀死，受了伤，或者是做了俘虏。陆军上士乔治·贝利斯是位滑翔机飞行员，他把他的无带轻软舞鞋带到了荷兰，因为他认为荷兰人喜欢跳舞。在一个花园里伪

装了的狭长掩体里，德国士兵“眨眨眼要他出来”，贝利斯靠墙和其他人并排站着，遭到了搜身和审问。贝利斯没有理会审问他的人，而是平静地取出了一个手镜，检查着他满是污垢、没有剃须的脸，问那个德国人：“你是否知道碰巧今天晚上镇里有舞会，是吗？”他被带走了。

别的伞兵实际上确实听到了舞会音乐。从德国人的扩音器里，传来了二战时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是格伦·米勒的《来劲儿》注。在战壕阵地和防御阵地，形容枯槁的伞兵们静静地听着。当唱片结束的时候，一个说英语的嗓音告诉他们：“第一空降师的士兵们，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中士伦纳德·奥弗顿“现在充分预料到，反正是不会活着离开荷兰了”。奥弗顿和附近的每一个人都用机枪做出了回答。中士劳伦斯·戈德索普也听见了扩音器中的话。几个小时以前，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了一个补给品的挂篮———结果却发现，里面装的不是食品或者弹药，而是红色的贝雷帽。现在，当他听见要求“投降，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他叫喊道：“滚开，你们这些愚蠢的杂种！”当他举起步枪的时候，他听见树林和战壕阵地里的其他人也喊了起来。机枪和步枪火力冒着火焰，那是被激怒的伞兵们在对准扩音器射击。那个嗓音突然停止了。

在德国人看来，投降似乎是英国人唯一明智的做法———第一机降旅的理查德·斯图尔特少校就发现了这一点。斯图尔特被俘了，由于发现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于是便被带到一个大司令部里。他生动地记得那位指挥官。比特里希将军“是个身材修长的人，大概四十岁出头或者四十四五岁，穿着黑色的长皮外套，戴着帽子”。斯图尔特回忆说。比特里希并没有审问他。“他只是告诉我，他想要我去找我的师长，劝他投降，以便使该师免于被消灭。”斯图尔特客气地拒绝了。那位将军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套。他告诉我，我有权拯救‘国家的鲜花盛开般的青年’”。斯图尔特再次说道：“我不能这样做。”比特里希再次敦促他。斯图尔特问道：“长官，如果我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你的回答会是什么呢？”那位德国指挥官缓慢地摇了摇头：“我的回答会是不。”斯图尔特说道：“那也是我的回答。”

尽管比特里希“从未看到有别的士兵像在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的英国人那样奋力作战”，但他却继续低估了厄克特的伞兵们的决心，而且他也错误地阐释了波兰人在德里尔的空投。比特里希虽然认为，波兰人的到达对陷入包围的英军第一空降师是“一种士气上的鼓舞”，但他却判断，索萨博斯基的主要任务是进攻德军的后方，并阻止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到达奈梅亨地区，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现在正在使用阿纳姆大桥。他认为，波兰人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干预了针对奥斯特贝克的军事行动”，命令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急调他的装甲营南下。这个强大的克瑙斯特战斗队（Kampfgruppe），现在有了25辆载重量为60吨的虎式坦克和20辆美洲狮型坦克的增援，它的任务是保卫埃尔斯特，阻止波兰人到达阿纳姆大

桥的南端，也阻止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他们会合。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在重组之后，奉命“要把奈梅亨地区的英美联军赶回到瓦尔河那边去”。在比特里希看来，英国人从奈梅亨发起的大举猛攻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而厄克特的师已经被牵制住了，被消灭了。他从来也没有考虑到，波兰人的目标是增援厄克特的桥头阵地。比特里希的战略将决定第一空降师的命运。

9月22日，星期五一大早，当克瑙斯特的坦克到达埃尔斯特的时候，厄克特将军得到了第三十军军长霍罗克斯的消息。昨天夜间，厄克特通过鬼怪式通信网发出了两封电报，告知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渡口不再被控制了。霍罗克斯却显然并没有被告知这个消息，这位军长的电报电文是：“第四十三师奉命，今天冒一切风险实现解救，目标是渡口。如果形势许可，你应该撤退到渡口或者渡过渡口。”厄克特回答：“我们将高兴地看到你。”

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酒窖里———“这是所剩的唯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厄克特回忆说———将军与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上校进行了商谈。“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大惊小怪，”厄克特记得，“但我感到，我必须做什么事情以实现解救———而且是立即实现解救。”

通常在黎明时分进行的迫击炮轰击，伞兵们将其称之为“清晨的仇恨”，现在，外边“清晨的仇恨”已经开始了。已经被毁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摇动起来，发出了回响，那是几乎被击中所产生的震荡，备受折磨的厄克特不知道他们还能够坚守多久。当初在阿纳姆空投场着陆的空降部队，总共有10005人———有8905人是该师的人，1100人是滑翔机飞行员和副驾驶———厄克特现在估计，他只拥有不到3000人了。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他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尽管厄克特现在与霍罗克斯和布朗宁有通信联系，但他却认为，他们并不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确信，”厄克特说道，“霍罗克斯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困境，我得想法让他知道形势的紧迫和严峻。”他决定派麦肯齐上校和埃迪·迈尔斯中校前往奈梅亨，去见布朗宁和霍罗克斯。迈尔斯是首席工兵，“他将处理在人员和补给品轮渡过河中的特殊安排”。“我被告知，”麦肯齐说道，“绝对重要的是，要向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强调，这个师事实上已经到了不再存在的程度了———我们只不过是聚集起来了正在坚持的个人。”厄克特认为，忍受的限度已经到了，而麦肯齐则要向他们强调，“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还得不到兵员和补给，一切就可能太晚了”。

当麦肯齐和迈尔斯准备动身时，厄克特站在一边。他知道，这个旅行将会是危险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也似乎有理由假定———如果霍罗克斯的电报可信，而且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进攻将会按预定时间发动———等到麦肯齐和迈尔斯过河的时候，将会有某种路线向奈梅亨开通。在两个

人离开的时候，厄克特“对查尔斯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告诉他要努力让他们意识到，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困境。查尔斯说他将竭尽全力，我知道他会的”。迈尔斯和麦肯齐带上了一个橡皮艇，乘坐吉普车出发，前往下奥斯特贝克和莱茵河。

10英里之外，在瓦尔河北边的奈梅亨地区，26岁的洛德·理查德·罗茨利上尉，率领着皇家装甲兵团第二营的一个连，他此时正坐在一辆装甲汽车里，准备下达出发的命令。夜间时，他的侦察队得到命令，要在进行进攻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前面，给这个装甲连带路，并与空降部队取得联系。前天，爱尔兰近卫团被阻挡了，从那天开始，罗茨利就“充分意识到了德国人在奈梅亨北边的力量”。一直以来，他既没有得到德里尔的波兰人的消息，也没有得到第一空降师的消息，因而“得有人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年轻的罗茨利记得，这个连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方式，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中打开一条路并走过去”。罗茨利认为，如果避开那条从奈梅亨到阿纳姆的主要马路，转而走西边的那些格子样的公路支线，就能有一个较好的机会，在清晨浓雾的掩护下，从敌人的防御工事当中快速跑过去，清晨的雾“能够促成我们走运”。天刚亮，罗茨利就下令出发。他的两辆装甲汽车和两辆侦察车迅速消失在雾中。在他后面跟上来的，是阿瑟·扬中尉率领的又一个装甲连。这支部队迅速行进，在奥斯特贝克村的西边转弯，沿着瓦尔河的河岸走了大约6英里。然后，又绕着圈返回，朝正北方向前往德里尔。“在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了几个德国人，”罗茨利记得，“但他们似乎比我们更吃惊。”两个半小时以后，即9月22日，星期五的早晨8点，市场花园行动中的地面部队与英军第一空降师之间的第一个会师实现了。蒙哥马利本来展望，48个小时就实现这个会师，但这个48小时被拉长成了4天又18个小时。罗茨利和扬中尉超过了近卫团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星期四的尝试，没有放一枪一炮便到达了德里尔和莱茵河。

跟随在他们身后的H·S·霍普金森中尉所率领的第三个连，则遇上了麻烦。清晨的雾突然散开，当这支部队被发现时，敌人的装甲部队便开火了。“第一辆车的司机里德立即被打死了，”霍普金森说道，“我上前去帮忙，但那辆侦察车正在熊熊燃烧，敌人的坦克继续朝我们开火。我们被迫撤退。”德国人再次暂时关闭了通往厄克特的第一空降师的解救道路。

从一开始就不断干扰着市场花园行动计划的那种奇怪而又造成严重损害的瘫痪，现在正开始强化。9月22日，星期五，黎明时分，人们等待许久的托马斯将军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将要从奈梅亨突破，去帮助仍然在埃尔斯特受阻的近卫团装甲师纵队。计划要求，有一个旅———第一二九旅———要沿着高架公路的两边进军，穿过埃尔斯特，继续前往阿纳姆；与此同时，第二个旅———第二一四旅，要在更西边的地方发起进攻，穿过奥斯特豪特镇，然后朝德里尔和渡口发起攻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

韦塞克斯人从埃斯考运河赶来，竟用了将近3天的时间———而这段距离只不过60英里多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敌人不断对走廊发起进攻，但有些人后来指责说，这也是因为办事有条不紊的托马斯过分小心所致，他的师就是步行走完这段距离，也会比这快。

现在，不幸的事故又再次降临在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身上了。第二一四旅的旅长是埃塞姆将军，令他既心酸又失望的是，他的一个先锋营，也就是第七萨默塞特营，迷路了，未能在21日的夜间渡过瓦尔河。“你究竟到哪里去了？”当这支部队终于到达时，埃塞姆愤怒地质问其营长。这些萨默塞特人在奈梅亨被人群和路障耽搁了，有几个连在混乱中分开，被指引着过了错误的桥。埃塞姆利用黎明的浓雾朝德里尔大举猛攻的计划失效了。这个分两路发起的进攻，直到上午8点30分才开始。在充足的光亮中，皇家装甲兵团的侦察队使敌人警觉起来，他们做好了准备。9点30分时，一位在奥斯特豪特的足智多谋的德国指挥官，熟练地使用了坦克和火炮，成功地把第二一四旅压制得动弹不得；而第一二九旅，在前往埃尔斯特，试图支援范德勒上校的爱尔兰近卫团的时候，则遭到了克瑙斯特少校集结起来的坦克的炮火轰击，比特里希将军曾命令这支坦克部队南下，粉碎英美联军的大举猛攻。在厄克特看来，这个关键的星期五，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命运依赖于立即的解救，但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攻占奥斯特豪特，却已是傍晚时分———时间太晚了，无法大规模移动部队去帮助奥斯特贝克被包围的士兵们。

别的人像埃塞姆一样，也对进攻的行动迟缓感到愤怒。乔治·泰勒中校率领着第五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他无法理解，“是什么把每一件事情都耽搁了”。他知道，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在到达第一空降师的时候，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3天。他不安地意识到，更高一级的司令部也在担心。星期四，他遇见了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将军问他：“乔治，你想做什么？”泰勒毫不犹豫地提出，想在星期四的晚上急速调派一支特遣部队，带上满是补给品的载重量为2.5吨的水陆两用车，前往莱茵河。“我的主意是无根据的妄想，”泰勒回忆说，“霍罗克斯显得有点吃惊，就像人们在认为一个建议不切实际而有时做的那样，他迅速换了话题。”

泰勒不耐烦地等待命令，以便调动他的营渡过瓦尔河。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才有一位少校，他是第三十军的一位参谋，过来告诉他，他的营将被给予两辆装有补给品和弹药的水陆两用车，要把它们带到德里尔去。除此之外，泰勒还将得到龙骑兵近卫军团的一个坦克连。“阿纳姆局势危急，”少校说道，“水陆两用车今天晚上必须过河。”那两辆满载的水陆两用车，是星期五下午3点到达集结地的，泰勒看着它们，不知道它们是否带上了足够的补给品。“想必，”他对他的情报官戴维·威尔科克斯中尉

说，“我们得带上比这更多的东西过河给他们。”

就在这些步兵走出奈梅亨桥头阵地的时候，麦肯齐上校和迈尔斯中校，就已经到达了德里尔索萨博斯基的那些波兰人那里。他们渡过莱茵河，顺利得令人惊讶。“只朝我们开了几枪，”麦肯齐说道，“而且子弹是从我们的头上面飞过的。”在南岸，一场全面的战斗却正在进行中，波兰人处在强大压力之下，抵挡着从埃尔斯特和阿纳姆方向赶来的敌人步兵的进攻。有一段时间，麦肯齐和迈尔斯在莱茵河的南岸等候波兰人。“已经用无线电告诉他们了，要他们密切注意我们，”麦肯齐说道，“但战斗打得如火如荼，索萨博斯基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他们骑着自行车被护送到索萨博斯基的司令部。

发现皇家装甲兵团的部队，麦肯齐很是振奋。但他要到达在奈梅亨的布朗宁将军那里的希望，却很快就被粉碎了。对洛德·罗茨利和阿瑟·扬中尉来说，霍普金森的第三装甲侦察连的车辆未能到达德里尔，就意味着德国人已经从后面把他们包围了；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进攻也尚未获得突破。麦肯齐和迈尔斯将不得不等待下去，直到有一条路线被打通。

罗茨利回忆说：“麦肯齐要求，立即用我的无线电与军司令部联系。”他开始给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发一封长长的电报，这位厄克特的参谋长并没有费心把电报译成密码。罗茨利站在麦肯齐的旁边，听见他“清晰地”说：“我们缺乏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我们不能再坚持24个小时以上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和祈祷。”罗茨利第一次意识到：“厄克特的师一定处境极为恶劣。”

麦肯齐和迈尔斯接着与索萨博斯基进行了交谈，谈到了让波兰人过河的紧迫性。“现在甚至几个人也能造成不同！”麦肯齐告诉他。索萨博斯基表示同意，但又问船和筏子从哪里来。如果顺利，要求送来的水陆两用车将会在晚上到达。迈尔斯想到，空降部队所拥有的几条可装载两人的橡皮救生筏，也可以一起使用，用缆绳连起来，就可以把它们在河的两边来回拉动。索萨博斯基“听到这个主意感到高兴”。他说，那会慢得让人痛苦，但“如果没有遭到抵抗，那么一夜间就能有两百名士兵被运送过河”。迈尔斯用无线电迅速与哈滕施泰因旅馆取得了联系，要他们为橡皮救生筏作好安排。已经决定了，这个可怜而又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将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开始。

在河对岸的桥头阵地上，厄克特的士兵们继续以非同寻常的勇气和决心战斗着。然而，在环形防线的一些地方，甚至最坚定的人也对解救表示出担心。在各处，一种正在降临的孤立感正在成长，这种孤立感也传染给了荷兰人。

杜沃·范·德克拉普，这位前荷兰海军军官，在早些时候被安排指挥一支由25个人组成的荷兰地下组织武装，与英国人并肩作战。这个小组是在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的建议下组织起来的，沃尔特斯是厄克特司令部里的荷兰联络官。扬·埃以克尔霍夫曾经在星期一帮助斯胡努尔德旅馆做好准备，以收容伤亡人员，他受命为这个小组找到德国武器。英国人只能给每一个人5磅弹药———如果能够找到武器的话。埃以克尔霍夫开着车，一直到了沃尔夫黑策，但找到三四支步枪。起初，这支武装刚刚被任命的指挥官，也就是范·德克拉普对这个主意感到欢欣鼓舞，但接着他的希望就渺茫起来。他的部下在与伞兵们并肩作战时，如果被俘，就会立即被处决。“英国人得不到解救也没有补给品，显然是不能坚持下去的，”范·德克拉普回忆说，“他们不能武装我们，也不能给我们饭吃，所以我决定解散这个小组。”然而，范·德克拉普却继续和伞兵们在一起。“我想战斗，”他说道，“但我认为我们并没有机会。”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本来由于伞兵们的到达以及每天都想看到“蒙蒂的坦克”的期望而激动万分，但现在，持续的炮轰和不断改变的战线，却把她吓坏了。“嘈杂声和苦难在继续，”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吓坏了，我除了炮弹和死亡之外什么也想不到了。”安赫的父亲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与英国医生在塔弗尔贝格旅馆里一起工作，他一有可能就把消息带给家人，但在安赫看来，这场战斗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我无法理解，”她写道，“在街道的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德国人，人们从街道两边彼此杀戮。在房子上打，在楼层上打，在屋子里打。”星期五，安赫写道：“英国人说，蒙蒂随时都会到这里。我不信。蒙蒂可以到地狱里去！他永远也不会到这里来。”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英国伤员和德国伤员拥挤在宽大的阳台上，躺在接待室、走廊和卧室里。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几乎无法相信这是星期五。这个医院正在不断易主。在星期三，旅馆被德国人攻占了，星期四又被英国人攻占，而到了星期五的上午，又被德国人再次攻占。对斯胡努尔德旅馆的控制，与避免它遭到轰击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一面大的红十字会会旗，在屋顶上飘扬着，而众多的小会旗则插在庭院的周围，但尘土和飞起的瓦砾却往往让这些三角旗受到了遮蔽。卫生员、护士和医生持续地工作着，除了不断流动的伤员，似乎对别的什么都不在意。

每天晚上，亨德丽卡只和衣睡上几个小时，起床后便帮助医生和卫生员，因为新的伤员正被抬了进来。她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开始的时候她注意到，在德国人当中有一种悲观情绪，与英国人乐观的耐心形成了对照。而现在，在受了重伤的“红毛鬼子”当中，有许多人似乎坦然准备接受他们的命运。她给一名伞兵送来了一份量非常小的汤和一块饼干，这家医院所能提供的一顿饭就是这么多，这时这位伞兵指着一位刚刚来到的伤

员。“给他。”他告诉亨德丽卡。她掀开那个人身上的毯子，看到他穿着德国制服。“是德国人，啊？”伞兵问道。亨德丽卡点了点头。“还是把饭给他，”英国人说道，“我昨天吃了。”亨德丽卡盯着他。“为什么打仗呢，真的？”她问道。他疲倦地摇了摇头。在她的日记里，她写下了自己的私人的惧怕：“我们的村子是否变成了一个最血腥的战场？让主力部队停滞下来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在翁德沃特医生的地下室里，沃斯奎尔一家与另外二十来个人一起躲避，既有荷兰人也有英国人，沃斯奎尔太太第一次注意到，地板上因为有鲜血而打滑。在夜间的时候，两位受伤的军官彼得·沃尔少校和肯·史密斯中校，被英军伞兵抬了进来，两人都受了重伤，沃尔伤在大腿上，史密斯是在肚子上。在伤员被放在地板上之后不久，德国人冲了进来，其中一人扔了一颗手榴弹。史密斯中校第十营的一等兵乔治·怀利记得：“先是一道闪光，然后是震耳欲聋的爆炸。”沃斯奎尔太太正坐在沃尔少校的后面，她感到她的腿“灼热疼痛”，在此刻变得黑暗的地下室里，她听见有人在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她感到，有一个男人的身体重重地跌倒在她身上。那是列兵艾伯特·威林厄姆，他跳在了沃斯奎尔太太的前面，为的是保护她。一等兵怀利看见，威林厄姆的背上有一个敞开的伤口。他记得，那个女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是一个孩子，那个死去的伞兵横躺在她的腿上，那个孩子似乎满身是血。“我的上帝啊！”怀利在失去知觉之际想到，“我们杀死了一个孩子。”这场凶猛的战斗突然结束了。有人点着了一个火把。“你还活着吗？”沃斯奎尔太太朝她的丈夫喊道。然后她伸手去找儿子亨利。孩子对她的喊叫没有做出反应。她确信，他死了。“突然我不在乎发生什么事情了，”她说道，“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她看到，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严重受伤，在尖声大叫。在她前面，沃尔少校的紧身短上衣“血淋淋的，敞开着口子”。每个人不是在喊叫，就是在啜泣。“安静，”沃斯奎尔太太用英语叫喊道，“安静！”她身体上面的那个沉重负担被拖走了，然后她看见，怀利在附近。“那个英国孩子站了起来，可以看出是在颤抖。他步枪的枪托拄在地上，那把刺刀几乎和我的眼睛水平，他抽搐着前后移动，试图站稳。动物一般的低沉声音———几乎就像狗吠或者狼嚎———正从他嘴里发出来。”

一等兵怀利的头开始清醒了。有人在地下室里点了一支蜡烛，一位德国军官让他啜饮了点白兰地。怀利注意到，酒瓶子有红十字会的标记，标记下面写的几个字是“国王陛下的军队”。当怀利被带出去时，回头看了看那位“死了孩子的”女士。他想对她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好”。注

那位德国军官要沃斯奎尔太太告诉英国人，“他们英勇地作战了，举止像绅士，但现在他们必须投降。告诉他们，结束了”。当伞兵们被带出去的

时候，一位德国卫生员给亨利做了检查。“他昏迷了，”他告诉沃斯奎尔太太，“他的肚子擦伤了，眼睛变了颜色，肿了，但他会没事的。”她一声不吭，点了点头。

在地板上，沃尔少校的肩膀由于挨了爆炸骨头从皮肤下突出出来，他喊叫着，咒骂着，然后再次失去知觉。沃斯奎尔太太弯下腰来，弄湿她的手帕，擦掉他嘴唇上的血迹。不远处，史密斯中校含糊地说了点什么，一位德国警卫转向沃斯奎尔太太，露出了询问的目光。“他要医生。”她轻声说道。那个士兵离开地下室，几分钟后与一位德国医生一起返回。那位医生检查了史密斯，说道：“告诉这位军官，对不起我得伤害他了，但我必须看他的伤口。告诉他咬紧牙关。”当他开始脱衣服时，史密斯昏厥过去。

天亮的时候，平民奉命离开。两位党卫军把沃斯奎尔太太和亨利抬了出去，送到街上，一位荷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指引着他们，来到一位牙医的地下室，那位牙医是菲利普·克劳斯医生。沃斯奎尔的岳父母并没有去，他们宁可待在家里碰运气。在克劳斯的家里，牙医热情欢迎这一家人。“不要担心，”他告诉沃斯奎尔，“会没事的。英国人会赢。”沃斯奎尔站在受了伤的妻子和孩子旁边，脑子里仍然满是夜间的恐怖景象，他盯着那人。“不，”他轻声说道，“他们不会赢的。”

许多伞兵，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忍耐几乎到了尽头，但也知道，他们不能独自坚持多长时间了。上士达德利·皮尔逊对“被德国人摆布”感到厌倦。在环形防线的北部边缘，他和士兵们被坦克追赶着，在树林里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不得不用刺刀一次次把德国人打退。最后，在星期四的晚上，当环形防线收紧的时候，皮尔逊一行人奉命撤退，他被告知，要用一颗发烟手榴弹掩护撤退。在不远处，他听见有一挺孤零零的布伦式轻机枪在射击。他从矮树丛当中爬了过去，发现有一个下士，那个下士藏在树林中的一个深坑里。“出来，”皮尔逊告诉他，“我来断后。”那个下士摇了摇头。“我不走，上士，”他说道，“我要待在这里。我不会让那些杂种过去的。”当皮尔逊返回时，他能听见那挺布伦式轻机枪在射击。他认为，形势没有希望了，他开始纳闷地想到，是不是投降会更好一些。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里，地面上散兵坑已是纵横交错，因为德国俘虏被允许自己挖坑，以便保护自己。在网球场附近的一个狭长掩体里，滑翔机飞行员维克托·米勒盯着另外一位飞行员的尸体，那具尸体伸开四肢躺在几码远的地方。射击是如此密集，结果人们无法搬动死去的人。米勒看到，自迫击炮上次轰击以来，那具尸体差不多被树叶和断裂的树枝掩埋了。他不住地盯着那具尸体，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收殓。想到他死去的朋友的容貌将会改变，他吓坏了，而且他确信，有“一种强烈的死亡的气味”。他感到恶心。他记得，当时他在疯狂地想：“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我们就会全都变成死尸。子弹将会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直到这里变

成一个坟场。”

别的士兵感到，长官既激励他们保持勇气，又不让他们知道事实。列兵威廉·奥布赖恩记得，在下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附近，“每天晚上都有一名军官过来，告诉我们要坚持，说第二集团军第二天就会到达。对此大家非常冷淡。每一个人都在问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那支该死的军队究竟在哪里。我们受够了”。中士爱德华·米切尔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在教堂对面的一个阵地里，有一个士兵把自己锁在附近的一个棚屋里。“他谁也不让靠近。每过一会儿他就会喊：‘来吧，你们这些杂种。’又把一份杂志撕得满棚屋都是。”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位孤零零的伞兵交替地喊着，射击着，然后又陷入一阵宁静。当米切尔和其他人争论怎样才能把他弄出来的时候，又是一阵猛烈的射击，然后又是宁静。他们赶到棚屋，发现这位伞兵死去了。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地区，受到炮弹的震撼、脑子受到震荡、倦于作战的士兵们在各处闲逛，终于对战斗毫不在意了。卫生员塔菲·布雷斯，曾在星期二料理了他的朋友安迪·米尔本被毁坏了的尸体，现在，当他处理伤员的时候，遇到了这些悲惨的、招人怜悯的人。布雷斯已经用完了吗啡，他正在使用纸绷带。他实在不忍心透露，他没有药了。“你要吗啡干什么？”他问一位受了极严重伤的伞兵，“吗啡是给真正受了伤害的人用的。你还好呢。”

当布雷斯给这个人包扎的时候，他意识到，身后传来了一种奇怪的鸣叫声。他转过身来，看见一位完全裸体的伞兵，上下挥舞着双臂，“发出了类似火车头的声音”。当布雷斯被那个士兵看到时，士兵开始骂起来。“去你的，这个该死的司炉工，”伞兵说道，“他从来都干不好。”布雷斯带着一个伤员来到环形防线附近的一幢房子里，他听见有一个人在柔声唱着《多佛尔的白色断崖》[注]。布雷斯以为，这个伞兵是在安慰其他的伤员，于是便朝着他微笑，点头表示鼓励。这个士兵突然向布雷斯猛扑过去，试图掐死他。“我要杀死你，”他大叫道，“你知道多佛尔什么？”布雷斯松开那掐在他喉咙上的手指。“它没事，”他轻声说道，“我去过那里。”那人后退了几步。“哦，”他说道，“那就没事了。”几分钟以后，他又唱了起来。别的人记得，有一位受了炮弹震荡的伞兵，夜里在他们当中走着，他在蜷缩着身子试图睡觉的人上面弯下身来，粗暴地把他们摇醒，盯着他们的眼睛，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收到信了吗？”[注]

尽管有一些令人怜悯的、受到震惊和绝望的人，他们的信念已经失去了，但成百上千的其他人，却被行为古怪、英勇无畏的士兵的行动激励着，那些士兵似乎完全毫不畏惧，拒绝向伤痛和艰苦低头。迪基·朗斯代尔少校是“朗斯代尔部队”的指挥官，该部队坚守着下奥斯特贝克教堂四周的阵

地，朗斯代尔似乎无处不在。“他是一个能激发起恐怖的人物，”中士达德利·皮尔逊回忆说，“他的一只胳膊吊在一条血迹斑斑的吊带上，头上绑着同样血淋淋的绷带，一个巨大的绷带绑在一条腿上。”朗斯代尔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激励着他的部下，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进攻。

准尉副官哈里·卡拉汉，给他的制服增加了额外的点缀———他在一个灵车里发现了一顶黑色的高帽子，于是不论到哪里都戴着它，对大家解释说，他已经被任命为“参加希特勒葬礼的空降部队代表”。卡拉汉记得，那位模样令人敬畏的朗斯代尔，对教堂里的人们发表了一篇声音洪亮、目空一切的演讲。军官和军士把伞兵们聚拢起来，把他们送到那座快成废墟了的古老建筑中。“屋顶没有了，”卡拉汉记得，“而且每一次新的爆炸，都把墙上的灰泥像瀑布似的震落下来。”士兵们无精打采地倚靠在墙上和断了的长木椅上抽烟，懒洋洋的，几乎睡着了。这时朗斯代尔爬上了布道坛，人们朝上盯着这个模样凶狠、血迹斑斑的人物。“我们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同德国人作战，”卡拉汉记得朗斯代尔这样说，“当时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现在也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滑翔机飞行员团的迈克尔·科里上尉在进入教堂的时候，“被我所看到的疲惫不堪所感染。但朗斯代尔的演讲是激动人心的。他的话让我感到震惊，感到骄傲。士兵们在进去的时候显得是被打败了，但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了新的精神。你可以在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

有些士兵似乎已经战胜了那种甚至能令人失去勇气的恐惧，那种恐惧是敌人装甲进攻的野蛮力量逐渐带来的。由于没有几门反坦克炮，伞兵们在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前无能为力，坦克和自行火炮在环形防线里随便移动，摧毁一个又一个阵地。然而，这些步兵却仍然以某种方式进行着还击，甚至60吨重的虎式坦克也被摧毁了———往往是被以前从未发射过反坦克炮的士兵摧毁的。一等兵悉尼·纳恩，原先曾热切地盼望能去阿纳姆，因为那会是从他英格兰兵营的“噩梦”中的一种逃脱，是对入侵他床垫的那只鼹鼠的一种逃脱，现在，他却以表面上的平静面对着一种更为可怕的噩梦。他与另外一位伞兵列兵诺比·克拉克一起，与比邻而居的一个狭长掩体里的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交了朋友。在迫击炮轰炸暂停期间，那位飞行员朝纳恩喊道：“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老弟，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辆非常大的坦克。是虎式的。”克拉克看着纳恩。“你打算怎么办？”他问道，“去在上面钻孔？”

纳恩小心翼翼地从掩壕的边上朝外看，那辆坦克确是“巨大”。不远处的灌木丛里，藏着一门反坦克炮，但炮组人员阵亡了，而在纳恩的小组里，谁也不会装炸弹和发射。纳恩和那位滑翔机飞行员决定爬过去。当他们爬出来的时候，被发现了，于是坦克开始开炮。“我们用鼻子在泥土上挖出了沟，我们就是趴得那么低，”纳恩回忆说，“我们小小的树林开始变得像一

个伐木营，因为树在我们四周纷纷倒下。”就在那辆虎式坦克“开始用机枪亲自关注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这两个人来到了反坦克炮旁边。那个飞行员朝下看了看炮管，高兴地叫喊了起来。“我们的炮直接对准了那辆坦克。倘若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就可能瞄得更准一些。”那位飞行员看了看纳恩，说道：“我希望这东西好使。”他拉了导火索。在随后的猛烈爆炸中，这两个人被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我们的耳朵不再耳鸣的时候，我听见周围的其他人开始大笑欢呼。”纳恩说。当他带着怀疑凝视时，他看见那辆虎式坦克被烈火吞没了，弹药在爆炸。那位滑翔机飞行员转向纳恩，庄重地握着手。“我们赢了，我想！”他说道。

许多人记得，第二南斯塔福德郡团的罗伯特·凯恩少校，是对付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真正专家。在凯恩看来，似乎自从他们到达以来，他和他的士兵们就一直被虎式坦克追赶和威胁着。现在，他小小的部队分头驻扎在下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里、马路对面的房子和花园里，以及一个姓范·多尔多伦的人家所拥有的洗衣房里，凯恩决心把他看见的每一辆装甲车都干掉。凯恩寻找运作的最佳地点，选中了范·多尔多伦的家。这位洗衣房主人不愿意离开。凯恩环视了一下后花园，说道：“唔，既然如此，我就在那里挖。我要把你的地方用作我的弹药临时堆积处。”

凯恩所使用的是一种火箭筒样的反坦克武器，称之为步兵用反坦克炮，用以摧毁装甲车。星期五，当巷战愈来愈猛烈的时候，凯恩由于自己在不断射击，耳朵鼓膜震破了。他在耳朵里塞进了几条绷带，继续抛掷炸弹。

突然有人朝凯恩喊叫，有两辆坦克正在马路上驶来。在一座建筑的角落里，凯恩给步兵用反坦克炮装上炮弹，然后瞄准。上士理查德·朗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吓呆了一样旁观着。“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勇敢的人，”朗说道，“他开始射击的时候，离坦克只有100码远。”在凯恩能够再次装弹之前，坦克还击了，炮弹击中了他身后的建筑。在打旋的浓厚灰尘和瓦砾之中，凯恩射击，射击，又再次射击，他看见，第一辆坦克里的士兵跳了出来，用机枪在街道上扫射。立即，在凯恩周围，伞兵们用布伦式轻机枪开火了，凯恩记得：“那些德国人的脚好像被打得掉了下来。”他再次装上炮弹，开火了，上士朗看到，“有一道巨大的闪光。炮弹在步兵用反坦克炮里面没有飞出去就爆炸了。凯恩少校双手伸向天空，朝后跌倒了。当我们到他那里时，他的脸是黑的。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我瞎了呢。’”上士沃尔顿·阿什沃斯，是那些严重射伤了德国坦克人员的布伦式轻机枪手之一，当凯恩被带走的时候，阿什沃斯毫无表情地凝视着，“我所能够想到的就是，这个可怜的该死的杂种。”

没过半小时，凯恩的视力恢复了，但他的脸上却嵌进了金属碎片。他拒绝使用吗啡，认为自己“并没有伤得足以待在那里”，于是返回参加战斗———就像W·A·泰勒上尉所描述的那样，“去增加他那袋子里的敌人坦克

的数量”。到星期五下午时，这位35岁的凯恩有了满满一袋子。自从18日着陆以来，他总共击毁或者赶走了6辆坦克，还击毁了若干门自行火炮。

在整个桥头阵地，凶猛的士兵们进行着勇猛的抵抗，对他们自己的安全毫不在意。下士伦纳德·福莫伊是菲奇上校第三营的幸存者之一，第三营不顾一切行军，要到达阿纳姆大桥上的弗罗斯特那里，到星期五黄昏时，他们已经在西郊占领了一个阵地，离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师司令部不远。“我们实际上是从所有的方向遭到打击。”福莫伊记得。突然一辆虎式坦克从阿纳姆方向驶来，隆隆驶向福莫伊所在的一群人，暮色之中，福莫伊看见坦克上的炮塔在旋转。中士“凯布”·卡洛韦拿起一个步兵反坦克炮，向前冲去。“我到哪里你就到哪里！”福莫伊听见他叫喊道。在距离坦克大约50码的地方，卡洛韦开火了。炸弹在履带上爆炸，坦克停了下来，但几乎同时，卡洛韦被坦克上的枪炮杀死了。“那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举动，”福莫伊记得，“他恰好被撕成了两半，但他却救了我们的命。”

列兵詹姆斯·琼斯记得，有一位他不认识的少校，他要琼斯和另外3名士兵和他一起到环形防线的外面去，以便寻找枪支和弹药。这一小组人突然撞上了一个机枪掩体里的一些德国人。少校跳了起来，开火，同时喊道：“这些杂种有一些不会活下去！”当德国人开火时，这组人分散开来，琼斯被困在一辆废弃的吉普车后面。“我说了一句祷辞，等枪击再次停止后，又返回了营地。”琼斯回忆说。他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少校。

高级军官树立了他们的士兵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榜样，而且他们所留下的印象，自己却往往并没有意识到。皮普·希克斯准将在整个战役中都拒绝戴头盔。伞兵威廉·钱德勒，是弗雷迪·高夫少校侦察连的一员，星期天时，他的小组在北边的豹子路线上与其他人分开了，之后奉命返回到奥斯特贝克的一个十字路口，他记得，希克斯的红色贝雷帽在成群的戴着头盔的士兵当中格外显眼。“喂，准将，”有人大声说，“把你该死的头盔戴上吧。”希克斯只是微笑，挥挥手。“我不是要试图穿着入时，”希克斯解释说，“我只是受不了那个在我的头上弹来弹去的该死的东西。”他的行为可能与此多少有点关系。有些士兵回忆，希克斯每天都频繁地向厄克特的司令部里跑，他每次都是慢跑着去，最后又是在德国人的炮火前面一步远快速奔跑。“当我完成那些疯狂的冲刺的时候，我都充分感到了我的年纪。”希克斯承认。

沙恩·哈克特准将，曾经率领他的第十营和第一五六营进行了勇敢但又徒劳的尝试，试图突破德国人北边和东边的防线，从而到达阿纳姆，现在又率领他的这两个遭到重创的营返回到奥斯特贝克地区，他不断地访问他的士兵们，用温和的话语赞扬他们。乔治·鲍威尔少校正率领着一五六营的两个排，坚守在北边环形防线的阵地上。“我们缺少食品、弹药和水，”鲍威尔记得，“而且我们的医疗用品也很少。”星期五，哈克特突然出现在鲍威尔

的指挥所里，鲍威尔说：“我们的指挥所实际上直接突了出去，伸进了敌人的营地。”哈克特解释，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来访问鲍威尔。“但你们一直这么好地顶住，乔治，因而我并不为你担心。”鲍威尔很是得意。“长官，到目前为止我真正犯下的唯一的错误，”他说道，“就是把司令部安置在一个养鸡场里。我们身上满是跳蚤。”上士达德利·皮尔逊是第四旅的首席文书，在他看来，哈克特之所以赢得了尊敬，是因为“他与我们共享，好像他没有头衔似的。如果我们吃饭，他也吃饭，如果我们挨饿，他也挨饿。他似乎没有野战炊具。在星期五时，他与我们一起坐了下来，用手指吃了一小片食物”。皮尔逊出去找到了一副刀叉，在返回的路上，他的脚后跟受伤了。但是，他说道：“我认为，准将确实应该得到比他在我们当中的生活方式好一些的东西。”

通信兵肯尼思·皮尔斯，隶属于师司令部的指挥部炮兵通信部队，他将永远记得那个前来帮他忙的人。皮尔斯负责大蓄电量的蓄电池组，称之为“笨蛋”———每一个蓄电池组大约25磅重，装在木盒子里，盒子上有铸铁把手———这些蓄电池组为信号接收装置提供电能。在傍晚稍晚些时候，皮尔斯正在努力把一个新的“笨蛋”从一个深深的壕沟里移出来，蓄电池组原本就储存在那个壕沟里。他听见有人在他的上面说：“喂，让我来帮你。”皮尔斯指示那个人，抓住一个把手，把这个蓄电池组拉上去。两个人一起，把这个笨重的盒子拽到指挥所的壕沟里。“那里还有一个‘笨蛋’，”皮尔斯说道，“咱们去把它搬来。”两个人又去了一次，在回到指挥所的时候，皮尔斯跳进壕沟，与此同时那个人搬起盒子，朝下递给他。当他们走开时，皮尔斯突然注意到，那个人佩戴着红领章。他停下脚步一动不动，结结巴巴地说道：“非常感谢你，长官。”厄克特将军点了点头。“这没什么，孩子。”他说道。

随着可怕的一步紧跟着可怕的另一步，危机正在增长。在这一天，没有一件事情是对头的，霍罗克斯将军后来把这一天称之为“黑色的星期五”。不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在荷兰，恶劣的天气都再次使盟军的飞机停飞，使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受阻。在对厄克特要求战斗机攻击的恳求做出答复的时候，皇家空军方面的回答是：“……在进行了最仔细的检查之后，遗憾地说，由于风暴，无法接受……”而且，霍罗克斯也需要每一个人、每一辆坦克和每一吨补给品。以便保留蒙哥马利在莱茵河上的桥头阵地，并突破到“红毛鬼子”那里去，可就在这个时刻，德军元帅莫德尔的反攻，终于成功地切断了走廊。霍罗克斯将军先是接到了麦肯齐的电报，说厄克特可能在24个小时之内被打垮，30分钟以后，又接到另外一封电报：在第一○一空降师的防区，强大的德国装甲部队已经切断了费赫尔以北的走廊。

莫德尔几乎不可能选择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地点了，也几乎不可能更好地选择他的进攻时间了。第十二军和第八军的英军步兵，沿着公路的两边进

军，现在只是到达了索恩，离第一○一空降师的防区约5英里。他们由于要与顽强的抵抗进行斗争，所以进度慢得令人痛苦。第一○一空降师的师长泰勒将军本来预料，英国人应该老早就到达这条“地狱的公路”上的他的防区了。经过了5天多的持续作战，又没有获得支援，泰勒的遭受强大压力的伞兵们兵力分散而且为数稀少，容易受到攻击。在一些地段，公路已经没有防卫，只是在北边的路上，有一些英军的装甲车和步兵在移动，另外的地方，“前线”实际上就是马路的两边。陆军元帅莫德尔之所以选择在费赫尔发起反攻，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走廊中，费赫尔地区有最大的桥梁群———不少于4座，而其中的一座又是主要的运河渡口。莫德尔希望用一个重重的打击，便可扼住盟军的生命线。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荷兰地下组织的话，他或许会获得成功的。

在夜间和一大早，费赫尔东边的各个村庄和那些没有教堂的小村子里，荷兰人发现德国人在集结，他们立即给第一○一师的联络官打了电话。这个警告来得一分钟都不早。集结起来的德国装甲部队几乎彻底击败了泰勒的部队，德国坦克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在走廊的一个5英里长的地段里，两次疯狂地大打出手，试图强行突破赶到那些桥梁。泰勒的士兵在马路上的英军炮兵和装甲部队的帮助下，拼死击退了这些进攻。但在北边4英里处，在乌登，德国人成功地切断了走廊。现在，由于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而后方的部队又被切断和孤立了起来，霍罗克斯被迫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他不得不派出装甲部队———那是他努力要到达厄克特所紧迫需要的部队———沿着走廊返回南边，以帮助泰勒将军，泰勒的情况现在甚至更加急迫。近卫团第三十二旅被派出匆匆南下，以支援第一○一师并再次打开公路。英勇的第一○一师将继续保住那些桥梁，但即使在近卫团的帮助下，之后24个小时的时间里，也没有一个人、一辆坦克或者一辆运送补给品的车辆能够沿着走廊向北移动。莫德尔的反攻，尽管暂时没有获得成功，但却仍然产生了巨大的效益。最终，走廊之战将决定阿纳姆的命运。

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9月22日，星期五，下午4点———这是英军步兵最初被德国坦克部队和炮兵压得动弹不得的6个半小时之后———英军步兵才终于打开了一条通路，穿过了奥斯特豪特。这个村庄着火了，被俘虏的党卫军正在被聚集起来。在那条“岛屿”公路西边的解救路线，也就是有胆识的皇家装甲兵团在黎明时全速赶往德里尔时所使用的那些低洼地的公路支线，现在被认为是安全的，或者充其量也只是被敌人轻微把守着。第五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在龙骑兵近卫军团一个坦克连的支援下，带着两辆珍贵的装载有补给品的水陆两用车辆，准备奋力冲过任何抵抗，全速前往莱茵河。指挥着这支部队的乔治·泰勒中校，因为非常急于赶到厄克特那里，他“感到有一种疯狂的欲望，想用我的手把我的步兵推到坦克上去，跑起来”。

在奥斯特豪特北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装载着货物的车辆等待出发。突然，在远处，泰勒发现了两辆虎式坦克。他小声提醒他的情报官戴维·威尔科克斯中尉：“什么也不要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有这些坦克。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泰勒挥手，让救援纵队上了马路。“我知道，倘若我们再等上5分钟，”他说道，“这条路线就会再次被关闭。”

泰勒的步兵上了坦克、军车和卡车，全速隆隆驶过荷兰村庄。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惊讶、欢呼的村民欢迎，但速度并没有慢下来。泰勒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到达莱茵河。“我感到一种巨大的紧迫感，”他说道，“失去的任何时间，都会给敌人调动兵力进行封锁的机会。”车队没有遭到抵抗，对泰勒来说，“当光线迅速变得暗淡，纵队的前部到达德里尔的时候，那是一种使人精神振奋的感觉”。他们只用了30分钟的时间，就走完了10英里的旅程。在下午5点30分，龙骑兵近卫军团先头的几辆坦克到达了莱茵河，又沿着河岸向东北方向绕去，开进了德里尔村的郊外。泰勒听见了一声爆炸声，立即猜出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小心谨慎的索萨博斯基的环形防线上，一辆坦克碰上了波兰人布下的地雷。

当泰勒到达索萨博斯基司令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关于厄克特，他得到的信息是模糊的。“我不知道他们在阿纳姆的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坚守着大桥的一端。”但泰勒决定，立即派他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前往大桥南端。他知道，水陆两用车必须“尽可能快地过河，而如果大桥仍然被坚守住的话，那么把它们开过去，显然要比让它们漂浮过去要快”。在索萨博斯基的司令部，泰勒惊讶地发现了查尔斯·麦肯齐上校和迈尔斯中校。他们立即劝他不要前往阿纳姆大桥。麦肯齐解释说，自星期三晚上以后，就没有听到过弗罗斯特的任何消息，司令部里的人推测，“在大桥上，一切全都完了”。

泰勒勉强放弃了这个计划，命令一个侦察小组出去，沿着河岸，为水陆两用车寻找一个可以下水的地点。索萨博斯基的工兵们不抱乐观态度：这些笨拙的水陆两用车在过沟渠和河岸，下到河边的时候，将会证明操作起来是不方便的，在夜间尤其是如此。一小会儿以后，泰勒的侦察小组证实了波兰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只能通过一条狭窄的两边是沟渠的马路，才能来到河边。泰勒的部下相信，他们能够让水陆两用车下到莱茵河去。麦肯齐上校由于仍然无法前往奈梅亨，于是将监督车的下水。水陆两用车将在星期六，也就是23日的凌晨两点过河。然而，首先需要让士兵们进入桥头阵地：索萨博斯基的波兰人，将用一小连串的橡皮艇摆渡过河。

星期五晚上9点，这个军事行动开始了。波兰士兵静悄悄地蹲伏在河岸上，等待着。河的两岸，在迈尔斯中校的指挥下，工兵们做好了准备，准备来回拉动绑着橡皮救生艇的缆索。只有4条船———两条可载两人的橡皮艇和两条可载1人的橡皮艇，一次只能让6个人渡过400码宽的莱茵河。

辅助这些船的是波兰工兵建造的几个木头筏子，用以运送小的补给品和备用品。在索萨博斯基下达命令之后，最先的6名士兵上了船，开了出去。没过几分钟，士兵们便过了河，在他们后面是一串木筏子。士兵们一到达北岸，船和筏子便被拉回。“这是一个缓慢、吃力的进程，”索萨博斯基特别提到，“但到目前为止，德国人似乎什么也没有怀疑。”

然后不久，从河的对面，在登陆地点的西边，一道光亮升上了天空，几乎立即，整个地区便被一颗伞投镁光照明弹照得通明。立即，施潘道型机枪开始朝河里扫射，“激起了小小的波浪，炽热的钢铁让河水沸腾起来。”索萨博斯基回忆说。同时，迫击炮弹开始落在等候着的波兰人当中。没出几分钟，两条橡皮艇便被打出了好多窟窿，艇上的人摇晃着落入水中。在南岸，士兵们分散开了，朝着那颗伞投照明弹射击。在疯狂的混乱中，索萨博斯基暂时停止了这个行动。士兵们后退，进入新的阵地，试图避开正在爆炸的迫击炮弹。等那颗伞投照明弹昏暗下来，他们便跑向橡皮艇和筏子，爬进去，于是渡河又再次开始。又有一颗伞投照明弹在空中爆炸了。在这个残酷的捉迷藏游戏中，波兰人蒙受着可怕的伤亡，在整个夜晚乘坐着剩余的船只继续过河。德里尔的那幢校舍，已经暂时变成了伤亡人员收容站，在这里，科拉·巴尔图森照料着被带进来的伤员。“我们无法过去，”一个波兰人告诉她，“那里是一场屠杀——我们甚至不能还击。”

凌晨两点，泰勒的水陆两用车开始朝河边开去。由于白天下了大雨，所以这条地势低、狭窄、两边是沟渠的马路，就有了几英寸厚的烂泥。而且，当这些水陆两用车在60名士兵的包围下，缓慢地驶向河边的时候，一场浓密的地面大雾形成了。士兵们既看不见马路，也看不见河。挣扎着的士兵们屡次费尽气力，在车辆从马路上滑下去的时候，把它们重新拖过来。补给品被从水陆两用车上卸下，以减轻它们的重量，但甚至这样做也不能让它前进。最后，尽管士兵们做出了艰难的努力，但这两个笨拙的车辆还是在距离莱茵河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滑进了沟里。“没有用，”绝望的麦肯齐告诉泰勒，“一点都没有希望。”凌晨3点时，整个行动停止了。只有50名士兵，而且几乎没有补给品，被轮渡过河，进入了厄克特的桥头阵地。

3



在9月23日星期六的上午，查尔斯·麦肯齐上校终于到达了奈梅亨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麦肯齐“累坏了，冻僵了，牙齿咯咯作响”。尽管麦肯齐决心要立即见布朗宁，但他还是立即“被放进浴缸里，以便解冻”。

英国军队使用的那条解救路线，在那条“岛屿”公路的西边，同时又与其平

行，现在他们正稳定地前往德里尔，但那些马路却远非已经摆脱了敌人。尽管如此，洛德·罗茨利还是决定要尽力把麦肯齐和迈尔斯中校带到奈梅亨。这个短暂的旅行，是在一个侦察车的小车队里进行的，是一次惊险的旅行。当一行人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辆部分被毁的德国半履带式车辆侧着躺在路口上。罗茨利下了车，指挥他的车辆行进，而就在这时，一辆虎式坦克出现在马路远处。为了避免发生遭遇战，那辆送麦肯齐的装甲车开始后退，就在这时，马路在车的下面突然坍塌了，车翻了。麦肯齐和车上的人员不得不在一块田地里躲避德国步兵，与此同时，罗茨利一边朝他侦察车的司机叫喊，要他“玩命地开”，一边朝通往奈梅亨的马路奔去，以寻找英国部队。罗茨利组织起了一支救援分队，沿着马路快速返回，寻找麦肯齐。当这支小小的部队到达的时候，那辆德国坦克已经离去了，麦肯齐和装甲车的人员从他们躲藏的地方出来，迎接他们。混乱之中，原本乘坐第二辆装甲车跟在后面的迈尔斯，与部队分开了。

布朗宁将军焦急地迎接了麦肯齐。按照参谋部的说法，“这一个星期是一连串令人痛苦而又悲惨的挫折”。最让布朗宁关切的，就是与厄克特充分沟通的欠缺。即使是现在，尽管在英军第一空降师和军部之间已经互通了电报，但布朗宁有关厄克特形势的局面显然仍是非常模糊的。在最初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中，一旦厄克特的士兵找到一个合适的着陆点，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就要飞进阿纳姆地区———最好是在9月21日星期四以前飞到。当厄克特的危急形势为大家所知时，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的师长爱德华·黑克威尔·史密斯少将，便立即提出，要冒险乘坐滑翔机带着他的一部分部队，在距离被围困的第一空降师尽可能近的地方着陆。昨天，星期五的上午，布朗宁拒绝了这个提议，用无线电说：“谢谢你的电报，但不要再提此事，这并不需要，因为形势比你认为的要好一些……第二集团军绝对会……一旦形势许可，将把你们空运到迪伦机场。”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员布里尔顿将军，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个电报的时候，评论说：“布朗宁将军过于乐观了，他当时显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红毛鬼子’们所处的困境。”当时，布里尔顿似乎并不比布朗宁更为消息灵通。星期五的晚上，布里尔顿给艾森豪威尔发过一个报告，是通过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转送的，报告在谈到奈梅亨—阿纳姆的形势时说道：“这个防区的形势正在表现出很大的改善。”

没过几个小时，布里尔顿和布朗宁的乐观主义就消失了。星期五为了到达厄克特而做出的徒劳的努力，对布朗宁这位军长来说似乎成了转折点。按照他的参谋部的说法，“他对托马斯将军以及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感到厌恶”。他认为，他们的移动不是足够的快，他告诉参谋们，托马斯“在前进的时候，太过急于把道路整理干净了”。除此之外，布朗宁的权力也只到此为限：英军地面部队一进入奈梅亨地区，行政控制就移交给第三十军的

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决定将由霍罗克斯做出，或者由他的上司、英军第二集团军的迈尔斯·C·邓普西将军做出。布朗宁所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

布朗宁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复活了的麦肯齐坐在一起，第一次得知了厄克特令人震惊的困境的细节。麦肯齐事无巨细，讲述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沃尔什准将记得麦肯齐告诉布朗宁："这个师是在一个非常紧密的环形防线里，什么都短缺———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虽然形势严峻，但麦肯齐说道，"如果第二集团军有机会到达我们那里，我们是能够坚持的———但不会坚持太长的时间。"沃尔什记得麦肯齐令人害怕的总结。"没有剩下多少东西。"他说。布朗宁沉默地听着，然后向麦肯齐保证，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计划现在正在酝酿中，要在星期六晚上派士兵和补给品进入那个桥头阵地。但是，沃尔什准将说："我确实记得，布朗宁告诉查尔斯，似乎没有多大的机会让大量部队过河。"

当麦肯齐动身再次前往德里尔时，他突然想到了军指挥部里的思维矛盾之处———以及那种矛盾的思维给他带来的两难境地。显然，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说出任何确切的决定。但他应该告诉厄克特什么呢？"看到了河两边的形势后，"他说道，"我确信，从南边渡河是不会成功的，我可以告诉他这一点。或者，我可以就像我被告知的那样报告说，每一个人都在尽力，将会有一次渡河，我们应该坚持下去。说哪一个好点儿呢？告诉他，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可能让任何人过来吗？或者援助正在路上？"麦肯齐决定说后者，因为他感到，"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将会帮助厄克特"让大家继续坚持"。

像布朗宁一样，盟军最高指挥部现在才得知有关第一空降师困境的真相。在艾森豪威尔、布里尔顿以及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举行的不准公开发表的简报会上，战地记者们被告知，"形势严峻，但正在采取每一个措施去解救厄克特"。这个小小的关切的口气，标志着态度上的一种根本改变。自开始实施以来，在面向公众的报道中，市场花园行动就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势不可当的成功。就在9月21日，星期四，一家英国报纸的头版新闻，以宣布一个"坦克的乐园就在前面"为大字标题，声明："希特勒的北部侧翼正在崩溃。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出色帮助下，已经为进入鲁尔河地区铺平了道路———也为战争的结束铺平了道路。"甚至四平八稳的伦敦《泰晤士报》，在星期五也刊登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在前往阿纳姆的路上，坦克部队渡过莱茵河"；只是副标题才暗示，前面可能有麻烦："阿纳姆即将发生的战斗，空降部队的艰难时光。"这几乎不能责怪记者们。通信手段的欠缺、盟军指挥官们的过于热情，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得精确的报道成为不可能。这样，一夜之间，画面就改变了。在20日，星期六，《泰晤士报》的大字标题是："第二集团军遇到顽强的抵抗，空降部队的严酷战斗。"而伦敦的《每日快报》则把阿纳姆称作了"一

小块地狱”。注

当然，希望还是有的。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七天，英格兰上空的天气放晴了，盟军的飞机又再次上了天。注这个伟大的滑翔机机群的最后一批，自星期二以来就在格兰瑟姆地区停顿着，现在终于动身了，带着3385名官兵前往加文的第八十二师———这是加文等待已久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而泰勒的处于强大压力下的第一○一师，也因为将近3000名士兵的到达而恢复了元气。但索萨博斯基在德里尔受到猛烈的进攻，却无法得到剩余部队的支援。这是因为，布朗宁被迫指示其余的波兰人前往第八十二师地区的空投场。布里尔顿原本计划，要在有史以来所设想出的最伟大的空降行动中，在三天的时间里，空运大约35000名士兵，但由于天气原因，实际上用了计划时间的两倍还多。

尽管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在别的地方得以成功完成，但厄克特的士兵们，在位于奥斯特贝克四周的那个迅速缩小的小块地区里，却眼巴巴地看着货物落入敌人之手。由于无法确定哈滕施泰因旅馆空投场的位置，也由于是在野蛮的防空炮火当中飞行，所以运送补给品的飞机不断遇到麻烦：那123架飞机，有6架被击落，63架受损。在给布朗宁的一封电报中，厄克特报告说：

231605……再次空运补给品；获得的数量非常少。狙击手现在严重阻碍了行动，也因而减少了补给品的收集。而且马路被倒下的树木、树枝和房屋严重阻碍，吉普车实际上不可能开动。无论如何，吉普车已经实际上失去战斗力了。

战斗机的近距离支持，也仅差强人意。阿纳姆地区的整个上午都天气恶劣，只是中午的时候才晴朗下来。结果，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台风型战斗机只飞行了几次，进攻了环形防线周围的目标。厄克特感到困惑。“鉴于我们具有完全的空中优势，”他后来回忆说，“我对缺少战斗机的支援感到既心酸又失望。”但对士兵们来说，这些进攻是振奋人心的，因为自从D日也就是前一个星期日以来，他们一架战斗机也没有看见过。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已经得知，英国部队终于到达了德里尔的莱茵河南岸。他们相信，解救即将到来。

尽管受到所有这些挫折，但既然托马斯将军的部队正在侧路上开赴德里尔，霍罗克斯将军也就相信，厄克特正在恶化的形势能够得到缓和。霍罗克斯有才能，有想象力，而且有决心，他反对把已经获得的东西都丢掉。然而他也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把部队和补给品送进桥头阵地。“我确信，”他后来说，“这些几乎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空降部队在河的另外一边，进行着绝望的战斗，这个画面”让他非常痛苦，以至于使他无法睡

觉；而费赫尔北边的走廊，自星期五的下午就被切断了，这个切断又威胁着整个军事行动的生命。

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极其珍贵。就像霍罗克斯一样，托马斯将军也决心让他的士兵过河，他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要在一个分为两个方面的行动中全力以赴：一是进攻并占领埃尔斯特，一是朝德里尔大举猛攻。尽管现在对攻占阿纳姆大桥，没一个人抱有任何幻想———从空中侦察照片可以看出，显然敌人正以重兵把守———但如果要从德里尔渡过莱茵河进行任何行动，那么其终点就在埃尔斯特，托马斯的右翼必须予以保护。而且霍罗克斯也希望，除了那些波兰人之外，一些英国步兵也能在星期六晚上过河进入桥头阵地。

他乐观得太早了。在奈梅亨至阿纳姆那条主要公路西边的那些地势低洼的公路支线上，一个巨大的瓶颈产生了，这是因为，托马斯的两个旅，都试图穿过同一个十字路口。那两个旅，每一个都大约3000人，一个旅向东北，朝埃尔斯特发起进攻，另外一个旅向正北，朝德里尔大举猛攻。敌人的炮击又增加了拥挤和混乱。这样一来，等到托马斯第一三○旅的主力部队开始到达德里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与波兰人一起，试图有组织地渡河，已是为时太晚。

午夜后不久，索萨博斯基的士兵在炮兵的强力支援下，开始渡河，这一次是乘坐16条船，这些船是第八十二师在渡过瓦尔河之后留下来的。他们遭到了密集炮火的打击，损失惨重，只有250个波兰人成功地到达北岸，而在这250个人当中，只有200人到达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环形防线。

在这个严峻的一天，霍罗克斯和托马斯只收到一条好消息：下午4点时，费赫尔北边的走廊又重新开通了，交通又再次流动起来。在工兵的纵队里，有更多的突击艇，顽固的霍罗克斯希望能够把这些突击艇及时迅速送到前面来，以便在星期日晚上把步兵送过河。

但那个师还能再坚持24个小时吗？厄克特的困境正在迅速恶化。在星期六晚上给布朗宁发去的形势报告中，厄克特说：

232015：白天遭受到许多次进攻，是由小股的步兵、自行火炮、坦克发起的进攻，包括带有喷火器的坦克。每一次进攻，都伴随以迫击炮和火炮对师的环形防线之内的非常猛烈的轰击。在经过了多次的险情之后，环形防线基本上没有改变，只是防御兵力稀少。尚未与南岸的那些人实际接触。再次补给砸锅了，只收集到少量的弹药。仍然没有食品，而且由于缺水，士兵们全都非常肮脏。士气仍然差强人意，但迫击炮和火炮的持续轰击正在产生明显的效果。我们将坚持，但同时希望，前面能有一个光明些的24个小时。

盟军下午的那次规模巨大的滑翔机空运，让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大吃一惊。在战役的这个较晚的日子，他并没有预料到还会有盟军的空降部队着陆。这些新的增援部队，正好在他反攻的势头增长的时候到来，因此能够改变战役的趋势———而且甚至可能会有更多的盟军增援部队来到。自从盟军的进攻开始以来，他第一次对后果产生了怀疑。

他驱车去了杜廷赫姆，与比特里希将军商谈，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员记得，莫德尔要求“迅速了结奥斯特贝克的英国人”。莫德尔需要每一个士兵和每一辆坦克。太大的兵力被束缚在一场“本应该在几天以前就结束的战斗上了”。比特里希说，莫德尔“非常激动，不断重复说这里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完”？

比特里希坚持认为：“我们现在的作战，在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激烈过。”在埃尔斯特，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正在挡住英军的坦克和步兵纵队，他们正在试图沿着那条主要的公路前往阿纳姆。但克瑙斯特不能既在埃尔斯特坚守，同时又向西针对德里尔的波兰人和英国人发起进攻。他沉重的虎式坦克一进入圩田，便会陷入泥泞中。比特里希解释说，对德里尔的攻击，是步兵和轻一些的车辆的任务。“莫德尔从来就不对理由感兴趣，”比特里希说，“但他理解我。不过他仍然只给了我24个小时的时间，用来把那些英国人干掉。”

比特里希驱车前往埃尔斯特，去见克瑙斯特。少校现在担忧起来。整整一天，针对他的兵力似乎越来越强大。虽然他知道英军的坦克不可能离开那条主要的公路，但来自西边的进攻的可能性却让他担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英军的突破，”比特里希提醒道，“在我们清理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你能再坚持24个小时吗？”克瑙斯特向比特里希保证，他能够。在离开克瑙斯特之后，这位装甲军团的司令员立即命令霍亨施陶芬师的哈策尔上校：“明天加强针对空降部队的一切进攻。我想要整个事情结束。”

哈策尔面临许多困难。尽管奥斯特贝克已经完全被包围了，但狭窄的街道却正在证明，要调动坦克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60吨重的虎式坦克，“这些坦克掘开马路的基础，使得马路就像犁出来的地一般，而在转弯的时候又把人行道撕裂”。除此之外，哈策尔告诉比特里希：“每当我们压缩空降部队的那个小块地区，使它缩得更紧的时候，英国人就似乎作战更凶猛。”比特里希指点说：“强大的进攻应该从东边和西边发动，进攻环形防线的基地，以便把英国人与莱茵河切断”。

弗伦茨贝格师的师长哈梅尔将军的任务是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坚守并击退盟军部队，他也得到了比特里希的消息。他的整个师的集结，由于阿纳姆大桥上的车辆残骸而耽误了，哈梅尔没有能够在那条抬高了的“岛屿”公路两边，形成一个封锁性的前线，英国人在奥斯特贝克的进攻，把他的兵

力分割了开来。当英国人进攻时，他的师只有部分兵力是在西边的阵地上，他剩余的士兵和设备在公路的东边。哈梅尔向比特里希保证，埃尔斯特将会守住，英国人不能在那条主要马路上进军。但是他却没有力量挡住对德里尔的大举猛攻，“我不能阻止他们前进或者后退”。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员是坚定的，他提醒哈梅尔，下面的24个小时将会极其重要。“英国人将会尽一切努力支援他们的桥头阵地，同时还要向阿纳姆大举猛攻。”只要哈梅尔能够坚守住，哈策尔对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进攻就能成功。正如比特里希所说：“我们将得到指甲。你必须切除手指。”

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大炮在隆隆作响，在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西南角，一个大型煤气罐熊熊燃烧，把一道怪异的、摇曳不定的、淡黄色的光投掷在莱茵河上空。当在北岸从一条船上爬出来的时候，查尔斯·麦肯齐上校明白了，为什么无线电提醒他要他等向导。岸边地带是无法辨认的，船只的残骸，倒落的树木以及炸弹爆炸留下来的坑，掩埋了那条向后通向桥头阵地的马路。倘若他尝试自己动身，他将一定会迷路。现在，跟着一位工兵，他被引导着去了哈滕施泰因旅馆。

有关他将向厄克特作的报告，麦肯齐并没有改变主意。在等船把自己送到师的环形防线的时候，他再次想到他的种种选择。尽管他在德里尔以及南岸看到了那些准备工作，但对于援军能够及时到达师部，他仍然持有怀疑。对他决定要作的报告，他感到内疚。尽管如此，他本人的见解还是有可能太过悲观了。

在被毁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厄克特正在等待。麦肯齐把官方的见解给了这位空降部队司令员：“援军正在路上。我们应该坚持。”麦肯齐记得，厄克特“神情木然地听着，这个消息既没有让他沮丧，也没有让他高兴”。对这两个人来说，那个没有说出的问题仍然是同一个：他们必须再坚持多久？在这个时间，在9月24日，星期日的凌晨，在经过8天的战斗之后，据估计，兵力减少到了不足2500人。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只有一个问题：蒙蒂的军队什么时候到达？在孤独的战壕里、火炮掩体里和前哨阵地里，在残破不堪的房屋和商店里，在医院和包扎所里，焦急而又毫无怨言的人们把伤员放在草席上、床垫上和光秃秃的地板上，在所有这些地方，他们想着这个问题。

由于步兵就在河的南岸，所以伞兵们毫不怀疑，第二集团军最终将会渡河过来。他们唯一感到纳闷的就是，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能活着看到等待了那么久的救援。在这最后的几个悲剧性的钟头里，他们老是害怕被歼灭，为了减轻这个惧怕，士兵们试图用所能有的任何方式来提高彼此的士气。玩笑在辗转相告，受伤的士兵不顾他们受到的伤害，仍然坚守在岗位上，而非同寻常的勇敢的例子已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士兵们是骄傲的。他们后来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共有着一种比他们所知的更加强大的精神。

炮兵连的一等兵詹姆斯·琼斯，从他的行装里取出了他随身带来的那个唯一的非军事物品———一个他从孩童时期就一直使用的长笛。“我只是想再吹它，”他记得，“有三四天的时间，迫击炮弹一直像下雨般飞来，我吓得要死。我拿出长笛，吹了起来。”在不远处，火炮阵地军官詹姆斯·伍兹中尉有了一个主意。由琼斯打头，伍兹中尉和另外两位炮手从他们的战壕里爬出来，开始围着火炮阵地齐步前进。当他们排成单行进时，伍兹中尉唱了起来。在他的后面，那两位伞兵摘下头盔，用棍子在上面当鼓敲。遭到重创的士兵们听见，《英国掷弹兵》和《勇敢的苏格兰之歌》的旋律柔和地传遍四方。其他士兵也开始唱起来，一开始是微弱的，但接着，随着伍兹“放声高唱”，火炮阵地就爆发出了一片歌声。

位于乌得勒支到阿纳姆马路上的斯胡努尔德旅馆，大致在这个环形防线的东边沿线中间，在这个旅馆里，荷兰志愿者和英国随军卫生员，在德国看守警惕的目光下，照料着几百名伤员。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9月24日，星期日。这是主的日子。战争在外面激烈地进行。这座楼房在摇动。因此医生无法做手术，也无法打石膏。我们无法为伤员洗伤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冒险出去找水。随军牧师在他的笔记本里潦草地书写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做礼拜。

G·A·佩尔神父记完了笔记。他与亨德丽卡一起，把旅馆里的所有房间逐一走了一遍。炮击似乎“声音特别嘈杂”，他回忆说，“外边作战的声音让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然而，“看着伸展在地板各处的士兵们的脸”，随军牧师佩尔“感到受到了激励，要用内心里上帝的平和与外面的嘈杂声战斗”。佩尔引用了圣徒马太的话，说道：“不要为明天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注然后，就像火炮阵地里的人一样，他也唱了起来。当他唱《继续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开始人们只是听着，然后他们开始哼着，自己柔和地唱了起来。在斯胡努尔德旅馆外面雷鸣般的炮声之下，几百个伤员和奄奄一息的人唱起了下面的歌词：“当别的帮忙者未能帮助，当安慰者逃走的时候，无助者的上帝啊，继续和我在一起。”注

在下奥斯特贝克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把他的5个孩子和11位别的平民，留在她家里那个10英尺长、6英尺宽的地下室里躲避，她到了上面的一层，走在受了伤的人们当中。这幢14个房间有 200年历史的房子，原先是一位教区牧师的住宅，现在则完全认不出来了。窗子不见了，而且“大厅、餐室、书房、花园里的凉亭、卧室、走廊、厨房、锅炉房以及阁楼里每一英尺的空间，都挤满了伤员”。特尔霍斯特太太回忆说。伤员也躺在车库里，甚至躺在楼梯的下面。总共，有超过300个受了伤的人拥挤在房子里和庭院里，而且每分钟都还有别的伤员被抬进来。在户外，

在这个星期日的上午，凯特·特尔霍斯特看见，烟雾悬挂在战场的上面。“天空是黄色的，”她写道，“黑色的云悬垂下来，就像潮湿的抹布一样。大地被撕裂开了。”在庭院里，她看见“死去的人，我们的死去的人由于下雨而全身湿透，而且身体僵硬。他们脸朝下躺着，就像昨天和前天时那样———那个有着蓬乱胡子的人，以及那个长着黑脸庞的人，以及许多许多别的人，他们都是这样”。最终，有57个人将被埋葬在花园里，“其中一位还只是个孩子，”特尔霍斯特太太写道，“他们由于缺乏空间而死在房子里面。”这幢房子里医疗队的那位孤独的医生兰德尔·马丁上尉，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那个孩子“砰的一声把头撞在暖气片上了，一直到死去”。

凯特·特尔霍斯特在各个房间里轻手轻脚地走着，心里想着她的丈夫扬。扬是在星期二晚上骑着自行车出去的，以便在这个地区进行侦察，并把有关德国阵地的情报带回，送给一位炮兵军官。环形防线是他不在的时候形成的，而在激烈的作战之中，扬无法回家。他们还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不能彼此见面。自从星期三以来，特尔霍斯特太太就一直与马丁医生和护理员们一起工作，几乎没有睡眠。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与伤员们一起祈祷，给他们读《诗篇第九十一》：“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

现在，整个上午，那些在夜间渗入环形防线的德国狙击手们，正在“无耻地向一幢房子里面射击，而那幢房子从未向外射出一发子弹”，她写道，“子弹嗖嗖地穿过挤满了无助的人们的房间和走廊”。有两位护理员，在抬着担架走过一个窗子时，被击中了。接着，每一个人最怕发生的事情发生了：马丁医生受伤了。“只是伤着脚踝，”他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到下午的时候，我就将再次到处蹦蹦跳跳了。”

外面，取狙击而代之的是炮击。迫击炮弹的隆隆声和碰撞声，“无法描述，”特尔霍斯特太太记载。在列兵迈克尔·格罗看来，“这位女士似乎是极度平静，一点儿不紧张。”格罗已经因为炮弹碎片而大腿受伤，现在又被炮弹的爆炸伤了左脚。卫生员们匆匆把格罗和别的刚受伤的人，从一排落地窗那里移开。

下士丹尼尔·摩根斯，在坚守奥斯特贝克教堂附近一个阵地的时候，头部和膝部中弹，就在一辆德国坦克从马路上驶来的时候，被抬进了特尔霍斯特的家。一位护理员向摩根斯解释说：“他们用光了绷带，没有麻醉剂或者食品，只有一点水。”正在这时，那辆坦克发射了一颗炮弹，炮弹撞上了这座房子。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列兵沃尔特·博尔多克，肋部和背部有子弹伤，他惊恐地注视着，只见那辆坦克“嘎嘎响着移动，转变方向。我能听得见机枪的急促嗒嗒声，然后一颗炮弹穿过了我背后的墙。灰泥和瓦砾开始到处落下，许多伤员被杀死了”。在楼下，投弹手E·C·博尔登是一位医务护理员，他怒不可遏，一把抓起一面红十字会的会旗，冲出房子，直接

跑向那辆坦克。下士摩根斯清楚地听见他说话。“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博尔登朝着德国坦克的指挥员尖声大叫，“这幢房子清楚地用红十字会的旗帜标记着。快滚开！”焦急的伤员们听见了那辆坦克后退的声音。博尔登回到了房子里，摩根斯记得，他“几乎就像离开的时候一样气愤。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博尔登简短地回答说：“那个德国人道歉了，不过他倒真滚蛋了。”

尽管这幢房子没有再次受到炮击，但他们周围的火力却没有停止过。凯特·特尔霍斯特写道：“到处都有人在死去。难道他们必须在这样的飓风中断气吗？啊，上帝啊！给我们一刻的安静吧。当他们前往永恒的时候，给他们一刻神圣的安静吧。”

环形防线的各个地方，当疲惫、虚弱的伞兵们到了筋疲力尽的极限时，坦克冲开了防御阵地。到处都是恐怖———尤其是火焰喷射器带来的恐怖。在党卫军的一个野蛮暴行中，一辆挂着红十字会旗、运送伤员的吉普车，被4个德国人拦下了。其中的一位卫生员试图说明，他是送伤员去伤亡人员收容站的，那些德国人却突然用火焰喷射器袭击了他，然后走开了。

但这场战役的始终，不论是在阿纳姆大桥还是在环形防线，都有表现出骑士精神的突出例子。在环形防线东边哈克特准将的防御阵地里，一位德国军官打着白旗，开车来到英军阵地，要求见指挥官。哈克特见了他，得知德国人“就要发起进攻，首先要把迫击炮和火炮炮火对准我们的前沿阵地”。那个德国人得知，一个伤亡人员收容站就在进攻的路线上，于是他要求哈克特，把他的前沿阵地后移600码。“我们不想让火力网击中伤员！”那个德国人解释说。哈克特知道，他无法遵从。“如果战线按照那个德国人的要求后退那段距离的话，”厄克特将军后来写道，“就会使师司令部到了德国人的营地后面200码的地方。”尽管他无法移动，但哈克特却注意到，当进攻终于来到的时候，火力网仔细地对准了伤亡人员收容站的南边。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另外一位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少校，一直在旅馆的娱乐室里，在一张台球桌上做手术，当一颗口径为88毫米的炮弹穿过大楼房顶的时候，他丢失了他的全部设备。自从星期三以来，他就不能做手术了，尽管一个野战救护车队已经在彼得堡旅馆设置了一个手术室。“我们有1200到1300名伤员，但却既没有护理设施，也没有医务人员来适当地医治他们，”他记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止痛的吗啡。我们的主要问题是食品和水。我们已经用光了中央供热系统中的水，现在，由于不再做手术，我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军需官，努力给伤员们提供食物。”伤员当中的一位，第一五六营的约翰·沃迪少校，星期二那天被一名狙击手击中了腹股沟，后来又再次负伤。一颗迫击炮弹落在了一个大飘窗[注]的窗台

上，爆炸了，炮弹的一个碎片嵌进了沃迪的左脚，接着这个房间又被直接击中，沃迪的右肩、脸和下巴被落下来的砖和木头碎片划破。该师的首席医官格雷姆·沃拉克医生冲到了外边。沃迪挣扎着站了起来，看见沃拉克站在街道上，朝着德国人喊道："你们这些该死的杂种！难道认不出红十字会旗吗？"

范·马尔南一家———安赫、她的哥哥保罗以及她的姑姑———正在塔弗尔贝格旅馆，在范·马尔南医生的指导下，24小时不停地工作着。保罗是医学院的学生，他记得，那个"星期天是可怕的。我们似乎一直都在被击中。我记得，我们不可以在病人面前表现出害怕来，但我准备从屋子里跳出来，大声喊叫。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伤员们如此安静地待着"。保罗记得，当受到伤害的人从一个毁坏的房间被送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开始唱歌了。我们为英国人唱，为德国人唱，为我们自己唱。然后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唱，由于感情强烈，人们又会停下来，因为他们是在哭泣，但他们又会再次唱起来"。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曾怀有一个浪漫的梦想，那就是被从天而降的聪明健壮的年轻人解放，对她来说，这个浪漫的梦想正在绝望中结束。许多被带到塔弗尔贝格旅馆的荷兰平民死于他们自己的伤口。安赫在她的日记里特别提出，有两个荷兰平民是"可爱的姑娘和优秀的滑冰者，和我一样大，只有17岁。现在我将再也看不到她们了"。在安赫看来，这个旅馆似乎不断被炮弹击中，在地下室里，她哭了起来。"我怕死，"她写道，"爆炸声音巨大，每一颗炮弹都能杀人。上帝怎么能让这个地狱存在？"

星期天上午，到9点30分时，沃拉克医生决定，要为这个地狱做点什么。这个地区的9个伤亡人员收容站和医院，挤满了双方的伤员，因而他开始感到，"战役再也不能这个样子继续下去了"。医疗队"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工作，有一些医疗队没有外科工具"，而在德国人的猛烈进攻下，伤亡人员一直在增加———其中就有勇敢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就在上午近8点钟的时候，一颗迫击炮弹，让他的腿和肚子受了重伤。

沃拉克决定了一个计划，而那个计划又需要得到厄克特将军的许可，于是他便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我告诉将军，"沃拉克说道，"尽管挂上了红十字会的旗帜，但所有的医院仍然遭到了炮击。有一个医院被击中6次，着了火，迫使我们把150名伤员迅速撤离出去。"他说，伤员正"受到虐待，因而到了该与德国人做出某种安排的时候了"。既然完全不可能把伤员撤离到莱茵河的对面去，所以沃拉克认为，"如果把伤员移交给德国人，到他们在阿纳姆的医院里治疗的话"，那么许多生命就会得到拯救。

沃拉克回忆说，厄克特"似乎听从了"。他同意这个计划，但又提醒沃拉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以为，这是编队阵地崩溃的开始"。沃拉克

要向德国人说清楚，之所以采取这一步，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厄克特说，可以进行谈判，“条件是，德国人应该明白，你是一个代表着病人的医生，而不是这个师的一个官方特使”。沃拉克被允许，在下午的时候要求一段停火的时间，这样一来，在“双方继续作战”以前，可以让战场上没有伤员。

沃拉克匆匆离开，前去寻找那位荷兰联络官———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另外还有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请他们二位帮助谈判。沃尔特斯将担任翻译，他是荷兰军方人士，因而“前往德国司令部可能冒极大的风险”，有鉴于此，沃拉克给他起了个假名，叫“约翰逊”。这三个人迅速前往斯胡努尔德旅馆，与德国师部的那位医官联系。

说来也巧，那位军官，29岁的埃贡·施卡尔卡少校声称，他也得出了与沃拉克相同的结论。施卡尔卡回忆说，在那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感到“必须做点事情，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伤员，也是为了在‘巫婆的大锅’里的英国人”。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伤员躺得到处都是———甚至躺在地板上”，按照施卡尔卡的说法，在沃拉克到达之前他就过来了，为了见“英国人的首席医官，提议清理战场”。不管是谁首先有了这个主意，他们确实见面了。沃拉克对这位年轻军官的印象是，“他长得女人气，但有同情心，显然非常急于讨好英国人———只是为了留个后手”。这位身材细长、风度翩翩的军官，穿着剪裁合身的制服，显得很英俊，沃拉克面对着他，用“约翰逊”当翻译，提出了他的建议。当他们交谈的时候，施卡尔卡打量着沃拉克：“一个高个子的、过分瘦长的、黑头发的家伙，就像所有的英国人那样冷静。他似乎疲倦极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样子倒不难看。”施卡尔卡准备同意这个撤离计划，但他又告诉沃拉克，“首先我们将不得不去我的司令部，以确保我的将军不会反对。”施卡尔卡拒绝带范·马尔南医生同去。在一辆缴获的英国吉普车里，施卡尔卡、沃拉克和“约翰逊”，动身前往阿纳姆，由施卡尔卡开车。施卡尔卡回忆说，他“开得非常快，一路地呈之字形移动。我不想让沃拉克确定自己的位置，而我的开车方式，也一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我们走得很快，有一部分时间是在炮火下走的，绕着弯进了城。”

对沃尔特斯来说，这个进入阿纳姆的短途乘车旅行是“悲伤而又悲惨”的。到处都是车辆残骸。房屋或者仍然在冒烟，或者已经成了废墟。他们所走的一些道路，由于被坦克履带压碎，被炮火炸出了坑，因而“就像犁过的地一样”。残破不堪的火炮、翻倒的吉普车、烧焦了的装甲车，以及“死者扭曲的尸体”，就像一条小径一样，一直通向阿纳姆。施卡尔卡并没有蒙住这两个人的眼睛，沃尔特斯感到，施卡尔卡也没有试图隐瞒他所走的这条路线，这使沃尔特斯突然感到，这位高雅的党卫军医官似乎“急于让我们看到德国人的力量”。穿过阿纳姆仍然冒烟、瓦砾遍地的街道，施卡尔

卡朝东北方向开，最后在哈策尔中校司令部的外面停了下来，司令部设在黑策尔贝格路上的那个中学里。

尽管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到来在参谋军官当中造成了惊讶，但哈策尔已经得到过电话通知，正在等待他们。施卡尔卡把这两位军官留在外屋，进去向他的指挥官报告。哈策尔生气了。“我感到吃惊，”他说道，“施卡尔卡竟没有蒙住他们的眼睛。现在他们知道我的司令部的精确位置了。”施卡尔卡笑了。“要是他们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他们的路，那么我就会对我开车的方式大吃一惊了。”他向哈策尔保证。

两个德国人与英国特使一起坐了下来。“那位医官提议，应该把他的英国伤员从环形防线撤离出来，因为他们不再有地方或者补给品来照料他们了，”哈策尔说道，“这就意味着，要求休战几个小时。我告诉他，我对我们两国交战感到遗憾。毕竟，我们为什么应该交战呢？我同意他的建议。”

沃尔特斯———沃拉克介绍他为“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加拿大军人”———记得，这次会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起初，那位党卫军中校甚至拒绝考虑休战，”他说道，“房间里还有几个别的参谋军官，包括代理参谋长施瓦茨上尉，施瓦茨最终转向哈策尔，说这整个事情还得由将军决定。”那个德国人离开了房间。“当我们等待的时候，”沃尔特斯说道，“他们给了我们三明治和白兰地。沃拉克提醒我，不要空着肚子喝酒。三明治里不管夹的是什么馅，上面都有切成薄片的洋葱。”

当德国人再次进入房间时，“每一个人都啪的一声立正，大声喊嗨希特勒。”比特里希将军，没有戴帽子，穿着他长长的黑色皮外套，走了进来。“他只待了一会儿。”沃尔特斯记得。比特里希打量着这两个人，说道：“我对我们两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感到遗憾（Ichbedaueresehr diesenKriegzwischenunserenVaterlandern）。”将军静静地听沃拉克的撤离计划，表示同意。“我同意，”比特里希说道，“因为一个人不能失去所有的人性，即使在最激烈的交战期间———当然，只要他首先就有这种感情。”然后比特里希递给沃拉克一瓶白兰地。“这是送给你的将军的。”他告诉沃拉克，然后退出了。

星期日上午10点30分时，部分休战协议达成了，尽管沃尔特斯回忆说：“德国人似乎有些担心。不论是塔弗尔贝格旅馆，还是斯胡努尔德旅馆，都位于前线，而德国人又无法保证停止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哈策尔主要担心的是英国人在莱茵河南边的远程炮击，伤员撤离的时候能否被控制住。施卡尔卡说，这一点得到保证，他收到了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无线电讯。“那个电讯纯粹是发给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的医官的，它感谢我并且问，停火能否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好让英国人把医疗用品、药品和

绷带从莱茵河对面带过来。”施卡尔卡发回了无线电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只是要求，你们的空军不要继续轰炸我们的红十字会卡车。”他立即得到了答复：“不幸的是，这样的进攻是双方发动的。”施卡尔卡认为，这个电讯“可笑”，他生气地回答道：“对不起，我有两年的时间没有看见我们的空军了。”英国人的电讯又回来了：“就按协议办。”施卡尔卡声称，他现在勃然大怒，以至于发回了这样的电讯：“舔我的……”[注]

最终做出的安排，要有两个小时的休战，时间从下午3点开始。其时，伤员将沿塔弗尔贝格旅馆附近一条指定的路线，离开环形防线。要做出一切努力，“以便少开火，或者完全停火”。坚守前线阵地的双方部队被提醒，不要开火。施卡尔卡开始命令，“每一辆可用的救护车和吉普车在前线的后面集结”，与此同时，沃拉克和沃尔特斯将要返回自己的营地，他们被允许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装满吗啡和医疗用品。沃尔特斯“为能够离开那里而感到高兴，尤其是因为施瓦茨对他说过，‘你说起德语来，可不像英国人’”。

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吉普车上飘扬着一面红十字会旗帜，并由另外一位德国医官护送，在返回环形防线的途中，他们被允许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停留，以视察那里的状况，并访问英国伤员———其中就有拉思伯里准将，他现在去掉了军衔徽章，成了“一等兵”拉思伯里。迎接他们的是英军首席医官李普曼·凯塞尔上尉，外科手术队队长锡德里克·朗兰少校，以及荷兰资深外科医生范·亨格尔医生———沃拉克记得，他们全都“非常急于知道消息”。医院周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凯塞尔报告说，有一次，甚至还在大楼里面进行了一场酣战，德国人的子弹从病房里的病人头上飞过。但自从星期四以来，这个地区是安静的，沃拉克发现，与在环形防线里的伤员所受到的令人痛苦的磨难形成对照的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里，“英国伤亡人员是躺在床上，盖着毯子，铺着床单，并受到荷兰修女和医生的悉心照料”。这两个人提醒凯塞尔，要为大量涌来的伤亡人员做好准备，然后返回了奥斯特贝克。沃拉克回忆说，他们正好“赶上了塔弗尔贝格旅馆附近的一轮迫击炮炮击”。

下午3点钟，部分休战开始。射击突然减少了，然后又完全停止。对一等兵珀西·帕克斯来说，那种“势不可挡的嘈杂声已经成为正常，因而发现这种寂静是如此不真实，以至于刹那间我以为我死了呢”。在英国和德国的医官和护理员的监督下，来自双方的救护车和吉普车开始装伤员。中士达德利·R·皮尔逊是第四伞兵旅的首席文书，在一辆吉普车里他被放在他的旅长的担架的旁边。“这么说你也受伤了，皮尔逊？”哈克特说道。皮尔逊只穿着靴子和裤子，右肩绑着厚厚的绷带，“弹片在那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哈克特面色苍白，显然因腹部的伤而非常痛苦。当他们前往阿纳姆的时候，哈克特说道：“皮尔逊，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是以权压人，不过

我认为我比你要糟糕。到了医院，要是他们先给我治，你不会在意吧？”

那位和伞兵鸡默特尔一起跳伞的帕特·格洛弗中尉，在极大的痛苦中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一颗子弹切断了他右手的两个静脉，而在前往斯胡努尔德旅馆包扎所的途中，弹片又击中了他的右小腿肚子。由于只有一点点吗啡，因而他被告知，除非他认为绝对必要，否则是不能给他打上一针的。格洛弗并没有要吗啡。现在，他睡睡醒醒，不知不觉想到了默特尔，他记不得它是哪一天被打死的。在作战期间，他和他的勤务兵乔·斯科特列兵，交替拿着装默特尔的小背包。然后，在一个狭长掩体里，在炮火的打击之下，格洛弗突然意识到，装着默特尔的小背包不见了。“默特尔在哪里？”他朝斯科特叫喊道。“她在那里，长官。”斯科特指着格洛弗掩体的顶上。在她的包里，默特尔仰面躺着，脚伸在空中。那天晚上，格洛弗和斯科特把这只公鸡埋葬在树篱附近的一个小小的坟墓里。当斯科特扫着土盖上的时候，他看着格洛弗，说道：“唔，默特尔到最后都是勇敢的，长官。”格洛弗记得，他并没有解下默特尔降落伞的伞翼。现在，在一阵疼痛之中，他感到高兴的是，他是让它带着荣誉得体地得到了埋葬———是带着它的职衔标记被埋葬的———这对阵亡者来说死得其所。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注视着，德国护理员开始把伤员抬出去。突然射击开始了。一个德国人叫喊：“如果不停下来，我们就开火，没有一个伤员、医生或者护士能活着出去。”亨德丽卡并没有在意。“总是最年轻的士兵叫得最响，”她特别提到，“到现在我们已经习惯德国人的威胁了。”射击停止了，装车又继续下去。

当步行伤员长长的行列以及吉普车、救护车和卡车的车队开赴阿纳姆的时候，有好几次再次爆发了射击。“不可避免的是，”厄克特将军回忆说，“有误解。让一场战斗暂时安静下来是不容易的。”在塔弗尔贝格旅馆的医生们，“当他们把好斗的德国人从旅馆里清理出去的时候，有了一些不安的时刻”。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记得，那些刚刚到达的波兰人无法理解，这个小部分的停火有什么必要。“他们有许多旧账要清算，”厄克特说道，“因而看不到让他们停火的合情理的原因。”最终，他们被“说服了，抑制住他们的渴望，等到撤离完成之后再说”。

施卡尔卡少校与沃拉克医生一起，让车队运行了整整一个下午。大约200名能行走的伤员被带了出来，超过250名被抬进了医疗车队。“我从未见过类似奥斯特贝克那样的状况，”施卡尔卡说道，“那里只有死亡和残骸。”

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从在阿纳姆受的胸伤中恢复了知觉，听见第一批能够行走的伤员进来了。“我感到，一阵激动的颤抖从我

的脊椎升了上来，”他说道，“我从未这样骄傲过。他们走了进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吓坏了。每个人都长了一个星期的胡子。他们的作战服撕破了，满是污渍，而且肮脏、浸透着血液的绷带从他们所有人的身上伸了出来。最扣人心弦的是他们的眼睛———有红圈，深陷进去，从拉长了的、沾了厚厚一层泥巴的脸上朝外凝视着，脸由于缺乏睡眠而憔悴，然而他们走了进来，并没有被打败。他们显得足够凶猛，足以当场就接管这个地方。”

当最后一个车队离开奥斯特贝克时，沃拉克感谢那位党卫军医官的帮助。“施卡尔卡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能把这写给我吗’？”沃拉克没有理会这句话。下午5点，战斗再次开始，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似的。

一等兵珀西·帕克斯的火炮阵地，在多尔德伦家洗衣房附近，在他的阵地里，“再次乱成了一片。德国佬朝我们投掷一切东西”。在撤离伤员期间，有一段相对的安静，在此之后，帕克斯有了一种被解救感。“一切都返回到正常，这我能够适应。我又再次准备就绪。”德国人利用了这个暂时的休战，渗透进了许多地区。人们从所有的方向，听见了尖叫声和射击声，那是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街道上和花园里彼此追击。从战壕里，帕克斯看见，一辆坦克穿过一块白菜地，朝排炮大本营驶来，有两个炮兵朝马路上的一门发射6磅重炮弹的大炮全速跑去。当炮兵们开始射击的时候，帕克斯惊奇地朝上看着，因为白菜开始飘过他的战壕。“大炮的力量把白菜吸了上来，直接拽出了地面，把它们掷向天空。接着一声巨大的撞击声，我们看见，一颗炮弹击中了坦克。”

罗伯特·凯恩少校听见，有人叫喊，“虎式坦克！”于是他便全速朝一个建筑边上的那门小反坦克炮跑去。一位炮手从街道上跑来帮助他，这两个人一起，把炮推进阵地。“开炮！”凯恩喊道。他看见，炮弹击中了坦克，让它出了故障。“咱们再发一炮，有把握一些。”他叫喊道。炮手看着凯恩，摇了摇头。“不用，长官，”他说道，“它完了。反冲装置没了。”

在特尔霍斯特的家里，嘈杂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一个人都麻木了，听不见了。突然，凯特·特尔霍斯特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震动。砖发出了轰响，栋梁裂开了，各个方向发出了被抑制的哭叫声”。爆炸把地下室的门卡住了，令人窒息的尘土在整个小屋子里旋转着，在其中，她听见，“人们用铁锹和工具工作着……把栋木锯开……脚步在砖和灰浆中嘎吱作响……而且沉重的物品被前后拖拽着”。地下室的门被打开，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在楼上，凯特看见走廊的一个部分以及花园里的那间屋子，都朝户外敞开着，一面墙的一段已经被炸了进来。人们躺在各处，那是被爆炸抛掷过去的。马丁医生再次被击中，根本无法走动。有一个士兵，几天前因为患有战斗疲劳症而被带进来，现在他在房子里的大屠杀当中徘徊着。他盯着凯特·特尔霍斯特，说道：“我想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她

温柔地带着他去了地下室，在石头地板上为他找了个容身之地。他几乎立即就睡着了。后来他醒了，便移到特尔霍斯特太太的旁边。“现在我们随时都会被攻占。”他平静地说道。他又睡着了，凯特疲倦地靠在墙上，她的5个孩子在她旁边，她等待着，与此同时“这令人恐惧的时间在缓慢地延续着”。

在距离凯恩少校阵地不远的一个战壕里，中士艾尔弗·鲁利埃看见，又有一辆坦克出现在街道上。他与一位炮手冲向似乎是留在他所在的炮兵部队里的唯一一门反坦克炮。就在坦克转向他们的时候，这两个人来到了炮的旁边。他们发射了，看见一道闪光击中了坦克。就在这时，一挺机枪开火了。与鲁利埃一起的那位炮手喘息着，靠着他倒下来。当鲁利埃转过身来，小心翼翼地扶着他倒下时，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左手。左手开始失去控制，颤抖起来，鲁利埃猜想，子弹一定是击中了神经。鲁利埃把靠在身上的炮手慢慢放下来，然后朝他的战壕走去。“我去找人帮忙。”他告诉这位血迹斑斑的士兵。在特尔霍斯特家的门口，鲁利埃停下来，不愿意进去。他听见，人们在尖声大叫，胡言乱语，乞求给点水，并喊出亲人的名字。“啊，上帝啊！”鲁利埃说道，“我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就在这时，投弹手E·C·博尔登出现了。“天啊，老兄，”博尔登看着鲁利埃颤抖的手说道，“你是去打字了吗？”鲁利埃解释说，他是来为那位受伤的炮手找人帮忙。“好的，”博尔登说道，同时给鲁利埃的手包扎好，“我会到那里去的。”在返回阵地的途中，鲁利埃经过特尔霍斯特家的花园，停了下来，恐怖地凝视着。他以前从未见过，在一个地方有这么多尸体，有些尸体，脸上盖着士兵穿的伪装服，但另外的尸体却并没有盖，“他们的眼睛朝所有的方向凝视着”。尸体成了堆，太多了，无法在他们之间迈步。

在战壕里，鲁利埃等待着，最后博尔登带着两位担架手来了。“不要担心，”博尔登告诉鲁利埃。他伸出了拇指，“一切都会没事的。”鲁利埃并不这样认为。在英格兰时，这位31岁的伞兵恳求前去执行任务，他的年龄让他未能如愿，而且，尽管他是个炮兵，却成了代理食堂军士。但鲁利埃还是成功了，最终被允许前去。现在，当他凝视身边的疲倦、口渴、饥饿的伞兵们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忘记了这场战斗。我一门心思要给我们找点吃的东西”。他并不知道，他在这个地区被摧毁的花园里以及倒掉的房子当中爬了多长时间，他在架子上搜查，在地下室里搜索，寻找一片片或者一块块的食品。在一个地方，他发现了一个没有毁坏的镀锌盆，他把找到的所有东西都扔了进去———几个枯萎的胡萝卜、一些洋葱、一小袋马铃薯、盐，以及肉汤的一些块状浓缩料。在房子的附近，他发现了一个鸡笼，只有一只鸡还活着。鲁利埃把它带上了。

在成了废墟的房子的石头地板上，他把几块砖围了起来，架上盆。他从墙上扯下一条条墙纸，并使用一些木头，生上了火。他不记得，当他再次出

去找水的时候，街道上是否仍然在激战———当他蹒跚着回来时，盆子里的水就几乎满了。他把那只鸡杀了，拔了毛，然后扔进盆子里。就在薄暮时分，他认为鸡汤已经炖好了，于是便从窗框上扯下两个窗帘，包住锅的热把手，在另外一名伞兵的帮助下，朝战壕走去。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第一次意识到迫击炮弹飞来了。两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前进一次，在每次就要爆炸的时候停下来，然后再前进。在炮兵阵地里，鲁利埃大声呼喊："过来吃呀！"眼睛发红而视力模糊的伞兵们大为吃惊，他们以小心翼翼的小组形式出现，拿着被毁坏的食品罐子和野战餐具。他们恍恍惚惚地咕哝着表示感谢，把餐具伸进热盆子里，然后消失进渐浓的夜色之中。十分钟之内炖汤就光了。艾尔弗·鲁利埃盯着盆子的底，只能找到几小块马铃薯。他把马铃薯拣了起来，在那一天，第一次吃了点食物。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庭院的一个五人战壕里，滑翔机飞行员伦纳德·奥弗顿中士，朝愈来愈浓的夜色望去。与他共用战壕的那4个人，消失了。突然，奥弗顿看见，有黑色的形体在靠近。"是我们！"有人小声说道。当那4位士兵跳进战壕的时候，奥弗顿看见他们抬着一个扎起来的斗篷。那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斗篷，在斗篷的边上举起一个马口铁罐头盒子，把约有1品脱的雨水倒了进去。有一个人拿出了一块茶叶，开始搅动雨水。奥弗顿旁观着，恍惚起来。"在那一天，我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只有两片硬饼干，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它分享了。"他说。然后，令奥弗顿惊讶的是，那些伞兵们把那个马口铁罐头盒子给了他。他啜饮了一小口，又往下传了过去。"生日快乐！"每个人都小声对他说。奥弗顿都忘记了，那个星期日，9月24日，是他23岁的生日。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病情危急和能够行走的伤员，都离开了，但患战斗疲劳症的士兵却仍然继续留在这个大旅馆里。当随军牧师佩尔走过一个被遗弃的房间时，他听见，在这个传出回声的大楼的什么地方，有一个微弱、颤抖的嗓音在唱着《只是在暮色中唱支歌》注。佩尔上了楼，走进楼上的一个房间，在一个患有严重的战斗疲劳症的年轻伞兵旁边跪了下来。"神父，"那个孩子说道，"你能给我掖好毯子吗？这么多噪音，我好害怕。"佩尔没有毯子，但假装给这个伞兵盖好毯子。"这感觉很好，神父。我现在感觉很好了。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佩尔点了点头。"和我一起念主祷文。"佩尔这样做了。他把那个年轻人的头发抚了回去。"现在闭上眼睛吧，"佩尔对他说，"睡个好觉。上帝保佑你！"伞兵微笑了："晚安，神父。上帝保佑你。"两个小时以后，一个卫生员来找佩尔："你知道那个和你一起念主祷文的孩子吗？"佩尔问道："出了什么事？"卫生员摇了摇头："他刚才死了。他说，他要告诉你，他无法忍受外面的嘈杂声。"

傍晚时分，环形防线御用苏格兰近卫团地段的R·佩顿－里德上校，不愉快

地看到，“24日令人伤感地结束了。由于共识，希望早日得到地面部队支援这个大希望，现在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

星期天的后半夜，鬼怪式通信网的操作员内维尔·海中尉，奉命来到哈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厄克特的房间。“他递给了我一个较长的电文，”海说道，“并且告诉我，我把它译成电码之后，再还给他。我记得他说，也许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会把这个电报发出去了。”海读电文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这实际上意味着，要么他们得过来救我们，要么我们将被消灭。”海把电报译成电码，又还给厄克特。“我也不希望他把它发出去。”海说道。电报发出去了，原文是：

厄克特致布朗宁。必须提醒你，除非在9月25日一大早与我们直接接触，否则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了。所有的士兵现在都精疲力竭。缺少口粮、水、弹药和武器，同时军官伤亡率很高。敌人甚至稍微发动一次攻势，就可能造成完全的崩溃。这样，如果不投降的话，将命令所有的人朝桥头阵地突围。在敌人的面前，任何调动眼下都不可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只要可能将仍然尽最大努力。注

连续两个晚上，要把士兵和补给品送进厄克特的立足点的尝试都失败了。然而第三十军固执的军长霍罗克斯将军，拒绝放弃这个努力。如果要拯救这个桥头阵地，如果要实现对厄克特及其部下的解救，那就必须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进行。天气再次不利，不能指望基地在英格兰执行运送补给品和支援的任务的飞机前来帮忙。但在德里尔至奈梅亨的地区，兵力强大，而霍罗克斯又完成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驱动着他的整个军，沿着那条只有一辆坦克宽的狭窄走廊，到达了在莱茵河上的先头部队的位置，现在困扰他的，就是把他与空降部队分开的那条400码宽的河。他命令托马斯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杰拉尔德·蒂利中校的多塞特团第四营，将在上午10点开始，与剩余的波兰人一起发起攻击，渡河进入桥头阵地。

蒂利的行动，将是一个更大计划的第一步。“如果事情进展顺利，”霍罗克斯后来写道，“我希望，将让第四十三师侧滑下去，在更西边的地方渡过莱茵河，给进攻空降部队环形防线的德国军队一记左勾拳。”另外一个选择余地就是撤退。在市场花园行动的这个第八天，霍罗克斯固执地拒绝面对这个选择。然而，其他人现在却正在认真计划可以怎样撤退。

按照他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的说法，第一空降军司令员布朗宁将军，现在“非常公开地谈论撤退”。在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前往德里尔的时候，这个决定尚悬而未决，但“布朗宁确信，一旦他们被卡住了，就将不得不把厄克特的士兵撤出来”。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员迈尔斯·C·邓普西将军，

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自进攻开始以来，他便未曾与霍罗克斯会晤过，现在，由于时间所剩无几，邓普西便命令霍罗克斯，到位于圣奥登罗得的走廊地带开会。按照指挥的顺序，邓普西由于得到了蒙哥马利的授权，将最后说了算。这个令人痛苦的决定，将是由一个人迫使他们做出的，那个人就是德国陆军元帅莫德尔。

当霍罗克斯驱车向南，前往圣奥登罗得时，蒂利中校的多塞特团第四营开始准备进行夜间的渡河。他的营正在匆匆赶往德里尔的集结地，而攻击艇，由于现在走廊又再次打开，也正在路上。给蒂利的指示是清楚的，旅长本·沃尔顿准将亲自给他下达了简短命令，蒂利被告知，要“扩大环形防线的基地”。渡河将在那个旧渡口进行，在奥斯特贝克西边大约1英里处。一旦过了河，多塞特团便要“坚持下去，直到得到增援时为止”。他们将轻装前进，只带着能维持三四天的食品和弹药。按照这位35岁的蒂利的看法，他的士兵“是一支特遣部队，为邓普西的整个英军第二集团军带路”。他敏锐地意识到迅速到达厄克特那里的急迫必要。从他所得知的一切来看，那个师的死亡正在以小时计算。

星期天，蒂利曾三次爬上德里尔一个被毁坏的教堂的塔尖，观察他的部队将在莱茵河北岸登陆的那个地区。他的司令部设在德里尔南边的一个果园里，下午的时间沉闷地过去了，他在司令部里不耐烦地等待着他的营从霍姆伊特村赶来，霍姆伊特村在德里尔西南几英里外，与此同时，攻击艇正从走廊送来。

下午6点刚过，本·沃尔顿准将便派人叫蒂利过去。沃尔顿的司令部在德里尔南边一幢房子里，在那里，蒂利本来预料，旅长会再次检查这次夜间行动的细节。相反，沃尔顿却告诉他，计划有了改变。沃尔顿说，已经接到命令，“整个行动———大规模的渡河———取消了”。蒂利的那个营还是要渡河，不过目的不同了。蒂利听着，越来越焦虑。他的士兵们将在厄克特的第一空降师撤退时，坚守环形防线的基地！他被要求带尽可能少的人———“够完成任务就可以”：大约400名步兵和20名军官。蒂利不必去，他可以派他的第二把手詹姆斯·格拉夫顿少校，取代他的位置。尽管蒂利回答说，他将“考虑一下”，但他已经决定，要亲自率领他的士兵过去。当蒂利离开沃尔顿的司令部时，他感到，他的士兵正要被牺牲掉。有关如何把他们带回来，沃尔顿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沃尔顿对此也无能为力，无法改变形势。令他困惑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计划为什么改变？

要把厄克特的部队撤出的决定，是星期天的下午，在与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将军一起举行的圣奥登罗得会议上，由邓普西做出的，而这个决定还要由蒙哥马利批准，而蒙哥马利则是9月25日星期一的上午9点30分，才最终批准了这个命令。在考虑了手下军长的大规模渡过莱茵河的设想之后，邓普西推翻了这个计划。邓普西与霍罗克斯不同，他认为这次攻击不可能成

功。“不，”他对霍罗克斯说，“让他们撤出。”邓普西又转向布朗宁，问道：“你看这样行吗？”布朗宁缄默不语，闷闷不乐，点了点头。邓普西立即通知了身在德里尔的托马斯将军。甚至就在圣奥登罗得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德国人又再次切断了费赫尔北边的走廊。由于被切断了回去的道路，霍罗克斯便使用了一辆装甲军车，突破德军的营地，返回到他在奈梅亨的司令部。陆军元帅莫德尔的最新进攻，将使走廊关闭40多个小时。

在德里尔，蒂利中校那个营的大多数人现在已经到达了。他在部队当中走着，挑选他将带着的人。蒂利拍着士兵的肩膀，说道：“你去……你不去。”这次攻击的真实目的是保密的，他无法告诉那些提出抗议的士兵们，为什么把他们留在后面。蒂利“挑选了那些老兵，他们绝对有把握———绝对是不可或缺———而把其余的人留在了后面”。

这个决定是使人痛苦的。他看着那些军官和士兵，认为他们“要走向必然的死亡”。蒂利把格拉夫顿少校叫了过来。“吉米，”注 格拉夫顿记得蒂利说，“我得告诉你点事情，因为除了我之外，还得有人知道这次渡河的真正目的。”蒂利概述了计划中的改变，又小声补充说，“恐怕我们要被抛弃了。”

格拉夫顿大吃一惊，盯着蒂利。蒂利补充说，关系重大的是，不能让任何别的人知道这个信息。“那会太冒险了。”他解释说。

格拉夫顿知道蒂利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相被人所知，那将是对士气的一个可怕打击。当格拉夫顿准备离开时，蒂利说道：“吉米，我希望你会游泳。”格拉夫顿微笑了。“我也这样希望。”他说道。

晚上9点30分，蒂利的士兵来到河边，却仍然没有攻击艇的影子。“没有船，他们到底要我怎样过河？”蒂利问他的工兵军官查尔斯·亨尼克中校。给士兵的口粮也没有到达。蒂利心情烦躁，同时也因为知道这次任务的真正原因而精神沉重，于是便与多塞特团第五营的营长奥布里·科德中校交谈起来。“什么都不对头，”蒂利告诉他，“船没有来，口粮也没有给我们发下来。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的话，我就不打算出发了。”科德命令他的营把口粮交给蒂利的士兵。

在3个漫长的小时里，在寒冷的毛毛雨中，蒂利的部队等待着攻击艇。在午夜时，有消息说，那些船现在就在德里尔，但只剩下了9条。在黑暗之中，有一些卡车拐错了弯，结果开进了敌人的营地，还有两辆卡车从一条泥泞的堤岸马路上滑了下去，丢失了。在会合地点，船由步兵用肩膀扛着，穿过600码沼泽地，来到下水地点。士兵们跌跌绊绊，摇摇晃晃，在圩田的泥土上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船送到河里。直到9月25日，星期一的凌晨两点之后，集结才告完成。

当士兵们准备下水的时候，蒂利把给厄克特将军的两封信递给了格拉夫顿：一封是布朗宁将军给他的，另外一封是托马斯将军用密码写的电文，上面概述了撤退计划。这两封信各有两套。厄克特的工兵军官埃迪·迈尔斯中校已经从奈梅亨与布朗宁见面之后回来了，现在，迈尔斯带着相同的信，正在等待过河。“你的任务，”蒂利告诉格拉夫顿，“就是万一那位工兵军官没能送过去，就带着这些信到厄克特那里去。”带有撤退计划的信“绝对重要”，蒂利强调说。

在河上，显然德国人也对另外一次渡河做好了准备。现在只剩下大约15条英国攻击艇———包括3辆水陆两用车，以及头一天晚上所使用的那个小小的舰队的残余船只。在最后时刻，由于船只短缺，所以决定停止原定波兰人在多塞特团的下水地点东边进行的一次牵制性的渡河，蒂利的士兵将分成5拨，每拨3条船过河。当准备工作继续进行时，迫击炮弹在南岸爆炸了，而重机枪———现在显然是仔细地部署在环形防线基地的两个边缘———在水面上扫射起来。蒂利中校跳进了一条船。第一拨开始渡河了。

尽管南岸的每一门可用的英国大炮都在频频轰击，从这些多塞特人注上方送去了浓密的炮弹，但渡河还是遭到了残酷的攻击。帆布和胶合板做成的船遭到了扫射，打出了洞，被水冲走了。有一些船，比如格拉夫顿少校的船在离开南岸之前就着火了。格拉夫顿迅速坐上另外一条船出发。在半途，他发现他的船是这一拨中唯一的一条船。15分钟以后，格拉夫顿过了河，“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走运”。

在雨水和黑暗之中，被位置有利的机枪火力包围，这5拨人中的每一拨，都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敌人却是水流。水流在午夜之后出乎意料地速度加快，无助的多塞特人既不习惯于这些船，又不习惯于这水流，结果被水冲得过了环形防线的基地，落入了敌人手中。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散开在几英里的地方，被迅速截断，包围起来。在动身前往环形防线的420名官兵当中，只有239名到达了北岸。蒂利中校在登陆时，遇到了山崩似的手榴弹，那些手榴弹就像保龄球一样滚下坡来，人们听见，他率领着他的士兵从这个火海中冲了出来，大声呼喊着：“跟他们拼刺刀！”注

多塞特人无法作为一支有效的部队与厄克特的士兵会合。只有几个人到达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环形防线，其中就有格拉夫顿少校，他带着那份完好无损的撤退计划，经由下奥斯特贝克教堂附近的迪基·朗斯代尔少校的阵地，走了进来。迈尔斯中校已经带着他携带的文件，来到了厄克特的司令部。这两个人都不知道托马斯密码电文的内容，也不知道电文极其令人啼笑皆非的名字。当蒙哥马利最初迫切要求艾森豪威尔，进行“一次前往柏林的强大而又有力的挺进……从而结束战争”的时候，他的单兵挺进的提

议被拒绝了。“市场花园行动”是妥协的产物。现在，为厄克特血染的士兵们所制订的撤退计划，已经正式定名。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余部，将以“柏林行动”为代号撤退。

4



现在，蒙哥马利本来希望将迅速结束战争的市场花园行动，正在无情地走向毁灭。在60英里长的可怕地段里，士兵们在各座桥梁上坚持着，为一条单一的道路，也就是那个走廊而战斗。在位于艾因霍温以北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防区，伞兵们在英军装甲部队和步兵的支持下，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凶猛进攻，同时又试图再次打开乌登被切断了的公路的那个无人地段；在加文将军第八十二师的防区，瓦尔河大桥不断遭到轰炸，敌人继续从国家森林向里紧逼，而且兵力越来越强大。一个星期以前的态度消失了，当时认为战争几乎要结束了。现在遭遇到的敌军部队，是老早就已经被注销的部队。纳粹战争机器，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被认为是惊魂未定，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却又神奇地生产出了60辆虎式坦克，那60辆坦克在9月24日上午交给了莫德尔。市场花园行动正在窒息而死，计划的主要出击目标，也就是在莱茵河的对岸获得立足点，获得通往鲁尔河地区的跳板，现在要被放弃。9月25日，星期一，早晨6点05分的时候，厄克特将军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在为阿纳姆行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厄克特得到的许诺是，在48小时之内就会得到救援。布朗宁将军本来预料，第一空降师独自坚持的时间，最多也不会超过4天。厄克特的士兵，不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上都逊于敌人，但他们所坚持的时间，是那个时间的两倍还多，对一个空降师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战斗业绩。对于这位第一次指挥一个空降师的勇敢的苏格兰人来说，撤退是痛苦的，然而厄克特却又知道，撤退是唯一的途径。现在，他的兵力只有不到2500人，而且他也不能向这些不妥协的伞兵提出更多的要求了。实际上，前来救援的英国部队就在1英里之外，与他的师只隔着一条宽阔的莱茵河，得知这一点是让人恼火的，尽管如此，厄克特还是勉强同意了上级的决定。到了该把在阿纳姆的这些勇敢的人撤出去的时候了。

哈滕施泰因旅馆里，筋疲力尽的埃迪·迈尔斯中校把那两封信———布朗宁的信，以及托马斯将军的撤退命令———交给了厄克特。布朗宁表示祝贺的鼓励信，是在24个小时以前写的，已经过时了。其中写道，“……军队正在涌去帮助你，但……在这一天的非常晚的时候”，而且，“我自然感到，不像你那样疲倦和沮丧，但有关整个事情，我大概比你还感到糟

糕”……

撤退命令，甚至更令人沮丧———尤其是因为它来自托马斯，厄克特就像布朗宁一样，永远也无法原谅托马斯的缓慢。托马斯的信中写道，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现在开始感到，德国人带来的压力愈来愈大，要在莱茵河对岸建立一个主要桥头阵地的一切希望必须放弃：而第一空降师的撤退，经过厄克特和托马斯之间的相互同意，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

厄克特思考着他的决定。当他听着外面的迫击炮和火炮持续轰炸的时候，有关日期和时间已经毫无疑问了。如果他的士兵能有人活下去的话，那么撤退就必须迅速进行，而且显然是在夜幕的掩护下进行。上午8点08分，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取得了联系。“柏林行动，”他告诉他，“必须是今天晚上。”

大约20分钟以后，厄克特把给布朗宁准备的电文发了出去，头一天晚上，他就已经让内维尔·海中尉把这封电文译成了电码。它仍然是切题的，尤其是那个提出警告的句子：“甚至敌人稍微发动一次攻势，都可能造成完全的崩溃。”因为在这个时刻，厄克特的形势是如此之绝望，他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士兵能否坚持到天黑。然后，这位痛苦的将军开始为这个最困难的调动制订计划。只有一条出路———越过那条400码宽的可怕的莱茵河，到达德里尔。

厄克特计划的设计，是按照另外一种经典的英军撤退的路线———1916年的加利波利撤退(注)。在加利波利，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之后部队最后在欺骗性的掩护下脱身了，当主力部队安全撤离的时候，掩饰着撤退兵力的稀疏营地仍然在继续射击。厄克特计划了一个类似的调动。沿着环形防线，一个个小组的士兵将持续齐射，以欺骗敌人，与此同时大部队将悄悄溜走。逐渐地，环形防线北面的各个部队，将沿着防线的边缘移动到河边，以便撤离。然后最后的部队，也就是最靠近莱茵河的部队，将跟上。“实际上，”厄克特后来说道，“我计划的撤退，就像一个纸袋子的倒下。我想要小股部队驻扎在战略地点，给人的印象是我们还在那里，与此同时又朝低处前进，沿着每一个侧翼撤退。”

厄克特希望能够设法制造出“正常”的其他迹象———无线电传输的通常模式将继续；谢里夫·汤普森的炮兵将一直开炮到最后；而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上，管理德国战俘的宪兵队将继续巡逻，他们将是最后离开的人。显然，除了后卫部队之外，还有人将待在后面———医生、医务护理员，以及重伤号。不能行走但能占据防御阵地的伤员，将留下继续射击。

为了到达河边，厄克特的士兵将走一条沿着环形防线的每一边的路线。滑翔机飞行员将担任向导，他们将领着厄克特的士兵走那条逃跑道路，在一些地方，逃跑道路是用白色的带子标志出来的。伞兵们的靴子绑上布条，以便隔音，他们将走向河水的边缘。在那里，海滩勤务队队长(注)将把他们装进一个小的撤退船队：这个船队由14艘装有动力的强击登陆艇组成，它们由两个连的加拿大工兵管理，每一艘能载14个人。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船，它们的数目是不肯定的。包括海滩勤务队队长在内，谁也记不得是多少，但它们当中有几辆水陆两用车，以及在前几次渡河后留下来的帆布和胶合板制作的攻击艇。

厄克特在孤注一掷，希望那些观察到船运的德国人会以为，士兵们是在试图进入环形防线，而不是从环形防线里出来。除了部队会被发现这个可怕的可能性之外，在两千多人试图逃跑的时候，别的危险也可能产生。厄克特能够预见，如果不能维持一个严格的时间安排，那么一个可怕的瓶颈就会在环形防线的狭窄基地里形成，环形防线的狭窄处现在还不到650码

宽。如果士兵们拥挤在上船地区，就可能被无情地消灭。波兰人和多塞特人都曾经试图进入环形防线，都是无功而返，厄克特因此并不期望撤退行动不会受到挑战。尽管第三十军能够使用的每一门大炮都将参战保护他的士兵，但厄克特仍然认为，德国人会带来严重的伤亡。时间是一个敌人，因为要完成撤退。得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为计划保密也是个问题，由于在那一天的所有时间里，士兵们都可能被抓获，受到审讯，所以除了高级军官以及那些被给予了特殊任务的人之外，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以前，将不会把撤退告诉任何人。

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将军进行了商谈，撤退计划的主要方面获得了对方的同意，然后他又召集剩下的几个高级军官开了个会，他们是：皮普·希克斯准将；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伊恩·默里中校，他现在代替负伤的哈克特指挥；R·G·洛德－西蒙兹中校，他是师的炮兵部队司令；参谋长麦肯齐上校；埃迪·迈尔斯中校，他是将负责撤退的工兵军官。就在会议开始前，首席医官格雷姆·沃拉克上校过来见厄克特，因而成了第一个得知这个计划的人。沃拉克“情绪低落。不愉快。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待下来———我对伤员负有责任，而是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刻，我都一直以为，这个师一定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解救”。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地下室里，在军官们的围绕下，厄克特透露了这个消息。“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去。”他告诉他们。他一步一步地概述了他的计划。撤退的成功，将取决于一丝不苟的时间安排。部队的任何集中，或者交通堵塞，都可能造成灾难。士兵们要不断地移动，而不要停下来作战。“在遭到射击的时候，他们应该采取回避行动，只有在事关生死的时候才还击。”当他沮丧的军官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厄克特提醒他们，撤退应该保密尽可能长的时间，只有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才可以被告知。

这个消息，并没有让厄克特的高级军官多么惊讶。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显然这个阵地是没有希望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像沃拉克一样感到心酸，因为救援从未到来。在他们的脑子里，也有这样的惧怕，即在撤退期间，他们的士兵可能会忍受甚至比在环形防线里更大的磨难。隶属于师司令部的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意外地听到了这个简短的信息：“柏林行动今晚进行。”他苦思冥想着意思，甚至都没有想到撤退。科克里尔认为，这个师“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他以为，“柏林行动”可能意味着，“将以《轻骑兵旅的冲锋》注的那种英勇精神，或是什么精神”，全力以赴试图突破，前往阿纳姆大桥。另外一个人，则太清楚它是什么意思了。在第一机降旅的司令部里，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佩顿－里德上校，在帮助安排环形防线西部边缘的撤退细节时，听见皮普·希克斯准将嘟囔了点什么，好像说的是“又一个敦刻尔克”。

这一天从早到晚，在一些发狂似的进攻中，德国人试图攻占阵地，但“红毛鬼子”们仍然坚守着。士兵们后来回忆，晚上8点刚过，有关撤退的消息开始向下走漏出来。在位于环形防线顶部第一五六营的乔治·S·鲍威尔少校看来，这个消息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想到所有那些死去的人，然后我又想到，这整个努力成了一种浪费”。由于他的士兵要走最远的路，鲍威尔就在晚上8点15分的时候，让他们排成单列出发。

第十伞兵营的列兵罗伯特·唐宁被告知，要他离开他的狭长掩体，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在那里，一位中士会见了他。“那里有一把旧的塑料剃刀，”中士告诉他，“你干刮一下。”唐宁盯着他。“赶快，”中士告诉他，“我们要过河，老天作证，我们要以英国士兵应有的样子回去。”

在阵地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罗伯特·凯恩少校借到了另外一把剃刀，有人找到了水，凯恩刮掉了长了一个多星期的胡子，然后在他被烟熏黑的、沾染着血的伪装服里子上仔细擦干脸。他走了出来，在倾盆大雨中站了一会儿，看着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教堂。在教堂的风标上有一个金制的风信鸡，凯恩曾经在战斗间歇用它核对过风向。对他来说，那是好运的一个象征，只要金制风信鸡在，这个师就会在。他感到有一种势不可当的悲伤。他不知道，明天风标是不是还会在那里。

像别的人一样，滑翔机飞行员团的托马斯·托勒少校也被伊恩·默里上校告知，要他稍微整理一下。托勒才不在乎呢，他是如此疲倦，以至于只“认为，整理是件费劲的事情”。默里把他自己的剃刀递了过来：“我们要出去了。我们不想让部队认为我们是一群流浪汉。”托勒涂上一点默里留下来的肥皂泡沫，也刮掉了自己的胡子。“让我吃惊的是，我感到好多了，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好多了。”他回忆说。默里的指挥所里放着那面双翼飞马旗，哈克特的士兵们本来计划在第二集团军到达的时候把它升起来。托勒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仔细把它卷了起来，收好了。

在炮兵阵地里，士兵们现在将随意发射，以帮助掩饰撤离，在这里，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听见，通信兵威利·斯皮迪从前哨撤回到炮台了。斯皮迪给了一个新的电台控制频率，然后只是说道：“我现在停止播送了。设备坏了。”

中士斯坦利·沙利文是9天前带路的伞降信号员之一，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大发雷霆。“我本来就以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这样的，我们还不如继续战斗下去。”沙利文的前哨站在一所学校里，“小孩子们一直在那里努力学习。如果我们撤出来，我就替所有这些孩子们犯愁。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也得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在他一直保卫着的那间教室的黑板上面，沙利文写上了大的印刷体字母，并在下面

画上了几道底线。他写的是："我们会回来的！！！"注

晚上9点整，夜空被第三十军集中起来的火炮的闪光刺破了，炮火沿着环形防线的所有的边缘爆发出来，炮弹雨点般地倾泻在德国人的阵地上。45分钟后，厄克特的士兵开始撤退。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恶劣的天气曾经使得部队和补给品无法迅速到达，现在，这恶劣的天气却又帮了"红毛鬼子"们的忙：撤退是在几乎7级风的状况下开始的，再加上轰炸的嘈杂声，这帮助掩护了英国人的逃跑。

在狂风暴雨之中，第一空降师的幸存者们，面部弄黑了，装备捆扎了起来，靴子隔了音，他们艰难地爬出阵地，排起了队，开始了前往河边的危险的跋涉。黑暗和天气使得士兵们只能看见前面几英尺的地方。伞兵们形成了一个活动中的链条，互相拉着手，或者紧靠着前面的人的伪装服。

中士威廉·汤普森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在倾盆大雨中弓着身子。他负责指引伞兵们到达河岸，并为一个漫长而又潮湿的夜晚做好了准备。当注视着士兵们排成纵队经过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生活在一个1英里长的角斗场里面是什么样子。"

对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来说，现在"柏林行动"的意义已经清楚了。他被派去，在部队撤退的时候待在后面操作。给他的指示是："一直播送，让无线电装置一直运行，以便让德国人以为一切正常。"在哈滕施泰因旅馆阳台的下面，科克里尔独自坐在黑暗之中，"在键盘上敲个不停。我能够听见，我周围有许多运动，但我除了让装备一直播送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别的指示"。科克里尔确信，在天亮以前他就会当上俘虏。他的步枪架在旁边，但没有用处。有一颗子弹是假子弹，里面装的是同第二集团军联系的密码。那是他剩下的唯一一颗子弹。

莱茵河南岸，医生、医务护理员以及荷兰的红十字会护理人员，在接待地区和集结点做好了准备。在德里尔，救护车和普通车辆的车队在等待着，要把厄克特的幸存者们送回奈梅亨。尽管为士兵们的到达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她的周围进行，但科拉·巴尔图森在照料了伤员三天三夜之后，已是疲惫至极，结果她以为，轰炸以及南岸上的活动，标志着另外一次渡河的前奏。在德国人对德里尔的集中炮击中，科拉的头部、左肩和肋部受了弹片伤。尽管伤口疼痛，但科拉还是认为只是皮肉伤，她更关心的是她血迹斑斑的衣服。她骑车回家，打算换身衣服，然后回来照料刚刚蜂拥而来的伤员，她确信他们很快就会到达。途中，科拉骑进了敌人的炮火之中。她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没有受伤，躺在一个泥泞的沟渠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又再次动身。到了家里，她不胜疲惫，在地下室里她躺了下来，本来是想

小睡一会儿。她睡了整整一个晚上，并没有意识到“柏林行动”正在发生。

在位于环形防线基地地段的河边，撤离船队正等待着，给它们配备的是加拿大和英国的工兵。到目前为止，行动还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事实上，德国人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火炮正朝着留下来的多塞特人开火，多塞特人已经开始在环形防线的西边发起了牵制性的进攻。在更西边，德国人正在开火，因为英国炮兵发射了一阵掩护炮火，好像要在那个地区向河发起进攻似的。厄克特的欺骗计划似乎正在奏效。

倾盆大雨中，一列列士兵沿着环形防线的两边，缓慢地向河边蜿蜒前进。有些士兵太疲倦了，结果迷了路，落入了敌人的手中；还有的士兵，由于无法自己前进，得让别的人扶着走。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没有一个人停下。停止就会带来嘈杂、混乱———以及死亡。

在炮火和燃烧着的房屋的红色光亮之中，博伊·威尔逊少校的伞降信号员小组的中士罗恩·肯特，率领着他的排来到了一块白菜地，那个地方被指定为连的会合点。他们在那里等待着，一直到连的其他人集结起来，然后朝河走去。“尽管我们知道莱茵河是在正南，”肯特说道，“但我们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们将把我们撤离过去。”突然士兵们发现，从南边飞来了一道道红色的曳光弹，他们把这些曳光弹当作向导，继续前进。不久他们便来到了白色的带子以及滑翔机飞行员的影子面前，滑翔机飞行员指引着他们前进。肯特的小组听见，在他们的左边，机枪在扫射，手榴弹在爆炸。威尔逊少校和另外一组人撞上了德国人，在随后的凶猛冲突中，两名士兵阵亡了，而安全地带就在1英里外的地方。

士兵们将通过细节来记住这次撤退———那些细节是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有时是幽默的。当第一营的列兵亨利·布莱顿朝河下走去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哭叫。在前面，队列停止了移动。伞兵们朝路边走去，在那里，一位受了伤的士兵躺在浸透了水的泥地上，哭着喊妈。士兵们被命令继续前进，谁也不得为伤员而停下来。许多人死去了。迪基·朗斯代尔少校部队的伞兵们离开阵地以前，他们去了特尔霍斯特家，把能带上的可以行走的伤员都带上了。

一等兵悉尼·纳恩，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曾经与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一起击毁了一辆虎式坦克，他此刻以为，他将永远也到不了河边。白天时，德国人曾侵扰了教堂旁边的炮兵阵地，现在纳恩和一组御用苏格兰边境近卫团的士兵，在那里与德国人进行了一场短暂而又猛烈的冲突战。在雨水和黑暗之中，大多数人脱身了，纳恩则躺在地上，在作战的9天当中，他第一次负了伤。弹片击中了石头，纳恩的一颗门牙被一块小圆石打掉了。

第十营的中士托马斯·本特利，跟在鬼怪式通信网操作员内维尔·海中尉的

后面。“我们不断遭到狙击手的伏击，”他记得，“我看见，有两个滑翔机飞行员从阴暗处走了出来，故意吸引德国人的射击，显然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到，射击是从哪里来的。”这两位向导都被打死了。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厄克特和他的参谋们准备离开。作战日志合了起来，文件被烧掉了，然后，将军的勤务兵汉考克用一片片的窗帘布包上了厄克特的靴子。当随军牧师念主祷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跪了下来。厄克特想起来，在D日，他的勤务兵在背包里放进了一瓶威士忌。“我把它递给每一个人，”厄克特说道，“每个人都喝了一点。”最后，厄克特下去，到地下室里看伤员，“他们扎着染满血的绷带，裹着简陋的夹板”，他向那些已经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们道别。还有的人，由于吗啡的作用而昏昏欲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要撤退，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一位面容憔悴的士兵，倚靠着地下室的墙站了起来，对厄克特说：“我希望你能成功，长官。”

师司令部的那位荷兰联络官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在将军一行人的后面走着，绝对一声不吭。“由于我的口音，倘若我开口的话，就会被当作德国人。”他说。在一个地方，沃尔特斯没有能跟上在他前面的那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是不停往前走，祈祷着，希望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沃尔特斯感到特别沮丧，他老是想着他的妻子以及他从未见过的女儿。他一直没有能够给她们打电话，尽管他的家人就住在距离哈滕施泰因旅馆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他在英格兰为妻子买的那块表还在他的口袋里，他本来打算送给女儿的那个玩具熊，是在一架失事的滑翔机里的什么地方。如果能够足够幸运，回到河边，那么沃尔特斯将会再次离开荷兰，大概是前往英格兰。

在河边，渡河已经开始了。迈尔斯中校和他的海滩勤务队队员们，在士兵们一到的时候便把他们装上船。现在，德国人虽然仍然没有意识到撤退正在进行，但通过照明弹的光线，他们却能够看见船渡的行动。迫击炮和火炮开始瞄准射击，船被打出窟窿，倾覆了。在水里挣扎着的士兵们大声叫救命，还有一些士兵，已经死了，被水冲走。受伤的士兵抓住船的残骸，试图游到南岸。不到一个小时，撤离船队的一半就被毁掉了，但船渡仍然进行着。

乔治·鲍威尔少校的士兵沿着环形防线东边，长途跋涉来到了河边，这时鲍威尔却认为，撤退已经结束了。有一条船正在水里上下颠簸，在波浪的击打下渐渐下沉。鲍威尔涉水过去。那条船满是窟窿，船上的工兵全都死了。当他的一些士兵开始游过去的时候，有一条船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了。鲍威尔匆匆把他的士兵组织起来，让一些人上了船。他和剩余的伞兵等待着，一直到那条船返回。在莱茵河南边的高堤岸上，鲍威尔站了一会儿，回头看着北岸。“我突然意识到，我过来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活着出

来了。”鲍威尔转向他15名又湿又脏的士兵，说道：“排成三人一行。”他让他们齐步走到接待中心。在那个建筑的外面，鲍威尔喊道：“第一五六营，停！向右转！解散！”他站在雨水之中，注视着他们走向避难所。“全都结束了，但老天作证，我们就像进来一样出去了。骄傲啊。”

当厄克特将军拥挤的船准备离开时，船陷在烂泥里。他的勤务兵汉考克跳出来，把他们推了出去。“他让我们摆脱出来了，”厄克特说道，“但当他挣扎着要再次上船的时候，有人喊道‘咱们走吧！船已经太拥挤了’”，这种忘恩负义让他气愤，“汉考克不理会这句话，用他所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爬上了船”。

冒着机枪的扫射，厄克特的船过了一半，这时引擎突然发出突突的噪音，停了下来。船开始随着水流漂浮，厄克特感觉“等到引擎再次活动起来的时候，绝对过了一个时代”。若干分钟后，他们到达了南岸。回过头来，厄克特看到德国人正在朝河面扫射，火光摇曳。“我认为，”他说道，“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

在莱茵河岸边，以及河岸后面的草地和树林里，几百名士兵在等待着。但现在，由于船队只有一半可以运行，也由于机枪火力猛烈，厄克特惧怕的瓶颈出现了。拥挤的营地里出现了混乱，尽管没有恐慌，但许多士兵仍然试图继续前进，而他们的军官和军士们便试图控制他们。第一营的一等兵托马斯·哈里斯记得，“成百上千的人等着过河。试图上船的人太多、太重，结果使船浸没在水里。”此时迫击炮的炮弹正在落在上船地区，因为德国人已经校准了射程。就像许多别的士兵一样，哈里斯也决定游泳。他脱下作战服和靴子，跳了进去，令他吃惊的是，他居然游过去了。

别的人却没这么幸运。等到炮手查尔斯·佩维来到河边时，上船的地区也遭到了机枪的扫射。当士兵们在岸上挤作一团时，一名士兵朝佩维躺着的地方游去。那个士兵不顾乱射在河边的子弹，用力从水里钻出来，上气不接下气，说道：“感谢上帝，我过来了。”佩维听见有人说：“该死的傻瓜。你还是在原来的那边。”

中士艾尔弗·鲁利埃，他曾在星期日设法煮了一锅汤送给大家喝，现在他试图游泳过河。当他在水里艰难移动的时候，一条船来到了旁边，有一个人抓住了他的领子。他听见有一个人在喊：“没事，伙计。继续游。继续游。”鲁利埃实在有些茫然失措了，他认为自己就要淹死了。然后他听见那同一个嗓音在说：“好极了，老兄。”接着一位加拿大工兵把他拉到船上。“我究竟在哪里？”晕头转向的鲁利埃咕哝着说。那个加拿大人咧着嘴笑了。“你快到家了！”他说道。

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仍然待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阳台底下，在他无线

电设备面前。天快亮的时候，他听见一声恶狠狠的低语。“赶快，小孩，”一个嗓音说道，“咱们走。”当士兵们朝河边走去的时候，突然发出了一片猛烈的爆炸声。科克里尔感到，他的脖子和肩膀被猛地拉了一下，原来他挂在背上的斯特恩式轻机枪被弹片撕开了。走近河岸的时候，科克里尔一行人遇见了几位站在树丛里的滑翔机飞行员。“我们让你们走的时候再走，”其中的一位飞行员说道，“德国人有一门火炮对准这个地方，是一门施潘道型火炮，朝腰这么高的地方射击。”在飞行员们的指导下，士兵们一次一位向前冲。当轮到科克里尔的时候，他蹲下身来，开始跑。几秒钟以后，他倒在一堆尸体上面。“一定有20或者30具尸体，”他记得，“我听见，士兵们在喊妈，还有的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留在那里。我们不能停下。”在河边，一颗照明弹爆炸了，机枪开始嗒嗒连发。科克里尔听见有人喊叫，让会游泳的人游泳。他跳进了寒冷的水中，从那些似乎在他身边挣扎的人旁边奋力游了过去。

突然科克里尔听见，有一个嗓音在说：“好了，伙计，不要担心。我们找到你了。”一个加拿大人把他拽进船里，几秒钟以后，科克里尔听见，船在岸边慢慢停了下来。“当我发现我又回到了我出发的地方时，我都要哭了。”他说道。原来，那条船到河里去，是为了把伤员救上来。在周围的士兵帮助装好船之后，船又再次出发，科克里尔记得，士兵们是从各个侧面蜂拥着爬上船的。尽管他们的船负荷沉重，又遭受着炮火的轰击，但那些加拿大人还是把船划到了对岸。在经历了阳台底下待着的几个小时以及噩梦般的渡河旅行之后，科克里尔已是晕头转向。“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在一个谷仓里，有人给了一支香烟。”然后科克里尔记起了一件事情。他在口袋里发狂似的寻找，把他那唯一的一件弹药取了出来：那颗里面装着密码的口径为303的仿真子弹。

快到凌晨两点的时候，第一空降师剩下来的那点弹药全用掉了。谢里夫·汤普森的炮手们把剩余的炮弹全都发射了出去，炮兵把炮栓卸了下来。一等兵珀西·帕克斯以及炮组剩下的人被告知，要他们撤退。帕克斯感到惊讶，他没有想到要撤退。他本来预料他要待下去，一直到他的岗位被德国人攻占。当他来到河边时，他甚至更加惊讶了。那个地方挤满了几百名士兵，有人说，所有的船都被击沉了。帕克斯身边的一个人深深喘了一口气。“看来我们是要游泳了。”他说道。帕克斯注视着河。“河非常宽。河水上涨的时候，流速似乎有9节[注]。我认为我游不过去。我看见，士兵们穿着衣服跳下水，被河水冲了下去。另外的人游过去了，结果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却被击中。我看见，有一个家伙抱着一块木板游了过去，还仍然背着他的背包。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帕克斯脱掉衣服，只剩下短内裤，把什么东西都扔掉了，包括他的金怀表。在急速的水流中，他的短内裤滑落下来，于是帕克斯把它踢到一边。

他游了过去，在树丛中和沟渠里躲避着，最终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小农舍。帕克斯走进去，找到了一些衣服。几分钟后，他从农舍里出来，遇见了多塞特团的一位列兵。那位列兵指引他去了一个聚集点，在那里，他得到了一缸子热茶和一些香烟。精疲力竭的帕克斯费了好长的时间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盯着他。他穿着一件男人的彩色运动衫，一条女人的长及膝部的亚麻布灯笼内裤。

第十营的列兵艾尔弗雷德·达尔福斯，赤身裸体游到了南岸，但仍然带着一支枪。令他尴尬的是，有两个妇女和士兵们一起站在岸上。达尔福斯“想要直接钻进水中”，其中的一个女人朝他喊着，把一条裙子举在前面。“看见我裸体，她连眼睫毛都没有眨一下，”他记得，“她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她们在那里，帮助士兵们过河。”达尔福斯穿着一条长达膝盖的彩色裙子，一双木底鞋，被带上一辆英军的卡车，卡车载着幸存者们返回了奈梅亨。

到了这个时间，德国人开始猛烈轰击上船地区，迫击炮弹尖叫着飞来。当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在一行士兵后面跑向一条船的时候，一颗炮弹在这群人当中爆炸了。“我绝对没有受伤，”沃尔特斯回忆说，“但在我的周围躺着8个死人，还有一个人受了重伤。”他给那个人打了一针吗啡，抱着他上了船。在那条已经超载的船上，没有沃尔特斯可待的地方。他下了水，挂在船的边上，被拖着过了河。他摇摇晃晃地上了南岸，瘫倒在地。

黎明时分，撤离船队几乎被摧毁了，然而那些加拿大和英国工兵们，仍冒着迫击炮、火炮和重机枪的打击，继续用那些剩下来的船运送士兵。第十一营的列兵阿瑟·希尔伍德发现，加拿大工兵正在把一些伤员装进一条小船里，其中的一个加拿大人向希尔伍德示意，要他上船。小船的尾挂发动机无法再次启动，因而加拿大人要求所有仍然携带步枪的人用枪托划水。希尔伍德拍了拍在他前面的那个人。“咱们走吧，”他说道，“开始划。”那个人毫无表情地看着希尔伍德。“我无法划，”他说道，同时指着扎着绷带的肩膀，“我丢了一支胳膊。”

接近黎明时，罗伯特·凯恩少校已经把他的士兵全都送过了河。他与准尉副官“罗伯”·鲁宾逊一起，在岸上等候着，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过去，但却似乎再也没有船驶来。在另外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人指着一条稍微打出了点窟窿的攻击艇，它在水里上下颠簸，于是一位伞兵游泳过去，把它拉了回来。凯恩和鲁宾逊用枪托划起水来，而那些仍然还有头盔的伞兵们则从船里向外舀水。来到南岸以后，一名宪兵指引他们去了一个谷仓。在谷仓里，凯恩最先认出来的一个人是希克斯准将。准将迅速走了过来。“唔，”他说道，“起码这里有一位刮了脸的军官。”凯恩疲倦地咧开嘴笑了。“我受过很好的教养，长官！”他说。

在环形防线边缘，在德国人的炮火轰击下，几十名士兵仍然在雨水中挤作一团。尽管有一两条船试图在烟幕的掩护下过河，但现在，在日光之中，已经不可能继续撤离。有些士兵试图游泳撤离，但被迅速的水流吞没，或者被机枪打死。有些人幸运地过了河。还有的人由于伤势太重，所以无能为力，只能无助地坐在滂沱大雨中，或者前往北方———返回到环形防线里的医院去。许多人决定先躲藏起来，一直等到天黑再试图到达对岸。最终，有几十个人用这种方式成功地逃脱了。

在南岸，以及在德里尔，精疲力竭、满是污垢的士兵们寻找他们的部队———或者说是寻找他们部队所剩下的人。伞降信号员中的中士斯坦利·沙利文，也就是曾经在学校的黑板上写下傲气的话的那一位，他记得，有人问道："一营在哪里？"一位下士立即站了起来。"这就是，长官！"他说道。在他的旁边，几个又湿又脏的士兵痛苦地笔直站了起来。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在人群当中走来走去，寻找他们炮组的伞兵们。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克里斯蒂突然感到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他不知道，在第二炮组中除了他之外还剩下了谁。

在前往德里尔的路上，厄克特将军来到了托马斯将军的司令部。他拒绝进去，而是站在外面，就在雨中等着，同时他的副官去安排车。这并不必要。当厄克特在外面站着的时候，一辆布朗宁将军司令部的吉普车来到了，一位军官护送厄克特返回军部。他与他的一行人被带到奈梅亨的南郊的一幢房子。"布朗宁的副官哈里·凯特少校，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房间，提议我们把湿衣服脱下来，"厄克特说。这位骄傲的苏格兰人拒绝了。"我任性地要求布朗宁就我们这个样子来见我们———就我们一直的这个样子来见我们。"在等了好长时间以后，布朗宁出现了，"还是一如既往，穿着整洁"。厄克特认为，他的样子，好像"他刚刚接受检阅回来，而不是在战斗之中从床上起来"。对这位军长，厄克特只是说："对不起，事情的结局并不像我本来希望的那样好。"布朗宁给了他一杯饮料，回答说："你尽了全力。"后来，在给他的那间卧室里，厄克特发现，他本来好长时间都渴望能够睡上一觉，但现在却不可能入睡。"在我的头脑里和我的良心中，"他说道，"有太多的事情了。"

要思考的事情确实很多。第一空降师被牺牲掉了，被屠杀了。在厄克特最初的10005名兵力中，只有2163名伞兵渡过莱茵河回来，外加160个波兰人和75个多塞特团的人。在行动开始的9天之后，这个师有将近1200人阵亡，有6642人失踪、负伤或者被俘。后来证明，德国人也蒙受了严重的损失：有3300名伤亡人员，其中阵亡者为1100人。

在阿纳姆的冒险结束了，市场花园行动也随之结束。现在，除了撤退和巩固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这场战争将继续下去，直到1945年的5月。"这场战争中的最伟大的空降行动，就这样以失败结束了，"一位美国

历史学家后来写道，“尽管蒙哥马利断言，它是百分之九十成功，但他的宣称只不过是一种安慰性的修辞手法。除了阿纳姆之外，所有的出击目标都夺取了。但没有夺取阿纳姆，别的一切就毫无价值。作为对这么多勇气和牺牲的回报，盟军赢得了一个50英里长的突出部———从这个突出部哪里也去不了。”注

也许是因为，本来预料能够逃脱的人数微乎其微，所以就没有准备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送这些精疲力竭的幸存者们。许多人，已经在别的地方受了这么多的苦，现在又不得不步行返回奈梅亨。在马路上，爱尔兰近卫团的罗兰·兰顿上尉站在寒冷的雨水中，注视着第一空降师回来。当疲倦、肮脏的士兵们踉跄走来时，兰顿后退了。他知道，他的连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驱车从奈梅亨赶到阿纳姆，然而他仍然感到不安，“几乎不好意思同他们说话”。爱尔兰近卫团的另外一位士兵默默地站在马路边上，一位伞兵走到与他并排的时候，喊道：“你们到底到哪里去了，老兄？”近卫团的那个士兵平静地回答道：“我们一直打了5个月的仗。”近卫团的下士威廉·切内尔听见，一位空降兵说道：“喂？你们一路行驶得好吗？”

当士兵们陆续地返回时，有一位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的军官，查看着每一张脸。埃里克·麦凯上尉的那一小群掉队者，曾经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那座校舍里英勇地坚守着，麦凯逃脱出来到达了奈梅亨。现在他在寻找着他的连的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能够到达阿纳姆大桥，但麦凯抱着顽固的希望，在从奥斯特贝克出来的空降兵行列里寻找他们。“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脸，”在谈到那些伞兵的时候他说，“那些脸都显得拉长了，而且疲倦，令人难以置信。不论在哪里，你都可以挑出一个老兵来———一张带有错不了的‘我根本就不在乎’的表情的脸，好像他永远也不会被打败。”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到黎明，麦凯一直待在马路边。“我没有看见一张我认识的脸。当我继续注视的时候，我恨每一个人。不论对这件事负责的人是谁，我都恨他。我恨这支军队，因为它犹豫不决。我想到了生命的浪费，想到了一个优秀的师被浪费掉了。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当麦凯回到奈梅亨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在那里，他开始在集合点和士兵临时营房里核对，决心找到他的士兵。在他们连的200名工兵中，回来的只有5个人，包括麦凯本人。

在河的另外一边，一些士兵和平民留下了，他们的工作或者伤势要求他们留在后面。因为时间太晚而无法成行的小股士兵，也留下了，他们蹲在现在没有部署兵力的战壕里和火炮掩体里。对这些幸存者们来说，不再有任何希望了。在被毁坏了的环形防线里，他们等待着他们的命运。

随军卫生员塔菲·布雷斯把最后能够行走的伤员带到了河边，结果发现此刻岸边空无一人。在与那些伤员挤作一团的时候，布雷斯看见有一位上尉走

向前来。“我们该怎么办？”那位军官问布雷斯，“再也不会有船了。”布雷斯看了看那些伤员。“我想我们得待在这里，”他说道，“我不能离开他们。”那位上尉摇了摇头。“祝你们好运，”他对他们所有的人说，“我要试着游过去了。”布雷斯最后看见，那位军官涉水下了河。“也祝你好运，”布雷斯喊道，“再见！”

塔弗尔贝格旅馆里的那位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少校，对他来说，“师部的离开是一粒要吞掉的苦药丸”，但他仍然继续他的工作。里格比－琼斯与卫生员们一起，在旅馆地区的每一幢房子里搜寻，把受了伤的人带了进来。这些卫生员经常是抱着伤员到聚集地点，把他们装进德国人的卡车、急救车和吉普车里，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前去做俘虏。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佩尔神父睡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惊醒了，确信有什么事情出了大差错。接着他意识到，那是一种不自然的安静。他匆匆走了出去，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个卫生员站在窗前，外面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当佩尔走来的时候，卫生员转过身来。“这个师走了！”他说道。佩尔并没有被告知撤离的事情，他盯着卫生员：“你疯了，老兄。”那个卫生员摇了摇头：“你亲自看看吧，先生。我们现在确实成了俘虏了。我们这伙人得撤退了。”佩尔无法相信。“先生，”卫生员说道，“你得向病人公布这个消息。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佩尔走遍了这个旅馆。“每一个人都试图情绪高昂地接受它，”他回忆说，“但实际上我们全都非常沮丧。”然后，在那间仍然收容着大多数伤员的大房间里，一位士兵坐在钢琴面前，开始弹奏流行歌曲。士兵们唱了起来，佩尔也不由自主与他们一起唱起来。

“在吃了最后几天苦之后，这样做是奇特的，”佩尔说道，“德国人无法理解，但要解释起来也很容易。那种提心吊胆，那种被落在后面的感觉，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反应。除了唱歌之外，没有事情可做。”后来，当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和别的荷兰平民准备离开到德国人的医院里去帮助伤员的时候，佩尔遗憾地挥手道别。“他们和我们一起受苦，忍饥挨饿，然而他们一点也不为自己考虑。”当最后一辆救护车消失时，佩尔和卫生员们把他们少得可怜的财物装上了一辆德国卡车。“德国人帮助了我们，”他回忆说，“敌意奇怪地消失了。我们谁都没有什么可说的。”当卡车驶离时，佩尔闷闷不乐地凝视着成了黑色残骸的斯胡努尔德旅馆，“那里曾经创造出绝对的奇迹”。他“坚信，第二集团军渡过莱茵河，再次夺取这个地区只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也许就是在今天晚上”。

在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向伤员们道了别，伤员们现在全都成了俘虏。她拉着一辆手拉车，在5个孩子的陪伴下，步行前往阿珀尔多伦。没走多远，她停了下来，回头看着曾经是她的家的那座古老的教区牧师住宅。“一缕阳光照射着一个挂在房顶上的鲜艳的黄色降落伞，”她写

道，“鲜亮的黄色……那是空降兵在打招呼……再见了，朋友们……上帝保佑你们。”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也在前往阿珀尔多伦的路上，当红十字会的汽车和救护车，载着来自塔弗尔贝格旅馆的伤员经过时，她不停地寻找她的父亲。安赫与她的姨妈和兄弟一起，凝视着她在那整整一个星期逐渐认识的那些熟悉的面孔。然后，当一辆卡车经过的时候，安赫看见了父亲，她的父亲就坐在车上。她朝他尖叫着，跑了起来。卡车停下了，范·马尔南医生从车上爬了下来，迎接他的家人。他热烈地拥抱他们所有人，说道：“我们从未这么贫穷，也从未这么富有。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村子，我们的家，我们的财产。但我们拥有彼此，而且我们活着。”当范·马尔南医生又回到车上照料伤员的时候，他安排家人在阿珀尔多伦见面。当他们走在几百个难民当中的时候，安赫回过头看。“天空是鲜红的颜色，”她写道，“就像为我们牺牲了生命的空降兵的鲜血一样。我们四个人全都活着，但在战争的这个毫无希望的星期结束时，战斗在我的灵魂上留下了印象。光荣属于我们所有亲爱的、勇敢的英国兵，属于所有为了帮助和拯救别人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人们。”

在德里尔，科拉·巴尔图森一觉醒来，发现寂静得奇怪。那是9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科拉因为伤口而发僵、疼痛，又因为这寂静而感到困惑，于是一瘸一拐地走到外面。烟从镇子的中心滚滚升起，也从河对面的奥斯特贝克滚滚升起，但战斗的声音消失了。科拉跨上自行车，缓慢地朝镇子蹬去。街上空无一人，部队离开了。在远处，她看见一个朝南开往奈梅亨的车队的最后一辆车。在德里尔一个成了废墟的教堂附近，只有几个士兵在一些吉普车旁边逗留着。科拉突然意识到，英国人和波兰人正在撤退，战斗结束了，德国人将很快就会回来。当她走向那一小组士兵的时候，损坏了的教堂尖塔上的钟响了起来。科拉抬起头。坐在钟楼上的是一个空降部队的伞兵，头上包着绷带。“出了什么事？”科拉喊道。“全结束了，”伞兵喊道，“全结束了。我们撤离了。我们是最后一批。”科拉抬头凝视着他：“你为什么敲钟？”伞兵再次踢了钟一下。钟声在德里尔这个有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上空回响，然后逐渐消失。伞兵朝下看着科拉。“看来这就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他说道。

“在我的——抱有成见的——观点看来，如果这次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恰当的支持，并被给予了任务所必需的飞机、地面部队以及行政资源的话，那么尽管有我的错误，尽管天气不利，尽管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出现在阿纳姆地区，这次行动仍然会获得成功。我仍然是市场花园行动不懊悔的鼓吹者。”

——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蒙哥马利回忆录：阿纳姆的蒙哥马利》，第267页。

“我的国家再也消受不起蒙哥马利的另外一次奢侈的胜利了。”

——荷兰亲王伯恩哈德致本书作者

1. 环形防线东南端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谢里夫·汤普森上校的迅速思考。在混乱的战斗当中，9月19日从阿纳姆撤退的士兵发现自己没有领导人，汤普森迅速把他们组织起来，保卫火炮阵地前面的那最后一块高地。这些兵力，连同早些时候与他们的部队分离开来的那些兵力——大约150名滑翔机飞行团的士兵，以及他本人的炮兵，总数约800人——被称之为“汤普森部队”。这支兵力随后又得到了补充，被安排由朗斯代尔少校指挥。他们在9月20日晚些时候撤退，由汤普森部署在火炮阵地的四周。由于指挥员的改变，也由于总的形势，就这些事件而论仍然继续存在着某种混乱，但就在汤普森于9月21日负伤之前，火炮地区的所有步兵，都在后来称之为“朗斯代尔部队”的指挥之下。滑翔机飞行团的士兵则仍然在第一机降旅的指挥之下。——原注

2. 星期四黎明后不久，当德国人开始围捕仍然试图坚守的那些为数甚少的士兵时，芒福德把他的无线电接收装置毁掉了。“敌人的坦克和步兵就在桥上，”芒福德回忆说，“我帮忙把负了伤的人抬到一个伤兵救护点，然后把无线电砸了。汤普森上校再也不能为我们做什么了，不能为每一个想回到奥斯特贝克师部的人做什么了。”芒福德在试图到达英军营地的时候，在阿纳姆的郊外被俘虏。——原注

3. 对那条渡船的真实叙述，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甚至官方的史书也说明，它被炸沉了。其他的说法暗示，为了避免它被使用，德国人或者是用炮火把它炸毁了，或者是把它转移到了他们控制下的另一个地点。在德国人的任何战争日记、日志或者战后报告中，都没有提及此事来支持这些猜测。我采访了德国军官——比如比特里希、哈策尔、哈梅尔和克拉夫特，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忆起，曾经下令进行过任何这种行动。我认为，假定德国人想夺取这条渡船的话，那么他们要找到这条船，就会遇到爱德华兹所报告的相同的困难。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位德国军官记得曾命令切断缆绳，以免英军使用它。——原注

4. 敦刻尔克（Dunkirk），法国北部港口城市，1940年英军被德军打败，由此成功撤回本国。

5. 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我自由地服役》，第124页。——原注

6. 有些报道声称，科拉是地下组织成员，被派去告知索萨博斯基，那条渡船在德国人的手里。“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科拉说道，“我从来就不是

抵抗力量成员，尽管我哥哥与它有联系。英国人并不信任地下组织，我们德里尔村的人，直到波兰人在我们上空直接落下的时候，才知道有这次空投。”——原注

7. 爱尔兰近卫团的鲁珀特·马哈菲中尉记得，坦克部队在埃尔斯特被挡住后不久，荷兰艾琳公主旅的一位军官来到爱尔兰近卫团的食堂吃饭。这位荷兰军官朝桌子四周看了看，说道：“你们将会考试不及格。”他解释说，在荷兰参谋学院的考试中有一道题，何为从奈梅亨进攻阿纳姆的正确方式。有两种选择：一、沿着大马路发起进攻；二、在大马路上驱车1到2英里，然后向左拐弯，渡过莱茵河，以侧翼运动绕道而来。“凡是选择沿着马路一直向前的人，考试都没有及格，”军官说道，“凡是选择向左拐弯，然后前往河边的人，都及格了。”——原注

8. 第五部的标题即源出于此。原文是德文DerHexenkessel，标题处所附的英译是“TheWitches，Cauldron”，直译是“巫婆的大锅”，引申的意思是“杂乱的一团”、“凶险的形势”、“可怕的混乱状态”。

9. 圣尼古拉（St.Nicholas，？—350），小亚细亚米拉主教，米拉（Myra）是小亚细亚西南部临地中海一个古国利西亚（Lycia）的一个地方。圣尼古拉是儿童、海员及一些国家（如俄国和希腊）和城市的主保圣人，在美国和英国是圣诞节的主保圣人。

10. 米勒（GlennMiller，1904—1944），美国爵士乐长号手、乐队领队、作曲家。他创作了多首流行金曲，最著名的是《月光小夜曲》（MoonlightSerenade）和《来劲儿》（IntheMood）等。在声名最为显赫时，曾出现在两部好莱坞影片中。二战期间入伍（1942年），担任美国空军乐队领队。在一次从英格兰去巴黎的飞行途中，米勒乘坐的飞机失踪，人也无从找到。他被誉为英雄。

11. 那些韦塞克斯人即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韦塞克斯（Wes□sex）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地区，该师即以韦塞克斯人组成。英军番号别具特色，前面是师的序号，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43rdWessexDi□vision），其实就是第四十三师，又名韦塞克斯师。

12. 见切斯特·威尔莫特，《为欧洲而斗争》，第516页。

13. 萨默塞特（Somerset）是英格兰的一个郡。第七萨默塞特营（7thSornersets，或者7thSomersetBattalion），就是第七营，又名萨默塞特营。

14. 所涉及的这些著名的英国团的番号，总是给美国人带来混乱——尤其

是在使用缩写的时候。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部里，有关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的电报来了，电文是“第五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定于与第一空降师联系……”大惑不解的值勤官终于把电报解码了。他汇报说，“5条鸭子船登陆步兵”正在前往厄克特。——原注［译者按：第五康沃尔公爵的轻步兵团（5thDukeofCornwall＇sLightIn fantryRegiment），就是第五轻步兵团，又名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这里的解码，根据的是电文中的番号缩写——5DCLI，结果把缩写猜成了5条（5），鸭子（D－duck），船（Craft），登陆（Landing），步兵（In fantry）；这是一个团，团字（Regiment）省略，值勤官没有想到这一点，结果成了不伦不类的“5条鸭子船登陆步兵”。］

15. 龙骑兵近卫军团（DragonGuardsRegiment），即这是一个团，由龙骑兵近卫军组成。

16. 怀利再也没有看见沃斯奎尔一家，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他一直替地下室里的那个女人以及他以为死了的那个孩子担心。后来，小亨利·沃斯奎尔成了一名医生。——原注

17. 多佛尔是英格兰东南部港口城市，多佛尔的白色断崖俯瞰英吉利海峡，是著名风景名胜。《多佛尔的白色断崖》（TheWhiteCliffsof Dover）是著名二战歌曲，由纳特·伯顿（NatBurton）作词、沃尔特·肯特（WalterKent）作曲，1941年由著名歌星，号称“军人的心上人”的薇拉·林恩（VeraLynn）灌制成唱片。《多佛尔的白色断崖》是她演唱的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另外一首最著名的是《后会有期》［We＇ll MeetAgain］。）这首歌有四段歌词，前三段是：“明天／只需等待，便可看见，蓝色知更鸟／将从多佛尔的白色断崖飞过。／／明天／当世界获得自由，／便将永远有欢声，笑语和和平。／／羊倌将清点他的羊群，／山谷将再次盛开鲜花，／而吉米将再次／在他的小屋子里睡眠。”第四段是第一段歌词的重复。

18. 这里的信，即基督教三大德（信、望、爱［faith，hopeand charity］）之一的信，即信仰，信神。

19. 有关这场战争的一些最优秀的报道来自阿纳姆。那个隶属于第一空降师由10人组成的记者团包括：公共信息官罗伊·奥利弗少校；保密检查员空军中尉比利·威廉斯和彼得·布雷特上尉；陆军摄影师中士刘易斯和中士沃克；以及伦敦《每日快报》的记者艾伦·伍德，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斯坦利·马克斯特德和盖伊·拜厄姆，路透社的杰克·斯迈思，和隶属于索萨博斯基旅的波兰记者马雷克·斯威齐基。这些人，尽管受到了匮乏的通信手段的限

制，每天只得到几百个字的公报消息，但他们仍然以战争报道的最优秀传统，描绘了厄克特的士兵们的极大痛苦。这个团队，一直以来，我连其中的一位都没有能够找到。大概，他们全都死去了。——原注

20. 令人不解的是，英国的一些官方和半官方报道断言，在9月23日，星期六，恶劣的天气使得飞行活动受阻。气象报告、军部报告以及盟军空军的战后报告全都记载，星期六的天气是晴朗的，与从19日即星期二以来的每一天相比，飞行任务都执行得更多。在半官方的《为欧洲而斗争》一书中，作者切斯特·威尔莫特出了差错，他说："再次空运补给品因为恶劣的天气而受挫。"这个说法改变了他对随后的战役时间顺序的排列。别的报道，由于使用了威尔莫特的书作为指导，也就愈加不精确了。——原注

21. 语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一节。

22. 《继续和我在一起》（AbideWithMe）是最流行的基督教圣歌之一，1847年由亨利·莱特（HenryLyte）作词，1861年由威廉·蒙克（WilliamMonk）作曲。这里唱的是歌曲的第一段。

23. 飘窗（baywindow），凸出于墙壁之外三面有玻璃的窗户。

24. 施卡尔卡的叙述大概是真实的，即双方进行了一些电讯的交换。然而这些电讯的用词是可疑的，尤其是他有关德国空军的回答，在那个星期，德国空军就在空中，骚扰着英军的空投。不仅如此，这还是对他自己国家的军队的贬抑。在敌人面前对自己一方作轻蔑的估价，在党卫军当中是罕见的。——作者原注。（又，译者按："就按协议办"，原文是"Juststicktotheagreement"，stickto意思是"遵守"，施卡尔卡气急了，在回电的时候把stickto改成Lick，意思是"舔"，含有骂人之意。）

25. 在医院里，拉思伯里和哈克特都成了"一等兵"。中士戴夫·莫里斯，在哈克特做手术前为他输了血，他被提醒，准将的身份不得透露。拉思伯里从19日起就一直在医院里，当奥斯特贝克的伤员们到达的时候，才第一次得知了师里的消息——包括厄克特终于回到了师部，以及弗罗斯特的士兵坚守阿纳姆大桥几乎4天时间了。后来，这两位准将都在荷兰人的帮助下从医院里逃脱，躲藏了起来。拉思伯里最终是与约束不住的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在一起，泰瑟姆-沃特穿着平民衣服，与荷兰地下组织一起工作，"非常公开地四处走动，有一次还帮忙将德国的参谋车从沟渠里推出来"。拉思伯里与被荷兰人藏起来的大约120名伞兵、卫生员和飞行员一起，在一名荷兰向导的带领下，于10月22日傍晚到达了莱茵河南边的美国部队。那位匪夷所思的泰瑟姆-沃特，帮助了大约150名英军士兵逃跑。顺

便说一句，本书作者花了7年的时间，才发现了他的下落——是偶然发现的。我的英国出版商在肯尼亚遇见了他，二战结束以后他一直住在那里。泰瑟姆 - 沃特说，他“在战斗中带着雨伞，更是为了身份辨认的目的，因为我老是忘记口令”。——原注

26. 《只是在暮色中唱支歌》（Justasongattwilight），是一首19世纪的英国情歌。

27. 在有关这场战役的别的报道中，出现了有关这封电报的几种版本。上面的是最早的版本。内维尔·海中尉保留了他记录了时间的鬼怪式通信网的日志，并让我使用。对他的合作我深表感谢。——原注

28. 吉米是格拉夫顿的名字詹姆斯的昵称。

29. 多塞特（Dorset）是英格兰的一个郡，多塞特团即由该郡的人组成。

30. 其中一颗蹦蹦跳跳的手榴弹实际上打到了蒂利的头，而且爆炸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只是受了轻伤，并作为战俘活了下来，直到战争结束。

31. 明明是撤退，只能是离柏林越来越远，可撤退又冠以“柏林行动”的代号，不能不是“极其令人啼笑皆非”。这个短语原文是，“cruellyironic”，如果硬译的话，那就是“所具有的讽刺性近乎残忍了”。

32. “那些坦克是在凌晨的时候到达的。”哈梅尔将军在他的作战日记·9月24日·附件6中特别提到。他又补充说，“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司令部，把这个分遣队的大半，也就是45辆虎式坦克，分配给了第十党卫军弗伦茨贝格师。”——原注

33. 加利波利（Gallipoli），土耳其西北的狭长半岛，即加利波利半岛，构成达达尼尔海峡（theDardanelles）北岸，是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在此发生激战。盟军试图用海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但遭到失败，于是便决定入侵加利波利半岛，希望能使土耳其脱离战争，并为通往俄国在黑海的各个港口打开运送补给品的航线。尽管土耳其人处于严重的不利局面，但盟军也未能抓住这个机会，结果这个战役陷入了阵地战。在双方各蒙受了25万人的伤亡之后，盟军于1916年1月成功地从半岛撤离，而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伤亡。

34. 海滩勤务队队长（beachmaster），其职务是指挥部队登陆或装备卸船。

35. 《轻骑兵旅的冲锋》（ChargeoftheLightBrigade），是英国桂冠诗人

丁尼生（AlfredTennyson，1809－1892）的一首名诗，是为了纪念在克里米亚战争（1953—1856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中，英军轻骑兵旅于1854年9月26日发起的一次著名的冲锋。冲锋英勇完成任务，但参战的673名官兵有247名阵亡或者负伤。当时轻骑兵旅向一个三面有俄国士兵重兵把守的山谷发起进攻，这次冲锋实际上是为了非常小的军事目的，而使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轻骑兵部队大量伤亡。

36. 那些孩子们永远也看不到这些字了。9月27日，在一次针对荷兰人的野蛮报复行动中，德国人命令阿纳姆地区的人全部撤离。阿纳姆和周围的村庄将无人居住，一直到战争最后的日子，也就是1945年的4月4日，那一天，加拿大部队到达了。——原注

37. 这里的原文是Chick，可译为“小孩”，也可译为“小鸡”。科克里尔（Cockrill）这个名字的前一半是“Cock”，意思是“公鸡”，所以具体到这个名字，“小孩”和“小鸡”之意二者兼有，都是亲昵的称呼。

38. 节（knot），航速和流速单位，1节＝1海里／小时。“流速大约是9节”，即“流速大约是每小时9海里”。

39. 见约翰·C·沃伦博士，《二战中的空降行动，欧洲战区》，第146页。——原注

伤亡小记



盟军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伤亡，超过了规模巨大的诺曼底登陆。大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在D日，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24个小时里，盟军损失的总数，据估计达到10000到12000人。而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9天中，共同的损失———也就是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的阵亡、负伤和失踪人员，达到17000人以上。

英军的伤亡是最高的：13226人。厄克特的师几乎完全被消灭了。在阿纳姆的10005名士兵中，其中包括波兰人和滑翔机飞行员，伤亡总数为7578人。除了这个数字之外，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损失是294人，这使得负伤、阵亡和失踪人员的总数到达7872人。霍罗克斯的第三十军损失了1480人，英军第八军和第十二军又损失了3874人。

美军的损失，包括滑翔机飞行员和第九运输空军兵团，据估计为3974人。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损失1432人，泰勒将军的第一○一空降师损失2118人，空勤人员损失424人。

德国人的完整伤亡数字仍然不为人知，不过在阿纳姆和奥斯特贝克，公认的伤亡数字达到3300人，其中1300人阵亡。然而，在市场花园行动战役的整个地区，莫德尔的损失要大得多。从在内佩尔特的突围开始，然后沿着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个走廊，在奈梅亨、格拉夫、费赫尔、贝斯特以及艾因霍温进行的那些战斗中，阵亡、负伤或者失踪的敌人的数目，找不到有关的数字分析，尽管如此，但在采访了德军指挥官以后，我还是愿意保守地估计，B集团军群的损失，起码是7500到10000人，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阵亡。

荷兰平民的伤亡又怎样呢？谁也说不清楚。阿纳姆和奥斯特贝克的死亡人数据说是低的，不到500人，但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我听说，在整个市场花园行动战役中，加上从阿纳姆防区的强行撤离，这次进攻之后的那个可怕的冬天又是贫困和饥饿交加，这一切所造成的伤亡数字———也就是说死亡、负伤或者失踪的数字———高达10000人。

作者致谢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快30年了，尽管同盟国和德国的记载卷帙浩繁，但对寻找幸存者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踪迹正在变得模糊。许多最重要的人物已经死去，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也随着他们消失。在诺曼底进攻之后的所有重大计划和战役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花园行动了。然而，除了一些个人回忆以及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史书中的几个章节之外，这个悲惨的故事在美国实际上无人知晓。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一空降师，在这场战役中所起的卓有成效的作用———尤其加文的部队渡过瓦尔河———在英国人的叙述中很少占有超过一两个段落的篇幅。

英军第一空降师在阿纳姆的奋力抵抗，仍然是二战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壮举之一，但它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是英国的第二个敦刻尔克。由于官僚们往往会掩盖他们的失败，所以不论是在美国的还是英国的档案中，用于证实的文件也就经常是不足而且难以获得的。为了解读一些费解之事，也是为了从所有的参与者———盟军、德国人、荷兰地下组织以及荷兰平民———的立场，对这次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联合进行的攻击行动，提交出我所认为的第一个完整的描述，我用了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那个阶段，有时，尤其是我身患重病的时候，我对这本书能否出版都不抱希望了。

正如我先前有关二战的著作———《最长的一天》（1959）以及《最后一役》（1966）———一样，信息的基础来自参与者：盟军的官兵，与他们作战的德国人，以及勇敢的荷兰平民。总共有大约1200人为《遥远的桥》的写作提供了信息。这些军事人员、前军人以及平民，他们无私而且毫不吝啬地无偿付出他们的时间，接受采访，带领我参观战场，从日记、信件、军事专著、电话记录、仔细保存下来的战后报告、地图和照片中，提供证据和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提供信息的人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内容完全一样、缺少确证或者数量太大，因此并非每一个人的故事或者经历都能够被包括进来。在这1200位提供了信息的人当中，一半以上的人受到了采访，而且这些叙述中的大约400份被使用了。但过了30年以后，记忆并非绝对可靠。某些严格的指导方针，与我以前的书所使用的研究过程相类似，也就不得不予以遵循。这本书中的每一个陈述或者引语，都得到了文件证据的支持，或者得到了那些听说过或者目睹过所描述事件的人的确证。传闻、谣言或者第三方的叙述，都不能被写进来。我的卷宗包含了几百个故事，它们可能是完全精确的，但又无

法得到别的参与者的支持。出于历史真实的原因，它们并没有被使用。我希望那些众多的提供信息者能够理解。

在重现市场花园行动那可怕的9个昼夜的过程中，有这么多的人帮助了我，以至于竟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提出他们的名字。首先，我尤其想感谢伯恩哈德亲王殿下，他花费了时间，提供了帮助，找到并提出应该采访的人，并让我得以接触到荷兰和英国的档案。我也热忱感谢《读者文摘》的德威特和莉拉·华莱士。他们不仅报销了写这本史书的大量费用，而且还让我受到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办事处记者和研究人员的接待。在这些人当中，我尤其想感谢以下各位：纽约的希瑟·查普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朱莉亚·摩根；伦敦的迈克尔·伦道夫；巴黎的约翰·D·潘尼策、约翰·弗林特、厄休拉·纳卡谢、吉泽尔·凯泽；斯图加特已故的阿尔诺·亚力克西；阿姆斯特丹的阿尔德·范·莱伊文、扬·海因、莱斯贝斯·施蒂曼，以及扬·范·奥斯。

一个特别的段落，必须献给弗雷德里克·凯利孜孜不倦、勤恳精心的工作，他做了我两年的助手。他在英格兰、荷兰和美国所做的研究、采访和优秀的新闻写作，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他为参与者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也都被证明是极有价值的。

必须向美国国防部的军事史主任办公室表达谢忱。在我进行研究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是哈尔·C·帕蒂森准将，也必须感谢帮助我制定出军事框架的帕蒂森准将的助手们———尤其是迪特马·M·芬克和汉娜·蔡德里克。另外一个其帮助和鼓励必须提及的人，是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查尔斯·B·麦克唐纳，他的内容详尽的《齐格菲防线战役》（The Siegfried Line Campaign）一书，包含了对市场花园行动的优秀而又精确的叙述。我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丁·布卢门森的《突围与追击》（Breakout and Pursuit），他的这本书是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正式史书系列之一。而且我要再次表达对福里斯特·C·波格博士的谢意，感谢他在军事史主任办公室的《最高统帅部》（The Supreme Command）一书中详尽介绍的指挥结构。

我必须对美国国防部书刊部的官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帮助我在美国和欧洲各地找到老兵并安排了采访，这些官员是：美国空军的部主任小格罗弗·G·海曼上校（已退休）、美国陆军副主任的小查尔斯·W·伯蒂克中校、美国空军的罗伯特·A·韦布中校、安娜·C·厄班德小姐，以及副官署署长办公室里的西摩·J·波姆伦茨。

在对德国进行研究方面，我感谢美国国防部二战档案部的下述各位：部主任罗伯特·W·克劳斯科普夫博士、赫尔曼·G·戈德贝克、托马斯·E·霍尔曼、洛伊丝·C·奥尔德里奇、约瑟夫·A·埃弗里、黑兹尔·E·沃德、卡罗琳·V·穆尔，以

及希尔德雷德·F·利文斯顿。如果没有对所提供出来的德国战争日记和专著的完全理解，我就几乎不可能精确地采访德国的参与者，尤其是党卫军的指挥官们———威廉·比特里希中将、海因茨·哈梅尔少将以及瓦尔特·哈策尔中校———他们是首次把他们对市场花园行动的描述告诉给了一个美国人。

在荷兰，我与我的助手们从荷兰档案当局接受了最亲切的合作。我十分感激国家战争文献资料研究所所长、教授、路易斯·德容博士，档案保管员雅各布·兹瓦恩，阿纳姆空降博物馆馆长B·G·J·德弗里斯先生，以及爱德华博士和埃米·格罗威尔德太太。在荷兰皇家陆军的军事史部，许多人让我的助手们使用了相关的研究，在那些人当中有格里特·范·奥伊恩中校、奥古斯特·克尼普肯斯中校、吉尔伯特·弗拉克斯上尉、亨德里克·希尔克马上尉。荷兰人的帮助非常详尽，我甚至被提供了市场花园行动中所涉及的各个桥梁的比例地图、绘图和照片。尤其帮忙的是路易斯·艾恩特霍芬，他是战后荷兰的安全和情报局局长，他帮助弄清楚了科尼利厄斯笔下的荷兰间谍“金刚”林德曼斯的故事。

阿纳姆、奈梅亨、费赫尔和艾因霍温各市的市档案馆是极其重要的，大量背景材料在那些档案馆里找到了发生地点，得到了验证。我十分感谢在这些中心里的下述各位：克拉斯·施哈普、安东·施坦弗、皮特·范·伊德金格博士（阿纳姆档案馆）、艾尔伯特·尤金和彼得鲁斯·施利彭贝克（奈梅亨档案馆）、扬·容格内尔（费赫尔档案馆）、弗朗斯·科尔蒂（艾因霍温档案馆）。

在荷兰，有许多人提供了信息，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奥斯特贝克的扬和凯特·特尔霍斯特夫妇，以及扬和伯莎·沃斯奎尔夫妇，他们花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同我在一起，回顾了英军第一空降师在他们村子里受磨难的最后几天的每一个细节。扬·沃斯奎尔带我去了战场，特尔霍斯特夫妇则第一次解释清楚了德里尔渡口的神秘环境。在德里尔，巴尔图森一家让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详尽采访，那些采访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核对和阐释来自荷兰的采访记录方面，我也必须向一位杰出的记者表达我的感谢，他就是阿姆斯特丹《电讯报》（Telegraaf）的A·胡格诺特·范·德林顿。如果没有他的留意，我很有可能会出许多错误。我也要感谢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他后来是鹿特丹的警察局长，他几乎是逐分钟地给我讲述了在厄克特将军司令部里发生的事情。在奥斯特贝克，马尔南一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日记和采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也是如此，她一丝不苟的记录，就像马尔南家的日记一样，给伤亡人员收容站里的形势一个清晰的画面。他们生动的记载和非同寻常的帮助，使得我能够再现那种氛围。我对他们所有人深表感谢。

许多军方人士提供了信息，在他们当中，必须特别提出感谢的是詹姆斯·M·

加文将军、马克斯韦尔·D·泰勒将军、罗伊·厄克特将军和查尔斯·麦肯齐上校———他们全都耐心地接受了数不尽的采访。还有的人帮助极大，他们是约翰·D·弗罗斯特少将、埃里克·M·麦凯上校、菲利浦·W·希克斯准将、约翰·哈克特上将、乔治·S·查特顿准将、戈登·沃尔什准将、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已故的斯坦尼斯劳·索萨博斯基少将，以及随军牧师G·A·佩尔，他的笔记是一个难忘的、令人伤心的文件。布朗宁夫人（达夫妮·杜莫里埃），用她的机智和常识，证明她是一位令人愉快的通信者，并搞清楚了阿纳姆的一些谜团的真相。

在德国，我在追踪幸存者和找到背景材料、专著和战争日记方面，得到了下述各位的巨大帮助，他们是波恩新闻信息局的布里斯讷博士、国防部的西格尔中校、军事史研究部的沃尔夫冈·冯·格鲁特博士和福里克少校，以及联邦档案局的中校、施塔尔博士。

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使得这本书成为可能。我必须再次感谢我的妻子凯瑟琳，她本人就是一位作家，她对研究工作进行了组织和整理，进行了编辑，并留意我笔下的垂悬分词。而且，我衷心感谢我的好朋友帕特里克·内利根医生与威利特·惠特莫尔医生，当我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们一起对我进行了护理，神奇地让我康复起来，让我能继续工作下去。而且，我还要感谢杰里·科恩，他是我主要的“吹毛求疵者”；苏珊娜·格利弗斯和约翰·托尔，他们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手稿；安妮·巴登哈根，她是我尊重的朋友和助手；朱迪·缪斯和波利·杰克逊，她们在各个时期担任过秘书。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保罗·吉特林；感谢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威德和迈克尔·科达，感谢他们提出的建议；感谢《读者文摘》的总裁霍巴特·刘易斯，在这个非常累人的工作的始终，他都在耐心地等待着。